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鉴赏述往事 / 陈重远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 1999
(文玩鉴赏丛书)

ISBN 7-200-03797-4

I. 鉴... II. 陈... III. 古玩-鉴赏-中国 IV. 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9) 第 32749 号

鉴赏述往事

JIANSHANG SHU WANGSHI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 100011

网址 :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字

199 年 月第 1 版 199 年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ISBN

定价 : 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鉴赏述往事 / 陈重远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 1999
(文玩鉴赏丛书)

ISBN 7-200-03798-2

I. 鉴... II. 陈... III. 古玩-鉴赏-中国 IV. 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9) 第 32774 号

鉴赏述往事

JIANSANG SHU WANGSHI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 100011

网址 :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字

199 年 月第 1 版 199 年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ISBN

定价 :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古玩行业的起源及其演变	(1)
古玩行业经营些什么	(6)
古玩行业的经营和行规	(9)
古玩商会史	(12)
第二章	(15)
一、碑帖	(15)
端方求教李云从	(17)
翁同龢与刘振卿论帖	(18)
二、书画	(20)
博古斋审定《百苦吟》	(22)
论古斋的三代人和《董源山水大轴》	(23)
笔彩斋的两幅宋元画	(25)
菇古斋的《袁安卧雪图》	(27)
悦古斋的《画儿韩》续篇	(30)
车翻了，彝古斋关了	(35)
韵古斋韩少慈趣闻	(37)
论文斋靳伯声和张大千	(44)
博韞斋经营明清字画	(49)

证古精舍的张治平	(52)
虹光阁的经营有“ 三靠 ”	(53)
宝古斋的匾和苏东坡真迹	(58)
回忆中的名画	(61)
三、金石	(61)
尊古斋的传说	(62)
式古斋经营西周礼器和昌化十二石	(68)
赵鹤舫“ 牵走 ”拳毛騧和飒露紫	(73)
陶古斋的白玉佛	(77)
郝葆初同罗振玉做生意	(79)
四、瓷器	(80)
经营明清官窑瓷器首户——延清堂	(81)
程瑞卿巧买万历五彩大海碗	(84)
杨伯衡同福开森博士做古瓷生意	(86)
蜚山先生和中国的宋龙泉炉	(88)
雅文斋和宋定窑大缸、钧窑洗、哥窑瓶	(90)
泥瓦匠开三家古玩铺	(95)
韞玉斋经营的名贵瓷器、铜器	(99)
陶庐和宣德雪花蓝大碗	(103)
文古斋和岳彬	(105)
古玩铺里一曲《秦琼卖马》	(108)
馥粹斋和哥窑瓷器	(111)
寂叟《海王村游记》中记载的珍贵瓷器	(113)
五、玉石印章 石砚古墨	(115)
英古斋和鸡血、田黄石章	(115)
德宝斋经营黄玉碗和赵飞燕玉印	(117)
永誉斋、韵珍斋和石砚	(119)
古墨和马振卯	(121)

六、缙丝 雕填 宣德炉 法华器	(123)
大观斋和春字盒、明墨、花鸟缙丝	(124)
法花人和雕填条案	(127)
鉴古斋和缙丝	(129)
雅韵斋和宣德炉	(131)
一对 2.5 米高的黄杨大柜	(133)
七、古琴 刻铜 篆刻	(134)
张春圃教西太后弹琴	(134)
张莲舫和古琴	(137)
刻铜名师和“交通票”贬值	(138)
篆刻与古董	(141)
八、官僚绅士开的古玩铺	(142)
王府出钱办“赏奇”	(143)
知府投资开“崇古”	(145)
交通总长和古欢阁	(149)
《古玩指南》的作者与萃珍斋	(151)
张瑞亭开鉴光阁	(153)
九、文物整修复制和能工巧匠	(154)
裱画业的历史和好手艺	(156)
拓红拓 裱行活	(158)
阎御笔和张明	(158)
官窑瓷器的仿制和后挂彩	(159)
詹远广制作珐琅彩瓷碗	(161)
后挂彩名师巧匠詹兴祥、刘永清	(162)
李焕章修理、复制唐三彩	(163)
青铜器的修复和仿铸	(164)
张济卿整修、复制青铜器	(166)
古铜张修复文物后继有人	(167)

贾玉波和他的五个儿子	(168)
古瓷镶口、配损和做旧	(171)
名贵装璜和硬木雕刻	(173)
第三章	(175)
一、古董沧桑	(175)
古董出口公司和祝续斋之起落	(175)
北魏鎏金佛像的出土与转卖	(181)
岳文轩其人其事	(186)
夏锡忠的故事	(194)
王栋廷和宋代五大名窑	(200)
二、云烟往事	(204)
老古玩铺天和斋	(204)
崔仲良经营保粹斋	(206)
敦华斋和孙瀛洲	(208)
名贵官窑瓷器集锦云散	(210)
苏觐墀的法国之行	(215)
一对珐琅彩碗，关了韵宝斋	(217)
同益恒的四代人	(218)
师傅揭徒弟底	(221)
三、珠宝荟萃	(223)
聚珍斋传奇	(224)
翡翠大王铁宝亭	(234)
四、琐事逸闻	(246)
卖古董的整修宫室	(246)
珠宝商串朝房出趣闻	(248)
曹锟的仆人经营古董	(250)
北京“新世界”与和阗大碧玉	(253)
釉色奇特的弘治官窑瓷盘	(259)

田黄石引出不幸	(261)
柳叶尊导致殒身	(264)
鉴别与经营宣德青花瓷器的诀窍和经过	(265)
一本万利的成化斗彩杯	(267)
一只铜鸭换家古玩铺	(269)
第四章	(273)
一、鉴赏家与收藏家的轶事	(273)
罗振玉是学者也是古董商	(274)
学徒出身的收藏家郭世五	(279)
大收藏家袁励准绰号“袁掌柜”	(282)
未曾破落的旗人收藏家桂月汀	(285)
收藏家的悲剧	
——珍贵文物付东流 上当受骗假“古月轩”	(290)
收藏家开古玩店还想联营大干	(296)
二、鉴别古玩珠宝的路数与方法	(299)
珠宝钻翠的价格变迁和鉴别方法	(299)
鉴定书画的基本功	(303)
鉴别青铜器之要点	(308)
专家谈鉴定古瓷之秘诀	(312)
三、古董佚散	(319)
二百余年未启封的康熙官窑瓷器	(320)
12 万多两金质文物一次抵押	(322)
传世宋钧窑瓷器之抵押变卖	(323)
行宫御用瓷器转入古董商之手	(325)
泰安庙供器失而复得	(327)
西蕃片在瑞典	(328)
“八蛮进宝”进伦敦	(330)
万历五彩兽头尊和日本画家	(332)

古董改变了洋博士的生活习俗	(335)
四、珍品与杂项	(337)
一挂朝珠八万两白银	(338)
翠扳指入土复出	(338)
“百一砚”终归国有	(339)
润贝勒的一对白玉如意	(340)
永乐青花瓷器和葫芦瓶	(342)
250 年前的法国机械钟	(344)
日本画家笔下的《贵妃出浴图》	(345)
一座周代特钟的来历	(347)
烟具与马镫	(349)
牛角灯 活计 织锦诰命 缙绅	(352)
古钱	(356)
第五章	(360)
一、风云人物——老古董商之传略	(360)
祝晋藩 祝德酬 李诚甫 刘振卿	
萧秉彝 袁厚民 王德凤 孙虞臣	
赵佩斋 黄兴甫 白瑞斋 张楼村	
李德宣 李云从 陈玉堂 张春圃	
袁占鳌 呼益卿 计文卿 刘三戒	
白五楼 萧勋臣 萧云章 孙秋 _飘	
郭世五 韩懿轩 郭小臣 丁济谦	
贾腾云 万筱竹 韩少慈 韩敬斋	
卢钦斋 程启元 黄伯川 康竹亭	
赵鹤舫 萧虎臣 杨伯衡 张治平	
周杰臣 关子光 郭静安 俞淮清	
阎善之 张鉴轩 祝续斋 周希丁	
萧敬斋 张孝禹 马霁川 曹文波	

杜华亭	夏锡忠	毛子恒	萧延卿
萧静亭	卢月舟	谢瀛轩	苏惕夫
王栋廷	孙瀛洲	朱浦泉	张式如
安溪亭	张彬卿	萧书农	王幼田
杨润斋	张云岩	崔耀庭	岳文轩
苏觐墀	陈养泉	陈中孚	李健平
何玉堂	刘宜轩	骆泽民	靳伯声
司仁甫	苏凤山	周殿侯	倪玉书
金从怡	叶叔重	仇焱之	贾济川
刘廉泉	耿朝珍	马振卯	黄镜涵
崔仲良	杨兰 _增	李欣木	王孝禹
韩博文	裴振山	傅凯臣	陈鉴堂
萧宏度	靳咨轩	邱震生	乔友声
曹旭深	王致中	徐震伯	丁兆凯
刘学敏	崇庆瑞	李汝宽	王哲东
范岐周	马宝山	李卓卿	

二、琉璃厂古玩铺老字号表 (465)

后记 (476)

再版后记 (478)

二次再版后记 (480)

内 容 提 要

古玩行业都经营些什么？琉璃厂延古斋的创办人赵鹤舫如何“牵走”了“昭陵六骏”之拳毛騧和飒露紫？老北京首任古玩商会会长赵佩斋怎样兢兢业业 30 年而到手了大观斋？清廷醇亲王爷为何起兴开赏奇斋古玩铺？赏奇斋有何可赏？宣德炉的来龙去脉引人入胜，它的“玩头”在哪儿？猜猜 250 年前的法国贡品机械钟光擦油泥就要多少手工钱？门人之盛冠于老北京古玩行的笔彩斋及博古斋都出了哪些位鉴赏奇才？本书寓历史兴衰、文物学问于真实具体的交易过程与人物命运中，述说了老北京古玩界的众多渊源掌故、鉴赏知识、绝学绝技；名器奇珍荟萃，秘闻隐事迭起，鉴赏家、大学者、巨贾大富、王公贵族、军阀、破落户、地痞等各色人等混迹于琉璃厂，演不完的传奇故事，道不尽的古董史话……

前言

这本书原书名《古玩史话与鉴赏》，是我初学之作，1990年出版，1994年再版，先后印刷四次。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我又多次采访古玩珠宝界的老行家，在他们的指导帮助下，我写出了百万余字的“古玩三部曲”：《文物话春秋》、《古玩谈旧闻》、《骨董说奇珍》，1996年后由北京出版社陆续出版，并在海外出版发行。

在我离休后，便把写古都文物市场史实和收藏鉴赏知识，作为我余生的一项事业，不断探索追求，尽力将历史写清楚，将前人鉴定各类文物的方法经验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作参考。

第一本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为满足海外读者的需要，我于1992年写20万字的以宋瓷、明清官窑瓷器和三代青铜器为内容的《古玩旧闻》书稿，先在《中国文物报》上摘编连载第一章，继而香港《龙语》杂志也连载了。又经报社的一位编辑介绍，将全部书稿拿到台北出版。不料，这位中介人同台北出版者另签有合同，而我从未授权他人去签出版合同。与之交涉无结果，书稿没了下落。

当我所追求的事业受到挫折，使我心灰意懒、愤愤难平时，文物界的老专家和出版界的老朋友都劝我说：“你只有写好下部书，才能出这口气。”在他们的支持帮助下，我愤然命

笔继续写了下去。我得到了北京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不断鼓励，给我出版了“古玩三部曲”，成全了我所追求的事业。

北京出版社要再版我写的第一本书，为使书名和“古玩三部曲”那三本书名相吻合，故改名为《鉴赏述往事》。鉴赏文物，自清乾隆年代以来，在京城逐渐形成一种行业，就是古玩业。经营古玩，首先要能鉴别其真赝，会欣赏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才谈得上经营。“述往事，思来者”乃太史公之名言，用以鞭策作者，求真求实，以利于后来者。

这次再版，不仅改改书名，而要重新修订。十年前，我对老古玩、珠宝界的史实的调查了解，没有今天这样深入，再说，当时的思想仍有顾虑。今将十年前我不敢写和不愿写的文物市场史实和鉴赏文物的方法经验，充实进去，用以回报出版社的关怀和读者的厚爱。

序

1986 年夏季，有位“陌生人”来访问我。他做了自我介绍，我和他一边谈一边想，突然想起了他的小名，便叫了出来，问他是不是这个人，他笑了笑说：“是呀！是。”我有些不好意思了，人家是快 60 岁的人了，我怎能叫他小名？！又想是自家弟兄，40 年未见，叫出小名倒也显得亲热。

这个人便是本书作者，名叫陈玉栋，字重远。他幼年上学时住在琉璃厂他伯父开的古玩铺里，后跟他伯父学徒。家里让他结婚，他跑了！又去上学读书，在学校里参加了学生运动，由大学里参军南下。一晃 40 年过去了！我问他这几十年干什么工作，他说：在军政大学、兵工企业、院校教书。现今退休了，想写点古玩行里的人和事，并想向老行家求助素材。我很赞同他的想法，只因我工作繁忙，无暇及此，就介绍一位年老退休、闲在家里的范岐周老先生。果然，他从和范老的长谈中，获得了很多素材。

1988 年，他来找我说，写完了 60 篇，交给文物管理机构，答应登报连载，再出本册子，可是一直不见报。他有点着急。我鼓励他说：“看准了的事，要干到底。不管登不登报，古玩行的历史还没有人写，你把它写好了，就算尽了心，完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

作者用了四年多时间，走访了许多老同行，经过三次大的修改补充，写出了《古玩史话与鉴赏》。本书付梓之前我看了原稿，内容丰富，题材新颖，前三章着重写史，后两章着重写鉴赏收藏，鉴赏中有史料，史料中有鉴赏，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全书三十余万字，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写北京古玩行业的史书。作为文物史料，可供参考之用；作为历史人物故事，简要真实而文笔流畅；作为鉴别文物的工具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书是根据老行家回忆记录下来而写成的，就不免与事实有些小出入，但总的来说是真实的，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从鉴别文物的方式方法上讲，也是总结古玩行老一辈的经验而写出的，老办法总有些不科学的东西，但鉴别文物是从老经验发展到走上科学道路的。

依我看，这本书写得不错，补上了文物史中的一项空白，对弘扬华夏文化，普及文物知识，使后人了解古玩行的历史，都有作用。谨作此序，以致贺意。

孙会元

78 岁时于北京

1990 年 9 月 3 日

第一章

古玩行业的起源及其演变

古玩，在乾隆年间（1736—1795）以前称之为骨董或古董。骨董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开元年间（713—741）张萱写的《疑耀·卷五》：“骨董二字乃方言，初无定字。”至南宋朱熹《语类》乃作“汨董”。明代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中曰：“杂古器物不类者为类，名骨董。”明代和清初较普遍使用骨董或古董这个名词。乾隆年间，古玩这个名词开始叫响，即古代文玩之简称。本世纪50年代初，叶恭绰先生鉴于“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书·旅獒》）之说，建议将古玩改为文物。历史艺术文物委员会主任邱震生先生根据叶老的意见提出，将古玩业改称文物业。1953年末，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在《私营企业统一分类规定》中，正式改为文物业。从此古玩叫文物，古玩铺改称文物商店。

古玩是指可供鉴赏、研究、收藏、摆设用的古代一切雅致器物。鉴定、经营古玩成为一种行业始于何时？文字资料中只有“古玩独立成为商号始于何时，无从稽考”、“古玩行业由来已久”的模糊记载。

从前在外行人中传说，古玩行供吕不韦，吕不韦是他们的祖师爷。其实这是没影的事儿。没影的事儿为什么传说广泛？《史记·吕不韦列传》写道：“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

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吕不韦在赵国邯郸做买卖时，见到“子楚为秦质子于赵”而怜之，说：“此奇货可居。”吕不韦同他父亲有段对话：“耕田之利几倍，答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答曰百倍；立王定国之赢几倍，答曰无数。”于是，吕不韦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用，结宾客；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奉献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吕不韦劝说华阳夫人收纳子楚为嗣。秦昭王死后，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后来，子楚为秦庄襄王，吕不韦当了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人们用这段故事中的吕不韦类比一本万利的古董商，传出古董商的祖师爷是吕不韦。但老古董商最忌讳人们说他们的祖师爷是吕不韦。

在古玩行里流传着另一种古玩行业起源之说：元代至元元年（1264），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在修建大都城时，海王村是个有土山、河流、茂林修竹的京郊小村庄，水路畅通，可用船运输货物至西山。在西山开采烧制琉璃瓦的原料，在海王村建琉璃窑烧制成品。明代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修建北京城时，将海王村元代建立的琉璃窑的规模扩大，由宫内太监掌管窑厂。北京城建成后没有南城，海王村仍是京郊小村。明代有些外乡人在京为官多年，告老而不愿还乡者在海王村蛰居，隐度晚年。这些人平素喜爱琴棋书画，有书画癖，他们在自己的住所挂上斋名或堂号，写上藏书处或藏帖、藏画处等，以此招徕客人，以文会友，共同切磋琴曲棋技书法画艺。明代是每隔三年，各省举子来京会试。有的应试举子到海王村同这些“仕途隐退之士”看书论帖、观赏字画，并请教于这些做过官的引退老人。

嘉靖年间（1522年以后），北京修建南城。在现在的崇文门至宣武门以南一带，各省、府逐渐建立起会馆，琉璃厂适居崇文、宣武之中。寄居在各省、府会馆的应试举子中有人从家

乡带来字画、法帖、铜、瓷、玉等玩物，同居住在琉璃厂海王村藏书、藏帖、藏画处的主人，相互观赏，进而相互交换。那时不讲买卖，而是说“您把东西匀给我”。“匀给我”这句话，后来成为古玩行的行话。老北京各行各业的店铺，都设有柜台，惟独书铺、古玩铺没柜台，而有幽静的客堂，三五间窗明几净之室，书画古玩陈列其间。

明代的北京每年阴历正月初一至十六举办灯市，先在东华门一带，后延至今天的灯市口。清初，灯市移到琉璃厂前。康熙年间（1662—1722），在灯市上有了出售字画、古玩、书籍的小摊。雍正十二年（1734），琉璃厂里的火神庙同时举行庙市。庙市逐渐被古玩珠宝、玉石、字画摊完全占据。这时，古玩才真正进入商品市场，古玩铺、书铺同时渐渐兴旺。

公元1772年至1782年，乾隆开馆纂修《四库全书》，长达十年之久，琉璃厂文化街市从此发展起来，书铺、古玩铺、南纸店、湖笔徽墨店等等文化商铺，林立街道两旁。乾隆进士、内阁学士、大书法家翁方纲在《复初斋诗注》中记载，纂修《四库全书》的“诸臣每日清晨入院，设大厨、供茶饭，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可见当时琉璃厂书肆藏书之丰富，可说是“全国最大的图书馆”。这是从永乐至乾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各代文化人在琉璃厂日积月累的结果。书行生意兴隆，碑帖、字画、金石、文玩、笔墨纸砚等店铺也随之兴旺。

嘉庆年间，琉璃厂书铺、帖铺较多，大部分是江西人经营，形成帮，外地人进不了这一行。道光以来，山西、河北等地人经营的书铺、帖铺、古玩铺才逐渐多了起来。根据今天健在的老古董商的回忆和文字记载，开设在琉璃厂东门内路北的宝文斋书画处，是道光年间的老古玩铺。博古斋、德宝斋、笔彩斋、论古斋、英古斋，是咸丰、同治年间开设、民国以来仍

然存在的老字号。从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至北平解放前夕的 1948 年，88 年的时间里，在琉璃厂街上，先后开设约有 123 家古玩铺。北京狗尾巴胡同兴隆店里、炭儿胡同、东华门、东四牌楼等地都先后开设有古玩铺。前门大街有挂货铺，也属古玩行。后门等地的旧货铺和旧物摊，虽然经营些零七八碎古董玩器，但不属于古玩行。

同治、光绪年间，在琉璃厂开古玩铺的股东那时叫东家，有王府贵族、朝廷官员。清朝制度规定做官的不准经商，他们便以王府总管的名义出面。笔彩斋是郑王府出资，赏奇斋是摄政王府总管张明芳出资，延清堂、大观斋是内务府总管出资开办的。这些王公贵族开古玩铺，不是一般人想象的是“为了浓缩资财”或“为了发财”，而是为了“摆谱儿”，为了他们自己和亲朋好友逛琉璃厂、厂甸和火神庙时，有个“歇脚儿”的地方，也是为当时上层官员和文人雅士提供消磨时间、读书赏古的场所。特别是经咸丰状元翁同龢、进士潘祖荫和同治进士吴大澂等人的提倡，一些在翰林院任清闲差事的读书人，家中富有，终日无事，便到琉璃厂消磨岁月。那时北京还没有公共图书馆，翰林院的一些大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庶吉士等负责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的官员和国子监的一些官员，到琉璃厂看书、鉴赏古玩，一时形成风尚。

光绪年间出现了外国人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开办的贸易商行，进行古玩玉器的交易。日本在北京等地开设山中商会，买卖中国古玩；英、美、德、法等国开设洋行，也做中国文物生意。美国人福开森 1886 年来中国传教、办学、办报，直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军拘禁于北平。他经常不断鉴赏、收买中国文物，他是琉璃厂的“常客”，人们称呼他“福大人”。他曾被国民政府聘为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并同中国文物专家合作编著《项子京收藏图录》，自己编著有《历

代著录吉金目》、《历代著录画目》、《艺术综览》等考证书籍。清末法驻京第三公使魏武达先生，是位中国文物爱好者，他对青铜器、法花、孔雀绿、康熙彩都有研究，卸任后在巴黎开古玩店。同时，还有日本的福田、高桥、长谷川、茧山等人，法国人杜伯斯、巴尔，英国人何太太等人做古玩生意，可见鉴赏中国文物的外国朋友很多。清末在中国也出现了向国外出口文物的私人公司——卢吴公司，它是由卢钦斋和吴启周合开，他们开始时向法国出口，后又向美国出口文物，国内的古玩行里有了法国庄、英美庄、日本庄等分类名词与行话。琉璃厂不单是中国达官贵人、文人政客游览消遣、收买古玩书画的地方，也成了外国的豪门贵族、富商大贾、学者专家旅游观光、收购文物的商品市场。由此，琉璃厂驰名海内外。

辛亥年至丁卯年（1911—1927），是古玩行业的“黄金时代”。琉璃厂街上人来人往，古玩铺里迎来送往。每年春节正月初六开市至正月十六，琉璃厂、厂甸、火神庙等地，游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街上马车、洋车、四人抬的轿子排列成行。达官贵人、文人学者出没于火神庙和古玩、书铺之店堂。火神庙里珠宝玉器、翡翠钻玉、书画文玩摊一个挨一个，珠宝商展出高档货品，珠光宝气，吸引游人。火神庙里原是露天摆摊，1920年，庙内建成罩棚，游人顾客来之更多。

由于古玩生意兴隆，仅从京城内外及附近城镇收购古玩已难以满足需要。光绪年间，古董商从山西、河南等地收购，后来外地客商增多，坐商、行商就有了区别。坐商是指在琉璃厂、东华门、东四牌楼等地开设的古玩铺。行商大部分集中在珠市口狗尾巴胡同里的兴隆店内。店里居住的古董商来自陕、豫、晋、鲁等地，他们在外地收购，到北京同行中“窜货”（卖货）。兴隆店里有古玩行的“窜货场”，进行行内交易。1927年以后，行商与坐商之分，才逐渐消失。

1927 年至 1941 年，政府南迁，内、外战争不断，古玩行业从繁荣逐步走入萧条。在萧条时期也曾出现“回升”，回升原因有二；1928 年孙殿英东陵盗宝，珠宝钻翠和珍贵文物流入市场；上海、南京金融界和军政界兴起官窑瓷器热和购买其他文物的热潮，北平古董商跑上海的人多了，生意一度兴隆。新开张的古玩铺在琉璃厂有雅文斋、韞玉斋、文古斋、宝古斋等等；继续发财的有彬记、通古斋、上海的金才记，以及一些做洋庄生意的古董商。可是到了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古玩行业则渐渐“萎缩”了。这与当时中国沦陷区被切断同美英的商业往来，德、意、日在战场上失利，国外购买古玩的人稀少，国内长年内战不断，财力物力殆尽，收藏购买古玩的人更为凋零有关。1945 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古玩行业中人士曾希望有个和平环境，再度出现繁荣景象，随着内战再起，希望成为泡影。

古玩行业经营些什么

古玩行业中分上、中、下三等，即古玩铺、挂货铺、旧货店和摊。旧货店、摊经营些零七八碎的古董玩器，不能入古玩商会，在行业中人们不承认他们是古玩行。挂货铺是古玩商会的成员，古玩行人都承认他们是同行。

北京的古玩铺集中在琉璃厂、东华门、东四牌楼等地，虽是一个行业，可是经营的古玩则分门别类。有的以经营文玩（古墨、印章、端砚、玉件、漆盒等）为主，有的以经营碑帖为主，有的以经营书画为主，有的以经营青铜器（或称金石）为主，有的以经营瓷器为主；有单独经营古琴或古钱和西番片的，还有卖《缙绅录》的。古玩的品物名称还有：秦砖汉瓦、浮雕造像、珐琅、雕漆、镶嵌、围屏、石器、木器、竹器、竹

刻、陶器、唐三彩、漆器、铁画、法花、犀角器物、鼻烟壶、地毯、古铜镜、刀币、宣德炉、扳指、玉件头、缂丝刺绣等等，可说品物繁多，举不胜举。而经营每一门类，又有年代和品名之分。例如：青铜器，有商、周、秦、汉年代之分，又有兵器、礼器、乐器、日用杂器和生产工具之别。而兵器、礼器、乐器之中，则各有各的不同名称。以青铜器中的礼器来说，就有■、簋、卣、觯、食、尊、彝、豆、敦、爵、蓀、■、觥、角、繹、鬲、鼎、鬺、盘、卢、壶、觚、舟、觥、■、甗、瓿、铺、铎、■、镬、铎、铎、斗、觥、洗、钲、锅、铛、散、盒等等，这些是古代祭礼宴享所用的器皿。各种器皿还有花纹、造型的不同。整个青铜器又分生坑（即新近出土）、熟坑（即出土年久）。有的青铜器上有铭文，钟、鼎上铸刻文字，这种文字过去叫“钟鼎文”，今称金文。毛公鼎上的铭文有 497 个字，记述周宣王告诫和褒赏其臣下毛公的事，内容反映了西周统治不稳定的情形；虢季子白盘上有铭文 111 个文字，记述虢季子白奉周王命征伐西北强族獫狁，有所虏获，受赏于周庙。这是铭文文字数量最多的两件国宝。有的铭文只有几个字、十几个字、几十个字不等。

碑帖、书画、瓷器等同样有年代之分，品名之别，也各有一门专业学问。所以鉴别古玩必然涉及多门学科，因为一切古器物都是它的研究对象。可是，我国设立专科、大学以来，还没听说有“文物学科”，只有考古系。而每家古玩铺则成了“文物分类的专业研究室”，在这“研究室”中，培养造就出众多的有各种不同专长的文物鉴定人才。1986 年我国成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其中部分委员和常委是从这“研究室”中成长起来的、有特殊鉴定本领的专家。

北京的挂货铺，集中开设在前门大街珠市口以南、赵锥子胡同以北、路东这块地点上，新中国成立前共有 15 家。挂货

铺是把一部分商品挂在营业室的四壁，买卖公开，跟古玩铺不同。古玩铺里的大号、特殊生意，只有掌柜的知道，徒弟、伙计都不了解；徒弟、伙计知道了，不得外传；挂货铺这种买卖只是北京有，别的城市没有，其经营范围介于古玩铺与旧货店之间。

挂货铺经营的古物有：翠玉、珍珠玛瑙、旧瓷、珐琅、象牙、虬角、古铜、陶器、竹木石雕、地毯、绣花、铁器、马蹬、串铃、唤头（专业小贩敲击某种响器以召唤顾客的用具）、宫灯、牛角灯、蒙古香牛支靴、西藏氍毹、哈达、马鞍、马轡、鸟笼、苏毯、麻布、缙丝、刻毛、腰刀、宝剑、戒手、刀子、漆金、漆镶嵌、堆漆、描金、刀填螺钿、皮箱、捧盒、川盘、佛花、绣花宫扇、蝈蝈葫芦、蝈蝈罐儿、鸟食罐、鸽子哨、雕翎扇、织造诰命、佛堂五供（有铜、锡、洋瓷、珐琅之别）、鹿皮画、油画、册页春宫手卷、紫檀、花梨、鸡吃木、红木、铁梨、檀香、沉香、料器、烟具、马毡、驼毡、弓箭、鸟枪、眼镜、锡茶壶、水烟袋、佛面竹、木变石、公道老、水注、水中丞、蜡斗、墨盒、镇纸、带钩、钱范等等、等等。有些东西，而今已鲜为人知，如：织造诰命，是明清各朝代皇帝任命官员用的丝织的“委任状”；钱范，是各朝代铸钱用的模子；公道老，是旧的瓷酒杯中有一老人，酒倒入杯中适量时没变化，过量时杯内之酒则完全由杯底流出。

挂货铺虽然是以经营以上的民俗文物为主，但各家有不同的主顾，经营的品类也各有重点。如：祥和成挂货铺经营蒙藏旧货，同德福经营硬木家具，双合号经营古铜器，义和号经营彩绘瓷器，祥和号经营新旧地毯、牛角画灯，和兴号经营鎏金佛像，恒兴号经营山西漆器，奇古斋经营仿壁画、古佛头像，奇珍祥经营旧地毯、嫁妆货、瓷器、旧乐器等。挂货铺里也同

样培养造就出一些鉴定文物的大才。美籍华人李汝宽就是挂货铺里培育成长的考古学者、文物鉴定家，他著有《长城地毯图录》、《宋代青花瓷》、《中国漆器》等，在美国和日本大量发行。

旧货店和摊，是古玩铺、挂货铺的货物来源之一。一些老鉴定家曾有过到旧货店、东晓市地摊（天不亮摆摊，天亮收摊）买货的经历，他们从收买旧货中锻炼眼力，增强鉴定文物的本领。旧货店、摊卖的旧货种类很多，有的属于文物，有的则不属于文物。他们从来不得入古玩商会，不被承认为古玩行。

古玩行业的经营和行规

古玩铺的经营方式，基本上是“等主候客”，也有走宅门串大户、提溜包送货到家的，张罗买主的。

行内交易集中在古玩行商会所设的“窜货场”。同行人议价，习惯用“袖内拉手”的方式，保持机密，议妥则以报出数目为准。对价值较高文物采用“封货”方法，即密封投标，投完后，当众拆封，出价高者得标。遇有标价相同，则用抽签方法决定属谁。窜货场不准“掏货”，即未经当众将货摆出、议价，便私自背后将货买走。还不准打架骂人，违者轻则罚款，重则不准许再进入窜货场买货。商会规定“买卖公平，双方有利”。但买货人必须有眼力，看准识货，胸中有数，否则买来“打眼货”（没看准年代的或赝品），非但经济受损失，还会被同行作为笑料传播。古董商一旦打眼受骗，便将所买的赝品收藏起来，不给人看，也不向外说。徒弟、伙计买了打眼货或价钱过高，掌柜的可请商会调解委员会出面要求对方让价或退货，行话称之为“砸浆”。

古玩铺里的货物从无明码标价，只凭营业人员口头一说，而有还价商讨之余地。不还价的顾客少。还价让价，使双方感到满意。

经营古玩者，必须懂鉴定，大多数人还有历史、地理、人物等方面的文化知识，能对所售之物品讲出“来龙去脉”，对古玩文物上的图案能说出原委，例如“三阳开泰”、“五子登科”、“鸳鸯戏水”等是什么意思，用以提高所售物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激发购买者的兴趣。接待顾客，要有礼貌，谦虚和蔼，有文雅风度；语言讲究，不说粗话，口才好，对答如流，这样才能得到顾客的尊重和信任。

古玩行人可以相互搂货，就是将对方的货拿来代为销售。不论这件古玩值多少钱，也不论谁来搂货，凡是同行的认识人拿走东西，不用写收条立字据，只管拿走。近百年来，没有搂货不认账的事，双方都恪守信用，形成一种行业的传统规矩，因而，才有“包袱斋”。古董商有的领东当掌柜的，开家古玩铺，起个字号叫某某斋；有的人眼力好，会做生意，没有人给出钱开买卖，便开个“包袱斋”，即分文不用，拿块蓝色布包袱皮，到各家古玩铺搂货，搂来的货可以卖给买主，也可卖给同行，北京最大的古董商岳彬，就是从“包袱斋”起家的。

有件古玩，甲方要卖，乙方要买，中间有人给联络、说合。中间人称为“拉纤的”，成交后，中间人取佣钱，一般是“成三破二”，即买方出3%的佣钱，卖方出2%的佣钱。上海的最大古董商金才宝在光绪末年，就是位“拉纤的”。

“伙货”，即合伙买卖古董。两个人以上合伙买卖古董，都称伙货。假如几家买卖一件古玩，买时一般大家都过目，也有不看货声明一下“我伙着了”的，也行。卖时可由一家售出，售价早已商定，但必须将实售价格公开，平均分配赢利。有的古董商眼力差，自己也不买货，便采用伙货办法做生意，

这样的人一般消息灵通，得到信息或自己看了货，便约同行人一起去看货，见有利便伙，看无利则不伙。

卖货不骗人、买货不受骗的古董商极少。骗人分两类，一类属于被迫，一类属于故意。

古玩铺陈列的古玩有真有假，还有“撂跤货”，即真假未定的货，但不标明真伪。鉴定文物的眼力不一样，有人看真，有人看假。买主看真，卖主看假，如果是真东西，被人买走了，这叫“拣漏”；如果是假东西，被人买了，这叫“打眼”。这些不能称之为骗人或受骗，双方都认为是眼力问题。

被迫骗人是明明是件赝品，买主看是好东西，卖主不能说是赝品。本来是雍正仿宣德的青花瓷器，买主说是真正宣德的，卖主不能说雍正仿。原因有二，一是说实话卖不了好价钱；二是有的买主自恃高明，如果驳他，他说你看不起他，不但这次生意做不成，下次他就不再来。

故意骗人的方法很多，基本方法是以假充真，辅之以“插圈弄套”。有的人骗人，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搬人”。

以复制品充真品。古铜器、陶器、石器、浮雕、造像、瓷器、字画等等都能复制和整修。破碎的可以修复完整；有样子的可以照样做成复制品。青铜器可以做假锈，没花纹的可以刻花纹，没字的可以刻上金文；瓷器可以做后挂彩；字画可以落假款、假御题……办法很多。做这方面手艺的人才也不少，他们的技艺高超，做出的东西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成年累月制作的赝品充斥国内外文物市场，使后人难以辨别真伪，非有老经验的、行里出身的人是难以鉴定这种文物的。

有的古董商是用自己的“两片嘴”说得天花乱坠，使买主分不清真伪；有的用个人的声望唬人。岳彬收藏古玩最多，

珍品也多，有罕见之物在他手里，他便雇人复制。行里行外人都知道某件东西是在他手里，他把复制的东西拿出来卖，别人不会产生怀疑。有的古董商将赝品放在旧王府或名人手里，由他们去卖；有的人则利用旧军官或太监，貌似是从宫里拿出来的……花样很多，方法不少，总的是给人们以“先入为主”的心理错觉，使人在鉴别文物时失去警觉，缺乏慎重而受骗。

骗人是为了“撇人”的事也有。例如，有位老古董商在众人面前自我吹嘘：“王□的画，我不用看，用手一摸，便知真假。”有人故意撇他，弄张后落款的王□假画，使了个圈套，他便上了钩。这件事在二三十年代，古玩行里传为佳话，它教育古玩行的人要谦虚，不要说大话，鉴定文物的学问是无止境的。

不论被迫、还是故意，骗人在行规中不禁止，也不认为可耻。可是，偷则是最可耻了，被认为是最愚蠢的人干的事。古玩行里，发现谁偷了东西，谁就永远不能在这行里干了。这条行规非常严格。

古玩商会史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农工商部奉旨准许京师商务总会成立。由花翎四品衔候选知州冯麟霈为总理，三品衔山东补用直隶州知州袁监为协理。京师商务总会将原有的北京各行业的“行会”、“会馆”、“公所”等统一起来，名称统称“某行商会”。

古玩商会于1909年成立。商会成立之前，同行经常聚会在狗尾巴胡同兴隆店内。兴隆店是陕、豫、晋、鲁等地来的旅客长住的地方。他们在外地收购古玩，到北京在同行中窜货。兴隆店内有古玩行的窜货场，进行行内交易。

1908 年京师商务总会成立后，古玩行人推选出赵佩斋、孙秋^枫、郭宝卿、穆恩禄和马子光等筹备建立古玩行商会。1909 年北京古玩行商会成立后，选出两名会长，正会长代表坐商（即在北京开古玩铺的商号），副会长代表行商（即外地到京卖货的古玩商）。第一任正会长是赵佩斋（琉璃厂大观斋古玩铺经理）、副会长是郭宝卿（兴隆店内德兴斋古玩铺经理）。会址设在兴隆店内。

商会成立后，原兴隆店内的窜货场由商会管理，以成交额千分之五缴纳会费。因此，商会逐渐积累了一些钱，会址随之逐渐扩大，先从兴隆店搬到芦草园，后在闰王庙前街买了一所大院，门前挂上了清政府学务侍郎宝熙书写的“北京古玩行商会”七个大大的招牌。牌子挂起，商会的权威性提高了。

玉器行商会也于 1909 年成立。珠宝玉器同古玩，似乎是一码事，其实是两种行业。玉器行里回民多，古玩行商会不准回民入会。

古玩行商会搬到闰王庙前街后，外地来京的古玩商，可以住在商会，不要房钱，只交成交额千分之五的会费就行了。此后，古玩行内的行商与坐商之分，逐渐淡漠了，正、副会长之分也没有必要了。赵佩斋后任的会长是孙秋^枫（式古斋古玩铺经理），后又由郭宝卿担任会长。

1931 年古玩行商会改为古玩业同业公会，由天和斋经理郭静安担任公会主席。后由公会理事组成，公会主席改名为公会理事长。崔耀庭（德兴斋经理，郭宝卿的徒弟）被选为理事长。因崔耀庭为人耿直，处事公正，对会务殚精竭虑，给公会的窜货场盖上铅铁大罩棚，使同行交易时免受风吹雨袭之苦。所以，他担任理事长是连选连任，时间较长。

1945 年“八一五”后，王幼田（琉璃厂大雅斋经理）任古玩业同业公会理事长。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古玩业在新

公会未建立前，由 125 户会员中公推出崔耀庭等 18 人，负责筹备委员会工作。1951 年 6 月北京工商业联合会成立，将属于文物性质的公会合并为历史艺术文物业公会，1952 年 8 月，宝古斋经理邱震生被推选为公会主任委员。1953 年末，依据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私营企业统一分类规定》，改名为文物业同业公会，继续由邱震生任主任委员。1956 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曾成立外贸文物业同业公会，尔后，商会、公会的名字逐渐消失。

第二章

琉璃厂是古玩行业的发源地和集中地，也是古玩文物的集散地和鉴定文物的权威之地。在这长不过一公里的街道上，聚集了古玩字画、碑帖书籍、南纸行业的许多店铺。各店主人皆工于应对，讲究酬酢，读书考据，吟诗作画，以便与名人士大夫交往。清代乾隆以来，上至公卿，下至士子，莫不以到此地为雅游。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前后，古玩行业的人事物才有了一些传说。大部分古玩店铺在经营上是“一专多能”，即以经营一类文物为主兼能鉴别各类文物。从“一专”来讲，可分为经营碑帖、书画、金石、瓷器、杂项等行当。

一、碑帖

竖石为碑，横石为帖。碑以纪功志墓为主，帖以书翰诗文为多。碑初无文字，西汉初开始有碑文。汉代兴厚葬，遗留碑石较多。汉末曹操秉政时下令禁止厚葬，不准一般人树碑立传。魏晋两代禁令未废，故这个时期碑石较少。至北魏时，墓志之风盛行。墓志和碑石大体相同，只是碑石立在墓外，墓志埋在墓内，都以颂扬墓主功德为主。自唐代以来，五品官以上者方可用墓碑，五品以下者用碣。方者为碑，圆者为碣。碑碣刻石，以“石鼓文”最早，文字刻在十块鼓形的石上，歌咏

秦国君游猎盛况，故正名为“猎碑”。

古代无纸，书于帛者曰帖。帛难久存，将帛书刻之于石上，亦称之为帖。刻石的拓本随之亦称帖。刻石拓本之帖，以《瘿元帖》较早。

碑帖乃中国珍贵文化史料，它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着指导、借鉴、推动、延续的作用。自宋代以来，不少文人学者对碑帖做过大量的考证研究，留下许多名著。金石学就是从考证研究青铜器，碑碣刻石而诞生。研究金石碑帖者自宋代以来历代皆有，为宋代的欧阳修、赵明诚、苏轼、米芾，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文徵明、董其昌，清代的王昶、翁方纲，近代的王国维、罗振玉等，对碑帖都有深入的研究，并留有著作。历代考校碑帖的著述约有四百余种，可供鉴定碑帖之用。

传说，碑帖铺在琉璃厂乾隆年间就有，但查不到文字根据了。有据可考的是，德古斋是于咸丰五年（1855）开设的老字号，宜古斋、富华阁也是咸丰年间开的老字号。自咸丰年以来至民国年间，琉璃厂先后开的碑帖铺，还有隶古斋、怡墨斋、墨妙斋、访古斋、文林阁、古雅斋、敦古斋、庆云堂、墨因銓、墨宝斋、墨林堂、如古山房、笃古斋、观复斋、石墨斋、集雅斋、清秘斋等老字号。碑帖铺原属于帖业，而墨宝斋是既鉴定碑帖，也鉴定经营字画，则属于古玩行。而后帖业与古玩行也是文物同行。而今惟有庆云堂是专门鉴定经营碑帖的老字号了。鉴定碑帖的墨宝斋出身的老行家、今日健在的90岁马宝山，既是位碑帖鉴定专家，又是位画家，著有《书画碑帖见闻录》，乃硕果仅存者。

碑帖方面，早有“端方求教李云从”和“翁同龢与刘振卿论帖”的传说故事，今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端方求教李云从

光绪十年（1884），清廷各衙门恭送玉牒（皇族的谱牒）至盛京（沈阳），其中有侍郎盛伯羲、祭酒王濂生、尚书端方。途中夜宿某站，盛伯羲与王濂生谈论法帖之碑版，端方插口询问：“你们讲的是什么？”王濂生不客气地说：“你端方只知饮酒狎优，对碑帖一无所知，请不必问了。”端方当即面赤拍案曰：“三年后再见！”

公务完毕，端方从沈阳返回北京，从潘文勤那里得知琉璃厂宜古斋碑帖铺的李云从，直隶故城人，经营法帖碑石。潘文勤介绍说：“此人精于鉴别碑帖，某帖之拓本多字，某拓本少字，背诵如流。我从他和里买到过一些名帖。”

光绪十一年春，端方乘大桥，简从便装来到琉璃厂宜古斋，见到李云从便拱手言道：“听潘文勤大人介绍，你鉴别碑帖的眼力好，又致力于考据，今特来拜访。”李云从赶忙躬身作揖口称：“端五爷驾到，给小店增光，不敢承受‘拜访’二字，请多赐教。”端方走进店堂观赏碑帖，买了十几部宋明拓本。

不到100天，端方从琉璃厂古玩店铺买了许多法帖、碑碣。他的庭院摆满古代长方形的碑和圆顶形的碣，碑碣上刻着名家书法文字，他的书房案几也上布满碑帖。

1886年的端午节，端方设家宴请李云从。酒席上，端方举酒说：“今日端午，我端午桥（端方字午桥）拜李先生为师！法帖、碑文学问甚多，请多加指教。”李云从急忙站立，躬身作揖连称：“不敢！不敢！大人抬举，云从愿为大人效劳。”端方要和李云从碰杯共饮，李云从说：“小人乃一草民市商，怎敢同皇室贵族同干共饮！请恕罪，不能从命！”端方

哈哈大笑连声说：“饮！饮！恭敬不如从命，今天无尊贱之分，只有学识深浅之别，你为师，我为徒。”二人将酒喝了下去。

李云从见端方诚心诚意要学鉴别碑文法帖，便经常到端方府同端方研讨鉴赏碑帖之秘诀，并将自己多年致力于考据之所得，口述给端方，端方记录成文。果然不到三年，端方在京都士大夫之间有了精于鉴别碑文、法帖之盛名，并著有《香斋吉金录》，金石、文物收藏家的盛伯羲、王濂生对端方也刮目相看。

李云从和端方、潘文勤交买卖，做碑帖生意，曾被日本考古学家请去东北考察鉴定碑碣刻石，并收购碑帖，赚钱既多又快，但他不善理财，挥金如土，挥霍无度，终于在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36岁的李云从贫困而死！

翁同龢与刘振卿论帖

光绪十八年（1892）阴历四月初七，光绪皇帝的老师、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乘八人抬大轿到琉璃厂，在德宝斋古玩铺门前下轿。德宝斋经理人刘振卿恭候迎接，趋步请安，口称：“翁夫子驾临小店，请多指教。”边说边请翁夫子入店堂，翁同龢落座，刘振卿相陪，献上香茶，品茶闲聊。

刘振卿说：“我店楹联：‘德比圭璋儒所贵，宝兹彝鼎古为徒’乃夫子亲笔所题，三十多年来，遵照您的题示而经营，得到发展。”翁同龢说：“我记得，你店匾额是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克勤郡王所书，他已不在人间，而笔墨犹存。他的笔法圆润紧凑，超然绝俗。”刘振卿说：“您的书法笔力遒劲，浑脱潇洒，世人无与相比。”翁同龢回忆说：“那是我30岁时写

的，而今我已 63 岁了，你也六十多岁了，岁月流逝，你我都老矣！”刘振卿说：“岁月不饶人！您年高德劭，书法超群。”翁同龢说：“我搜集一些法帖，揣摩古人书法，习字作画，是一大乐趣。你可知法帖之由来？”刘振卿答：“小人才疏学浅，请老夫子赐教。”

翁同龢说：“论帖，先说碑。竖石为碑，碑在尧舜时代就有了，用碑识日影、引阴阳、计时刻或系牲。”翁夫子继而引经据典说：“‘君牵牲入庙门系著中庭碑也’，‘宫皆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古代天子棺墓前后四角竖四碑。始西汉时，是为引棺入墓之用。用碑镌文，立于宫室庙堂墓隧之间，其文多为臣子赞述君父之功的溢美之词。”翁同龢喝口香茶继续说：“唉！碑创用虽早，可是拓为书法之样本，今称之为帖者，是到了五代时期才由南唐王朝建立者李昇^昇 创始。”

刘振卿答道：“李昇^昇，市讹传为李暉。而李暉乃前蜀画家，李昇^昇 乃是南唐初主。”翁同龢点点头称赞说，“你所言甚是。”刘振卿接着说：“李昇^昇 在位时（937—942），鉴于古代墨迹日渐消亡，为保存真迹，留之久远，将秘府珍藏古代名人墨迹命徐铉刻石，拓印其刻石的拓本，名之曰帖。李昇^昇 废吴帝杨溥自立，国号大齐，年号暉元，故后人称之为《暉元帖》。”

翁同龢问：“你可知《淳化秘阁法帖》？”刘振卿说：“据我所知，《淳化秘阁法帖》乃宋太宗赵匡义命翰林侍书王著重刻《暉元帖》，并由秘阁选出汉代张芝、崔瑗，三国时钟繇，晋代王羲之、王献之、庾亮、萧子云，唐代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怀仁等人的墨迹，摩刻在枣木板上，标明为《法帖》，共 10 卷，拓赐大臣。历来称之为‘法帖之祖’。宋徽宗赵佶于大观三年（1109），鉴于《淳化秘阁法帖》板已断裂，出内府所藏墨迹，命蔡京等人稍加厘订，重行摩勒上石，名为《大观帖》。《大观帖》刻工精良，胜于《淳化秘阁法

帖》，但拓本流传极少。如今我手里有本《大观帖》，请翁夫子过目鉴赏。”

刘振卿捧出《大观帖》残本，同时拿出他自己著作《化度寺碑图考》放在几案上，翁同龢戴上花镜仔细观赏。指着《大观帖》说：“这帖我曾见过，是不是祁文瑞收藏的那本？”刘振卿答道：“祁大人之后代已败落，将这件《大观帖》残本换钱，准备离京回原籍。”翁同龢听此言，喟然长叹！沉默片刻，拿起《化度寺碑图考》，指着书中一图说：“你画的这张图，比《大观帖》11页上的苏斋题识要详细些。”刘振卿说：“承蒙夫子夸奖，甚为荣幸！”

翁同龢回府后，将这段事记在他的日记中。《翁文恭公日记》中记载：“癸巳四月初七日，过厂于德宝斋见祁文瑞所藏《大观帖》一本，二十年前曾在寿阳坐上一见，今其曾孙质钱作川资，疑其季所为也，为之凄恻。与德宝主人刘姓，论□师塔铭三段式，伊画一图，较苏斋为详，此市人中风雅者也。”

二、书 画

书法、绘画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称之为“国粹”。“书画为国家精神所在，个人名誉所关”，故向来为国人所重视。

上古无文字，结绳以记事。《说文解字 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汉字的形式书体，就目前见到的主要有八种：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八分（似篆而体势多波磔。波：左撇回波；磔：右捺回磔）、草书、楷书（亦称真书）。无论哪种书体，最初都为便于实用。在几千年嬗变过程中，每次革新变化，人们在使用中学习和钻研，在书写中更不断追求字本身的形象美，并

注入书写者的审美情趣。于是，渐渐形成了我国所特有的书法艺术。汉晋以来，书法艺术得到大的提倡和发展，出现众多的著名书法家，也留下大量的书法佳作。

绘画。古代在实物上绘画居多，如青铜器上的花纹，秦砖汉瓦、古陶、碑碣上的图画，庙宇、宫廷、古墓之壁画、神像等。

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纸的应用促进绘画艺术发展。文人士大夫在读书、写字之余，亦常作画。绘画艺术逐渐从匠画转入士夫画。社会以文人所绘之画，作为高尚装饰和赏玩品，文人亦以此为高尚之消遣与艺能。故而后汉以来，我国的历代著名画家层出不穷。

西晋卫协在绘画发展史中，起过划时代作用。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颇得壮气。”卫协弟子顾恺之《洛神赋图》、隋代展子虔《游春图》，皆为晋隋时期著名珍贵绘画佳作，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皆经琉璃厂古董商之手，而流传下来。

自魏晋之钟繇、王羲之，至清末之翁同龢，从东晋的顾恺之作《洛神赋图》到清乾隆时的郑燮作笔墨竹兰。有文字可考的我国书法家、画家，数以万计，留下的佳作则不计其数矣。各代书画名家之笔墨丹青，又各具特色。可见，鉴别历代名家书、画学问之深邃而繁复。

琉璃厂鉴定经营古代书画的古玩铺，自道光至民国年间先后有博古斋、论古斋、笔彩斋、茹古斋、悦古斋、韵古斋、论文斋、虹光阁、宝古斋等老字号较有名声。鉴定书画的人物众多，博古斋祝锡之、祝德酬父子既是书画家又是鉴定家；论古斋萧家祖孙三代鉴定古书画八十余载；悦古斋韩家父子均为书画家，鉴定书画五十余年，第二代门生萧程云被誉为鉴定书画的状元，第三代门生刘九庵乃当今鉴定书画大家；民国年间琉

璃厂有鉴定书画名人的“三杰”人物：万筱竹、萧虎臣、张治平。还有萧静亭、卢月舟、邱震生，以及而今健在的90岁高龄的老鉴定家马宝山、李卓卿等，人才众多。

博古斋审定《百苦吟》

道光二十五年（1845），祝锡之创办博古斋古玩铺。祝锡之，名晋藩，河北大兴县人，是位会试未中的落榜举子，擅长山水画，师宗王石谷，临摹王□山水画轴，难辨真伪，鉴别金石注重考据。梁溪坐观老人在《清代野记》中，称赞祝锡之鉴赏为咸同间第一，人皆推重之。

光绪初年，博古斋在门市上收买一幅画卷，卖画的人走后，发现画卷里边夹带一本康熙十二年（1673）的历书，书里字迹皆满。写得不整齐，字迹大小、墨迹深浅不一，有的是用香头黥的字，纸的背里都写满了字。祝锡之拿着这本历书仔细看，原来是一些忧郁愤怨的旧体诗，便把它收藏起来。

没过多久，祝锡之买到一幅清初思想家、学者顾炎武手书正楷册页。册页上的诗文好像曾见过，祝锡之想起了前两个月买的那本历书，对照一看，册页上的诗文与康熙十二年历书上的诗稿相同。经考证审定方知：康熙十三年，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起兵，自称兵马大元帅，后响应吴三桂叛乱。耿精忠谋反，将福建总督范承谟幽禁于土室达三年之久。三年中，范承谟在历书上写下《百苦吟》诗稿、《画壁遗稿》等诗文。

范承谟是顺治进士，康熙年间巡抚浙江，整治两浙豪恶，为官清廉，民甚德之，提擢为福建总督。后于康熙十六年死于土室中，他的遗作有《百苦吟》、《杂著》等。不知何时，《百苦吟》诗稿被顾炎武得到。但有人说，耿精忠在康熙十五年降清，三藩之乱平定后被处死。顾炎武于清兵南下时曾举兵抵

抗，失败后考察山川形势，图谋匡复明室。在顾炎武游历考察山川到达福建时，正赶上范承谟死于土室中，而得一康熙十二年历书。顾炎武将《百苦吟》编次审定，重新正楷书写成册页。辗转二百来年，分而复合，流入博古斋祝锡之的手中。

范承谟《百苦吟》诗稿，是件难得的文物珍品，因两面都是字无法装裱，祝锡之将其藏入锦匣中。顾炎武手书正楷册页，同样是难得的墨迹，祝锡之得之如获至宝。

论古斋的三代人和《董源山水大轴》

论古斋藏画处，同治元年（1862）开业，萧家祖孙三代经营80年。论古斋的创始人萧秉彝，河北衡水县人，经营论古斋29年，光绪十六年（1890），由其长子萧维邦（字勋臣）经营。1921年萧勋臣去世，由他的五弟萧云章经营论古斋。1924年萧云章去世，由其子萧少云经营到1947年，论古斋倒闭。

论古斋关张这么多年，早已被人忘掉，萧家祖孙四人亦鲜为人知。可是萧秉彝的三儿子经营的信远斋所售的蜜饯、酸梅汤、糖葫芦，多年后仍驰名国内外。

萧勋臣经营论古斋的时间最长，是一代著名的书画鉴定家。他幼学四书五经，居住在论古斋，长大跟他父亲学徒，钻研书画，自己能写会画。鉴别唐宋元，特别是明清名家书画，很有功底。眼力好，又善于交际，同当代的书法家、画家和鉴赏收藏家有交往，翁同龢、王濂生、李葆恂等名人学者，都买他鉴定、经营的字画。

《翁文恭公日记》中记载：“丙申十一月十二日，论古斋送来字画，有英光残帖一本，道因碑宋拓，周东村沧浪亭图，查梅萃壑直幅，皆可观。”

李葆恂《海王村所见书画录》中，记录了论古斋萧勋臣鉴定、经营的南唐《董源山水大轴》：“绢本，高七尺六寸二分，宽四尺九寸，系双幅拼成。写意，微著色，主峰雄峻，丛林茂密，下段蓝林石濑，映带村舍，村内四人，村前二人，一人荷条，一人荷担，并顾盼有神，布景平淡，笔力圆浑，无款，标题在上绫边。”

董源（？—约962），五代十国时南唐画家，南唐中主李璟在位时，董源任北苑副使，人称董北苑。他善用披麻皴法画山水，长于描绘秋风远景，其画多写江南真山，平淡天真。五代宋初画家巨然继承其风格，而有发展，并称“董巨”，他们是五代、北宋时代的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对后世影响甚大。董源作品传世稀少。论古斋鉴定、经营的《董源山水大轴》上，有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横题“魏府收藏董源画天下第一，董其昌鉴定”16个行书字，遒劲苍古，不同于他平时写的软媚字体。名家鉴定董其昌的字，同样可贵。这幅山水大轴，曾入元代御府收藏，盖有五印：下左缉熙殿宝（朱文方印）、下右万钟（朱白文）、秘玩（半印朱文）、还有二印辨不清。

“此幅已载入明人清河书画舫中，近利津李佐贤所编书画鉴影中，亦录之。”萧勋臣将这稀有珍品卖给了国子监祭酒王濂生。

李葆恂还记载：“抚军所藏翁覃溪先生宋翻拓本化度寺碑暨松雪小楷书红格管公楼纸为魏国夫人书金刚经册子，载在陈焯寓赏编者，予获见于论古斋。”

民国初年，萧勋臣的五弟萧云章，帮助其兄鉴定、经营字画。他鉴定字画的眼力不如其兄。萧云章经常到苏州、常熟等江南城镇收购字画，运来北京给书画家、收藏家和政府官员。论古斋开张以来，一直以经营书画为主，铜、瓷、陶器不收购

不销售。它是清末民初琉璃厂最大的一家藏画处，收藏明代“四大家”的书画和清初“四王”的妙笔丹青较齐全，宋元名家字画较少。收藏家汪向叔陆续不断地从论古斋买去明清名人书画，是这家古玩铺的好主顾。

约在 1917 年前后，汪向叔急于用款，欲将其多年收藏的字画出售，给论古斋和韵古斋打去电话。此时恰巧遇上萧氏兄弟分家，萧勋臣、萧云章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想等等再说，错过了时机。韵古斋韩少慈当机立断，将汪向叔多年搜集、收藏的名贵书画全部买到手。从此，韵古斋一跃而为琉璃厂经营字画的首户，论古斋日趋衰落。

1924 年萧云章去世，论古斋由萧少云经营二十余年，正赶上政府南迁后，古字画生意日渐衰落，收藏古书画者、日渐减少。论古斋专鉴定经营字画，未开拓其他文物的鉴定经营，维持到 1947 年关张了。关张清理货底，请同行看货，拍卖货底。有一块鸡血石方章在门面上摆了多年，表面呈黑色，被李欣木看到了，便说：“少云！这块黑石图章匀给我吧。”萧少云答应一声，“你拿去！”量他不知这是一块鸡血石。李欣木精心细磨黑石图章的皮表，使之呈现出藕粉地上几块鲜红的鸡血色。这块石章在货架上摆了几十年，经日晒变黑，琢磨后又重现原貌，身价倍增。

笔彩斋的两幅宋元画

笔彩斋是火烧圆明园后的第五年（1865）开张的，郑亲王府拿钱开的买卖，后归王府总管王某人所有。匾额由咸丰进士王维珍书写。王维珍书法宗欧阳询，参以米芾、董其昌，是近代的著名书法家。

邱震生老先生回忆说：“我是笔彩斋门下的第三代人，开

张时头一任掌柜的是谁，说不清了。只知道有位南宫县人袁以德，字厚民，后来他开了德珍斋古玩铺，笔彩斋由他的徒弟陈东南经营，再后就是武琴轩接营。笔彩斋的徒弟们在琉璃厂开了好多家古玩铺，如德珍斋、铭珍斋、虹光阁。宝古斋则是虹光阁的徒弟开的。”

笔彩斋以鉴定、经营字画为主，明清字画较多，宋元字画极少。有文字记载的仅有两幅宋元画：

一幅是五代《卫贤盘车图》。卫贤是五代南唐著名画家，陕西长安人。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时（961—975）为内供奉。卫贤师事唐末宫室画名家尹继照，后学吴道子。他画的楼观、殿宇、人物以及山村的盘车、水磨，见称于当时，而今已是国宝。

笔彩斋刘斌谦看到的五代《卫贤盘车图》：“绢本，高一尺八寸，长六尺，界画古朴，人物舟车，用笔沉著，生气远出，信非宋以后人所能到。中作一水阁，下有水车，激水转轮，即今之水磨是也；运粮人约数百，皆赤膊作用力之状。棚中一官，居中坐，乌纱帽，红衣，旁列吏胥数人，并指顾如生。有益王之章、内府图书之印，晋府图书，更有数古印，不可辨，押缝宣和政和小玺。”

这幅画卷本身绢首上方有三个楷书字：“神品上”；本身绢尾有“卫贤恭绘”四字，细看才能看到。还有钟峰王守仁识，下押王守仁印；崧樵王铎跋，不用印；嘉庆丁巳八月之望，成亲王观，下押成亲王印，因观而题：“按宣和画谱，五代胡翼，有盘车图二，卫贤有盘车图四，皆藏御府。以卷前宣和玺，当是谱所载也。郑邸收古物最富，然雒凤楼中宝绘，须以此为第一，与汉瓦唐琴，辉映千古。”成亲王是清代“四大书法家”之首，名永璘，是乾隆皇帝的第11皇子，《卫贤盘车图》经成亲王题识，价值更高。

这幅盘车图原收藏在郑亲王府，而笔彩斋是郑亲王府拿钱开的买卖，是不是王府的东西拿到了琉璃厂去？笔者访遍老书画鉴定家、笔彩斋的门人，无人知晓。

另一幅是《王蒙丹山瀛海图》。王蒙，元代四大著名画家之一，字叔明，号香光居士。在元末当过小官——理问，不久弃官隐居在浙江余杭黄鹤山，自号黄鹤山樵。朱元璋当皇帝时，做过山东泰安知州。他善诗文、书法，绘画工人物，尤擅山水，得外祖赵孟頫之法，更参酌唐宋诸家，以董源、巨然为宗，而能变古，自立门户，对明清山水画影响甚大。近代我国著名画家张大千曾临摹王蒙山水画，得益匪浅。

笔彩斋经营的《王蒙丹山瀛海图》，据李葆旬记载：“纸本，尺寸失记。细笔皴染，浅绛色。琼山瑶岛，琪树芝田，柏塞满纸，几无隙地，真奇迹也。款题：丹山瀛海图。香光居士叔明为（下二字失记）画，下押黄鹤山樵方印白文。后有金崖道人，暨陈方两跋。又有细楷题后云：万历（下一字失记）年，得王叔明丹山瀛海图，价三十两，治字第四号。”

书画收藏、鉴赏家李荷恂认为：“此卷造境甚奇，笔意高妙，在山樵真迹中，亦为极精之品。”这幅极精之品，清末时，笔彩斋卖给王濂生才纹银 150 两。今日之价，岂止 1500 两黄金？！

茹古斋的《袁安卧雪图》

茹古斋古玩铺，于 1883 年开业，匾额是翁同龢书写，为琉璃厂著名精彩匾额之一，金台稚川居士写道：“茹古为翁叔平所写，浑脱潇洒，老气横秋”（见《春明古迹识》卷四）。创办人孙虞臣，协办赵佩斋。

孙虞臣名述祖，博古斋祝锡之的徒弟，曾接任博古斋经

理，是位书画鉴定家。赵佩斋名德习，原在宜古斋学鉴定碑帖，光绪九年帮孙虞臣创建茹古斋，1898 年离开茹古斋，自建大观斋。1911 年，茹古斋由白五楼经营，直至 1941 年他去世。白五楼名凤翔，是咸丰同治年代著名雕刻篆刻家陈寅生的徒弟，他本人是位书画鉴定家。

茹古斋经营书画、碑帖、古瓷、玉件等文物，以书画为主。这家古玩铺的徒弟有很多人成为清末民初以来的文物鉴定家，并形成一大门系。

孙虞臣的徒弟刘克昌、程秋浦、萧虎臣、杨伯衡、周杰臣、郭梅亭、张治平、朱溥泉都在琉璃厂开了古玩铺：光绪末年，朱溥泉开设闻光阁，刘克昌和程秋浦开设信古斋；民国元年，杨伯衡和萧虎臣开设博韞斋；1918 年，郭梅亭开设致宝斋，周杰臣开设鉴古斋；1923 年，张治平开设证古精舍；刘克昌的徒弟傅凯臣于 1936 年开设鉴光阁。

白五楼的徒弟柳春农、韩启倬、萧福存等人鉴定历代书画很有眼力，在同行业中较有声望。其中萧福存，字允中，曾拜于国画大师张大千门下，担任过宁夏文史馆副馆长，尤以书法见长。

茹古斋经营 60 年，鉴定、买卖文物甚多，大量是明清名人字画和杂项玉件等，现有据可考的珍贵文物有：

墨玉小插屏。这件插屏，对经约三寸，型正圆，雕工精美，浑身无一点白痕，晶润莹澈。墨玉产于我国新疆和阗附近，该地因产墨玉而得名墨玉县。墨玉无丝毫白点与白纹已实属难得，再加之雕刻细腻，造型美观，此插屏确是件珍品。

戴醇士侍郎仿董源大幅。此画云峰树石，元气浑沦，布局整齐严谨，无一破碎之笔。这幅名画在当时只卖 120 两白银。

宋元绢画三轴。它们都是古代诗人画像：杜甫像颇似村叟野老；苏轼像倜傥风流，须髯甚美，眉宇奕奕有神采，白居易

像细眉秀目，而鼻准丰硕，面亦肥泽。当时评点这三幅画像，有人说，是凭想当然画的，有人则认为是有根据的。收购后一时难以出手。

菇古斋鉴定、经营最珍贵的字画要算是《袁安卧雪图》。这幅名画乃是宫内传世国宝。光绪十五年（1889）腊月十日，菇古斋经理孙虞臣将《袁安卧雪图》送到李葆恂府上求售，李老先生自称“力薄”买不起，又还给了孙虞臣。但李老爱画成癖，还给人家却又想这幅名迹，“眷亦名迹，心中作数日恶”，特将其款识印记在册上，李葆恂先生之记录：

唐李升《袁安卧雪图》

绢本立轴，长四尺二寸五分，徽宗瘦金书唐李升袁安卧雪图。字如胡桃大，横书帧首；右圆双龙玺，左御书瓢印，及御书之宝，下右角松雪斋印。

卧雪原非遁世情，孝廉徵诏令险平。立朝侃侃多忠告，皆自傲寒素养成。己丑新正御题（下押几暇怡情印；又一印不可辨）。

右高宗纯皇帝御题，在帧首左方，小行书，有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之宝、御书葫芦印、御书之宝、信天主人印、淳化轩印、淳化轩书画（下二字不可辨）、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二方印。按诸印皆在江村著录之后，今细辨之，右角有寿字长方印，下有柯九思墨印、木斋过眼方印，左角有停云圆印（下一方印不可辨）。

按此图，江村销夏录已著录，所谓以焦墨作山石皴法，苍莽非人力可到，人物树木，略设淡色，生动异常，隆暑张之，凜然有寒意，传宝于世，几及千年，而绢素完洁，尤为所难，真希世之珍云云；信为

确论。山用斧劈法，石室中一人拥絮卧，门外侍立一童，树隙一髯奴牵马立，当是太守使者，人马均凌兢有寒态，奇笔也。绢色已昏，而闪闪有光，骨董家所谓包浆亮也。江村著录在康熙中，后入内府，编入石渠宝笈；嘉庆中，又入重编，不知何时复出于世。

李葆恂的记录颇详，编入《海王村所见书画录》中。而“唐李升袁安卧雪图”之命名，颇令老人费解，八个如胡桃大的字，横书顿首，乃宋徽宗赵佶之瘦金体字。

据余考证，李升、袁安皆非唐代人。李升（903—925），五代十国之一的前蜀成都人，小字锦奴，善画人物，写蜀中山水尤妙，时亦有小李将军之称（见《中国人名大辞典》）。袁安（？—92），东汉汝阳人（今可南商水西南），字郡公。章帝（76—84）时为河南尹，在职十年，政尚慈爱，官至司徒。安未达时，洛阳大雪，人多出乞食，安独僵卧不起。洛阳令见而贤之，举为孝廉。和帝即位（89），外戚窦宪兄弟专权，他不避权贵，曾多次弹劾窦氏的专横。

可见唐李升《袁安卧雪图》，乃前蜀画家李升以“东汉章帝时，洛阳大雪，人多出乞食，袁安独僵卧不起，太守贤而举之”作为题材，创作出《袁安卧雪图》这幅传世国宝。据此一孔之见，笔者求教于当今书画鉴定家，先生们指教说：“鉴定书画，各抒己见；前人已定，后人亦可更之。”

这幅珍品，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皆收藏在皇宫中，被视为国宝。何时流入民间？据李葆恂记载：孙虞臣“得此图于曾宾谷先生裔孙某家”，孙虞臣将此珍品卖给了谁？拜询今日健在的茹古门生、老书画鉴定家，皆云：“没听说茹古斋曾经售过这件国宝。”

悦古斋的《画儿韩》续篇

悦古斋在琉璃厂经营书画文玩有 54 年的历史，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张，1956 年加入公私合营的一家老古玩店。匾额是光绪末年学部大臣宝熙书写“悦古斋文玩铺”六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韩博文是悦古斋老掌柜的韩德盛（字懿轩）的儿子。老掌柜是河北深县人光绪初年来京，在杨梅竹斜街钱锦盛纸铺学徒，光绪十年（1884）前后，离开钱锦盛，住琉璃厂观音阁，买卖旧纸和旧画，后在一位秀才的指点下，摹仿名家书法。他每天天不亮就去赶晓市，买回旧纸旧画分类整理，再去买掉。夜晚在一盏油灯下练习毛笔字读书，生活十分艰苦。

韩懿轩先临碑帖练好功底，再仿名家笔墨，他先仿翁同龢，再仿杨守敬。苦练十余载，终于成功。他仿翁同龢的字，翁同龢见到，夸他书法有功底。从临摹中学习鉴定书画，从跑晓市买旧字画中，锻炼出好眼力。光绪二十八年开了悦古斋，光绪三十一年（1906）生了儿子，起名叫增贤字博文，韩博文在古玩铺里长大成人，自幼喜爱书画，长大与当代书画名家交往，练一手好花卉山水画，鉴定古字画眼力甚佳。

民国以来，韩懿轩经营悦古斋 18 年，正是古玩行业的黄金时代，可是他无法同韵古斋的韩少慈相比，也不能同博韞斋的萧虎臣相比，这两家古玩铺在这个时期都发了财。就是和与其同年开张的彝古斋也不能比，彝古斋的呼克祥卖给了庆小山一批画，赚了两千现大洋，韩懿轩没做过上千元的买卖。他胆小、本小、钱少，所以能发财的时候也没发财。他鉴定字画的眼力好，又喜好学习钻研，同一些名人画家有交往，字画收藏家也赞赏他的眼力。在臣字款带御题的字画吃香的时候，他也

卖过小量的后落款、假御题的字画，卖给那些不懂画的新权贵。

悦古斋的买卖虽小，培养出的人才却不少，如王献臣、郭泳章、张孝禹、田健秋、萧程云、苏瑞生、王保祥、辛衡山等人在鉴别历代名家字画方面是各有千秋。就连韩懿轩儿子的徒弟刘九庵，如今也已是故宫博物院鉴定字画的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了。

60年代韩老先生的弟子辛衡山在陶然亭疗养院疗养，遇到邓友梅先生，两人无事闲聊，辛衡山讲起了韩老先生的往事和古玩铺买卖名人字画的故事。邓友梅经过构思，创作写出《画儿韩》拍成电视剧。当然，文艺创作是艺术加工的东西，不完全是事实，故事的情节与历史事实不是一回事，更不是韩懿轩一生的写照。一些老古董商看了《画儿韩》、《烟壶》、《那五》等作品，就电视剧中有关古玩和买卖古玩的描述向笔者说：“尽些外行话，只是看个热闹。”笔者说：“行家看门道，力巴看热闹。他是给力巴看的，不是给行家看的。咱们写《画儿韩》的续篇吧，把韩博文的事儿简要地写写。”老先生们微笑说：“可别写外行话，也别瞎编。”“咱们知道多少，写多少，写真格的。”

韩博文生长在悦古斋古玩铺，日久天长、耳濡目染，没学徒就能鉴定字画。他自幼爱好书法和绘画，在他父亲指导下，照着《芥子园画谱》学画。十几岁能画一手好画，山水、人物、花卉很有功底。二十来岁时同国画大师张大千、溥心畲交往，向他们求教；书法家、古画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也是韩博文的好朋友。1929年韩懿轩去世，23岁的韩博文子承父业，当了悦古的掌柜的。同行人都称呼他“小韩麻子”，他也不恼，总是微笑点头答之。

韩博文看字画的本事，虽不如他的几位师兄，但也颇有眼

力。有关历代、当代书画家和收藏家的轶事掌故，他比他的师兄们知道的多。在同行中，他是位活跃人物，谈笑风生，幽默诙谐。

1928年，山西人贾济川在海王村开了晋秀斋古玩铺。开张那天，韩博文去祝贺。22岁的韩博见到贾济川，拱手说：“师兄！我今天祝贺您的买卖开张，没拿什么礼物，买您一幅画，开张大吉！”边说边选出一幅山水画，问多少钱。贾济川跟他要了180元，韩博文二话没说买了下来。贾济川说：“你要买，给现钱。”“师兄！您胆忒小，我不坑您，给现钱。”韩博文笑着说。当给钱时，只给了160元。贾济川问：“你怎么给160元？”韩博文说：“您不相信我，跟我要现钱，罚您20元。”贾济川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行吧！就这的，你拿走吧！”

韩博文把这幅画送到画家、收藏家、清恭王府的袭爵将军溥心畬先生的府上，溥心畬没看上这幅画，把它挂在书房里。过了几个月，溥心畬在他的书房里接见一位外国朋友，没想到这位外国朋友看中了这幅画，请溥心畬把画让给他，溥先生欣然同意。这样一幅普通画，在王府里卖出了4000元的高价。韩博文用这笔钱发送他的父亲，又将悦古斋的门面扩大，一间小门脸儿变成两间大门脸儿；内部整理一新，把原来堆放零乱的字画陈列出来，整整齐齐。同行人都称赞他，20刚出头的人，就能办大事；也有人说，“老韩掌柜卖不少假画，怕人家看破，故意把东西弄乱装穷；韩博文的4000块办不了这么大的事，还是老掌柜留下的。”

韩博文同溥心畬的关系好，向溥先生请教绘画，溥先生给予指导，使韩博文笔墨有了长足进步。书法家、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了解到这一情况，于1936年曾委托韩博文去溥府，向溥先生婉言表达，不要将《平复帖》让给别人，而其本人露出

想高价收藏的意图。

韩博文知道《平复帖》是西晋陆机向朋友问疾的书札，共有 85 个字。这幅帖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要早六十多年，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年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法真迹。他在溥府看到这幅帖是牙色纸本，绝色邃古，高 7 寸 5 分，阔 6 寸。帖上有字 9 行，共 85 个字。字形朴质，在章草、今草之间犹存隶法，笔法刚劲古朴。帖上有宋徽宗赵佶瘦金题签，下钤双龙圆玺。前后钤“宣和”、“政和”印玺。还有楷书“晋平原内史吴郡陆士衡”11 个字。此外，还有明韩世能、董其昌，清梁清标、安岐等人的收藏印。这幅帖原是乾隆皇帝的母亲孝圣宪皇后所有，后归成亲王永璘。同治年间转入恭亲王府。后由恭王府的袭爵将军溥心畲收藏。

韩博文问溥心畲：“张伯驹问您是否愿意将《平复帖》转让给他收藏？”溥心畲说：“是他让你问我的吗？我不需要钱花，如果张伯驹实在是想要，让他给我 20 万块大洋。”韩博文说：“溥爷！我给您打一半折扣，10 万块，我去跟张爷说。”溥心畲说：“你那是侧棱肩子睡觉，想偏了心。”

1937 年，张伯驹又通过张大千向溥心畲探询，溥心畲仍不同意。同年夏季，溥心畲的母亲病故，急需用钱。这时，张伯驹请原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做中人，用了四万现洋的代价才将《平复帖》收藏在手。张伯驹于 1956 年将这件国宝捐献给国家，而今《平复帖》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1929 年到 1949 年，韩博文经营悦古斋 20 年，买卖明清名人字画数千件。同行人都说他搞了不少假的仿制古画，但具体到哪幅画是假的、复制的，是后落款、后加跋、题和御题的，至今没人说得清楚，只是猜疑。有的人为其辩解说：“说人家韩博文自己会画画，仿制、复制手到擒来，盖假印迹，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 1956 年公私合营时，韩博文拿出三百

多方假印章时，他们都目瞪口呆了。

这些复制的假印章，虽然都是用一般的玉石、木块刻制的，但也属于极其难得的艺术品。因为他复制了历代著名画家、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所用的印章。这些印章是大有学问的。以乾隆皇帝的印玺来说，就有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御书葫芦印、御书之宝等各种式样。各代著名书法家、画家、鉴赏家、收藏家，他们每个人都有名、字、号、又号、堂号、斋名等，如清初画圣王□，字石谷，号耕烟，又号乌目山人，晚年称清晖主人，他们的印章也是各式各样。镌刻的文字有大篆、小篆、金文、鸟篆之别。而篆刻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之一，在先秦及汉魏时期，艺术成就颇高。隋唐以来，也各有其时代的特点和风格。皇帝、官员、书法家、画家、鉴赏家、收藏家之印章都非常讲究，每方印章都有其特殊之处。鉴别这些印章的时代、人物、特点，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如果想复制、仿制这些印章，必须经过长期积累资料，反复琢磨，才能复制或仿制出来。悦古斋仿制出三百多方印章，非一日之功，它是通过经营历代字画半个多世纪，积累了大量资料，用两代人的心血才取得的。这些印章对我们研究历代名人字画、书法家、画家、鉴赏家、收藏家的印鉴，及各个时代镌刻的特点与风格，都有参考价值，可惜今已散佚，不知下落！

悦古斋参加公私合营，韩博文的脾气越来越孤僻，工作不到两年就不干了，退居斗室作画，以卖些早存的破、旧字画和他自己的作品，维持个人生活。他自己说：“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吾不改吾乐。”他离开他的家人，自己独居。1987年，81岁时在京去世。

车翻了，彝古斋关了

彝古斋在东琉璃厂路北，左侧是戴月轩笔铺，右侧是大观斋，一间小门脸儿，一师一徒，买卖字画连裱带装。小买卖完全靠勤劳，一点一点干起来。天不亮跑东晓市，买来破、旧字画，自己装裱好了卖。掌柜的呼克祥，字益卿，光绪二十八年（1902）自己独资开彝古斋，他是论古斋的徒弟，人很老实，要说传奇的话，他没什么奇闻可言。

大观斋的徒弟、伙计经常到彝古斋串门儿，跟呼掌柜有交情，有人同呼掌柜讲：“人忒老实了，不能干咱们这古玩行，您就是位太老实的人。”呼掌柜说：“干了不老实的事儿，我总是心里放不下。”大伙儿给他出主意说：“您干多了、干长了，习惯成自然就好了。”他说：“咱们靠眼力和手艺吃饭，甭想大富大贵，够吃够穿行啦。”

呼克祥交了位好买主，名叫庆小山。庆小山是位皇亲贵族，跟西太后都能说上话。1902年西太后带着光绪帝，从西安返回北京，一看宫里的东西丢了不少，就要搜查老百姓，庆小山奏请以收买代替搜查，以安民心。这一奏就准了。庆小山借着这个，收买了很多好古玩，成为北京城有名的收藏家。他本人对青铜器、陶器、瓷器很有鉴赏能力，看字画的眼力稍差一些。

民国初年，呼克祥积攒了一批明清名人字画，其中有真有假，还有后落款、假御题的画。呼克祥拿了二十多幅画给庆小山看，没有全打开看。先看了郑燮画的一幅兰花。板桥擅写兰竹，这幅画只写一束兰花，配诗文，是别开生面之作；又看了一幅王原祁的山水画，麓台擅画山水，这幅山水画是干笔焦墨，层层皴擦，青绿相映鲜明；再看了一幅仇英的仕女画，十

洲擅画人物，尤长仕女，是幅水墨、白描画。庆小山看了这三幅觉得不错，其余的画就不看了，论堆儿估买了下来，20幅画给了2000大洋。那个时候，卖了2000块算是大号买卖，也是彝古斋的第一号大生意，赚了一千五六百大洋。

不到半年，呼克祥又弄了一批字画，送给庆小山看。正赶上庆小山在家里会客，没接见呼克祥，呼克祥扫兴地回去了。又过了几天，呼克祥雇了一辆人力车拉着他和字画，给庆小山送画。拉人力车的是个新手，拐弯时没扶住车把，车打了偏乘，人摔下来了，字画滚到街上。呼克祥捡起字画对人力车夫没说什么，只一挥手说声：“拉我回去！”

回到彝古斋，呼克祥心里嘀咕，嘴里叨咕：“财源断了！财源断了！”他认为人力车打偏乘是不祥之兆。于是他把儿子呼博符叫到跟前说：“我这辈子，就到这儿啦！我回老家种地去，你好好看着这个买卖。”

呼克祥回老家不久，呼博符便将彝古斋的字画、家具等收拾一下，搬到天津太康商场去了。戴月轩收买了彝古斋的铺面房，扩大成两间门脸儿，逐渐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湖笔店，而彝古斋在太康商场没多久，就歇业了。

呼家父子都胆小，他们惟恐卖了假画，人家会不答应他们，来找他们算账。所以，爷儿俩先后都回河北深县老家去种地了。彝古斋开张十几年，赚了两三千块，呼克祥置了一顷地，盖了一所四合院的房子，弃商务农了。

庆小山到琉璃厂，彝古斋这个字号没了，呼克祥也见不到了，便问他的仆人，呼克祥哪儿去了？仆人告诉他：“呼克祥发财了，在乡下又盖房又置地，不回北京了。”庆小山说：“我没买他多少东西，怎么2000块钱就发财了？！”久居京城的皇亲贵族，挥金如土，那知乡下人有了千元，便是财主？！

韵古斋韩少慈趣闻

韩少慈，名士怀，原是穷苦出身的人，家住三河县农村，缺房少地，无法生活下去。光绪十二年（1886）来到北京，才13岁，在琉璃厂火神庙里一家叫萃文阁的裱画铺学徒。他吃苦耐劳，干活勤快，三年学成了装裱字画的好手艺。一天，火神庙对面的观音阁里有位算命看相的老先生，看见了十六七岁的韩士怀，跟他聊了起来，说他个子高、相貌好、胳膊长、嗓音宏亮，长大了会有出息。韩士怀说他胳膊长是从小用胳膊干活抻出来的，老先生说，不对，刘备双手过膝、大耳垂轮，乃天子相，你韩士怀当不了皇上，将来也不是个穷人！你长的是富贵长寿之相，信不信由你！

韩士怀回到萃文阁裱画铺，自己想，老先生跟我说这些，不知灵验不灵验？我光有裱画的手艺，一辈子耍手艺是发不了财的，买卖古玩字画是能发财的行当。从此，他裱字画时就注意看每幅字画，不懂就问。他在裱画铺里干了17年，既会裱画，又懂字画。这时，他就同大观斋的伙计万筱竹、张星五等拜了把兄弟，凑了几个钱，在琉璃厂开设了韵古斋买卖字画的古玩铺。

韵古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张，同治状元、历任乡、会试主考官、国子监祭酒陆润庠书写匾额，属琉璃厂名匾之一。

在清末的几年里，韵古斋是从东晓市买些旧、破字画，拿回来揭裱整修，然后再卖，逐渐积累，慢慢地自己存了些明清名人字画，买卖越做越红火。到了民国初年，有臣字款、带御题的字画“吃香”，价格也上去了。万筱竹到上海、南京、苏州一带收购明清名人字画，运到北京卖。北京政府的总理、总

长、次长们买韵古斋字画的不少，韩少慈也跟他们熟悉了，买卖发展了，字号也闯出来了。韵古斋成为琉璃厂的一家殷实户。

1917年，北京政府的财政次长、收藏家汪向叔，在两三年前，花十几万大洋从琉璃厂论古斋、韵古斋古玩铺，陆续买了大批明清名大家家的字画，还写了一本《麓云楼书画记》，记载他收藏的珍贵书画传说汪向叔跟一位军阀赌钱，一宵输了六万！军阀跟财政次长赌钱，实际是勒索。汪向叔同此督军搓麻将，打出个“幺饼”，督军将手中麻将一推说：“我和了！”汪次长仔细一看说：“你和幺鸡，不和幺饼！”督军说：“妈了八子的！我们奉天是鸡吃饼，怎他妈的不和？！”

汪向叔赌输了，急于用钱，打电话给论古斋，告诉他们，欲将所收藏的字画，以四万现款出卖。论古斋的萧云章接到电话，没立即答复，他想，这么多钱，一时谁也拿不出来。这时萧家弟兄正在分家，分完家再做这号买卖也不迟。韵古斋的韩少慈接到电话，当机立断，一口答应马上付现款，但要分期给，先付两万，双方达成协议，这号生意被韩少慈全部拿到手。

韩少慈的手里哪有那么多的现款？他有位好朋友、书法家冯公度，当时担任华商电灯公司的总办。总办有权动用公司的现款。韩少慈从冯公度那里借来两万元，付给了汪向叔。

在四万元还未完全交付时，韩少慈就将汪向叔《麓云楼书画记》中所载的珍贵名画，网罗无遗。全部弄到后，很快将其中的一小部分倒手卖给徐世昌大总统的弟弟徐世章。徐世章当时任津浦铁路局长，这是个肥缺，因此他很有钱。徐世章知道这批字画是汪向叔收藏过的，经过鉴定都是真东西，他本人也十分喜爱书画，也有鉴赏能力，所以他花了十万元将一部分明清名人书画买到手。

韩少慈还给冯公度两万，付给汪向叔两万，自己干剩六万大洋，还收存了一批明清名人书画珍品。从此，韵古斋在琉璃厂的声望高起来了，韩少慈从一个小本经营的古玩商，一跃而为古董巨子、字画富商。

韩少慈发了财，回到三河县老家，一下子置了 1600 亩地，又在西集镇开起了烧锅和粮行。乡亲们都觉得出奇，韩七（韩少慈排行老七）怎么发了这么大的财？！于是，在他的家乡传开了有关他的各种各样的奇闻。在北京城里，韩少慈买了房产，开设德茂茶叶铺。土地、房产、烧锅、商业的盈利日渐增多，韩少慈越来越富，成了琉璃厂这条街上屈指可数的大财主。他的城里城外的亲朋好友，没一个人再当面直称他韩士怀或韩少慈，更不敢叫他韩七，而是在“韩七”的后边，加上一个“爷”字。

韩七爷高高的个子，手能够膝，隆准凤目，配上一副金丝近视镜，很有派头。不到 50 岁就留起长髯，飘飘洒洒，说话嗓音宏亮，走路迈四方步，颇有士大夫风度。虽然他是裱画匠人出身，但他善于学习钻研，鉴定明清字画的眼力不错，又善于经营，做事果断，用人得当，能发挥人之所长，因此买卖越做越大。

他发财之后，习惯于以话压人，再加他嗓门高，同行人都说他“财大气粗，爱吹牛”。他当众吹嘘说：“王□的画，我不用看，用手一摸，就摸出个真假来。”不少同行捧他：“七爷的眼力谁能比得了。”可是也有不少同行不服他。

其实韵古斋鉴定字画是靠万筱竹。从 1903 年至 1921 年，万筱竹帮了韩少慈 18 年。这一年万筱竹出号了，自己单独去干了。二掌柜的万筱竹离开韵古斋不到两个月，江南常熟有位收藏家给韵古斋寄来信，约请万筱竹去看清初画圣王石谷的山水立轴。韩少慈想，这号买卖可别落到万筱竹手里。他急忙派

人去常熟把画拿来。

韩少慈把画拿到手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幅长4尺、宽1尺5寸的山水立轴。上用北苑法（即按董源之笔法作画）作主峰，笔势秀伟；中作楼观，群松环绕，颇假山樵，下作杂树数株，掩映村舍，墙内细条丛生，门外一客扶杖过桥，桥下流水激乱石，仿佛有声，砂碛水口，远近层叠，略用焦墨皴染。款落：耕烟外史王□，下押王□之印，白文方印耕烟外史，朱文方印。韩少慈摘下近视镜，细看深思，觉得这幅画似曾相识，嘴里哼道：“此乃画圣石谷先生得意之作也！”

琉璃厂的书画鉴定界名人高手萧虎臣、张治平等，打听了韩七爷从南方买到王石谷之杰作真迹，想过目欣赏。韩少慈先找到和他关系较好的几位鉴定家看看这幅画轴。几位有经验的老人都说：“这是幅清代的旧画，不是王石谷亲笔，乃虞山派画家模仿之作，出于谁手，未落款；画上的款，是后落的，似是张鉴轩之手笔。”韩少慈沉着冷静地说：“明眼之鉴相同。我吃亏在惟恐这号买卖被人抢去，又想王□是常熟人，从常熟买来不会有错。后再反复细看，从落款上看出是张鉴轩的手笔，印色显浮未入纸层，是新盖的印章。再则作画的笔法较嫩，不像石谷之老气横秋……”一位老行家说：“七爷！吃堑长智，虽属破财，塞翁失马，正焉知非福。”韩少慈又说：“士怀丢丑之事，请别外传。”之后，韩少慈将这幅画收藏起来，不再让它见人。深藏25年，沧桑变换，1956年合营时，才见世面。

事情的原委是万筱竹听说韩少慈当众吹嘘自己能摸出王□画之真假。他想，韵古斋经营字画靠我的眼力，你韩士怀有什么可吹的。事也凑巧，万筱竹刚从韵古斋出号，就遇到一幅山水画轴，笔墨好，气势不错，颇似石谷之作，没有落款。他灵机一动，找张鉴轩落上王□的款，寄往常熟，托人办这件事，

试试韩少慈的眼力。这才有了韩少慈派人去常熟，买了假画，说大话被掀的这段在琉璃厂流传多年的故事。

韵古斋赔了点钱，未因此伤筋动骨。买卖仍然是越做越好，土地、烧锅、粮行、茶叶铺的买卖也不错，房产租价也在提高，韩少慈的财气越来越旺。韵古斋请来“瓷器把式”徐少山，不单经营字画，还做起古瓷生意来。

古瓷、古画都属古玩行业，但在鉴定上则是各有各的奥妙。确切地说，它们是同行不同业。对韩少慈来说，鉴定字画他是内行，鉴定瓷器他是外行。但他不管行里行外，只要能赚钱，他都敢干。到了1942年，韩少慈大财主的名声在外，早已有人想捉弄他，要“设下香饵钓金鳌”。

194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韵古斋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问：“你是延古斋吗？一对钧窑洗子，你们给了6000块，能不能再添点。”徒弟一听，对方把电话打错了，要撂下电话，可是6000块一对钧窑洗子，要卖给延古斋，应当告诉掌柜的。韩少慈正在柜上，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想抢延古斋的这号买卖，让徒弟打听好地址，马上去看货。他带上“瓷器把式”徐少山，一同来到什刹海北面的一家旧王府。

1911年清王朝覆灭，1942年王府的排场却照旧。门房、客厅、听差的、老妈子，打帘子迎、送客人和看茶送客等一套老规矩照常。韩少慈、徐少山见王爷的后代拿出的是一对口上带鼓丁、三足云字头、直径有20厘米的钧窑圆笔洗。再看底部见不到瓷胎，露胎处镶着鍍花银片，看来很别致。反复看完后，韩少慈说：“是件宋钧窑洗子，东西不错。”抬头看看王爷的后代——一位中年男子，又说：“这是您家传的吧，东西不错，6000块是不少啦，我们卖出去，也赚不了多少。”这位中年男子低着头，有些难为情地说：“你能再添点吗，家里等着急用钱，老太太不知道我卖这对洗子，要是她老人家知

道，给多少钱也不准卖，还准备传留后世哪！”韩少慈望了望徐少山，徐少山皱着眉头、不说话。韩少慈不肯多添一文钱，就给6 000块。主人说：“钱，我是等着急用，6 000 块就6 000块吧，要现钱，你们想要，就一个人留在这儿，一个人回去取钱，咱们是一手钱，一手货，交钱东西拿走。”

韩少慈很高兴，心想一对宋钧窑洗子，6 000 块值，起码卖个三四万；王府里的东西不会错。回到韵古斋从银行取出6 000块，雇辆汽车到王府，把钧窑洗子取回来。

过了半个月，韩少慈请来安溪亭。安溪亭，古玩行人称呼他“安老蔫”，平时不爱说话。他是琉璃厂最大的一家经营古瓷的延清堂的徒弟，见到的名窑瓷器最多。经过三十年来鉴定、经营古瓷的实践，同行人都信服他的眼力。

凡是懂得古瓷的人都知道，宋代钧窑瓷器胎色深灰而胎质坚密，器胎厚重而器形规整。安溪亭看这对钧窑圆笔洗，露胎处都用鑲花角片镶上了，镶得牢固，见不着胎；手头不够（用手掂量叫“手头”，重量不够叫“手头不够”），而钧窑瓷器胎厚釉厚，手头较重，再看釉，钧窑瓷器是一种釉层较厚的天青色浊釉，烧得像周世宗、柴荣所要求的那样：“雨过天青，云破处”。这种漂亮的釉色烧制，是利用氧化铜、铁呈色不同这一特点，烧成蓝中带红或带紫的色釉，红、紫的色泽如海棠红、玫瑰紫，非常艳丽。可是这对钧窑洗子的釉层薄，颜色是蓝红相间，像窑变性质的釉色，看起来死板，不像人们形容的“晴空万里的几朵彤云在飘摇变幻”那样呈现自然美。

安溪亭看了看，吸了口气，心想，这是民国初年河南禹县窑烧出的仿制品，仿得还不错，但“貌像神不像”，手头不够，胎子不露是怕看出破绽。他用眼望了韩少慈问了声：“七爷！您从哪儿买来的？”韩少慈答道：“是某某王府的东西。”安溪亭哼了一声，不再说什么。韩少慈心里有点明白，可能买

“打眼”了。但尚未消除赚钱的念头。之后，他又请了两位鉴定古瓷的高手看了看，谁也没说一句肯定的话。这时，他好像被一瓢冷水泼醒，“啊”了一声，随手把这对钧窑洗子放在柜里锁起来，不再让它见人，也不愿将这件丢人、破财的事泄露出去。

那时，韩少慈不怨自己的眼力不高，鉴定古瓷没本事，而是怨自己的命运不佳，认为这是自己留胡子留的，一气之下，把长髯割掉。熟人见面问他：“七爷，您的胡子怎么不留了？”他说：“唉！留胡子不走‘字’（走运气的意思），吃饭又碍事，剃了它既方便又卫生。”

到底是谁玩弄的这套骗术，骗取了韩少北的6000块巨款，气得他割须弃髯？有人说：“北京后门那里有位姓梁的，专门干这路事。”是不是姓梁的干的，至今没有肯定或否定。而这对钧窑洗子，1956年曾公开陈列在琉璃厂韵古斋，虽是仿制品，仍有其一定的价值。

解放后，韩少慈早已重新蓄起长髯，经常带上一包好茶叶，到文古斋泡好茶水，同那里的主人陈中孚和炭儿胡同的岳彬、靳咨轩、整修瓦器的李焕章等人聊大天。谈起他的往事，他呵呵一笑。1960年，他在京离世，享年86岁。

韩少慈从1903年开韵古斋到1956年合营，独自经营53年，他发财、失误流传出许多奇闻。其实，鉴定界人士有哪位是过目千万件文物古玩没“打过眼”的“常胜将军”？而今韵古斋这个老字号还保留在琉璃厂的街上，又谁知这家老字号的原来主人，有这么多颇有戏剧性的趣闻？

论文斋靳伯声和张大千

论文斋原是论古斋萧维邦的徒弟刘子衡在宣统二年

(1910)开设的。1944年，刘子衡将论文斋的全部货底倒给靳伯声，徒弟、伙计也跟着去了。刘子衡经营论文斋34年，是以买卖历代名人字画为主。从1911年到1927年的16年，生意较好，虽然没赚什么大钱，但也趁个几万。1927年以后，生意日趋平淡，到了1943年，刘子衡已无力经营，就倒给了靳伯声。

靳伯声原本不是古玩行人。他是京东香河县人，15岁到天津学南纸店，南纸店经营新字画。书法家、画家在南纸店里有“笔单”(即各种规格字画的价目表)，他们通过南纸店卖自己的作品，所以，南纸店的人同著名书法家、画家认识和熟悉。靳伯声在家念书时，毛笔字写得不错，过年时给街坊邻居写春联，在天津南纸店管过账，跑过外，跟书法家华世奎、张伯英，国画大师张大千、溥心畲等名家打过交道，曾向他们请教书法、绘画，在名家指导下，经常练习书法。到了1944年，他的书法在琉璃厂古玩行的人里头，称得上首屈一指。他把论文斋倒过来后，即将由书法家贻穀书写的老牌匾摘下来，换上他自己写的匾额。

北京的店铺最讲究牌匾。传说“六必居”的匾是明弘治进士、奸相严嵩写的，其实没那回事。六必居是清康熙时代开张的。从误传中可见北京人注重匾额。自道光年间以来，琉璃厂是北京匾额精华集粹之处。古玩铺、书铺、南纸店、湖笔徽墨店等各家的匾额，绝大部分出自名家之手。琉璃厂有何绍基、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陆润庠、阿克敦布、克勤郡王、王维珍、潘祖荫、翁同龢、翁斌孙、祁間藻、徐颂阁、温忠翰、宝熙、端方、朱益藩、徐世昌、郑孝胥、樊增祥、袁珏生、邵章等著名书法家写的匾额；还有华世奎、张伯英、寿石公等书法家写的牌匾；至于恽薇荪、唐驼、冯公度、张海若书写的苏体、欧赵体、颜柳体、北魏字体的匾额堪称一绝。琉璃

厂各店铺之匾额都是名家所书，字体不一，极尽琳琅壮观之至。靳伯声在琉璃厂挂出他自己书写的牌匾，跻入名家之林，任人观览，不见逊色。他书法虽好，但一生没卖过字，书写的对联、中堂、扇面今已不存。他一生的精力用在做新、旧字画生意上，没注重自己的书法艺术成就，把书法做为“以文会友”的手段。

靳伯声在 24 岁时开始经营新旧字画，经常卖些仿古画。那时，张大千仿的石涛山水画，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有一次陈半丁先生宴请客人，张大千、靳伯声在座。陈半丁拿出一幅石涛的山水画轴，请大家欣赏，并介绍说：“大涤子，姓朱，名若极（清初画家，他曾为僧，法名原济），这幅画是件稀世珍品。”张大千插话说：“过奖！过奖！这是我画的咧！这是我画的咧！”靳伯声在 1924 年的前前后后，代张大千出售一些仿王石谷、仿石涛的山水画轴。画家、收藏家、鉴定家们评价张大千的山水画艺术水平，不低于石涛、王□。后来，张大千很少或不再落款石涛、王□，而写“蜀人张大千”。

1926 年靳伯声在北京粮食店北方旅馆租了一间长房（即长期居住的房间），室内挂满字画。他经常到琉璃厂，同论古斋、韵古斋等经营书画的古玩铺来往密切，也到清秘阁找张静忱、到荣宝斋找王仁山做买卖、聊天。一天，靳伯声来到荣宝斋，看到室内陈列着 12 扇围屏，围屏上是 12 条通景山水画，气势磅礴，雄伟壮观。便问王仁山：“你这套围屏山水画卖不卖？”王仁山说：“这是张大千给我们画的，摆在这儿供人观赏，不卖。”靳伯声说，我请他给我也画条通景山水画。靳伯声找张大千说：“我准备在琉璃厂开家古玩铺，买 12 扇围屏，请你画 12 条通景山水画，我把它摆在客厅，供往来客人欣赏。”张大千应诺给画，但未画成，便离开了北平。

围屏是什么呢？围屏是室内装饰品。我国在什么时候发

明、制作的围屏，无从考证。笔者的前辈们说：“围屏也叫屏风，放在屋里挡风或挡眼用的，挡眼就是怕看，如躲在屏风后面换衣服。后来成了室内装饰品。唐代有四角屏风、六角屏风。唐代的屏风是什么样，谁也没见过。宋代的屏风存之者也极少。到了明代，宫廷里讲究用围屏装饰宫殿。清代顺治、康熙、雍正时期，宫内使用的围屏，大部分还是明代宫廷的遗物。乾隆时期新制一些围屏，大都与明代的遗物相同。惟独到了慈禧当政时期，特别讲究围屏，有三扇、五扇、七扇之别，最多的是12扇。有雕漆围屏、雕填围屏之分，雕填较为珍贵，若镶嵌上珠宝钻翠则价值无限了。慈禧太后穷奢极欲，如意馆有专门给西太后绘画围屏画的画师，还用翡翠、珍珠、红蓝宝石等镶嵌围屏。各大王府也争相效仿制作。1921年前后，北京的珠宝玉器商有的从旧王府收购的围屏中得到了珍贵的珠宝钻翠。古玩铺里很少经营围屏，因为件大不好存放。岳文轩的彬记古玩铺里有围屏，也只是雕漆或雕填的，带镶嵌的则没有。

张大千为12扇围屏给荣宝斋画的12条通景山水画，是罕见的艺术珍品。若保存到今天，一定价值连城，可惜不知落在谁手？！

从1925年到1944年，靳伯声在天津、北京经营新、旧字画，发了点财，把论文斋倒了过来，入了古玩行商会，成为古玩行人。他鉴别古代书画的眼力好。抗战胜利前夕，伪满洲国垮台时，溥仪被苏军拘留。在沈阳、长春混乱之际，伪满宫廷中的古玩字画，大量被盗窃或遗失，长春、沈阳、大连的街头小摊上，都出现了古玩字画。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马霁川得到消息后，邀靳伯声同去收购。他们合伙收购到一批字画。其中有隋朝画家、朝散大夫、帐内都督展子虔画的《游春图》，金碧设色，景物秣丽，山峦树石，空钩无皴，是我国传世最古的

名画之一。有唐朝诗人、文学家杜牧书《张好好诗》，诗文清俊生动，书法似行云流水，还有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宋人绢本《听琴图》等等。

靳伯声将范仲淹手书《道服赞》和杜牧书《张好好诗》卷，卖给了书法家、收藏家张伯驹。《张伯驹传》中记载：“琉璃厂论文斋老板靳伯声，从东北收购来范仲淹手书《道服赞》。张大千、马叔平闻讯，皆欲一睹此稀世之宝，但靳伯声为了提高此宝的卖价，故意避而不见。张伯驹也早已得到消息，但他只是不露声色地密切注意着靳伯声的行动。最终还是靳伯声耐不住性子，悄悄给张伯驹通了电话，表示要给张爷送到府上，请鉴定鉴定。

《道服赞》送来，张伯驹展卷细看，只见书法风神隽爽，骨气洞达，确为真迹，便以 110 两黄金的高价买下。张伯驹照例备酌请挚友张大千、马叔平、王君坦等人一同欣赏新藏品。几位名家皆击节叫绝。席间，张大千作画，张伯驹题诗；后又和诗人王君坦联句，还请潘素弹奏琵琶和古琴。倚声论曲，弦歌酬唱，直到明月当空。

张伯驹买到靳伯声收藏的杜牧书《张好好诗》，是从画家秦仲文处得到消息，托人从中联系，以 5 000 元买到手的。《张伯驹传》中记载：“张伯驹经常把藏品置于案头榻前，静静揣摩，反复欣赏，尤爱《张好好诗》墨迹卷，常常如醉如痴，感叹不已。”

1949 年后，靳伯声曾因在东北收购伪满宫廷遗失字画文物和向香港走私文物被判刑。因为他开的论文斋加入公私合营，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在琉璃厂宝古斋当营业员，做鉴定古旧字画工作，并做出过贡献。

1956 年，张伯驹将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手书《道服赞》等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收到文化部部长沈雁

冰亲笔签发的褒奖状。

1961年，国内生活遭到困难，国画大师张大千在国外不忘故旧，不忘二十多年前的承诺，给他的老朋友靳伯声寄来两幅亲笔画。由于种种原因，加之关税过重，靳伯声没敢去领取，不知此画失落何方？

不出名的书法家靳伯声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他家乡的造反派押解还乡，积郁成疾，病死在故里。

博韞斋经营明清字画

博韞斋是由著名画家、篆刻家、中国画会创始人金拱北集资，茹古斋的门生萧虎臣、杨伯衡担任经理，于1911年开设的，至1945年倒闭。在琉璃厂经营书画和古瓷34年，曾闻名于国内外。本篇仅记述其经营书画方面的事实。

萧虎臣在茹古斋学徒，受孙虞臣的指教，鉴赏明清名人字画颇有功底，深受书画收藏家赞赏。画家金拱北收藏历代名家字画甚丰。宣统元年，萧虎臣拜见金拱北，金拱北拿出一幅明代四大家之首沈周之花鸟画，共同观赏。金拱北说：“这幅画是沈周之佳作。”萧虎臣讲：“沈周擅画山水，笔墨坚实豪放，沉着雄浑；又兼工花鸟，浅色淡墨，老笔纷披，而有神采。”金拱北听萧虎臣评议沈周颇有见地，便提议由萧虎臣担任经理，他本人负责集资，开家古玩铺。萧虎臣向金拱北推荐他的师弟杨伯衡当经理，他做副手协助经营。

1910年，金拱北集资9000现大洋，由萧虎臣、杨伯衡筹建博韞斋古玩铺。1911年博韞斋开张时，9000块本钱全赚了回来，还多了千余元。经营古玩书画赚钱怎么能这么快呢？这与当时的时局有关。

1910年，琉璃厂传说着汪精卫谋炸摄政王，摄政王没被

炸死，汪精卫被逮捕；四川乱了，载澧没办法，启用端方入川，后被士兵处死在资州；孙中山要回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等新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京城里的居民是人心慌慌，大户人家想卖些古玩字画，存点银子，准备度荒乱之年。

萧虎臣趁此时机，在城里收购了一批珍品，有明代著名书画家沈周、仇英、唐寅、文徵明、董其昌的真迹；清代“四王”——王鉴、王石谷、王时敏、王原祁之佳作；蒋廷锡的花卉、董邦达的山水、郎世宁的人物、八大山人的水墨画等等。清末时，宋元字画每幅超不过千两银子，明清字画价格更低，这批字画总共花了不到6000块银元。

一些文人学者、新兴的银行界人士和政客，也想趁此时机买些字画文玩，自己欣赏或用以疏通新的权贵。京城里鉴赏、收藏字画的人士，对萧虎臣都有耳闻，加上金拱北的介绍，请萧虎臣代为挑选、鉴定字画的人便多了起来。经萧虎臣的一买一卖，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赚了一万多块钱！

1911年冬季，博韞斋正式开业。匾额由郑孝胥书写。郑孝胥是光绪举人，曾参加“公车上书”，是维新派人物。处于武昌起义、民国兴起之时，由维新派人物书写匾额，是一种“时髦”。可是不久，郑孝胥投靠顽固派，成为复辟清室的急先锋，堕落成汉奸。而他的书法仍然属于上乘，此匾是琉璃厂名匾之一。

博韞斋开张的这一天，杨伯衡、萧虎臣剃掉了脑后的辫子。同行的人很多来祝贺，东家、掌柜的、徒弟、伙计都很高兴，议论杨、萧二位走运气，没开张就赚了大钱；谈论着黎元洪被迫当湖北军政府都督。有位仍留着辫子的同行的人说：“这辫子可较不得，黎元洪坐不稳，革命党也长不了！”

民国初年，明清名人字画价格暴涨，1916年前后比起清

末时的价格，有的画猛增数倍，有的画甚至涨了十多倍！而“南宋四家”夏圭、马远、李唐、刘松年的画，鉴赏的人不多，能看出真伪者更少，因而无人问津。行市是卖起来的，买明清字画的买主多，愿出高价；懂宋元字画的人少，就没有去买，价格自然降落。

清初的朱耷和郎世宁的画各有所长，艺术成就都较高。朱耷擅画水墨花卉、禽鸟，笔墨简括，形象夸张，他的水墨画对后代的写意画影响很大。朱耷是明代宁王朱权的后裔，明亡，朱耷出家当和尚，致力于绘画，他写山水，意境冷寂，他画鱼鸟每作“白眼向人”的情状，他的画署款“八大山人”，没落过臣字款。郎世宁，意大利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来北京传教，后任清宫廷画家，擅长肖像、花鸟、走兽，尤其是画马画得最好，他的《百马图》是稀世之宝。郎世宁作品参酌中西画法，注重透视和明暗，注重写实，刻画细微，而止于形似，从这一点比较则有逊于朱耷。而郎世宁称臣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他的画有臣字款的居多，带御题的也多。那时，郎世宁的画价格高涨，卖得很快，而朱耷的画则无人愿意买。

博韞斋经营书画，适应了这种变化，在北京和外地，特别是江、浙一带大量收购明清时代名人字画。有的字画没落臣字款，他们请张明（字鉴轩）书写上臣字款；没有御题的字画，则请阎善之书写乾隆御题。张明、阎善之是仿旧画、落假款、写假御题的专家，他们落款和御题，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甚至行家也难分辨真伪。博韞斋将真的和假的，有臣字款、带御题的字画卖给他的主顾。买这类画的主顾主要是一些新权贵、军阀、官僚和政客。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不了解我国国画之奥秘，对古画缺少知识，没有鉴赏能力，只认为：凡是臣子给皇帝画的画，又有皇帝的御题，就是值钱的好画，并以自己手

里有这类的画，来显示其文雅、高贵。他们财大气粗，有势力。有的北京政府总长、次长，特别是军界人士，给萧虎臣期限，要求在限定的时间，给他买到郎世宁臣字款带御题的画，那就只能做假应付。

从辛亥年到丁卯年，16年来博韞斋的生意一直兴隆。那时，北京还算是首都，虽然袁世凯上台、倒台，段祺瑞上台、倒台，军阀混战，各派势力有消有长，当政的像走马灯一样，上来下去，可是北京仍是首府，历史上称之为北京政府。外国使节也驻在北京。外国财团、各国使馆官员争相购买中国古玩。一些国家，如日、英、美、法、德等国在北京驻有古董商人，收买中国古玩。军阀、官僚、政客也都买文物字画，装饰府第；文人学者、收藏家买些文物鉴赏、研究。博韞斋又有东家金拱北的介绍，很多军、政界人士和金融界人士，以及名流学者，成为博韞斋的主顾。经营16年，赢利四五十万元。

政府南迁后，南京成为中国的首都，那时称之为南京国民政府，北京改称北平。博韞斋的主顾们，有的败落了，有的随政府南迁；东家们陆续抽出股份；经理人的精力衰退，有能力的徒弟伙计们纷纷离去，博韞斋日渐衰落，勉强维持到1945年抗日胜利前夕，便完全倒闭了。

证古精舍的张治平

张治平，名钧，河北武清县人。在三四十年代，他是琉璃厂“三位书画鉴定名家”之一，这是同行公认。能做到这一点甚为不易。因为这种行业的人有个共同的缺点，就是谁也不服谁，不是取长补短，而是背后相互“扒皮”。你如果说某人眼力好，他会说：那人不怎么的，你不要吹捧他，他买过“打眼货”，或者说他人品不好等等，好像别人强了，自己就

弱了一样。所以，取得公认是十分难得的。

张治平的父亲张子青，名广万，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琉璃厂开富润轩古玩铺，有鉴别书画文玩的好眼力。张治平自幼耳濡目染，爱上了书画。他读书习字很有天禀，老师教他习八股、进考场、踏入仕途，父亲则说“商人之子恒为商”。光绪末年，他到茹古斋学徒，受业于孙虞臣门下。孙虞臣的徒弟众多，多数都成才，其中萧虎臣、张治平是鉴定字画的杰出人才。三位鉴定书画名家，茹古斋的徒弟有两名，还有一名就是万筱竹。

他们三人的共同特点是谦逊谨慎，虚心好学，从不说大话，尊重别人。时间长了，人们自然而然地尊重他们。张治平还是位书法家，有人说他是先柳后赵，柳赵揉合，自成一家。字体柔中有刚，刚柔相济。张治平在40年代，走路时在腋下经常夹着蓝布包，笔者年幼时曾好奇地问他：“张大伯，您的包里是什么呀？”他打开给笔者看，原来是书和笔。他不大爱闲聊，著布衣布鞋，颇有书卷气，不像古董商倒像位教书的老先生。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是老鉴定家的口头禅。这句话不无道理。张治平鉴定字画的才能，不是从课堂上听了名人言传而得到的，而是在不言中心领神会的。他说过：“要学会看字画，自己要能写会画，才懂笔法画意；看画时俨如置身画境，才能品出优劣。”这句话是他自己经验的总结。

1923年，张治平在琉璃厂开设证古精舍，专门鉴定字画，只有他和徒弟薛士和二人。薛士和出师后，来了萧秉志，总是两人的时候多。1945年后，张治平在家鉴赏书画，做点字画生意。他的名声虽高，但经营书画只是维持生活，没发过财。传说他对明代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大家和“清代四王”——王鉴、王□、王时敏、王原祁以及吴历、恽寿平等

人的作品有较深的研究，鉴别能力最强。可惜，未见他在这方面著述的文字。

虹光阁的经营有“三靠”

虹光阁于1923年在琉璃厂开业，以经营字画为主。股东有三家，一家是状元的后代翁斌孙。从咸丰到光绪，翁家出了两名状元，老状元翁同龢，小状元翁增源，叔侄状元，传为佳话。翁斌孙是翁增源的儿子。另外两家股东是渠铁医和于泽三。渠铁医是翁斌孙的女婿，于泽三是旗人，他的父亲是被徐锡麟刺杀的安徽巡抚恩铭。三家合股共拿出一万现大洋。

虹光阁这个字号是怎么起的？说也奇怪，曾经做过顺天府主考的翁斌孙会相信“扶乩”（口语叫“扶鸾”）。翁斌孙用扶乩的办法，求神给起了字号。把木制的丁字架放在沙盘上，由两个童男各扶一端，依法请神，木架下垂部分在沙盘上画出“虹光”二字，于是便起了这个字号，叫虹光阁。那时，传说由华世奎写匾买卖能发财，翁斌孙便请华世奎给虹光阁写了块匾。

东家拿一万块钱，请笔彩斋的徒弟杜英魁（字华亭）当经理。杜华亭把永宝斋的铺底倒了过来，开办虹光阁。永宝斋是山西人崔偕平于光绪十年（1884）在琉璃厂开的古玩铺，宣统二年（1910）由山西人贾凤笙经营。1923年，贾凤笙将全部货底倒给杜华亭。山西人在琉璃厂经营古玩铺，较为殷勤，货底子厚。杜华亭本人鉴定古玩的眼力平常，但他善于经营，遇事忍让，放手用人。他经营虹光阁，一靠原有的货底，二靠东家的势力，三靠伙计、徒弟的才干。

拿靠东家的势力来说，虹光阁的东家是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后代，翁斌孙又做过顺天府主考，翁家的门生很多。他家

的门生尽些些北京政府的官，参、众两院的议员，还有些名流学者。翁家在琉璃厂开古玩铺，翁家的门生络绎到虹光阁买古董。所以，虹光阁一开张就生意兴隆。虹光阁开张后，翁斌孙来过两趟，不久就去世了。翁斌孙的儿子有位好友，名叫张叔诚。经翁家介绍，张叔诚经常到虹光阁来鉴赏文玩书画，成为老主顾。张叔诚的前辈在清廷做过天津道、海关道和兵部侍郎。张叔诚在北京有房产和店铺多处，是北京著名商号马聚源、天成斋、庆成轩和几家当铺的股东。张先生爱好古玩，喜爱名人字画，收藏文物甚丰，是位收藏家。

1921 年的前前后后，北京的当铺行业十分兴盛。因为这时在北京的清廷遗老遗少、宗室贵胄、旗人、太监中的大部分人已衰落、贫困。有的靠典当度日，尚能维持生活，有的则贫困潦倒。因此，典当的人很多。典当之物种类庞杂：珠宝钻石、古董玩器、名人字画、服装家具、金银首饰、牙雕珐琅……能当的都当。张叔诚先生家里开的几家当铺，有的人家当了古董玩物、名人书画，没钱赎当，过期了当铺就可以拍卖。他们先请张叔诚选出心爱之物，其余的由虹光阁代为出售，虹光阁可以从中提取 20% 的利润。张叔诚对虹光阁这样支持，使虹光阁的货源不断，并保证了一定的利润。

杜华亭还依靠伙计、徒弟的才干。杜华亭开虹光阁，鉴定名人书画，是靠他的师弟曹文波。曹文波钻研鉴别历代名人书画，特别对明清名人书画有研究，他的眼力好，又经常和收藏、书画家们打交道，学了不少知识。在书画交易中，虹光阁的老主顾有：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外交总长、暂代国务总理的汪大燮，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书写北京前门箭楼上的“正阳门”三个大字的书法家林长民，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收藏家朱幼平等。曹文波做这些人的书画生意，为虹光阁赚了钱，又培养了徒弟。由于他钻研业务、操劳过度，

得肺病早亡，去世时才 35 岁。

曹文波死后，杜华亭请来张云岩协助他做生意。张云岩是大观斋的徒弟，受业于赵佩斋门下，他对铜器、瓷器、玉件、杂项文物有研究，眼力好。1924 年前，他给曹锟部下高凌霨、吴毓麟等人买文物礼品，同直系军官有往来。原想由他们出资，张云岩在琉璃厂开家古玩铺，不料第二次直奉战争曹锟被赶下台，他的部下也就没心思开古玩铺了。张云岩的打算落了空，才去帮助杜华亭经营虹光阁。

1925 年前，溥仪还住在故宫里，袁世凯答应给“先朝的优待”不能实现，宫里开销很大，无法维持，将一些古玩字画、金器文物抵押在盐业银行，逾期后由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在古玩行、玉器行里“封货”。有一次在廊房二条聚珍斋“封货”，有官窑瓷器百 80 件。张云岩去了，封到雍正天蓝圆笔洗子一对，康熙斗彩十二季酒杯一套。股东渠铁医看好了这些宫里的东西，给了虹光阁一点儿利润，他收下了。

1932 年，大观斋请张云岩去当掌柜的，他便辞去虹光阁二掌柜的职务。这时，杜华亭的大徒弟邱震生跟曹文波学会了鉴定字画，又跟张云岩学了看铜器、瓷器、玉件、印章等等，眼力不错，他跟杜华亭说：“掌柜的！您不用请人啦，咱们自己干吧。”杜华亭说：“你能行啊？”邱震生说：“您放心，把事交给我吧。”25 岁的邱震生挑起了虹光阁的大梁，一直干到 1944 年。

邱震生会鉴定字画、瓷、铜器，也懂玉石雕刻，他还会抓住顾客的心理做生意。1929 年的一天，老翰林庄蕴宽来到虹光阁，杜华亭应承他，邱震生侍候他们。庄蕴宽看一幅山水画，邱震生在旁边介绍说：“这东西不错，”没想到这句话把老翰林惹火了，庄老先生用眼上下打量邱震生，然后眼珠一瞪说：“你怎么知道不错，你看着他画的？！”邱震生心想，我没

说什么，就惹他瞪眼，这老家伙！乾隆时人画画，我怎能看着他画。后来，他一琢磨，悟出个道理来，原来是不该我说话，我说了，他看不起我，就训我。一些买古玩的官僚、学者、有钱的人，都看不起人，高傲、自以为是，他说什么是什么，你不能插嘴。他买古玩，他说真就真，说假就假，别人要顺着他说，他不问你，你不要说，你一说，他认为你在他面前显示自己比他高明。他本来不懂，你还要捧着、顺着他，他就高兴，呛着他说，不行。他把假是当真的，你也顺着他说是真东西，他能花大价钱买。而真正收藏家、鉴赏家、对文物有研究的人，跟那有钱有势的人不一样，他们尊重古玩铺里的人，愿意听他们对具体文物的见解，对这样的人，必须说真话。古玩行里成长起来的鉴定家，不少人是通过细心听老一代古董商同收藏家、鉴赏家在评议具体文物的对话中，学到鉴定本领的。

邱震生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方法做古董生意，他做过韩复榘的生意。他从廊房二条德源兴珠宝玉器铺的“铁巴”（“巴”是回语尊称，如同汉语称“爷”）那里搂来田黄石和鸡血石印章、珠串等，到山东见到师长孙桐轩。孙师长很喜爱一对鸡血石印章，是块方章，1寸5分见方，6寸高，藕粉地，质地最美，浅红微淡，是一对难得的珍品。孙师长以1万元高价收买了，送给了孔祥熙。这是1934年的事。孙师长同邱震生交了朋友，派参谋开汽车送邱震生到曲阜参观孔林、孔庙，孔子后裔衍圣公孔德成和他们见了面。孔德成将孔府珍藏的青铜器取出，请邱震生鉴赏。由于邱震生健谈，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交接的朋友较多，虹光阁的生意一直不错。

虹光阁的经理人杜华亭从1923年到1944年的21年中，基本上是当了甩手掌柜的，他依靠伙计和徒弟的才干给他做买卖；依靠东家财势，招徕顾客；他本人善于筹措。邱震生出号

后，由杜华亭的儿子杜少亭经营，生意日渐平淡，这是因为1944年后，古玩行业处于衰退时期，战争频繁，民生凋敝；而杜少亭本人又不善于经营。1956年前，虹光阁只能维持门面，后参加合营。今天，在琉璃厂还保留着虹光阁这个字号，仍以经营字画为主。

宝古斋的匾和苏东坡真迹

而今琉璃厂东街中间路北挂着一块金字大匾：宝古斋。有人跟笔者讲：“西琉璃厂的荣宝斋，东琉璃厂的宝古斋，都是经营字画、吸引国内外顾客的老字号。”笔者说：“荣宝斋属南纸行业，经营南纸和近代名人字画，宝古斋是古玩行业，经营文玩、古代名人字画。宝古斋比荣宝斋年头浅，知名度没荣宝斋高。”

1987年，《北京日报》登载一篇文章，题目是《琉璃厂元老邱震生》，内容有邱震生从天津劝业场买了件明成化青花杯，赚了大钱，开起了宝古斋。这一年的冬季，笔者见到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程长新，刚见面程先生便问：“怎么一件成化青花杯子，就开家古玩铺？！”笔者说：“师兄！您这句话，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程先生说：“报上登宝古斋是用一件成化青花杯子赚的钱开的。我以为是‘邱大炮’放炮，你写稿子，登在报上的。”笔者说：“您想错了，我没写过这样的稿子，也没注意报上登这篇文章。”

1988年春节，笔者给邱震生去“拜年”，谈起了宝古斋。邱老先生说：“宝古斋1944年开张营业，是十人集资开的买卖。集资人：张叔诚、杨缉成、陈景_真、王绍贤（盐业银行副理）、赵紫震、魏仲衡、陶北溟、黄叔伟、李青苹和我，集资伪联合币20万元，经理人是。”

宝古斋开张前几个月，邱震生去天津，在劝业场里有家古玩铺，请邱看货。这家古玩铺论堆卖货。有一堆货是一块古墨、一块寿山石印章和一件青花小杯子，要价 150 元，邱震生给 100 元钱便买到手。卖主不识货，将成化青花杯论堆撮出去了！邱震生“拣了漏”。

成化青花杯造型玲珑精巧，十分喜人，青花色调柔和淡雅而又透澈。经孙瀛洲鉴定，买主愿出 1.2 万元，邱震生没卖。又经崔耀庭从中斡旋，卖给了范岐周，1.4 万元。日伪时期的联合币不值钱。宝古斋开张时，用这笔钱办酒席请了几桌客，不是用这笔钱开宝古斋。邱震生说：“我跟来访记者是这么说的，他写错了，不是我胡放炮！”

宝古斋的匾额是翁同龢书写。翁同龢是咸丰时的状元，1904 年他就去世了，在他去世 40 年后的 1944 年，怎么又写出这块匾呢？原来这块匾写的是赏古斋。赏古斋是由顺义县高丽营人张舜清于光绪初年（1875）创办的，请当代皇上的老师翁状元写的匾。1902 年，赏古斋由衡水县人刘竹溪经营；1928 年由刘少溪经营；1943 年，赏古斋关张。邱震生便看上了这块匾。他请陶北溟将“赏”字的上半部“尚”改写为“𠂔”，下半部的“贝”字仍用原来翁同龢写的。这样合成一个“宝”字。陶北溟是位书法家，将“𠂔”字与翁同龢的“贝”字，写得浑然一体，谁也看不出两字相隔 69 年（翁同龢写于 1875 年，陶北溟写于 1944 年）。

早年琉璃厂店铺之匾额，皆出于名家之手笔，字体不一，琳琅壮观，文人学者逛琉璃厂，先浏览名家匾额。而今，名家遗墨湮没，墨痕亦不复为人所能忆及，谁又能想起，琉璃厂有何绍基、曾国藩、祁閭藻、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写的匾？宝古斋这块匾算是保留下来的状元遗墨，至今已有 115 年矣，亦属一件有价值的文物。

宝古斋以经营字画为主，瓷、铜、玉器、石章也都经营，开张时处于古玩行业生意萧条时期。邱震生善于经营，做了几项好生意。一幅苏东坡的“真迹”手卷，曾轰动国内外。

1945年，马霁川、靳伯声、郝葆初、李欣木等人从东北沈阳、长春买了一批宋元名画。李欣木同崇庆瑞合伙买了一幅苏东坡“真迹”手卷。北宋苏轼（1037—1101），号东坡居士，是文学家、书画家，作画主张“神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法擅长行书、楷书，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这幅真迹手卷，上有乾隆皇帝御题御览，名家题识，乃宫内收藏的传世珍品。李欣木、崇庆瑞如获至宝。

李欣木、崇庆瑞鉴定古砚、印章和瓷器颇有功底，鉴赏字画只知皮毛，不解奥秘，珍品到手，心里没底，便请笔彩斋第三代门生徐震伯给鉴定。

徐震伯打开画卷，仔细观赏，看画、看字、看印迹、看绢纸，平看、悬看，边看边琢磨，半小时只看不说话。李欣木问：“震伯！你看怎么样，这是宫里的东西呀！”徐震伯回过头来用眼望了望崇庆瑞、李欣木，叹了一口气说：“不要认为宫里的东西都可靠，我看是件赝品。苏东坡是位书法家，他作画是写画，这幅‘真迹’笔法不对，似乎是错的。”

崇庆瑞、李欣木又请邱震生看。邱震生听说他们是从东北弄来的、溥仪丢失的传世珍品，“先入为主”，未加仔细看、琢磨，便认为是真东西。李欣木、崇庆瑞便将这幅“真迹”卖给了他，黄金60两。

邱震生与徐震伯都是笔彩斋的第三代门生，他们是一门人，彼此都有关照。徐震伯找邱震生要看这幅“真迹”，打开手卷，二人共同琢磨，进行审定。审定结论是，原字是东坡真笔，已被揭走。这幅字是原字的第二层，真迹揭走后，照二层绢纸上的印迹描绘的。邱震生出了一身冷汗，叹了口气，将手

卷收藏起来，不再让它见市面，从此也不再提这件事。

11年后，宝古斋参加公私合营，邱震生想来想去，最后向公方代表讲了这幅“真迹”的实情。公私合营的高潮中，1956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徐迟的长篇特写《真迹》，表彰了邱震生，并认为这幅手卷仍有其价值。这时，宝古斋的苏东坡“真迹”手卷，才见于世人，在同行业人士中引起轰动。

回忆中的名画

邱震生在生前回忆三家老古玩铺收藏的名画有：

永宝斋鉴定、收藏的一幅宋元绢画美人图。这幅画，工整细腻，眉眼衣褶，逼真生人。当年老掌柜的崔偕平，在光绪年间跟买主要价是300两银子。有位翰林说：“你这幅画的价钱比买一个婢女还贵！”始终没卖出去，1923年作为货底倒给了虹光阁。

另一幅画是仇十洲《剑阁图》。仇英，字十洲，是明代四大画家之一。这幅长1丈2尺，画面是人马履危栈而过，笔墨工整，奕奕有神。是麟见亭家中故物，麟的女婿宗伯卖给琉璃厂寄观阁。寄观阁要价800两银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永宝斋用200两银子买到手，以500两银子卖给某翰林。

致宝斋经营的明清字画中，有一幅山水画轴，是唐寅画的。唐伯虎的真迹难寻，仿制的赝品极多。这幅画是真迹，笔意高淡，上有自题长律，其腹联曰：“漫劳海内传名字，谁信妥间没酒钱。”书法潇洒出尘，真乃名士风流。邱震生在1946年见到这幅画，后不知卖给谁家。

韩敬斋收藏的范宽《雪景寒林图》、马远《夜山图》和黄公望《秋山图》，均为罕见之宋元名画。邱震生于1988年春

回忆时，仍赞叹不已！

三、金 石

金石是指古代镌刻文字、颂功、纪事的钟鼎碑碣。金，钟鼎也；石，丰碑也。古之金石器物镌勒文字、颂功、纪事、寓戒皆铭诸金石。东汉以来墓碑盛行，碑文渐多。

金石学是研究古代钟鼎彝器碑碣石刻，考辨今古文字之起源与演进的一种专门学问。老古玩界传说，梁元帝萧绎（508—554），独目好学，著述颇多，始作金石文字著录。宋代欧阳修（1007—1072）始事搜采金石著录。清乾隆年代，金石学再度兴起，咸、同、光年代大为盛兴。光绪年间，金石学兼及甲骨、简牍、封泥、瓦当等。金石学是我国考古学的前身。20世纪初，中国开始有了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

琉璃厂古玩业的发展同金石学再度兴起、乾隆年间散氏盘出土有关。道光、咸丰年间，毛公鼎、大盂鼎的出土鉴定收藏，琉璃厂博古斋、德宝斋的经理人曾直接参与；陈介祺、潘祖荫、端方等金石收藏家，金石学者同琉璃厂老古玩界交往数十年，古玩界中有的人亦可称之为金石学者、收藏家。琉璃厂尊古斋收藏青铜器、古玉、古陶、瓦当、秦砖汉瓦、封泥、简牍等文物最丰，经理黄伯川著录考古书籍 112 卷。鉴定经营金石的古董商中，识金文，辨铜质和锈色，懂造型和花纹者颇多，在旧时代均被埋没。博古斋祝锡之，德宝斋李诚甫、刘振卿，式古斋孙秋^飘，晋雅斋康竹亭，民国以来的岳彬、丁兆凯、倪云书、陈鉴堂、乔友声、黄镜涵，以及解放后 1986 年被选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担任常委的傅大卣、程长新等，均为国内外知名人物。

尊古斋的传说

尊古斋和通古斋是黄氏家族三代人在琉璃厂经营金石 60 年的著名古玩铺。三代人中黄伯川是位承前启后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较多。笔者幼年见过黄伯川，他身材高大魁梧，四方大脸，蓄有长髯，说话声音宏亮，很有气魄。

清朝每逢子午卯酉年开科举试，光绪二年（1876）湖北云梦举子黄兴甫进京赶考，揭榜时名落孙山，不肯回乡，便在琉璃厂附近的安澜营开私塾馆，教一些古董商的子弟读书习字。他因此同古董商有了来往，闲暇时常到古玩铺里观赏字画古董。字画中的诗文，铜器上的铭文，有的古董商看不懂或不解其义，便请教黄老师。黄兴甫讲述诗文，令人信服；但铜器上的铭文，他不认识，只是从篆字的变形上猜测，而不够准确。

时间长了，黄兴甫所见的古董多了，能鉴别一般文物的真伪，并对铜器的造型、纹饰、铭文、锈色有所见解。他用自己的微薄积蓄，买了些古董玩赏。1895 年，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上书光绪帝时，黄兴甫未参加联名。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在琉璃厂开了尊古斋古玩铺。开张的第二年正赶上“戊戌变法”。虽然维新运动失败，他仍赞同维新主张，认为要维新，必须学外国，故而将自己的侄子黄浚（字伯川）送入京师同文馆读书。

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开办，是我国最早的洋务学堂。原只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入学，1876 年开始满、汉学生皆收，学制八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黄伯川在同文馆读书八年，成绩优秀，通晓德、英、法三国语言。毕业后，入德国奇

罗佛洋行做译员，兼在尊古斋做古董生意。

宣统二年（1910），黄伯川接替他叔父经营尊古斋。他经营金石文物注重考证研究。商周秦汉铜器的造型、花纹、锈色，特别是铭文，都引起他极大的研究兴趣。铜器上的铭文原称“钟鼎文”，又叫“金文”。1899年，我国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的殷墟发现占卜用的甲骨刻辞。1910年黄伯川将甲骨上的文字与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做过比较，发现金文同甲骨文相近，并与清廷学部参事罗振玉研讨过这一问题。

尊古斋古玩铺，同金石收藏家、鉴赏家端午桥、宝熙、画家溥心畲等清室王公贵族颇有交往。他们到尊古斋鉴赏、买些商周青铜器；当他们需用钱时，也将他们玩腻了的青铜器交给尊古斋代为出售。

民国初年，宝熙曾将一尊提梁卣送到尊古斋寄卖。提梁卣是我国商代和西周初期盛行的青铜酒器，亦称礼器。宝熙的这尊提梁卣是西周初期的，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提梁的两端有兽头，口的下端有花纹，盖的里端有金文四个字，字体齐整。其造型端庄，花纹清晰，卣的色泽是纯青翠色，莹润如玉。专家们鉴定，这尊提梁卣出土于帝王之陵墓，不然，不会有这样好的色泽。因为帝王的陵墓建造坚固，不会进水，器皿多放在石几上，不受土侵，在地下埋藏了两三千年，才会出现这种锈色。这件提梁卣，堪称国宝。

罗振玉是宝熙的部下，清末时，宝熙任学部侍郎（即今之教育部长），罗振玉做过学部参事。宝熙和罗振玉都经常到琉璃厂尊古斋、式古斋等古玩铺鉴赏古董。黄伯川同罗振玉研讨过甲骨文与金文。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逃往日本，在日本考古写书；1919年回国，住天津，后在大连开设一家古玩店，字号墨缘堂。1919年至1924年，罗振玉去琉璃厂的次数多。罗振玉曾将溥仪让他鉴定的青铜器珍器的拓片和黄伯川

收藏青铜器、白陶片等考古实物的拓片相交换。

老古董商中不少人说，黄伯川聪颖过人，胆大心细。在清末民初，他敢买太监拿来的东西。那时，太监的东西往往是从宫里和王府里拿出来的，买了他们的东西，容易吃官司，钱好赚官司打不起。黄伯川不怕。1925年冬季的一天，有位操陕西口音的人来到尊古斋，拿出两件青铜器：权和衡（秤锤、秤杆）。经黄伯川鉴定，认为是两件很有考古价值的文物。因为他知道，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有重要作用。然而，在出土青铜器中，尚未见到秦汉的权和衡。这两件青铜器上，每件都刻有“始建国”三个字。经他考证，始建国是王莽建立“新”王朝时的年号。王莽是公元8年时称帝，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这两件青铜器距今已有一千九百余年，保存完好，实属难得之珍品。黄伯川出数千元将它们买下。

一天，考古学家马衡来到尊古斋，黄伯川将王莽时代的权、衡给他看。马衡说：“我的名字叫衡，但还没见过秦汉时代的权、衡。既然是王莽时代的权、衡，就叫莽权、莽衡吧！”不久，马衡当了故宫博物院院长，他看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失盗王莽时代权、衡的文件。

马衡派人将尊古斋的权、衡没收、充公，送到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莽权、莽衡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当时，黄伯川不好直接与马衡面谈这件事，他拜托商务印书馆经理孙伯衡找马衡，要求给他收购的本钱。孙伯衡是马衡和黄伯川的好朋友，他从中调和，给了黄伯川的收购本钱，这件事就私了了。黄伯川对这件事从不外露，当老朋友问他莽权、莽衡的事时，他总是说，我送给马衡了，因为他的名字叫衡，马衡将它们收藏在故宫。

黄伯川热爱文物，特别是对金石、古玉爱好成癖。他在同

行中声言：“我黄伯川不搞破坏，破坏古物是土匪，凡是我卖出去的好东西都留底样，留给后人研究参考，不能把祖宗留下的东西都卖给外国人。”尊古斋收藏的金石、古印、古玉、陶片等珍贵文物，黄伯川都用纸把它拓下来或者照相，编辑成册，保存起来。

拓拓片是一门手艺。这门手艺，是在刻或铸有文字、花纹图案的石、玉、铜、陶等器皿上，蒙上层绵纸，捶打，使之凹凸分明；再稍上墨，使之显出文字、花纹图案来。手艺好，就能拓出文字、花纹图案清晰、墨迹均匀，不走样的好拓片。尊古斋有位谭师傅专门拓拓片，他的手艺好，深受黄伯川的器重。

谭师傅有位本家弟兄在孙殿英部下当师长。1928年东陵盗案件发生后，他到尊古斋找谭师傅。谭师傅把他介绍给黄伯川，他们之间做了一项秘密交易。谭师长拿来些珠宝钻翠。具体都是些什么，传说甚多，有的说：“珍珠、翡翠、钻石，成簸箕地端，”有的讲：“茶盘中放着核桃大的珍珠”，还有的说：“西太后那双珍珠鞋，也是其中的一件……”但究竟是些什么，至今仍然是些传闻，无从查考。

能够知道的是，黄伯川只研究金石文物，不懂珠宝翠钻。有人讲：“黄伯川找了懂珠宝翠钻的王月波。王月波是他多年的好朋友，在琉璃厂开设怡宝斋珠宝玉器店。二人商量合伙做这项生意，经他们俩人的手，将这批珠宝钻翠卖给了义文斋珠宝玉器店。”

孙殿英盗东陵墓的消息很快传出去，北平各报馆争相刊登。盗陵事件引起了住在天津的溥仪和平津各地的清室遗老遗少们的悲愤。他们在溥仪居住的张园，摆设灵堂，供上乾隆、慈禧的灵位，行礼叩拜，痛哭流涕，像办丧事一样进行祭奠，并通电蒋介石要求严办此案。那时的平津卫戍司令是阎锡山，

蒋介石下令阎锡山查办了盗陵案。孙殿英根本不出面，派了一位师长到北平，让阎锡山给扣留了，不久又放了，却把买他们脏物的义文斋的经理、怡宝斋的王月波和尊古斋的黄伯川投入陆军监狱。

1930年，由商震接任河北省主席。黄伯川的挚友孙伯衡等人向商震申述情况，求其释放。不久，黄伯川、王月波和义文斋的经理都被释放了。

黄伯川出监不久，将尊古斋关闭，由西琉璃厂搬到东琉璃厂，在一家最大的旧书铺宝铭堂旧址，开设通古斋古玩铺。通古斋有九间门面，院里有一百多间房子，后院有花园，大院后门通琉璃厂双鱼胡同，比原来的尊古斋宽大得多，阔气得多。可是，黄伯川不直接经营通古斋，而让他的徒弟乔振兴（字友声）当经理。这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的前夕，罗振玉鼓吹借日本势力复辟清王朝。溥仪在天津与日本人来往。黄伯川怕溥仪借日本势力返回北平，追查盗陵案，再把他牵连进去。所以他关了尊古斋，开通古斋，让乔友声当经理，让他的儿子黄金鉴（字镜涵）在通古斋管账。1945年通古斋由黄镜涵经营，直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

黄伯川同我国著名考古学者郭沫若、马衡、罗振玉都有交往，他曾为一些专家学者提供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金文资料和河南安阳出土的白陶片和龟甲兽骨。他自己编撰的著作有：《尊古斋古彝集林》、《衡斋藏印》、《衡斋金石识小录》、《邨中片羽》、《衡斋吉金识小录》、《衡斋藏见古玉图》、《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尊古斋陶佛留真》、《古玉图录》、《尊古斋集印》，共计112卷。这些著作已遗散多年。1987年，笔者见到美籍华人、考古学家李汝宽先生，他向笔者询问：黄伯川的《邨中片羽》一书，能否找到。1988年，笔者见到黄伯川的孙女黄文华女士谈及此事，她说：“早已失散，家里一本也没有

了！”

黄伯川不单是位古董商，他还是位研究商周秦汉青铜器的专家，考证金文、甲骨文的学者，在琉璃厂古玩行业中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财富在琉璃厂也是独一无二的，人称“黄百万”。但他创造的最大财富是为中国培养了鉴定金石的人才和遗留下的现已失散了的 112 卷考古书籍，可惜的是至今无人收集、整理这些书籍。

他的徒弟乔友声鉴定金石较有名声，在琉璃厂他是识金文最多的一位。50 年代初，故宫博物院从乡间将乔友声请出，让他担任青铜器鉴定工作。他的儿子黄镜涵曾在师范大学文学系就读，未毕业就到通古斋管账，学习鉴定金石。经二十多年的学习与研究，他对我国商周秦汉青铜器、石器、玉件的造型、纹饰，有个人的见解，是位青铜器鉴定家，也是位金文考证家。50 年代初，郭沫若曾访问过他，同他探讨金石文字，观看黄伯川编撰的考古书籍。1956 年后，他被历史博物馆聘为顾问。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黄镜涵先后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商、周青铜器，玉器、陶片、汉代铜印等 106 件，1986 年，故宫博物院才补发给他的后代人《故宫博物院收到捐赠文物凭证》。

黄氏三代经营尊古斋、通古斋，长达 60 年。三代人共同的特点是，注重于文物的研究，不单单为了发财，但却积累了比别人更多的财富。

式古斋经营西周礼器和昌化十二石

式古斋古玩铺是 1903 年开设的，创办人孙桂_激，字秋_颿，河北衡水县人。提起孙秋_颿，老古董商都赞叹不已，称他为“鉴定金石的前辈”。

孙秋瓢是茹古斋经理孙虞臣的侄子，幼年读诗文，练习书法，学作八股文章。光绪初年来京浮住在琉璃厂博古斋，准备在京师继续求学，参加顺天乡试，取得功名，光宗耀祖。那时，孙虞臣是经理人，博古斋另有东家，孙秋瓢浮住，不免听到一些闲言碎语，“这小子，不是少东家，也不是少掌柜的，在这儿吃什么闲饭！”孙秋瓢想，大丈夫不吃嗟来食，岂肯寄人篱下。他恳求叔父给他找个事做。他叔父规劝他还是读书求功名，他说：“有事做我还可‘负薪’、‘挂角’，等乡试时我去考。”叔叔一听，“我这侄儿出语不凡，有志气，”就让他到清秘阁学徒。

清秘阁创建于乾隆年间，在同治、光绪年代，是京师最大的南纸店，经营文房四宝，文玩书画。清廷各大衙门都用它的纸张、办公用品；官员、文人、书画家离不开它生产的印色。清秘阁的印色里有朱砂，配方绝密，配制出的印泥要经日晒几个月才出售。用它的印色，印迹经久不变色，长期保持印红。清秘阁三个字很有来历：秘阁，乃是我国自汉人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宫中收藏珍贵图书、古画墨迹之处。清秘阁，乃清朝秘阁之意。清廷默许在宫外的琉璃厂私人开设清秘阁，并由阿克敦布书写匾额。这块匾额是琉璃厂最著名的书法古迹。《春明古迹小识·卷四》中记载：“清秘阁为阿克敦布所写，神气十足，结构精密，似脱胎于九成宫，然运笔潇洒过之。”清末文人学者推重清秘阁之匾额，运笔潇洒超过欧阳晚年得意之作。

孙秋瓢在清秘阁学徒，受到经理人的青睐。他仪表非凡，眉清目秀，隆准洁齿，举止文雅，有书卷气，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掌柜的器重他，让他跑衙门，同官府交往。几年后，他收了求“功名利禄”之心，想在古董文物上求发展。

在商业交往中，孙秋瓢经常去国子监。国子监是清廷教育机构，文人学士多，使用纸笔墨砚和印泥也多，有的官员喜爱

金石、文玩、书画，是清秘阁的好主顾。日久天长，孙秋^颉同国子监的监丞、博士、学正等官员熟悉了。国子监祭酒（国子监长官称祭酒）王懿荣是位金石学者、收藏鉴赏家，对金石、书画很有研究，并能辨识金文、大篆，是最早发现甲骨文的一位学者。孙秋^颉也懂金石篆刻和文玩书画，爱到国子监王懿荣祭酒的赏识。光绪二十四年（1898），经王懿荣介绍，孙秋^颉拜见端方。

端方，字香，号午桥，满族正白旗人。他精于金石学，收藏甚丰，著有《香斋吉金录》和《藏石记》。孙秋^颉因略识铭文，读过《书经》、《左传》，懂夏商周的历史，鉴定金石在琉璃厂较为知名，所以他虽是位商人，端方却不轻视他。他们相识后，一起鉴赏金石，识别金文、篆书，相谈融洽，逐渐成为好友。光绪二十五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卧病，端方告知孙秋^颉，孙秋^颉去拜见王懿荣。王懿荣将一种药物“龙骨”给他看，“龙骨”上有类似铜器上铭文的文字。王问他是否认识这样的篆字，他说不识。孙秋^颉问王“龙骨”出于何处，他说是药铺里卖的一味药。王懿荣从药铺里收集了数千片“龙骨”，未及研究就去世了。孙秋^颉将此事告知端方。端方在光绪二十六年，受宠于西太后，当了湖北巡抚、湖广总督，忙于政务，无暇顾及“龙骨”的研究，他告诉孙秋^颉：“我将远离京城，请照顾我在京的眷属，并代我收集商周铜器。”

光绪二十九年，孙秋^颉独资开设式古斋古玩铺，专门鉴定经营金石。宝熙（学部侍郎）、罗振玉等人经常到式古斋鉴赏青铜器。同治举人、经学家、文字学家孙诒让，是清秘阁的老主顾，同孙秋^颉相识。孙秋^颉开了古玩铺后去拜访孙诒让，得知他在研究“龙骨”，撰写过《契文举例》，考释“龙骨”上的文字。这时，孙秋^颉才知道龙骨是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但他的注意力是在为端方收集青铜器，只打听殷墟铜器

出土情况，而对“龙骨”上的文字没有研究兴趣。罗振玉则十分注意搜集研究，写出《殷墟书契》，成为我国著名的甲骨文学者。

光绪二十七年（1901），陕西宝鸡出土了一批青铜器。这批铜器被孙秋^颉于光绪三十年后收购到，卖给端方。这件事在古玩行中传说多年，说法不一。

陕西宝鸡于1901年出土的这批青铜器是酒器，也可称之为礼器。现存有一幅照片。照片上有件铜质垫衬，呈长方形，无腿，平面。从照片中看，“中高”有3条开缝，似是中空，粗平花纹4组。上置器物共11件：前排有爵、□、□、角；中排有4件^觶；后排是大提梁卣、觚、小提梁卣（下似有一方座）。后排的觚中插有带花纹、不明其象之器物7件。这幅照片现保留在开封古玩世家蔺半农先生手中，乃是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展出实物的照片。

铜质垫衬方形物是什么呢？老古董商说：“光绪三十年，孙秋^颉卖了件铜桌，特别奇特。之后以讹传讹，都叫它铜桌。美国人则翻译为“祭坛”，而中国古籍中称“禁”或“俎”。

禁，祭祀时承放酒樽的礼器，形如方案。孙颖达疏：“禁长四尺，宽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

俎，古代祭祀或宴会时盛放牲体的礼器。《说文·且部》云：“俎，礼俎也。”唐玄应在《一切经音义·卷五》云：“俎亦四脚小^俎也。”

这件铜质方形器物，上置酒器，称之为“禁”较为恰当，称之为“桌”不符历史实际。

孙秋^颉将这12件西周青铜器卖给两江总督端方，获利颇巨，但未透露出具体数额。传说光绪三十一年，端方与载泽等人出国考察政治。归国后，孙秋^颉将这批新出土的铜器卖给端方的。端方非常高兴，从此他们之间的交情越来越深。宣统元

年，端方任直隶总督任期较短，被摄政王载灃罢免，在家闲居近两年，经常与孙秋^颿往来，鉴赏金石，结为“金兰”之好。宣统三年（1911），摄政王起用端方为川汉铁路大臣，率军入川，行至四川资中县境内被起义新军杀死。端方死后不久，清廷倒台，民国成立，端府的经济开支日渐不足。他生前所收藏的金石文物，除送银行抵押外，不少珍品由式古斋代为出售。

民国初年，琉璃厂古玩行人就传出：“孙秋^颿在花旗银行存款50万现大洋！”是否确实，无从考证。孙秋^颿在清末民初的十多年中，是北京古玩行业中的佼佼者，他曾担任古玩商会会长。1921年后，他经常住在老家衡水县的乡间，把式古斋交给他的徒弟杨福旺经营看管，他自己过着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有时进京看看，只要徒弟们为他守好这个摊子，就心满意足了。1931年，孙秋^颿老死在家乡。

孙秋^颿死后的第二年，即1932年，崇彝在《说印》中记载：“壬申之冬，在厂肆式古斋，见昌化十二石，亦可称中华文物之菁英，天壤之尤物也。”十二石“为晋人某富室所藏”。清末，式古斋孙秋^颿、大观斋赵佩斋、青山居李五巴和孙四等人，曾多次去晋中收购金石、文玩书画。孙秋^颿从何入手收购到昌化十二石，尚未查实。但他从山西收购后卖给端方，端方去世后又由式古斋收藏则是事实。

式古斋收藏的昌化十二石，据崇彝《说印》中记载：“石作四副：皆两方章，一引首章。分大小4级：甲级高3寸余，两方章作馒首圆顶，引首长方式，质微黄，红色虽鲜，只半截，下方无红，计重25两。乙级高3寸，方章亦作馒首圆顶，引首腰圆式，质微青，其红色鲜而满，尤以引首为最，计重24两。丙级高亦3寸许，但周围小于乙级者，两方印皆方顶，引首刻扁方式，质作荞麦色，红色既艳而满，重21两。丁级高则2寸，两方印亦平顶，引首扁方式，此副则藕粉地，其质

最美，红微淡，色尚匀满，重 12 两。”共计 82 两的 12 块昌化石印章，卖给何人，尚未找到知底细的人。古玩行的老人都知道，孙秋^颢要求他的徒弟老老实实，看摊守业，不教他们鉴定、经营古玩的真本领。所以在他死后，式古斋没出鉴定人才，营业日渐衰落。1940 年杨福旺到上海花了上万元，买了一件商代的虎头彝，带回北京，经专家鉴定，乃是苏州的仿制品。从此式古斋一蹶不振，以至后来完全倒闭。

赵鹤舫“牵走”拳毛^驹和飒露紫

赵鹤舫是延古斋的创办人，他名叫福龄，光绪七年（1881）出生在北京广安门外一位菜农的家里。父亲种菜卖菜养活全家六口人，天不亮不是下地种菜就是进城卖菜。他积攒点钱，供福龄上学念书，盼子成龙，改变门风，希望福龄长大在官面上做点事，别再种菜卖菜。

光绪二十二年（1896）秋季，广安门外遭一场雹灾，菜园子里的大白菜全毁了，菜农没辙了。赵福龄的爸爸无奈，便叫他到城里去学徒。他父亲卖菜经常到琉璃厂，认识寄观斋古玩铺掌柜的计文卿，请掌柜的收下他的孩子，让他在其柜上学徒。计文卿说：“先试试，让他来干些日子看看。”

赵鹤舫来到寄观阁才 15 岁。掌柜的一看，这小子长得挺俊，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招人喜爱，就把他收下当徒弟了。这个徒弟比他师兄能干，嘴会说、字儿写得好。学了两年徒，就管账。计文卿很器重他，跟他讲了一些往事，告诉他学古玩行可不容易，有眼力还要有学问，不然，买东西受骗，卖东西被人家“拣漏”。他还讲了光绪十五年自己被买主蒙骗的一件事：

那年，寄观阁从山西买了一幅《王羲之临诸葛亮远涉

帖》。《晋王羲之临诸葛亮帖》宣和瘦金书绫鉴。帖中文曰：“师徒远涉，道路维艰，自及褒斜，幸闻无恙，使□，记此，不复云云。亮顿首。”翁方纲题识：“此帖仅见于元人破临安所得宋故宫书画目，孙退谷云，曾见于大名魏氏家，然亦未详其前后题跋印记也。此卷中州汪君以赠仲节，持来京师重观，去余前在粤东借观题句时，二十有一年矣。乾隆辛亥秋八月，北平翁方纳识于石墨书楼。”还有程正辅书和朱友仁跋，书和跋的字迹工整，朱友仁写道：“夫字有古今，心无古今，古人之字极精妙出于天然者，由心手相应，得之笔先，有非智力所及，令人不见古人之妙，乃谓古人作书，信手模写，夫岂知古人者哉！余观此作，晋唐人学古书者，意趣潇洒，如芙蓉沿岸，自有一种清味，令人爱之重之，不容置；其得古人之心于异世之下，幸以笃人之所能学古人者。吴兴朱友仁跋。”这幅帖还盖有十几颗印迹。

一位鉴赏家、收藏家看中了这幅帖，嘴上却不说，摇头晃脑地讲：“非王右军之作也，是后人仿的。朱友仁的跋里已经点出，‘余观此作，晋唐人学古书者’，是晋唐人仿的，不值什么钱。”这位老先生这么一胡诌乱评，把我弄糊涂了。我恳求他将这幅帖收下，说了半天他才给我 20 两银子。王羲之的字是一字千金，共有 27 个字，你说值多少钱？是件无价之宝！事后，琉璃厂传出，××收藏家得瑰宝，寄观阁的人没长眼，被人拣了漏。事儿过去十来年，我忘不了。你要记住，吃这碗饭不容易，要有眼力、有学问。

计文卿的一段回忆，赵鹤舫得益匪浅。从此他用心观赏古铜、瓷器、书画等文物，对浮雕、木刻、金石也特别感兴趣。他不懂就问，见什么人就说什么话，从同收藏家、鉴定家谈话中，学到不少鉴赏文物的知识。光绪末年他到上海，那时，他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人长得体面，举止文雅，有文人书生

之风度。他被某翰林的姨太太看中，随同翰林迁居上海，姨太太给了他些钱，在上海开设延古斋的古玩铺，因经营得力，赚了些钱。呆了不到五年，赵鹤舫回到北京，自己独资在琉璃厂火神庙右侧开设了延古斋古玩铺。这一年是1912年。1917年时，延古斋由琉璃厂路北的几间屋子搬到路南的100间房子里，赵鹤舫成了富商。他在城里买了不少房产，古玩铺里进了很多货，一百来间房都摆满了。儿子发财了，就想到老子，他把他爸爸请到城里来往，但老人家一辈子劳动惯了，城里闲，住不了，又回广安门外乡下老家种菜去了。

延古斋在琉璃厂开了才几年，就发了大财。赵鹤舫不再直接经营，请来他的表弟陈养泉当延古斋的经理。他自己则有厨子、老妈子和包月车侍候着，悠然自得享受着人间的乐趣。

赵鹤舫善于交际。在上海，他经常出入于官宦府第，在官面上有熟人。有钱人家的小姐太太都喜欢他，别人拿去的東西，太太小姐们看不上眼，他拿去的東西，准能多给钱。在上海赚了，在北京开买卖，也结交了民国的官僚、北洋政界人士，还有议会的议员、总长、次长等一些大人物。延古斋在北京一开张，买卖就不错。

那时，正是新旧交替之际，古玩铺的买卖，家家都不错。但为什么延古斋能发那么大财呢？准有“窃货”！买卖“窃货”，秘密交易较多，不往外泄露。可这“窃货”究竟又是什么呢？

有人说，陕西来的客人，牵着“两匹骏马”，卖给延古斋；延古斋又卖给洋人，发了“洋财”！也有人讲：“马是赵鹤舫自己牵来的。”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赵鹤舫早就想把“昭陵六骏”弄到手。“昭陵六骏”是指六块骏马浮雕，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之集大成者。六匹骏马神态各异，雄劲有力，每一笔凿迹刀痕都有动人的艺术魅力。赵鹤舫垂涎已久，但一

直没有机会，不得下手。1915年，袁世凯想做皇上。赵鹤认识了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袁二少爷有战国时期孟尝之遗风，广为交游，“鸡鸣狗盗之徒”都可与之交友，何况是略有文采、仪表非凡的古董商赵鹤舫。有人说，赵鹤舫同袁克文拜过把兄弟，是否事实，有待考证。但他借袁克文之手，取得袁府运送物品的专用封条，可能属实。袁克文不拘小节，不可能问他用封条运什么。1912年，有了这种封条贴在运送物的包装箱上，所有关卡放行，一路畅通无阻。

赵鹤舫获得封条如得“圣旨”，到陕西声称大总统要建“袁家花园”，用“昭陵六骏”浮雕点缀点缀。六块浮雕都拿走，恐怕不好办，他从中选了两块：拳毛騧和飒露紫。结果一切顺利，畅通无阻地运来北京，转手将其卖给美国博物馆。现在这两块浮雕陈放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

1986年8月16日和23日，台湾在美国出版的《美洲时报周刊》，连续两期登载李利国、林清云、刘黎儿、李柏亨四位先生写的《流落海外的中华国宝》一文，其中曾写道：“昭陵六骏飞扬神采，每一笔刀痕凿迹，都是动人的艺术成就，都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我呆想着这两件国宝，是怎样被运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大陆的？”我的调查可解开诸位先生的疑问了：昭陵六骏中的拳毛騧和飒露紫二骏，是早在1914年，就由琉璃厂延古斋运往美国宾州费城了。

1915年以后，延古斋突然变为琉璃厂街上最富有的一家古玩店，做起大号生意，经营河南、陕西等地新出土文物，有金石、银器、浮雕、造像、冥器等等。陈养泉从民国五年接替赵鹤舫经营延古斋，赵是东家，他是掌柜的。陈养泉，名利昌，原在集雅斋古玩铺学徒，由于店铺小，见的东西不多。来到延古斋，他借赵鹤舫的财力，财大气粗，敢买敢卖。经过几年，他学到了鉴定青铜器、陶器、浮雕、造像、唐代银器等文

物的本领，20 年代在琉璃厂有了名声。

有位古董商名叫宋佐贤，眼力差，历史知识少，但是腿勤，经常去外地收购文物。1923 年，他在山西侯马买了两座一丈多高的木佛像，上了税拉来延古斋。这路货，除岳彬和陈养泉外，很少有人识货，即使懂的人也免不了有忌讳：一是封建迷信忌讳买卖木佛像；二是怕出事，庙里的佛像拉这么远来卖，惟恐是偷来的。陈养泉知道宋佐贤不懂木造像，又不容易卖出，所以尽量往下压价，没花多少钱就买到手了。

这两尊木雕佛像是唐代木雕释迦牟尼像，完整无损，很有价值。史书记载，在我国商代武乙时代，造木人称之为天神，至六朝时开始造木菩萨，唐代才有木释迦牟尼之偶像。因此，它既具有历史考古价值，又有雕刻艺术价值。延古斋将两尊木雕释迦牟尼像出售，又发了笔财。

好景不长在，古玩铺发财长久不败的很少。1936 年赵鹤舫去世了；1938 年，陈养泉离开延古斋，自己在家开养源斋古玩铺。延古斋由赵鹤舫的弟弟管，他只会花钱，不懂做古董生意，虽然他曾请来内行人张月岩帮他经营延古斋，但年月不久。大约在 1940 年前后，延古斋倒闭关张了。

陶古斋的白玉佛

陶古斋是延古斋的徒弟曹旭深开的。1936 年开张到 1956 年加入公私合营，20 年的时间里主要经营金石、秦砖汉瓦、陶瓷、石雕造像，按延古斋的路数做生意。但曹旭深没他师傅赵鹤舫那样的胆量和口才。同他师傅相反，他胆小怕事，嘴笨不能说，但他生活俭朴。在日伪统治时期，他只做些小生意，不敢做大号买卖。

陶古斋一间小门脸儿，进屋堆满了货，都是些零七八碎的

便宜东西，没有像样的珍品。传说在 1940 年，曹旭深从外地买到一件宋瓷，是件汝窑盘子，口径 12 厘米左右，香灰色的胎，天青淡色釉，还有 3 个支钉印迹，算是件珍品。他将宋汝窑盘卖给日本人，两千多块钱是陶古斋开张以来的惟一大号生意。

论鉴定本事，曹旭深懂的东西不少，譬如秦砖、汉瓦，懂的人不多，但曹旭深能说出一套道理来。一般人认为，秦砖，就是秦始皇时垒墙盖房用的砖；汉瓦，就是汉朝是房上的瓦，因为它们年头久远就值钱。曹旭深讲，秦砖不是长城上的砖，也不是盖房用的砖，而是圻砖。圻砖是什么？就是墓里砌的砖。古代帝王将相的陵墓里砌的砖，上面有花纹、图画，还有文字，这种砖才值钱，有考古价值。汉瓦是指头瓦，也叫瓦当，就是古代宫殿建筑滴水瓦的瓦头，有圆形或半圆形的，上刻有图案、文字。文字多是一些吉祥的话，如长乐未央、延年益寿、千秋百岁、长生无极等等。秦砖、汉瓦上的字，书写雕刻得十分精致，书法家、雕刻家、考古学者都喜爱这种字。

曹旭深还懂古代石雕、造像。金石鉴定界多数人为，石造像盛行于我国北魏时代，唐宋时期石造像稀少；也有人认为，在宋代根本没有石造像。曹旭深在 1943 年花一千多元联合币买到一尊白玉石造像——观世音像，带紫檀佛龕。他鉴定为西夏时代的造像。西夏是 1038 年至 1227 年由与宋、辽、金对峙的党项羌人建立的封建政权。白玉石佛说明我国宋代在宁夏银川一带，党项羌人已雕造出艺术价值较高的观世音像，是有一定的考古价值的。1948 年曾有人愿以 3 000 元的价值钱收购他这尊白玉石佛，他不肯出手，一直收藏到 1956 年公私合营时归公。

公私合营后，曹旭深被分配在北京首饰公司看管库房。事也凑巧，在他看管的库房的院子里，放着一尊白玉石佛，佛龕

不知去向，任凭风吹雨淋，无人过问。他仔细一看，正是他原来合营时交公的那尊西夏白玉佛。他伤心极了，几夜没睡好觉。他想自己再花钱买下来，别让它抛在库房的院里。在1957年反右派的交心会上，他把他的这些心里话说出来了，引起了领导人的重视。可是他本人从此对文物的价值失去信心，对文物的未来失望而伤心！

郝葆初同罗振玉做生意

海王村公园里有家古玩铺，字号叫博闻鋐。鋐（yí），楼阁边相连的小屋称之为鋐。屋子小却广见博闻，这个字号起得多么好！后来这家小古玩铺搬到琉璃厂街上，成了大古玩铺。

博闻鋐于1926年开张。说是大和恒米粮店经理和一得阁墨汁铺徐掌柜合伙出资开的。一得阁的字号今天还有；大和恒早没有了，只有老北京人知道，大和恒的小米面，是穷人天天吃的口粮，南城一带的人吃窝头的多，知道大和恒的人也多。

博闻鋐的经理人是韩醒华、郝葆初。他们两人都是古光阁周希丁的徒弟。韩醒华和一得阁徐掌柜是亲戚。这家古玩铺原是小本经营，买卖些旧字画、青铜器、杂项等一般文物。后来，买卖做大了，宋元名窑和明清官窑瓷器、三代铜器、宋元名人字画都鉴定经营。在琉璃厂的古玩铺能鉴定经营青铜器、瓷器和字画三大项文物的，没有几家，博闻鋐真算是广识博闻了。

韩醒华在北京主持日常业务，郝葆初跑外。1931年以后，郝葆初经常去东北，做伪满洲国官僚、收藏家、考古学家罗振玉等人的古董生意。郝葆初做罗振玉的生意，知道他买古董有个特殊要求，就是从北京等地来到东北的古董商，拿来的古玩要先给他看，先给别人看过的古董，他就不要了。郝葆初按照

罗振玉的要求，从北京带来的古董先拿给罗振玉看，并投其所好，弄些新出土的铜器、冥器卖给他。罗振玉喜爱有铭文的青铜器，郝葆初买铜器时也注重铭文。他从彰德府买的商代青铜敦、虎头彝和爵杯都有六个字的铭文；也有没铭文的铜器，他便找人刻上几个字；还有残、碎铜器整修好的□壶、簋、提梁卣等青铜器。郝葆初将这些完整珍贵的、残破修复的、甚至是作假锈、假花纹、后刻字的铜器，给罗振玉拿去。罗振玉是位考古学者，鉴赏青铜器的眼力很强，对一些修补、作假的东西能识别出来，但如果价钱合适，他就买下来，珍品他自己留下，有问题的东西他卖别人。后来，郝葆初悟出罗振玉为什么要求拿来东西先给他看的道理，原来罗振玉也在做古董生意，如先给别人看了，他不好编造这件东西来源的谎话，同时也卖不上高价。

郝葆初同罗振玉做古董生意，学会识别不少金文，将金文运用在石刻上，提高了自己的篆刻艺术。罗振玉曾欣赏、称赞过郝葆初的篆刻。郝葆初拓铜器的原形、纹饰、铭文的技术高超，罗振玉也收购他的好拓片。

郝葆初除跑东北外，还经常去上海。他从北京带去上海的大部分是宋元和明清瓷器，在上海卖给同行或一些收藏家及官僚、富商；有时从上海收购青铜器，再带到东北去卖。

四、瓷器

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起源于东汉时期，此说为1978年召开的中国古陶瓷和窑炉学术会议，多数专家所认定的，并在浙江上虞发现东汉时期的瓷器。

而今称陶瓷，老古玩界将陶瓷分开。陶是三代以前的灰陶、白陶和唐代的三彩陶器，也叫瓦器。瓷器叫硬片，字画叫

软片，鉴定经营瓷器的叫“吃硬片的”。

我国瓷器以青瓷、白瓷和彩瓷为主要品种。老古董商一谈古瓷则顺口说出柴、汝、官、哥、定宋代五大名窑。而柴窑烧制出的瓷器，谁又没见过，只闻其名，未见其物。其实，在唐代青瓷，白瓷就发展起来了，有“南青北白”的生产局面。我国的南方上虞、余姚、宁波等地是越窑作坊、青瓷作坊集中地，而河北省内临城邢窑生产的白瓷作为地方特产向唐朝廷进贡，白瓷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名瓷。

宋代著名的瓷窑，青瓷有汝窑、官窑、龙泉窑、哥窑、钧窑、耀州窑等，白瓷有定窑，青瓷有景德镇窑，黑瓷有建窑等，都各有其特色。明代以后，江西景德镇成为瓷业中心，也是明清两代御窑厂所在地，各种釉色和彩绘瓷器不断有新的创造和发展。至于一般瓷窑，几乎遍及全国。故而我国有“瓷国”之称。

元代青花瓷器、明代永乐甜白瓷器、成化斗彩瓷器、嘉靖万历五彩瓷器均属名贵稀有之珍品了！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社会经济进入繁荣时期、瓷器的生产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是瓷器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生产的瓷器各种釉色和彩绘，争奇斗艳，色彩缤纷；釉色彩色之名称繁多，不胜枚举，而以康、雍、乾珐彩瓷器最为名贵。

琉璃厂“吃硬片”的古玩铺，在光绪二十六年，朝廷不准官窑瓷器在民间买卖，只能鉴定经营宋元瓷器和明清民窑瓷器。光绪二十七年由内务府总管文索出资，由丁济谦经营，开设延清堂，鉴定经营明清官窑瓷器。清末民初以来，景德镇瓷窑不断烧造明清官窑瓷器的仿制品，北京出现并不断烧制“后挂彩”的官窑器，因而鉴定官窑瓷器必须具备仿制和后挂彩方面的历史知识和较强的眼力。北京、上海鉴定官窑瓷器的名人不少，上海仇焱之已成为世界五大陶瓷鉴赏、收藏家之

一，北京的耿宝昌、孙会元已是闻名海内外的陶瓷鉴定家，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

经营明清官窑瓷器首户——延清堂

延清堂在琉璃厂开设 25 年，赢得很高声誉。民国以来、北京政府时期，购买上等官窑瓷器的顾客，都知道要买好瓷器，到琉璃厂延清堂。顾客的心理如同“买好绸缎到瑞蚨祥，买好药到同仁堂”一样。延清堂在琉璃厂是经营明清官窑瓷器的首户。

老古董商们讲，光绪二十六年（1900），明清官窑瓷器很少流入民间，经营御窑瓷器在清代属于违禁犯法；康熙、雍正、乾隆年代的珐琅彩瓷器（俗称古月轩），是供皇帝后妃欣赏之玩物，清廷制度规定不准将这种名贵瓷器赏赐给王公大臣。咸丰十年（1860）、光绪二十六年（1900），圆明园里和宫内文物相继大量流失；民国初年，热河行宫被盗；1921 年前后，溥仪将长年存放在内务府瓷器库里的大量官窑瓷器，抵押在盐业银行，由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将之拍卖给古董商，琉璃厂古玩铺里的经营官窑瓷器才日渐兴旺。

延清堂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清廷内务府总管文索出资 9 000 两银子开设的古玩铺。“九千两”和“延清”，有其寓意：“九”字在《说文》中解释为“阳之变也”，也有多的意思，“延清”乃延续清廷之意。

文索请丁福田《字济谦》担任延清堂的经理。丁济谦胆大心细，能言善辩，善于交际，鉴定瓷器有一定的眼力；他经商却有文人风度、士大夫习气。光绪二十年前后，丁济谦在琉璃厂提溜包做古董生意，串宅门、走大户、结交官府衙门的官员，私下买卖些官窑瓷器。

光绪二十八年，慈禧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后，见宫内丢失大量文物，下旨查抄“九城”。庆小山奏请“变抄查为收卖，以安民心”，西太后准奏。文索得知消息最早，找来丁济谦商议，在琉璃厂开家古玩铺，收购官窑瓷器。延清堂刚开张后货源不断，宫里流失的珍贵瓷器，他收买了不少。

袁世凯当总统时，热河行宫失盗，丁济谦、常惠川、韩少慈收购了些赃物。当政府将盗窃者追拿到案、索取赃物时，丁济谦在公堂声言：“我是公买公卖，将本图利，有卖的我就买，我不是偷的。失盗的责任在熊希龄，他是热河都统。”之后，花点钱也就了了。

丁济谦同原在清廷翰林院供职、后在民国任要职的熊希龄、王士珍、梁士诒等上层人物早有交往，他还是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的好朋友。他做古董生意门路宽、交际广。

延清堂开设没几年，明清官窑瓷器便陈列、收藏甚丰。明代的青花红彩、斗彩、五彩盘、碗、罐、壶，玉壶春瓶、梅瓶、高足杯、永乐甜白瓷器皿，孔雀绿瓷器和康熙豇豆红菜菔尊、柳叶尊、郎窑瓶，康、雍、乾御窑珐琅彩瓷器等稀有的传世珍宝和清宫内御用珍品，延清堂都有。至于具体实物，而今仅见陈孝威《钵庵忆语》中的记载：“硬片以延清堂最著（硬片指瓷器，软片指字画）。余在延清堂见碗一枚，表里各画葡萄一枝，朵紫而叶碧，光景常新，枝藤纠结处，蜩蜩欲动；款为大明成化年制，实系雍正朝所仿。最难得者，内外彩色花纹，不走一丝，映日光照之，不知其为两面彩画也。余所见，仅此一枚而已。延清堂又有长方式茗壶（即茶壶），陆葵生所制，漆器，中隐一马，然不适用于瀹茗（即烹茶）。”陈孝威先生所见的乃门陈列之一般文物，而延清堂所属明清官窑名贵瓷器，均在柜中收藏，非贵客挚友难得一睹。

延清堂收藏陈列之明清官窑瓷器，在琉璃厂首屈一指，一

般收藏家望之兴叹！因而招徕顾客颇多。当时正处于民国初期、新旧权贵交替之时，原来的王公贵族有的破落衰败了，变卖古董陈设，用以维持生计；新的官员、富户在京城安居又都要陈设字画、瓷器，延清堂从中媒介，以满足他们的各自需要，而生意兴隆。民国十年前后，延清堂驰名中外，国内外的收藏家、古瓷爱好者、官员学者陆续不断到此观光游览，收购明清官窑彩瓷。

丁济谦经营延清堂 23 年，给东家赢得利润数十万元，他本人所得不多。1922 年，丁济谦同一位比利时金融界人士交了朋友。这位比利时人收购了一些明清官窑瓷器，在生意交往中，他发现丁济谦善于经营，交际广，有才干，便约请丁济谦担任比利时办的华比银行北京分行经理。1924 年，丁济谦辞退延清堂经理职务，从古玩界步入了金融界，成为“买办”。

丁济谦走了，谁当延清堂的经理？东家从丁济谦的徒弟中选出了一名。丁济谦有五个徒弟：任雁亭、安溪亭、韩启宏、刘松年、恽中天。这五名徒弟，除安溪亭外，其余四名看古玩都没有眼力。可是大徒弟任雁亭善言谈，懂交际，举止文雅，有派头，而二徒弟安溪亭不爱说话，为人老实，外号“安老蔫”。很自然，东家选中了任雁亭当经理。

任雁亭当延清堂经理不到两年，“谱儿”大起来了。他买了一驾四面玻璃窗的马拉轿车，养了一匹枣红膘肥大马，雇了一位掌鞭的、一位跟车的。任雁亭一出门，便学着清廷官僚的派头儿，坐在马拉轿车上，威风不小。那个年头，北京城没几辆小汽车，有驾马拉轿车，走起来，马脖子上的串铃，掌鞭的脚下的踏铃，叮当山响，跟车的站在车座后面的踏脚板上，挺胸直立，真够威风的了！

任雁亭在城里头摆谱儿、耍威风，在乡下老家又购买砖瓦、石块和木料，准备盖所像样的四合院。东家一看，事儿不

好！赶快把开了 25 年、在国外内名声显赫的延清堂关了张！1926 年，以 10 万大洋的代价，将全部货底倒给了俞淮清。

程瑞卿巧买万历五彩大海碗

程瑞卿巧买万历五彩大海碗，是宣统二年的事。那时，谁家有了个红白喜事、娶媳妇、送葬，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胡同里，便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钱越多的人家，人群越大。

1909 年的夏天，正是三伏天儿，热得很。在骡马市大街上，来了队出殡的，有打幡、抱罐的，抬杆、打帜饰的，举着楼库人、撒纸钱的，还有吹鼓手、送葬的……缕缕行行走在骡马市大街上，直奔广安门。正巧程瑞卿从这里路过。

他看到马路边上有个卖酸梅汤的小摊，摆着一个直径约有 1 市尺 5 寸的大海碗，碗里盛着满满的酸梅汤。他仔细一看这大碗，云龙图案花纹密满，色彩艳丽，是件万历五彩大海碗，实属难得珍品。程瑞卿心想，这么好的万历五彩怎么落到这儿，我必须把它买到手。但他又不敢冒冒失失地直接买这个大碗，怕买炸了锅。他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他走进出殡的人群里，又走了出来，直奔卖酸梅汤的小摊，说声：“掌柜的！我买您这大碗酸梅汤，你看天儿多热，吹鼓手、送殡的这么多人，一人一口这碗梅汤都不够，连大碗都卖给我吧，我端去给他们喝。”摆摊的人说：“您拿去给他们喝，喝完了把碗给我拿回来。”程瑞卿一听凉了！碗买不走了。他灵机一动说：“您看这么多人，边走边喝，走远了你能放心？干脆我给您钱，连碗也卖给我算了，您辛苦一趟再买个大海碗。”摆摊人一听他说得有道理就答应他说：“好吧！你给我二两银子，多了点，可这里头有我的跑腿钱。”程瑞卿一听高兴极了，连忙说：“是贵了点，一个大海碗那值二两银子，这就么着了，大

海碗归我，您再跑趟腿去买一个。”

程瑞卿交了二两银子，捧着一大海碗酸梅汤走了。他拐个弯儿进了四川营南口里头，把酸梅汤全倒了，小心翼翼地拿着万历五彩大海碗，往北走，直奔海王村。回到瑞珍斋古玩铺，程瑞卿叫徒弟把碗刷洗干净，找来锦匣铺的人做件装璜，将万历五彩大海碗收藏起来。后来，他把碗卖了，赚了500现大洋。那个年月，500块钱能买所十来间房子的四合院。程瑞卿用这笔钱把买卖扩充一下，后来，开了清逸阁。

杨伯衡同福开森博士做古瓷生意

1912年，博韞斋开业不久，门市上来了位美国人。他名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华名福茂生。经理杨伯衡躬身问候：“福大人好！”福开森微笑着说：“你的买卖开张，我祝贺来迟，请见谅。”杨伯衡急忙答话：“不敢劳福大人驾，请多关照。”

光绪十二年（1886），福开森来华传教，居住在中国近60年，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会说中国官场上的那套客气话。他在上海办学、办报，在北京担任过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委员，是位考古学家，著有《历代著录石金目》、《历代著录画目》、《艺术综览》等书。光绪二十六年，福开森到琉璃厂收购古玩的次数多了。那时，他穿的是靴帽袍套、马蹄袖，像是位清廷官员。他喜欢别人称呼他“福大人”。琉璃厂的古董商都认识这位福大人。老古董商们说：“福开森是古玩铺的好买主，要是真东西，你要多少钱，他给你多少钱，概不还价，还给现钱，从不赊账。”

这次他到博韞斋来，穿的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布袜，像是位中国绅士。杨伯衡拿出一件郎窑瓶给他看，福开森

懂得，钧窑洗子、郎窑瓶是中国古瓷中的珍贵文物。他甚至知道，郎窑是清康熙四十五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的官窑瓷器，因郎廷极督造，故称“郎窑”。他虽懂不少有关郎窑的知识，但拿出实物，他却鉴定不了。这件郎窑瓶的造型如油锤，故称油锤瓶；色泽深艳，犹如初凝的牛血一般猩红，故称牛血红；底足内呈现透明米黄色故称米汤底。福开森拿起郎窑瓶看了片刻，问杨伯衡：“你看这是件真东西吗？”杨伯衡抬头望望福开森，低头看看郎窑瓶，手指着郎窑瓶说：“福大人！您看这东西怎么样？”

“我听你的一句话，你说是真的，我就要了。”

“我看是真东西，才给福大人看，您说相信我的眼力？”

“相信！相信！”福开森不还价、不缓口，杨伯衡要2 000元，他给2 000元，将郎窑拿走了。

一个月后，福开森派人到博韞斋，请杨伯衡到他家来一趟。福开森见到杨伯衡开口便说：“郎窑瓶是件赝品，请你拿回去！”杨伯衡一愣，然后安定下来说：“您相信我的眼力，我看是真东西，今天您说是件赝品，这是眼力的不同。不要，可以退货！”福开森发火训斥杨伯衡，声言不准杨伯衡再进他的大门！杨伯衡生了一肚子气，离开了福开森的家以后也不再理他。

第二年，博韞斋经李竹君介绍，买了对宋钧窑鸡心杯，造型美、小巧玲珑，釉色艳丽，恰似彤云飘荡，十分诱人喜爱，是宋钧窑烧制的贡品。消息传出后，日本的山中商会、向国外出口文物的中国卢吴公司，都想从杨伯衡手里得到这件珍品。福开森听到了这些消息，便亲自来博韞斋。

杨伯衡见福开森登门来了，“光棍不打上门客”，笑脸相迎，第一句话还是：“福大人好！”福开森开门见山：“听说你有一对宋钧窑鸡心杯，能不能给我看看？”杨伯衡说：“福大

人要看，当然可以。”

福开森边品茶，边欣赏这对钧窑鸡心杯，慢吞吞地问：“你要多少钱？”杨伯衡知道他是位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的买主。福开森知道中国人诚实，不会要价要出圈去；他在中国高价买的古玩，到美国也是便宜货。所以要多少钱，他给多少钱。杨伯衡打定主意给多少钱，我也不卖给你，所以他不开口要价，但又不好得罪他，便说：“这对鸡心杯，我要留一个时期，仔细鉴定鉴定，不想再卖出赝品！”福开森一听，不是滋味，也就不往下说了。

福开森走后，光绪进士、翰林院侍读学士、京师大学堂监督袁励准来到博韞斋。杨伯衡拿出钧窑鸡心杯给他欣赏，请他鉴定。袁老先生是位书法家、文物收藏家，鉴赏宋元名窑瓷器很有眼力，一看见这对鸡心杯就爱不释手。杨伯衡告诉袁老先生说：“福开森刚走，他要买，我没卖给他。”袁老先生说：“这位洋大人是给美国博物馆买古玩，他们的钱多，我没那么多钱。”杨伯衡说：“他钱多，我不卖！您喜爱，您就拿去。”袁励准以4 000银元代价，收下了这对鸡心杯。几十年过去了，这对宋钧窑鸡心杯，经京戏名票、文物鉴赏收藏家夏山楼主（韩慎先）之手，收藏在天津艺术博物馆。

蜚山先生和中国的宋龙泉炉

1921年，博韞斋的杨伯衡在门市收购一件宋代龙泉窑香炉。这件香炉高30厘米，两耳三足。它的胎、釉、造型工艺都很细致。胎质细密洁白，釉色明快，是深而莹澈的梅子青，釉面光滑，很少开片纹，造型端庄素雅，是南宋时期龙泉窑发展到鼎盛阶段烧制出来的产品。杨伯衡如获至宝，做好装璜，标价4 000块银元。

一天，有位日本人边溜达边看陈列的文玩书画，也不说话。杨伯衡发现这个日本人来到博韞斋。杨伯衡知道，英国人、美国人喜爱中国宋钧窑瓷器，日本人喜爱中国宋龙泉窑瓷器。这位日本人可能不会说中国话，就过去同他搭话，问他喜欢什么，他说：“龙泉的有，佛像的有？”杨伯衡拿出龙泉窑的香炉给他看，他左看右看，爱不释手，想要，又不知值多少钱，却又不肯开口问价。最后他把香炉放在桌子上，抬头看看杨伯衡说：“我的不明白，去请朋友帮忙的干活，你等一等。”说完他走了。

这位日本人走了不到两个小时，又来了一位日本人，这个人杨伯衡认识，是日本同行，日本的中国古董商，名叫茧山，是位中国通。杨伯衡一看他进来，就让到后屋客厅，坐下来喝茶聊天，茧山问：“掌柜的，你有什么好东西给我看看？”杨伯衡拿出龙泉窑香炉给他看。茧山是内行人，拿到手里仔细看，边看边说：“么喽西！”看完便问要多少钱。杨伯衡说4 000块。茧山说，东西是好，可不值4 000，两人正在讨价还价，就听前屋有人吵吵，原来是两个多小时前来的那位日本人带了另一位日本人来了，进了博韞斋就说：“我的朋友请来了，龙泉的搂喀搂喀的有。”伙计说：“请你们坐坐，我去找掌柜的。”他们听不懂伙计说的是什么，大声喊着要看龙泉窑香炉。伙计到后屋找杨伯衡。杨伯衡对茧山说，4 000块！你要不要？你不要，我就拿前屋去，卖给你的同胞。茧山一听，不容他还价，只好出4 000块收购。之后，杨伯衡又向前屋的那两位日本人道歉，说：“对不起，我已经把香炉卖了。”这才了事。

茧山携带宋龙泉窑香炉返回日本东京。从此五年没来北京。1923年东京大地震，杨伯衡惦着茧山，可是茧山始终没来信。

1926 年春节，琉璃厂车水马龙，逛厂甸、游火神庙的人山人海。蜚山出现在博韞斋门前，杨伯衡急忙开门相迎，拱手说：“蜚山兄！过年好！”蜚山躬身鞠躬九十度，说：“伯衡先生，久违了！”二人走进客堂，品茶聊天。

“几年不见，十分悬念，东京地震，着实为兄担忧。”

“感谢伯衡先生分心，我安然度过地震。”

“我兄大难犹生，必有洪福。”

“借您吉言，再展宏图，我的龙泉堂仍在东京开设。”

“你的字号改了？以前不是叫会仙堂么？”

“从前是叫会仙堂，那年从你这里买回龙泉炉后，字号改为龙泉堂。那件龙泉炉曾招引东京朝野名人到我店观赏，轰动一时，我引以为荣，故改了字号。”

“龙泉炉是否出手转让？”

“我舍命保护，岂肯轻易出手。1923 年东京大地震，地动山摇，举步维艰。龙泉堂的财物我不顾，抱着龙泉炉跑出震区。”

杨伯衡赞扬蜚山爱护中国文物甚于生命财产，并问：日本人为什么喜爱宋龙泉窑瓷器？蜚山说：“龙泉窑又称弟窑，日本人是弟弟，故爱龙泉窑器。”杨伯衡说：“您真客气！但愿龙泉窑瓷器在贵国生辉！”

雅文斋和宋定窑大缸、钧窑洗、哥窑瓶

雅文斋古玩店于 1928 年开张。掌柜的是萧书农，名文田，衡水人。萧书农 15 岁在大观斋跟赵佩斋学徒，二十来岁就帮助掌柜的做买卖、掌管大观斋经营业务，在大观斋干了 20 年。在这里他学到了鉴定商周秦汉青铜器和历代陶瓷的本领，对端砚、古墨、印章、玉件、雕刻等古代艺术品也有研究。按理

说，徒弟学到了本事，有了能耐，师傅应该高兴。可是，在那个年月的人，“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的口头禅，深深印在人们的脑子里。所以，当萧书农给师傅磕头辞柜时，师傅没嘱咐他一句话，而是破口大骂一通。

萧书农创办雅文斋，得到《群强报》主笔陆慎斋和同业人秋良臣、萧静亭在经济上的支持，还有他的师弟范岐周、陈中孚在业务上的襄助。从1928年到1940年的12年中，雅文斋在琉璃厂同行业中是佼佼者。可是，大观斋培养出来的人，一般来说谨小慎微、胆量不足，小打小闹还可以，做大号买卖就不行了。

雅文斋是在延清堂的旧址开设的。延清堂1926年关张，雅文斋1928年开张，两年来，延清堂的货底相继倒了两家。先是以10万块的代价倒给了俞淮清。俞淮清是做外国人古董生意的，行话叫“吃洋庄的”。延清堂的货底大部是历代名瓷，特别是清官窑瓷器较多，这跟俞淮清卖给外国的货不对路。所以，他很快就倒给了祝续斋，也是10万块钱倒出去的，只是从货底里取走一件康熙官窑豇豆红瓶。祝续斋也是吃金石的，这些货自己卖不出手去，全部转移到冰窑胡同收存起来。雅文斋开张，祝续斋把自己的女婿李英送去跟萧书农学徒。他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祝续斋找萧书农说：“延清堂的全部货底子，你全拿去卖，10万块钱你分期给我，我不赚你钱。”萧书农心想，10万块的货，要是卖不了砸到你手里，拿什么给人家钱？他便说：“祝大爷！您的情我领了。我看还是搂一件、卖一件、给您一件钱，这不耽误您用。”祝续斋一听，说了一声：“那就随你便了。”过些日子，祝续斋将货底的头一批较珍贵瓷器卖出去了，萧农再来搂货，销路快的好货全没了。

延清堂的货底，萧书农没敢要。有人说：“这是坐失良

机。”1928年，政府南迁之后，明清官窑瓷器价格上涨。在上海、南京的一些国民政府的要员和暴发户，为了显示自己的文雅、高贵，大量收买官窑瓷器收藏和陈列。延清堂货底有珍贵的明清官窑瓷器上千件，价值岂止10万，一倒手就能赢利数万元。

大号买卖没做，小号生意雅文斋没少做。1929年，雅文斋买到一件宋定窑划花大缸。定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窑址在河北定州，故名定窑。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是在唐代邢窑白瓷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北宋后期发展到高峰。定窑烧制的器皿装饰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

雅文斋收购的这件宋定窑划花大缸，高约8寸，口径1尺2寸，这么大的尺码在宋定窑烧制的成品中，实属罕见。缸内划花是鱼藻文饰，画意生动；缸外雕二层莲花瓣，雕刻精美。缸的口部镶铜口，用手敲之，声如钟磬。这件珍贵文物同1925年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陈放的定窑划花大缸的尺码、纹饰、造型完全一样。

光绪进士、清廷布政使、辛亥革命后成为遗老、被废帝溥仪召充毓庆宫行走、参与张勋复辟活动的梁鼎芬，民国以来，每次举行家宴，招待宾客，都用这件定窑划花大缸盛鸭翅，以飨食客。1923年，举人出身的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的爹，应邀到梁府赴宴，看到定窑划花花缸盛鸭翅，便风趣地说：“梁爷！您这缸鸭翅，值万金！”梁鼎芬没听出是什么意思，便说：“哪里，哪里，一碗鸭翅，能几许？！”王说：“不值万金，岂能用宋代名窑瓷缸盛它呢？”从那以后，梁鼎芬再不用它盛鸭翅，刷洗干净，糊个锦匣，收藏起来。

雅文斋用3000现大洋买了这件宋定窑划花大缸，转手卖给上海的喻桂泉4500块，赚了1500元，就已很满足了。但这件国宝级珍贵文物，恐怕不能用千位数字计算它的价值。

1930年，雅文斋同鉴古斋、瑞增源三家合伙买了件宋钧窑鼓钉三足洗子。起初是有人托南池子的瑞增源珠宝玉器铺代为出售这件钧窑洗子。瑞增源的邢掌柜不懂古瓷，鉴定不出是不是宋钧窑，去找琉璃厂鉴古斋的周杰臣。周杰臣鉴定字画，特别是缙丝有眼力，但对陶瓷他吃不准，便请雅文斋给鉴定鉴定。萧书农看这件钧窑洗子：釉较厚，是天青花浊釉，玫瑰紫颜色，胎质坚硬，芝麻酱底，造型是鼓钉三足，是件真东西，不是仿制品。三家一商量，合伙花4 000块买了下来。

周杰臣把这件宋钧窑洗子送给他的主顾、收藏家陶北溟先生看，陶一看，不错，是宋钧窑，造型、颜色都好，出价两万元。可是他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也就作罢了。刘宜轩听到这个消息，到雅文斋找萧书农说：“我给一万四千块，现钱交易，我们赚一万也不少了。”刘宜轩是给上海的一位收藏、鉴赏家代买的。萧书农同鉴古斋、瑞增源的掌柜的商量，三家同意卖给刘宜轩，各得利润3 333元。

雅文斋只做些零七八碎的小古董生意，买卖一两件宋代名窑瓷器，赚个千八百的就算是大号生意了，再大的买卖不敢做。1931年有这么一件事，这事儿要从头说起：

直系军阀曹锟是个大老粗，没念过书，青少年时走街串巷卖布，跟五行八作的人打交道。他当了军阀、总统时，不忘故旧，他的亲信不少人出身于搓澡的、修脚的、跟班的、吹糖人的、耍猴的等等社会底层。他的总统府收支处长李彦青，就是个搓澡的。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把曹锟幽禁于中南海的延庆楼；派兵追捕总统府的收支处长李彦青和财政总长王克敏。王克敏是举人出身的官僚，得到消息早，跟外国使馆有联系，乔装打扮，坐着汽车钻进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避难”；搓澡出身的李彦青，没有官僚们那么多经验，消息不灵，曹大总统

被抓起来了，他还不知道，在家里抽大烟，冯玉祥的兵把他活捉了，当场就给枪毙了，他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死的呢！

总统府收支处的副处长汪筱舫，得到处长李彦青被冯玉祥枪毙的消息，很快就躲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里，几年不敢出来，坐吃山空。到了1931年，汪筱舫抵押在中南银行的两箱康熙官窑瓷器到了期，他没钱赎，又不愿将其抵押品卖给中南银行经理、收藏家郑瑞声和当过袁世凯总统府庶务司长的收藏家郭世五，而是想把东西卖给琉璃厂的古玩铺。他找到韵古斋，韵古斋又找雅文斋商议此事，萧书农没那么多钱收购，则请上海卢吴公司的吴启周看货，商议此事。

吴启周、萧书农看这两箱康熙官窑瓷器，有莱菔瓶、太白尊、柳叶尊、印色盒、笔洗子等等。这些器皿的釉色有的是豇豆红，有的是天蓝釉。浅淡如万里晴空的天蓝釉，是康熙官窑按照传说中柴窑要求的“雨过天晴”那种蓝色烧制的。鲜嫩的豇豆红和天蓝釉，都是康熙官窑中的高级颜色釉，实属康熙年代官窑中的珍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

吴启周看了之后，认为是宫里的好东西，但由卢吴公司出口美、法等国，货不对路。当时美国大量收买宋钧窑瓷器、法国人喜爱法花，对康熙官窑的豇豆红、天蓝釉还有点不认货。在国内的北京、上海还都能卖得出去。吴启周愿意同萧书农合伙买下这批货，主要由雅文斋经售。萧书农胆子小，他说：“我没那么多钱。”吴启周说：“我先给垫上。”萧书农还是不敢做这号买卖，怕还不了吴启周垫的钱，“煮熟的鸭子眼看飞了”。汪筱舫没辙，还是把东西卖给了郑瑞声、郭世五。

萧书农没胆略去做成批的大号买卖，但单件的珍品文物，他还是有眼力、有胆略经营的。1932年，同行张升甫送到雅文斋一件宋代哥窑米黄色穿带瓶。这件瓶原是前门五牌楼底下裕古斋的，掌柜的死后，两个儿子分家，老二分得了这件哥

窑瓶，托张升甫去卖。张升甫请萧书农给鉴定鉴定。行里人都知道哥窑，是宋代名窑之一。南宋时代有一家姓章的兄弟二人，在龙泉烧制瓷器，哥哥烧的窑叫哥窑，弟弟烧的窑叫弟窑，也叫龙泉窑。哥窑烧制的瓷器有三大特点：铁骨、百圾碎、紫口铁足。萧书农鉴定的这件哥窑穿带瓶，约有1市尺高，扁圆形，腹部腰围约8市寸，周身有疏密不同的纹片，即百圾碎；胎色黑如铁，即铁骨；口沿施釉淡薄，显出胎色，圈足底也露胎，即紫口铁足。釉很肥厚，釉色米黄，色泽嫩美，这釉色同1925年在故宫博物院陈列的宋哥窑高把杯相似。瓶口内刻有乾隆皇帝的御题诗，诗文曾被叶叔重抄录下来，今已散佚。萧书农鉴定为哥窑中之珍品，花3000块大洋买下了。

日商、山中商会会长高田听说雅文斋买了件宋哥窑瓶，找萧书农要看看，萧书农拿给他看，他给价4000元，没卖给他。后来，上海集粹阁的王鸣吉和管复初二人合伙，用4500元买走了这件宋哥窑米黄色、扁圆形、刻有乾隆御题诗的穿带瓶。管复初将这件国宝出口到英国，便不知是值多少英镑了？

从1928年到1940年，雅文斋除做了些几千元的大生意外，还做了许多赚个百八十元的小生意，积少成多，每年赚个万八千的，在那个时期是不容易的。何况，有的年月还能赚上两三万元呢！这主要靠萧书农的腿勤，经常跑天津和北京城里的挂货铺、旧货铺，能拣到漏；也靠范岐周善于经营，交了些是收藏家的买主；还有陈中孚每年跑上海去做官僚、金融界和同行的生意。三人同心协力把买卖做起来了。

泥瓦匠开三家古玩铺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古玩行人都知道有位“何山药”，经营瓷器发了财，开了三家古玩铺——1929年在琉璃厂海王村

开德润兴、1939 年在东四牌楼开耀华斋、1945 年在上海五马路租两间房做古玩生意。

“何山药”原名何玉堂，可是何玉堂这个名字没叫响，“何山药”却人人都知道。“山药”这个名由来很久，是由一件古瓷器而得名。1921 年前后，何玉堂在大观斋看见一件窑变棒锤瓶，随口说出“大红瓶”，大观斋的徒弟、伙计便说：“这小子真山药！”“山药”这个绰号由此而传出，一直叫了几十年。山药本是一味中药和菜蔬，北京人说这个人是“山药”，意思是说，这人是傻瓜、外行。

何玉堂不傻，可是他年轻时，个子高，面容憨厚；说他是外行，也是确实。外行人在琉璃厂开古玩铺当掌柜的，没内行人推举引荐是开不了张、入不了古玩商会的。老古董商至今还说：“何玉堂进琉璃厂是崇九带来的。”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何玉堂买卖古玩是万筱竹教的”。这要从隆裕太后颁布溥仪退位诏时说起。

辛亥年腊月 25 日（1911 年 2 月 12 日），隆裕太后颁布了溥仪退位诏。这一年的春节，琉璃厂厂甸、火神庙不像往年那样，王公大臣和他们的眷属都来游逛，但仍然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可是在一般人的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因为从秦始皇算起到 1912 年，中国有皇帝的年月是 2158 年；从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开始，北京城里有皇上的年月是 491 年。

大城县的何瓦匠想到北京看看没皇上的市面是什么样的，于是他带着 14 岁的儿子进京做瓦匠活，住在南城头发胡同小店里。他看市面上同有皇上时没两样，只是大街上的店铺门前挂了五色旗。第二年春季，何瓦匠让儿子回乡，帮助妈妈种地去。临行前，他儿子在东晓市买了一个梳头匣，想带回家送给他妈。在走路时碰见一位中年人，那人问他梳头匣卖不卖？他

说不卖；问他多少钱买的，他说 15 个大铜子。那人说：“我给你一块银元，卖不卖？”这孩子愣住了，因为那时候一块银元换 460 个大铜子，便追问说：“你说的可是真话？”“谁还骗你？”两人在马路上做了这号买卖，各道姓名：万筱竹，何玉堂。万筱竹告诉何玉堂：“我在琉璃厂大观斋，以后有好东西送给我看，看好了我还要。”

这件梳头匣，古玩行话叫镜支，是红木雕花，刻工精细，山水人物逼真。万筱竹买回去打蜡擦抹，光亮照人，卖了十多块钱。

何玉堂赚了钱，虽说只是 445 个大铜子，但在他心里算是不少钱了。他不愿回家种地，也不愿在城里当泥瓦工，想在城里跑晓市做生意。

1912 年，北京的东晓市旧货很多，半夜四更开市，天亮散摊，打着灯笼做买卖。有钱人家变穷了，白天不愿出头露面卖东西，夜里才出来卖。也有偷盗来的东西，趁天不亮卖掉。何玉堂跑晓市腿勤，买来东西送到大观斋鉴定。在大观斋跟徒弟一样，他也给掌柜、伙计沏茶倒水，垂手而立。

开始时，他见什么东西便宜，就买什么。有一天，他却买了张“五鬼闹判”，判官像钟馗，画得神态逼真，色彩鲜艳。他拿给万筱竹看。万筱竹告诉他，看字画不容易，不能光看花哨，你不识字，不要买字画，买些零碎和瓷器，慢慢能懂行。从此，他不买字画，瓷瓶、罐、碗、碟、盘他买卖不少，渐渐“吃硬片”入了门。同时，也买些古砚和古墨。

韵珍斋崇佑之经营石砚、古墨多年，何玉堂从晓市买来砚墨，拿给崇佑之看。崇佑之是位旗人，吃过皇粮，后来皇上倒了，皇粮吃不上了，受过穷。现在，自己好起来了，原意拉帮穷人。何玉堂是个跑晓市的穷人，靠腿勤混碗饭吃，为人憨厚，崇佑之教他鉴定古砚、古墨，告诉他唐宋元明清历史朝代

年号，使何玉堂开了窍。从此，他买货开始注意年代。

日久天长，何玉堂懂了老古董商鉴定瓷器的方法：先用手掂量一下，手头（重量）是否适量，再看瓷胎、釉色、彩头，琢磨款识的笔画、书写笔体。他原来不识字，从琢磨字款，认识了明清官窑瓷的款识中的楷书、隶体、篆字，并对明成化官窑的“成”字书写有了自己的见解。他说，要注意看“成”字的一点点在什么地方，多数成化官窑瓷器的款识是点在成字的腰间和一横的头上。他对乾隆瓷器分类、分大小，多次掂量。所以他的手头很准，用手一掂，觉得轻了或重了的东西，他都注意审定。他还对瓷器的图案、绘工进行比较，他认为民窑瓷器有的比官窑瓷器上的图案画得好，生动不拘谨。

何玉堂从1912年跑晓市，直到1929年。这期间，他锻炼了眼力，增长了鉴别古玩的本领，同时他也积存了不少古玩，官窑瓷器少，零七八碎的瓷器多。

海王村有家回民开的古玩铺——德润兴，几年来生意不好，又入不了古玩商会。因古玩商会有规定：“回民不准入会”。会长崔耀庭怕回民入会，进甯货场买货，争吵打架，引起回汉两族矛盾冲突。德润兴要倒给汉民，崇佑之得到消息，跟何玉堂讲：“你把德润兴倒过来。”何玉堂说：“我是行外人，进琉璃厂开古玩铺能行吗？入不了商会，买卖不好做。”崇佑之大包大揽地说：“一切包在我头上，我引荐你入商会，介绍给琉璃厂的同行入。”

1929年，何玉堂当了德润兴的东家、掌柜的，入了古玩商会，正式成了古玩行人。同行人都想看看这位外行“山药”，到底怎么样。

一次，在古玩商会甯场上，有一对宣德青花海水行龙八寸盘。淡色海水、浓色行龙，显得特别生动，六字楷书款：“大明宣德年制”。不少人看不准。雍正仿宣德青花瓷器太多，而

且仿得十分相似，一般人鉴别不了。何玉堂花 800 块钱买下来了，不久卖给了上海同行，1 200 元。从此，何玉堂在古玩行业中“立住”了。

何玉堂做古瓷生意，胆大、心细，只要他看准的东西，敢出大价买。他的买主不多，主要做同行中的生意，行话叫“窜行”，窜行的生意不好做。同行入眼力有高有低，路数各有不同，应付同行比侍候买主还难。何玉堂做习惯了同行的买卖，摸到了同行人的心理，他买货不把价钱压低，卖货不把价钱要过头，使同行入有利可图，快买快卖不囤货居奇。干了十来年，德润兴的生意兴隆，赚了十多万元。手里有钱，便在 1939 年，将东西牌楼耀华斋古玩铺倒到手。

何玉堂见到耿朝珍、孙瀛洲在上海做生意赚了钱，一些大古玩铺都在上海做买卖，1945 年初，他到上海五马路租了两间房，在上海同行中做起了古董生意。由于时局变迁，战火连绵不断，整个行业的生意冷淡，他的买卖也日趋衰落。后来回到北京，靠倒卖货底过活。50 年代初，上海的古玩生意收摊，北京的两家古玩铺关门。60 年代，他穷困潦倒，1985 年老死在京。死后遗留下一台紫檀琴桌、一件康熙抹金蓝花大棒锤瓶。

韞玉斋经营的名贵瓷器、铜器

现在在琉璃厂街上，还保留着韞玉斋这家老古玩店的字号。韞玉斋原是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开张的，创办人是现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常委、陶瓷鉴定家孙会元。

孙会元创办韞玉斋还有段故事：1928 年，孙会元来到雅文斋古玩铺学徒，学了三年徒，管了五年账，1937 年春请假回胶东老家，不料掌柜的来信将他辞退了！饭碗子打了，他很

上火。父母不了解他，认为他在北京不好好干，让人家给“散”了。其实，他是因为没按掌柜的意图写假账，支出、收入如实记账，掌柜的想克扣两位吃股份的副经理的意图，没能实现，而被辞退的。

雅文斋副经理范岐周写信让他返回北京，找人给锯锅（即托人说合）。锅没锯上，孙会元没了辙，便问范岐周怎么办？范反问他：“你有胆量没有？有胆子，你开一个，我拿钱。”他说：“胆子是有，能力较差，你指导我干，我就敢干。”

范岐周拿出2 000块钱，孙会元在琉璃厂开了韞玉斋古玩铺。韞玉斋开张，萧书农（孙会元的师傅）给送了副对联：“买卖兴隆通四海 财源茂盛一百天”。史实证明：韞玉斋岂止一百天，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韞玉斋门前挂着寿石工写的“收藏文玩金石书画”的招牌，但主要经营瓷器。

2 000块钱开家古玩铺，算是小本经营。孙会元只能领着两个徒弟，维持门面，将就生活。他第一次买货时，心里犯嘀咕：他从聚和成挂货铺买了件没款的明宣德青花盘，是宣德的还是雍正仿的，心里没底。拿去给范岐周看，范点点头，他才放下心。而这件盘子才花了八块钱。

范岐周拿钱开韞玉斋，自己还在雅文斋当副经理。1938年春，雅文斋门市上来位顾客，徒弟们招待，他选来选去，选了件康熙官窑五彩罐。康熙官窑五彩，彩色鲜艳，光泽透澈明亮，白地彩绘人物——耕织图；带盖罐，高1.5市尺；款楷书“大清康熙年制”。这件上等康熙官窑瓷器，客人仅花600元就买走了。

没过一周，这位客人又来了，这时，副经理范岐周才出面招待。范岐周知道这位客人买清官窑名贵彩瓷，便拿出康熙五彩、乾隆粉彩、雍正斗彩瓷器，还有青花、豆青、一道釉等瓷

器二三十件给他看，最后拿出康熙郎窑瓶和一对乾隆官窑小花觚，这位客人在主人热情招待下，买下了康熙郎窑瓶、乾隆官窑小花觚和康、雍、乾官窑青花，斗彩、五彩、粉彩瓷器二十余件，要求包装托运到上海，共花了一万多块钱。

在交易中，范岐周与之攀谈，得知这位客人姓梁，名培，字植之，留学法国，寓居上海。梁培说：“我的名字，古玩行人知道的不多，我刚开始买古玩；但澳门的萧瀛洲，老古董商们都知道。”范说：“萧瀛洲是民国以来澳门的著名绅士，他收藏宋元瓷器较多。”梁说：“他是我的岳父。”范岐周拱手说：“萧翁之贤婿来到我店照顾，失迎！失迎！”

范岐周和梁培交上了买卖，又交了朋友。梁培在京买古玩，由范岐周陪同到最大的古玩铺炭儿胡同彬记，岳彬亲自接待；到东四牌楼荣兴祥，贾腾云出面招待。梁培买明清官窑瓷器和其他古董，范岐周协助选择、鉴定，成交后，梁培主动给回扣，范岐周不收。梁培赞赏范岐周为人忠实诚恳，看东西有眼力，不卖假货。两年多的时间，彼此取得相互信任。1940年二人达成协议：“由梁培出资4万，月息4厘；由范岐周给梁培买货，加利润一成。”范岐周辞掉雅文斋副经理职务，到韞玉斋扩充营业。

韞玉斋的财力、人力增加了，孙会元、刘秉昆鉴定、经营古玩，都有了门路，而范岐周又善于经营。1940年到1943年，韞玉斋红火一时，经营瓷器、金石，成为一家有名的古玩铺。

孙会元独立经营韞玉斋三年，买卖古玩增长了不少见识。1940年到山东烟台、青岛去买货，同一位老同行搭伙同行，在青岛见到一尊饕餮纹、四字铭文、三足两耳的铜鼎，花纹清晰、锈色莹润，是件好东西。孙会元鉴定是商代的，和一起来青岛的同行某某商议合伙买下。这位老古玩商看不准这件铜

器，又不大相信孙会元的眼力，便说：“要买你自己买吧！我看不好这件东西。”孙会元花了2 400元买了下来。回到北京，孙会元拿着铜鼎给岳彬看，岳彬见到便不放手，他心想商代的东西难得，又有铭文，花纹、锈色都好，嘴里说：“东西还行，多少钱买的？”“岳二爷！你甭问多少钱买的，给我1万，我就卖给您。”“咱爷儿们讲点面子，让我2 000，给你8 000！”孙会元很痛快地说：“8 000卖给你！”

韞玉斋还曾鉴定、经营过两件商代青铜器：

商代铜觚。这尊觚通身纹饰，锈色青绿莹润，六字铭文：“作宝彝××尊”；造型端正、四方型，同壶的形状相反，腹部小，底大于腹口，口又大于底，敞口。一些鉴赏家认为是古人插花用的器皿，故称此为花觚。可是《说文》曰：“乡饮酒之爵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谓之觚。”觚在商代实乃祭祀时用的盛酒器。

商代青铜壶。这尊壶造型美，有盖、有嘴、有执攀，盖和执攀用链相连；锈色好，有六字铭文：“作宝彝××尊”。依据《说文》：“调味也”和《文韵》：“调五味器”的说法，应是一种调味器。但有些鉴赏家们认为是酒器，用于合水于酒，然后倾入于爵或觚。到底是酒器还是调五味器，有待专家论证。

这两件商代青铜器是国宝，20世纪40年代由梁培收购了。

韞玉斋鉴定、经营的瓷器，有三件明清官窑瓷器较为名贵：

明永乐青花绘龙葫芦瓶。葫芦瓶造型美，绘画的青花龙，生动活泼。白色的坯体上用蓝色绘成的龙，比在白纸上所画的龙更动人心目，加上蓝色比黑色更多朴素的感觉，青翠光艳，色调明快，给青花葫芦瓶增添了典雅的深厚意味，而洋溢着雅

洁恬静的美感。这件葫芦瓶具有东方工艺美术的特点，实属罕见之珍品。这件珍品归梁培所有。

明宣德釉里红高把杯。釉里红，是用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后，罩以透明釉，在高温 1250 左右还原焰气氛中一次烧成的，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这种工艺在景德镇始于元代，明宣德釉里红瓷器在历史上极负盛名，收藏家争相购置。韞玉斋将这件珍贵文物卖给了上海的王轶陶。1950 年，明宣德釉里红高把杯出现在上海博物馆。

乾隆官窑霁蓝描金瓶一对。这对瓶高 7 寸、海棠式，故又称海棠式七寸瓶。霁蓝釉，是一种含钴在 2% 左右的失透釉，釉面如橘皮，色泽匀润稳定，衬托着描金开光，绘画着鲜艳的四季花，书写着乾隆皇帝的御题诗文。而今可在上海博物馆欣赏到这件珍品。

红火一时的韞玉斋，1943 年后，生意日渐衰落。这时，梁培同范岐周商议：由梁培出面联合上海古董商叶叔重、香港古董商潘溪，成立古董联营公司，请范岐周主持联营业务。范岐周鉴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内抗战，战火连绵，古董生意暗淡，加之三家联合，难于从中斡旋，故而婉言谢绝。

梁培的古董联营公司设想未能实现，便在上海江西路北口路东，开了家艺林古玩店，罗伯恭和韞玉斋的伙计刘秉昆代为经营。

1946 年，孙会元离开韞玉斋，范岐周身单力孤，生意萧条，惨淡经营了十年。1956 年合营时，货底核价 1 200 元，负债高达 2 000 块钱。这也与当时的文物行情过低有关。若按今日价格核算，则有天渊之别了。

陶庐和宣德雪花蓝大碗

陶庐是范岐周出资，由刘学敏经营的一家古玩店。刘学敏是东四牌楼天和斋郭静安的徒弟，1935 年便自己夹包跑上海，做明清官窑瓷器生意。1941 年范岐周做梁培的古董生意赚些钱，在琉璃厂又开了家古玩店，请刘学敏当经理，起字号陶庐。

陶庐鉴定经营是陶瓷。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陶瓷的价格不高，经营的又是较为普通的大路货。所以，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深。1987 年，当笔者问到范岐周老人，您开的陶庐鉴定经营过什么名贵瓷器时，老人想半天，也说不出一件好瓷器来。

当笔者把台湾作家郭良蕙写的《郭良蕙看文物》一书给范老看时，翻到《宝归何处》一文中有一幅照片是件明宣德雪花蓝大碗，老人看了又看，随后说出，这碗是陶庐刘学敏在北平吃“混合面”的那年，从天津买来，卖给上海仇焱之的。

再看文章中写道：这碗是 1980 年 11 月 25 日，苏富比在香港富丽华酒店举办拍卖会时，拍卖仇焱之生前所藏 175 件瓷器古玩，宣德雪花蓝大碗是其中一件。这件大碗成交价格是 370 万港元！看后，老人不言语，闭目养神。当他听笔者说，仇焱之早在十年前就在瑞士去世了时，他睁开眼说：“小仇和我同岁，我们都是属羊的，我还以为他还活着，想不到他早已离开人间。”于是，他开始述说往事：

这碗在早叫宣德霁蓝釉暗龙大碗，口径有市尺八寸（26.2 厘米），“七寸碟子，八寸碗”，算大件，却是件粗货。1942 年，刘学敏从天津劝业场一家小古玩店买来，才花伪币 500 元。看年代值钱，500 块不贵，看东西这碗是粗、厚、脏，碗里边还留有污垢痕迹，洗刷不掉。这是带色的脏物在碗里浸

泡过久，刷也刷不下来。给北京的同行看，谁也没看上眼。那年正遇上仇焱之来北京，给他看这碗，他寻思一阵，花 800 元买走了。从 1942 年至 1980 年，他收藏了这件大碗 38 年，800 元买拍卖到 370 万港元！看来存什么也不如存古玩，但必须掌好眼，还要遇上好年月，天下太平，古玩才值钱。

说起仇焱之、范岐周来，老古董商在 20 世纪 30 年代都说：“吃硬片的，南有小仇，北有小范”，他们鉴定经营宋元名窑和明清官窑瓷器颇有名声。到了 80 年代，仇焱之去世十年后，范岐周才从《郭良蕙看文物》书中得知。当笔者给范老读《宝归何处》文中：“11 月 25 所拍的 175 件物品，全系已故之仇焱之所藏。隔行如隔山，惟陶瓷喜爱人士才鲜有不知仇氏之名者，一为美国的何克斯（Cox），美国大卫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克拉克（A·Clark）、瑞典的林白（Lind Berg）等，都是著名收藏家。仇焱之是世界上收藏陶瓷的五大家之一。”范老听后喟然叹曰：“小仇辛苦一生，搜集许多明清官窑瓷器，转眼被儿孙拍卖殆尽！”而今谁又能知我们都是学徒出身，他是上海五马路晋古斋朱二的徒弟。

笔者说：“想当初，岳彬请您给他经营文古斋，您谢绝不干。上海梁培要联合叶叔重和香港潘溪开办平、沪、港古董联合公司，请您主持经营，您也谢绝，自己独资经营韞玉斋和陶庐。1956 年加入公私合营，分配您在首饰公司工作，退休度清贫生活。您是否感到自己错过时机，没赶上小仇？”老人一笑说：“时也！运也！命也！小仇在国际陶瓷收藏界有了大名，发了大财，一死化为乌有！我托共产党的福，今天还活着，生活无忧，不比什么都好么？”老人的心宽，必然高寿。

文古斋和岳彬

1939年，岳彬看到琉璃厂雅文斋开张十多年来，生意一直不错，心中有点嫉恨，想把雅文斋的副经理范岐周请出来，开家古玩铺，削弱萧书农的力量。可巧，有一家鉴古斋要倒出去。岳彬找到雅文斋另一位副经理陈中孚，让他去请范岐周，商量在鉴古斋的底子上开家古玩铺。范岐周跟陈中孚说：“师兄！彬记是做大号生意的，一件是万八千甚至几万块！咱们是做小买卖的，他岳彬看不上眼。再说他这个人‘食亲、财狠、不认人’。您可甭听他说，也不要给他去干！”

岳彬花了8000元联合币把鉴古斋倒来了，又花2000元整修房子，制作货格子，整修门面。一切就绪，但范岐周却不出山。陈中孚认为范岐周能出来当掌柜的，然而他和萧书农都不知道1937年韞玉斋开张是范岐周拿的钱。当范岐周从雅文斋出来，来到韞玉斋时，陈中孚才明白过来。

岳彬见范岐周是请不出来了，却又不相信陈中孚能挑起大梁、做好买卖。但他钱拿出去了，只好让陈中孚带领雅文斋的杨兴顺等三个徒弟，将文古斋开办起来了。“生米熟饭”，无可奈何，资本抽不回去，再出钱又舍不得，他便不再投资，把陈中孚“干”在了那里。

做买卖没流动资金是玩不转的。陈中孚没办法，经常不断从弟弟开的首饰楼里拿钱，他弟弟看事不好，便请他立字据。借钱由杨兴顺写字据，盖上文古斋的水印。可是，开文古斋却没同岳彬立下东伙字据。文古斋开了十多年，岳彬同陈中孚经常见面，却不谈东伙之事，岳彬偶尔也到文古斋去，却不问生意如何，买卖做得怎么样，也从来不要房钱。

文古斋由陈中孚独自经营，以经营瓷器为主，也有些铜

器、杂项等文物。经李鸿章的孙子李定候先生介绍，陈中孚买到一件元钧窑瓷满红大碗。元钧窑瓷器与宋钧窑器相比，胎质粗松，釉面多棕眼，光泽较差，施釉不到底，圈足内外无釉。元钧窑瓷器可供鉴赏的较稀少，而这件大碗呈海棠红釉色，较为艳丽，故成为珍品。这件珍品，陈中孚带到上海，卖给了乐笃周。

在上海，陈中孚是出名卖“小窑瓷器”的古董商。所谓小窑瓷器是指赝品和后挂彩瓷器。他靠刘永清给他制作后挂彩，不少用旧胎挂彩的盘、碗、瓶、罐，他都以珍品价格出售，其中有件乾隆官窑青花梅瓶，是后挂上的黄釉，此外，他还依靠天津同泰祥瓷店，他弟弟陈中原在那里当经理。同泰祥在景德镇有窑，专门烧制清代官窑瓷器仿制品。原故宫武英殿陈列着一对乾隆官窑黄地青花九龙瓶，这对瓶胎色洁白，绘工细腻，九龙各异，形象生动。同泰祥派人到武英殿摹绘，拿到景德镇照样烧制。复制品惟妙惟肖，胎质、釉色、绘工、款识，甚至“手头”（即重量）都跟原件一模一样。陈中孚将这对瓶带到上海，通过乐五爷给张群鉴赏，张看好了，1946年蒋介石六十大寿，作为寿礼送给了蒋介石。

文古斋经营的瓷器也不完全是后挂彩或复制品，也有较为珍贵的官窑瓷器。其中为古玩行业所周知的有：雍正官窑弦纹瓶一对、石榴尊一对；乾隆官窑黄地青花梅瓶一对、粉彩瓶三对；一件乾隆天蓝釉外雕花、内转心瓶，造型新颖别致，釉色淡雅悦目；还有一件乾隆官窑窑变瓶，绘有金花猫扑蝴蝶，金字乾隆御题诗文。有人考证这件窑变瓶，乾隆题的诗文乃其自豪年高德劭之意，猫蝶寓意耄耋高寿，因而推断是乾隆八十大寿时，御窑烧制的贡品。

文古斋也做过赔本生意。一次，经祝续斋介绍，陈中孚到张勋的某管家的家里看货。祝续斋说：“这是我师弟，他看官

窑瓷器眼力好，你的好东西给他开开眼。”管家拿出康熙豇豆红瓶，瓶高 20 厘米，釉色鲜艳，幽雅清淡，柔和悦目，真是“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造型为柳叶瓶，底足内白釉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三行六字楷书款。陈中孚一看就爱不释手，心想这是很难烧制的、仅供宫廷陈放的珍贵官窑瓷器，嘴里说：“先生！您的东西，确实让我开了眼，是件珍品，多少钱能出手？”“我等着用钱，不然不卖，你给 12 两黄金，我让给你。”祝续斋从中说合，10 两黄金定下来了，先给 1 两定金，10 两交齐取货。陈中孚手里没那么多黄金，去找东家岳彬。岳彬怕给他 10 两还不回来，算入文古斋的股金，所以不同意。陈中孚一时筹措不到 10 两金子，取货的日子过了，白白赔了 1 两定金。

老古董商常惠川清末时期给内务府庆宽当管家，他在琉璃厂经营金石、瓷器，同大观斋掌柜赵佩斋、延清堂经理丁济谦、韵古斋经理韩少慈都有交情，也算当时古玩行的一位人物。干了一辈子，家里仅存一件秦鼎。这件秦鼎高约 2 市尺，圆形，直径有 1 尺 2，可算是大型秦代青铜器。三足两耳，有盖，锈色苍绿，夔纹无铭文。据考证，乃秦代“钟鸣鼎食”之家的炊器，非象征社稷之宝器，但也属有考古价值之珍贵文物。

常惠川的这件秦鼎留传给了后代。文古斋开张时，常惠川的儿子（陈中孚的表弟）想，东家岳彬、掌柜的陈中孚都是常惠川带到北京学古玩的，又有亲属关系，兵荒马乱，秦鼎放在乡下不保险，不如放在文古斋保存。常某说：“表哥，这是老人留下的，你也知道是三万现洋买的，少了，你可不能给我卖。”秦鼎在文古斋存放到 1947 年，陈中孚给卖了三万联合币，常家一直不取钱，也不认可。在那风云变幻、战火连绵的年代，常家绝了根。常惠川的秦鼎付之东流！

文古斋在琉璃厂开了十多年，古玩行人都知道，这是岳彬开的买卖；陈中孚从自己家里也拿了不少钱。当岳彬因龙门石佛案银铛入狱时，始终不说文古斋是他开的买卖。

有人给陈中孚出主意，让他将全部文物转移。他说：“有营业执照开的金匾大字买卖，怕什么。”岳彬的二太太翠云没房住，要住在文古斋楼上，陈中孚不同意，翠云就向政府报告：文古斋是岳彬的。经查实账目有“文古堂”三字，证实是岳彬的买卖，因岳彬的自家堂号是文古堂，他在家乡的二十多顷地，地头树石桩，都刻有“文古堂”的字迹，结果文古斋收藏之文物、家具完全收归公有，陈中孚只身出走。翠云回岳彬的老家——通县西集乡张各庄，贫困难熬，投井而亡。

古玩铺里一曲《秦琼卖马》

京剧名票友韩慎先，艺名夏山楼主，原住北京，后移居天津，家中收藏着上百件的宋代名窑瓷器和明清官窑彩瓷。1947年，韩先生的家境衰落，生活困难，带几件好瓷器来到琉璃厂，住在文古斋的楼上。因官窑瓷器卖不上价钱，他不愿出手，便在文古斋闲住。京剧演员杨宝森、著名琴师杨宝忠和韩慎先是好朋友，他们经常来往。

桂月汀收藏古瓷、鼻烟壶、蚰蚰罐、蝈蝈葫芦，是收藏家又是京剧爱好者，年轻时下海演过丑角，跟老供奉王瑶卿配戏。

一天，韩慎先在文古斋巧遇桂月汀。二位相见，十分投缘，韩称桂为桂三爷，桂称韩为先生。

“桂三爷好！同您见面机会不多，今天见到您，很荣幸！”

“我们有几年不见了，你还遛嗓子吗？你学谭派唱腔是韵味十足，谭小培也不如你。”

“三爷是老行家，我学谭派声韵都不到家。余叔岩是学到家了，又有创新，我是望尘莫及。”

“你可记得，余叔岩给张伯驹配演王平？”韩慎先问。

那是“九一八事变”前的事，张伯驹四十大寿，他本人演《失街亭》中的诸葛亮，余叔岩为他配演王平，是杨小楼的赵云、郝寿臣的马谡、侯喜瑞的司马懿、萧长华的老军……被称为梨园盛会。

“我听张伯驹唱的戏，吐字清，韵味还行，就是声音小，比不上你夏山楼主。”

“张伯驹是京剧名票友，他研究谭派、余派唱腔。当年张伯驹、张学良、袁寒云和溥西园被世人并称为‘四大公子’，我乃一介草民，岂能相比。”

“韩先生不要客气！谭鑫培早不在世了，听你清唱也极不容易，今日幸会，是不是让我们饱饱耳福？”

“桂三爷想听我唱，哪能不唱？没胡琴就哼几句吧！”

“那就请杨宝忠来一趟吧！”

文古斋掌柜打发徒弟到西河沿杨家去请，临行前嘱咐徒弟说：“你要告诉杨老板：桂三爷、韩大爷邀请您带把胡琴来坐坐。”

杨宝忠听说桂三爷在座，很快提溜把胡琴来了，见到桂月汀便说：“宝森不在家，他要是在家也会来的。”桂月汀风趣地说：“谢谢你光临。”

韩慎先吸几口大烟，喝口茶润润嗓子，“啊、啊”两声，杨宝忠对音定弦。唱了段《捉放曹》，唱完后，桂月汀说：“你唱得好！合着眼听跟谭鑫培唱得一样，特别是：‘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颤……马行在狭道内，我难以回马’这几句。”

杨宝忠说：“桂三爷是亲眼见、亲耳听过谭鑫培唱的这出

戏。”桂月汀说：“我年轻时，在宫里大戏台，听谭鑫培唱戏；在戏馆子里，也爱听谭老板的戏。”

掌柜的说：“您是吃皇粮的，王公贵族，那个年月，我们见了您，先要请安！”桂月汀笑了，高兴地说：“请夏山楼主再唱段《秦琼卖马》，我配演店主东。”大伙儿拍手，欢迎桂三爷和韩先生合演《秦琼卖马》。

韩慎先生嗽嗽嘴、喝口茶，唱起了：“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不由我秦叔宝，两泪如麻……”桂月汀边道白边表演，韩慎先越唱越深沉凄惨，将秦琼落魄的神情都表现出来了。

桂月汀说：“唱得字正腔圆；宝忠胡琴托腔、过门是严丝合缝、悦耳动听。就是唱悲了点，壮气不足。英雄落魄，壮志不减。”

韩慎先说：“桂三爷对戏是研究到家了，您说得对。”沉了一会儿，韩又说：“慎先来京，不是卖马，而是卖古瓷，行情不好，不舍得出手。”桂月汀问道：“什么好瓷器，能不有给我看看。”

韩慎先拿出一对雍正官窑粉彩过枝碧桃大盘。桂月汀带上花镜仔细观赏，这对大盘子有1尺2寸直径，画工细，色彩好，蓝色双圈楷书款：“大清雍正年制”。他问：“你想卖多少钱？”韩说：“三五千块总是值的吧！”桂月汀说：“不要三，也不要五，咱们要三五之间的四，我给你四！”那时，一对雍正官窑粉彩大盘子卖到4000元，算是高价了。韩慎先高兴地将这对盘子出手，第三天便回天津了。

馥粹斋和哥窑瓷器

馥粹斋是王孝禹开的。王孝禹是东四牌楼义兴和古玩铺的徒弟，1923年跟他师兄崔仲良合伙在东四牌楼开保粹斋古玩

铺。师兄弟在一块儿干得不错，可是他俩的性格相反，崔仲良做买卖不爽快，生活俭朴，花钱抠抠缩缩；王孝禹办事干脆利落，有吸鸦片的嗜好，花钱不在乎。性格相反的两个人合作了21年，一是崔仲良能忍让，一是孝禹能赚钱，但在1944年他俩终于分开了。

王孝禹到琉璃厂开馥粹斋古玩铺。那时古玩生意不好，同行人都认为王孝禹的买卖不一定能做好。王孝禹却满有把握能赚钱，原因是他自信有门路和眼力。

王孝禹和“钟杨”的后代有交情。老北京北城一带的人，都知道财主“钟杨”。为什么叫“钟杨”。因为早年间有位姓杨的，给皇上管钟，故称“钟杨”。前清时代，只要沾皇上的一点边儿，不管给皇上干什么，喂马的马夫，御膳房烧火的伙夫，都有钱有势，甭说给皇上管钟的了！皇宫里的钟很多，外国进贡的不少，管宫里的钟是个肥差事，杨家靠这肥差发了大财，是北京城的大财主。1944年，“钟杨”早已去世，他的后代靠吃瓦片（吃房租）和卖古玩维持生活，以前的那套谱儿早没了，北京城的人也渐渐地忘了“钟杨”这家财主。王孝禹抽大烟，早先在大烟馆里认识“钟杨”的后代人，后来变成了“烟友”。

一天，杨家的大少爷跟王孝禹讲，他有几件传世哥窑瓷器。王孝禹听说后便想看看，嘴里却说，现如今的哥窑瓷器不如弟窑龙泉窑的瓷器，日本人喜爱龙泉窑，不愿意买哥窑瓷器，买主不多，货难出手。杨大少说：“你帮我个忙儿，找个买主，我想卖几件。”王孝禹说：“我先看看。”杨大少拿出四件——圆笔洗、印池、小盘、水中丞（即文房用的贮水器）。王孝禹仔细观看，见都是深灰色的胎，粉青色的釉，釉里有长短、深浅不等的开片纹里，开得有条不紊，十分美观。四件小器皿的造型玲珑精致，很是喜人。当时王孝禹鉴定是南宋时期

的佳作，传世哥窑瓷器，民间罕见之珍品。但他嘴上说是一般常见的哥窑瓷器。他花钱不多买了四件珍品。

1945年，王孝禹在北京古玩商会的窜货场从谢仲伦手里买到一件宋哥窑洗子，曾轰动北京古玩行业。那时，普遍认为哥窑瓷器铁足紫口颇似官窑，有碎纹著名，有碎纹多者称“百圾碎”，但没人进行深入考证研究。1960年，“由故宫博物院提供的、经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化验测定的哥窑标本，其胎釉的化学组成、纹片颜色以及底足的切削形式等都与发掘出来的龙泉黑胎青瓷不同，比较来说，反倒与江西地区的仿哥、仿官以及碎器一类产品更接近”（见《文物》1964年第6期，《关于传世哥窑烧造地点的初步分析》）。哥窑瓷器的窑址迄今未发现，哥窑问题至今仍是我国陶瓷史上一大悬案，有待专家考证研究。

馥粹斋从文古斋买去一对外蕉叶内花卉的明代宣德青花大碗。这对大碗原是翡翠大王铁宝亭的，陈中孚“搂来”代销。宣德青花瓷器，胎、釉精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纹饰优美，在国内外久负盛名。在陶瓷史上，宣德时期被称为中国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因此，这对大碗很值钱。

王孝禹曾鉴定、经营的一对明代宣德官窑霁蓝白花鱼藻纹七寸盘，是罕见的珍贵明官窑瓷器，传说他卖给上海古董商洪玉林，得六条（60两）黄金。

从1944年到1948年短短的四年里，王孝禹鉴定经营宋代名窑、明清官窑上等珍贵瓷器有百余件；在古玩行业奄奄一息之时，馥粹斋来个“回光返照”，赚了些钱。但王孝禹不善理财，到头来所剩无几。1949年后凑和着过日子，1956年，馥粹斋加入公私合营。

寂叟《海王村游记》中记载的珍贵瓷器

臂斋藏有一苹果青大盘，直径二尺，嫣红欲滴，绿点舒散，自成片段，盘外周遭苔点较浓；款为“大清康熙辛卯年制”八字。

康窑群猴大凤尾瓶，上面沧江断峡，枯藤缠络群松上，景物幽绝；而有八十一猴，大小不一，走者、卧者、坐者、跪者、倒悬者、滚地者、缘树者、食果者、相扑相抱为戏者、扳危石者、自崖上跌落者、母乳子于怀者、寂坐洞中者、自捉虱者、为他猴捉虱者、自上下下者、自下上上者、婉妾相亲^啞者、喁喁似对话者、四猴共舁一巨猴者、执竿而舞者，千幻万态，五色十光，盖有莫可形容者矣。其尤奇者，山嘴一松，若飞龙之翔空际，十三猴各以爪握爪，如修绠之汲，下临巨浸，所谓饮水之猿，千臂相接者也。别有二猴，浴于深涧中，泼水互嬉；其一却立而竦顾，断绝攀跻，若从天空往来，亦诡矣哉！

万古斋有天球瓶，高尺许；润珍斋一花觚，高二尺余，均甚浑雅。裕古斋有小碗，殊不见佳，而索价颇巨，殊难问津。

某斋有一瓶，略如蒜头式，耳几及尺，宽不及半寸；上有釉里红二猴，各舞长棒，杂以绿点，“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款。

乾隆瓷片，宽可四五尺，高三尺弱，上画关山月夜。一儿危立边墙，横吹画角，大门半开，衰草无际；有数骑杂囊驼行鞞确中，手弓腰箭，枪上悬雉兔之属，载毳幕雪具，似远猎归者。一翁短须方面，貂冠貂马甲，靴刀而吸烟，后顾微笑，则一蒙古女儿，相与喁喁小语；女颀而长，凤帽兜篷，上下一赤。上题墨彩行楷长律，盖御制诗也；押朱文方圆小印各一

颗。

春永斋有粉彩大瓶，瓶颈画一女，抱琵琶而行，瓶身满录白香山琵琶行，亦道光窑也。又有康熙小瓶，作美人肩式，画一硬绿大蝴蝶，沙地螺纹十数道。

宝铭斋有小碗，上面龙虎山人道衣执剑，剑端绕一蛇，足踏巨蝎如舟，一飞天蜈蚣，张两翼而来，癞蛤蟆蹲山石上；又有彩服小儿，顶放毫光，光中隐蜥蜴，谓之五毒；画笔工细，道光抹红款。

丁未光绪三十三年（1907）2月15日，寂叟在润珍斋买件牟尼漆盒，系乾隆嵌品，高柳下两儿在草地蹴鞠为戏。有山石四堆：二为寿山，一芙蓉石，一颇黎翠。一儿黄衣白裤，皆寿山石，一儿芙蓉石为衣，颇黎翠为裤，扬脚举袖，各有神态；面貌皆琢贝成之，眉黛唇朱，丰腴秀美，若孪生子也。

琦宝斋有瓷壶，乃乾隆御制品，细项丰下，尾有柄，瓷彩甚精美，锦边开光，有字而无画。惜瓷壶系配嘴。

宝铭斋有郎窑画螭之圆罐，仿哥五彩人物大瓶。某处见康熙彩盘，山水人物，斩然未经人用者；颜君所谓极新旧者也。太阳一轮，金彩夺睛，决非近代所能仿制。盘系客货，不得辄疑为犯禁，岂真三晋旧家，藏度至二百余年之久，而不一开箱笼者耶？

五、玉石印章 石砚古墨

玉石印章、石砚古墨等文人用具，老古董商中有人统称之为“文玩”。琉璃厂经营玉石印章的古玩铺，以山西人开设的英古斋、德宝斋最著名。石砚古墨，各家古玩铺都有，而以韵珍斋崇佑之鉴定经营古砚有名，玉纲斋马振卯收藏清代名墨为最多，英古斋杨兰_增鉴定玉石印章的眼力最好。

英古斋和鸡血、田黄石章

英古斋是山西襄汾人开的古玩铺，同治六年（1867）开业，1948年歇业，在琉璃厂经营文玩长达81年。匾额是道光进士、工部尚书、书法家贺寿慈书写，门联有八个大字：“英光宝晋，古鉴西清”，是曾国藩所书。

这家古玩铺不用外乡人，徒弟、伙计均来自山西省西南部的汾河下游一带；徒弟、伙计三年回一趟家，在家住一年，做生意赚钱归己；全店所有人员年老或有病时，可告老还乡或回家养病；三年一算账，赢利分红每人可得一份，包括还乡养病或告老还乡之人；经理人去逝或告老还乡，则由店内年龄最大、在店内工作时间最长的人接任；经营的珍贵文物严格保密，不准向外泄漏，泄漏者则遣散回乡。

这些特点，决定了师徒接力办英古斋，使英古斋代代相传，开了81年。据文字资料记载，英古斋的创办人是王德凤，字梧_同，接任经理的有：徐全义、贾丕焕（字承伯）、关耀先（字子光）和杨兰_增。

英古斋在琉璃厂鉴定、经营鸡血、田黄石印最出名。81年中买卖石章上万方，还有端砚和秦汉瓦砚及明清古墨、汉玉件头、雕漆盒子等文人用具，故称文玩店。清代时，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大学士、尚书及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等职务清闲、荣誉高的名人学者和国子监的官员，不断到英古斋选购玉石图章、古墨、端砚。民国年间，一些老翰林还不断光顾。北平沦陷后，伪政府官员、特别是汪时曦收购鸡血、田黄石章最多。

鸡血石，产于浙江昌化之玉石洞。红、黄、褐色、灰白色者居多，昌化石中有鲜红斑块或全红像鸡血凝结的，叫鸡血石，也称鸡血冻。鸡血石红色越鲜艳越妙，质地没黑钉，藕粉

地、红色鲜艳成大片的是珍品。英古斋经营鸡血石章很多，老古董商能回忆到的是一对寸五见方的石章，白藕粉地、四面有红片却不甚鲜，质地多于红，惟独顶上之红艳夺新割之鸡血，两方皆然，真巧制也，顶作馒头圆。这对鸡血石章乃稀有之物，后为日本人以高价收购去。

田黄石，产于福州市郊寿山。寿山石分为：寿山冻、白芙蓉，也叫田白、田黄。田黄石略呈透明，具萝卜纹条带。一些资料上写呈橘黄、熟栗黄、枇杷黄及金黄色为最好。实际上，田黄以鸡油黄或蛋黄那样的嫩黄色为最妙。田白以白似玉为佳。

以前田黄、田白的价格跟黄金相同，按两、钱计价。颜色好、刻工细、艺术价值高的，则超过黄金的价格。英古斋鉴定、经营田黄、田白章不少，惜无具体实物之记载。有文字记载的是两对雍正官窑两面积红五寸盘，一座黄玉乳虎。黄玉乳虎的质地细润，颜色浓醇，刀法简古，神情如生，使鉴定、欣赏者，见之心醉。

经营英古斋的经理人，以关子光为时最长。他从民国初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还故里养老，由杨兰^增接任。杨兰^增当经理不到四年，英古斋就歇业了，但在30年代初关子光当经理时，便由杨兰^增掌管业务，关子光当甩手掌柜的。故此，杨兰^增鉴定、经营田黄、鸡血石章、端歙古砚、古墨、漆盒、玉件等文玩器物，是琉璃厂颇有权威性的人物。可惜的是，杨兰^增于1948年后归故里，未发挥其有用之才，默默无闻地老死在家乡。

德宝斋经营黄玉碗和赵飞燕玉印

德宝斋在85年的经营中，鉴定的珍贵文物很多，大部分

是青铜器和法帖、汉印、田黄、鸡血石章，也有古玉件头和宋元字画。有件黄玉盖碗，曾被寂叟写入《海王村游记》中。这件黄玉盖碗是乾隆贡品，“苍润浑朴，物产之美，刀法之精，达到空前绝后之境地，嘉庆、道光之后，再没看到这样精美的黄玉碗，所配之紫檀雕花座，也是精美别致。”

在老古董商中传说：“本世纪20年代，德宝斋曾受道光进士、翰林院编修、秦汉印章收藏家陈介祺的后人委托，代为销售万印楼收藏之汉印。万印楼是陈介祺修盖的藏印楼，他将其多年搜集的印章，收藏在楼里。号称万印，实有六千余方。这么多印章由德宝斋销售，可见德宝斋之名望。其中有一方白玉石印，刻有“婕妤妾赵”四个鸟篆字，乃赵飞燕之玉印。为此笔者去拜见而今健在的88岁的毛公老人，他是德宝斋的门下传人。老人不愿谈论古玩行业的往事，当询及飞燕玉印之事，则抚首曰：“记不清了，记不清了。”

笔者幼读《幼学故事琼林》，书中有“飞燕身轻，掌上可舞”的形容，注解云：“赵飞燕入阿阳主家学歌舞，汉成帝微行，闻其声而悦之，因召入宫大幸。上所种环佩竹于临池，服其实，肌滑体轻，上令飞燕服之，能于掌中起舞。”人怎能手掌上跳舞，赵飞燕是人是神，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人？及长，读史书方知，赵飞燕实有其人，生于何年不考，死于公元前1年。赵飞燕乃咸阳侯赵临之女，初学歌舞体轻曰飞燕。汉成帝喜爱赵飞燕，召之入宫，封为婕妤。后来，刘骘废了许皇后，立赵飞燕为皇后，飞燕之妹昭仪也入宫侍候皇帝。《资治通鉴》中写道，她们姊妹二人“日事蛊惑，致帝无嗣暴崩”。哀帝刘欣死后，平帝刘衎即位，将赵飞燕废为庶人。因不堪忍受，赵飞燕自杀而亡。她死后不到八年，王莽摄政、篡位，西汉结束。

40年代初，琉璃厂一家古玩铺收藏了一本册页，是明代

大画家仇英的白描 12 幅。每幅皆有文徵明的题诗。12 幅画画的是赵婕妤、赵昭仪在宫内同一男子寻欢作乐。男子身材健壮，窜房越脊，进入内宫；飞燕、昭仪各献殷勤，妩媚多情。仇士洲的白描仕女，勾画得惟妙惟肖，文徵明的笔墨苍润秀雅。邱震生鉴定他从文徵明的字中见到有“败笔”，便鉴定为赝品。是否赝品，须经审定。但即使是赝品，也有其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赵飞燕的故事流传到今天，她的一颗玉印也仍留人间。自秦汉以来，印章中玉印传世极少，因为秦汉惟皇帝用玉印。赵飞燕受宠于汉成帝刘骘，在她为婕妤时，雕刻“婕妤妾赵”四个鸟篆字白玉印章，约 1.5 寸见方，距今将近 2 000 年了。飞燕之印飞向何方？有人说：“那批汉印大部分卖给了张学良”；有人讲，此玉印曾经王澍常之手；又有人说，邱震生在 30 年代初见过这颗白玉印，并将“婕妤妾赵”四个鸟篆字印在宣纸上。当笔者拜见邱公时，他说：“原想将印迹附在扇面上，再请名家题字，不料事多被遗忘。五十余载沧桑，旧物已失，何处觅寻？”

永誉斋、韵珍斋和石砚

永誉斋是 1931 年由李健平和李欣木合伙开的。他俩都是德宝斋的徒弟，又都是山西汾城人。李健平稳重，李欣木活跃，一个在京照顾门面，一个跑外做生意，两人合作 25 年，直到一起参加公私合营。

25 年以来，永誉斋主要经营鸡血、田黄石章，也买卖些古墨、古砚和瓷器字画，生意做得不错。直到 1946 年以后，买卖才日渐萧条，勉强维持到合营。抗战前，永誉斋主要做收藏家、老翰林袁励准和原北京政府盐务署长、收藏家王幼平的

生意。北平沦陷后，永誉斋收购的田黄、鸡血石章大部分卖给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珣。汪时珣收藏鸡血、田黄石章，在华北一带可属头名。

韵珍斋是民国初年由旗人崇佑之（外号崇九）开的。1931年崇佑之把买卖交给了自己的侄子崇庆瑞经营。崇佑之以鉴定端砚、歙砚而闻名。崇庆瑞年轻时在东四牌楼天和斋古玩铺学徒，是郭静安的徒弟，学的是鉴定古瓷，特别是明清官窑瓷器，后又跟他叔父学鉴定古砚、古墨、石章等。韵珍斋在早先只是经营古墨、石砚、图章，1931年后，也经营瓷器、字画、杂项等文物。

崇庆瑞，字■云，个头矮小，眼珠漆黑，说话时两眼滴溜转，精明能干。他嘴儿甜，人缘好，跟谁都能聊到一块儿。他跟李欣木、李健平都不错，他们合伙经营做古董生意。传说，在抗日前夕，他们卖给孔子的后裔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德成先生一块古砚。

孔府收藏的古砚很多，古书记载：“鲁之孔庙收古砚一块，制作古朴，盖孔子所用物也。”一般古砚，孔府是看不上眼、不收藏的。他们卖的是一块明末清初时期的龙尾歙砚。早在我国南唐时代，龙尾歙砚就被推崇为“文房四宝”之一。龙尾歙砚是指砚的石头说的，这块龙尾歙石，是由清初刻制石砚的巧匠王岫筠刻制的大圆形砚，名叫大圆覆寿砚，刻以寿山福海，上铭收藏这块砚台的清代大书法家翁方纲的诗文，紫檀雕花硬木盒，是一块石质精良，造型古朴大方，雕刻铭文似神笔仙刀，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古砚。

说起古砚来，名堂很多，大有讲究。砚，古人称之为“研”。北宋太宗时，进士第一、翰林学士、文学家苏易简给砚起个别号叫“墨侯”。古砚有瓦、石之分，唐朝以前，瓦砚居多，唐代以来则石砚盛兴，瓦砚淘汰。石砚多注重以端石、

歙石为原料。端石产于广东端州（今肇庆市），因地而得名。端石，石质坚实、细润，用端石作砚研出的墨，书写流利生辉，不损伤毛笔之毫毛。歙石产于安徽歙州（今歙县），因地得名。歙石，石质坚韧、润密，不吸水，用歙砚研出的墨如油，书写浓艳生辉，不损笔之毫毛。用端石、歙石制作砚台，始于唐代。歙砚亦称龙尾歙砚。

制作砚台的石，除端石、歙石外，还有紫金石、红丝石、金星石、菊花石、易州石、绿石、洮石、乌金石、灵岩石……石上有纹、眼，如端石上有青花、鱼脑冻、蕉叶白、天青、冰纹、火捺、马尾纹、胭脂晕、石眼等。石眼分为鹦哥眼、鸛鸽眼（八哥儿）、了哥眼、雀眼、鸡翁眼、猫眼、绿豆眼（俗称“王八眼”）……，眼又分为活、死眼、泪眼等等。

制作砚时先选石造型。造型根据石上的纹理、石眼的形状，因料造型。自唐代以来，千余年的演变发展，使古砚的形状丰富多样，式样多如繁星，如履式、簸箕式、莲蓬式、圭式、蝉式、凤字式、内相式、抄手式、门字式、双夔戏珠式、云龙式……

古砚讲究刻工，珍品刻工精妙绝伦，均依石质自身色泽、纹理、形状而加工刻制。历代都有刻制石砚之名工巧匠。唐代诗人李贺在《青花紫石歌》中，有赞扬砚工之诗句：“端州砚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清朝初期王岫筠善于刻制石砚，他刻铭砚，造型精美，古朴庄重、自然；雕刻铭文，刀痕不外露而内含，似神来行笔，仙来运刀，功底深厚，所刻铭文与原书完全一致，真可谓“巧夺天工”。当今，在古砚上雕刻铭文，技艺高超者是年逾古稀的傅大卣，他雕刻的古砚铭文，堪称一绝。

古墨和马振卯

在琉璃厂差不多所有古玩铺都鉴定、经营、收藏古墨。在清末年代，大观斋、茹古斋、英古斋、德宝斋等老古玩铺，都收藏有明代的墨。墨的名目很多，大部分都有原装漆盒、黄绫漆盒、黄绫套漆盒、原锦盒、黄绫套花纹精细黑漆原盒……不用说墨，就是装墨的盒、匣都是很讲究的。

民国初年，以韵珍斋的崇佑之鉴定、经营古墨、端砚较多。到了本世纪30年代末期以来，以玉纲斋的马振卯鉴定、经营古墨较多，他经营的墨多数是清代的，明代的较少。马振卯是杭希阁田健秋的徒弟，田健秋是悦古斋韩懿轩的徒弟，他们这门人，主要是鉴定、经营字画的，而马振卯既能鉴定字画，也能经营古墨。玉纲斋是1937年以后到1948年收藏古墨最多的一家古玩铺。

说起古墨来很有学问。墨在我国是何时才有的？陶宗仪《辍耕录》上记载：“上古无墨，竹挺点漆而书。中古方以名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晋时，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夹和为之，所以晋人多用凹心砚者，欲磨墨贮沈耳。自后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遗制。”《西京杂记》记载：“汉尚书令仆承郎月给榆糜墨。魏晋间以漆烟和松煤为之。唐初高丽岁贡松烟墨。宋熙宁间张遇供御墨始用松烟入麝谓之龙剂。”《李坚墨评》云：“古有李廷珪墨为第一，张遇墨次之，陈州朗墨又次之。”

如果说，北宋、熙宁年代张遇开始用松烟加麝香制墨，那就是公元1068年宋神宗赵顼当皇帝的时候，我国才有松烟墨。这种说法，恐怕不确切。因为《李坚墨评》中说：“古有李廷珪墨为第一”，这个第一，是说制墨水平、墨的质量是第一

位。老鉴定家们也讲过，南唐有位墨工，本姓奚，制墨有功。南唐皇帝赐姓李，名廷皂。他原籍是河北易县人，后搬到安徽歙州去住。在歙州他用藤黄、犀角、珍珠、巴豆、松烟等 12 种物混合，制成的墨坚如玉，纹如犀。墨上有字，有络字的是上品，圭字的次之，皂字又次之。这个时代的墨，谁也没见过。南唐时代，称廷皂墨、澄心堂纸、龙尾砚为“文房三宝”。如此说来，我国在公元 937 年至 975 年的南唐时代，就制作出上等的好墨了，而不是公元 1068 年才开始用松烟制墨。

从文字记载上看，我国于东汉时代，在陕西虢县（今陕西千阳东）生产出虢县墨。虢县以产墨著名，后世以“虢县”为“墨”的代称。魏晋时代，用漆烟和松煤混合生产出墨丸。唐代初期（618 年后），朝鲜向唐王朝进贡的贡品中有松烟墨。到了公元 937 年至 975 年之间，南唐墨工李廷皂制作出上等好墨。公元 1068 年，宋神宗时代，张遇给皇帝制作出松烟加麝香的御用墨，使墨馨香扑鼻。宋代制墨名工辈出，使墨的制作达到完美的程度。宋代书法家、画家的真迹流传于今日，名墨的功劳不小。元代制墨工艺没有什么进展。明代制墨在取材配制等方面都有进步，不仅有松烟墨，还有兰烟、棉烟墨，墨色黑润，气味馨香。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大国香墨”可以治病。本世纪 30 年代，有人患肺病，大口吐血。笔者亲眼见到，用“大国香墨”研磨出墨水饮而止血。为此笔者曾询问在琉璃厂开设老胡开文徽笔徽墨店的主人，才知道原来明代古墨都有止血之效能。因为明代的徽墨（即安徽歙县制作的墨），制作配料中加入麝香、冰片、珍珠、金泊、儿茶、公丁香、黄连等多种药物，使墨香扑鼻，闻之清凉爽神，既防蛀防腐防裂碎，又有止血效用。清朝时代，制作出“万宝止血药墨”，配料又加入牛黄、熊胆等贵重药物，成为皇家专药。所以，墨用于书写，又

有治病，既可外用，又可内服，能治中风中暑、小儿惊风、蛇虫咬伤、吐血、鼻孔出血等。

清代康熙、乾隆时期的御制墨制作精良，可称是古墨集大成者，精绝千古，是我国制墨史上最光辉的一页。玉纲斋收藏的一批古墨，是康、乾时代的贡品，墨上刻有臣字款，堪称古墨之精品。公家收购，折价4 000元，马振卯拒不收款。

鉴别古墨之年代、种类、名目、制作人姓名，研究古墨之装璜以及收藏、保管之方法，都有专门学问。而今墨早被墨汁所代替，墨不多见矣，古墨则更见不到了，谁去研究这门学问呢？

六、缙丝 雕填 宣德炉 法华器

古玩铺将缙丝、雕填、宣德炉等文物，划归“杂项”之类，但它们都是古代特种工艺美术品，艺术价值相当高。法华器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器皿。琉璃厂大观斋以经营“杂项”文物著称；法国人魏武达研究收藏我国的法华器较有名气；鉴古斋经营缙丝、雅韵斋经营宣德炉也有名声。

大观斋和春字盒、明墨、花鸟缙丝

大观斋在琉璃厂开设43年，是一家有名的老字号。这家古玩铺经营特点是将一些旧、破文物，加工修整，配上装饰，再出售。经营文物品类庞杂，大部分是些破、旧字画手卷、古铜镜、玉件头、缙丝、古铜、古瓷等零七八碎之文物，值钱的古董较少。

这种经营特点，是同大观斋的经历与经理人赵佩斋的谨小

慎微有关的。

赵佩斋原是在一家帖铺学徒，1883 年帮孙虞臣开茹古斋。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内务府总管的儿子文索出资 9 000 两银子，让赵佩斋开家古玩铺。筹备了一年，光绪二十五年大观斋在琉璃厂开张。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赵佩斋雇辆独轮木轱辘车，带着家眷逃回大兴县乡下老家，躲避兵乱，大观斋被抢劫一空。

事变后，赵佩斋回北京找文索说：“你拿钱开的古玩铺，被抢光了！”文索说：“何止你一家古玩铺，我家开的 24 家当铺和城里大吉祥古玩铺都被抢光。我给你 300 两银子，安家去吧！”

赵佩斋拿着 300 两纹银，继续做古玩生意。本钱少开不了古玩铺，便从摆地摊买卖旧货的人手里买货开始，万筱竹给他当伙计，带两个徒弟跑晓市，做小生意。他们买残破字画，请裱画铺装裱；买到紫檀、红木的雕花妆奁，修整打蜡；买到残缺的古铜、古瓷也找人修理完整。做小号古董生意赚些钱，再买点值钱的东西，逐渐恢复了大观斋。

大观斋经营 30 年，存货很多，每年赚了钱，不存入银行，除按“东六伙四”分给东家六成，给徒弟伙计工资和日常生活开支外，剩下的钱换成银元和银子，收藏起来。

1931 年，赵佩斋老了，有能力的徒弟伙计都领东当掌柜的去了，剩下二徒弟何骥良，独当一面做生意。何骥良染上吸毒嗜好，卖货钱不交柜，卖下件顶上件的钱交给掌柜的。外边传出，大观斋赔本了，让何骥良抽了“白面”了！东家文索的后人找赵佩斋，跟赵佩斋说：“大观斋的买卖归您算了，白给您也行，可不要让我们往里赔钱。”赵佩斋说：“哪有白给的道理！光绪二十四年，你爹给了我 9 000 两银子，光绪二十七年又给我 300 两银子。开张三十多年，给你家赚了不少银

子。而今我给你一万现洋，抵那 9 300 两银子，买卖归我。三天后你来取钱。”

徒弟伙计们都认为，掌柜的老了，糊涂了，哪来的一万现洋？！跟东家说了，用什么给人家。不料，三天之后，大观斋的客堂条案上，摆满了银元，一万元整，一个不少。大伙儿非常惊奇，掌柜的从哪里弄来这多么现洋？！

原来这是赵佩斋用 30 年的时间积蓄下来的钱。他将大观斋每年剩下的钱，100 元一包包起来，放在花盆或瓷坛里，坛子满了，埋在地下。30 年后把它们都起出来了。交给东家一万，还有 2 000 块剩余。

1935 年赵佩斋去世，大观斋倒给了玉器行人林复贤。林复贤不懂古玩，曾由大观斋的徒弟张云岩、王金声等人经营，买卖没做好，1943 年关张。

43 年间大观斋经营杂项文物千万件。经大观斋门人回忆，现在仅能说出三件文物的经营始末：

春字盒。是件紫檀雕花，两寸见方，小巧玲珑，刻工精细，盒面上刻有“春”字和“八宝”的宫内玩物。打开盒，内装一对精美的白玉小拱璧。盒里还有三个小屉，一屉装一件玉器：玉戈；玉制册页，册页上刻有乾隆皇帝的御题诗文，楷书，蝇头小字；周代玉剑隔手。物件虽小，但确是乾隆皇帝御用珍品。1925 年，这件珍品才卖 120 块现洋。

明代吴公度制作的墨。这块墨是从东晓市买的，才三块钱。配的雕漆盒花了 30 块钱。孙秋^颉在大观斋闲坐，问赵佩斋，买到什么好货？赵佩斋拿出这块墨给他看，孙秋^颉一看是块明代名人制作的好墨，便问：“多少钱卖？”赵佩斋未假思索地回答：“60 块钱。”孙秋^颉心想，乾隆时的墨还值个二百多块钱，这块明墨才要 60 块，太便宜了！嘴里却说：“卖古玩的，没有一口咬死价的，你说说少于多少钱不卖吧。”赵佩

斋一皱眉头，感到价要少了，又不好反口，就一口咬定 60 块钱，孙秋^飘买下转手 360 块钱。

乾隆时代的花鸟缂丝。1925 年，大观斋在前门大街祥和号挂货铺买了一幅花鸟缂丝。这幅缂丝画，油渍破裂，陈旧不堪，但上绘花鸟尚可分辨，鸟身绒毛贴附画面。赵佩斋请竹实斋的崔竹亭整修装裱。崔竹亭装裱字画、整修缂丝的技艺高超，他先将油渍的缂丝画浸入水中，去其油垢，晾干修补，再用刀剔、粘补绒毛。修整后画面完整无缺，色泽依旧，鸟羽支腾，花瓣鲜明，一幅油渍破裂的花鸟缂丝，恢复了原样。再请小器作，制作红木压银丝玻璃镜框，悬挂起来观赏，画面平整，线条匀称，花如镂花，鸟似雕刻。这幅花鸟缂丝的成本、加工整修费和红木镜框，共花 120 元钱。

从法国留学回国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刘符城，喜爱法国油画，他认为，油画能较充分地表现对象的复杂色调和丰富的层次，在这一点上比国画好。当他看到缂丝画时，觉得缂丝画细腻动人，远观似雕刻，便爱上了缂丝画，他将每月工资的一半留下积存买缂丝。赵佩斋知道了刘符城买缂丝画的消息，便派徒弟将花鸟缂丝送到史家胡同刘符城的住宅。

刘符城把这幅花鸟缂丝，挂在书房里，仔细观赏，他远观近看，细心琢磨，问赵佩斋的徒弟，这幅缂丝要多少钱？徒弟答：“1 500 元。”刘符城摘下眼镜，看看这位徒弟的脸说：“你小孩子，知道 1 500 块是多少钱。”徒弟说：“先不说钱，您看这幅缂丝，花鸟细腻动人，花瓣鲜明，鸟好像展翅欲飞。这种丝织物的画面，远看似雕刻。”刘符城点点头说：“你讲得在行，东西不错，我看是乾隆的。咱们头一次见面，你少算点，我留下。”徒弟说：“您给 1 200 元，再少了，我不好向我们掌柜的交待。”刘符城高兴地买下了这幅花鸟缂丝画。

28 年后的 1953 年，刘符城已是年近 60 的老人，在北京

前门大街巧遇卖给他花鸟缂丝的那位大观斋徒弟。这位徒弟已是 48 岁的中年人。他们久别相逢话当年，各有感叹！刘符城想将多年收藏的六幅乾隆时代的缂丝画卖给国家。50 年代初，公职人员懂缂丝的甚少，出价过低，刘老先生未能如愿。这六幅缂丝一直保存在私人手中。

法花人和雕填条案

大观斋的徒弟吕诚，学满三年徒，回乡下老家探亲。1925 年城乡交通不便，乡下人见城里回来的人，觉得新奇，住在两三里外的乡亲们都来探望。

一位乡亲拿来一个瓷胎琉璃釉的小人给吕诚看。吕诚看不准是什么年代的东西，也叫不准它的名称，又不好意思说自己看不懂，便问：“这瓷人从哪里拿来的？”乡亲说：“挖土挖出来的。”吕诚说：“在城里这种瓷人很多，不值什么钱。”乡亲说：“您愿意要，就给我二斗玉米。”吕诚答应说：“行吧！你给我瓷人，我给你两斗玉米。”

吕诚拿着二斗玉米换来的瓷人，回到北京，找琉璃厂古玩铺人看。有人告诉他，这东西叫法花，不是殉葬的陶俑，法国人魏武达收买法花器，你这件法花人可以给他送去看看。

魏达看了法花人，告诉吕诚说：“双口吕！你拿来的法花人，是明代的不是宋元的，我给你 200 块钱，匀给我吧。”吕诚一听很高兴，二斗玉米换来的东西，卖了 200 现洋！

法花是陶瓷釉色名。明代景德镇烧制瓷胎法花釉，山西烧制陶胎法花釉。魏武达原系清末时，法国驻中国第三公使，喜爱中国文物，并深有研究。20 世纪 20 年代，他曾是鉴定法花器的权威人物。

吕诚有了钱，便到晓市上去买货。他见到一件雕填踏脚

板，是明代的，花 50 元买了下来，找小器作配上硬木腿，变成一件小条案。

北京盔甲厂有一家门前挂着“中英银公司”的牌子，里面住着一位英国人，华名高林士，他收买中国古董。吕诚拿雕填小条案给他看。高林士对雕填很感兴趣，只注意条案的雕填板面，没仔细看腿，认为条案虽小，雕填的艺术价值不低，花了 250 块钱收购下来。

雕填的艺术价值为什么高呢？

这要从漆器说起。我国使用天然漆，已有三千来年的历史。传说，上古文字用漆书写，商代鸟迹文字是用竹挺点漆而书。用漆漆物，是在漆书之后。《周礼春官·巾车》中提到的“漆车藩蔽”，是最早的以漆漆物的记载。《史记·刺客列传》：“豫让又漆身为厉。”春秋末，豫让漆身吞炭，漆身变其形，吞炭变其音，伺机谋刺赵襄子，是用漆漆身。何时发明用漆漆物，具体年代考证不清。从实物考证，明清代用漆装饰和保护器皿、棺槨较多，唐宋实物见证较少。

漆器由于漆法不同，分为平漆、雕漆、雕填、剔红、戗金、填漆、堆红、螺嵌等等。

雕填，是在器物上涂几层漆，漆没干时，雕刻花纹，挖成凹状，再用各种颜色的漆填平。先雕后填，故称之为雕填。雕填不同于雕漆，也不同于填漆。

雕漆，是在器物上涂几层红漆或杂以其他颜色的漆，雕刻花纹。在漆上雕刻，故称雕漆。

填漆，是用五彩稠漆，一次按花纹所需之不同颜色而堆成，然后磨平。

从技术上讲，雕漆较容易些，雕填是两道手续，较难些。填漆也是两道手续，先堆后磨。填漆的技艺要求是一次绘成，不准修饰，一笔画成，不能描，这就比雕漆难些。

明清时代的雕填工艺作品，要算山西绛州出产的最好。老古董商仅从纹饰的粗、细分朝代。一般认为，明代的雕填较粗，清代的较细。这种鉴别方法较为落后，而今已有科学方法进行鉴别。

鉴古斋和缙丝

琉璃厂东门外路北邮政局的西侧，从1918年至1955年一直是家古玩铺，换过两个字号，1918年到1939年是鉴古斋，以后是文古斋。鉴古斋是谁出资开的？邱震生《古都的文物》写道：鉴古斋的东家是中国银行总裁、金融家冯耿光和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有人则说，鉴古斋有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的股份，房产也是王克敏的。1939年，鉴古斋倒给了岳彬，房子也卖给了岳彬，1940年岳彬出资开文古斋。鉴古斋的东家究竟是谁？笔者向师叔范岐周请教，他说：鉴古斋的房子是王克敏的，地皮是一家茶叶铺东家姓吴的，王克敏入股开鉴古斋是可能的，因为他的管事的萧玉璞经常到琉璃厂同古董商来往。冯耿光和梅兰芳是周杰臣的老主顾，他们不可能直接投资开家小古玩铺。

鉴古斋的经理周杰臣，名俊普，河北冀县人。他是茹古斋孙虞臣的徒弟。茹古斋主要经营字画，也有缙丝、古铜、瓷器等文物。周杰臣在学看字画的基础上，致力于研究缙丝。所以，鉴古斋主要经营缙丝。其他古玩铺也有缙丝，比起鉴古斋则大为逊色。周杰臣也能鉴定字画，但对古瓷、青铜器的鉴别，他没多大把握，所以他要与别人合作经营。

缙丝，也叫刻丝，是我国特种工艺美术品。它是用蚕丝织造。织造特点是，以细蚕丝为经，各种颜色的蚕丝作纬。各色纬丝仅于图案花纹需要处与经丝交织，故纬丝不贯穿全幅，而

经丝则纵贯织品，古人称之为“通经断纬”，又云：“缣丝承空视之，如雕镂之像，故名刻丝。”

缣丝始于何时，尚无定论。有人说，在我国五代时期（907—960）开始有缣丝；有人则认为，隋唐时代就有缣丝。说五代时有缣丝是实有其物，清故宫收藏有缣丝《金刚经》一幅，是五代朱梁时代（907—923）的遗物，距今已千余年，是最早的缣丝珍品。隋唐之缣丝，只闻其说，未见其物。

五代之缣丝织造简朴，到了宋代，缣丝的织造工艺精细，观之美丽如刻画。宋代画家崔白画的花竹翎毛；赵昌画的草、虫、折枝果；黄居昉画的古怪山景；陈居中画的人物、蕃马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画家的作品，都曾移植于缣丝上。缣丝既保存原作的风格与形状，又具备丝织物细腻动人的特点，艺术价值很高，是我国特有的传统工艺美术之一绝。宋代的缣丝，现存甚为稀少，每幅都堪称国宝。

周杰臣经营缣丝 20 年，他积累了丰富的鉴别经验和修整破、旧缣丝的方法，但未留下只文片字，可惜！就连他鉴别过哪幅著名的缣丝，也无从查考。收藏缣丝最多的收藏家是徐世昌内阁的内务总长、代国务总理朱启钤，他也是鉴古斋的好主顾。朱老先生著有《丝绣录》一书，他是我国收藏缣丝的第一人。1925 年，日本山中商会曾买过鉴古斋的缣丝。传说，周杰臣曾向日本一位大财团介绍过朱启钤收藏缣丝的情况，这位日本人愿出百万收买朱启钤的全部缣丝，遭到朱老先生的拒绝。1930 年，冯阎大战时，朱启钤被张学良委任为北平市长，他未到任。在这期间，朱启钤将他多年收集的宋、明、清珍贵缣丝，全部卖给了张学良，现洋 20 万元。张少帅付不起如此巨款，由东北官银号给予支付，全部缣丝收藏在奉天博物馆。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内外战争，这批文物未毁于兵燹，也未被人盗窃，现在完整地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这些缣

丝中有一部分，是当年经过周杰臣之手卖给朱启钤的。

周杰臣同冯耿光、梅兰芳是通过卖字画和缙丝熟悉的，具体卖过哪幅字画或缙丝，则无记载。传说中有冯耿光要捅鉴古斋的匾的故事：有一件康熙官窑青花加紫笔筒，冯耿光很喜爱这件笔筒，他听说是周杰臣卖出的，恼怒地说：“周杰臣不先把东西拿来给我看，就卖给胡伯平了，我捅他的匾！”后来一了解，原来是张云岩卖的，跟周杰臣无关。可能是由于这段故事，有人引申出冯耿光是鉴古斋的东家，其实是不确切的。

鉴古斋到 1938 年，因王克敏将房子卖了（地皮还是茶叶铺吴家的），负了股而倒闭。

雅韵斋和宣德炉

雅韵斋是民国初年开的买卖，领东的掌柜是张德鹤，东家是谁，说不清了。后由隆福寺三和公的徒弟苏凤山接营。苏凤山是学硬木家具的，对古玩知之不多，但对宣德炉有研究。雅韵斋主要经营宣德炉，也经营些古墨、端砚和杂项文物等。

雅韵斋在琉璃厂经营四十多年，没发财没赔本，只是维持门面。到了 1954 年，苏凤山把存货一分，自己到西单商场卖皮箱去了。

苏凤山鉴定宣德炉有经验。以前的北京政府的秘书长、收藏家陈汉第，老翰林、书法家邵章等人喜爱、鉴赏、收藏宣德炉。“七七事变”以后，鉴赏收藏宣德炉的人愈来愈少，而古玩铺里却家家都有宣德炉，但真的不多，真懂宣德炉的人也不多，真品、赝品都卖不出，偶尔有日本人买一两件，宣德炉的生意仍然萧条。苏凤山也就“无用武之地”，他的本事被湮没了，他关于宣德炉的见解和说法，没写成文字记录下来。

要说宣德炉，先说香炉。我国在什么时候有香炉的？宋朝

皇帝的宗室赵希鹄写的《洞天清录》中，援引考证说：“惟博山炉乃汉太子宫所用者，香炉之制始于此。”博山炉是什么样？博山炉像座山。炉盖雕镂人和兽，像尖顶“帽子”，“帽子”是透笼；炉盖下部似“高脚盘”，比盘深，盖上盖儿就像座小山了。博山炉始于东汉，盛行于魏晋，有青铜的、陶的，后又有瓷制博山炉。

博山炉和宣德炉都是实用工艺美术品。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呢？开始是用于烧熏，点燃沉香、檀香等香料，放在炉内冒出缕缕香烟，熏衣服。古人会见宾客、朝拜皇帝，必须将穿的衣服熏香，才不失礼仪。读书人用香炉焚香，使室内温馨，刺激精神，有益于理解与记忆。所以，香炉刚发明时，不是给佛爷烧香用的。后来香炉才成为“五供”之一。

香炉和香囊有联系，香囊是装香料的小袋。古人佩带身边或挂在卧室帐子的四角。古乐府《孔雀东南飞》中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的诗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前门大栅栏还有卖香料的店铺，供香炉烧熏和装入香囊用。香料的品名繁多，香味多种。自乾隆年代西洋的“花露水”进京，香水大量出售，香料销售日趋下落。但香料的香，特别是熏烧的檀香，是香水不能代替的。

宣德时为什么要铸造香炉呢？说法不一，有的说，明朝宣宗皇帝朱瞻基在位十年，有一年宫里失火，烧毁了不少金银财宝和古铜玩器，朱瞻基命用烧毁之物，炼铜铸造香炉；有的则说：宣德的十年是太平年月，国强民富，藩属之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有一年暹罗国用几万斤铜进贡，送来北京。朱瞻基一时心血来潮，命人以暹罗铜为主料，加入金银锡铁等金属物，精炼十多次，炼出铸炉的特殊金属。再按古代鼎、炉、彝等器皿形状加以创新，制作铸模，进行浇灌，铸出五千余件形状不同的香炉。炉底有款是阴印阳文楷书“大明宣德年制”，

故称宣德炉，简称宣炉。

宣炉的特点是铜质精良，造型古朴典雅，最妙之处在其色，其色名称很多，例如，紫带青黑似茄皮的，叫茄皮色；墨黄像藏经纸的，叫藏经色；墨白带红色淡黄色的，叫褐色；如旧玉之土沁色的，叫土古色；白黄带红似棠梨之色的，叫棠梨色；还有黄红色的地、套上五彩斑点的，叫仿宋烧斑色；比朱砂还鲜红的斑，叫朱红斑；以及猪肝色、枣红色、琥珀色、茶叶末、蟹壳青……明朝万历年间，鉴赏家、画家项元汴说：“宣炉之妙，在宝色内涵珠光，外现澹澹穆穆。”

宣炉内放香料熏烧，外用布盘（即轻轻擦试，不是用力擦磨），可迸发出赏心悦目之光色，愈烧愈盘而光色愈美。故老古董商将鉴赏宣炉的人，称之为“玩宣德炉的”。宣炉确有玩头！

一对 2.5 米高的黄杨大柜

协记古玩铺经营明清宫窑瓷器，经常跑上海，是一家较有名声的古玩店。谢君忱、司仁甫、刘尊三鉴定官窑瓷器的眼力也较强，经营了一些好瓷器，但早被人忘掉。在人们的记忆中，出色的货不是古瓷，而是一对 2.5 米多高的黄杨木顶箱立柜。这对顶箱立柜上雕刻山水人物，镶嵌玉石、贝壳，形状高大壮观，木料好，木质坚韧致密，色如蛋黄，雕刻精细，镶嵌在柜上的玉石、贝壳隐隐发光，是件难得的珍品。1949 年协记关张，黄杨大柜不知归谁所有了。

七、古琴 刻铜 篆刻

鉴定、修理古琴之名师都懂乐理善弹奏。光绪年间，张春

圃弹奏古琴，名闻于王室和士大夫，西太后曾请他教琴；民国初期，张莲舫修理、鉴定古琴，得名“古琴张”。刻铜创始人陈寅生、篆刻名家张樾丞、周希丁的艺术成就，闻名于世。魏长青开的萃文阁刻字铺，字号存留至今，他为天安的广场建造人民纪念碑做过贡献。他的弟子李文新数度出国表演书法和篆刻艺术，受到国际友人欢迎。

张春圃教西太后弹琴

光绪初年，琉璃厂有位修理、鉴定古琴的高师，懂五音六律，弹琴闻名于士大夫。他是京师人，名叫张春圃。他有个姐姐，出嫁后不久孀居，他将姐姐接回家中供养。姐姐擅长给小儿治病，也会弹古琴。在琉璃厂街上，他们姐弟两人很受人尊重。行医、修琴是他们的职业，但没有牌匾字号，跟平常住家的一样，可是他们名气不小。

姐姐经常给附近邻里的病儿治病，天长日久，南城一带居民都知道张寡妇医治小儿百病是手到病除。她看病不收费，人家给她家门口、墙上挂了好多块匾。

张春圃弹琴出了名，京师的王公、大臣、豪门贵族都知道琉璃厂有位琴师张春圃。肃王府王爷隆鋮活着的时候，听说张春圃弹古琴是京师第一人，打发人把张春圃叫到王府来，侍候王爷。王爷什么时候想听古曲，他什么时候给弹，每天是早来晚归，每月给月俸 30 两银子。张春圃觉得天天去王府，王府的规矩又多又严，很不自在，他不愿这样干下去，但又没办法摆脱，怕王爷怪罪下来，杀头。

有一天，王爷进晚膳时想听琴，王爷隆鋮边饮酒边听琴，外边淅淅沥沥下起雨来。隆鋮听罢一曲叫了一声，“张春圃！”张春圃“咋”了一声，急忙请安说：“侍候王爷。”王爷说：

“今儿个晚上下雨啦，你别回家啦，住在这儿吧！”张答：“回禀王爷，奴才还是回去的好！”“让你在这儿住，就住下吧。”“不瞒王爷说，奴才不回去，家里人认为我住‘窑子’去了！”王爷一听大怒，喊了一声：“来人呐！把他给我轰出去！”张春圃顶着雨跑回家，被雨淋成落汤鸡。老婆问他这是怎么啦？他把经过述说一遍，然后嘻嘻一笑说：“这回王爷就不再叫我侍候他了！”果不其然，肃王爷不再召他进王府了。

光绪六年（1880）前后，西太后的梳头房太监李莲英（后为总管太监）来到琉璃厂向张春圃宣称：“慈禧皇太后欲学琴，听说你弹琴弹得好，召你入宫供奉，太后让我传话告知你，只要你好好用心供奉，缺不了你一官半职的，你在内务府听从差遣，尊意如何？”张春圃叩头谢恩，向李莲英说：“奴才愿效劳！可是，公公！我有话要直说。”李莲英看了他一眼说：“你有什么话，就先跟我说吧！”张说：“这弹琴可不像玩别的玩艺儿！不能跪着弹，跪弹不成音，坐弹才成曲。”李莲英说：“谁见太后都要下跪，不见面可以不跪，你这点事儿，听从咱家分派！”

张春圃进宫的那一年，谭鑫培、王瑶卿、杨小楼等名伶尚未入宫供奉，他们是光绪二十六年前后进宫的。所以最早进宫供奉的是张春圃。张春圃进宫弹古琴是在西宫寝殿。寝殿是七大间正房，慈禧坐在尽西头的一间，离西厢房很近。弹琴室设在西厢房。张春圃不面对慈禧，而且根本见不到面，所以就不用跪着弹了。

西厢房的紫檀桌上放着几张古琴，外表装饰富丽堂皇，可称是“金徽玉轸”。张春圃一一弹拨琴弦，音响皆不合韵，他脱口而出：“这几张琴装饰虽美，琴质不佳，弹不出悦耳之曲。”慈禧听到他说琴不好，告诉李莲英说：“把我平日弹的那把琴，拿给他弹。”张春圃在这张古琴上一落指，声音清脆

悠扬，连声称赞：“好琴！好琴！”慈禧听他赞不绝口，命内监传旨：“既然他说好，就让他弹吧！”张春圃叩头谢太后恩典，然后正襟危坐，竭其所长，弹起古琴曲。弹奏之间，慈禧称赞他弹得好。

乐阕休息时，三位乳母打扮的满族妇人，领着一个衣着极华丽的十来岁的少年，步入西厢房。这位少年见琴就用手拨动琴弦，又把琴轸抽出，玩弄古琴。张春圃上前阻止说：“这是太后老佛爷的琴，可动不得！”少年怒目而视之。站在旁边的一妇人责怪张说：“你知他是谁？！老佛爷事事都依他，你敢拦他，你长几个脑袋？！”另一妇人瞪他一眼说：“皇上驾到！”张春圃连忙跪下叩头，连声说：“奴才不知圣驾到此，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少年一笑了之。

原来，光绪皇帝载■四岁登基称帝，因年幼，由慈禧太后“训政”。光绪十三年载■才亲政，但还要听西太后的。光绪六年载■还是个少年，在宫内玩耍，张春圃哪里知道拨弄古琴的少年就是当今的万岁爷？张春圃吓出了一身冷汗，出宫回家后，他宁死也不愿再进宫供奉。

供奉太后，侍候王爷，在那个时候都是肥差事，可以当官发财，成为有钱有势之人。琉璃厂的街坊邻居都知道张春圃的这档子事儿，有人问他：“你怎么不去当这份肥差？在家修琴能挣几个钱？”他说：“那种龌龊富贵，我不羡慕，在家啃窝窝头，也不干那提心吊胆的差事。”后人称赞张春圃是位狷介、不慕富贵、不趋势利的贤德之人。

张莲舫和古琴

海王村公园旁边开设的一家蕉叶山房古琴店，是1911年开业的，经营古琴二十来年，“九一八事变”后，不再经营古

琴，转营古瓷和文物杂项。老掌柜的叫张莲舫，北京人，琉璃厂的人都称呼他“古琴张”。

张莲舫原是修理古琴的，他的手艺好，懂乐理，会弹拨。清末时他经修王府贵族、宅门大户的古琴，见的琴多了，逐渐能鉴定古琴制作的年代、考证出制作者的姓名，成为琉璃厂惟一能鉴定古琴的人。张老先生为人和善，古玩行人都说他是位老实人。他有一套整修古琴的工艺流程和鉴定古琴的方法，但未形成文字记录下来。他的惟一的儿子张玉华又不喜欢音乐，跟古琴无缘。张玉华在蕉叶山房长大的，他喜爱古玩中的小零碎和古瓷。1931年张莲舫去世后，张玉华接营蕉叶山房，不再经营古琴。从此，琉璃厂再没有能研究、会鉴定和修理古琴的人了，张莲舫的“绝活”失传了。

说起古琴来，中国古代的文人讲究琴棋书画，用琴这种乐器奏出曲调，陶冶情操。我国发明拨弦乐器——琴比较早。琴在我国已有3000年历史。《琴论》中说：“伏羲氏削桐为琴，面圆而法天，底方象地，龙池八寸通八风，凤沼四寸合四气。琴长三尺六寸象三百六十日，广六寸象六合。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象五行，大弦为君，小弦为臣，文武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

琴是不是伏羲氏按照天地、君臣、时日、四气、五行、六合、八风而发明的，没有研讨的必要，因为伏羲氏本身就是位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据专家考证，古琴出现在我国西周年代，定型于西汉。魏、晋以来，琴的形制已和现在的大致相同。“汉瓦唐琴”是珍贵文物，而今谁又能看到唐代的琴呢？！

古琴的面板是用桐木或杉木制成，底板用梓木制成。有两个出音口：凤沼、龙池；有七根弦，故又称“七弦琴”。在我国的历史故事中，琴的位置和作用很明显，如俞伯牙摔琴、卓文君听琴、诸葛亮抚琴。摔琴、听琴、抚琴中流传着脍炙人口

的故事：伯牙摔琴谢知音，“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好友称“知音”，就是从这段故事中得来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文君夜亡奔相如”的爱情故事：“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为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弹琴歌唱曰：‘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皇，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入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司马相如以琴声传达自己的心意，卓文君听琴动情而私奔。后人以“琴心”指爱情之表达，还有“兰浦秋来烟雨深，几多情思在琴心”的美妙诗句。至于诸葛亮抚琴退魏兵的“空城计”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人所共知了。

刻铜名师和“交通票”贬值

墨盒在我国发明、使用的年限不久，约二百多年。传说，乾隆年间进京应试的举子感到用石砚研墨不便，有人用粉盒装入丝棉、浇入研好的墨水，代替研墨，携带方便。

嘉庆年间，按天圆地方，制作出圆盖方底的铜墨盒。同治秀才陈寅生工书画，自写自刻，开始在铜墨盒盖上刻书画。

陈寅生刻铜艺术独具风格，他刻的花鸟鱼虫，栩栩如生，山水人物，静中有动。铭刻的真、草、隶、篆和行书字，各具特色。光绪初年，陈寅生在琉璃厂开设万礼斋，后改字号万丰号，经营刻铜墨盒，他刻铜和书画家一样，在琉璃厂各家南纸店有“笔单”。

科举时代，陈寅生的刻铜曾极盛一时。北京的文人、士大夫和各地进京应试的举子，都讲究用琉璃厂李玉田制的毛笔、陈寅生的铜墨盒、周金盛制作的折扇。

陈寅生刻铜作品成为清代刻铜艺术珍品，亦属珍贵文物。

他的艺术未闻有传人，仅知有位徒弟白凤翔，字五楼。1911年，白五楼接营茹古斋古玩铺，未继承其师的刻铜艺术。

民国初年，琉璃厂开设了一家同古堂图章墨盒铺，经理人张樾丞继承发展了陈寅生刻铜艺术，他既刻制铜墨盒，又精于刻制印章。当代人称赞他“精通篆法，仿古篆刻，声振河北”。张樾丞著有《士一居印存》，印行于当世。

藻玉堂主人请张樾丞刻梁启超写的“龙飞虎卧”四个大字，铁画银钩，名声大振。废帝溥仪曾让他刻“宣统御览之宝”等篆刻玉玺。北京政府的官员和当代的文人学者、清朝的遗老们，有不少人找张樾丞刻图章和铜墨盒。他的两个儿子：少丞、幼丞，皆继承其业。孙殿起称赞张氏父子三人之篆刻：“钝刀浅刻轻轻搨，铁线文成细细拦。”可谓家学渊源。

关于张樾丞，在琉璃厂还有一传闻。在民国初年同古堂墨盒铺，还是琉璃厂西门内路南的一家小买卖店铺，靠一刀刀地刻图章、墨盒维持生活。转眼没几年，同古堂在琉璃厂竟成了最富有的商号之一。人们传说，张樾丞的发财同当时交通票的贬值、升值有关。

要说交通票，就不能不提交通系。交通系是北京政府时期的一个政治团体。旧交通系的首领是梁士诒。梁士诒，光绪进士，授官翰林院编修。后被袁世凯赏识，任北洋编书局总办。1913年，他受袁世凯的指使组织公民党，搜罗议会议员、政客，为袁世凯的独裁和帝制效力。袁世凯任命梁士诒为总统府秘书长，交通、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交通银行发行交通票，这种货币在市面流通。1916年袁世凯死后，梁士诒被列为帝制祸首，受到通缉，逃往香港。交通票曾一度一钱不值。

就是在这个时候，北京政府的一位官员提着两个皮包，来到同古堂墨盒铺，找掌柜的张樾丞说：“张掌柜！我欠你的图章、墨盒钱和刻字费，今天我都还给你。”说完把两个皮包打

开，给张樾丞看。张一看满是交通票。这位官员指着皮包里的票子问：“这些够不够？”张樾丞心想，交通票现如今是一钱不值，再多也没用，可他嘴里却说：“用不了这么多钱。”官员接着说，“用不了，先存在你这儿，我去香港，带它没用。”不久，新交通系的首领曹汝霖当了交通总长、交通银行总理，交通票恢复了原票值，而把交通票存放在同古堂的那位官员却病死在香港。

琉璃厂从此有了“在交通票迅速贬值和升值中，同古堂发了财”的传闻。

另一传说是张樾丞买了件汉代铜鼓，而起字号同古堂，“同古”乃“铜古”之谐音。同古堂和尊古斋、韵古斋两家古玩铺，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曾被称为琉璃厂的“三大财主”。1925年、1930年，张樾丞在琉璃厂先后开设邃雅斋书铺、观复斋碑帖铺。1956年，同古堂、邃雅斋和观复斋都加入公私合营。

张樾丞从学徒成长为篆刻艺术大师，实为难能可贵，他一生治印不下10万，其1935年编辑的《士一居印谱》至今仍印行。他给溥仪、蒋中正、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等刻制过印玺，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玺做刻制设计、给周恩来总理刻制篆文印章。

篆刻与古董

篆刻是中国传统艺术之一，起源于实用，继承秦汉印玺之传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倍受欣赏的艺术。

琉璃厂古董商中，识篆刻的人不少，成为篆刻家的不多。古玩铺鉴定、经营字画，要看书画家的印迹、皇帝鉴赏、名人跋、题识等字迹印痕。各时代书画上的印玺痕迹，都有其时代

的篆刻特点与艺术风格，不识篆刻则难以鉴别书画之真伪。鉴定、经营玉石图章、印玺的古董商也要识篆刻，才能知晓所买卖的印玺原系何人之物。鉴定、经营青铜器的古董商，若对商周秦汉青铜器的纹饰、造型、铭文有研究兴趣，必然设法学会拓拓片，拓出纹饰、铭文和整体原形。而秦汉印玺上的篆刻，是从商周铜器铭文发展而来，继承了金文的传统艺术。琉璃厂鉴定、经营金石的人士中，就有人精通篆刻，成为篆刻家，周希丁师徒便是一例。

周希丁，名康元，河北宛平人，幼年在琉璃厂富润轩古玩铺学徒，1918 年自己开设古光阁文玩处。古光阁原主要经营砚台、图章、古墨和字画，后兼营青铜器。

周希丁在富润轩学徒时，受张子青之指教，学习鉴定历代名人书画，苦心钻研书法家和画家的笔法画意，专心观察书画上印迹的篆刻艺术风格和特点，并练习书法，写篆、隶体字，持刀习刻。经过名家指点和个人刻苦雕刻，十年后他的篆刻作品受到当代书画家的赞赏。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他在古光阁文玩处的门口挂过一块竖写的小木牌：“周希丁篆刻处”。

古光阁经营古玩和篆刻。周希丁买卖青铜器，注重研究铜器上的铭文，他考据青铜器上的文字，吸取金文的特点，运用在他的篆刻艺术上，使自己的篆刻别具风格。他拓青铜器的拓片，熟练有技巧，拓片清晰，墨迹均匀。古玩行人公认周希丁鉴定青铜器、古玉、古墨、石砚、图章和书画的眼力好，他是位多才多艺的篆刻家，二三十年代已闻名于京都。

周希丁的徒弟：韩醒华、郝葆初、宋九印、马振德、萧寿田、傅大卣，除韩醒华都会篆刻。30 年代，郝葆初的篆刻艺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受到考古学家、甲骨文学者罗振玉的赏识，后因忙于经营古玩，经常跑上海、东北等地收购文物，未能致力于篆刻。萧寿田的篆刻艺术也具有相当水平。篆刻、拓

拓片手艺最好的是傅大卣。

傅大卣年轻时跟周希丁学徒，得其师之真传，又勤奋好学。1942年在琉璃厂开裕文斋文玩处，小本经营，鉴定金石、拓拓片、搞篆刻维持生活。而今，傅大卣的篆刻艺术已驰名国内外。

琉璃厂的篆刻家除周希丁师徒外，还有陈漱石、李文新、魏长青等名家。李文新是魏长青的弟子，书法和篆刻皆有功底，“文化大革命”后曾数度到法国、美国、日本当众表演我国古老的传统艺术——书法和篆刻，深受欢迎，名声大振。魏长青从小在琉璃厂刻字铺学徒，善于钻研学习，写一手好颜体字，篆刻艺术治印，能刻吴昌硕体。1934年在琉璃厂开萃文阁刻字处，字号一直存留至今。魏长青为天安门广场建造人民纪念碑做出过贡献，周恩来为纪念碑题的辞是由他放大镏金的方法镌刻在巨大的花岗石上的。

八、官僚绅士开的古玩铺

琉璃厂古玩铺，除少数古董商自立门户、独资经营的以外，大多数都有东家。东家中以供职为官和官宦后代者居多。最大的东家是摄政王府，还有知府、交通总长和一些绅士。

王府出钱办“赏奇”

光绪二十三年（1897），琉璃厂有位古董商张楼村，自己提溜包做买卖，走王府串宅门。一天，他到醇王府，王爷让他打开包，要看看他拿来的古玩。包里装的是些小件铜器。王爷看了看说：“这些破铜烂铁算什么古玩。”张楼村说：“回禀王爷！古玩铺里的东西，就是这些零七八碎、破铜烂铁，还有石

头、玉件头、瓷器、字画。”王爷叫声：“来人呐！”张楼村吓了一跳，心想我没说错话，王爷喊人干什么？进来一位中年人说：“侍候王爷！”王爷说：“你把我收藏的金胎、银胎的彩瓶、彩盘拿两件来，给他开开眼。”张楼村这才放下心来。

张楼村说：“王爷收藏的是真金真银、好彩头的珍品，外边看不见这样的好古玩。”

王爷指着一件金胎珐琅彩绘洋人的盘子说：“这是西洋进贡的贡品，你们哪能看得见。”

“王爷将奇珍异宝，给平民百姓饱眼福，功德无量！”

“你拿回琉璃厂，也给你的同行开开眼。”

“小人不敢，这样贵重的东西，我尚无安放之地。”

“琉璃厂那条街上没你的地盘？我出钱办家古玩铺，你当掌柜的。我高兴时逛琉璃厂，好有个歇脚的地界儿。”

于是，由醇王府总管张明芳出面，拿出9 000两银子，在琉璃厂开赏奇斋古玩铺。

赏奇斋是一间半门脸儿，进深才二间，门面小，后边设“局子”，是北房三间、南房三间、东房两间的一个小院。经营铜、瓦、石器。上等官窑瓷器和金胎珐琅彩瓶盘，供熟人欣赏，不经营出售。民国以后，赏奇斋经营的古玩都是整齐货，不买卖零碎。政府南迁后改变了以前的经营内容，供人观赏的奇珍异宝，成为经营销售的主要商品。

宣统二年，张楼村去世，由程启元经营。民国初年，程启元是琉璃厂的一位“人物”，他同区、局地方官员都有交往，很熟悉。谁家买了偷盗来的赃物，吃了官司，便托程启元找人送礼说情，大事小事都好解决。程启元同龙泉寺主持道兴和尚共同创立孤儿院；还办过粥场，早晚施给吃不上饭的人粥喝，粥场开了三个月，程启元得了“程善人”的美名。

1921年，程启元死了，由杨润斋接营赏奇斋。杨润斋派

头十足，谱儿大，出门坐包月（自备人力车，雇有车夫，按月给车夫工钱）。外边人力车上的脚铃“叮”一响，徒弟伙计便知这是杨掌柜的回来了，赶紧打洗脸水，递撞子，掸身子、鞋上的尘土。洗完脸，茶水伺候。稍有不顺，杨润斋就训斥人。

杨润斋做古董生意是“独来独往”，赏奇斋的古玩买卖，他一手经营，别人插不进手，而且极端保密，谁也不让知道。徒弟是侍候掌柜和买主的。开了近半个世纪的老古玩铺，没培养出一个人来。除杨润斋外，赏奇斋的徒弟伙计没人懂鉴定、会经营。

杨润斋做日本山中商会的生意，只要山中商会的汽车一到琉璃厂，必先在赏奇斋门前停下。桂月汀先生每到琉璃厂也是先去赏奇斋，同杨润斋躺在一起抽大烟、聊天。在同行中他常跟大古董商交易，同小古董商来往很少。

赏奇斋经营过什么珍贵文物？询访多人都说：“这家老古玩铺不买卖零碎，都是些好货，掌柜的一人经手的买卖，对同行人不谈买了什么，卖了什么。”有人说：“见过赏奇斋经营的金胎彩色器皿，是外国给乾隆进贡的东西；经过赏奇斋卖给东洋人不少宫内、王府里的珍贵文物。”具体是什么文物，却一件也说不清楚。

传说，赏奇斋有一套银质宫僚雅集杯，现在的老古董商，谁也不知宫僚雅集杯是什么样的杯。《郭夙好斋诗续编卷三》中记载，叶名澧在琉璃厂见到过宫僚雅集杯十具，因价钱太贵，叶先生无力收藏，赋诗纪之。诗云：“大户汤睢水，浅杯王阮亭，百年溯游宴，故物叹飘零！宝此缘非偶，撑来眼乍醒。聊同恺之事，妙画可通灵。”诗后的注文：“康熙朝，汤潜庵、沈绎堂、郭快圃、王昊庐、耿逸庵、田子湄、张敦复、李山公、朱即山、王阮亭诸先生，同官官坊，造银杯十，镌

‘宫僚雅集’四字，并饮者人名、字号、籍贯，大户汤文正公，小户则王文简公也。”

康熙朝廷中的十位同官宫坊的同僚，很有雅兴，游宴共饮，制杯留念。十具宫僚雅集杯是留有历史遗迹的珍贵奇物，赏奇斋真可谓“赏奇”矣！

知府投资开“崇古”

崇古斋在北京琉璃厂、沈阳大南门里两地开设，从1904年开张，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如今，谁又知这家老古玩铺的少东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而张作霖给这家古玩铺的东家当过“顶马”（清廷官员出行时仪仗中前导的骑马差役）？

光绪二十七年，琉璃厂遭洗劫后的第一个春节的厂甸市集，虽不如往年红火，可是逛厂甸的还是人山人海。海王村门前，卖山里红的小贩在人群中穿梭叫卖；卖大串糖葫芦、沙燕、风车和应春食物——艾窝窝、豌豆黄、驴打滚的货摊、小吃摊，鳞次栉比。悦耳的吆喝声、抖空竹声、风车的响声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新春的热闹。海王村园内摆列着名目繁多的儿童玩物：琉璃喇叭、噗噗登儿、空竹、风筝、刀枪、棍棒、假面具……园里的北边摆着古玩、玉器摊。园东门外，有西洋景、活动电影、山里红汤、梨汤、炸灌肠和豆汁摊，在这段狭窄的街上，熙熙攘攘。园之西门外，北从西河沿口，南至东、西琉璃厂的交叉口的道路中间（那时还没拆开城墙建和平门）搭起了临时苇棚，棚里摆满书摊、字画摊。古今书籍触目皆是，字画悬满席壁，琳琅满目；学者文人、书画爱好者，走进苇棚，流连忘返。

苇棚里有一个书摊，是张鸿瑞、张景韩、刘振之三个人经

营的。正月初七，来了一位顾客，挑拣了一些书和碑帖，久久不肯离去，但又不问价钱，张鸿瑞走过去问道：“老先生！您看的这些书和帖，适合您的需要吧？”老人说：“我看了半天，这几本书和帖，我看都很好，我想要，不瞒你说，我今天拿不出钱来。”张鸿瑞看老人面貌忠厚，就顺口说：“您老先生想要，就拿走，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我们。”老人说：“你们相信我，我就拿走。”张鸿瑞说：“我们完全相信您，您拿走吧！”老人问明了价钱和书摊主人的住址，拿着书和帖走了。

二月初二，张鸿瑞收到老人寄来的钱，很高兴。因为正月十六日厂甸市集收场后，生意一直不好，老人寄来的钱救了燃眉之急。那一年逛厂甸的人多，花钱买书画、古玩的人少，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大臣们逃到西安还没回来，达官贵人也不出来买书画，一时琉璃厂的生意不好，张鸿瑞的书帖小铺更难维持。于是，张鸿瑞同张景韩、刘振之商量怎么办，他们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带上一些书和帖去找这位老先生帮助。

1902年初春，张鸿瑞出关经奉天（沈阳）到辽阳，见到了这位老人。老人说：“我的钱不多，买不起这些书和帖。我给你介绍位知府大人，你去找他。”张鸿瑞持信到新民府，见到新民知府曾子固、二堂陈昔凡。曾知府不喜爱书、帖，陈昔凡（名衍庶）是位画家，他的山水画曾师尊清初画圣王□（石谷），自称“虞山派”（石谷弟子多称“虞山派”）。陈昔凡在清末的书画界是位知名人士，他爱好书画碑帖。张鸿瑞很尊敬陈昔凡。经二三年的生意交往，张鸿瑞得到陈昔凡的信赖。

1902年，陈昔凡升任新民府知府。这年张作霖被清政府收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管带是清末官制，统辖一营的长官）。有人传说，张作霖当过陈昔凡的“顶马”，他还请

求拜陈昔凡为义父，陈昔凡因为他出身于绿林，不愿接受。

1904年，陈昔凡拿出一万两银子，让张鸿瑞开古玩铺。张鸿瑞在北京琉璃厂开设崇古斋古玩铺，于宣统二年在沈阳大南门里（“九一八事变”后迁小南门里）开设崇古斋分号。崇古斋的匾额是同治状元、溥仪师傅陆润庠书写，属于名匾牌之一。

崇古斋古玩铺经营的古玩较庞杂，开始时没有像样的好古董，零七八碎的较多。这是因为张鸿瑞、张景韩、刘振之都是摆书摊卖书和碑帖的，对古玩字画不大懂，所以开始不敢买卖像样的好古玩。不久，他们熟悉了古玩行业，又有万两白银资本，买卖越做越大，青铜器、字画、陶瓷、文物杂项样样俱全，都鉴定经营。张鸿瑞稳稳当当做了三十多年两家崇古斋古玩铺的掌柜的，他的大徒弟牛在如也是善经营、有眼力。他的小徒弟名叫李廷琦，字卓卿，香河县人，14岁跟他学徒，17岁（“九一八事变”前）去沈阳大南门里的崇古斋，钻研古铜、字画和瓷器。“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做罗振玉等清廷遗老和伪满官员的生意，经过长年实际锻炼，既有眼力，又会做生意，故1942年崇古斋由李卓卿担任经理。

1943年，崇古斋收购一件约2.5市尺高的明嘉靖青花带盖大罐，上绘十六子戏耍图，有山石树木和十六个儿童，生动活泼。这件大罐在琉璃厂出了名。协记古玩店的康绍南给李卓卿7000元，李卓卿不卖。一天晚上，彬记岳文轩来到崇古斋要买这件大罐。他想钱少了，李卓卿不能卖，开口就给了四万元。李卓卿赚了笔大钱。这可能是崇古斋开张以来的一项大生意。当然他们也做了不少价值万八千元的古董买卖。1956年，崇古斋参加公私合营。私营52年。

52年的风云变幻，崇古斋没因为东家是陈昔凡而得到好处，也没因此而受害。辛亥革命后，陈昔凡卸任，曾住过北京

琉璃厂崇古斋的后院。他为人和善，从不参与经营古董生意。他的夫人去世，未留子女。他在北京“续弦”，娶了西城谢家之女，是官宦之后。谢氏操持家务，掌管一切，善于处事，为人贤慧，但她也没生育。

早在光绪二十六年前，陈昔凡之兄将其次子陈乾生过继给陈昔凡。陈乾生，字仲甫，号独秀，年轻时是位秀才，光绪二十四年入杭州求是书院，参加反清革命活动，被清政府追捕，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不久被日本遣送回国。1904年崇古斋开张后，陈独秀从安徽来到北京，去过琉璃厂崇古斋，没住几天，又回安徽办报和当教员去了。这时琉璃厂的古玩商传出崇古斋的少东家是革命党的新闻。一些人说：“我看见了这位秀才，光秃秃的脑袋。”清代时，男人都留着辫子，剃掉辫子是件新闻，也是反清行动。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文学院长），他的叔父陈昔凡携眷返回原籍安徽怀宁，后病死于故里，由谢氏操管陈家的一切。

第二次直奉大战，张作霖打败直系军阀，把持北京政府时，崇古斋没因为东家陈昔凡当年的“义子”和部下当权而得到任何好处；张作霖自称安国军总司令，宣言“反共讨赤”、杀害李大钊时，崇古斋没因为少东家是陈独秀而被查封。日伪统治北平时，陈昔凡的夫人谢氏迁居四川，崇古斋也没因为东家在抗日的后方，而招来麻烦。崇古斋在风云变幻中，经营了52年。50年代初，陈独秀的侄子陈遐年在北京学习，到过崇古斋。这时，陈昔凡的夫人谢氏已经谢世，崇古斋加入了公私合营。

交通总长和古欢阁

民国初期，处于新旧权贵更替、王谢凋残、沧桑叠变之际，琉璃厂的古玩行业却因之发展。达官贵人、富商大贾、社会名流、清廷遗老、宦官和外国的官员、豪富纷至沓来，有买有卖，古玩铺的生意兴隆，吸引一些人投资于这个行业。

1919年，光绪举人、靳云鹏和内阁交通总长曾毓隽想开家古玩铺。曾先生原想请一位姓萧的古董商筹建，消息传出后，西华门一家卖木器的店铺掌柜的姚栋臣知道了，主动去找曾毓隽说：“姓萧的不行，我能给您办这件事，文玩书画、古铜瓷器我都懂，您别看我卖硬木桌椅，但古玩这一套我全明白。”曾先生被他三说两说，说动了心。又因以前买过他的硬木雕花条案，知道他很能干，又当过掌柜的，所以，就让他去开古玩铺。1916年，曾毓隽出资两万现大洋，姚栋臣在琉璃厂开了个古欢阁。

古欢阁的资本是两万块，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姚栋臣自吹懂古玩，其实他是卖硬木家具的，哪儿懂古玩。他请了位内行人陈中孚帮他进了一批货，书画、铜器、瓷器、玉石、雕刻摆满货格，陈设得琳琅满目，井井有条。开张那天东家来了一看，不错！是个很像样的古玩铺，满意了。

姚栋臣自己看古玩没眼力，心眼儿小，不敢放手用人。自己没本事，又不相信别人，所以，他只能看堆，不能买卖货，偶尔买点卖点，也是掂量来掂量去，犹豫半天才成交。同行人不愿同他做生意。

那时，古玩商会内设“窜货场”，进行行内交易。在窜货场上，古玩鉴定家只要货一到手，就能鉴别出真伪，说出它的价格，没有拿回去研究研究这一说。因为大家都要看要买，不

容5分钟的时间，没鉴别能力的人，进窜货场只能是看热闹，那儿是个锻炼人、考验人的地方，大多数鉴定家都经过了这种场合的锻炼和考验。老古董商有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指的就是有没有鉴定的本事，到窜货场买买货看。姚栋臣进了窜货场，眼花缭乱，看大伙儿纷纷把手伸进卖主的大袖子里，手拉手地递价，愣了神，傻了眼。别人问他：“姚掌柜！您看比卖硬木家具热闹吧？”他“嘿嘿”一笑了之，从不把手伸进大袖子里去，也就是说从窜货场他进不了货。

干了两三年，他想：总这么看堆、吃底货不行，还得想办法进点货。他看别人开的古玩铺，买卖有臣字款、带御题的明、清字画能赚钱，想学着干。他去请教韩少慈说：“七爷！您那么多有臣字款、带御题的字画是从哪儿买来的？”韩少慈不告诉他有些是落假款、假御题这个诀窍，只说：“这些东西，京城里老主顾想出手的不多了，我们到江南一带收购了一些。”

姚栋臣下江南去收购字画。他哪里知道，鉴别字画不像买卖硬木桌椅那么容易。鉴别字画要具备基本功，首先要熟记《画史汇传》中历代主要名书法家、画家的姓名、字、号和别号，以及他们所作书、画的基本特点；第二，要了解各个时代著名书法家、画家作品的纸绢、墨迹、印章；第三，能鉴别作品上的题、跋、收藏、鉴赏家所用印迹之真伪。有了基本功，还要在经营字画中锻炼眼力、积累经验。姚栋臣既没有基本功，又无经验，到了江南苏杭一带，只见美人妙，哪知画中奥！人家拿出旧字画给他看，他看不懂，见要价高，没敢买；拿出仿制品，他看画得花里呼哨，价格便宜，就当真的买了不少。带回北京，谁肯买这些毫无艺术价值的东西，砸在手里，卖不出去。

从1917年到1937年20年的时间，古欢阁在姚栋臣的经

营下，有内行协助时是生意冷淡，勉强维持门面；没人帮忙时，他带着徒弟是卖一件、吃一件，将货底吃光，两万元赔完，1937 年关张。东家曾毓隽在开张时，来过一趟，从那以后，便无暇顾及了。

1920 年，段祺瑞的皖系军和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军在河北涿县、高碑店大战，奉系军张作霖帮助曹锟、吴佩孚打段祺瑞，皖系战败。曾毓隽是段祺瑞的亲信幕僚，被列为十大祸首之一，逃往日本驻华使馆，后住在天津日租界，十多年来他从不过问古欢阁的事。古欢阁关张前夕，曾毓隽拒绝参加伪南京维新政府，逃亡香港，早把古欢阁忘到脑后了。

《古玩指南》的作者与萃珍斋

萃珍斋于 1939 年开业，经营到 1956 年，今天琉璃厂还有这家古玩铺的字号。原先掌柜的是海王村雅蕴斋苏凤山的徒弟黄同文，东家是赵汝珍。

古玩行人传说，赵汝珍是余戟门的门婿。余老先生名启昌，字戟门，是位法学家、收藏家，在清末曾任大理院少卿。光绪三十二年改大理寺为大理院，职权是解释法律、监督各级审判，并且是最高级的审判机关，是最高法院性质的机构；“少卿”通俗的讲，就是最高法院的副院长。民国后仍有大理院，余戟门是院长，办公地址在原司法部街，现在的人民大会堂西部北头。

赵汝珍是位读书人，在余府教家馆。他喜爱古玩，致力考古，收藏文物，著书立说。因与余戟门有同好，受到他的赏识。后余老先生将其三女儿许配给赵汝珍，他成为余府门婿。抗战时期，北京有家朝鲜银行，赵汝珍担任过理事。1939 年他出资数千元，由黄同文当经理，开设萃珍斋，主要经营新瓷

器，供应出口，还做些古瓷、字画等古玩生意。

1942 年，赵汝珍出版了他的著作《古玩指南》。在自序中写道：“中华民族之在今日尚能夸耀于世，尚能为世人所称道者，惟此而已。”就是说，惟有古玩是中华民族在今天尚能夸耀和称道于世界的。“因此亦可证知吾中华之祖先聪明睿智高于同时之任何民族，依优生学之定例，则吾黄炎之子孙其脑筋智力，绝不低于今日之任何国家。现在虽遭逢不辰，国势微弱，设稍假时日，定能与最前站立之白人并驾齐驱。”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北京，能写出这段文字，也就不简单了。

赵汝珍写这部书，按他自己讲“最重要的特点在揭穿伪作古玩之黑幕”，故取名《古玩指南》。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所谓伪作古玩，不过是搞些文物复制品。在大量古玩出口不受限制的年代，以假充真，古玩商赚了钱，同时也使一些珍贵文物免于流入异国他乡，何乐而不为。复制文物的技艺、整修文物的技艺应大力继承和发展，而今，有的“绝活”已失传，真令人痛惜！

《古玩指南》出版之前，我国古玩还没有系统的专著。这部系统介绍文物、传播有关文物知识的专著，引起了古玩行人、鉴定家、收藏家的关注。萃珍斋卖古玩和新瓷，也出售《古玩指南》一书。一些老古董商对这部书有褒有贬，但都认为有了这么一部书，总可以作为参考，然而，因涉及的古玩种类、物品繁多，不可能写透彻。有人讲：如按这部书的论述去鉴定古玩，非打眼不可。

琉璃厂的老鉴定家们传说，萃珍斋的东家写书是要揭穿做假古玩的，可是他开的买卖净卖假货。这可能是气话，但是不少人说，黄同文在 40 年代初曾卖给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一幅郎世宁《百马图》是假的，是北京后门大街梁某人请某画家按照故宫博物院陈放的那幅郎世宁《百马图》样子画的，画

得好，落款、图章印迹、印张、墨迹都很像原样。画了两幅，一幅卖给魏子丹，另一幅卖给陈璧君了。有人说，陈璧君喜爱郎世宁的《百马图》，买不到真的，情愿花 4 000 块买一幅仿制的去欣赏；也有人讲：陈璧君吹嘘自己懂郎世宁的画，黄同文故意从后门梁某人那里拿来这幅画给她鉴赏，考考她的眼力，陈璧君左看右看、仔细琢磨，认为是件珍品，黄同文也就按珍品的价钱卖给了她。卖假货是古董商中的事，与赵汝珍的著作无关。

张瑞亭开鉴光阁

张作霖有位亲戚名叫张瑞亭，居住在天津。民国以来，张作霖在东北当“大帅”，出资让张瑞亭在天津开办恒聚德军衣装，供应奉军服装。张瑞亭有了钱，成为天津的著名绅士。他收藏古玩，琉璃厂的古董商不少人做他的买卖。

悦古斋的徒弟张效禹，名延舜，河北衡水人，经常给张瑞亭送字画，请他鉴赏。日子长了，张瑞亭看出张效禹为人老实，有一天就跟他说：“效禹！你不用老跑腿啦，我拿几个钱儿，咱们在琉璃厂开一个，你当掌柜的。”张效禹十分高兴，于是开了个鉴光阁。

鉴光阁主要经营字画。张效禹当了 17 年的掌柜的，买卖做得不错，他自己手里也攒了点钱，不想当有东家的掌柜的，自己在琉璃厂开了个闻古斋古玩铺。张五爷一看，干了 17 年，这小子撂挑子了，就把鉴光阁关了。没过多久，张瑞亭找到信古斋的徒弟傅凯臣，请他当鉴光阁的经理，于是鉴光阁又在琉璃厂开了张，这是 1936 年的事儿。另一种传说是，张瑞亭出资开鉴光阁，请张效禹当掌柜，傅凯臣协助。后来傅凯臣将张效禹挤兑走了。傅凯臣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南宫老家，惨

死在家乡。

傅凯臣，名林^庚，河北南宫县人。他经营鉴光阁 20 年，1956 年参加公私合营，归宝古斋。傅凯臣在宝古斋当业务员，鉴定字画。他的眼力不错，还懂古瓷。在 1946 年，他曾卖给韞玉斋范岐周一对嘉庆九江瓷紫地彩花勾莲茶壶、一对乾隆官窑金地粉彩盖碗、一对雍正官窑青花小瓶。这六件文物，很有价值，都属精品。这些珍贵瓷器都是鉴光阁的东家、收藏家张瑞亭的。这个时候的张瑞亭，已经不是给张大帅制做军装时候的张五爷了！人老了，家境趋于衰落，不得不把收藏多年的心爱之物卖掉。但老古董商照样称呼他张五爷。

九、文物整修复制和能工巧匠

整修、复制文物的能工巧匠，自古就有，但不曾明文记载，偶有记载则笼统而不详。清末以来，这种能工巧匠修复了许多珍贵文物，也制作出许多有艺术价值的文物复制品。他们对保护文物和继承发展我国传统的工艺技术，起了重要作用。

而有些人却把过去的整修、复制文物同造假作伪、蒙事骗人联在一起。其实不尽然。

中华民族有尊古的传统，整修、复制、收藏、保护文物，可说是尊古的表现之一。有尊古的传统，才有数千年的传统文化艺术绵延和发展。若不尊古，否定古代文化艺术，就不会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品保留至今。

以青铜器为例，历代均仿前朝，商仿夏、周仿商、汉唐以来仿三代青铜器未断，清乾隆以玉雕仿制三代铜器，惟妙惟肖，达到艺术雕琢的高峰。在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文物尚未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换时，整修、复制文物是保护继承发展文化艺术，并不是为了谋利。

明末清初以来，我国商品经济开始有了发展，乾隆年代的琉璃厂发展成为文化街市，文物在市场上交易。而这一时期无论是各种釉色、彩色瓷器的绘画烧制，还是各种玉石雕琢技艺，都发展到历史上的高峰。同时整修、复制各类文物的技艺也有了发展。

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后，侵略军大量掠夺我国珍贵文物，致使中国文物流入国际市场，特别是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一直到民国，中国文物流入国际市场的最多。有位文史学家认为，这一时期文物造假业恶性膨胀。这只不过是因为这一时期整修、复制文物的技艺有了发展，可以说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对真品流出国外，起了替代作用，保护文物免于外流。因而，将整修、复制文物一概说成是文物造假业，是否欠妥？笔者愿与专家探讨。

历代整修、复制文物不断，文物鉴定专家才出现。市场上的文物中有不少是经过整修的或者仿制、复制的赝品，就是历代传下的皇家收藏中也有复制品，这就需要各类文物鉴定专家来鉴别了。琉璃厂古玩铺出身的古董商亲身经历各类文物的整修、复制，对鉴定文物有独特的见解，故而在鉴别文物上有其特有的专长。这一点是学院培育出的鉴定人才无法与之相比的。因此，北平解放后，国家文物领导机关非常重视这类人才，并加以重用。

当前文物收藏家了解清末以来整修、复制文物的史实，有益于鉴赏收藏。收藏家亦应重视清末至民国年间各类文物的仿制品，其中却有“假赛真”的作品。研究收藏有艺术价值的仿制品，亦应提倡。名匠制作的仿制品而今已属罕见，能工巧匠的名字也早被人忘记。笔者仅将自己青少年时所知、老年时采访所得、有关这类艺术大师的史实事迹和珍贵的仿制品，记录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裱画业的历史和好手艺

琉璃厂的裱画铺手艺高超，闻名全国。清末民初以来，字画收藏家、书画家与著名的裱画铺都有来往。而看字画有眼力的书画鉴定家，有的人是出身于裱画业，有的会裱画。

古玩行有句话：“三分画，七分裱”，可见古旧字画装裱的重要。琉璃厂装裱字画的手艺，可称世界第一，裱画铺在早叫裱褙铺，用纸或丝织品做衬托，来装璜字画书籍，或加以修补、使之美观耐久。裱褙必两层，书画正面向卧者，谓之裱；以无染素纸衬托其背者，称为褙口所以叫裱褙。北京城至今还有裱褙胡同，很可能在明清时代，那里聚集裱褙铺。

北京装裱字画手艺是从苏州传来的，而称苏裱。传说在明代有位汤勤，绰号汤裱褙，清乾隆年有位徐名扬，都是从苏州来京城的装裱字画书籍的工艺师。他们的技艺高超，名闻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甚至皇帝。

苏裱技艺代代相传，精益求精。到了光绪年间，琉璃厂裱画铺装裱字画的手艺，精巧到旧书画虽破碎至不可分辨，甚至糟脆至呼气即能吹散的程度，仍能裱为原状，真可谓神乎其神，令人不可思议。

光绪年间琉璃厂的裱画铺有萃文阁、懿雅斋、存粹斋、竹林斋、修古斋、石墨斋等有名字号。民国初的名字号是竹实斋、智远山房、玉池山房、观古斋、绂文阁等。

笔者听到传说较多的是，竹林斋的刘林修、竹实斋的崔竹亭、云池山房马霁川等人有好手艺。

刘林修和崔竹亭合伙开竹林斋裱画铺，分手后，崔竹亭经营竹实斋，刘林修独自开办竹林斋。他们的手艺都好。经营字画古玩铺的掌柜们，给他们二人起了个绰号：“刘二寡妇”、

“崔三娘儿们”。为什么二位男子汉有这样的外号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干活心细手巧像妇女，另一方面是他们的音容相貌像女人。刘林修见人没笑容，脸总是阴沉着：崔竹亭说话慢言细语，嗓音似女人。他们装裱字画都有绝活，油渍碎裂的旧字画，经他们手，定恢复原样；填补残缺，看不出破绽。

马霁川在光绪三十二年先在竹林斋学裱画，后在竹实斋跟崔竹亭耍手艺。他把刘林修和崔竹亭的手艺、绝技都学到了手，1918年在南新华街长春会馆内开设玉池山房。

玉池山房装裱名人字画，也经营字画。马霁川的手艺精妙，玉池山房装裱字画很讲究质量，达不到质量要求，不交货，赢得了信誉。当时的北京政府和而后南京政府的要员、书画家、收藏家如林森、于右任、张群、张学良、张伯驹、张大千、溥心畲、徐悲鸿、齐白石等，都知道马霁川的名字。马霁川给他们装裱字画，也做他们的字画生意。

传说，张学良将军的一幅珍贵的手卷画，日久受潮，画面反铅，白脸人变成黑脸，经玉池山房整修、装裱，恢复了原样。于右任老先生收藏的宋元画，年久碎裂，马霁川加工修复。而张群先生收藏的古画，马霁川给装的最多。

玉池山房经营字画，注重书画的装裱。有的名书画是先装裱，再展出销售。由于装裱精细，衬托画面的色调协调，装饰讲究，深得顾客的欢迎。玉池山房经营过什么名画？老古董商们都说，明清的字画多，宋元的字画少。具体的实物，谁也说不出。

1948年，玉池山房曾搬迁到南京经营，则同南京政府要员们做装裱、销售字画的生意有关。后来南京的玉池山房迁往香港，改了字号，由马霁川的徒弟张金鼎经营至今。马霁川的另一位徒弟王禹平，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鉴定书画，被选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是书画鉴定专家。

拓红拓 裱行活

清末，琉璃厂除裱画铺，还有兼做裱行活拓红拓的古玩铺，字号墨宝斋。而有的裱画铺由于精于装裱，善于补描填补古旧字画损折失掉之处的笔墨丹青，又对古旧字画有研究。逐渐变为文玩处或藏画处的古玩铺。如玉池山房、萃文阁等家，均成为鉴定经营书画的著名商号。

墨宝斋原是家帖铺，从卖红拓、裱行活，艰苦创业，成为鉴定经营碑帖书画的著名古玩铺，在琉璃厂开设 54 年，1956 年加入公私合营。

什么叫红拓？清代的文人墨客吟诗作对的一些诗词对联，不像今天这样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而是在木板上刻文字，再用纸拓，拓成红色的字，再装裱成拓本，叫红拓。这种红拓在文人中时兴流行，进京赶考的举子买来，相互馈赠。

什么叫裱行活？就是给南纸店装裱书画拓片，成帖的形状。南纸店卖新字画，是当代书画家之作，也卖古字画的拓本，就是将古代名书画临摹后木刻，再拓成拓片，进行装裱出售。荣宝斋南纸店创造木板水印画，代替了这种古书画拓本。裱行活这份手艺和生意，也就逐渐消失了。

阎御笔和张明

《古玩指南》“书画之作伪”一节中说，有的古玩商号招收十岁上下的儿童做学徒，不让他们学习古玩铺的知识，先令其每人任意书写绘画，约半年之久，由铺掌斟酌何人长于写字何人长于绘画，凡有一长者留之……让他终年累月地临摹古代名人书画，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终有一二可以乱真者……

意思是说，古玩铺里专门培养摹仿作伪的学徒，做出假书画骗人。琉璃厂古玩界中老一代的书画鉴定家对此颇有反感，说古玩铺里培养不出这路书画家。古书画中的仿作绝大部分出自书画家之手，自古就有。国画大师张大千曾摹仿王石谷的山水、仇十洲仕女之作。

清末民初，琉璃厂观音阁却住过仿乾隆御笔的阎善之，绰名“阎御笔”和仿古书画家名款的张明、张鉴轩老先生。

阎善之仿乾隆御笔字，行家都说是“假赛真”。民国十年前前后后，收藏古旧书画的新权贵中热衷寻觅带御题、落臣字题的书画。阎善之、张鉴轩恰逢这一需要，为古旧书画题上乾隆御题，落下臣字款的不少。而今除了刘九庵，谁又能辨别得了呢！刘九庵是行里出身，知道这段历史，又有好眼力。

官窑瓷器的仿制和后挂彩

清代，朝廷严禁臣民买卖、摆设、收藏皇家御器厂烧制的官窑瓷器，但据说，有一种“赏瓶”例外。赏瓶是专为皇家赏赐给大臣而烧制的。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官窑瓷器渐渐在文物市场上出现了。随之，官窑瓷器的仿制品和旧胎后挂彩瓷器也慢慢出现。

据古玩老行家讲，仿制官窑瓷器是在江西景德镇窑厂，烧制后挂彩瓷器是由景德镇来的技师，在北京架起小窑烧造，故而后挂彩瓷器，也叫小窑瓷器。

清王朝覆没后，御器厂随之取消，民办窑厂也可以烧造有年号款的瓷器了。这路有年号款的瓷器由各地细瓷店销售，当时很是畅销。开始时民窑烧制有年号款的瓷器不十分讲究，作为民间摆设和嫁妆货。

自1913年春节至1915年中秋节，郭世五在景德镇给袁世

凯烧造“居仁堂”款识的瓷器，同时也给他自己烧制“觥斋”款识瓷器之后，接着便有从古物陈列所拿来宫里收藏的官窑瓷器作标准，在景德镇窑厂照样仿做。这路官窑瓷器的仿制品非常讲究，瓷胎、瓷釉、绘画、彩色都很考究。

御器厂散摊子前，光绪二十九年筹办，宣统二年正式成立了官商合股的江西瓷业公司，公司的设备和技术力量最强。1913年，郭世五利用这家公司的实力，又用重金聘回原御器厂中的造型、上釉、绘画、填彩、焙烧之技术名匠，选用精良瓷土、彩料、燃料等，先进行实验制作，不惜工本反复试作，精益求精，不达标不罢休。所以，郭世五督造的“居仁堂”、“觥斋”款识的粉彩瓷器，精致细腻，绘工精美，彩色娇妍，十分名贵。专家们讲：“这是中国瓷业史中的一朵复兴之花，但仅仅昙花一现罢了！”有“洪宪年制”款的瓷器则大为逊色了。

民国六年（1917），北京前门大街德泰细瓷店副经理刘勉之在景德镇开始烧制仿官窑瓷器，当时传说是给古物陈列所复制的。古物陈列所提供样品，刘勉之利用郭世五创办仿制官窑瓷器的技术设备和名技师，烧造出精美的复制品，连鉴定名家难于鉴别。但复制品的数量有限，最多只是三五件。这路复制品可谓精妙绝伦，同后来德泰细瓷店在门市销售的有明、清朝代年号款的细瓷器，真可谓有天壤之别。

紧随德泰细瓷店之后，天津锅店街同泰祥细瓷店经理李春生也到景德镇窑厂烧制有明清朝代年号款的细瓷，在天津市场销售。民国十年前后，同泰祥在景德镇有窑场有库房，生意兴隆发财了。他们也用真官窑器作标准，照样仿作，同样生产可以乱真的瓷器。1946年，张群为蒋中正祝六十大寿的九龙瓶，就是同泰祥仿乾隆御窑瓷器。

若从1913年算起至1948年解放前夕，35年里，仿制明

清官窑瓷器知多少？其中珍品也不下数万件了！谁能鉴别其真贋，惟有笔者的师兄孙会元和耿宝昌了。这段仿制的历史，他们知道，有段历史他们亲身经过。同时，他们的眼力也好。

官窑瓷器从光绪二十六年，逐渐从皇家御用走上国内外文物市场时，清廷内务府的人管理着北城瓷器厂，那里积存着历代选剩下的没上釉、没上彩的素瓷器胎子还不少。被古董商发现，开始在素胎上做文章。从江西景德镇请来绘画填彩、焙烧技师，架起小窑，烧造旧胎后挂彩官窑瓷器了。

后挂彩，就是在官窑瓷器的素胎上绘画出各种图案，填上各种彩色。或烧成青花瓷、青花釉里红，青花瓷器上挂黄彩等等。后挂彩的技师手艺好技术高，一专多能，会画会填彩还会烧窑。这路瓷器难鉴别真贋，可是，一到孙会元、耿宝昌的手上，马上就知道是后挂彩的了。后挂彩的技师刘永清跟他们岁数差不多，彼此都熟悉。

詹远广制作珐琅彩瓷碗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将一对乾隆御窑珐琅彩瓷碗上交国家。这对碗彩质细腻如涂脂，彩色鲜嫩，画工极其工整。经陶瓷专家鉴定，乃是旧胎后挂彩、仿“古月轩”惟妙惟肖之作品。

捐献人是东四牌楼荣兴祥经理贾腾云之后裔。贾腾云之弟子司仁甫证实，这一绝妙佳作出自詹远广之手。

詹远广，江西景德镇人，工绘画，1903 年自景德镇来京，为古董商制作仿明清官窑瓷器的后挂彩。他手艺高超，制作后挂彩的工价极高，一般古玩铺做不起。他给荣兴祥制作这对碗，工价是 400 现洋，工时近一年。贾腾云老先生出于维护荣兴祥的信誉，收藏这对仿“古月轩”碗多年，不肯出手。

詹远广技艺超群，他的作品是在原瓷胎上挂彩，画工精细，彩头与原品一致，故难辨真伪。但因技艺未传人，作品极少，又有鸦片嗜好，最后默默无闻地死掉了。

后挂彩名师巧匠詹兴祥、刘永清

詹兴祥，安徽婺源县人。民国初年来北京，住东珠市口石虎胡同，专门补修瓷器和烧制后挂彩瓷器。他的工价低廉，作品较多。30年代，詹兴祥给人烧制的雍正官窑粉彩五寸盘，原系雍正斗彩，盘内素白，盘外斗彩花卉。詹兴祥在盘内加工绘制五朵小花、填粉彩，成为既有斗彩、又有粉彩，彩色特别致的文物。至今仍有一对盘子落到某古董商后人之手，见价二三十万元，不肯出手。

小窑焙烧瓷器，没有电炉，温度很难掌握，詹兴祥掌握炉窑温度，全凭经验。配色填彩是工艺关键，配出的彩色经焙烧要与原品彩色一致，才算成功，詹兴祥的配色绝活，传给了徒弟刘永清。刘永清发展了他师傅的技艺，成为后挂彩工艺技术之名师。

刘永清，河北安平县人。30年代初来京学徒。先学绘画、写款，后学配色填彩、掌握炉窑火候。40年代初，刘永清独立烧制后挂彩瓷器，他绘制、焙烧出仿明清官窑彩瓷数百件，其中以明万历官窑素白大盘，添仿万历五彩鹭鸶卧莲；康熙官窑青花梅瓶，增添黄彩；雍正官窑素白碗，添仿雍正粉彩牡丹，最为出色。万历五彩鹭鸶卧莲盘，收藏在某博物馆，作为一级文物保管；康熙青花黄梅瓶于1944年，由上海收藏家乐笃周收藏；雍正粉彩牡丹碗四对，宝古斋于1945年以每对400元的价格，出售给日本山中商会。

复制官窑瓷器，刘永清以仿雍正青花瓷和康熙釉里红瓷为

最佳，但作品极少。刘永清复制后挂彩官窑瓷器，名闻国内外，50年代香港古董商聘他出国去巴黎献艺，他婉言谢绝。70年代末，被北京附近某陶瓷厂聘为工艺师，复制明清官窑瓷器，但多为一般产品，精工细作之产品甚少，1982年辞退，年已衰老。

刘永清技艺高超，脾气倔犟，技术保守，不肯传人。他将绘画、填彩、写款等一般技艺传给徒弟，而配料、配色、烧制青花瓷、釉里红的焙烧技术绝活，从不传人。当他想将绝技传留下来时，已是步履维艰，双手颤抖。虽经友人奔走推荐，却无人合作，终未如愿，辞世而去。

李焕章修理、复制唐三彩

唐三彩陶器制作，始于唐代李世民之后、高宗李治时代（650—683），盛兴于李隆基当皇帝时的开元年代（713—741），辽代仍流行，以后逐渐衰落，多用做冥器，即古代殉葬器物。民国以来，西安、洛阳两地的唐墓出土唐三彩陶器数量最多。出土的唐三彩陶器，有的完整，有的破碎。整修唐三彩陶器，是一件特殊的专门技艺。

1913年，琉璃厂云松阁古玩铺老掌柜之长子李焕章（1892—1965），因与继母不和，分居另过，独自一个人跑洛阳收购唐三彩陶器。他将破碎的唐三彩携回北京，自己研究修理。开始时是刷洗后，粘粘补补，手艺粗糙，后来逐渐研究出一套整修、复制、建窑烧制的工艺。李焕章终于成为北京城整修唐三彩的著名艺人。

破碎的唐三彩陶器，经李焕章恢复原样，看不出破碎痕迹。他复制的三彩陶俑，体态匀称，神形俱佳；他制作的陶马，头小脖长，眼睛有神，仰啸、饮水、奔走、负重，形态各

异，富有生机。

李焕章和琉璃厂古董商来往甚多，谁家有活，他都给修，给岳彬、夏锡忠整修、复制唐三彩陶器最多。他修复唐三彩陶器数以千计，但一生积蓄无几，留给他的子孙的是整修唐三彩技艺。他乐观、诙谐，爱说笑话，爱聊天，但不谈他如何修复陶、瓦器的手艺，也不说给谁做了什么样的唐三彩陶器。

李焕章对琉璃厂古玩行的掌故、趣闻轶事知之甚多，又爱闲聊。1950年，他同裴振山、赵振茂、王德山联合组织整修、复制青铜器、陶器和石刻浮雕等文物，叫文物整修加工部，设在琉璃厂裴振山开的振寰阁内。1956年公私入营后，振寰阁划归文物商店，文物整修加工部划归北京文物局，改称美术加工部。

李焕章、赵振茂、王德山是修复青铜器、唐三彩的技师，今可称之为大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们做出过贡献，为国家修复三代铜器、唐代瓦器、北魏浮雕，并进行过复制工作。

李焕章在20世纪50年代，曾被选为北京市宣武区政协委员。

青铜器的修复和仿铸

老古玩行讲究夏、商、周三代和秦、汉两朝的青铜器。这以后的青铜器统称之为“新铜器”，也叫“仿铸”，就是按照三代秦汉铜器模式仿造的。行家讲，唐代的仿铸好鉴别，这路铜器上大部分有监官花押，但有的花押被磨平或灌铅整平，可是细看铜质，不是发红就是闪白，跟三代铜器的铜质不一样。唐代“开元之治”时，在江苏西南部句容县设置官场，专门仿铸三代铜器，延续二百多年，到了南唐后主被赵匡义派人毒

死后，官场的仿铸才停止。宋代又有台州铸，元代杭州姜娘子、平江路王吉铸等铜器皆出名，世称“野铸”。

清乾隆年间以后，出现“苏州造”、“潍坊造”、“西安造”、“北京造”，这四个地区仿铸的三代铜器是各具特色各有所长。开始都是从修复新出土的铜器进而搞仿铸。老行家讲，搞仿铸是苏州较早，早在散氏盘出土后，曾按样翻沙仿铸，较晚的是北京，北京主要是修复铜器的手艺精巧、补纹、补损、作锈等技艺高超。一件铜器刚出土时，散在土中，看不出是何器物，七零八碎的铜片、块，经修铜器技师之手，可说是“妙手回春”，恢复原样，是鼎是彝，是□是尊，这时人们才能看出来。整旧复原仍如旧，三代铜器神韵再现，令人叫绝，叹服不已。

这份神妙手艺有其演进过程，并有代代师传，至今未断，十分令人心慰。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古铜鉴定专家程长新师兄生前同笔者讲，他听他的师傅岳彬说，从前修古铜在皇宫里有位太监，原姓于，他的嘴有点歪，人称他“歪嘴于”，真名没传下来。歪嘴于会修铜器，他给皇上家修补损伤的铜器，手艺好，被内务府看上，请他到造办处传艺带徒。我们掌柜的（指岳彬）学徒时，歪嘴于还活着，他开了万龙合古铜局，收了些徒弟，帮他干活。其中小徒弟张七儿，大名叫泰恩，比岳彬大四五岁。岳彬进京学徒才两三年，歪嘴于去世了，老宫不生育没儿子，张泰恩给他打幡送殡发丧，万龙合归张七儿了。民国了，“万龙合”字号改为“万隆和”了。张泰恩当师傅，先后收了六七个徒弟，给古玩铺修铜器，古玩行人叫他“古铜张”。万隆和古铜局没“古铜张”这名儿叫得响。古铜张有个侄子张文普，字济卿，13岁跟他叔父张泰恩学徒，二十多岁时就有了好手艺，这个人心细手巧，遇着活儿善于琢磨，人称

他“小古铜张”。小古铜张修复铜器的技艺发展了。

张济卿整修、复制青铜器

1928 年在我国河南安阳小屯一带，开始发掘殷墟。在这以前，北京古董商便有人驻彰德府，称之为彰德府客商，他们在当地收购青铜器，到北京销售。

有位北京古董商，为了将青铜器收购到手，便采用“论坑包”的办法，就是挖前同挖掘人讲好价钱，挖出的东西不论好坏，全部包下来。那时，私人偷挖的土办法是用竹杆探，发现深层土松，便同古董商一起观察、讲价。讲好价，古董商蹲在坑边看着挖，挖出后不论完整与破碎，古董商将青铜器全部拿走。

古董商的坑里有破碎青铜器，便想办法请人修补。以前，北京没人会修带锈的青铜器，只有修补黑铜器的手工作坊。

张济卿，河北冀县人，年轻时在北京东晓市万隆和修补黑铜铺，跟他叔父张七学徒。他学会了修补黑铜器的好手艺。当有人请他修理带锈青铜器时，他钻研试做，逐渐练好了修青铜器的手艺。

30 年代初，张济卿修理青铜器的手艺闻名于京、津、沪的古玩行业。他整修“新坑”（即新出土）青铜器的手艺，能将一堆破碎古铜片，恢复成原来青铜器的形状，外行人看不出破绽。

张济卿修理“熟坑”青铜器的手艺同样高超，出土年久的青铜器（熟坑），有的器物上花纹磨浅，看不清纹饰，有的损伤不成形状，经他手修饰、补缺，花纹显露清晰，损伤之处补缺完整。锈色不好的青铜器，他能做出好的锈色。他还会在青铜器上雕刻铭文。

天津有位古董商买了件缺腿的铜鸭，经张济卿整修，完美无缺。他将其卖给了北京古董商，用卖古铜鸭的钱，换回一家小古玩铺的股金，成为佳话。

张济卿复制青铜器也有“绝活”，他给北京古董商复制仿北魏金人造像三尊，远销美、日、德三个国家。他一生整修、复制青铜器很多，给彬记和同益恒古玩铺整修、复制的东西最多。但无人记录他整修、复制的器物名称、件数。而且一些古董商对此相当保密，不外传、不泄露他们卖了些什么青铜器。

北平和平解放后，“三反”、“五反”运动中，岳彬盗毁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案发，张济卿同岳彬对簿公堂，证实《帝后礼佛图》为洛阳运来的一堆碎石块，由他手工复制。岳彬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病死在狱中。

张济卿在日伪时期加入“一贯道”，当过“点传师”，镇反运动中被判刑，1965年死于东北狱中。

古铜张修复文物后继有人

古铜张的徒弟有七名，其中三名将修复古铜的技艺传给门徒，并有发展。小古铜张的徒弟有七名，其中有四位在解放后发挥了技艺专长，技艺有提高。他们是：高英、张兰会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赵振茂、李会生在故宫博物院，都在继续从事修复青铜器和其他文物的工作。

贡茂林有两位徒弟：孟海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王存计在辽宁省博物馆工作，为修复文物做贡献。

王德山的技术强，手艺好。解放前给琉璃厂尊古斋、通古斋修理青铜器较多，是黄伯川修复古文物的左右手，黄家鉴定经营金石文物发了大财，号称黄百万，其中就有王德山的功劳。解放后王德山曾在振寰阁内、裴振山办的文物整修加工部

工作。公私合营后归北京特艺公司文物修复部，1958 年进入北京市美术公司工作。他发明给铜器做假地子即“漆地磨光”，做假锈即“点土喷锈”，化学做锈等。他的手艺同张济卿比不相上下。而他的门生后继有人，徒弟贾玉波技艺高超。贾玉波有五个儿子，都继承父业做文物修复工作，形成“贾氏文物修复之家”，将古铜张的技艺传留下来，并有了大的发展。

贾玉波和他的五个儿子

贾玉波，河北东鹿县人。1935 年由黄伯川的徒弟乔友声带来北京，拜在古铜张的传人王德山门下，学修理古铜，那时他才 13 岁。1942 年学成出师后，给琉璃厂古玩铺修理青铜器，手艺巧、技艺高。当时，古玩业生意萧条，他的活儿也就不多。1947 年，在琉璃厂以修复古铜器与掩护，为北平南城地下共产党做情报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初期进市军管会工作，后派到市粮食局当干部。1959 年，同他师傅王德山一起转入北京市美术公司，重操旧业，做文物修复工作。

贾玉波、王德山和高英、赵振茂等老古铜张的传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代文物修复工作者，开创了新中国的文物修复事业。1959 年，贾玉波转入美术公司，重操旧业，被中国历史博物馆邀去，参加通史陈列筹展工作。他同王德山、高英等人共同修复和复制了著名的司母戊大鼎、四方羊尊、龙虎尊、虢季子白盘、大盂鼎、犀牛尊、越王勾践剑、石寨山贮贝器、铜漏壶及陶器、石器等大型珍贵文物数百件。

20 世纪 60 年代，贾玉波应邀参与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修复、复制文物工作；1964 年为陕西博物馆复制多件金银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参加了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

大批珍贵文物修复工作。

80年代初，贾玉波离休前后曾修复和复制秦铜车马。约于1983至1984年不到一年间，复制出一套秦铜车马，成为我国第一套铜车马复制品，惟妙惟肖，达到乱真程度。1986年，在香港文物展览中的展出，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金枫同志见了后，以为是陕西的铜车马运来了，当他得知是贾玉波复制的，十分惊讶，赞叹其手艺高超。在展出期间被日本考古界人士买走。

贾玉波技术不保守，他教了很多徒弟，桃李满天下。他的五个儿子均子承父业，又有新的创造。

老大贾文超，1948年生。现在是北京故宫博物院馆员、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中国博物馆学会、北京市文物保护学会会员、东方收藏家协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他拜在赵振茂门下，又有家传，为故宫和全国各地博物馆修复过许多珍贵文物，并注意总结经验书写成文，发表了论文准备出书。

老二贾文熙，1950年生。中文专业大专毕业，平时注意对各类器物的修复过程进行记录及资料整理，他的《文物养护复制适用技术》一书已出版发行。他现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研究室馆员，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中国文物通讯》、《中国文物修复通讯》执行主编。近年来，他在河南、陕西多处考古工地，配合现场发掘，抢救性保护修复众多的珍贵文物。特别是参与了列为1990年、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三门峡虢国墓和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大批西周青铜器抢救性修复工作。

老三贾文珊，1953年生。小学毕业遇上“文化大革命”，无事可做，看父亲干活，经常搭个下手。中学毕业分配在汽车

修理厂当工人，心灵手巧，修汽车的活儿样样通，又会开汽车，曾开汽车跑长途。父亲退休后在家给军事博物馆修复些文物。他帮助父亲干活儿，翻制模具、修刻铜胎，用自己娴熟的钳、钹、焊技术，探索在文物复制中应用，并有成就，制作出五分之一的1号、2号铜车马等多种文物复制品。

老四贾文忠，1961年生。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毕业，九三学社社员，中国农业博物馆馆员。“文化大革命”后的1979年贾文忠参加工作，先后在北京市文物局、首都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复制、征集、鉴定工作。他修复过北京孔庙大成殿清代皇帝御书匾，国家重大考古发现工程江西新干出土的商代卧虎铜方鼎，曾担任河南三门峡西周虢国墓地出土文物修复主持人之一，修复几十件重要虢国文物。在报刊上发表过数十篇专业论文，著有《文物修复与复制》、《贾文忠谈古玩赝品》，并在文物部门组织的培训班授课，也为有关大学文物班担任文物修复课的授课，做兼职教授。他现在担任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博物馆学会保管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文物科技保护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还有其他社会职务。

老五贾文进，1963年生。他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打倒一切”的口号声中度过的。学校停课他跟父亲学干点修古铜技术活儿，高中毕业后接父亲的班，进了北京市文化局属美术公司文物修复厂，从事文物复制工作。他继承了父亲的传统修复技术，干了将近20年，镶嵌金银器、篆刻青铜器纹饰和青铜器化学与传统做旧，是他的拿手好活儿。他曾随文化部“中国文物大展”赴韩国，在汉城艺术殿堂组装起由他们仿制的秦1号、2号大铜车马和多件青铜器，受到好评。他是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文物修复委员会会员。

笔者写至此，不由得想起琉璃厂“吃金石”的老行家夏锡九、夏锡忠。清末民初夏氏弟兄在国内外古玩界出了名。他们的父亲是给皇上家维修颐和园的木匠，家住京西六郎庄，他们弟兄五人，人称夏家五虎，给六郎庄添了生气。而古铜张的传人贾玉波所生五子，可称是“贾氏文物修复之家”的“五虎”，给我国文物修复事业带来了生气，可告慰于“歪嘴于”和“古铜张”矣！他们使我国千年古物重放光彩，修复古文物的技艺代代相传，可以告慰先人矣。

古瓷镶口、配损和做旧

宋代定窑烧制的盘、碗等器皿，口部无釉，行话称之“有芒”。为什么有芒？原因是定窑采用覆烧工艺。覆烧是宋代瓷器入窑装烧方法之一，就是将盘碗等器皿扣过来装入窑内烧制。这种装烧方法节省燃料，提高产量，但器皿口部无釉。俗话说“古瓷毛边不值钱”，何况有芒无釉。传说，北宋宫廷不用定瓷。

但宋定窑瓷驰名中外，虽有芒，仍不降低其艺术价值。然而，定窑白瓷盘碗口部露胎，观之不雅，故而研究出弥补办法——镶口。定窑盘碗胎薄者居多，价值又高，一般手艺不敢做镶口活，稍一不慎就有损伤原物的可能。

诚和、义兴两家首饰楼专镶古瓷，并能配损做旧。民国初年，诚和楼老掌柜陈子晋之三子陈中平在琉璃厂致宝斋古玩铺学徒，后转回诚和楼学做银活手艺，开设义兴首饰楼。他见宋定窑瓷碗、盘等器皿釉色洁白，口部都露胎，观赏失雅，便同师弟李茂山研究镶口技术，承做宋瓷镶口活。

镶口工艺简便、用料不多，但手艺精巧，用紫铜叶镶口。紫铜叶呈黄色需做旧，做旧的方法是：用木炭磨铜叶、抹香

油、灯火吹烧呈栗色；在紫铜叶上涂抹硝酸银，则呈黑反绿色。工艺关键是紫铜吹焊接头和镶入，量准器皿之直径，乘以3，算出圆周长，下料，吹焊接头，长短准确不差分毫；做凹做圆套入瓷口，必须严丝合缝，不大不小。再用手工压紧，用蜂蜡或孩儿茶封住。检验质量的方法是用手敲器皿。耳听无“叭”、“沙”声，与原物的声响一致为合格。

这种简单工艺做出的镶口，使定窑瓷器釉色洁白，口部呈现出古雅栗色或黑反绿色，古朴美观。

配损，是指古瓷若损伤盖、耳、执攀，用银、铜照样镶配完整。40年代初，李茂山、张汉儒镶配雍正官窑豆青色凸龙薰炉，最为出色。

岳彬有件雍正官窑仿汝釉凸花龙大薰炉，高约1.2米，三层：盖、肚、底。底足是三只虎爪抓地；盖部龙钮，龙头向上开口；腹部八耳，耳是凸花五爪龙，是皇宫里使用的薰炉，腹部原有铜算子，上放香料，底部燃烧檀香木，香烟由盖部龙钮上的龙口喷出，是件珍贵的皇帝御用之文物。可惜损掉了六个耳子。

李茂山、张汉儒工匠艺师，照留在薰炉的两个耳子的原形图案绘制图样，按样下料，鑿出凸花龙，制作鎏金耳。制作出的六个耳子，形状、图案、花纹同原耳一模一样，大小相同，再加工做旧，镶嵌在薰炉腹部损掉耳子之处，不露伤损痕迹。手工之精巧，令人叫绝。

岳彬指着薰炉，向他的外国顾客介绍说：“薰炉在皇宫里伤损六个耳子，由宫廷造办处整修，配鎏金耳，仍留宫廷使用，是真正大内的东西。”这件珍贵文物已远销国外。

做旧，是将新制作的复制品做成旧的颜色。一件“四不像子”新作铜器做旧成功，颇有名声。

1941年，彬记古玩铺送来一件造型奇特的新铜器：角似

鹿非鹿，头似马非马，身似驴非驴，蹄似牛非牛，俗称“四不像子”的卧式麋鹿，长约3市尺，高1.5尺。要求诚和、义兴首饰楼给加工做旧。经李茂山研究，涂抹硝酸银，再用矾水煮，煮一段时间，抹一次硝酸银，晒干再煮，涂抹十余次，煮了二百余小时，终于由黄色变成黑反绿色，但无锈斑。再埋入尿窝子里头（土厕所的小便处），天天浇尿，经过夏季的伏天，寒露时节起出，则见铜“四不像子”全身绿锈斑斑，似新坑出土文物。

彬记用这件新铜器，冒充周代造型奇特之珍贵文物，卖给了西洋人。

镶口、配损、做旧这套古老、落后工艺，是手艺人实际操作中积累的经验，过去曾严格保密，不外传。有这套手艺的工匠名师，现只剩下张汉儒一人。80年代初，曾有人聘请他去香港或日本，重操旧业，他谢绝了。而今他蛰居北京。

名贵装璜和硬木雕刻

装璜一词解释有四：装裱字画；装订书籍；装饰门面；也有掩饰的意思。这里所说的装璜是指珍贵古玩用名贵的织锦、丝绸软囊盒、匣装藏。做这种装璜的，在琉璃厂有家瑞成斋老字号，做出的装璜，手工精巧，美观大方。

凡是珍贵的文物，古玉、古铜、陶器、瓷器、古墨等等，都要做装璜，便于收藏。例如古墨，明清时代就注重装璜，一块名墨有原装漆盒，这漆盒又分为平漆、雕漆、雕填、剔红、戗金、填漆、堆红、螺嵌等等。漆盒外边还套上锦盒装璜。甬说墨，就是漆盒、锦盒，也是精美的手工艺品，亦可称文物了。

做装璜的好手艺人留下姓名的人很少，现只知瑞成斋这家

老字号了。

字画、缙丝等文物，要配好硬木雕花镜框，陈设起来大方美观，又能保存长久；青铜器、古玉雕、陶器、瓷器等文物，一般都配上硬木雕花座。做这路活的作坊叫小器作，原先有复盛斋小器作和隆茂永小器作较出名。

硬木指的是质地坚实致密的木材，像花梨、紫檀、黄杨、楠木等。一块紫檀木材上，雕刻出山水、人物、鸟兽、飞云、瀑布等等，艺术性非常高；黄杨木上的雕刻镶嵌上珠宝钻翠，则更加名贵。

小器作给古玩铺做雕花硬木座较多，整旧复原的活也不少。好铜器、瓷器都配雕花硬木座，特别是名贵的康熙官窑豇豆红柳叶尊必须配座，不然，看起来似乎立不稳。清末民初，东晓市上的一些明、清硬木雕花的镜框，镜支（梳妆匣）、佛人、五供座托，各种玩物摆饰的雕花硬木座等等，已经破、旧，有的已经不成型，古董商买了，经小器作好手艺人修理，可整旧复原。大的小器作还可整修硬木家具。

隆茂永小器作的张绍永的手艺高超，1930年他给琉璃厂雅文斋修复的乾隆木雕“八蛮进宝”，补配之处，可称天衣无缝，看不出任何破绽，由吃洋庄的贾尽忠卖给英国古董商。20世纪30年代初，传说“八蛮进宝”乾隆木雕进了英国皇家博物馆收藏。

第三章

这一章写古玩、珠宝玉器。琉璃厂以外的古玩、珠宝店铺很多，前门外廊房二条曾是中外驰名的玉器街。珠宝玉器行业同古玩行业有联系，但不属同一行业。1951年至1953年，统称为历史艺术文物物业，1953年至1956年，称之为文物物业，后又叫外贸文物物业。据1951年统计，属于文物物业的有940户，没字号的买卖未统计在内。这么多家店铺，人物上千人，不能面面俱到，只能将风云动荡中、较有影响的人物和著名商号以及逸闻琐事写出来，以飨读者。

一、古董沧桑

古董出口公司和祝续斋之起落

卢吴公司是我国私人开办最大最早经营古董的外贸商号。中国的古董何时引起国外人士的注意和重视？老古董商都说是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他们是抢完以后烧的，当时的洋兵身上带着很多我国珍宝，走路时迈门坎都抬不起腿来。这些宝物在英国、法国大放奇光异彩，引起英法皇家贵族、豪门、富贾的兴趣。他们把中国古代艺术品作为珍宝收藏或陈设，以显示其尊贵。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再次大量掠夺我国历代文

物。琉璃厂有字号的古玩铺没有一家幸免洗劫的。世界列强除用武力掠夺，还用金钱收买。清政府腐败堕落，根本不管国家珍贵文物外流；清末民初，宫里的国宝还有许多抵押在国内外银行，逾期不赎，流出国外；北京政府同样不管文物外流问题，有的权贵还用国宝献媚于“国际友人”；南京政府也同样如此。那时的当权者，不管老百姓做古董生意的事。做买卖就是赚钱，赚外国人的钱有什么不好，这是人们一般的心理状态。1952年，税务人员询问一位老古董商：“以前你卖过多少古玩给外国人？”他发怒说：“我做买卖，有营业执照，国家许可的，卖给谁，你管得着吗？！”

清光绪年间，法国政府官员魏武达（法国驻清政府的第三公使），在北京买古玩运往巴黎。民国时，他卸任回国，在巴黎开设古玩店，北京的古董商岳彬给他进货。1890年，浙江吴兴人卢钦斋去法国巴黎做古董生意。卢钦斋在法国娶了位法国夫人，生了个女儿嫁给法国人杜伯斯。杜伯斯长期住在中国，是位中国通，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他经常到琉璃厂古玩铺、书铺走走、转转。一次，一家古玩铺学徒不认识他，问了一句：“你找谁？”杜伯斯用地道的北京话纠正说：“你不应当这样讲话，应当说：‘您来了，请坐，您有什么事，我去找掌柜的。’”

1911年，卢钦斋同上海的吴启周合伙开办卢吴公司。这家公司一直开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公司名义上虽取消，但吴启周仍然做出口古玩玉器的生意，由他的外甥、绰号“叶三”的叶叔重代理，沈建华等人帮他进货。这家公司从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年累月向外出口文物。1952年，叶三因走私文物被判刑，发往新疆，老死在西北。

1911年至1926年，这15年由卢钦斋、吴启周、祝续斋、缪锡华四人合伙做洋庄生意，卢吴公司没打出招牌，算是准备

阶段。据祝续斋讲，在法国有张静江的支援。张静江是国府要员、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拜把兄弟。

卢钦斋在巴黎，由上海的吴启周和北京的祝续斋和缪锡华给他进货。吴启周、祝续斋、缪锡华在中国买古玩，包装、托运，运往巴黎，做法国庄的买卖。法国人喜爱康熙三彩、法花、抹红、茄皮紫、孔雀绿等釉色瓷器，还有青铜器、石雕、瓦器等。吴启周、祝续斋、缪锡华就给卢钦斋进这路货，法国人魏武达也买这路货。俗话说：“行市是买起来的，没人买，行市就下去。”那时的康熙三彩和法花等古陶瓷器，价格涨得很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由于战争消耗，财力下降。做古董生意必须找有钱的人，国泰民安，民富国强，才有人玩古玩，卢钦斋很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从巴黎迁往纽约，继续做古董生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美都重视收购中国文物，政府和各博物馆搜集中国文物，作为珍贵的欣赏品和收藏品，其中以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法国卢浮宫收藏中国文物最为丰富。美国的福开森在中国搜集文物近 60 年。卢钦斋由法国庄转为美国庄，为美国搜集中国文物。在上海的吴启周、在北京的祝续斋、缪锡华改为给卢钦斋进铜器、石器、陶器和钧窑瓷器等货。那时，一件颜色好的宋钧窑笔洗，他们可花上万银元收购，运往美国售价更高。美国人不惜重金，收买中国文物，只要是真的、不是仿制品，中国古董商要多少钱，他给多少钱。卢钦斋、吴启周、祝续斋、缪锡华合伙干了 15 年的法国庄、美国庄的古董生意，发了大财。1926 年他们分开了。卢钦斋仍在美国，吴启周还在上海，卢吴公司的牌子正式打出来了。吴启周约请北京的王栋廷给他进货，后又派自己的外甥叶叔重跑北京进货。吴启周、叶叔重成为三代铜器、

陶、瓦、石器、浮雕、造像、唐三彩、宋元瓷的最大收买者和出口商。

祝续斋、缪锡华分出来后，各奔前程。缪锡华回江南开办织袜工厂。祝续斋在河北武清县老家盖房子，开粮行办烧锅，在北京买了几所房子，花 10 万元从俞淮清手中将延清堂的全部货底倒到手里，祝续斋成为琉璃厂最富有的古董商，人们称呼他“祝大爷”。

提起“祝大爷”，琉璃厂的老古董商都知道他原名叫祝维先，因说话口吃，绰号“祝结巴”。他生于光绪十年（1884），光绪二十四年，由武清县进京在琉璃厂一家古玩铺学徒。今天谁也说不清他是哪家古玩铺的徒弟了。但还有人知道他在民国初年自己开设大吉山房古玩店，经营金石。他鉴定青铜器有眼力。在他同卢钦斋、吴启周合伙做的 15 年的洋庄生意中，经营过许多商周青铜器，对铜器的选型、花纹、锈色、铭文都有自己的见解，是一位有声望的金石鉴定家。

1927 年，祝续斋将延清堂的房子和全部货底倒到手里，又花一万多元，修饰延清堂的房子，院子上面盖起玻璃大罩棚。但他自己不在这里开古玩铺，把全部货物搬到他的住所冰窑胡同，将修好的这所铺面房分给他大儿子祝荫亭。祝荫亭少爷出身，读书不成，什么事也不会干，就是爱唱京戏，同梨园行的人打交道，是位余派的名票老生。祝荫亭把琉璃厂这所铺面房卖给萧书农，卖价只是他爸爸修饰房用的一万多块钱。萧书农于 1928 年在延清堂的旧址，开设雅文斋。

祝续斋的女婿李英，在雅文斋学徒。因有这种关系，祝续斋想把延清堂的货底，打折扣由雅文斋代为销售。萧书农胆小，怕卖不出去，无钱抵偿。后来他想代为销售时，好货已被别人买走，萧书农只买了件紫檀桌子。祝续斋将他倒过来的货底卖光，钱也逐渐花光。在武清县开的粮行、办的烧锅也没经

营好。

祝续斋跟卢钦斋、吴启周做了 15 年的大买卖，一件货赚个万八千不算什么，养成习惯，不愿做小号生意。琉璃厂的古玩铺多数是买卖些古瓷、字画、端砚、印章、杂项等文物，积少成多，缓慢致富。成千上万元一件的古董很少。祝续斋不善于经营这种小买卖，吃大号吃惯了。他热情一上来，拿钱就办。他曾出资几万元，开华古山房古玩店，一看赚钱慢，觉得不新鲜，又倒出去不干了。一开一停，一出一入，折腾不到 20 年，他原来手中的积蓄，越来越少，由富商大贾，日渐败落，终于贫困。

1945 年，祝续斋人老体衰，生活困难。但他能鉴定商周青铜器，还是位有声望的人，古玩行里的人都还尊重他，仍称呼他“祝大爷”。这时，上海做出口古董生意的老古董商李文清的儿子李凌云要继承父业，准备去美国做古董生意，请北京的“祝大爷”给他进商、周时代新坑贵重青铜器。祝续斋凭借自己的声望和老关系，从跑彰德府的古董商手中，收购到一件新出土的商代兵器，造型、纹饰、锈色都好，价钱也不低。今日健在的鉴定家说不清是什么兵器，只知那时出土的青铜器中礼器较多，乐器次之，兵器稀少。物以稀为贵，商代兵器稀少，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祝续斋在北京给李凌云买到商代兵器，很快传到吴启周的耳朵里，吴启周往美国发电报，向卢钦斋通报了这件事。卢钦斋在纽约宴请美国考古、鉴赏中国青铜器的专家和收藏家，在宴会上他宣扬北京从河南运来很多新出土的兵器，有真有假，也有加工修复的。给美国人造成一种错觉，青铜器中兵器不稀奇，北京有很多，其中有修复或仿制品。李凌云到纽约，原想能卖个好价钱，经过几位美国鉴赏家、收藏家过目，都表示冷淡。李凌云沉不住气了，将这件稀有国宝，很便宜出手让给一

位美国收藏家。祝续斋想通过李凌云再做洋庄生意的路子，一下子被堵死了，因为李凌云一次美国之行就破了产！

祝续斋曾想跑合、拉纤，弄俩钱，也没干成。1946年冬，祝大爷到文古斋见到陈中孚说，我带你到“辫帅”张勋总管的府上，看点好官窑瓷器。见到张勋的管家说：“这是我师弟，你有好东西给他看看。”这位管家拿出一件康熙官窑豇豆红瓶，说是宫里收藏的上等官窑瓷器，当年溥仪赏给张勋的，嘉奖他复辟清室之功。陈中孚看后当即下了定钱，后因财力不够，东家不肯出钱，定钱白放了，祝续斋也空跑了。

历经挫折，祝续斋在京的日常生活维持不了了，无可奈何，回到武清县农村老家，过贫困生活。开始时，一年还来琉璃厂几趟，看看老同行，慢慢越来越少进京。那个年月，儿女也无力供养他。大儿子祝荫亭，余派老生唱得好，曾同于连泉（艺名筱翠花）去上海演出，因没同当地票友联系好，也没跟青红帮头目沟通关系，演出没取得成功。祝荫亭回北京，在李万春戏班里搭班。后来，弄到前台缺什么角儿，他扮什么角儿去顶，顶一角儿给一块钱的地步！李万春还是很器重他，请他给自己的儿子李小春充当教师，教唱余派戏，资助他维持生活。祝续斋的二儿子留学法国，远在天涯海角，又处于战乱年代，无力也无法供养老人。

1950年后，住在乡下的祝续斋到北京找他的徒弟接济他的生活。徒弟也不富裕，每月给个十多块钱，在乡下能生活下去。“三反”、“五反”时，祝续斋跑到区政府去问：“有没有我的事？”政府工作人员看到眼前站立的干瘦老人，不知他问的是什麼，反问他：“你有什么事？”他说：“‘三反’、‘五反’，是不是让我交待？”“你穷得这样，交待什么？！”让他回家好好休息，告诉他说：“没您的事儿。”家乡人早就知道他贫困不堪，冬天没棉衣穿，披一条破棉被，在街上走；人家吃

剩下的东西，他要来吃，“三反”、“五反”怎能反到这样人的头上？！年轻人哪里知道，眼前站立的这位瘦骨嶙峋、披着破棉被、趿拉着破棉鞋、萧索寒碜的老人，曾是百万富翁、古董巨商、国内外很有声望的金石鉴定家？！

北魏鎏金佛像的出土与转卖

北京琉璃厂是经营古玩的集中地，而今谁又知道北京狗尾巴胡同兴隆店是古董商起家的发祥地？大古董商岳彬、俞淮清和长期担任古玩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的崔耀庭等人，都住过兴隆店。兴隆店也是1909年古玩商会成立前，北京古玩商聚会地点。那里住的大部分是行商，古玩行人称之为“旅客”（从外地买来古玩，住在兴隆店），店内设有窜货场，北京的古玩商人到窜货场买货，“旅客”们卖货。窜货场里熙熙攘攘很热闹。

光绪年间，有位叫魏三的“旅客”住在兴隆店。他在北京收了个徒弟，河北安平县人，姓名俞名增河，后来有人给他起个大号叫淮清。俞增河于光绪二十七年跟魏三学徒。其他“旅客”也收徒弟看门，他们到外地去收购古玩。掌柜的都“出外”了，剩下徒弟在店里没事干，夏天搬把椅子坐在店门口打盹儿。俞增河、宋瑞、李兴旺三个十五六岁的小徒弟，脑后留着小辫子，见到同行的前辈们，就请安问好；遇见年轻的同行则说说笑笑。日子长了，人们给他们编出顺口溜：“兴隆店有三魔，宋瑞、兴旺、俞增河。”

宋瑞、李兴旺都是老实人，在古玩行业中早被人们忘记。他们只是给掌柜的老老实实看门，没学到鉴定文物的本事。俞淮清年轻时聪明、好打听，魏三鉴定文物的眼力并不怎么强，俞淮清从师傅那里学到的东西不多。但他没事钻进窜货场，边

看边问，天长日久，也学了不少本事。后来他成了古玩行的知名人士，国外的文物鉴赏家、收藏家中有的人也知道北京有位俞淮清。他做了几号大生意后，则销声匿迹，在家闲居。

1911年，俞淮清同段伯轩合伙在兴隆店开设明古斋古玩铺。那时，兴隆店内的古玩铺，大多是做法国人买卖的。法国人在北京买古玩，富商大贾、豪门贵族、收藏鉴赏家喜欢买元明法花、孔雀绿、抹红、茄皮紫等釉色的陶瓷器和康熙三彩等，这路货古玩行人称之为“法国庄”。一般的法国人到北京来，只是买些粉彩人等小古董玩物，带回国留作纪念。

俞淮清经营明古斋时，古玩行人卖给法国人的较好的法花釉色的器皿，都说是宋代的东西。其实，法花是元代产物，明代有发展，清初时也烧制，到雍正以后停烧。卖给法国人的瓷胎法花，大多是清初的产品；陶胎法花则按宋代的年限出售，法国人不出高价则买不到手。俞淮清做法国人的买卖，赚钱不少。1920年前后，他在古玩行业里的名声就出去了。1921年，他曾出钱给岳彬等三人在兴隆店做法国庄生意。他善于交际，在古玩行中他是“交游甚广、消息灵通”人士。那时，北京古玩行流传着俞淮清买卖一尊北魏鎏金造像的故事：

1918年，河北省正定县某村有位农民犁地，犁出一尊鎏金佛像来。捡个金佛爷的农民不敢声张，后来由他家的孩子说出去了，很快传出某人挖出个金佛爷的消息。消息传到北京，北京的古玩商得知后，下乡鉴定、收购。这位农民认为金佛爷没价，给一万现大洋也不卖。

其实，鎏金并不完全都是金的，它有铜胎、银胎、铁胎之分，表皮上鎏一层金。所鎏的金层经久不变，是我国古代特有的镀金方法。当然，镀金与鎏金有区别，工艺上怎样鎏金，古代的方法而今说不清楚。故宫太和殿两旁的黄色大缸，就是铜胎鎏金的。1979年出版的《辞海》解释，鎏和镏，按《康熙

字典》的原意，把鎏只解释为：金之美者。如按此理解，这位农民把鎏金佛像说成是金的，而且是“金之美者”则有道理了。也曾有人将太和殿两旁的鎏金大缸，看成是金的。日伪统治北京时，有人用刀子刮鎏金大缸。现在露出铜胎的地方，有的是因日久天长，人们用手抚摸掉的，有的则是妄想发财的人，用刀刮的。

俞淮清得知这尊造像的消息，想做这号生意，又觉得自己的眼力不够，财力不足。他琢磨来琢磨去，想出个办法来，想借助于他的哥哥俞宴斋和延清堂经理丁济谦，三人合伙做这号生意。他们三人知道给一万块钱人都不卖，就去看看。经他们鉴定是尊北魏鎏金造像。假如是纯金的，按分量算也不值一万块，但北魏鎏金造像，则是不能用金子换取的国宝了。

我国古代造像分为铜、石、木、泥四种。这尊鎏金佛像是铜胎鎏金。铜造像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是秦始皇销天下兵器，铸金人十二立宫门之前。所说金人，就是铜人。这种铜不是我们今天使用的铜，是属于合金性质的。汉文帝在长安宫铸甘露人，也是铜造像。初时，铸造铜像是为陈饰或纪念之用。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佛教传入中国，后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的三四百年间，佛教传播广泛，庙、寺遍布各地，造像成为人们供奉之品。

北魏（386—534）是鲜卑族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的国号，后分为东、西魏，到公元556年西魏灭亡，共历18帝，170年。公元398年，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公元439年，灭北凉，统一北方，与南朝对峙。这时，佛教在中国北方盛兴，皇家和黎民百姓都修庙宇。皇家修建庙宇里的佛像，铜胎鎏金的较多，而且铸造工艺精湛，造型端庄，鎏金的金层较厚，经久不掉；黎民百姓修建庙、寺里的佛像，大多是木胎、泥胎的塑像。

这尊北魏鎏金造像，是菩萨像。菩萨原为释迦牟尼修行尚未成佛时的称号。北魏造像，是按释迦牟尼的青年形象铸造，不是有点女人像那样的菩萨或观世音像，这就是北魏铸造菩萨像的特点。这尊鎏金佛像身高约2市尺，有莲花座，外围有栏杆，每个栏杆都是一尊小佛像。大佛造像端庄、素雅、大耳垂轮、双目微睁、面容慈善，小佛姿态各异，神色鲜明。大、小佛浑然一体，乃皇家铸造之佛像。这尊鎏金佛像距出土的1918年，已有1400至1500年，鎏金完整，未露铜胎，全身无缺陷，确实是件稀世罕见之珍品。

无奈，给多少钱这位农民也不卖。俞淮清想出个办法来，请王士珍给他家乡的县衙门写封信，衙门出面，我们出钱；有钱有势，何愁乡巴佬不卖。

王士珍是位收藏家，同俞淮清、俞宴斋、丁济谦都认识，而且还有点交情。王士珍是河北正定人，清末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与冯国璋、段祺瑞同被称为“北洋三杰”。辛亥革命后，任袁世凯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坐办和陆军总长等要职。1920年，王士珍正以北洋元老身份，调停直系、皖系的内战之际，俞淮清求见王总长。初次未见，仆人说，总长公务在身，无暇接见。二次到王府拜见，带去古玩请总长鉴赏。王士珍在书房会见了俞淮清。俞淮清将正定县百姓犁出鎏金佛像之事述说一遍，便请王总长给家乡写封信。王士珍听俞淮清这么一说，心想，鎏金造像放在农夫手里也没什么用，不如卖给古玩商，就答应他让秘书给正定县衙门写封信，由县衙门出面，交涉此事。

王士珍的信到了正定县是真管用，县里人和农民商议，同意卖出，但非三万现大洋不出手。俞淮清、俞宴斋和丁济谦三人合伙收购了这尊鎏金造像。

北魏鎏金造像运到北京，轰动了在京的中外古董商。北京

山中商会经理高田义三郎找俞淮清看货，俞淮清请他鉴赏。高田边看边说：“吆嘿西！吆嘿西！”传说，他们两人私下达成一项秘密协议：由山中商会东京总会以 15 万元收购，公开讲是俞淮清以 10 万元将北魏鎏金造像卖给高田，剩下的 5 万元，高田和俞淮清平分，各得 2.5 万。俞淮清按 10 万元售价，同俞宴斋、丁济谦三人平分。俞淮清赚了将近 5 万大洋，分给徒弟、伙计每人 500 现洋，将明古斋交给段伯轩独自经营，自己单独开了一家淮诚古玩店，继续做“法国庄”的生意。

1926 年，延清堂的经理丁济谦被比利时人聘任为北京华比银行经理，延清堂的东家以 10 万元的代价，将延清堂全部货底倒给俞淮清。延清堂的存货不对“法国庄”的路，所以他转手倒给了祝续斋，一个钱不赚，只从货底中拿走一件康熙官窑豇豆红柳叶尊，作为酬劳。

康熙官窑豇豆红柳叶尊是件“库货”。库货是指清朝宫廷库存的东西，买卖库货在清朝时期“犯禁”，要吃官司的。延清堂的这件柳叶尊是多年收藏之珍品。什么叫豇豆红？豇豆红是一种幽情的浅红色，恰似朝霞里的桃花一般幽雅的色釉，也叫“桃花片”或“海棠红”。在西洋名之为“Peach bloom”，中国的文人雅士呼之为“美人醉”，可见其色釉之娇艳。烧制豇豆红是很困难的，施挂这种色釉的器物为数不多，形状也较小，只限于笔洗、小瓶一类作品，至康熙末年已停烧。所以，豇豆红是康熙官窑中为数不多的高级颜色釉。柳叶尊，形似柳叶，口腹大、底足小。因其底足深而小，款识又在深底足的内部，所以，书写“大清康熙年制”的工楷款识，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柳叶尊，自身立不起来，要配上紫檀雕花座，把底足插入座内，才能立住。

俞淮清得到这件“酬劳品”，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物件虽小，不足 4 市寸，但价值连城。从此，俞淮清搬出兴隆店，

住进蒜市口标杆胡同，一直到老。他在标杆胡同的家里，也做过些古董生意，后逐渐不再出头露面，销声匿迹了。

岳文轩其人其事

北京古玩行里最富有的是岳文轩，他是中外驰名的古董巨子，解放后因龙门石窟的《帝后礼佛图》被盗案牵连入狱，1955年病死于狱中。因而至今没人再提他，他的徒弟也不愿再说他的往事。讲古玩行的老事儿。如没说到岳文轩，好像缺了一大块。要是说起岳文轩，又都是片片断断，谁也说不完全。笔者将一些片断往事记录成文，写写古董巨子岳文轩。

岳文轩，名岳彬，光绪二十二年（1896）生于河北通县西集镇张各庄。幼年家贫，只念过冬仨月和两年私塾，便进京学徒。幼年的岳文轩人很勤俭，但觉得在家干农活累断筋骨也发不了财。那时，西集镇有位李仲五在北京廊房二条聚珍斋珠宝玉器店当掌柜的，张各庄有位常惠川在北京给内务府官员庆小山当管事的，也买卖些古玩；还有张世培翰林的后代们，不少人在京经商做买卖。张家、常家都有钱，对幼年的岳文轩很有吸引力，他也想进京学徒做买卖。1910年，由常惠川把他带到北京，在锡拉胡同里一个庙里的小古玩铺学徒。

法华罐起家

岳文轩的师傅在古玩行里没名望，现在健在的老古董商谁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个别老人只知他是位跑小市、摆旧货摊的，住在锡拉胡同的破庙里，叫朱二。岳文轩跟他师傅跑小市、买卖旧货，除字画外什么旧物都买卖。他开始干这行，就眼路宽，跟在琉璃厂古玩铺里学徒不同。琉璃厂古玩铺有“吃”字画的，有“吃”金石的，有“吃”瓷器的，有“吃”

砚台石章的……而跑小市、摆旧货摊，只能买着什么卖什么，所以，买卖虽小，眼路却宽，样样都要懂点，不然买卖没法儿做。

从宣统二年（1910）到1916年，岳文轩住在锡拉胡同的庙里，跟他师傅学徒做买卖。他的眼力练得不错了，对法花陶瓷和金石青铜器入了门。1917年他自己夹包做买卖，从天津、山西等外地买点货，卖给法国人。他开始同法国驻清廷第三公使、卸任后在巴黎开古董铺的魏武达做起了古玩生意。那时，只是些小零碎买卖，像样的东西，他还买不起，没做大号生意。

1911年，由俞淮清和俞宴斋出资，金书源、王悦之和岳文轩合伙，在狗尾巴胡同兴隆店里，三人夹包做古董生意，也没起什么字号，做法国庄，买卖法华陶瓷、康熙彩瓷和些小号金石文物。

这一年，岳文轩从天津福兴成古玩铺，花4000大洋买了件法花罐。这个法花罐，是孔雀绿黑花罐，釉厚而透明如玻璃，颜色鲜艳，垂釉之处不发黑，造型美观，坠釉处所露出的白地黑花同黑花宋瓷一样。买回来后，给金书源、王悦之看，三人商量由岳文轩送给魏武达看。

魏武达虽是法国人，但在北京居住多年，是位“中国通”，爱好中国古玩，对中国的金石、法花陶瓷有研究。当时魏武达认为这件法花罐是宋代的，釉色美、造型新颖，是有欣赏价值的室内装饰品。

魏武达的鉴定对不对？法花是什么？以前古玩行人常把带玻璃釉的陶器叫法花，赵汝珍写的《古玩指南》一书中写道：“法花者带釉之陶器也。”而今的陶瓷鉴定家给法花下了个定义：“法花是陶瓷器釉色名”，因为这种釉色是采用彩画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制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

纹饰轮廊，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所以，法花的原名叫粉花。明代嘉靖年代前后，在景德镇用瓷胎烧制法花釉；山西用陶胎烧制，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艺术效果突出。

法花釉透亮如玻璃，色鲜艳有黄、绿、紫之分，黄的像松香黄，绿的有子母绿（即宝石绿）、孔雀绿，紫的有玫瑰紫等。法花的名称叫法较多，例如：法华、珐华、法蓝、法翠、粉花、法花等等。后来统称法花或法华，其实我国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义。法花釉色始于何时？过去，我国陶瓷鉴定家的认识不一致。有的说始于宋代，根据是法花釉坠釉处所露出的白釉黑花和黑花宋瓷一样；有的则认为始于明代，明代的瓷胎法花釉色较多，也有瓦胎、沙胎、缸胎，在宋代没有瓦、沙、缸胎；有的则认为始于元末明初。现在，专家们认为始于元代，在明代有较大发展。

法花釉色的陶瓷器，原本不大值钱，清末民初，被法国人把行市买起来了。法国人喜爱这种釉色，北京古董商在山西大量收购，将明代生产的陶胎法花釉色的器皿，当作宋代文物卖给法国人，价钱十分昂贵。岳文轩卖给魏武达的法花罐，价格高达1.5万银元。

法国人爱“显摆”夸富，自己有件好东西总是愿意拿出来给别人看，客人看后赞美几句，主人就高兴地满足了自己的心愿。一天，金书源到魏武达家里拜访，刚坐下，魏武达便将从岳文轩手里买来的法花罐给他看，还说：“金先生，我这宋代法花罐是一万五千银元买的，你看值不值？”金书源一愣，哼了一声。魏武达看看金书源脸色便问：“怎么！你看这东西不好？”金书源镇静了一下答道：“是宋代的法花罐，值一万五千。”随后又赞美了几句，便告辞而去。

金书源往回走的路上憋了一肚子气，到了兴隆店便把事情

告诉了王悦之，说：“岳文轩这小子骗了咱们俩，他把那件法花罐卖给魏武达是一万五千，告诉咱们他卖了6 000，这小子独吞9 000块！咱们算账，跟他散伙！”

三易其居

岳文轩独吞了9 000 块，有了本钱，继续在兴隆店做“法国庄”的古董生意，不断从外地进货，兴隆店里的一个小房间放不下了，搬到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蕴和店租两间房住，还找了位徒弟，名叫丁兆凯，河北吴桥人。这徒弟是位大高个，大眼睛，人忠厚老实，师徒二人做生意。岳文轩很注意行情，那时古玩的行市里随着买主的多少而升降。特别是做洋人生意的，随时要注意洋人喜欢买些什么，只要洋人一买，行市就起来。在北京东单牌楼有一家古玩铺，字号是永宝斋，掌柜的姓贾，哥儿俩开的买卖，行里人称呼他们：大贾、二贾。不知二贾从什么地方弄来七个石佛头，大贾说他：“买佛爷脑袋，卖不出去。”二贾说：“便宜！共总才花50 块钱。”大贾反驳说：“便宜也卖不出去，只能搁着。”果不其然，这七尊石佛头存了好几年也卖不出去。1925 年，突然间石佛头的行市起来了，岳文轩马上到永宝斋找大贾，问他：“你那七个石佛头卖不卖？”大贾说：“搁了好几年了，有买的我就卖。”岳文轩问他卖多少钱，大贾说：“100 块一个呗。”岳文轩说：“唉，石脑袋不值什么钱，没人要，我给你50 块钱一个，350 块不少了。”大贾一合计，是不少，50 块钱本，赚300 大洋，就卖了。

原来是日本有人研究中国的石雕造像，认为中国的石造像比铜造像、木造像少，石刻的艺术成就较高。石佛头的刻制始于晋初，风行于北魏，唐宋以后则不多了。所以，日本古董商到中国收购石佛造像。法国人、美国人也争相购买北魏石造

像，从此，中国的北魏石雕造像不断流出国外。

岳文轩买到七个石佛头，先卖给日本人一个，800 块钱。其余的六个，他分开卖，他懂得物以稀为贵，东西多了不值钱。后来，他的一个石佛头卖到 2 000 块！并选出其中最好的一个留了下来，自己收藏起来。

20 年代初期，岳文轩发了财，货多了，钱足了，先在北京买房子，后在老家置了 80 亩地（后发展到 20 顷）。1924 年前后，他搬到自己买的一所四合院的房子里住，离琉璃厂很近的东北园。1928 年后，四合院的房子堆满了货物，他便花三万块钱在炭儿胡同西头路南买了一套大房子，分东、西两个大院（即现在的大栅栏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所在地）。搬到炭儿胡同后，起了个字号叫彬记。彬记成了北京最大的古玩铺。从 1921 年到 1928 年，七八年的时间，岳文轩是大量地收购，大批地卖出。他经营的古董种类繁多，范围甚广，主要的有：商周秦汉青铜器、石刻石雕石造像、唐三彩、秦砖汉瓦、宋元明清名贵瓷器、雕漆填漆、珐琅玉器、绣花缂丝、地毯、象牙、虬角、竹器木器等等。炭儿胡同上百间的房子堆满了古代文物，院里摆有石器、瓷器等大件文物。彬记够得上个博物馆。

稀有中的特殊

岳文轩做古董生意，先是做法国庄，后来也做英、美和日本人的买卖，路子广，货物齐全。经过多年的经商，他懂得中外人士一个共同心理，凡是玩古董的，都爱稀奇之物。“少而难得谓之稀，少而特殊谓之奇”，古董是属于稀有而难得之物，古董好爱者是珍视稀有中的特殊。岳文轩悟出这个道理之后，花高价收购文物中稀有特殊之器物。

1930 年前后，岳文轩找郎兴甫给他跑外，到外地收购古董。“九一八事变”期间，郎兴甫从河南买到商代青铜器——

凤耳彝炉，造型特殊，锈色翠润，花纹清晰。特殊之处在于凤耳。凤耳彝属罕见之商代青铜器，当时人们认为，凤耳彝乃商代天子祭祀时用的礼器，而且是“新坑”（新出土的），初次出现的造型奇特的彝炉。岳文轩以4 000银元代价收购到手，将这件国宝文物送到巴黎魏武达开的古玩店里，要价30万元。“七七事变”前，魏武达给岳文轩来电，开价20万元，岳文轩没卖，始终放在巴黎。1963年，某老古董商到山西介休县城里，在周化南（老古董）的儿子周子刚家中，见到这件凤耳彝的照片，才“旧事重提”。但笔者访问岳文轩的徒弟某位铜器鉴定家时提及此事，他说：“没那么值钱的凤耳彝，也没那回事。”再次询问提供这一事实的老人时，耄耋老人说：“岳文轩的这位徒弟，那时还没来学徒哪！是他的大徒弟丁兆凯讲出来的。”

1939年，岳文轩花7 000元买了件西周青铜器提梁卣。卣是中国古代酒器，一般都是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有提梁，也有圆筒形的。岳文轩买的这件提梁卣与众不同，特殊之处是盖端的鸱鸟能转动。三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是稀有难得之物，盖上的铜鸟能转动则是稀有中的特殊。我国古代青铜器是浇灌铸造而成的，在一个整件中能铸出可转动之处，可见铸造技术之高超。在高超技艺下生产出奇特的产品，3 000年后还轰动北京古玩鉴定行业，引起国内外专家的注意。

有一件明永乐甜白暗花牡丹梅瓶，造型美、釉色洁白，暗花牡丹的花纹属于奇特，而且花纹细腻、生动。这件梅瓶，在30年代末期在中南银行经理郑瑞生手中，郑瑞生说是从上海买来的，郑卖给上海叶叔重，叶将其带回上海，存了十来年又带回北京，岳文轩花60万伪币买到手。上海古董商洪玉林在40年代末期，给岳文轩10条（100两）黄金，约定一个星期交金付货。洪玉林过了两个礼拜拿着100两金子来了，岳文轩

说：“过期了，不卖了。”有人说，岳文轩是财大气粗，其实是他喜爱这件奇特的永乐梅瓶，不舍得出手。现在这件文物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稀有特殊之文物，岳文轩经营、收藏的很多，透露出来的很少，而今他的徒弟又不肯谈，因而笔者知之不多！

以假乱真

岳文轩为了图利而追求文物中的奇特器物，是他经营古玩的一个特点。黄伯川和岳文轩都经营青铜器，岳文轩注重造型之奇特，黄伯川则重视铭文之多寡。黄伯川拓下青铜器铭文、图饰、花纹与形状，并汇集成册，传于后世，岳文轩只图金钱利润，无远见卓识。岳文轩经营古玩的另一个特点是搞复制品，以假乱真。

30年代末期，岳文轩在北京古玩商会的窜货场买来一对康熙三彩鹦哥，造型美丽，彩色鲜艳。康熙三彩是在明代三彩的基础上提高与发展的，声价较高，名驰中外。而三彩鹦哥则属稀有奇特之物，岳文轩爱不释手。两三年后，有人发现岳文轩卖出三对康熙三彩鹦哥，他是隔一年半载地卖一对，分开时间卖出。人们都知道他是在大庭广众的窜货场买的，谁也没怀疑他卖的是复制品。而真东西始终留在他的身边。

这是被同行发现的，没被发现的更多。岳文轩雇人给他搞复制品和修复青铜器、石器和瓦器，给他干活的都是一流的好手，如张济卿是当代修复、复制青铜器的高手；李焕章是整修唐三彩、瓦器的能人；还有位冉师傅（那时人称小冉）是石雕艺术家。岳文轩买来“破铜烂铁”，张济卿给他“整旧如新”；买来“碎石乱瓦”，李焕章、冉师傅给他“恢复原样”。他还买些石头，复制北魏佛像和其他古代石器，也找过刘永清给他搞后挂彩。彬记是北京最大的古玩铺，真东西收藏很多，

假东西卖了不少。岳文轩爱稀奇文物成癖，除字画外，属于古物的东西他都收。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探询谁有什么好东西，琢磨怎么把它弄到自己的手上。买到好东西，不肯轻易出手，搞些复制品，以假乱真，真东西他收藏起来。

岳文轩的大徒弟丁兆凯于 1942 年离开彬记之后，经常去琉璃厂文古斋串门聊天，他说了很多彬记的事，给人印象最深的要算是云冈石佛头的故事。“七七事变”前，彬记卖给美国石油大王一尊北魏石佛头像，三万美元。这个石佛头是件复制品，是岳文轩派人到云冈石窟拓下石佛头，选好石料，照样复制。“七七事变”后，美国石油大王来电，要求退货，声称是假的，真东西仍在原处。岳文轩花 3 000 美元买通孙殿英部下将原石佛头像毁掉，然后回电，扬言如云冈仍有那石佛头不但退货，还应允受罚；如无此石佛头，则请赔名誉损失费。结果货没退。

河南龙门石窟里有两块著名的浮雕：《帝后礼佛图》，是北魏浮雕艺术杰作，乃我国之国宝。岳文轩买通当地驻辖的伪军将浮雕砸坏取下，装麻袋运往保定府，由丁兆凯取回运到北京。在彬记的西院，复制了一套《帝后礼佛图》，然后卖掉。这种行为，引起古玩行业人的极大愤慨，黄伯川骂他是“土匪”，一些人诅咒他“断子绝孙”！果不其然，岳文轩娶了四个老婆，一个儿子也没生。

重利轻义无情谊

岳文轩的原配夫人是位京东人，和他是同乡。他发了财后，又从二等班子里找个从良的，名叫翠云，翠云染上吸鸦片的嗜好，不管岳文轩，有烟抽就行；原配是位农村妇女，老实人，管不了岳文轩的事。所以，他搬到东北园后，又找了位女招待，接到家里去住，几个月后散了伙。有一次岳文轩请客，

酒席宴会上叫了位“条子”，是位苏州人，年轻漂亮，名叫小玲珑。小玲珑正在陪宴，来电话要她到另外一家饭店去作陪。岳文轩火了，结结巴巴地叫了声：“掌班的！”问小玲珑的身价是多少钱。掌班的告诉他，6 000 块现大洋。岳文轩一拍桌子说了声：“我留下了！”跟他买一件古玩时的神气一模一样。小玲珑领到家，又花了2 000 块现大洋买嫁妆。8 000 块买位年轻漂亮的老婆，住了没几宵就不新鲜了。因为，他的脑袋里除了赚钱，买卖古玩外，没什么东西，他除了对古董玩物有感情外，对人没感情。

小玲珑年纪轻轻的便被卖给商人，比白居易《琵琶行》中“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妓更为悲惨。“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岳文轩没去江西浮梁县，仍然居住在北京炭儿胡同，但不与她同居。这位古董商重利轻义，跟他多年的朋友都不客气，只要对他无利，都可疏远摒弃，更何况刚认识不久的娼女，玩够了，便扔在一边儿不理。小玲珑不堪寂寞，跟岳文轩的二徒弟张某来来往往有了感情，不久被岳文轩发觉，便将张某辞退，把小玲珑赶出了家门。以后还是原配夫人和翠云同他度过了最后的岁月，但他们没感情，吃住不在一起。岳文轩吃独食，自己单独吃，吃剩下的才给他的家人。他的一生没有家庭、夫妻、子女团聚的乐趣，只有满脑袋的钱和古玩！

夏锡忠的故事

故事者旧事也。旧事重提，颇有兴味。

夏锡忠是位金石鉴定家如活到今天已是百岁老人了，可是他在1961年就去世了。死了这么多年，没人记得他了。当笔者到他的故乡京西六郎庄拜访他的侄儿时，他说：“四叔的事

儿我早忘了。”笔者说：“六郎庄的夏家五虎，当年很有名气。”他不同意将他的叔父称为“五虎”，便说，哪来的五虎，我都不知道。

夏锡忠哥儿五个，他排行老四，父亲是位木匠，前清时在颐和园里给皇家做木匠活儿。清代京西六郎庄是给皇上种稻田的地方，夏家的老二、老三在家种水稻，老大、老四在城里当古董商，老五在俄国开办的道胜银行里做事儿。传说夏老五曾绑架过张作霖时当过总理的潘复。

光绪末年，夏锡九在北京杨梅竹斜街蕴和店里租间房经营古玩，夏锡忠跟着哥哥干。1911年，夏锡忠自己跑太原买古玩，带来东西卖给北京的同行。1920年，夏锡忠在琉璃厂开设清和斋古玩铺，不久便搬到南河沿，做起了洋庄生意。清和斋经营、鉴定金石、古砖瓦、唐三彩、法花和宋元瓷器。

古砖不是盖房子用的砖，而是圻砖，就是埋棺材挖坑、坑的四周砌的砖。这种砖刻有花纹图案，图案有故事情节，如同连环画，还刻有文字。“秦砖汉瓦”属稀有珍贵文物。秦砖最难得，珍贵之处在于文字，书法佳妙，刻在砖上的字是瘦劲古雅，在砖上可见到秦代时中国文字之本来面目。

古瓦也不是盖房子用的瓦，而是瓦当，即檐头瓦。古代宫殿建筑滴水瓦的瓦头，有圆形或半圆形，上有图案或文字。秦以前之瓦当有花纹无文字，秦以后才开始刻文字。汉瓦之文字多用吉祥话，如天下康宁、永受嘉福、千秋万岁、长生无极等等。

唐三彩，即唐代三彩陶器。人称三彩，其实是一种多彩陶器，釉色呈深绿、浅绿、翠绿、蓝、黄、白、赭、褐多种色彩。也有上述几种彩色中的一种颜色或两种颜色的，叫一彩、二彩，多彩的都叫三彩。唐三彩多作随葬的冥器，西安、洛阳等地唐墓中出土的最多。唐代厚葬的风气盛行，用做冥器的三

彩陶器是包罗万象，凡是与死者在世的生活有关的东西，什么全有。大体可分为建筑、家具、牲畜和人物等。生活用器有瓶、壶、罐、钵、杯、盘、碗、盂、枕头、烛台等，而每一种又有多种样式，瓶就有双龙耳瓶、花口瓶、洗口瓶、细颈瓜腹瓶、双系扁瓶等。建筑物中有楼阁亭台，假山水榭。牲畜有马、驴、骆驼、牛、羊、猪、狗、鸡、鸭。人俑有贵妇人、男女侍俑、拉马俑、文官俑、武士俑、胡俑、天王俑等。还有比目人骑骆驼，仿木质的箱柜，种类、式样繁多，举不胜举。唐玄宗李隆基时的开元年代，唐三彩的质量好，产量高，色彩绚丽，造型多样。有的三彩陶人，人体结构准确，形态逼真传神，显示出我国早在公元 700 年时，塑工技巧之高超。唐三彩是我国艺术宝库中之珍品。

这些古代殉葬器物，大部分来自洛阳。洛阳素有“九朝故都”之称。史书记载，西周初年，周公旦出师东征，平定反叛，分封诸侯，营建洛邑（即洛阳）作为东都。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 256 年，东周被秦所灭为止，洛阳是东周的京都。而后的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炀帝、武周、五代唐先后定都于此；新莽、唐、五代梁、晋、汉、周、北宋、金皆以此为陪都。东汉、隋唐时代，洛阳是当时全国乃至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汉唐两代洛阳城拥有百万人口。古往今来，有不计其数的王公贵族、富商大贾麇集在这片土地上。这些人都在找块风水好的地方，死后安葬，将其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和幻想寄托于来世和后代子孙。

洛阳城北，有一条东西绵亘一百多公里的山脉，古称北邙，即邙山。邙山西起三门峡市，东止伊洛河岸。西段渑池县北仰韶村，东段称北邙。北邙的北面有泱泱大河，似带横腰，景色幽静，山水秀丽，古代人认为是块风水宝地，加之黄土覆盖，土层深厚，适于土葬。自东汉至宋代（有的说自东周至

宋末)，人们争相购置墓地于此。随着岁月嬗递，北邙便成了我国古代著名的墓园。古墓之稠密，致使“北邙山无卧牛之地！”我国古代风行厚葬，史书记载，汉文帝之子孝王刘武死后仅黄金随葬物就有 10 万斤。

历史上曾有过董卓兵败西窜，逃离洛阳时（191），“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宝”之事，开盗墓之先河。此后盗墓之风历代不绝。然而大规模的盗墓，还是清末以来。老古董商们回忆，光绪三十年修建陇海铁路，汴洛段开工，线路横穿邙山南麓，毁坏了邙山古墓群。随着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古墓不断露出地面，文物不断遗散，到邙山俯首可拾宝物。那里有大量的青铜器、秦砖汉瓦、唐三彩、壁画、金银器皿等绚丽多彩的殉葬文物。开始时一些古董商把殉葬品视为不祥之物，做此生意缺阴德，死后在阴间人家要同他算账。后来看到一些人做此生意，卖给外国人能发大财，旧的观念逐渐打破，洛阳便成为古董商发财致富之宝地。到了军阀混战的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日伪时期，盗墓之风登峰造极。有人估计，至解放前夕，被盗古墓约有五万余座，文物约有五十余万件，已是“十墓九空”，甚至是完整文物荡然无存！只见那里盗洞张着黑森林的大口，凄惨狼藉！

夏锡忠从山西、洛阳收购唐三彩、古砖瓦，出土的东西有不少是破碎的，带回北京请李焕章给修补。李焕章整修陶器、瓦器，闻名于古玩行业，将破碎之物修补成原样，天衣无缝，看不出破绽。夏锡忠还鉴定经营河南龙门、大同云冈被盗出的石佛头，都是北魏时的石雕。特别是龙门石窟的造像，雕刻刀法圆熟精致，佛像表情生动，大部分较小的佛像的头部被人盗走。传说清和斋收购过这种赃物，因而发财致富，从琉璃厂搬到南河沿。1939 年，又买了南河沿北头的原张勋府，清和斋搬到张勋府，一百多间房子，摆满了青铜器、陶器、石器、瓦

器和其他文物。夏锡忠成为著名的大古董商。

老古董商提起夏锡忠都说：“这个人要说他和气，是比谁都和气，可是翻脸比谁都厉害。”至今人们还记着他的几起发脾气不讲理的事儿：

30年代，有一年他和延古斋的陈养泉到祝近斋那里去，见到一件唐代的瓦马，陈养泉就撺掇他买，说：“夏四爷你买！你买！买了咱们合伙。”夏锡忠花400现大洋买了。陈养泉嫌贵犹豫了，夏锡忠当众拿着瓦马问：“养泉！你伙不伙？”陈养泉笑嘻嘻不答话，夏锡忠火了，举起瓦马摔个粉碎！

萧书农从夏锡忠手里买到洋瓷八宝，拿回雅文斋，徒弟们仔细一看是修补过的东西。萧书农当着夏锡忠的面说：“夏四爷，你那洋瓷八宝是有毛病修补的东西。”夏说：“有毛病怎么啦！”萧书农又磨叨几句，夏锡忠抄起板凳喊了声：“我揍你！”“咣嚓”，板凳扔了过去，幸亏没打着。

在古玩商会的窜货场买货，讲价钱是“袖里来袖里去”，用手式在袖里讲价，不准嘴里报数，谁要喊出数来，就犯了行规。夏锡忠有一次喊出钱数来，会长崔耀庭制止说：“这可不！”夏锡忠反口说：“不行，你把四爷我怎样？！”崔耀庭在古玩行里是个头面人物，脾气也很大，但也怵他三分！

有人从甘肃酒泉带来一件青铜器，是周代的提梁卣，铭文有百字之多，锈色花纹一般。还有件雍正窑变瓶。这两件东西送到崇古斋，正赶上崇古斋掌柜的李卓卿同夏锡忠一起聊天。李卓卿介绍给通古斋，通古斋花5000元收购了提梁卣。夏锡忠要想要，没给那么高的价，没卖给他，他火了，跟人家打起架来，逼人家把雍正窑变瓶白给他算了事。北京解放后，卖提梁卣那个人的后代，穿解放军的军装找到崇古斋李卓卿询问十多年前的这件事，夏锡忠听说后，吓坏了，当年那股横劲儿早没了。

古玩行人都知道夏锡忠霸道，说打就打，脱衣裳跟人干，但在“八一五”光复后，他脾气变了，他信了“九公道”。那年，河南来了位老道，劝他修善积德，忏悔赎罪。开始时，夏锡忠不信老道的那一套，当老道说出，佛祖神因你而头体分离、大量的随葬器物暴露在人间，这些事与夏锡忠有关时，他才觉得道士的言语指出了他多年的恶行。

于是河南老道进了张勋府，同夏锡忠生活在一起。一天早晨，有人叫门，老道告诉夏锡忠说：“你外甥来了”，开门一看果然是他外甥；第二天又有人来叩门，老道说：“这是你侄子叩门。”开门一看真是他侄子。连续几次老道都说对了，夏锡忠从此信服得五体投地，拜倒在老道的脚下，口称弟子，信奉九公道。

老道天天给他讲“道术”，夏锡忠入了迷。他想，人间的乐趣只不过是“吃喝玩乐”，荣华富贵对我来说也算可以了，住进了张勋府，拥有这么多上等的铜、瓦、陶、石器，没有六妾已有三妻，想吃什么有什么，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大烟管够抽，可是这一切跟道家所讲的清静无为是两码子事儿！我已享受过了，我要赎我以前的罪过，清静无为地度过后半生。老道见夏锡忠想赎罪了，便要他糊上300个童男、300个童女，糊烧活的手艺要好，要糊得和真童男、童女一样。夏锡忠花一大笔照办了。童男、童女糊好了，请来僧、道诵经。焚烧之日仪式隆重热闹：将300童男、300童女排列好摆在中央，老道手持拂尘，鹤氅道衣，站在童男童女中间，口吹法气，然后领着众僧、道，围着童男童女跑圆场，边跑边击打和吹手中的乐器，跑完三圈，众僧、道站在童男童女背后，夏锡忠跑在僧、道前面的中央，老道的拂尘在夏锡忠的头顶上晃荡，口喊：“无量佛！”众僧、道开始诵经，夏锡忠起立、后退。焚烧童男童女，火光冲天，经声动地。这个场面花掉夏锡忠十来万。

从1945年末到1948年终，三年的时间，夏锡忠用30到40年心血积累起的万贯家财，被河南来的老道骗走，不能说“一空”，但可说所剩无几了！房产卖没了，带着妻儿老小搬到西城租房住，青铜器差不多卖光了，剩了些唐三彩、陶人、陶马，石、瓦成堆。这些东西占的地方大，自己又没房子，得找个地方堆放，夏锡忠为此而发愁。北京解放了，有的同行的人跟他说：“四爷！您那么多东西都填给了‘九公道’，剩这点又没地方放，捐给国家算了。”夏锡忠想这话有道理，便把所剩文物全部捐给国家，政府嘉奖他一万元。他依靠这一万元生活到老死，得其善终。

而今健在的老古董商们跟笔者聊起夏锡忠的往事，都说夏锡忠要是不穷、不捐献，他的罪过不比岳彬小。这话有它真实的一面，也有夏锡忠生前得罪人甚多的一面。斯人已去，只写事实，不加褒贬。

夏锡忠有位徒弟叫崔铎，解放前去台湾，是台北著名金石鉴定家。

王栋廷和宋代五大名窑

王栋廷，排行老七，故绰号“王七”，北京人。古玩行业的都知道，炭儿胡同有位“王七”。王七年轻时在东四牌楼辅聚斋古玩铺，跟他父亲学徒。父死后由他经营辅聚斋，没门面和牌匾，在炭儿胡同家里经营宋、元、明、清瓷器和三代、秦、汉青铜器、瓦器。经营四十来年，后参加公私合营，因无字号，以个人名义加入琉璃厂振寰阁当营业员。

这位老营业员以前可神气了，个儿不高，说话气派，声称古玩行业“只有一个半人”，他自己算一个，岳彬才算半个人。他确实在鉴定青铜器、瓦器和宋元瓷方面有眼力，做过大

号生意。1929 年他鉴定、经营一件宋钧窑花盆，轰动国内外文物鉴定界，从此“王七”的名望出去了。

说起这件宋钧窑花盆，则有其来龙去脉：1929 年春季，长驻长沙的北京古董商王勉斋，被约到乡下去看货，说是有钧窑瓷器。王勉斋认为，乡下人懂什么，往往把窑变当钧窑，不去看货，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茂亭。李茂亭到乡下看到十多件的一堆瓷器，其中有一个花盆是宋钧窑烧制的。他花了 300 块钱，把一堆瓷器都买下来了。

李茂亭回到北京，住在古玩商会，在同行中宣扬他从长沙买来的宋钧窑花盆是罕见之珍品，邀请同行看货。那时，古玩行的行内交易在商会所设的窜货场。这一天，看货的人很多，都想看看宋钧窑花盆。

大家一看，是件长方形带六棱，高有 16 厘米、长约 22 厘米、宽 13 厘米、工艺特殊精致的宋钧窑花盆。这件花盆的瓷胎是深灰色，胎质坚密，芝麻酱底，底端刻有“九”字。釉厚，玫瑰紫颜色，红处似胭脂朱砂，青处像葱翠，远处望去，好似行云流水，鲜艳而不死板，这样好的颜色实属罕见。

王七说：宋钧窑烧制的瓷器底部有一至十编码的，单数是佳品。有人讲：从花盆的底部刻制有“九”字，就可断定，这是件为宋朝宫廷烧制的贡品。这一断定的根据是，北京明清故宫传世的宋代钧窑瓷器中，有一种工艺精美、外底刻有一至十字的配套号码的花盆和盆托，二三百年来历代陶瓷鉴定家都认定是宋代的贡品。

大家看后、议后，进行交易。同行议价，习用多年流传下来的“袖内拉手”方式，不公开要价还价，保守秘密。窜货场准备个大套袖，谁卖货谁披上这件大套袖。李茂亭刚披上大套袖，人们立刻蜂拥而上，抢他的袖口，人多，谁的手也伸不进他的袖口里去。用“袖内拉手”方式进行交易的办法行不

通了，改用“封货”方式进行。封货，即对价值较高的文物，采取密封投标的办法，当众拆封，由出价高者得标。

拆封报价：有的写2 000元，有的写3 000元、4 000元，琉璃厂博韞斋、雅文斋合伙写了5 000元，东四牌楼的几家古玩铺合伙写7 000元。人们认为，这可能是出价最高的了。不料拆封到最后，报价人高喊：“王栋廷标价9 606元，得标！”霎时窜货场里一片喧嚣！随着喧嚣声，王栋廷的名字在古玩行里响了。

喧嚣未停，又出现大声争吵。原来是李茂亭同王勉斋争吵起来。李茂亭喜出望外，300元买来一堆货，卖一件就得九千多块。王勉斋在旁边问李茂亭：“这号买卖，可是我转让给你的，赚了钱不能没我的份儿，咱俩应平分。”李茂亭反驳说：“我下乡前，你没说咱俩伙着，赚钱了你又想伙了，那没门儿！”你一言他一语，两人大声吵起来了。同行人为他们说和。经多方磋商，按二八分成。王勉斋分得赢利二成，白得1700元现大洋。

王栋廷为什么能出这么高价收购这件钧窑花盆？一是他眼力好、有胆量；二是他有后台。上海的卢吴公司向外出口的大古董商吴启周，请王七在北京给他代买宋、元瓷器和青铜器，每月给他500元酬金。

日本在北京的山中商会经理高田听到信息找王栋廷商议，愿出价1.5万元收买。高田知道他是不到一万块钱买的，让他白得5 000，准能卖，不然，他运往上海给吴启周，山中商会就赚不着钱了。不出高田所料，王栋廷将钧窑花盆卖给了高田。

高田了解国外的古董行情。这时，美国正出现“钧窑热”，只要是釉厚、胎坚、颜色艳丽的上等釉色钧窑瓷器，美国博物馆和收藏家，都愿出高价收购。高田赚了一笔大钱，将

这件宋钧窑烧制的、工艺特殊精致的花盆，卖给了美国博物馆。

1989年7月24日，美国《新闻周刊》上的《中国艺术品热》一文中记载，1988年5月在纽约，“一位美国籍华人用280万美元收购了宋朝一只淡蓝色的笔洗——这是迄今为止为一件中国古瓷器所付的最高价格。”文中只写宋朝，未写宋朝什么窑烧制的。

老古董商一提宋瓷，便随口说出：“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窑，而五大名窑中的柴窑、哥窑迄今尚未发现其窑址。柴窑瓷器谁都没见过，只是许之衡《饮流瓷说瓷》载：“柴窑在河南郑州，即柴世宗所创作也。”据史书记载，后周皇帝柴荣仅在位五年（954—959）。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建立北宋。在短短的五年中，柴荣先后取后蜀、成、秦、凤四州和南唐的江淮地区14个州，又北攻契丹，收复莫、瀛、易三州，是战争连绵的五年，他有可能创造柴窑吗？如有柴窑，也不属于宋代名窑，而是后周。何况，至今在郑州一带未曾发现柴窑窑址。许之衡的柴窑之说，查无实据。

《中国陶瓷史》记载：“哥窑与汝窑不同，它不见于宋人记载。元人记载中有所谓‘哥哥洞窑’与‘哥窑’是否是一回事也有待进一步的证明。哥窑瓷器的窑址迄今未发现，也难以陶瓷考古所得材料与传世哥窑器印证。因此，哥窑问题至今仍是我国陶瓷史上一大悬案。”

以前所说的宋代五大名窑，只有汝窑、官窑、定窑是毫无疑问的。钧窑算不算宋代名窑呢？过去有人怀疑过，宋代是否存在钧窑，其说法是：“现在河南禹县，在宋代称之为：‘阳翟’，到了金世宗时（年号为大定，1161至1189年），才改为‘钧州’。明代万历皇帝名叫朱翊钧，‘钧’字不准用，故改称

禹州。宋代没有钧州之地名，钧窑又从何说起。”这种说法能确立吗？曰否，因为：河南禹县的古老名称叫“钧台”，传说，夏禹王在钧台建都。《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史记》：“桀召汤而囚之夏台”，“注云，夏曰钧台。”这就是说，禹王之子启，曾在钧台享神（祭神）；夏桀王曾把成汤囚于钧台。这说明，宋代前的二千年来就有“钧台”之名。而且近年来，在河南禹县北门内发掘出“钧窑烧造遗址”（见《文物》1975年第6期载《钧窑址的发掘》），钧窑烧制的瓷器早已发现，数量相当可观，质量可与其他名窑瓷器相媲美。所以，钧窑存在，毋庸置疑。

1929年古董商从长沙收购，经李茂亭、王栋廷、高田之手流入美国的那件宋钧窑花盆，与1988年5月一位美籍华人用280万美元收购的那件宋朝淡蓝色笔洗相比，恐怕毫无逊色，可能还要高出一筹。

二、云烟往事

“东四西单鼓楼前”是老北京的商业繁华区。前门大街有挂货铺。属于古玩行，鼓楼大街有旧货铺不属古玩行，西单牌楼没有古玩行业的店铺，东四牌楼一带光绪年间就有古玩铺多家，如同过眼云烟早已消失。而云烟往事却留在老古董商的记忆中。那里的古玩铺有三大家：天和斋、荣兴祥、同益恒。另外还有保粹斋、鉴宝斋、清记斋、敦华斋、毓珍祥和韵宝斋等有名的字号。

老古玩铺天和斋

天和斋是东四牌楼的一家最老的古玩铺。这家古玩铺是在

光绪十三年（1887）开业的，老掌柜名叫郭小臣，北京人。原是小本经营，买卖文物中的杂项、礼品。那时官窑名贵瓷器在民间是不准买卖的，谁家也不准摆设，有这路货算是违禁、犯王法。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违禁的文物才开始在民间私下买卖。所以，天和斋开张的前十多年，不做官窑瓷器生意，只是给朝廷做事的小官们代买些送礼用的一般文物。郭小臣做过椿树胡同著名古玩收藏家、满族人庆小山的生意。庆小山是贵族，收藏古玩很多。

1923年，天和斋的老掌柜郭小臣去世了，由少掌柜郭宗（字静安）经营。郭静安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15岁时，跟他爸爸在天和斋学徒。实际上，民国以来老掌柜就逐渐不大管事了，郭静安逐渐代替了他。郭静安在1921年前后，同中南银行经理郑瑞生交了朋友。中南银行是当时的北京四大银行（盐业、金城、大陆、中南）之一，郑瑞生是位古董收藏家，他看天和斋经营这么多年，生意还是一般，比不上荣兴祥、韵宝斋等东四牌楼的几家古玩铺，原因是本钱少。郭静安也想找个财力充足的后台。所以，两个人商量由郑瑞生投资，郭静安经营，扩大天和斋古玩铺。

郭小臣死后不久，郭静安就将天和斋的两间小门脸儿，扩大为五间大门脸儿。从外观看，天和斋成了东四牌楼的一家大古玩铺了。有了银行界知名人士郑瑞生做股东，天和斋的流动资金，可随用随取。郭静安也懂得资本周转越快越好的道理，故此他买货敢出高价、卖货快不图高利，货出手快，他是快买快卖紧倒腾。日子久了，郭静安给同行人的印象是为人爽快，做生意不“拖泥带水”。

郭静安原是“吃清瓷的”，鉴定清代官窑瓷器有眼力，对宋元瓷器缺乏研究。后来，他同庆小山结成儿女亲家，亲家对历代名窑瓷器有研究，收藏的东西也多。他又同保粹斋的经理

崔仲良合伙做宋元明清瓷器生意，逐渐他对宋元瓷器的鉴定有眼力。郭静安成为北京古玩行业中著名的古董商，天和斋成了东四牌楼一家有名声的古玩铺。

天和斋经营古瓷成千件，出色的、给人留下记忆的东西不多。老古董商们还记得，郭静安经常同崔仲良、孙瀛洲合伙做古瓷生意：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郭静安和刘宜轩制作碧玉杯盘、鼎彝。郭静安卖给日本人福田一件明代蓝地白花的法华罐，一尺多高，颜色好，完整无损，这件货的成交，曾轰动过北京古玩行业。

东四牌楼的天和斋古玩铺，从光绪十二年开业，经营到 1956 年参加公私合营，前后共 69 年。合营时这家古玩铺的货底很厚，大部分是明清官窑瓷器，宋元瓷器不多，还有些杂项和硬木家具等。

郭静安这位古玩世家子弟，从 1899 年跟他爸爸学徒，到 1956 年加入公私合营，在古玩行业里干了 57 年，在经营和鉴定历代名窑瓷器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可惜的是未动笔成文。在人际交往、社会活动中，郭静安给人以和善的感觉，40 年代曾被推选为北平古玩商会会长。加入公私合营后被分配到青山居，未能发挥他的专长，1968 年老死在京。

崔仲良经营保粹斋

崔仲良，河北冀县人，1918 年到东四牌楼义兴和古玩铺学徒。1923 年他同王孝禹合伙在东四牌楼开保粹斋古玩铺。王孝禹和崔仲良是师兄弟，崔仲良为人勤俭，生活朴素，王孝禹爱花钱，又染上吸鸦片的嗜好。日久天长，两人性情合不来，就分手了。崔仲良继续经营保粹斋，王孝禹到琉璃厂开设馀粹斋。

保粹斋古玩铺，主要经营历代名窑瓷器，崔仲良人很仔细，鉴定古瓷较细致，经他鉴定的东西，十拿九稳，一般不会有差错。三四十年代他是北京古玩行里有名的古董商，谁都知道“崔麻子”，这个绰号是同行给他起的，因他幼年出天花，面上落有麻点。

崔仲良经营保粹斋，从1923年到1949年，26年的时间积累了很多货底，大部分是明清官窑瓷器，也有少量宋元瓷器。1956年公私合营前，崔仲良将一部分货底卖给了故宫博物院，用这笔钱在北京置了一所四合院房子。崔仲良原想依靠吃房租度过晚年，到了改造旧房产时，他又自动将房子交给了房产局。

保粹斋经营古瓷这么多年，最出名的珍贵文物是：宋官窑双耳炉，胎骨坚密，釉色莹润葱翠，造型、工艺都很精巧。这件官窑双耳炉今天可称之为国宝，当时卖给上海古董商洪玉林是一万大洋。还有件明永乐白瓷大碗，也是一级文物。这件碗很薄，薄到半脱胎的程度，能够光照见影，碗上有暗花牡丹。由于胎薄釉莹，给人以一种“甜”的感受，所以又叫永乐甜白暗花大碗。再有的则是明宣德霁蓝地白花七寸盘一对。宣德霁蓝地的瓷器也属罕见之物。碗和盘都卖给上海古董商叶叔重，叶叔重将其出口到国外。

崔仲良在1957年底到琉璃厂火神庙，参加斗争“右派分子”邱震生的大会。会上一些人发言踊跃，指责崔耀庭、邱震生把持古玩商会，不让回民入会；批判邱震生否定党的领导，邱曾说党员经理是外行领导不了内行。语言激烈嗓门高，喊声接连不断，崔仲良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在会上不知如何是好，有点心慌意乱，心脏病犯了。散会后，邱震生照常同别人打招呼，上饭馆照吃不误；崔仲良惊恐万状，急忙雇辆三轮车回东四牌楼。到了地方，蹬三轮的工人说：“到四牌楼了，您

下车吧！”崔仲良不说话，蹬三轮的觉得奇怪，他回头一看，这位先生怎么脑袋耷拉下来，嘴里还流着口水！有位邻居路过这里，便说：“这不是保粹斋的崔掌柜的么！怎么啦？”便用手往他嘴上捂了一会儿，急忙说：“不好了！断气儿啦！”这时的崔仲良才年过花甲。后来，老古董商传出了“斗争邱震生，吓死崔仲良”的史话。

敦华斋和孙瀛洲

现在东琉璃厂中间路南，还有敦华斋这家古玩铺的字号。原来的敦华斋开设在东四牌楼，掌柜的是孙瀛洲。

孙瀛洲，河北冀县人，宣统元年（1909）来北京，在隆福寺三合公硬木家具店学徒。后来，给铭记古玩铺掌柜的马铭轩当伙计。1920年，他在东四牌楼开敦华斋古玩铺。这家古玩铺开始时是做古玩礼品生意，掌柜的懂紫檀、红木家具和一些杂项旧货。有些段祺瑞政府的官员到这里买点一般的瓷瓶瓷罐、白玉如意等，作为礼品送给他的上司。后来，孙瀛洲同叶恭绰交上了朋友，认识北京政府的一些上层人物。政府南迁前的几年，敦华斋没做大号生意，一间小门脸儿，在东四牌楼算是家做礼品生意的小古玩铺。到30年代，敦华斋还是不大起眼的古玩铺。而孙瀛洲善于理财，做小生意也积攒了点钱。他曾同西华门延古斋古玩铺张式如商议，由他们两人各出1 000元，请李兴之当掌柜的，在后海烟袋斜街开个小古玩铺。协议达成。买卖开张那天，同行办公益，每人拿一元钱到天丰堂饭馆交“份子”、吃饭，柜上留位小徒弟看家。孙瀛洲一直没露面。头天开张，第二天就关了。李兴之去找张式如，将开张那天发生的事跟张式如说了。张式如当即拿出1 000元，告诉李兴之将钱交给孙瀛洲，不要他入股了。后来孙瀛洲在北京

的同行中站不住脚，不得不去上海。

孙瀛洲将敦华斋交给他的六弟孙蓬洲经营，他自己带了一些钱去上海做古董生意。30年代末40年代初，孙瀛洲时来运转，在上海同孙公寿、耿朝珍合作。孙公寿是伪南京政府的一位内务部长的表兄弟，在上海古玩界吃得开、叫得响，路子宽；耿朝珍眼力好、懂得多，瓷器、青铜器都能鉴定，他们都缺少财力。孙瀛洲带去万余元，有了些资本。正赶上抗日战争开始，上海古董商的货出不了口，急需出售。耿朝珍同孙瀛洲合伙买了一批货，运回北京“窜行”（同行内交易）赚了一笔钱。路子打开后，不断地走这条路，干了几年，不仅发财，也锻炼了孙瀛洲的眼力，使他能鉴定历代名窑瓷器和青铜器。在上海站住脚，在北京的敦华斋也扩大了经营范围，孙瀛洲在鉴定界有了名望，人称“孙四爷”。

抗战胜利前，孙瀛洲回到北京敦华斋，经常同崔仲良、郭静安三人合伙做明清官窑瓷器、宋元瓷器生意。到1956年合营前，敦华斋经营古玩有36年，货底雄厚，除瓷器、青铜器外还有一大批犀角杯，孙瀛洲自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奖励，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后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孙瀛洲是位有著述的陶瓷鉴定家，他写的《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别》是篇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十年动乱中，孙瀛洲遭受不公正的批斗，因年老受刺激而亡。

三四十年代，北京古玩行中，东四牌楼的天和斋、保粹斋和敦华斋经常联合，合伙做古瓷生意。敦静安、崔仲良、孙瀛洲无论在北京的古玩商会窜货场或同行中，还是在外地客商中，只要他们中的一位遇到珍贵陶瓷，都互相邀请、共同鉴定、合伙经营。他们共同鉴定和经营的明清官窑瓷较多，具体的物件，人们记住的不多。老古董商们还记得，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明代永乐暗花牡丹梅瓶，1尺2寸高，是件国宝

级文物。这件国宝在 30 年代后期，一位上海客人拿到北京古玩商会窜货场，郭静安、崔仲良、孙瀛洲合伙买到后，卖给中南银行经理郑瑞生。郑将其收藏三年，卖给上海大古董商叶叔重。叶叔重准备将这件国宝出口卖给美国人，正赶上太平洋战争，运不去美国，在上海存放几年，又带回北京，卖给北京大古董商岳文轩是 60 万元。1947 年，上海古董商洪玉林想出 100 两黄金从岳文轩手中购买，因交黄金日期超过岳文轩规定的时间，未能成交。50 年代初，岳文轩因犯破坏文物罪被判刑，财产全部没收，明代永乐暗花牡丹梅瓶这件国宝，才安然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名贵官窑瓷器集锦云散

清末民初，古玩行流传着“城外延清堂，城里荣兴祥”的说法。延清堂是内务府总管在琉璃厂开的古玩铺，荣兴祥是广东老财陆家、郭家合股在灯市口开的古玩铺。这两家古玩铺都是光绪三十年前后开的，都经营古瓷，以明清官窑瓷器为主，那时叫“吃硬片”（即经营瓷器）。这两家大古玩铺闻名于国内外。

荣兴祥的经理是贾腾云，河北束鹿人，光绪二十六年前在北京西华门一家古玩铺里学徒，他跟郭葆昌（世五）是师兄弟。这家老古玩铺实际上是家旧货铺，樟木旧箱子、檀木条案、椅桌柜、古瓷旧物都经营，还买卖挂屏。我国有石画、壁画、布画、绢画、纸画、油画，此外还有铁画，就是以铁_鍍为画，所以也叫铁_鍍花。铁_鍍花是用黑薄铁片雕剪成山水人物花鸟，挂在白壁上，很美观。传说是嘉庆年间一位铁匠创作的，此人名叫汤鹏，芜湖人，他跟画家萧云从住邻居，经常看萧作画。他用铁_鍍模仿画作取得成功。西华门这家古玩铺，经营铁

花较多。清末的一些官僚，有钱人家的客厅里悬挂名人字画，也挂有铁花，大部分是汤鹏的作品。

贾腾云原本是学硬木家具、铁花的，偶尔见到些旧瓷器。他的师兄郭世五很喜爱瓷器，后来给袁世凯在景德镇烧制“居仁堂”款的所谓洪宪瓷。受郭世五的影响，贾腾云经营、研究明清官窑瓷器。在经营名贵官窑瓷器时，贾腾云同广东喜爱古瓷的陆家、郭家交了买卖，卖给这两家一些好瓷器。后来，陆、郭两家商议，给贾腾云集资在北京开家古玩铺。1905年，荣兴祥在东四牌楼、灯市口路西开张营业，主要经营明清官窑瓷器，还有些紫檀、红木家具以及铁花等。到了20年代初期，荣兴祥发展成北京城里经营古瓷的最大的一家古玩铺。

荣兴祥的主要货源来自盐业银行变卖宫里的抵押品、北城一带王室贵族们直接或间接卖给他们的珍贵官窑瓷器。销路在广东沿海一带新兴的大资本家，同时也做国内外来京的巨商、富翁的生意。荣兴祥不到北京古玩商会的窜货场买货，这是这家古玩铺的一个特点，因此有人说它不是古玩铺，是挂货铺。其实在1921年前后，荣兴祥经营出色的官窑瓷器，已闻名于海内外。那时，康熙墨地三彩、郎窑、古月轩等驰名中外的官窑瓷器，只有荣兴祥、延清堂两家古玩有这路珍贵稀有之物。

康熙墨地三彩，也叫墨色质地三彩。这种釉色瓷器创烧于康熙中期，到了康熙晚期就停烧了，成品的件数极少。烧制这种釉色瓷器的彩料和绘画方法，不同于传统的黄、绿、紫釉上的三彩瓷器。它是先在器物坯胎上刻出画的全部内容，再用青花、釉里红、豆青三种彩料渲染后敷釉烧成。我国历代陶瓷鉴定家评论，都认定：“五彩以描金者为贵，三彩以墨色质地者为贵。”而今，康熙墨色质地三彩瓷器，在国内收藏恐怕所剩无几！早年，荣兴祥经营这种稀少名贵官窑瓷器，也是极少，

传说这家古玩铺曾卖给香港著名收藏家冯已千一件康熙墨地三彩凤尾尊。

郎窑，也叫郎窑红，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由江西巡抚兼督察陶官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的官窑瓷器。郎窑红驰名中外，在中国陶瓷发展史和世界艺术史上倍受人重视。老一代陶瓷鉴定家都说，康熙时代有位郎廷极在景德镇仿制明代宣德宝石红，郎窑红是由宝石红发展而来的。

郎窑红的特点是色泽深艳，像初凝的牛血一样的红，所以也叫“牛血红”，釉面透亮垂流，器物里外开片，在底足内呈透明米黄色或苹果绿颜色。全器越往下，红色越浓艳。它比明代成化、宣德烧制的宝石红釉前进了一大步。民国初年时，郎窑红在市面上是见不到的，荣兴祥却收藏有成对的郎窑瓶，吸引着国内外收藏家观赏。

古月轩即珐琅彩瓷器。传说“古月轩乃清帝轩名；乾隆之轩名”，《饮流斋说瓷》中也是这样写的。清王朝覆灭后，对古月轩感兴趣的人，遍查北京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和热河行宫的避暑山庄，也没查到有古月轩。为什么珐琅彩瓷器叫古月轩？请教一些陶瓷鉴定家，都不能给予详细指教。查《辞海》（1979年版）的珐琅彩条目中写道：“珐琅彩瓷器，其底部有‘古月轩’字样。”这种解释是不确切的。因为真正的康熙、雍正、乾隆的珐琅彩瓷器，底部没有“古月轩”三字。康熙多用胭脂水及蓝色双栏楷书及篆书“雍正御制”、“乾隆御制”四字料款。珐琅彩瓷器不完全都是料款，也有青花楷书四字及六字款。六字款加“大清”二字。民国以来，景德镇烧制的仿制品，底部有“古月轩”字样，是从古玩行传出去的“古月轩”这一名词，以讹传讹，仿制品上出现了“古月轩”字样。

驰名中外的珐琅彩瓷器是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由景德

镇御窑场供烧制素胎，送北京皇宫所属的造办处选胎，再经如意馆绘画、填彩，然后入炉供烧而成。据考证，如意馆在今北海公园内画仿斋，北城有瓷窑厂选瓷胎。

珐琅彩瓷器胎、釉的特点：釉质极细，釉色极白，釉表紧皮光亮，釉内气泡极小甚密。精密洁白釉质与精密洁白的胎骨相互衬托。珐琅彩和粉彩表面相似而本质不同，粉彩是用粉调彩料，而珐琅彩则是用珐琅加樟脑油调和的一种彩料，因其质似料，所以称之为“料彩”。彩质细腻如涂脂，彩色又鲜又嫩。画面也源自如意馆供奉的纸绢画稿。自康熙至乾隆的133年中供奉皇帝的画家有一二百人，都称之为“院画派”。“院画派”人物都是当代的著名画家。鉴别这种珐琅彩瓷器，还必须具备绘画常识、懂清代著名画家的笔法画意，因为绘画是珐琅彩瓷器的艺术精髓，也是鉴别的关键一环。

传说在清代，这种珐琅彩瓷器始终秘藏于宫苑，是专门供皇帝和后妃们观赏的御用品，乾隆皇帝弘历曾说过“庶民弗得一窥也”，并不准赏赐王公大臣。1925年后，故宫博物院刚开放时，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陈列于承乾宫约二百余件，而在早先烧制时，件数也不会过多。后被南京政府移运到南京、台北。收藏在我国大陆的珐琅彩瓷器，恐怕寥若晨星。当年荣兴祥经手买卖的珐琅彩瓷器也是极少，只是三两件而已。

在十年动乱中，荣兴祥经理人的后代，曾将一对珐琅彩碗交公。这对碗胎质洁白细腻，彩色鲜嫩，画面极其工整。经专家鉴定，乃是惟妙惟肖的复制品。后经荣兴祥的徒弟司仁甫的验证，这一绝妙佳作，出自詹远广技师之手，是1921年前后仿制的，胎是来自原造办处选剩下的，彩是詹远广后挂的。当时是花400块现大洋挂彩，始终未敢公开出售。

荣兴祥经营康熙墨色质地三彩、郎窑红、珐琅彩瓷器为数

甚少，随买随卖，经手交易而已，没有收藏。但这家古玩铺的货底很厚，宋元瓷器较少，明清官窑瓷器较多。例如，明宣德之宝石红、正德的孔雀绿、嘉靖的瓜皮绿、清康熙、雍正、乾隆官窑之斗彩、五彩、三彩、粉彩、墨彩、素三彩、豇豆红、釉里红等彩色齐全、品类众多的名贵瓷器，在其他家古玩铺里看不到的，到荣兴祥则都能见到，它成为明清官窑器的陈列馆，吸引着国内外顾客。

为什么荣兴祥拥有这么多彩色品种齐全的明清官窑瓷器？原来是贾腾云和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的交往较深。盐业银行是袁世凯当大总统时的直隶总督张振芳投资百万大洋，创办的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清室败落后，宫廷、王室、贵族不断将其珍贵文物抵押在盐业银行，到期不赎，则由盐业银行封货变卖。贾腾云通过岳乾斋不断买到珍贵的官窑瓷器。古玩行人众所周知的是在 1924 年，盐业银行变卖一大批清室宫廷抵押的康熙官窑五彩十二季杯，共 400 件，以 10 块钱一件的价格，全部由荣兴祥收购。行里人不知道的官窑瓷器则更多了。

购买荣兴祥名贵官窑瓷器的中外顾客多数是有鉴赏能力和财力充余的人士。有鉴赏能力而无财力者望洋兴叹，有财力而无鉴赏能力者则不敢问津。因而荣兴祥与国内外陶瓷鉴赏、收藏家的交往较多，香港的冯已干、北京的沈吉甫、上海的梁培等著名人士，都跟荣兴祥有交往。20 年代末期，沈吉甫先生想迁往南方，曾将自己收藏的一部分名贵瓷器，委托荣兴祥代为处理。40 年代初，梁培从荣兴祥买到乾隆官窑霁蓝地粉彩金花开光、海棠式小瓶一对，乾隆官窑粉彩葱心绿龙瓶一对，乾隆官窑葱心绿带盖罐一对，以及其他一些官窑瓷器。其中的乾隆官窑霁蓝地粉彩金花开光、海棠式的一对瓶子，而今在上海博物馆收藏。

荣兴祥从光绪三十年（1905）至 1945 年，经营名贵官窑

瓷器 40 年，培养出一批长于鉴别宋元、特别是明清官窑瓷器的鉴定人才，他们是谢瀛轩、吉迎东、谢君忱、司仁甫、刘尊三、苏觐墀。这些人在古玩行业中曾显露过头角，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眼高、看不起一般古瓷，在事业上未取得大的成就。

1946 年初，荣兴祥的股东们要求分货，不愿再继续做股东，经理贾腾云年老体衰，有本事的徒弟们都领东当掌柜的去了，故此停业。当时北京古玩商会的会长崔耀庭和各位理事都参加了荣兴祥各股东分货协定举办的宴会。崔耀庭见分到一件 60 厘米宽、10 厘米、3 米长的金紫檀大条案，便开口说：这件大条案，你们几家不好分，作个价钱归古玩商会。其余全部货底都按股金多寡、分给各位股东，贾腾云是人力股也分得一份。驰名中外、赫赫一时的荣兴祥古玩铺，就此关闭，真是“苦心经营四十载，一旦分开化乌有！”

苏觐墀的法国之行

苏觐墀，河北冀县人，1912 年到荣兴祥古玩铺学徒，是贾腾云的弟子。1917 年后，荣兴祥的大师兄谢瀛轩、二师兄吉应东等人，离开荣兴祥，自己去开古玩店。贾腾云则依靠苏觐墀做买卖。苏觐墀人很聪明，做事有魄力，在荣兴祥独当一面。荣兴祥是家大古玩铺，苏觐墀如鱼得水，在这家古玩铺里施展才能，很快被一些鉴赏家、收藏家所赏识，在同行人中也有了名气。

1923 年，北京兴隆街有家大财主姓徐，前清时是官宦人家，苏觐墀做徐家的古瓷生意，一来二去的跟徐家的大少爷、二少爷交上了朋友。徐大少爷看苏觐墀仪表非凡，很气派，又有鉴别古瓷的眼力，就想邀请他开家古玩铺，赚些钱，以免坐吃山空。有一天，徐大少爷同苏觐墀商量出资 10 万元，由苏

苏觐墀当经理，在东四牌楼开家古玩铺。不知怎么回事儿，贾腾云得知了这条消息。他马上穿戴整齐，长袍马褂，提溜着文明棍去见徐大少爷，见面便说：“听说大少爷您要拿钱让苏觐墀开买卖，我跟您说，苏觐墀这小子跟我学了十多年徒，眼力还是不行，他没少给我买假货，您可不能拿钱往坑里扔！”徐大少爷听贾掌柜的这么一说，就变了卦，不肯出资了。

苏觐墀无可奈何，去求徐家二少爷帮助筹资开古玩铺。二少爷说：“我不管家，‘官东儿’的钱我拿不出来，我和二奶奶的体己钱，也只有两万块钱，你看着够，就拿去开买卖吧。”1924年，苏觐墀在东四牌楼开办毓珍祥古玩铺。这家古玩铺主要经营明清官窑瓷器。苏觐墀在荣兴祥做惯了名贵官窑瓷器的大号生意，不愿做零碎买卖。做大号买卖又竞争不过荣兴祥，所以生意不太兴旺。

1924年，正是军阀相互开战时期，北京政府有时由皖系控制，有时则是直系或奉系军阀说了算。一些军阀、官僚新权贵，在京购买房产，布置居室、客厅，都要买好字画，以示文雅；买些一般古瓷，证明富有。而那些上等官窑和御窑瓷器，他们不懂，只有收藏、鉴赏家才了解这种古瓷的价值。因此，那时一般官窑瓷器和字画的买主是不贬其人，而稀有名贵的御窑瓷器，则少有人问津。毓珍祥的经理苏觐墀的经营思想跟那时的文物生意形势对不上号，所以经常不开张。行外人说古玩铺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只不过是形容古玩铺能赚大钱而已。果真三年不开张，则无法维持生活。何况毓珍祥古玩铺开业时间短，货底不厚，资本不多，买了上等官窑、御窑瓷器卖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开。所以开业几年都不大景气。

苏觐墀见在国内货卖不出去，携带一些珍贵的明清官窑瓷器，去法国巴黎。本想能赚大钱，弥补几年时间没怎么获利的损失。在巴黎早有法国人魏武达开的、万年克开的几家经营中

国文物的古玩店，中国古董商从北京、上海为他们进货。法国人买中国古玩，愿到法国人开的古玩铺去买，不愿从在巴黎开设商店的中国古董商手里买东西。苏颢墀在异国他乡，人生地疏，只认识些法国的古董商人，只好将货卖给他们，他们是“中国通”，不肯出高价，“货到地头死”，不卖不行。苏颢墀的法国之行失败了。毓珍祥古玩铺在东四牌楼开了不到 20 年就关张了。

苏颢墀在荣兴祥的 12 年，是红极一时，古玩行里人都承认他鉴定古瓷、特别是晚清官窑瓷器有眼力，又会做生意。当他自己开买卖时，则不能审时度势，看不起一般文物，因其利小而不为。空有鉴定本领，未能成其业。后来，为了维持生活，开了家小油盐店，卖起油盐酱醋来了。

一对珐琅彩碗，关了韵宝斋

同治进士，以第一人及第的头科状元、官至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徐■的后裔徐星曙先生，于民国初年出资万元，在东四牌楼开设韵宝斋古玩铺，由荣兴祥的徒弟谢瀛轩、吉应东和栾静波经营。这家古玩铺以经营上等官窑瓷器为主，不吃零碎。

1921 年前后，北京城里的上等官窑瓷器虽多，但也不是轻易到手的。当时，荣兴祥、延清堂两家大古玩铺，基本上垄断了明清官窑的好瓷器。而荣兴祥的经理贾腾云老谋深算、门路宽广、以稳重著称。徒弟谢瀛轩等人在经营上怎么敢与师傅贾腾云相比，他们的门路窄，货源自然小。他们是好货买不到手，一般古瓷又看不上眼。故此韵宝斋经营十几年，不见起色。

以追求瓷器中之珍品为经营方向的韵宝斋，终因买卖一对

古月轩碗而关闭。1926 年前后，谢瀛轩从某王府的太监手里买了一对乾隆御制珐琅彩瓷碗（珐琅彩瓷器，俗称古月轩）。这对瓷碗是胎薄釉细，口径不到 14 公分，绘画非常工整，画面上既能看出笔法，又能看出阴阳，是出自如意馆名画家之手，实属稀有难得之珍品。买价不高，只花 1 200 大洋。后由某经理人卖掉，报账 5 000 元。不久便传出风声说某经理人卖到万元以上，交柜 5 000，剩下的独吞了。因此，师兄弟三人争吵、散伙，韵宝斋关了张。

同益恒的四代人

东四牌楼灯市口椿树胡同里有家古玩铺，是光绪二十六年前开张，1956 年参加公私合营的老古玩铺，字号叫同益恒。老掌柜张聘之，东家姓姜。起初这家古玩铺经营些古玩杂项，买卖零零碎碎，没像样的古董。

张聘之有两个徒弟，大徒弟萧延卿，河北束鹿人，光绪末年跟他学徒；二徒弟张彬卿，河北冀县人，宣统年间跟他学徒。张聘之经营古玩，一生平平淡淡，可是他的徒弟们和徒孙们，在古玩行却都是人物，是国内外知名的古董商。

1899 年，我国在安阳一带发现殷墟，1928 年开始考古发掘。1931 年前，北京古董商便有不少人跑彰德府，彰德府的人也携带商代新出土的青铜器来京销售。那时，安阳小屯村周围的发掘混乱，国民政府无人负责保护文物，一边发掘一边走私，大量商代青铜器通过古董商流入西方国家。

商代从盘庚至纣（辛），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建都近 300 年，这里是我国最早的一个都城，地下埋藏的文物非常丰富，这些文物对研究我国商代后期的社会与历史有很大意义。古董商只为赚钱，从不考虑国家民族的利益。1931 年前

后，不少人在安阳（那时古玩行人称为彰德府）私人发掘，他们用竹杆子探土，下层土如松软，则雇人挖掘。古董商们听到这种消息，则去围观，亲眼看挖出什么来，然后选购。把手伸入袖口，用手势讨价还价，争相购买，吵吵嚷嚷，政府官员无人过问。

同益恒老掌柜张聘之于民国初年去世，东家姜府选中张聘之的两个徒弟萧延卿和张彬卿经营同益恒。他们在1921年前后，就买卖一些青铜器，主要由山西进货，卖给外国人。只是有买的，有卖的，中间经手而已。通过买卖，他们逐渐摸索出鉴别古代青铜器必须从铜质、造型、纹饰、铭文、锈色、做工、气味、声音入手的经验。到了1929年，萧延卿则长驻彰德府，私人挖掘出土金石文物，有时他包坑儿，讲好价一坑儿的东西都归他。在土里埋了近3000年的东西，出土时稍不慎，则易破碎，完整之物甚少。萧延卿是碎破的东西他全要，人们愿意成坑儿包卖给他，在彰德府他逐渐有了名气。

张彬卿在北京主持同益恒的门市经营。1920年前后，倪玉书、陈鉴堂先后来到同益恒学徒。张彬卿、萧延卿带领徒弟在外地收购金石，在北京销售。两位徒弟经常去山西大同、陕西。

萧延卿从彰德府收购来的商代青铜器，破碎之物，请张济卿整修。张济卿手艺高超，能将破碎的古铜片，整修完好，并可复制。经他手给同益恒整修和复制的商代青铜器不计其数。同益恒将这些商代兵、礼、乐等青铜器整修、复制件和原件，大部分出售给卢吴公司，由卢钦斋卖给美国、法国的博物院和收藏家。

1939年，同益恒的第三代人，萧延卿、张彬卿的徒弟倪玉书、陈鉴堂辞柜，两人合伙开设鉴宝古玩店，经营青铜器和石器。40年代初两人分开，倪玉书继续经营鉴宝古玩店，陈

鉴堂开设清记古玩店。

清记古玩铺，于40年代初鉴定一件西周青铜鸭子壶，轰动过北京古玩行业。鸭子壶是新坑，出土时间不久，绿锈斑斑，满身花纹，造型奇特，照片被收录在荣庚编辑的《商周彝器考》中。陈鉴堂曾委派他的徒弟张焕庚住彰德府。在彰德府，张焕庚同他师爷萧延卿竞争收购出土青铜器，在当时的古玩行业中传为佳话。清记收购的青铜器，大部分珍品卖给上海叶叔重，叶叔重转手销往美国。

陈鉴堂在安阳同萧延卿争购出土文物，同益恒的张彬卿在北京的同行人中，揭陈鉴堂、倪玉书的底，说他们请张济卿铸作三个金人，唬了外国人，发了财，两人分了手，各开各的买卖。倪玉书尝到甜头，打那以后，买到好东西他收起来，找人复制，卖假的留真的。还说了倪玉书的一段“假扮道士窥探云冈石窟”的故事：

“倪玉书我这位徒弟，打学徒就爱钻研事儿，懂得铜器、石造像、浮雕，会写篆书，毛笔字写得不错。日本人占了北京后，他对石佛头有了兴趣，听说大同武周山里有两里多长，五十多个石洞，洞窟里有五万尊石佛，都是北魏石雕。不知道他从哪里打听到，武周山上有‘道观’，老道看山守佛窟。于是，倪玉书钻研起道教，还入了‘九公道’，假扮成‘俗家道士’，穿上八卦袍，足踏云履，手持拂尘，声称信奉正一教派，来到武周山。可也别说，他真把武周山上的老道给唬了！听说他在那里住了一个来月。一年之后，倪玉书卖了北魏佛头，有人说是真的，有人说是假的。反正是真的他留下，照样复制，卖假的。”

同益恒这四代人：老掌柜张聘之不是“吃”金石的，经营些古董零碎，民国初年就去世了。第二代的萧延卿、张彬卿“吃”起金石来，从收购发掘殷墟之青铜器中，懂得了金石鉴

定，并在国内外有了名声。他们为东家赚钱不少，个人所得不多。同益恒加入公私合营后，萧延卿回河北束鹿县老家，老死于乡里。张彬卿老来生活困难，在北京隆福寺摆小摊，卖古董小零碎，勉强维持，后双目失明，死在北京。第三代的倪玉书、陈鉴堂，“七七事变”的第二年，自立门户，发了财。在40年代，倪玉书、乔友声和黄镜涵成为文物鉴定界的“金石三杰”。倪玉书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撵回武清县的老家，自溺而亡。

这四代人经营、鉴定过多少商周青铜器和北魏古雕等稀世国宝？谁又能知道呢。知道的人，又岂肯轻易说出。老古董商中传说，上海有位孙麻皮，这个人幼年出天花，脸上布满麻子，中年发了大财，上海人称他孙麻皮，孙麻皮有钱爱买古玩，他买了座古铜敦，后来卖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座古铜敦，有人说是同益恒的某人代卖的，卖给上海的叶三，叶三卖给孙麻皮的。

传说中的这座敦上铭文有二百余字，记载周武王伐纣之檄文。武王伐纣乃公元前11世纪，联合“庸、蜀、羌、■、微、犛、彭、濮人，于商郊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乃誓”。（《史记·周本纪第四》）《周礼天官五府》：“若合诸侯则共珠槃玉敦。”敦盛食，槃盛血，歃血为盟，共祭天地。若果真乃武王伐纣时所用之敦，并有如此多之铭文，则是无价国宝，而至今仍保存在国内，乃大幸特幸！

师傅揭徒弟底

张彬卿在1939年同萧书农做古铜鸭子壶的生意时，两人没谈妥生意，聊起大天来了。从聊张济卿修理古铜鸭子壶说起，说张济卿整修的活儿好，仿制的也妙。

张彬卿说：张济卿的手艺是真好，他给倪玉书、陈鉴堂做了三个金人，唬了外国人，赚了大钱。钱赚了，两人分开干了。这路活儿是怎么干的呢？他们先到故宫博物院看好了那陈放着的铜造像，选好仿哪一尊造像，再照样画图，按图制作模具。模具做好了，溶化金、银、铜混合液浇铸，不完全是金的，他们放的黄金多了，成了金人。浇铸后，再做刀工修模，刀工修的活儿细，要照原图样修，刀工要用刀圆润。修整后浸入盐水，经日晒生出紫锈，再入土埋藏，要经过冬夏，挖出后呈现出锈色斑纹，跟新出土的一样。张彬卿说完这一段，告诉萧书农：“这可是手艺人的绝密，说出去别人会做了，他的饭碗子就打啦！”

做好了三个金人，他们在外国古董商中宣扬他们从山西收购到新出土的北魏佛人金造像。外国的行家看了，有的认为是秦汉金人，还说：“你们中国史书上有秦始皇铸金人。”有的鉴定是北魏真金佛人，谁也没看出是仿制品。

其实，我国铸造人像最早的要算《孔子家语·观周》中记载的“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此古之慎言也。”造金人铭文，告诉人们说话要谨慎。《史话·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销天下武器，铸金人十二立于宫门之前，是作为装饰物，以示其威。《国语·越语》记载：勾践为范蠡铸造的铜像，是为了纪念范蠡而铸，是纪念品。《汉书·霍去病传》：“收休屠祭天金人”。这个金人则是作为偶像崇拜之物了。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佛教传入中国，后经三国两晋时代佛教的传播，佛像盛兴。北魏时我国铸造的佛像工艺精湛，技艺高超。所以，北魏鎏金造像的艺术价值很高，不仅年限久远，而且造型优美。所谓鎏金造像，乃是铜胎鎏金，不是黄金胎质。古代铜造像居多。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所记载的“金人”，也不是今日之黄金所铸，

乃是一种合金物，也非今日之铜。

外国金石鉴定家，有人认定是秦、汉金人，从历史上考据也是没根据的，秦始皇铸金人是人之铜像，高大魁梧，倪玉书、陈鉴堂请他鉴赏的乃是三寸来高的小佛人，中国秦代无佛之一说。当时，他们有一种错觉，认为是新出土的，这是由于金人身上的锈色极像刚从土里挖出的，仿制的锈色既像又美，从而断定，这是一种新发现，发现中国古代有黄金造像。所以，如获至宝，争相购买。

德国在北京开办的鲁麟洋行买去一尊金佛人，日本在北京开办的山中商会买去一尊金佛人，另一尊金佛人被法国人魏武达带到巴黎为之代销。每尊金佛人均以数万元价格出售。从此，倪玉书、陈鉴堂有了钱，发了财，买了房子搬了家。陈鉴堂搬到东四南椿树胡同东头，倪玉书在苏州胡同三元庵。古玩行有人说俏皮话：“铸金人分赴德、日、法，弄得师兄俩分了家。”陈鉴堂的财力足了，派徒弟去安阳，遇上新出土的青铜器，便抢着收购，成了张彬卿的强硬的收购对手。所以才引出了师傅揭徒弟底的故事。

三、珠宝荟萃

珠宝荟萃在北京前门外廊房二条，狭窄的街道，长不到300米，两旁林立着百余家珠宝玉器店，珠宝钻翠、美玉饰件和摆件，奇光异彩，琳琅满目，被中外人士称为“玉器街”。

北京玉器行业，始于乾隆时代。乾隆五十四（1789）年玉器行在琉璃厂小沙土园长春会馆内成立行会，作为酬神议事之场所，多年捐款，颇为壮观。光绪二十六年（1900）被毁于一旦，又由玉器行人捐款修建。宣统二年（1910）改为玉器商会。1951年玉器业公会会员46户与古玩业合并，称历史

艺术文物业，直到公私合营。

玉器街最老的字号是聚珍斋，最著名的人物是翡翠大王铁宝亭。

聚珍斋传奇

聚珍斋珠宝玉器店是家老字号，从 1848 年杜老二在沈阳挑翠花挑子卖翠花，到 1948 年关张，经营珠宝翠钻、美玉珍宝，长达百年。若从聚珍斋由沈阳小西门迁来廊房二条算，在京经营长达 87 年。

这家老珠宝店的东家姓杜，河北宝坻县（今属天津市）杜家台人；老掌柜姓沈，1917 年去世，后由李仲五经营，李仲五于 1942 年去世，由刘敬斋经营到 1948 年。

在宝坻县杜家台的年老的农民中，在北京的老珠宝商中，流传着这家珠宝店神话般的传奇故事。

“仙人”指路去奉天

昔日的宝坻县是十年九涝、“蛤蟆撒泡尿都能涨大水”的地方。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第三年，宝坻县涨了一场大水，已经是连续涝了三年。杜家台的杜寡妇在家无法生活下去，领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逃荒，住在本县一家财主的场院草房里。财主见她十分可怜，跟她商量把二小子卖给他，她想孩子小不懂事，卖给人家，母子连心怎舍得？又一想，跟着自己挨饿，不如给人家去吃口饱饭。财主找位“中人”，先劝说，后写了字据，杜寡妇押了手印，拿着卖孩子的五块银元，领着大儿子回杜家台，过那难熬的岁月去了！

转眼十来年过去了。一天，二小子回来了，后边跟着一位老头。杜寡妇喜出望外，看孩子长大了，挺结实，她光顾看儿

子，没跟老头儿打招呼。老头儿开口说话，述说这孩子财主家这十来年的经过，说他不好好念书，经常跟财主的孩子打架，财主管教不了，让我这个“中人”把他领回家，找她妈去管。当年写的字据也带来了，钱也不要了，财主图个省心。

杜老大是个二十多岁的庄稼人，带着弟弟在家干庄稼活，娘儿仨的日子还过得可以。道光二十五年的春节，杜老二看人家过年院里都立起天地杆，杆上挂灯笼，贴上“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的红纸黑字条，他也照样立起天地杆挂灯笼。初一早晨，天地杆上的灯笼灭了，朝东北方向烧了一道口子。杜老二琢磨这是怎么回事儿，要着还不全着，偏偏在东北方向烧个口子？他编出一套迷信的说法，告诉他妈说：“这是仙人指路，让我去东北。”他妈说：“东北可冷了！听说男人站着撒尿，都要拿棍儿打，不然就冻上啦，可去不得！”老二说：“我二大爷大奉天（沈阳）有副翠花担子，跟他去干，冷点，总比在这十年九涝的地方种庄稼强。”杜寡妇一听也有道理，开春就打发孩子去沈阳了。

杜老二化祸为福开聚珍

杜老二在奉天找到他本家的二大爷。杜老头住在奉天小南门外的一家店里，这家店里住着几副翠花挑子、十来个卖翠花的。杜老二看他二大爷岁数大了，抢着给他干活儿，扫地做饭，出门给挑挑子。二十来岁的小伙，还识几个字，长得也体面，懂事不打架了。杜老头很喜爱他，教他看翠，分辨什么是翠的，什么是料的，带他找货源串小市，领他沿街认识各大宅门。没三年，杜老二学会了挑挑儿做翠花生意。

道光二十八年（1848），有一天杜老头跟他本家侄儿说：“我这把骨头还是扔在咱们老家，死了进杜家坟，不能扔在关外，凑几个钱我回老家，买卖你熟悉了，挑子就归你，你在奉

天干吧！”杜老二送走了本家二大爷，自己挑挑子卖翠花。

那时，卖翠花的走街串巷，专门在大宅门门口吆喝。吆喝的声儿像唱歌似的，一声：“翠花儿哟……”，声儿拉得很长。老妈子出来跟卖翠花的见面，太太、小姐们不照面，由老妈子传递翠花匣子，送给太太、小姐看，选翠花，看好了由老妈子出面讲价。每逢卖了件翠花，杜老二都给老妈子点钱，作为酬劳，他人缘好，所以生意也好。小伙子长得挺漂亮，又会说话，嘴儿甜，岁数小的他叫大姐，中年的他叫姨，老妈子也喜欢他。住在一家店里的十来副翠花挑子，他的生意比谁都好。“同行是冤家”，别的卖翠花的，老想法子要把杜老二的买卖搞垮。

有一天，一位卖翠花的中年人从小市上偷着买了一幅 12 出的《春宫图》，里边画着男女性交的 12 种姿式，又偷着将《春宫图》用红纸包好，装在杜老二挑子的翠花匣子里。他想，往太太小姐手里送这玩艺儿，非挨揍不可，挑子也得让人家砸了。杜老二不知匣子里有这玩艺儿，挑着挑子走街串巷去了。在沈阳城里一家大宅门门口吆喝一声：“翠花儿哟！”，一位年轻的老妈子笑嘻嘻出来了，说：“今儿是太太的生日，多拿几匣，太太多挑几件。”老妈子抱着三个翠花匣进去了。杜老二在外面等了有半个时辰，老妈子出来说：“卖翠花的！你那红纸包里的东西要多少钱太太看好了，别的都不要，就要它啦！”杜老二心想匣子里没有用纸包的东西，嘴里却顺口说出：“太太赏 500 两吧！”老妈子说：“怎么那么贵呀！”他说，“那是件难得的东西，我孝敬太太啦！”老妈子进去了，不一会儿拿出 500 两白银，说声：“今儿你运气好，太太高兴。”杜老二顺手拿出 5 两给了老妈子，老妈子乐颠颠儿地回去了。

杜老二不知意外之财是怎么来的，自己纳闷儿，哪儿来的红纸包？但他沉住气，回到店里照常一样，谁也不知道他一下

子弄到 500 两。那个给他往匣子里塞《春宫图》的人，看他没事儿似的，甚觉奇怪。杜老二手里有了 500 两纹银，到小西门里找家一间门脸的铺面房，花几个钱租到手，开了家翠花铺，起个字号叫聚珍斋。这些是道光末年的事儿。后来，由塞《春宫图》的那个人把事儿捅出去了。打那儿以后，翠花挑子偷着卖《春宫图》，珠宝玉器铺、古玩铺也卖这路玩艺儿，越来越花哨，什么《金瓶梅插画》、《西门庆潘金莲大闹葡萄架》、《乾隆皇帝和嫔妃》，五花八门，有的还出自名家之手，作为艺术品销售。直到 1950 年，才彻底禁止买卖这路玩艺儿。

聚珍斋迁来北京

聚珍斋在沈阳小西门里经营翠花首饰十来年，杜老二积蓄了些钱，在火烧圆明园后，他把买卖迁移来北京。那时，北京前门外珠宝市开了许多家首饰楼，卖金银首饰；廊房二条开了不少家珠宝玉器铺，经营珠宝钻翠。杜老二选中了廊房二条，将聚宝斋迁到那里。到了同治年间，杜老二将聚珍斋交给一位姓沈的经营，他自己当东家，回到宝坻县杜家台过田园生活。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由大栅栏路北放火，前门大街和廊房二条一带铺户很快化为灰烬！聚珍斋被焚遭劫。这时，杜老二已不在世，由少东家出了钱，重新恢复聚珍斋，沈掌柜继续经营。

经过几年的时间，大栅栏、珠宝市、廊房二条一带，才恢复起来。宣统年间，珠宝玉器行业才恢复兴旺。1915 年，廊房二条修建起石渣马路，街道才显得整齐。那时的廊房二条，屋宇毗连，参差错落，有百十来家珠宝玉器铺。虽然街道窄短、门脸狭小，但整个街道的店铺里收藏着奇珍异宝，真是珠光宝气，琳琅满目。故外国人称之为玉器街。

玉器街的百十来家的珠宝玉器铺，有回民经营的，也有汉

民经营的。如按经营方式分，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蒙藏庄，主要经营玛瑙、珊瑚、松石、顶珠、项链、钳子披挂、镶嵌松石等。二是本庄，主要经营翎管、扳指、朝珠、顶珠、帽正、带钩、带扣、烟嘴、烟壶、图章、别子；供妇女装饰用的各式各样的宝石、翡翠、碧玺、钻石戒面、戒指、耳环、坠子、镯子、扁簪等。三是洋庄，主要经营各类品种的首饰、花片、摆件等统为洋庄货。洋庄商品分法国庄、南洋庄、美国庄和日本庄。聚珍斋是汉民经营的本庄珠宝玉器铺。

沈掌柜经营聚珍斋做本庄生意，收了六个徒弟，大徒弟谢楚卿、二徒弟刘锡臣、三徒弟李仲五、四徒弟刘赫卿、五徒弟刘敬斋、六徒弟任献亭。都是一个师傅的徒弟，但本事则各不相同，最有鉴别、经营能力的是李仲五，其次是刘敬斋、刘赫卿。其余的人都平平常常或者是根本无能。1917年，沈掌柜去世了，东家选出李仲五当掌柜，刘敬斋、刘赫卿协助，其他师兄弟，照拿人力股，不做买卖看堆，照样开钱。

李仲五振兴聚珍斋

李仲五于光绪三年（1877）出生于通县西集镇，光绪十八年跟聚珍斋沈掌柜学徒，在聚珍斋干了二十多年才当掌柜的。他鉴别珠宝钻翠的眼力好，清末民初他长住山西太原和太谷县，在那里收购古玩、珠宝、翡翠、钻石。原来山西的财主比别的省多，屋宇高大，琴棋书画、古董玩物、金银首饰、珠宝钻翠，在几户老财家收藏很丰。有的财主怕人抢，把千斤白银冶炼成一个银球，谁也拿不走，切不开。可是他没想到，使他败落的并不是外来人的抢劫，而是他的子孙吸毒成瘾，卖光了他长年积累起来的财产。

李仲五长住山西，摸透了山西老财们的脾气秉性和生活习惯，只要他进老财的屋里坐一会儿，就能知道老财家是不是缺

钱花。棚顶上的耗子“呼噜呼噜”乱跑，可能是不急用钱，呆了半天棚顶上没动静，准是财主没钱花了。为什么棚顶上的耗子会做出缺钱花的预报呢？原来是山西老财破落后，多年不重糊天棚，老棚顶上养了许多耗子，也不放耗子药灭鼠。人在屋里抽大烟，抽得日久天长，烟味熏得耗子也上了大烟瘾。主人抽足了烟，耗子也过足了瘾，兴奋地乱跑；主人抽不上大烟或抽得少，耗子没过瘾，一个个地都蔫儿了，棚顶上就没动静。主人缺钱花时，买他的东西能便宜点，不缺钱花，就要多花几个钱买他手里的东西。李仲五不断从山西买来珠宝钻翠，聚珍斋在北京卖给顾主，赚了不少钱，东家才知道李仲五有本事。所以，沈掌柜一死，东家便选中了他当掌柜的。

李仲五当了聚珍斋掌柜的，对大师兄、二师兄很尊重，放手让师弟们去干，他本人在一段时间里，还是在山西收购，北京的门市买卖由刘敬斋、刘赫卿经营，大事找他商量，小事由二位刘掌柜作主。聚珍斋在1921年前后买卖做得很红火，跟廊房头条的三阳、开泰几家大金店关系搞得好，还和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关系密切。1925年前，溥仪仍居宫里，开销不够时，将一些古董文物抵押在盐业银行，逾期不赎的物品，盐业银行请聚珍斋代为“封货”。由聚珍斋出面，邀请各家古玩铺到古玩商会窜货场看货，看后填写封货单，单上有品名，价格由购买者填写，然后将封货单交给主管人，最后拆封标，逐项核算，以出价最高者中标。聚珍斋分别通知中标人交款取货。现在能想得起来的有：岳文轩曾封到一对雍正官窑东青釉瓶，是1700银元；张云岩封得一堂乾隆官窑十二季杯；还有件乾隆官窑包袱瓶，是件少见的、奇特的官窑粉彩瓷器。还有乾隆年间制作的玉石摆件，是宫内的装饰品，最著名的是件碧玉仿商代青铜器花纹式样的提梁卣。由于聚珍斋代盐业银行出面封货，所以李仲五、刘敬斋跟古玩行的人较熟悉，交往较多。聚

珍斋也请古玩行人到他那里去看瓷器、图章、字画等，有时也派人将东西送到琉璃厂古玩铺鉴定。同李仲五、刘敬斋来往较多的古玩商有：韩少慈、杨伯衡、萧书农、陈中孚、岳文轩等人。

聚珍斋经过李仲五、刘敬斋的十多年经营，买卖兴旺，在古玩、玉器行业中有了声望，在玉器街是家出类拔萃的珠宝玉器铺。

高殿卿“塞翁失马”进帅府

高殿卿是李仲五的外甥，通县张家湾大辛庄人，小时候在北池子瑞增源珠宝店学徒。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长得漂亮，跑天津和北京各地买卖翡翠、钻石、珍珠、玛瑙等各种首饰摆件。20至40年代时，古玩、珠宝商都讲究穿着打扮，经常出入大宅院见老爷、太太，甚至小姐，这就得像个样儿，谈吐要文雅，行动要有礼貌，不然做不了这路生意。高殿卿够样儿，一双大眼睛像会说话似的，鼻直口方，五官端正，个头儿中等略高，人又机灵，瑞增源掌柜的让他跑宅门。20年代末，有一天他到西堂子胡同唐在礼的府上，拿着一对翡翠扁豆给唐太太看，太太看完放下了。高殿卿回到瑞增源，便去跑别的买卖去了。过了几天，他忘了这对翡翠扁豆是不是拿回来了。有人告诉杨品侯掌柜的，高殿卿从柜上拿了对翡翠扁豆没拿回来。杨品侯眼珠儿一转说：“那是800现洋买的，拿哪儿去啦？你问问他。”高殿卿打了马虎眼说：“我拿回来了！”嘴里说，可心里记不准了，他又不好意思去问唐太太。实在憋不住了，跑到唐宅跟唐太太说：“我送的那对翡翠扁豆，您看怎么样？”唐太太一怔说：“你不拿走了吗！”高殿卿“噢”了一声，没再往下说，不一会儿，他便告辞走了。没过几天，杨掌柜见他货不交柜，便把他散了！

高殿卿没辙了，到聚珍斋找他舅舅李仲五。李仲五给他出主意，让他住在聚珍斋自己跑买卖，跟刘敬斋商量做个外股，可以拿柜上货，赚钱按股儿分。高殿卿同刘敬斋一讲，刘自然同意了。高殿卿继续拿些翡翠首饰给唐太太看。唐宅有五个老妈子。一天，唐太太发现老妈子给她洗的绣花枕头没了，她到处找，找不到，就到下屋老妈子住的屋子里去翻，老妈子们都打开自己的箱子给她看，哪个箱子都没有。有个箱子没打开，因为这位老妈子回家了。唐太太让人把它撬开，撬开一看，果不其然枕头在里边，再往底下翻，纸包里包着一对翡翠扁豆，唐太太将东西拿回自己屋里，把这位老妈子解雇了。

唐太太越想越对不起高殿卿，心里过意不去，想补补这份情。一天，高殿卿到唐家，唐太太说：“过两天你多带点好的翠活、钻石、宝石首饰来。”高殿卿按时到唐宅，唐太太让他坐一会儿，便跟他说：“今天我带你去麻线胡同顺承王府。”高殿卿激灵一下子，心想顺承王府不是张学良住的地方吗？便问道：“是到少帅府？”唐太太说：“我让你见识见识，领你见见少帅夫人于凤至。她喜爱翡翠、宝石、钻石等首饰，爱买珍珠、翡翠、钻石、红蓝宝这些玩艺儿。”高殿卿喜出望外，连连称谢。唐太太赶忙说：“先别谢，有了新买主，别忘了老买主就行。”

高殿卿年轻又机灵，会侍候人。他同买主交往几次便能了解买主的心理，不用说话便知买主想买什么，不想买什么，很有“机灵辨儿、眼力见儿”，嘴又能说会道，对珠宝钻翠的评价能讲出一套道理，所以受到于凤至的赏识。高殿卿在顺承王府，不仅做于凤至的生意，还做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珠宝钻石买卖。聚珍斋给他提供了大量的货源，并且都是一些珍品。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高殿卿送到帅府的珠宝钻翠等饰物几十件，价值几十万元。有的已经看妥付款，例如一块

由鹦哥绿翠扳指改的戒指面，于凤至就给了1.2万银元，还有其他首饰小件也都给了钱，但一部分还放在帅府，主人没给价。

“九一八事变”发生了，顺承王府进不去人，高殿卿去了几次，都被副官挡驾，任何人不准进帅府。聚珍斋的掌柜李仲五心急如焚，几宵没睡好觉，催促高殿卿去少帅府，去了多次都碰壁。李仲五想，我这几十万块的好货都在少帅府，东北军若有个一差二错的，聚珍斋也要跟着完了！几个月后事态平息，东北军撤到山海关内，高殿卿继续做少帅府的珠宝钻翠生意，李仲五悬着的心才落下来。到“双十二事变”后，高殿卿的少帅府生意做不成了，同聚珍斋按股算账，他分得五万银元的赢利，聚珍斋则赚了几十万。聚珍斋除经高殿卿做张少帅、于凤至、赵四小姐的珠宝钻翠生意外，也做一些官僚、富绅、巨商、贵妇的生意，同时也赚了不少钱。二三十年代聚珍斋的东家，成了宝坻县杜家台的有名大财主，杜寡妇早已不在人间，杜老二也已作古。但他们发家的故事，一直流传在杜家台一带的农民中间。

聚珍斋的后十年

从日本人打进北京城、北京沦陷，到1948年聚珍斋关张的十多年间，由于李仲五（1941年去世）、刘敬斋等人鉴别珠宝钻翠的眼力好，又善于经营，聚珍斋的生意也曾兴隆一时。

“七七事变”后，汉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伪临时政府，1939年后并入汉奸汪精卫的伪政权，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朱琛、王克敏、王揖唐等人在日本人的指使下，想在北平成立一家大银行，经与银行界、廊房头条及二条的大金店、珠宝店商议，推荐王绍贤担任总裁，王绍贤不干，又推荐由在东北的中国银行经理汪时珷担任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的总裁。汪时珷懂

古玩字画、爱玉石图章，也买些珠宝钻翠。那时，汉奸人物经常给日本人送礼，到古玩铺、珠宝店买礼物，有的官僚自己也买些高档珠宝钻翠。聚珍斋跟政委会的头子们有生意来往，汪时瓛也是位主顾，并由他们介绍一些有钱的人家、贵妇和绅士到聚珍斋买东西。

20 年代日本人不爱翠，从 30 年代初期日本人开始喜爱翡翠，并逐渐发展起来。起初他们到北京珠宝店买些假货，后来越买越精、越玩越内行，到了 1936 年前后，日本人已经开始买上好的真货、要高质量的翠件。日本买翠的知名人物是依田忠，他同廊房二条的梁三、铁巴都有交往，曾在北京东单牌楼开过珠宝店，是日本大珠宝商。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日本妇女流行戴翠簪，一个日本贵妇头上的大发结需要三至五个翠簪，用绿色翠簪别住头发的发结，头发乌黑、翠簪碧绿，衬托着白嫩的面庞，格外娇艳多姿，所以很流行。那时，日本珠宝商人曾成群结队到北京来买翠扳指，将翠扳指改制成翠簪头，镶在金钗上，一副翠簪在日本能卖三至五千元，好的能卖上万元。几年的时间，日本人从北京经过珠宝商买走了上万个翠扳指。聚珍斋经营的翠扳指也不少于百件。

一对圆翠片，聚珍斋卖给岳乾斋是 1.2 万现大洋。这对翠片可做眼镜用，是艳玻璃翠，透明，像开春时菠菜那样绿，是件稀世之宝。聚珍斋做有钱人家的买卖，天津英租界住的陈光远、庆王府的王爷后代，当时人称千万元户，还有李七也是天津八大家之一。北京有北城帽儿胡同董家、秦老胡同曾家、麻花胡同计家，这几家逐渐破落了，他们不断卖些珠宝钻翠。一年，帽儿胡同董家管事的到廊房头条三阳金店卖块大蓝宝石，重 9.7 钱，托在手上像一汪水，真好。三阳金店找聚珍斋看货，两家合伙买，管家要半成账，1.5 万银元买下来，额外给管家 750 块。后来，卖了两三万元。还买过 1.6 两重的蓝宝石

带头，割开做戒指面卖掉了。卖给过李七儿媳妇一对长方翠戒指面，是用一个翠别子改的，黄杨绿色，是翠中最好的颜色。

40年代聚珍斋曾在北城金王家收购一对250年的法国座钟，赚了不少钱。还在门市买了一个大猫眼石，重有半斤，个儿大样儿美，灰黄坑交织在一起，银白色的一条直线，简直妙极了。买的便宜，卖给铁巴一万块。

聚珍斋的后十年也赚了不少钱。掌柜的、徒弟、伙计所得不多，东家富了。但关张时，掌柜的、徒弟却分得了一些珍宝。

翡翠大王铁宝亭

翡翠出自缅甸，中国收藏最丰。老北京有位翡翠大王铁宝亭，而今鲜为人知。铁宝亭是位传奇式的人物，在早先的古玩行、玉器行里关于铁宝亭的传说很多。

铁宝亭个子高，脑袋小，高鼻子，小眼睛，长腿、长胳膊，都说他像著名相声演员高德明，可是高德明的相貌、神气赶不上铁宝亭。铁宝亭长年穿件蓝布大褂，布鞋布袜，小帽头，显露出一副穷相。走在街上不认识他的人，如果说这个人就是翡翠大王铁百万，谁也不相信。有一年翡翠大王去日本参加博览会，日本记者到飞机场找中国的翡翠大王，准备拍照，次日见报。机场上人都走了，记者也没找到翡翠大王。翡翠大王是从记者身边走过的，因他的穿着打扮像个中国的苦力，记者哪能相信这就是翡翠大王？清末翰林袁励准的夫人说铁宝亭是“外貌似穷相，内藏万贯金”。

乡民的传说

铁宝亭，名广泰，生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三河县大

厂乡大马庄长大的，念过三年私塾。光绪三十四年（1908）到北京廊房二条德源兴玉器铺跟他父亲学徒。他的哥哥在家乡种庄稼，农忙时年轻的铁宝亭回家帮哥哥干农活，他发了财也还是没忘庄稼活儿，一直像位庄稼人。1921 年的前前后后，铁宝亭同琉璃厂韵古斋经理韩少慈经常一起回三河县老家，他们两人是三河县著名的财主。

1986 年，笔者到三河县大马庄走访当地乡民。铁家在大马庄是大户，本家人很多，人们还记得铁宝亭，对他的传说也不少。传说较多的是，铁宝亭会憋宝和他憋来的两件宝。

一件是从一位南方老太太手里买来的宝盘。有一年铁宝亭到南方去买货，看到一位老太太用一个一尺二的瓷盘子喂鸡。十多只鸡来回吃，鸡食总是吃不完，这个鸡食盘是不洗、不换，盘里鸡食不断，南方的夏天那么热，鸡食也不馊。

铁宝亭见了这个盘子呵呵笑，老太太说：“外乡人你笑什么？”铁宝亭说：“这个盘子是件宝，没福气的人擎受不了。您老太太有福气遇上了我，我管您吃喝一辈子，您不用喂鸡了。喂鸡盘子交给我，我把它交给有更大福气的人，才能镇住这件宝。”

另一件宝是一棵白玉大白菜，更是稀奇古怪。这棵大白菜能作天气预报。白菜上有只绿蝥蛄，阴天下雨时，蝥蛄在白菜叶底下，须翅合拢；天气晴朗，蝥蛄展翅吐须，站在白菜叶上。铁宝亭有了这两件宝，财是越发越大，成了三河县的大财主。

笔者告诉乡民们说：我幼年时见过你们三河县的两大财主，一位是回民，一位是汉民，他们都是大高个儿，足有 1 米 8 高。汉民韩少慈长髯细目，隆准口方，两条长胳膊，戴副金丝近视镜，派头十足；回民铁宝亭头小鼻梁高，圆脸总带微笑，打扮像个庄稼人的模样。他们谁也不会憋宝。铁宝亭确实

有件白玉大白菜、上面站只蝓蝓，古瓷盘子他也有，可不是像乡亲们说的那样神奇，那都是工艺美术品，是能工巧匠制作的，不会天气预报也不能自动给鸡添食。

斗纸牌挨揍

铁宝亭在德源兴学徒时，父亲管教他特别严。他从幼年就勤俭，没染上任何嗜好，抽烟喝酒全不会，听戏、看电影、下馆、打茶围、逛窑子也没有他。他从不讲究吃穿。德源兴经常到前门里户部街路东的月盛斋去买牛肉汤，用汤熬菜，徒弟掌柜一起吃。铁宝亭吃饭时总是有菜无汤或有汤无菜，一身蓝布大褂成年穿。每天早晨到青山居总是徒步走，腰里揣着两个烧饼做早点。到上海去做生意，自带黄酱，找小旅馆住，自己起火做饭吃。忙时来不及做饭，则从小饭馆要两人的份饭仨人吃。同行人都说他是“土瘪子”式的财主，可是办公益的事他舍得捐钱，大家对他有好感。

铁宝亭的父亲经常到外地去买货，长沙、武汉、奉天（今沈阳）各地跑买卖。铁宝亭在柜上看门没事干，找来些人跟他玩纸牌，斗缩儿糊。这种耍钱的玩艺儿，是他小时候在京东老家，看老太太们过年过节时玩纸牌学会的。京东的老太太们坐在炕上围一圈人，斗起牌来是成宵隔夜，可是输赢没几个钱，就是凑个热闹。铁宝亭玩牌，被他父亲发现了，三十来岁的人让他父亲打了两巴掌，罚他站了半天！还找聚珍斋的沈掌柜说：“我这儿子没出息，我不在家他玩纸牌！”沈掌柜说：“您儿子有出息，有本事您不让他去干！您这么大岁数，甭往外跑了，让他去跑。”从此铁宝亭不玩牌了，沿着父亲的路线到外地去买货，还到山西、陕西、青海去做买卖。在甘肃他认识了马鸿逵、马步芳，做他们的珠宝生意，因都是回民，格外亲近。父亲在20年代去世后，由他经营德源兴。发了财，德

源兴还是一间小门脸儿，三四个人，不扩充门面，也不增加人。

铁宝亭的“28字诀”

“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有人说，铁宝亭得了外财，1928年孙殿英盗东陵西太后的墓，所得珠宝钻石都卖给了铁宝亭，但查无实据。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抓的销赃犯、投入陆军监狱的人里，没有铁宝亭。村民们说他憋了二件宝，则属离奇，古玩玉器里根本不存在那种宝。

铁宝亭发了财，人们不再称呼他的名字，而叫他“铁巴”，“巴”是回语尊称，类似汉语的“爷”。铁巴成了他的绰号，熟人都叫他铁巴。

老珠宝商、老古董商凑在一起，给铁巴编出发财、成大王的口诀：“本事高超眼力强，善于经营门路广，抓住精品他不放，胆大机智广交往。”

神奇的手眼

民国初年，铁宝亭开始在城里和外地采购珠宝钻石和旧货，经过长年累月的锻炼，同行人都承认他有丰富的业务知识和较强的眼力。行外人一听翡翠大王的名字，便误认为他只经营翡翠。有篇文章写道：“铁宝亭酷爱翡翠，他专吃这一行，他的财力如此雄厚，按说珠宝钻石都可经营，可是他不干，特别不吃钻，他把钻石说成是‘玻璃渣子’，不屑一顾。”

其实，铁宝亭经营翡翠是能人，鉴别钻石也是好手。钻石到他手里，一掂量便知是几克拉。他买钻石不用戥子秤，只凭眼睛和手。钻石有好差真假之分，用眼看用手掂量，就能分出好差真假和重量，可不是一般的本事。因为首饰钻石必须无杂质，高度透明，番头（棱角）为五七角度，反射光强。有杂

质的用做工业钻石。还有假钻石：用铸造玻璃制造的“锡兰（即斯里兰卡）钻”；用水晶石加工制作的“水钻”；德国人制造的“锆石”，锆石极其纯净，跟钻石完全相同，很难鉴别，但硬度比钻石略低，用钻石刻划锆石即出现伤痕，锆石的比重大，每克拉比钻石重五分之一。铁宝亭用手一掂量，用眼一看，是锆石、锡兰钻、水钻还是真钻石，则泾渭分明，从不混同。老珠宝商说：“从未听说铁巴买过打眼的钻石。”

古玩珠宝样样通

珠宝钻翠、古玩玉器，只要是上等货，铁巴都经营。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琉璃厂古玩行人都知道铁宝亭收藏一对宋钧窑花盆，这对花盆是贡品，颜色好，玫瑰紫色，工艺特殊精致。在收藏家和古董商手里，很难见到这样好的成对宋钧窑花盆。他还有一对乾隆官窑茶叶末釉色瓷瓶。茶叶末釉色是雍正、乾隆官窑瓷器中的一种高级颜色釉。这种颜色釉的瓷器，宫内收藏较多，传入民间的极少。

铁宝亭跟古玩行人做生意，往往是他的同乡京东人，到他那里去搂货，为他代销。大古董商岳文轩跟他做生意，买他的古玩；文古斋陈中孚搂过他的明万历青花盘，带到上海去卖；1942年，虹光阁邱震生从铁巴手里搂去珠串和1寸5见方、6寸高的鸡血图章一对，还有块田黄石章。邱震生将这对鸡血图章卖给韩复榘手下的一位师长孙桐轩是一万现大洋。孙桐轩将这对鸡血图章送给了孔祥熙。

铁宝亭有一副全部呈高艳绿的翠扳指，装置在磨制花纹的白玉套盒内，刻有清代宗室载铨的“行有恒堂”堂号的字款，是件翠活中的绝品。这副翠扳指他曾卖给日本山中商会，后又用高价买回，收藏在自己身边。他的一只素高蓝宝石带头，重约5两，被称为“宝石王”。他有一对约8分长的子母绿宝石

坠子。子母绿也叫祖母绿，产于巴基斯坦，中国人原先称之为“回回石头”，译音为“助木刺”，是外国的方言，后演变称之为子母绿或祖母绿，这种绿宝石最贵重。

1970年，一位老珠宝商参加评价在“文化大革命”时从原先永盛和参茸店经理孙四家里抄走的子母绿戒指、坠子各1副；翠图章1对，长方形，有3两重；蓝宝石2块；大钻戒指1枚，钻石约6克拉；猫儿眼戒指1枚；玫瑰紫戒指1枚。当时评价12万元，现在岂止120万元！据孙四的老伴讲：“这些珠宝钻翠，都是从铁巴手里买的。”

玉石加工制精品

有个玉器作坊，一百来号人，长年给铁宝亭制作玉器、翠活。铁巴不开玉器作坊，作坊是别人的，两位技艺高超的工人，由铁巴供养，开付薪水奖金。

一年，铁宝亭买了块玉料，这块玉料通身是白色，有一点是绿色的。“白玉无瑕”，这块白玉有绿点，不算上等好材料，可是经过技艺高超的玉器工人精心制作，雕琢出一棵大白菜，利用那点绿色，雕刻出一只蝈蝈。白菜上站只蝈蝈，既美又妙，而且做工精细。白菜包心欲放，蝈蝈须翅伸展，跟活的一样。观赏起来，给人以生机勃勃、美不胜收之感，成为一件著名的工艺美术品。

30年代中期，铁巴买了块翠料，成色极佳，但一面有疵点，交给了磨玉工人，工人把疵点剔除，雕琢成翠麻花镯。这对麻花翠镯，碧绿如水，式样新颖，灵巧美观，居翠镯之冠。铁宝亭以四万的价格卖给了上海的杜月笙。宋美龄见杜月笙夫人戴着这副翠镯，十分喜爱，爱不释手，杜月笙便请他的夫人将翠镯送给了宋美龄。最轰动国内外的要算铁巴的碧玉宝塔。这座宝塔是用大块的和阗碧玉，花费了几年时间雕琢而成。九

层宝塔，玲珑剔透，远观若一柱碧绿秋水，近看雕刻细腻壮丽，塔顶有八条环链与八面塔脊相连。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观赏这座碧玉宝塔，赞叹不已，他动员铁宝亭将宝塔送往巴黎博览会，参加展出，并保证：如有损坏或丢失，以 30 万元抵偿。中国和阆碧玉宝塔在巴黎展出后，在国际上获得最高声誉。

“大王”之名名不虚传

“翡翠大王”之名是 1931 年以后传播开来的。1935 年，上海珠宝商从缅甸运到上海几块大翠料，要价很高，上海、北京的珠宝商不敢买，虽然从“开门子”看，成色是好，可是全部剖开能不能开出质量高、成色好到底的翠料呢？谁也没把握。正在犹豫观望，铁宝亭到了上海，他一眼看准了，花 32 万元买下来。运回北京，剖开来看，全是成色好、质量高的好翠料。他雇佣技艺高超的工人，用了几年时间，设计制作出 74 件翡翠大型摆件和小型饰品。铁宝亭应日本大珠宝商依田忠的邀请，带着精工制作的大型翡翠摆件，到日本名古屋参加博览会，轰动日本朝野。日本报纸上早早登出中国翡翠大王来名古屋的消息。

有一年，北京中原金店李济川看了一大块翠料，无皮全绿，想买又看不准，请铁宝亭给看看，他们俩人合伙买了下来。铁巴用这块翠料制作出一对翠插屏，俗称翠插牌子，高约 1 市尺，宽有 6 寸，全绿、匀净、色微浅。这对翠插屏曾于 50 年代在颐和园展出一件，另一件经薄一波批示，交国家文物机关保管，称之为国宝文物。

1931 年以来，每年春节从初六到十六，铁宝亭都参加琉璃厂火神庙的庙会，陈列他的各式各样的翠件，远处即能望见一片青翠，汪洋似海水，招徕游人顾客，叹为观止！以前德源

兴的珠宝玉器摊不是这样，是花丽胡哨，什么颜色的珠宝玉器都有，不显眼。从 1931 年后，铁宝亭在庙会摆设的摊，给人以青翠碧绿之感，从此翡翠大王之名便逐渐传开。

经营诀窍

铁宝亭做生意是胆大心细、有魄力，敢于在国内外的同行中争购“高、精、尖”的珠宝钻翠和古董玩物。他的口头禅是：“货高不怕价出头”；“货叫人点首就来”；“货正不愁，货好无忧”。铁巴不买低档货，买到高档货就待价而沽。

有一次铁巴跟行里人合伙买翠料，他分得三块，重约半斤。这三块翠可真好，用行话说是全绿、一口气儿，不深不浅，是少有的珍宝。铁巴将这三块翠拿到手，不加工制作饰件，也不卖。还有一件翡翠戒指，是从上海马晋卿手里花一万块钱买来的。三块翠和一枚翡翠戒指，是他心爱之物。铁巴见了同行的晚辈，只要他认为这小伙子有出息，便领到后屋说：“爷儿们！我给你开开眼。”说着便把三块翠和一枚翡翠戒指拿出来给人家看，边看边说：“我从不听戏，也不看电影、打麻将，更不逛窑子。心里闷痛了，就拿出这几件东西看看，过过瘾就行了。”

40 年代，聚珍斋门市上收购了一颗大猫儿眼，状如鸡蛋，重有半斤。猫儿眼的学名叫金绿猫睛石，化学成分为 BeAl_2O_4 ，透明、玻璃光泽。金绿猫睛石，色绿而光彩具有变化，如同猫的眼睛一样，所以称之为猫儿眼。猫儿眼是锡兰出产的质量最好。聚珍斋买的大猫儿眼，是罕见之物，铁巴知道了，便叫他儿子铁大义去打听。

铁大义同聚珍斋的一位徒弟在米市大街青年会英语夜校是同学，他俩下学聊起这颗大猫儿眼。大义求聚珍斋的徒弟问问掌柜的要多少钱。掌柜的刘敬斋想，你铁巴不出面，让儿子跟

我徒弟打交道，我也不上赶着找你，叫徒弟告诉他 1.5 万元才能卖。结果是聚珍斋的徒弟和德源兴的少掌柜的做了这号生意，铁大义以一万元的代价买了这颗大猫儿眼。不久，他转手卖给了一位美国人，得到四万美元。大义高兴地向他爹讲了这号生意。铁巴不满意地申斥他儿子说：“四万美元算什么，东西一出手就甭想回来！也不会有再有第二颗这样大的猫儿眼，这点儿道理你都不懂？！”

铁巴爱上等珠宝钻翠，特别是爱翠成癖。他是不是有了好翠都留在身边看着过瘾？也不是的，买卖买卖，买是为了卖，哪有光买不卖之理，他是待价而沽。铁宝亭的资本雄厚，谁也不知他到底有多少钱，财大沉得住气。凡是好货他想方设法花高价弄到手，拿到手里等买主，这给一些顾客造成一种心理：“铁宝亭手里的东西都是真的、好的、精的。”那个年月，有钱人不存钱，见了珠宝钻翠、古董玩物只要真东西，罕见之物，就花大价钱买，把钱“浓缩起来”。有钱人都觉得买铁巴的东西放心，什么时候都值钱。铁宝亭有时将货卖出去了，过一段时间，他又从买主手里买回来，而且比卖出的价钱要高。所以，20 年代的北京政府、30 年代的南京政府、40 年代的伪政府和南京政府的达官贵人、太太、小姐，买珠宝钻翠都是“非铁不买”。买铁巴珠宝钻翠的知名人士有：孔祥熙、宋子文、张群、杜月笙、白崇禧、马鸿逵、顾维钧、周佛海、汪时珷、袁励准，日本山中商会的山中高田和日本珠宝商依田忠以及英、美、德、法等国的富豪。

铁宝亭的生意好，同行想法子对抗他。30 年代末，有黑三、沈瑞等十几位回民珠宝商联合起来，拜把兄弟，在生意上对抗铁巴，但终归还是干不过他。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国内外都知道北京的翡翠大王铁宝亭。

铁宝亭经营德源兴生意兴隆，营业规模大，但一切进销都

要他亲自经手，从不假手于人。德源兴一直是只用三四个人，多了不用。用人给他看摊，支持门面，收拾屋子。他从不向徒弟传授鉴别方法和经营经验，也不让他们去做生意。几十年来，德源兴的徒弟没有一位能独立经营。铁巴怕培养出对手。但他以优厚待遇笼络人。有位姓崔的跟他多年，对他忠实，经常陪他出去，给他提溜包，同行开玩笑说崔某人是“铁崔氏”。铁巴给崔某人在北京置了两所房子。德源兴的伙食是有菜无汤，有汤无菜，铁巴跟徒弟一起吃，徒弟家里的生活，他是照顾备至，婚丧嫁娶，生病吃药，他都出钱给办理，大家都安心给他干。

屡遭抢劫

“七七事变”前，廊房二条的珠宝店：宝全、全聚厚、聚源楼、聚珍斋和德源兴，在东交民巷花旗银行的后院，共同租了房子，作为保险库。他们认为美国花旗银行后院是最保险的地方，各家都将贵重的珠宝玉石放在那里。

1935年冬的一天夜里，保险库里进来十个人，先把看箱子的人绑起来，眼睛蒙上嘴堵上，再撬箱子。各珠宝店的箱子是特制的，锁打不开、箱子撬不开、砸不坏。八个大汉加一个白俄，费了很大劲，用了五六个小时，才开了箱，取出珍贵珠宝，分成九堆。其中有位姓高的是珠宝商人，他从九堆里，每堆选一件，拿走了。分完赃扬长而去。第二天报案检查，聚珍斋的箱子没撬，原来这伙强盗把看箱子的人绑上放在聚珍斋的箱子上，没来得及撬天就亮了。铁巴箱子里的东西最多，除珠宝钻翠，还有金子和现钱。

1937年，铁宝亭娶儿媳，亲家是同行、同源斋杨掌柜。可说是门当户对。铁家在三河县大马庄举行婚礼，热闹一番。晚上入洞房了，绑票的上了房，枪声四起，土匪进了院子，将

儿媳和侄媳绑走。全家乱成一团。铁宝亭很镇静地说：“不要慌，绑走了人，咱们拿钱赎。”杨掌柜来了，喊着叫铁巴赎人，铁巴说：“刚绑走人没来信，你让我到哪里去赎人？”

铁宝亭回到北京照常经营德源兴，第三天他接到一封信，看完了掷到炉子里烧了。第六天又来封信，他看了看又烧了。同源斋杨掌柜知道了，便来找铁巴，问他：“我听说连来两封信你都烧了，你想不想赎人？！”铁巴说：“我想赎，赎不起，土匪敲我太厉害，第一封信跟我要 20 万，第二封信降到 10 万。甭理他们，你越还价，他越不肯落价！他们是土匪，你懂不懂？！”

十天后的一个早晨，德源兴刚开门，铁宝亭在铺子里来回走遛儿，突然进来一位陌生人，迎着铁巴面便问：“你是铁巴？”铁巴答：“是啊。”那位陌生人说：“到你后屋去，我有事同你商量。”边说边忙往后屋走，铁巴跟在他后边，到后屋坐下，那人开口便说：“你那俩孩子是我绑走的，你看怎么办？”铁巴说：“你不是说为了要钱吗，我给你钱，要太多了，我拿不出来，那就随你便了。”陌生人一听，铁巴的语气硬，便说：“您放心，孩子们没事，我找位老太太伺候她们，咱们都是回民，穷哥儿们没钱花，‘主麻儿涅帖’。”铁巴说：“看在真主的面上，我给你两万，多了没有。”陌生人早摸透了底，他知道铁宝亭这个人是一不二，便答应了。他们约定了时间、地点和接头暗语，陌生人一拱手走了。

到了日期，铁巴把钱票装在面袋子里，背在身上，只身一人到廊房的约定地点，把面口袋往地上一掷，站在那里不动，有个人同他接头，说了声：“就这么的，口袋你拿走！”那人笑了，不一会儿，两位少妇来了，跪下直哭，铁巴说：“甭哭！跟我回家。”亲戚、朋友都关心地说：“这路事儿你铁巴怎能直接出头，把你绑走不更值钱？”铁巴说：“你们不懂，

他们绑我的票，早把我的底摸透了。不然，他怎么敢闯进来，跟我直接讲价。他敢来我敢去，我去了他把我绑走，江湖上讲这叫不义气，何况他们知道把我绑走，没处要钱去。我的钱除我之外，谁也拿不出来。这个底他们摸得透透的。”

日伪统治北京时，有个著名的女汉奸，中国名叫金璧辉，日本名叫川岛芳子，住在东四十四条中间路北一个大套院里。她找铁巴，要买几件翠活首饰。这个女人是女扮男装，满族人，她要首饰自己不用，铁巴心里明白。铁巴给她送去翠镯、钻石戒指，她笑了笑收下，还叫铁巴捐献些钱，敲了一大笔竹杠。究竟损失多少，铁巴没向外讲。

几经敲诈勒索、绑架、抢劫，铁巴损失不小，但他心宽财厚，未曾伤筋动骨，财力仍然十足。

一场虚惊

1946年，铁宝亭携带一批货，由天津登轮去上海。为了财物和人身安全，他请马鸿逵给办个军人证件和军装，马鸿逵给了他中校证件和服装，随行人员也穿了军服。很不凑巧，船行到胶东半岛某地搁浅，岸上的八路军和民兵上了船。当时国共两党正在和平谈判，可是，铁宝亭身穿国民党中校军装，见了八路就惊恐万状，吓得不知怎么好，坐立不安，忙问他的随行人任某：“我的蓝宝带头子哪去了？”任某说：“您不是系在裤腰带上吗！”铁巴一摸腰带，仍在原处没丢。八路军上船看了看船上的人，东西不动，只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还挺和气。见了铁巴便说：“你是位大官，怎么坐三等舱？”铁巴说：“我没钱。”八路军人说：“这么大官没钱，是个好人哪！”铁巴笑了，也镇静下来了。

潮水上来了，船开走了。到了上海，各大报馆记者获悉北京的翡翠大王来沪，中途搁浅遇上八路，有新闻可写，便到码

头寻找铁巴采访。铁巴见此情景，甚觉不妙，忙把脸捂上，怕记者给他照相，更怕他的照片登在报上，让上海的青、红帮认识了他，绑架敲诈。铁巴有个特点，一生不照相，原来是怕坏人认识他。

尾声

自光绪二十八年到 1948 年，德源兴在北京廊房二条开设了 54 年，铁宝亭经营德源兴 39 年，在 1948 年他 54 岁时，1948 年迁往台北。老珠宝商讲：铁巴曾在日本名古屋开珠宝店，在日本去世。他的儿孙移居美国，70 年代铁大义来过北京，未回大马庄。1990 年如果铁巴还活着，已是 96 岁高龄了。在中国大陆上，同铁巴有交情的老古董商、珠宝商还有十来位，他们已是耄耋老人。提起铁宝亭，这些老人异口同声说：“铁巴的人缘好，他见到同行的小徒弟都先打招呼，没有财主、翡翠大王的架子。他不讲究吃穿，一生没嗜好。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他爱上等珠宝钻翠、好古玩有瘾，特别是爱翠成癖！”

四、琐事逸闻

不见正式记载的有关古董商的传闻不少，行外人曾写过一些，描述生动具体，但所写的故事往往与事实相悖，有的则是添枝加叶，任意描绘，使行内人看了不舒服。这里所写的作为史话中的逸闻，是以事实为依据，将传闻记录下来，载入书中的。

卖古董的整修宫室

光绪年间，北京东华门大街有家古玩铺，专卖些“礼货”和铁画。 “礼货”是官场上相互馈赠之一般古董玩物；铁画是用黑铁条、片编作山水人物花鸟画。每天上朝是文东武西，文官由东华门入宫。下朝时有位文官路经东华门，下轿到古玩铺买古玩，看铁画很别致，便买了一幅挂在书房的白墙上，白地黑画，有立体感，而形象与笔画相似，很美观。

这位文官大臣询问古玩铺的掌柜陈玉堂，这种铁画是什么年代、谁制作的。陈玉堂说，是道光年间汤鹏制作的。从此汤鹏制作的铁画便出了名，登上了大雅之堂，一些官员争相来买。陈玉堂同一些买铁画的大臣交了买卖，彼此认识了。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西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大臣们不上朝了。一些官员无事可做，便到东华门这家古玩铺里闲坐，陈玉堂殷勤招待。

1902年初，西太后、光绪帝返回北京，大臣们照例上朝。在等候上朝的朝房里，有位大臣提议给陈玉堂找个肥差，补偿一年来侍候的辛苦。正赶上皇宫里要整修被毁坏的建筑，于是给了陈玉堂这份差使。

当这位大官当面交待陈玉堂差使时，陈玉堂说：“回禀大人！我陈玉堂是卖古玩的，不会修房子，皇宫的殿室楼阁，更不懂怎么去修。”大臣教他说：“你不懂，找懂的人去干，内务府把活儿包给你，你**贿**好儿吧！”

陈玉堂从内务府官员那里打听到整修宫室的头目，进行协商。跟内务府要80万两银子，给包建工头目50万两，自己赚了30万两，而内务府下账是100万两。

光绪二十八年，陈玉堂阔起来了，古玩行、玉器行人都

说，“陈玉堂没买什么俏货，一些零七八碎的礼货，怎能赚大钱？”都觉奇怪。廊房二条聚珍斋沈掌柜跟陈玉堂是同乡，闲聊时同陈玉堂说：“我们卖珠宝的比你们卖古玩来钱多，手指头肚那么大块的蓝宝石，成色好的卖个万八千两银子。你柜上的全部货，也没一块宝石值钱。”陈玉堂说：“我卖礼货、铁画，赚不了多少钱，给宫里整修房子，拉个纤儿，得了不少银子。”沈掌柜说：“你有钱了，做点珠宝生意，比买卖铁画强。”

陈玉堂来钱容易，花钱也快。成天吃喝玩乐，不再经营古玩，改做珠宝生意。他不懂珠宝，有了钱，财大气粗装懂。到了宣统三年，陈玉堂的30万两银子已花光赔光，贫困潦倒。

珠宝商串朝房出趣闻

老古董商说，我们卖古玩的，进不了朝房，卖珠宝的能进去做买卖。说起来是件怪事，可也不奇怪，他们能弄到“腰牌”，且珠宝件小携带方便；而古玩件小的太少，古董商从不带东西进朝房做生意。

光绪年间，珠宝商通过与王公大臣、太监总管做珠宝生意，能弄到“腰牌”。腰牌是长方形的木板或象牙板，上刻有满文和汉文，字意为“准予通行”。腰牌只能用于上下朝的时间。白天进紫禁城还要有“路条”，一张字条上写明什么时辰，走什么门和哪条路，什么时辰从哪条路和门出去。

珠宝商串朝房是在早晨天不亮的时候，拿着朝珠（一挂朝珠108颗珊瑚或金珀、珍珠等）、项珠、翎管、带钩，以及翠镯、扳指、扁方等翠钻珠宝饰物，利用大臣们在朝房休息的时间，进行兜售。时间很短，大臣们选好货，珠宝商给送到官邸。

有一天，珠宝商串朝房，碰上了庆王爷，可把他吓坏了，忙跪地磕头。王爷问：“你是干什么的？”珠宝商答：“小人是卖珠宝的，给王爷献宝！”王爷说：“有什么宝我看看。”珠宝商拿出一只翡翠扳指，是黄杨绿颜色的，成色很好。

王爷看翠扳指，珠宝商说：“王爷！您看这东西够多好！我不赚您钱，您看好了，我孝敬您。”他没想到王爷瞪了眼，大声说：“做买卖要赚好人的钱，你不赚我的钱，我不是好人呐！”珠宝商跪下说：“我惹王爷生气了，我赚您的钱！我赚您的钱！”王爷说：“起来吧，甭跪着啦，你这话算是说对了，你有本事就多赚我的钱。”

第二天，珠宝商拿着翠扳指，提溜从古玩铺“搂来”的一件青铜器，来到庆王府（定阜大街西头路北）。在门房要求见王爷，听差说：“王爷没工夫见你。”珠宝商说：“昨天我在朝房见到王爷，他老人家让我赚他的钱，拿来古铜、珠宝，请通禀一声。”听差的说：“你赚钱，我喝西北风！”珠宝商说：“我吃肉不能让您喝汤。”

王爷在书房见了珠宝商，开口便说：“你小子没忘我昨天说的话！”珠宝商说：“王爷是金口玉言，小人怎能忘。”王爷买了他几件东西，其中有他从古玩铺搂来的那件青铜器。这件铜器是宋宣和年代仿制商代的簋，圆口，圈足，有双耳，仿造精妙。王爷一看很好，便花 800 两银子买了。珠宝商是给古玩铺代卖的，才给古玩铺 50 两银子。

可巧，琉璃厂这家古玩铺也做庆王爷的买卖。一天，式古斋掌柜的见到庆王爷。王爷说：“你是卖金石的，我有件簋，你给我看看。”掌柜一看，这不是廊房二条某某斋从我柜上搂去的货吗，嘴里没说，便问王爷：“请问王爷，您这件簋是多少银子买的？”王爷说：“800 两！”掌柜的心里发了火，但不敢在王爷面前发作，沉了沉气，心里想自己太亏了，珠宝商卖

了800，才给我50，嘴里只是评价这件铜器。他告诉王爷这是件仿制品，您上当了。王爷发了火，打发听差的把那位珠宝商叫来。

珠宝商见王爷跪地磕头，王爷问：“你怎么拿假东西骗我？”珠宝商说：“我不骗您，我怎么赚您的钱！”王爷说：“你很会说话。”珠宝商说：“话是您说的，您说有本事多赚您的钱，这就是本事。”王爷笑了，事儿也就了了。

曹锟的仆人经营古董

耿朝珍，名金元，河北霸县人。他年轻时在中南海居仁堂，是侍候曹锟的服务员，那时候叫“茶房”。

曹锟从1920年在保定召集直、奉两系军阀八省代表会议，组成反段同盟，爆发直皖战争。段祺瑞下台后，他和张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府，至1924年，被冯玉祥幽禁于中南海延庆楼，1926年被释放，前后在中南海住了六年。耿朝珍是曹锟从保定带来的随身仆人。就是在他居住在中南海给曹锟当“底下人”时，经常同古玩商、珠宝商来往，逐渐地由外行变成鉴定古玩、珠宝的内行人。

曹锟有两个年轻仆人，给他购买古玩陈设，一个是曹景勋，另一个就是耿金元。他们两个都往琉璃厂跑，串古玩铺、买古玩。曹景勋经常到大观斋买些小零碎、小玩艺儿，例如小瓷瓶、小天球瓶、小棒槌瓶，各色各样的小瓶，装在一个硬木匣子里，匣子里分上下格，上下格又分成几趟儿，把小瓶摆在各趟儿里供人玩赏。曹景勋买的是些花哨货，买古玩不琢磨，买好了拿走，有时也坐在古玩铺里闲聊，他聊的净是些“海天西”没影儿的事。

耿朝珍经常到延古斋买金石、旧玉件。金石、玉件的年代

较远，学问较深。金石是指钟鼎碑刻而言。《吕氏春秋·求人》载：“故功绩铭乎金石”，高诱注：“金，钟鼎也；石，丰碑也”。古玩行人将青铜器、石碑、浮雕、石像等总称之为金石。旧玉件，一般是指玉器中的各种佩饰，我国在殷商时代，就用玉石大量制作各种佩饰，如玉簪、玉樽、玉佩、玉环、玉■、玉筓等等。提起玉筓，还有段著名的历史故事。《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筓以示之者三。”说的是《鸿门宴》范增暗示项羽杀掉刘邦的故事。在酒席筵上，范增好几次用眼看项羽，三次举起身上佩带的玉筓，暗示动手杀刘邦。玉筓，形如环而有缺口，古代玩饰。筓与“决”同音，古人用以表示决断之意。范增三次举筓，就是要项羽立即决断。耿朝珍买金石、旧玉件，也喜欢听老古董商讲有关古玩的掌故轶事。他人很老实，没有旧听差的那些坏习气，说话有条理又和气，跟谁都能聊到一起。

曹锟被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后，耿朝珍住进延寿寺街炭儿胡同的一所曹锟买的大宅院，现在的炭儿胡同小学校的旧址。这里离琉璃厂和廊房二条都近。炭儿胡同里有古玩铺、玉器铺和玉器作坊。耿朝珍同古玩行人、玉器行人更接近了，他自己也做起了古董生意。1926年，曹锟获释，回天津寓居。耿朝珍在天津太康商场找到一家利源金珠店，一间小门脸儿，把它租赁过来，开了个小古玩铺，给下野的北洋军阀曹锟等人，买卖些古董玩器。他广泛交结北京、上海、济南、天津等地的古玩商，在同行中做些古董交易。他也同天津、北京的玉器珠宝商打交道，经营些翠钻、玉石。因此，耿朝珍懂的路数宽，商周秦汉的青铜器、玉件、陶器、宋元明清瓷器、法琅雕漆、珠宝钻翠他都懂，眼力也好。他的鉴定能力远远超过一般的内行人。

1931年以后，耿朝珍经常跑上海，在上海他同另一位古

董商孙公寿住在一起。孙公寿是北京的古玩商人，长住上海，同上海的古董收藏家和同行交往时间长，认识人也多，做生意的路子宽，他本人鉴定金石文物的眼力也好，所以，他在上海长期站住了脚。孙公寿好交友，吃喝玩乐的朋友多，赚钱攒不住，有了就花，花钱大手大脚，从不在乎。1938年，孙公寿死在上海。那时正在打仗，上海、南京还不稳定，古玩生意不好，孙公寿穷困潦倒死在上海，死后身无分文。耿朝珍请上海各家古玩铺帮忙，挨家给捐凑钱，买好棺材，装殓、托运，将尸体运回北京，孙公寿的家属万分感谢耿朝珍，古玩行的人都说耿朝珍做了件大好事。

孙公寿死后，由北京到上海又来了一位古玩商孙瀛洲，是河北冀县人，幼年在北京隆福寺三合公硬木家具店学徒。后来给铭记古玩铺掌柜的马铭轩当伙计。1920年在北京东四牌楼开敦华斋古玩铺，经营些“礼货”，同当时的交通总长叶恭绰和次长郑洪年有交往。敦华斋开了二十来年赚了些钱，但没发起来。在1940年前后，孙瀛洲出了点事，北京呆不住了，拿点钱去上海做生意，把敦华斋交给他弟弟经营。在上海孙瀛洲与耿朝珍住在一起。耿朝珍的眼力好，但没钱，孙瀛洲有钱，但眼力尚差，两人凑到一起，取长补短，同心协力大做古董生意。当时，古玩行人传出两句有趣儿的歇后语：“孙瀛洲去上海——因祸得福，耿朝珍遇孙瀛洲——如鱼得水。”孙瀛洲的钱（其实那时他只有万八千元），耿朝珍的眼，孙公寿的路子。他们是钱足、眼力好、货源足、路子宽，孙瀛洲由此起迹发家。

珍珠港事件后，爆发太平洋战争，上海做英、美古董生意的古玩商，货物出不了口，积压下来，资金周转不开，急于出售。这时，孙瀛洲借助于耿朝珍的眼力，耿朝珍借助于孙瀛洲的财力，不断地从上海做洋庄生意的大古商手里买来或搂来商

周青铜器、宋元瓷器、明清官窑、珐琅、雕漆、玉件等等文物，运来北京。在北京古玩商会的窜货场，进行行内交易。同行人都知道这些货都是经耿朝珍鉴定的，再经窜货场交易中行里许多人的鉴定，验证了耿朝珍的眼力好、路数广，懂的东西多，受到古玩行人的称赞和尊重。

孙瀛洲长期做古玩“礼货”生意，又出身于硬木家具铺，眼力差些，经过与耿朝珍的合作，又经常和郭静安、崔仲良合伙做古董生意，眼力越来越强。有人说他只懂明清官窑瓷器，其实不然，他跟耿朝珍在上海的几年里，学会了鉴定青铜器、宋元瓷器，懂的路数宽了，钻翠、雕漆、珐琅、犀角器物都有所了解，并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同时也发了财，扩大了敦华斋，改变了经营“礼货”的狭隘局面，敦华斋的名声随之而大了起来。

耿朝珍从上海回来，手里有了些积蓄，在炭儿胡同继续做古董生意。1956年他参加公私合营；进入琉璃厂振寰阁，利用他在天津的老关系，在天津收购到一些珍贵文物，为国家做出些贡献。久居海外的美籍华人、考古学家李汝宽1987年来京时，还询问过耿朝珍，他说：“耿朝珍年轻时，给曹锟当过‘茶房’，没学过古玩，后来他进入了古玩行，他的鉴定能力强，懂的东西多，二三十年代在古玩界就有名望了，现在耿朝珍还健在吗？”笔者告诉李汝宽说：“耿朝珍已去世，死在他的老家河北霸县。1979年，河北省博物馆要聘任他，那时他已不在人间。”

北京“新世界”与和阗大碧玉

刘少溪，江苏太仓县人。光绪十年前，他来到上海，拉黄包车，经常拉外国人到上海的古玩店买古玩。时间长了，刘

少溪会说几句英语，有时帮助古玩店用英语跟外国人讲价钱，从中得到些好处费。刘少溪省吃俭用，积蓄些钱，在上海开了个宝华祥古玩店。光绪二十六年后，刘少溪不断到北京琉璃厂趸货，成了“上海客”。这位上海客同琉璃厂的老古董商有交往，是大观斋掌柜赵佩斋的老朋友。所以，大观斋的师徒知道刘家父子的事最多。刘少溪没念过书，说英语是靠硬记，只会说不会写。自己吃了没文化的苦，有了孩子就注重培养他们读书。

1920年前后，刘少溪的大儿子刘宝庚来到北京。他作为上海黄金荣的代表，邀请北京京戏名角儿去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黄金荣出资在北京西珠市口大街香厂路的南头路东，按上海“大世界”的模式，建立一座“新世界”。刘宝庚任“新世界”经理。那时，新世界是北京南城最热闹的地方，里边设有游艺场、剧场、电影院、饭馆、餐厅、百货商店、高级理发厅……说评书，唱京剧、评戏，唱大鼓，演杂耍，演文明戏（话剧），帮子腔、落子调都在新世界演出。

新世界的地势好，南面不远是天桥，东面珠市口街上有开明大戏院、第一舞台，京戏名角杨小楼、梅兰芳、程砚秋、余叔岩都在这些戏院演出，著名饭庄丰泽园、浴池清华池都在附近。新世界的北面则是“八大胡同”，陕西巷、韩家潭、石头胡同等地的班子，妓院林立。西面的虎坊桥、骡马市大街商业集粹，富连成科班也在新世界的西边。在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新世界”，有人曾写下杜牧的诗句：“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表示忏悔。而多数人却同新世界经理刘宝庚一样，享受着新世界里的一切乐趣。

刘少溪的四儿子刘宜轩，上海外国语专科学校毕业，掌握英、法两国语言文字。1918年来到北京，他不依靠有钱有势

的哥哥刘宝庚，自己闯出一条路。

刘宜轩来北京时才 19 岁，他年岁小，个头儿也小，排行老四。琉璃厂一些古玩铺的中、老年人跟刘少溪熟悉，刘宜轩成了小字辈的。所以，人们称呼他“小刘四”。没成想这个“小刘四”的绰号叫开了。当他到了中老年时，人们把“小”字取消，称呼他“刘四”，这名字在古玩行里叫得很响，“宜轩”反而被人们所淡忘。刘宜轩是在上海宝华祥古玩店里长大的，对古玩行业的名词术语比较熟悉，懂些鉴定文物的知识，利用这点特长，领着外国人买古玩，他翻译流利，很受欢迎。起初，他领着英国人阿伯特，买中国的旧玉器和古玩杂项；一位美国人布洽德，购中国的青铜器、造像、浮雕等文物。1921 年，22 岁的刘宜轩住在北京南小街，做起洋庄古董生意，给阿伯特和布洽德进货、包装、托运。

布洽德第一次来北京时，经刘宜轩翻译，在琉璃厂大观斋买了一副汉玉拱璧和一架诸葛鼓。拱璧，即两手拱抱的大璧，1 尺 2 寸长，苍色，乃天子礼天之器也。皇帝祭天双手拱抱的苍色、顶圆形的大璧玉。诸葛鼓的直径有 2 尺，鼓边有双马 4 匹、青蛙 4 只作为花纹。鼓翻过来可当锅用，扣过来当鼓敲。由于一器两用，故称诸葛鼓；也有人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时，留在云南的，后由云南照样生产的。布洽德将这两件文物运往美国高价出售。不久，英国人阿伯特的买卖被张福川代做了，刘宜轩只给美国人布洽德进货，有时也带法国人在北京买古玩、玉器。干了十多年，刘四的名声出去了，自己手里也有了点钱。

1928 年，一位白俄从新疆运来北京一大块碧玉。这块碧玉足有 5 市尺长、4 尺宽、2 尺高，浅蓝色没杂色，是块难得的制作玉器的好材料。但是，北京的玉器行的人不识货，不少人对这么大块碧玉没一点杂色产生怀疑，以为俄国人是用人造

半透明物质充当碧玉来唬中国人，都说是“料货”！刘宜轩看中了一块碧玉，认定是玉的，不是料的，经与俄国人交谈，得知这块碧玉是从新疆和阗运来的。和阗地处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是中外驰名产玉的地方。这就更加坚定了刘宜轩的信心。在没人与之竞争的条件下，两万现大洋成交。

刘宜轩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找东四牌楼天和斋古玩铺掌柜的郭静安，天和斋的东家是中南银行经理郑瑞生。经郭静安介绍和炭儿胡同一位姓沙的说和，郑瑞生亲自看了这块碧玉，认定是真玉，才答应由他和他任金城银行当经理的弟弟出资，郑瑞生和他弟弟、刘宜轩、郭静安四人合伙买这块碧玉，刘宜轩占大股。可是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出的两万块钱要付利息。刘宜轩答应了这种不合理的条件。合伙将大块碧玉买到手。这时，刘宜轩给自己起个字号：大仁济古玩店。搬到南河沿一所大四合院里，北屋是货房，摆满古玩玉器，东屋是账房，即会计室，西屋住家。他还雇了徒弟、伙计，住南屋。

“玉不琢不成器”。刘宜轩有了制作玉器的材料——大块碧玉，必须请工匠制作、雕琢才能成玉器。玉器是我国著名的特种工艺品之一，制作、雕琢玉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有玉制工具。玉器是从玉工具发展而来的。至殷商时代已大量做礼仪用具和各种佩饰。孟夫子说：“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孟子·梁惠王下》）

中国皇帝中有两位酷爱美玉，一位是宋徽宗赵佶，一位是乾隆帝弘历。他们不惜一切，雕琢一物之工费超过原物之价的几十倍，所以乾隆年间的玉器，特别是御制品和贡品，最为精良。

刘宜轩要仿照乾隆御制品和贡品，雕琢出精美的碧玉工艺品，他在本司胡同租一所房子，开办玉器作坊，聘请技艺高超

的工匠，原德珍斋的少掌柜的程某人，指挥百十来位工人，琢磨玉器，日夜操作，干了近十年。程某人制作玲珑别致的盘、碗、壶、瓶，技艺绝伦，在当时的北京是一流的手艺，就是染上了吸毒嗜好，没人用得起他。刘宜轩给他足够的鸦片吸，他抽足了白面儿，精神头就来了，技艺充分发挥出来，指挥磨玉有条不紊。

琢磨玉器是慢活、又是细活，也是一种特殊的技术活。它要按料制图。制图前同作文章一样，先根据材料，进行构思，再创作样，按样下料，粗磨成型；精雕细琢，雕琢中分为做花活的和做素活的。雕琢之后，还要光亮，光亮则是另一种手艺。玉要成器，必须琢磨。古人将“琢磨”比喻“德行”或“文章”之砥砺修饰，确实语言贴切，含义深邃。刘宜轩要将碧玉琢磨出像乾隆年间那样的最精美的工艺品，更须精细加工，使之达到工、料、形状都同乾隆的御制品和贡品相似。

为了达到完全相似，刘宜轩找到乾隆时代梁诗正等人编著的《西清古鉴》一书，按照书上摹绘清故宫收藏的古代铜器的形状、花纹、鸟兽、铭文等，制图下料，精心雕琢，使宫内收藏的商周青铜器，再现为碧玉工艺美术品。经过十多年的时间，制作出一件又一件式样古雅，做工精细的鼎、炉、彝、尊、爵、卣、簋、斗、豆、簠、■、壶、盘、花觚等等碧玉工艺美术品。一件碧玉花觚，玲珑剔透，精美别致，素雅古朴；一对仿乾隆御制碧玉盘，宛如两汪碧水，真是鬼斧神工，堪称绝活。只这两项，刘宜轩按乾隆年间的珍品，卖给美国人三万来块现大洋。

他们还仿照宫里的凤凰盒、鹌鹑盒上的图样，制作出碧玉凤凰、碧玉鹌鹑，做工精巧，纹理细腻，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用这块大碧玉除制作上边说的整活儿外，还制作出不少零碎活儿，如别针、鼻烟壶、戒指面、玉镯、玉簪、旱烟袋嘴等

等。这些零碎小件碧玉，刘宜轩、郭静安送给朋友一些，笔者家中就有他们送的碧玉烟嘴。

十多年中，刘宜轩制作出大量的碧玉工艺美术品，大部分按照乾隆御制品或贡品，卖给美国人和日本人；在上海、北京的一些买主，买了一小部分。这批碧玉工艺品，虽然仿制精细，可以说是惟妙惟肖，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但内行人一眼能看出：“这是刘四在30年代制作的碧玉工艺美术品，不是乾隆御制品。”原因是乾隆年间的碧玉工艺品颜色深重，仿制品的颜色浅淡，成色不同，而且雕琢技术仍欠“火候”，精美程度尚差。然而，今日观之，仍不失其为奇妙、珍贵之艺术品，能看出是赝品者，恐怕甚为稀少。

大块和阗碧玉尚未雕琢完，刘宜轩又买了块玉，这块玉不如和阗碧玉的质量好，块儿也小。刘宜轩一面经营玉器，一面经营古玩，卖玉器赚了钱，买古玩。他听说洛阳出土了好铜器，拿钱让人去买；又听说西安有好货，还没弄清是什么，又派人去收购，总想把各地的好古玩一揽到手。在经营上，他是“勇气有余，慎重不足”，贪图好货之心太旺。结果，几遭挫折，几起几落，终于破产。玉器还没磨成，他就将半成品押给当铺，往往一押就死，因为他始终没翻过身来，没钱赎。

1939年，刘宜轩开办的玉器作坊歇业、解散。他经营的青铜器、石造像和宋元瓷器，因战争动乱，也不景气。他心胸开阔，能发财也能受穷，不因失败而苦恼、灰心。他的最后一着儿，是当翻译。他的英、法语水平高，又是位古董鉴定家，给外国人当翻译买古玩，是一流人物。有一次，刘宜轩带外国人到前门大街祥和成挂货铺，见到一副马镫。他向外国人说明，这副马镫能发出悦耳的音响，是中国皇帝骑马时用的御镫，外国人拍手赞扬，花高价收购。他可以用流利的英、法两国语言，介绍和评价中国古代各种文物，说明具体物件的由来

和特点，翻译的水平高，文物知识丰富，在翻译介绍中国文物方面，可称是少有的翻译家。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英对日宣战后，在北平的英国人、美国人行动不自由，而且日渐减少，刘宜轩做洋庄古董生意的路子断绝了，靠给外国人当翻译，买古玩吃回扣的道路也不通了。他处于困难时期，经常到琉璃厂的古玩铺串门聊天，遇上开饭，他也不客气地就吃。

1928年至1948年这20年是刘宜轩大起大落的20年，他有本事、有才华、有魄力，但是不善于经营，失败在贪图买好货上，但他始终不悔。1948年初，刘宜轩听说济南有件宋定窑渣斗。渣斗的形状像花觚，比花觚小，俗称“痰盂”。他认为是件好货，在手中无存款的条件下，他筹措款项，请人到济南去买。那时，解放军包围着济南，只可坐飞机去，去的人到了济南，人家在战乱中不肯卖这件宋定窑渣斗，只可空手坐飞机又回来。

1949年春，刘宜轩去香港。他带去件大明彩罐，这路货日本人喜爱，日本人给它起个名叫“赤绘”。其实，大明彩是紫、黄、绿颜色都有，不完全是红颜色。对这路货，香港人不认。刘宜轩没卖上好价钱。因为他爱家乡、爱祖国，家眷又在北京，他放弃了在香港或到国外去做古董生意的机会，回到北京。

刘宜轩被安排在北京工艺品出口公司工作，搞翠钻，法国人来了，他给当翻译，因那时会法语的人很少，就用他翻译；懂英语的人多，不用他。他还在仿制成对石狮和造像方面，做过贡献。1981年，83岁的刘宜轩病逝在北京。他生前写过的有关翡翠、钻石、碧玉、古董等方面的资料文章，现已散失，无法整理。

釉色奇特的弘治官窑瓷盘

1987 年夏季，美籍华人、文物考古学家李汝宽回国访问，他离国 40 年，还记得丁兆凯。丁兆凯这个名字，国外健在的老古董商不少人还没忘，因为他为人忠厚，鉴定文物的眼力强，懂的、见的文物多。

丁兆凯，河北吴桥县人，1923 年在北京杨梅竹斜街蕴和店里跟岳彬学徒。那时岳彬提溜布包做古董生意，师徒二人度过艰苦岁月。后来，岳彬发了财，在炭儿胡同开了彬记古玩店，成了中外闻名的古董巨子，丁兆凯没少为他出力，可是这位“开国元勋”所得无几。1942 年，丁兆凯从彬记出来，自己单独做古玩生意，也没发财。

他是细高个儿，长脸高鼻梁，大眼睛，说话慢条斯理，颇有文雅风度。笔者年幼时，听他说了不少有关岳彬的故事，可惜，他说时笔者不大注意听。有一件事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他说，岳彬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曾卖给美国煤油（那时称石油为煤油）大王一个云冈石佛头，是三万美元卖的。抗战前，美国煤油大王要退货，说是仿制的。理由是这座石雕佛像，美国记者在云冈看到还在那里。煤油大王生日时，举行招待会将他在中国买的北魏石佛陈列出来，有位记者告诉他，在云冈看到了这尊石佛仍屹立在那里。岳彬当时没答复，过些日子回电说，云冈石佛头是真的，记者看错，不信则派人来察看，如那里确有，则退货，如没有，则请赔偿名誉损失费。后来这件事就算了。这尊云冈石佛头是真是假呢？丁兆凯说：“是他妈假的，岳彬派小冉去云冈拓下来，在彬记的西院里，照样雕的。”丁兆凯当年称呼的小冉，而今是石雕艺术家，曾参加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刻制作，是我国一流的石雕艺术专

家。

丁兆凯跟着岳彬干了二十来年，经手的文物很多，他对商周青铜器、北魏造像、浮雕石刻、唐三彩、宋元明清瓷器等都有研究，他鉴定东西慎重仔细。古玩行的人，都认识彬记的丁兆凯，不少外国的同行人也知道他。他买卖古董很多，仅知道他有件东西很俏。他同岳彬一样重视文物中的奇特之处，以稀为贵，以奇致胜。

1944年丁兆凯在东晓市买了件明弘治官窑三桃三果1尺2寸的大盘子，青花楷书款识，是件稀有珍品。它的特殊之处是在烧制前上釉时，盘子里画的苹果涂青釉过多，烧时流下来了，烧制后肥釉变成苹果绿色，黄釉外加苹果绿，很别致奇特。本来大盘子不是什么稀奇之物，由于釉色奇特而成了珍品。

丁兆凯拿着这件珍品到古玩商会的窜货场，在同行中出售，引起同行争相购买。窜货场采取“封货”交易方式，即对这件珍品采取密封投标，当众拆封的办法，由出高价者得标。郭静安、孙瀛洲、崔仲良三人合伙封了七万元；岳文轩、崔耀庭、徐震伯三人合伙封了七万五千元；范岐周、李欣木、王幼田、张玉华、崇庆瑞、刘学敏、唐绍南七人合伙封了八万八千八百元。范岐周等七人得标。加上会费佣钱和做装璜钱，共用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票子十万元。虽然那时日伪的票子贬值很快，不值钱，但十万元买件盘子，也算可观！丁兆凯买卖这件俏货，曾轰动一时。

1945年“八一五”后，范岐周等七家商议，大家不赔不赚，折合法币归蕉叶山房张玉华独家所有。后经何玉堂之手卖给了衡致中。衡致中是旗人，喜爱古董玩物，鉴赏能力也强，他是从稀有之物中选奇特，出高价收买了这件釉色奇特的弘治官窑三桃三果、黄釉外加苹果绿的大盘子。

丁兆凯做了这号俏货后，只是倒腾点小零碎，维持生活。1965年，57岁的丁兆凯病逝在京。

田黄石引出不幸

田黄石是寿山石中最珍贵的一种，为刻制印章之上品。

寿山石。产于福建省福州市郊区的寿山，故名寿山石。因寿山石五色皆备，所以产寿山石的坑叫五花坑，宋代已在五花坑开采寿山石，用五色寿山石制作珍贵玩物。后来，当地老百姓将坑路填堵，多年无人开采。到了清代康熙初年，福州人又重新发现寿山石，继续开采。传说在康熙十二年（1673），皇帝下令撤藩，吴三桂、耿继茂、尚可喜三位藩王叛乱，耿继茂的儿子耿精忠占据福州，把福建总督范承谟幽禁，用杀鸡取卵的方法，大肆开采寿山石，结果是坑毁石竭。以后虽然仍能开采少量石料，但精美石料再未发现。所以，人们都以旧藏之寿山石为贵。

寿山石是以叶蜡石为主的一种石料，质地明如冻的，叫“寿山冻”；纯净如羊脂的，叫“白芙蓉”，又叫“田白”；略呈透明，具萝卜纹条带，呈橘黄、熟栗黄、枇杷黄及金黄色的，叫“田黄”。

田黄的色泽温润，比鸡蛋黄的颜色嫩，像鸡油那样油润而鲜嫩的黄色为最佳品。田黄的价值很高，以前是一两黄金换一两田黄，今则二两黄金换不到一两田黄。精美的田黄石雕刻上龙、凤、虎头、水怪等钮纹，则价值连城。

故宫博物院的武英殿曾陈列一对田黄石印章，一大一小，两者的上端雕刻龙头钮，龙口衔链，相互联结，一块石料雕制出两颗印章。咸丰年间的两江总督怡良，家藏有田黄双凤章。江苏常州蒋某人家藏一长方形，上雕九龙钮，九龙互相缠绕的

田黄石章，重约五两左右。这四颗印章都是鸡油黄色，色泽温润，观之使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堪称田黄石印章中最佳品，是国宝级文物。

琉璃厂信古斋古玩铺经理刘克昌，原是茹古斋的大徒弟，学鉴定字画、文玩，也懂玉石印章。刘克昌的儿子刘东轩，跟他爹在信古斋学徒。自光绪二十六年到“九一八事变”，三十多年来，刘家两代人做古董生意，在古玩界较有声望。

1930年，刘东轩在天津劝业场开一家小古玩铺。一天，门市来个人拿块田黄石要卖。刘东轩拿到手一掂量，有十多两重，这么大块田黄，才要200块钱？卖主说，200块。刘东轩一琢磨，这么大块田黄，才要200块钱，再仔细看看，觉得不对，不像田黄，是块牛油石，就跟卖主说：“先生！我们不收这种石头。”卖主到劝业场的另一家小古玩铺，卖了几十块钱，刘东轩认为这是花几十块钱买块石头。

1931春，琉璃厂雅文斋经理萧书农、大雅斋经理王幼田和王克敏的总管萧玉璞三人到天津劝业场转悠，到那家小古玩铺坐坐歇脚，同行人都认识，沏茶倒水，侍候一番。王幼田问：“掌柜的！买什么好货没有，给看看。”掌柜的拿出块田黄石给他们看，王幼田让萧书农先看，萧书农看完给萧玉璞，萧玉璞说：“块儿不小，颜色还行，要多少钱？”掌柜的说：“少500不卖。”萧书农又看了看说：“你们看，有萝卜纹。”王幼田说：“我们三人老远来的，给点面子，少算点。”仨人合伙花400元把它买下来了。消息很快传到刘东轩的耳朵里，很震惊，我看是块牛油石，是他们三人打眼了还是我看错了？！

当萧玉璞、萧书农、王幼田返回北京时，刘东轩也跟着来了，并到雅文斋去打听消息。他得知这块田黄石要在行内公开交易，在古玩行业公会设的窜货场卖。

古玩公会的窜货场上，摆出13两重的大块田黄石，同行

人都在观赏。这块田黄石的颜色比鸡油黄稍深些，同鸡蛋黄的颜色差不多，色泽老些，略呈透明，有萝卜纹，大家都认定是田黄石，没人认为是牛油石，品位属于中下等货。封货开封，德宝斋给价 1 300 元，是最高封货价，成交。那时的黄金每两也是 100 元左右。刘东轩在现场看到，田黄石被德宝斋买走了，心里才完全落底，是自己把真东西看假了。因为德宝斋、英古斋是鉴定玉石印章的权威商号，这两家古玩铺鉴定、经营田黄、鸡血石几十年，没听说买过打眼的货。

刘东轩坐火车回天津，一路上愈想愈不是滋味，我怎能把田黄石看成是牛油石？他非常懊丧。到了天津，心里堵得慌，自己跟自己憋气，心想我家两代人做古董生意，自己到了不惑之年，俗话说“三十不立子、四十不发家”，这辈子就算完啦，眼看财神爷把一千多块现大洋送到门前，我把它拒之门外，让别人赚了钱。他是越想越觉得丢人、憋气、窝火，终日闷闷不乐，后来发展到茶不思、饭不想、觉不睡，总觉得别扭，后来就生了病，一病不起而丧生。

柳叶尊导致殒身

刘子恭是位“外地旅客”。古玩行人称外地来京卖古玩的同时人为外地旅客。刘子恭长驻山西，经常来北京卖货，因为他年纪大，眼力好，为人厚道，不断从山西带来好货，北京的同行人都很尊重他。

1931 年这一年，刘子恭已年过花甲，眼神儿不行了，有人从他身上打主意，弄了件仿制品，放在晋西北破落的大户人家里，请他去看货，刘子恭花 400 块钱，收购了件康熙官窑豇豆红柳叶尊。

豇豆红又叫“桃花片”、“娃娃脸”、“美人醉”，像豇豆

的红色，带有绿色苔点。豇豆红、天蓝釉都是康熙官窑瓷器中的高级颜色釉。柳叶尊的样式美、小巧玲珑。豇豆红柳叶尊是造型秀丽、釉色幽雅清淡、柔和悦目的不可多得的上等官窑瓷器，原烧制的很少，仅供皇宫摆设。刘子恭买了这样的好货，要在北京古玩公会窜货场上去卖，事先在同行中宣扬出去了。

康熙官窑豇豆红柳叶尊摆在窜货场，大家都来观看，看看都走，没人伸手（古玩行在窜货场议价采用“袖内拉手”的讲价方式，没人伸手，就是没人把手伸入袖内同卖主讲价钱）。刘子恭站在那里愣住了，怎么回事，这样好的东西没人要？是不是我打眼了？他戴上老花镜，拿起康熙官窑豇豆红柳叶尊，仔细鉴定，突然如梦方醒，心里在盘算，噢！原来是件仿制品！他一声不吭，赶紧把东西收拾起来，不卖了。

古玩行人一旦买了“打眼货”，非但经济损失，还会被同行作为笑料。所以，谁买到“打眼货”都是把赝品收起来、锁起来，谁也不给看，免得名声受影响。可是，刘子恭干了一辈子，今天在同行中丢了人，东西收起来也没用，人家都知道了。

老头儿晚上连饭都没吃，躺在床上发愣。第二天一早儿，收拾一下，回自己的老家——衡水县去了。到家拿起锤子把柳叶尊砸得粉碎。想自己在古玩行干了一辈子，老了老了，丢人现眼了！窝囊、憋气、恼火，情绪失去控制，抑郁不到半年而殒命。

鉴别与经营宣德青花瓷器的诀窍和经过

1940年，计受田到外地买回四件青花八寸盘，两件上画吹箫引凤，一件上画海水鱼，另一件画藻草鱼。他看不准这四件青花瓷是什么朝代的，拿到前门大街祥和成挂货铺，给他师兄杨宝山看，杨看了半天告诉他，是雍正仿宣德的青花瓷器；

他又给师弟王哲东看，王鉴定是明代宣德的真品。

宣德青花瓷器和永乐青花瓷器，同负盛名，永乐、宣德时期，被称为我国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宣德青花与永乐青花有共同特征，最主要的是青花色泽浓艳，胎、釉精细。由于两朝制作青花瓷器的总风格相同，要细分其不同处比较困难。近来中国陶瓷鉴定家的习惯区分法有以下几点：永乐青花瓷大多无款，宣德大多有款；同样的器物，永乐较轻，宣德较重；永乐的釉层更莹润，器底圈足凝釉处往往泛青绿色，宣德釉层较多气泡，呈桔皮纹；永乐偶然有青色混糊的现象，宣德青色则都较清晰。永乐和宣德青花瓷器，雍正仿制的不少，而雍正仿宣德青花瓷器比仿永乐的多，在宣德的黑斑及釉下气泡方面，仿得特别相似。所以，一件有宣德款的青花瓷品，是宣德的真品还是雍正时仿制品，历来的鉴定家都十分重视。

王哲东为什么认定，计受田买来的四件青花八寸盘是宣德的，不是雍正时的仿制品呢？笔者近来曾访问了王哲东老先生，他说：“我是专门搞古地毯的，对瓷器、铜器也了解一些，因为我学的是挂货铺那套，比较杂，什么都知道点，但不精，只精于旧地毯。”笔者问：“您在1940年怎么区别宣德青花和雍正仿宣德青花的呢？”他回答说：“那时学徒没人教，全靠自己，真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看青花是从故宫武英殿里学来的，以前那里陈列的文物极多。我专门看宣德、雍正、乾隆三个朝代的青花瓷器，多次看反复看，比较着看，终于我看出了，宣德青花是蓝中有黑斑点，雍正青花没斑点，乾隆青花也有斑点，但不黑，白地跟宣德的白地不一样。那时，我只是凭这一点点的见解认定是宣德的真品，因为盘子的青花蓝中有黑斑。”是不是有黑斑的青花瓷就是宣德的呢，那就不尽然了，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宣德青花瓷器蓝色中没黑斑，但青花色泽极为幽雅美丽；而雍正仿宣德青花瓷器中，模

仿其黑斑又极相似。由此可见，鉴定一件古瓷是多么复杂而艰巨了。

王哲东看准了四个青花八寸盘是宣德的，就从师兄计受田那里搂了来，为之代销，作价 400 元。第二天他把这四个盘子交给孙华峰，请孙华峰在古玩商会的窜货场去卖，要价是 4 000。那天，窜货场卖货，王哲东也去了。窜货场里的货卖完了，孙华峰没把这四个盘子拿出来，王哲东问孙华峰为什么不“递货”（将出售的古玩，在窜货场拿出来，叫递货）？孙华峰说：我有位上海的客人要买这路货，你卖给我吧，这四件里头可是三件是真的，一件是假的，真的里头还有一件是坏的，不能给你那么多钱。王哲东不答应，少 4 000 块不卖。孙华峰说，好吧！过两天你听信儿。三天后，他们以 4 000 元的价钱成交。

这件事被古玩商会会长崔耀庭知道了，他说，孙华峰在商会卖货时，从中掏货。古玩行里有个会规，在行内公开交易时，货进了窜货场，如负责卖货的人不把货拿出来公开卖，自己留下私下交易，叫掏货。掏货违犯会规。所以，崔耀庭把孙华峰申斥一顿，从此不准他进入窜货场帮助卖货。

孙华峰做古玩生意，没字号，自己在外地跑，以前刘学敏曾帮他，后来他自己跑，从外地买来货，在北京古玩行里卖。这四个宣德青花八寸盘，卖给上海叶叔重一个宣德青花绘海水鱼盘，是 2.5 万元。画吹箫引凤的青花盘当时鉴定是一个是宣德的，一个是康熙的，宣德的卖给陶庐刘学敏四万块。一个康熙的、一个残破的没卖出去，自己留下了。

再说说计受田。计受田听说他的四个青花盘子，祥和成给他代销，卖了 4 000，去找掌柜的王殿臣。本来话不好说，原先他自己作价是 400 元，不能出尔反尔。可他是王殿臣的徒弟，所以他找师傅再给他添了几个钱，王殿臣又给了他 200 元，合计成本是 600，赚了 3 400 元。王掌柜在北京买了一所房

子，他很满意。可是，他让孙华峰拣了个大漏，孙华峰赚了6.1万元，还剩了两个盘子。至于叶叔重和刘学敏又赚了多少钱，就不用提了。所以，古玩是没标准价格的，只要是真东西，价钱多少则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定了。

一本万利的成化斗彩杯

1939年，前门大街祥和成挂货铺掌柜的王殿臣到山东黄县、烟台一带收购旧货。一天他在黄县县城里走街串巷，见一家的中年妇女在院子里梳头，小桌上放着盛皂角水的小杯子，高有11厘米，口径约5厘米，彩色艳丽。小杯子吸引了他，身不由自主地走进人家的院子。妇女问他：“你找谁？”他说：“我谁也不找，进来看看你桌上放的那只盛皂角水的杯子。”“这有什么好看的，我梳头沾皂角水时用它，你看吧。”妇女边说边把杯子递给他。王殿臣拿到手，仔细一看，是成化斗彩杯，便问：“这杯子卖不卖？”妇女说：“这杯子是我泡皂角水用的，不卖。”王殿臣心想，怎么也得把它买到手，嘴说：“你换个别的杯子用，这杯子卖给我，行不行？”这位妇女便说：“行是行，你得给我一块大洋。”那时在县城里用一块现大洋，可以买不少东西，三十来块钱买一亩地。所以，她觉得一块大洋，谁也不要这小杯子，没想到对方马上从腰里掏一块站人洋钱（铸有孙中山像的银元）交给了她。

王殿臣兴高采烈回到北京。徒弟、伙计一起研究这只杯子卖多少钱，定价800块。他们以为这价不低了，拿到古玩商会窜货场，在古玩行内交易。王殿臣披上大袖褂子，鉴古斋的周杰臣把手伸入王殿臣的袖内，王殿臣的手摆出“八”的手式，周杰臣问：“十、百、千”，王殿臣答：“百。”周杰臣将手从王殿臣的袖里抽出，说声：“我要了。”为什么周杰臣连价都

不还，要 800 就给 800 呢？王殿臣明白了要价少了，被人家拣了漏；又想，反正才一块钱买的，800 块也是赚。想到这儿，也就心满意足了。

周杰臣看这只带把的小杯子，是明成化斗彩，造型轻灵秀美，胎质细腻纯洁，白釉莹润如脂，彩色柔和，笔法流利，画的是松鼠偷葡萄，葡萄果叶并茂，松鼠栩栩如生，绘工精细，杯子的表里精致如一。这么好的东西，才花 800 元就买到手，周杰臣拣了王殿臣的漏，特别高兴。

斗彩，是瓷器的釉彩名，也叫逗彩，古人还称之为填彩。就是以釉下青花和釉上的黄、绿、紫、矾红等彩色，拼填而成彩画。有人说，这种绘工技术创始于明代成化年间，这种华丽的彩瓷是明宪宗朱见深特为其宠爱的贵妃烧制的。此说能否成立另当别论，但成化斗彩的工艺成就，是历代所承认的，在明代就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据《唐氏肆考》中记载：“神宗尚器，御前有成杯一对，值钱十万”，就是说，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崇尚器皿，他桌上摆的一对成化斗彩杯，价值十万。那时斗彩杯已如此贵重！清代乾隆皇帝弘历把成化官窑斗彩鸡缸杯视为至宝，他写下《鸡缸诗》，表达自己的喜爱。而今健在的一些陶瓷鉴定老专家提起斗彩来，必先言成化，他们认为，成化斗彩为我国瓷器的多彩绘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古瓷绘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对成化斗彩的高度工艺成就，挂货铺的王殿臣不大明白，古玩铺的周杰臣也不了解。那时，他们只知这东西能赚钱，着重于赚钱，而对其艺术成就和价值缺乏考证与研究。

王殿臣被周杰臣拣了漏，周杰臣同样被别人拣了漏。周杰臣手里的成化斗彩杯，古玩行里的人都看好，却不肯出高价。他找到卢吴公司的吴启周，吴启周开口给了 3 500，最后以 4 000 元成交。周杰臣心满意足了，倒手赚了 3 200 块现大洋，

当然高兴。他没料到吴启周将这只成化斗彩松鼠偷葡萄的小杯子运往美国，获利逾万。故此，古玩行里有“成化斗彩杯一本万利”之佳话。

一只铜鸭换家古玩铺

1939年，天津劝业场雅鉴斋古玩铺的萧宏度到北市场茶馆，遇到一位姓潘的人手里拿着只古铜鸭子壶。萧宏度仔细看壶的造型：有鸭子嘴、长脖子、有尾巴和腿，还有把有盖，形状像只卧着的鸭子。因为出土的时间较长，壶身没有绿锈；经长期、多次人手拿、摸，表面上有点油亮，花纹也磨浅了；壶的口、尾有残破，还掉了一条腿。萧宏度问姓潘的卖不卖？姓潘的说：卖！你给多少钱？萧说，30块钱呗！姓潘的说，才10袋洋面钱，我不卖。经反复协商，50块现大洋成交。

雅鉴斋是琉璃厂雅文斋出资开的买卖，连钱带货总共是2000块本钱。萧宏度是小本经营，可是他在天津经常买到好货。这次他买了这件古铜鸭子壶，拿到北京，先找雅文斋的二掌柜的范岐周报告消息说，我买了件古铜鸭子壶，才花50块钱。范岐周问他，你想卖多少钱？他说，还不卖个几百。这句话引出范岐周讲述以前的两件古铜鸭子壶。

他说：鸭子壶造型奇特，很值钱，不是卖个几百的，而是几千！几万！前几年，崔耀庭让武就三出外，买来件古铜鸭子壶，在古玩商会窜货场卖，见价3000，他没卖。后来，他卖给了艾少记，4000块。还有件古铜鸭子壶让陈鉴堂碰运气买到的。陈鉴堂在同益恒古玩铺时，去过山西大同买金石，结交当地的贩卖古董的小贩。这位小贩从大同背来件古铜鸭子壶，到同益恒找陈鉴堂。这时陈鉴堂已经自己开买卖，不在同益恒了。小贩到同益恒时纪国谦在柜上，纪没问他带来什么东西，

便把陈鉴堂的住处告诉他。小贩找到了陈鉴堂，拿出古铜鸭子壶给他看，陈鉴堂一看是新坑，出土时间不久，绿锈斑斑，通身是三代古铜花纹，造型奇特，是西周的文物。陈鉴堂将这件珍贵青铜器买到手，转手卖给上海叶叔重，是三万块。叶叔重将它出口到美国，又赚了一大笔美元。这件西周鸭子壶的图片收录在荣庚编辑的《商周彝器考》书中。

萧宏度听范岐周这么一讲，便问范怎么办，范说，你出钱买，雅文斋出钱修，咱们两家合伙做这号生意。萧宏度同意了。

雅文斋将古铜鸭子壶送到张济卿家里，请他修补。张济卿是位修补金石的专家，手艺高超，修理残破古铜，看不出破绽，仿造的铜、石器跟真的一样。而今，张济卿已不在世了，他的徒弟高英还健在，是位身怀绝技的老专家。张济卿修补古铜鸭子壶，先把掉的腿安接好，再把口、尾残破处补好，外行人看不出是经过修补的东西。修理费是200块，比买价还高出几倍。

萧宏度在天津买到这件古铜鸭子壶时，北京同益恒掌柜的张彬卿就得到他的叔伯弟弟张志均报给他的消息。雅文斋将鸭子壶拿到张济卿家修理时，张彬卿就告诉张济卿说，修好送回雅文斋之前，告诉我一声。

两个月后壶修好了，张济卿交货不到俩钟头，张彬卿就来到雅文斋，要看古铜鸭子壶。雅文斋萧书农跟他做这号生意，没要价，张彬卿先给价是4 000，再增到5 000，最后搭上一件古铜爵杯，给6 000，还是不卖。萧书农跟张彬卿做的古铜鸭子壶的生意没成，两人聊天，一聊聊到下半夜两点。张彬卿比萧书农的年纪大，知道的老事儿多，天南海北，离不开古玩行，这家买了件宋瓷，那家买了件唐三彩，彰德府出土什么商代古铜……聊来聊去，聊起了他的两个徒弟是怎么发家的事儿来了，师傅揭徒弟的底，谜底是什么，笔者另作文章。

雅文斋买了件古铜鸭子壶，行里人都知道张彬卿给了

6 000块没卖。一位长期住在北京的德国人，古玩行人都叫他“老德”。这位老德只听说是50块钱买的，没听说张彬卿给了6 000没卖，就急忙打来电话要看货。老德住在齐化门城根，货送去了，老德张口给2 000，他觉得你50买的，我给你2 000，完全可以买到手；而雅文斋则觉得，老德鼓足那么大劲儿，才给2 000，当然不卖给他。岳文轩也听说了，伙同倪玉书到雅文斋看古铜鸭子壶。倪玉书鉴定这只鸭也壶是唐代的，他师傅张彬卿认定是东周的，爷儿俩的认识不一致。倪玉书认为6 000块给价过了头，所以，跟岳文轩一起看了看就走了，他们两人都没给价。北京再没人想买这只古铜鸭子壶了，只有叶叔重能要这路货，可是他去上海没回来。雅文斋把东西收藏起来，等叶叔重回京。

1940年春节前，叶叔重来到雅文斋，见萧书农说：“你那只铜鸭子壶，张彬卿给你6 000，你应该卖给他。6 000，我拿去给你卖卖看。”时间不长要过年，年前结账是老规矩，范岐周找叶叔重。叶说，我有个外国买主，我给他寄去他要给美元，咱们按美元同联合币（日伪统治时期华北通行的货币）兑换牌价折算，行不行。范岐周跟萧书农一说，萧书农说：“他们上海人办事绕脖子，七绕八绕地把你绕进去，他占便宜你吃亏，咱们不干，给6 000联合票好了。”所以，过年没结这笔账。后来，叶叔重同萧书农说，现在是到处打仗，你的那件东西我寄到外国没卖，放在那里，人家要保险费，我给6 000卖了算了。这时，日伪的票子已经贬值，萧书农无可奈何，将古铜鸭子壶卖给了叶叔重。

古铜鸭子壶是萧宏度买的，雅文斋修理的，两家合伙做这号生意。萧书农从天津把萧宏度找来，告诉他说，你把我们原来开雅鉴斋立的字据拿来，咱们撤销字据，两千元开买卖的本钱我不要了，雅鉴斋全归你，卖古铜鸭子壶钱我不给你了，咱

们是两抵销。萧宏度同意了。后来，古玩行里传出“萧宏度化 50 块钱买只鸭子，换来个古玩铺”的佳话。

第四章

一、鉴赏家与收藏家的轶事

鉴赏说的是对文物、艺术品的鉴定欣赏。明陶宗仪《辍耕录·淳化阁帖》说：“《淳化阁帖》，非精于鉴赏者，莫能辨其真伪。”何止《淳化阁帖》，所有古玩文物均如此。古玩若离开人们的鉴赏，则无从发挥其社会作用。鉴赏古玩，只有能辨别真伪，才谈得上欣赏。而能辨别古玩之真伪决非易事，要具备鉴定文物的基础知识，懂得我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艺术，还要亲身实践，多听多看，虚心求教，细心琢磨，日久天长才会练出好眼力。

收藏家和古董商都要有好眼力，不然收藏或买卖一些假古玩，岂不既丢名誉又赔钱！收藏书籍典章、古画墨迹、文物古玩，自古有之，分为皇家收藏和私人收藏（而今是公家收藏和个人收藏）。收藏家收藏古玩文物各有不同，收藏目的不外爱护文物，保护文物，进行研究考证，著书立说者有之；而以此聚敛、“浓缩”财富、发财致富者亦有人在。譬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和她丈夫赵明诚同好金石图书，收藏商周彝器及汉唐石刻拓本甚丰，编著《金石录》30卷，考古学者；清乾隆时代有位文华殿大学士和糴，收藏古玩奇珍之多，可谓空前绝后。当嘉庆皇帝命其自杀、抄没他的家产时，最值钱的是他收藏的珠宝古玩，紫禁城传出：“和糴跌倒，嘉庆吃饱”，可见

他的财富有多少！

收藏家和古董商都要有好眼力，那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此问题，笔者请教过老古董商，他们说：“收藏家是买古玩的，我们是卖古玩的。”而其实，古董商也买古玩，而买是为卖；收藏家玩腻了古玩字画，也卖。古玩不经过市场买卖，实现不了它的价值，也不知它到底值多少钱。民国以来，所谓的收藏家，哪位没卖过古玩，大古董商哪位又不是大收藏家呢？笔者今将经多方采访了解到的几位收藏家的趣闻轶事，介绍如下。

罗振玉是学者也是古董商

罗振玉的名字往往同中国的甲骨文连在一起，一提罗振玉，人们便想到甲骨文。其实，发现甲骨文最早的是光绪二十五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王老先生得病买药，有一味药叫“龙骨”，上有类似青铜器上铭文的字形。王懿荣曾把“龙骨”给琉璃厂古董商孙秋^颉看过。光绪二十九年，孙秋^颉拜见同治举人、经学家、文字学家孙诒让，见孙诒让在研究“龙骨”，撰写《契文举例》，考释“龙骨”上的文字。孙诒让研究甲骨文要比罗振玉早十来年。

罗振玉作为历史人物，特别是考古学者是值得研究的。为给研究者提供点资料，现将老古董商中的传说整理出来，供参考。

罗振玉，浙江上虞县人，他父亲在县城里开旧书铺。罗振玉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要用以充做奠仪；另一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册旧书和字

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很好，就请他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掌柜变成了古玩字画商。可见罗振玉刚踏入社会便与古董联系起来了。

罗振玉辞去家馆教师，携带一批古书画到上海、北京，开始与那里的古董商有了交往。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罗振玉反对，他在上海办过几个月的《农学报》，创办东方学社，得到清王朝保守势力的赏识，给他安排个学部参事的差事。当时的罗振玉官职微小，是宝熙的部下，他自称是宝熙的学生。宝熙当时任清廷学部侍郎，即学务大臣。

1906年，罗振玉奉召入京。1911年辛亥革命，他逃亡日本。这五年时间，罗振玉曾不断到琉璃厂的尊古斋、式古斋等各家古玩铺观赏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他结识了孙耿飏、黄兴甫和黄伯川等经营金石的老古董商。那时，来琉璃厂鉴赏金石的，有两江总督端方、学部大臣宝熙、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等人，罗振玉算是个小官，琉璃厂的人不大重视他。

罗振玉是秀才出身，尊古斋的老掌柜黄兴甫是湖北赴京会考落榜的举人。黄伯川是京师同文馆毕业，通晓英、法、德语，在德国奇罗佛洋行当译员兼做古董生意，后专门鉴赏、经营金石。罗振玉同尊古斋的黄兴甫，特别是黄伯川交了朋友，他们研究金石钟鼎文的兴趣相同。尊古斋给罗振玉提供过研究金文的资料，主要是青铜器的拓片，罗振玉和黄伯川曾传看各自拓下的金石拓片，鉴赏青铜器上的铭文，共同切磋。1899年，河南安阳出土甲骨文后，黄伯川曾将商代青铜上的金文同甲骨文相比较，发现它们近似。后来，黄伯川向罗振玉提供过这种比较资料。

辛亥革命的那年，罗振玉逃亡日本，曾在日本做古董生

意。他靠同日本的书商、古玩商的人际关系，结识了一些日本朝野名流。在日本他继续搜集和整理商周青铜器、龟甲兽骨、竹简木片、古代陪葬器物等古物上的文字和铜器的造型、花纹与铭文。以罗振玉的名字出版的《殷墟书契》，有他自己搜集、整理、研究的辛劳，也有黄伯川为他提供资料的劳苦，更有王国维研究、整理、编纂的心血。

王国维是罗振玉的儿女亲家。王国维青年时代曾入罗振玉办的东方学社，学习日文，接受过罗振玉的经济支援；后来，王国维到日本留学，罗振玉正在日本。罗振玉做古董生意，支援王国维在日本留学的费用。他们两人在日本时，生活在一起。王国维为了报答罗振玉的恩情，帮助罗振玉整理青铜器的拓片、甲骨拓片，编写《殷墟书契》前编。

1913年，《殷墟书契》前编出版，罗振玉名声大振，在日本轰动一时，日本人将罗振玉看成是中国考古的学术权威。一些爱好中国历史文物的日本朝野名人，向他请教或拿来一些中国古玩请他鉴定。罗振玉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画上，另加“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日本古玩商向中国古玩商讲过：“罗振玉是鉴定古玩，特别是金石、字画的权威。”1919年，罗振玉自日本回国，住在天津，开墨缘堂，经营古书、文玩。他经常到北京搜集、研究金文和甲骨文，同琉璃厂的古董商黄伯川等人继续交往。1924年，溥仪召他入直南书房，和王国维一起检点宫中器物。他曾列席清室善后委员会，参予清点清室财物。这时罗振玉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有一些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

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古董商只知罗振玉拓宫里青铜器，墨缘堂卖这路拓片，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老古董商中流传着罗振玉三件买卖青铜器的事。第一件事是他从日本回来后，没当伪满官员时，罗振玉卖给宝熙一件铜器叫“簋”。簋是商周时期盛食物的器皿。卖给宝熙这件簋是圆口、圈足、有两个兽头耳子，带盖，造型、花纹平常，锈色一般。有人说是件仿制品、新东西，罗振玉硬说是商代的簋。宝熙相信了罗振玉，没听别的鉴定家们的话，宝熙此时手中的钱已不多，他把收藏的古董玩物放在琉璃厂古玩铺代卖，却出巨款买了这件簋。

第二件事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当了伪满官员到卸任期间。这一阶段，罗振玉买古玩，北京的古玩商和沈阳的古玩商不少人给他送货看。他搜集的文物大部分是青铜器和字画。具体的器物，现在一些健在的老古玩商，有的确实不知，有的则不肯说，但他们都说了罗振玉收买文物的特点，就是凡是给他送去的货，他先看第一眼，别人看过的东西他不要。他说：“你给别人看过了就不新鲜了；你卖不了，别人不要的，拿我这里来，我不要。”后来，人们明白了，他这一招儿是为了赚一些伪满官员的钱，如给别人先看了，底细别人就知道了，他不好跟别人要高价。

第三件事是罗振玉卸去伪满监察院院长后，在大连开墨缘堂时，溥仪说他是做了一任监察院院长，又跑回大连继续卖他的假古董，一直到死。这个阶段，沈阳有商人卖给罗振玉四件寻常的青铜器，本来不值多少钱，弄到他手里，则想方设法卖高价。这回他找到了溥仪的岳父、婉容的父亲荣源的头上。单从人品上说，荣源是位老实人。罗振玉跟荣源说，我有位日本

朋友在上海开咖啡馆。其实，那时日本人没喝咖啡的习惯，上海也没有日本人开的咖啡馆。荣源是久居宫府的皇亲贵族，对外国的事知道的不多，上海有没有咖啡馆，他当然也不知道，连编瞎话的罗振玉也不知道。罗振玉说，我在上海开咖啡馆的那位日本朋友，赔了本，出了事，需要钱，所以托人把四件青铜器带来，要卖给我一万块，这四件铜器的价值不止一万，可我手里没那么多钱，您先给我垫些钱或借给我一些。荣源一听信以为真，说不用借了，把东西给我拿来，卖给我吧。罗振玉顺水推舟，把四件青铜器卖给了荣源。

荣源是懂古董玩器的人，一看罗振玉拿来的四件青铜器，都是些寻常的东西，心里很不高兴，又不好退给他，弄得这位老实人几宿没睡好觉。后来，这位老实人也学乖了，他用同样的办法卖给了熙洽。熙洽是溥仪的远支宗室。溥仪没到东北时，熙洽当东北保安副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溥仪当上伪满洲国皇帝时，熙洽是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熙洽不懂古董文物，听说是日本的东西，他就花一万块买下来了。

从罗振玉踏入社会到死，一直同书铺、古玩铺交往。他父亲是开旧书铺的，他自己长期开设墨缘堂，经营古书、古画、古铜等文物。他的发迹是从买卖古玩开始的，他的收场仍是落到古玩商的行列里。可以说他是位考古学者，也是个古董商。他卖过假宋版书、假古董，但他将大量的珍贵文物，搜集到手，整理出甲骨、铜器、简牍、冥器、佚书等考古资料，专集刊行。著名的著作是《殷墟书契》、《三代吉金文存》、《殷墟书契菁华》、《殷墟契考释》和《流沙坠简考释》等。

罗振玉死于1940年，死后在大连遗存大量古书、夏商周秦汉青铜器、龟甲兽片、冥器、字画、法帖、古钱、陶瓷器等种类繁多、数量浩瀚的中国文物。

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失败投降后，一位久居旅大的朋

友说：“罗振玉的书和古董可真多，我亲眼看到，用汽车拉运火车站，装了几火车皮。”运往何方？他说不知道。

学徒出身的收藏家郭世五

郭世五，名葆昌，河北定兴县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前，在北京西华门的一家古玩铺学徒。他幼年机智聪明，善于辞令，深受古玩铺的东家、掌柜的赏识和器重。借给袁府送山水画屏之机，入袁世凯府当上差，袁世凯看上了这小伙子。袁世凯筹划实行帝制时，郭世五当上了袁府大总管，后又做呈启官、总统府庶务司长，被委任为九江监督，监制“洪宪瓷”。

俗话说：“官升脾气长”。郭世五为官后，派头十足，脾气不小。但对古玩行的老同仁还是比较客气的。老古董商到他府上去，他总是叫听差的打帘子迎，客人来了或走了，都由听差的打帘子，表示尊敬。但是对比他年轻的或他的徒弟他就不客气了。虹光阁的曹文波经常到他家送字画给他看，他不怎么懂字画，看了些看烦了，郭世五跟他的听差的说：“这个人再来，你拿张纸儿，把他给我捏出去！”一次，他到琉璃厂雅文斋，一进门杨兴顺大师兄说：“郭五爷！您吃饭啦。”郭世五用眼珠翻棱他一下，申斥说：“他妈的！我一天老是吃饭，成饭桶啦！”郭世五有个优点，当官不忘故旧，凡是小时候跟他一起干过活的老朋友，求到了他，他都给予帮助。一天，一位扛肩的（老北京有一种卖苦力的，专门给财主扛贵重器物），给他家扛来硬木条案，在院子里看见了郭世五，便喊：“咳！这不是郭葆昌吗？”郭世五心想，谁这么大胆，敢直接叫我的名字，仔细一看是他学徒时的老相识，连忙过来道辛苦，叫听差的送水送烟，临走还多给两块钱。

郭世五同美国人福开森共同编著《项子京》一书，内容

是历代名贵瓷器的照片和说明。这部书在整理、鉴别、说明历代名贵瓷器上，有独特见解，对鉴定古瓷有参考价值。有人认为，书名为项子京，所拍的照片，必是项子京收藏之物，其实不然。项子京是明代万历年间去世的，他是画家、鉴赏家，收藏甚丰。《中国人名大辞典》记载：“清兵至嘉禾，项氏累岁之藏，尽为千夫长汪六水所掠。”而且项氏收藏最多的乃是法帖、字画。

1913年至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时，郭世五想效仿明清历代皇帝的做法：每代皇帝都在江西九江景德镇设御窑，烧制名贵瓷器，写上年号，供宫廷陈设所使用。他将这一想法禀报给袁世凯，袁世凯当即委任他为九江道，监督烧制“洪宪瓷”。

郭世五在景德镇监督烧制瓷器时，聘请绘画、填彩、烧釉、造型、烧窑等名家，重用人才，选用精良材料，继承清代官窑瓷器的传统特点，采用官商合股开办“江西瓷业公司”（1910年筹办）。其烧制高级瓷器的特点是：胎骨薄轻，釉色洁白。郭世五集中人力物力，精心烧制，烧制前的样品，要经他过目、批准，才能入窑。所烧制出的成品，胎釉精白，彩质纯净，彩色鲜明，绘画工巧，同雍、乾之珐琅彩相比，毫无逊色。

“洪宪瓷”是一种通称，郭世五烧制的高级名贵瓷器，并没用“洪宪”款识。因为他是在1913年开始筹备、到1915年就结束了他监督烧瓷任务。袁世凯在1915年12月12日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改变年号，规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到了1916年3月2日宣布撤消帝制，洪宪年号也随之取消。郭世五为袁世凯烧制的瓷器是用“居仁堂”款识，为他自己烧制的瓷器用的是“觐斋”款识。这两种款识的瓷器，精致细腻，绘工精美，彩色娇妍，堪称名

贵。市场上出现的有“洪宪年制”款识的瓷器，则大为逊色。标写“洪宪年制”款识的瓷器，不一定是1916年生产的，不少是二三十年代民窑烧制的。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人将“洪宪”款识的瓷器，视为珍品。“居仁堂”、“觐斋”款识的名贵瓷器甚少，有人见了不识货，不重视，甚至轻易允许出口。

郭世五烧制出“居仁堂”、“觐斋”名贵高级瓷器，取得成功，在我国瓷器烧制发展史上留下了一页，这同他尊重和重用景德镇烧制瓷器各种专业人员有关，也同他长期酷爱、研究、鉴赏我国历代名贵瓷器有关。他原是一名古玩铺学徒，却对我国的瓷器发展做出了贡献。

他家住北京交道口秦老胡同，收藏很多历代名贵瓷器和其他文物。从清末到40年代初他去世之前，一直同琉璃厂和其他地方的古董商来往，但没开设古玩铺。他在海王村公园门前左边，开了一家专门拍摄古董玩物的照相馆——“铸新照相馆”。

郭世五收藏的王羲之《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是两件国宝。这两件国宝大有来历。《伯远帖》上有宋徽宗赵佶御题和收藏印，北宋时由宫廷收藏。辗转六百多年，清代高宗皇帝弘历得到《伯远帖》，又得到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中秋帖》，乾隆皇帝认为这是三件稀有之物，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名其收藏之室为“三希堂”。1924年，溥仪将《中秋帖》和《伯远帖》带出宫中，抵押在一家日本银行。抵押到期未赎。郭世五闻讯赎回，收藏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郭世五曾想将《中秋帖》、《伯远帖》和几幅名画，转让给张伯驹收藏，因战争爆发，未能如愿。郭世五在1940年秋季，病死在北京。斯人已去，两帖仍留人间。

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到北京，郭世五之子郭昭俊巴结权贵，把二帖奉送宋子文。张伯驹一向广交朋友，信息灵通，获

悉后愤然命笔，在上海《新民晚报》副刊发表了《故宫散失书画见闻记》，文笔犀利，矛头直指郭、宋二人。宋子文担心事情败露，引起民愤，落一个盗窃国宝的名声，只好忍痛将《伯远帖》、《中秋帖》二帖退还给郭昭俊。

一直关心二帖下落的张伯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知二帖已流入香港，并被典当给一家英国银行，便立即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十分重视，派专人赴港，在1951年典当期满之日，用重金把《伯远帖》、《中秋帖》赎回。1951年12月27日，文化部长沈雁冰决定将两帖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三希堂的另一幅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大收藏家袁励准绰号“袁掌柜”

袁励准，字珏生，江苏常州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进士，入翰林院任侍读学士。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监督，1905年创办实业学堂，任校长。1927年阴历八月，曾被废帝溥仪召见，1928年东陵被孙殿英盗掘后，曾到天津张园溥仪住所，叩拜乾隆皇帝、慈禧太后之灵位。1932年，在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当教授，1935年因病在京去世。

袁励准是位书法家、文物鉴赏、收藏家。他的书法宗米芾，劲力奔放，潇洒自如，北京中南海南门上的“新华门”三字匾额和琉璃厂原“雅文斋文玩处”六字，皆出自袁励准之手。他收藏法帖、古墨甚多，对古铜、字画的鉴别有较高眼力与学识，鉴赏、收藏古瓷的兴趣较浓。

民国以来，袁励准经常到琉璃厂各家书铺、古玩铺，他同杨伯衡、萧虎臣、萧书农、陈中孚、范岐周等人有交往。他收藏的古墨大多是清代名墨，明代的墨很少，虽无稀奇之珍宝，

但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袁先生爱墨成癖，凡好墨皆收藏，所收藏之墨，时至今日，皆为珍品，著有《中舟藏墨录》。当前在北京搜集清末出品名墨、甚至民国以来胡开文出品的“龙门”墨，也十分困难了。

袁励准收藏古瓷是少而精，都属于珍品。他从杨伯衡手里买到的那对宋钧窑鸡心杯，是国宝级的珍品之一。这对鸡心杯，造型小巧玲珑，惹人喜爱；釉色艳丽，恰似彤云飘荡，是宋钧窑烧制的贡品，袁励准爱不释手，始终收藏在自己的身边。

上有“枢府”二字的元代官窑闪绿印色盒，也是他心爱之物。这件印色盒的颜色特别好，观之若深渊之绿水，望之似三月之麦浪，绿油油的。元官窑，是元代灭南宋后在景德镇袭南宋旧制，烧制瓷器时加印“枢府”二字，以区别南宋官窑。这件元官窑闪绿印色盒，是元代末期景德镇瓷窑烧制的新产品，名叫“钴蓝釉”，这种蓝是蓝中闪绿。与此同时，景德镇还烧制铜红釉，蓝地白花和蓝釉金绘（炆金）等新釉色瓷器。这些釉色的烧制成功，是元代官窑烧制新釉瓷器的创举，烧制的器皿为数极少。所以，袁励准的元官窑闪绿印色盒，乃国之珍宝。

袁励准有件宋官窑竹节笔洗。这笔洗约2市寸高，5市寸的口径。笔洗是洗笔的器皿，有玉制的、铜制的，瓷制的居多。好毛笔的笔尖极娇嫩，写字、绘画后必须即刻将笔洗净，否则笔尖则被墨的胶性所浸浊。故此，名书画家写字作画之后，皆将笔洗净。传说有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洗笔、将池塘染黑的故事，形容写字之多。袁励准是位书法家，他喜爱的宋官窑竹节笔洗，不是用来洗笔，乃为观赏。

宋官窑是宋代名窑之一，乃宋宫廷设置的御窑。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南宋官窑又分为“修内司”官窑和“郊

坛”下官窑。北宋官窑和“修内司”官窑的窑址，1956年尚未发掘出来；郊坛下官窑窑址范围甚大，1956年曾做过部分发掘。

袁励准之宋官窑竹节笔洗，乃“修内司”官窑所烧制的珍品。“修内司”官窑烧制的器物，造型取法于古代铜、玉、陶器之形状，工艺精巧，所烧制之文具尤为奇妙。

袁励准有件宋定窑碗，碗的特殊之处是在碗内花纹中的两旁有“郭彦”二字。碗的胎骨洁白坚密，透明釉，白中微微泛黄，即象牙白色。这种釉色属定窑之上品。宋定窑是宋代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北曲阳涧磁村、燕山村，古代属定州，故名定窑。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是在唐代邢窑白瓷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北宋中、后期发展到高峰，居于宋代白瓷的代表地位。袁励准的宋定窑碗，乃北宋中期烧制的刻花暗字署名的象牙白碗，是宋定窑烧制的罕见之珍品。

袁励准收藏的宋哥窑水注（亦称水滴、砚滴，向砚台里滴水之器皿），也是件珍贵罕见之文物。水注的造型新颖奇特，是圆立瓜型；胎是追求古铜的效果，胎质坚密，胎色紫黑，足部露胎处呈紫红色；釉追求古玉的效果，釉层浑厚，釉色呈粉青色，釉面滋润如凝脂；釉面有长短和深浅不等的开片纹理，开得有条不紊，十分美观。这件水注乃传世哥窑瓷器，这种瓷器在国内外收藏的为数不少，但圆立瓜型水注则属罕见。

玉龙勾是袁励准收藏的一件珍贵古玉。这件玉龙勾，色如新剥熟栗子的颜色，长约6寸，宽不到1寸。玉龙勾，形如龙有纹，玉制，故称之为玉龙勾，实际上是一种带钩。带钩在我国使用时间久，古人服装必束带，带之联结处用钩。有人认为，带钩在春秋、战国时由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有的则以为带钩在三代即有之，乃汉民族服装的一种装饰品和实用物，

一直沿袭使用至清末。民国以来带钩变为皮带卡子，而今女子束腰又时兴各式各样的带钩。袁励准的玉龙勾，经专家鉴定为周代遗物。

袁励准是位书法家、收藏家。他同老古董商交往多，同珠宝商来往也不少，他也做古玩珠宝生意。所以，人们在背后称呼他“袁掌柜”。他的书法，而今人们能够看到的是中海南门的“新华门”三字；他收藏的文物，一件宋钧窑鸡心杯现收藏在天津艺术博物馆。其余则不知。

未曾破落的旗人收藏家桂月汀

桂月汀，生于 1880 年，是生下来便吃皇粮的旗人。清代在北京居住的人，分为旗人和民人。旗人是指八旗成员。民人是八旗成员以外的平民百姓。

八旗是清代满族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和制度。这种制度是努尔哈赤在“牛录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公元 1601 年，建立黄、白、红、蓝四旗。14 年后，努尔哈赤的势力范围扩大了，又增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为八旗。每旗（满语称“固山”）下辖五参领（“甲喇”），每参领下辖五佐领（“牛录”）。凡满族成员分隶各佐领，平时生产，战时从征。皇太极时，又将降附的蒙古人和汉人编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与“八旗满洲”共同构成清代八旗整体。

八旗制度初建时，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清兵入关，福临为帝时，曾直接掌握正黄、镶黄、正白三旗，限制和削弱八旗贵族势力。但是，清朝满族统治者都要利用八旗制度，加强对人民的控制，特别是用八旗的军事力量，扩展疆土，统治臣民，这造成了旗人与民人之间的矛盾。那时，旗人

比民人高一等，旗人见汉人的县官不下跪，生下来就有俸禄、钱粮，民人称他们是“吃皇粮的”。清廷腐败，表现在贵胄、八旗之腐败，代代相传不会生产，不会经营，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不能自理，游手好闲，架鹰玩狗，吃喝嫖赌，外加抽（吸鸦片、抽白面儿）。清末，八旗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致使武昌起义时摄政王载灃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

清亡，八旗制度全部瓦解。八旗成员的生活日渐贫困，不少人穷困潦倒；一些上层人物虽然生活来源断了，但还能依靠以往的积蓄，继续“摆谱儿”，摆到一定时间，钱少了，“谱儿”越来越小。但桂月汀的“谱儿”却一直也没小。

桂月汀没功名，是位白丁。各个时期都没做过官，也没特殊技能，可是他一辈子始终没掉价儿，出门有自用的汽车或包月人力车，家里有仆人。他瘦瘦的，中上等个儿，隆准细目，文静清秀，衣着经常是长袍马褂，缎鞋洋袜；举止言谈、甚至走起路来都有气派。给笔者的印象，他是位有派头的和善老人。

桂月汀，老古董商背后称他“桂三儿”，见面称呼他“桂三爷”。他玩了一辈子，很会玩，能玩出名堂来。他玩什么，会什么，钻研什么。他幼年便喜爱京戏，钻研京戏，会演京戏；成年后，他玩古董，钻研古董，能鉴定古董。他为人和善，交际广，能联系人。这些就是他玩一辈子、没破落的原因所在。

桂月汀年幼时聪明，机灵，被当时在朝中居高位的“宝二爷”看中了，把女儿许配给他。婚后，住在东四九条宝二爷府上的西跨院。他喜爱京戏，从小经常听戏。王府、甚至宫廷内演戏，他带着“腰牌”（宫禁中的通行证），常进去观看。所以，他认识内廷供奉京剧名角王瑶卿、谭鑫培。他跟王瑶卿同龄，从年轻到老死，一直是好朋友。他从爱听戏到自己登台

演出，清末，他是唱小花脸的票友，民初即谢绝舞台。桂月汀不像汪笑侬（满族）、言菊朋（蒙族）那样，从业余爱好者成为专业演员，并成为京剧界的一派，在梨园界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梨园界著名人士都认识“桂三爷”，都尊重他。他同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都有交往，同著名老生余叔岩、马连良、谭富英都熟悉，是名票友夏山楼主的好朋友，跟著名琴师徐兰沅、杨宝忠有交情。虽然他不上台演戏，但他经常琢磨戏，对京剧艺术有见解，有研究。琉璃厂的老古董商只知道桂月汀是王瑶卿家中的座上常客。他在三四十年代，每月要到琉璃厂来两三趟，先到赏奇斋、雅文斋，后来又 到 韞玉斋、文古斋，古玩铺里溜达完了，便到大马神庙王瑶卿的家里去。至于他同王瑶卿谈论京戏的事，对京剧艺术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则不得而知了。

桂月汀喜爱名贵瓷器、各种鼻烟壶，还爱养蛐蛐儿、观看斗蛐蛐儿，他家藏有上好的蟋蟀盆、蝈蝈葫芦。他从喜爱到研究我国历代名窑瓷器，鉴定瓷器的眼力好。到本世纪 20 年代，桂月汀已经是北京的有名声的古玩鉴赏、收藏家。有些卖古玩的旗人、大宅门都请他去看东西，托他代卖；买古玩的新官僚、富户也找他鉴别真假或托他代购。他同琉璃厂、东西牌楼等地的古玩商有交往，跟谁都说得来，平易近人，特别注意提携后辈。

1942 年，桂月汀来到琉璃厂文古斋，掌柜的不在，徒弟给他拿出件鼻烟壶看，告诉他里边还有鼻烟。桂月汀打开烟壶盖心，倒出鼻烟，闻了闻说：“好！好！”徒弟没注意，说了一句走嘴的话：“好什么好，脚巴丫泥味！”桂月汀听了后笑笑说：“咳！这味才好哪！这么多年，薰烟的香料味都走了，这才是正味。”接着他问徒弟：“你知道鼻烟是哪里来的？”答曰：“不知道。”桂三爷便聊起了鼻烟的来历，他说，原来北

京人不闻鼻烟，自雍正皇帝接受了意大利进贡的鼻烟，到了乾隆时，乾隆爷把每年外国进贡的鼻烟赏赐给大臣和藩属国王，嘉庆、道光皇上都闻鼻烟，文武大臣也闻。在我小的时候，北京城里的人闻鼻烟的，就跟现在抽烟卷的似的，很普遍。直到今天大栅栏还有豫丰烟铺，可是没有多少人闻鼻烟了。接着他由意大利人怎么发明鼻烟聊到中国的王致和怎样发明臭豆腐。他说，康熙年间有位南方人带来北京一坛豆腐，他参加殿试落榜，豆腐放的日子长了，打开一闻臭了。可是他是个穷举子没钱买菜吃，就凑合着吃这坛豆腐：觉得还能吃，有一股特殊的臭味。后来，他经过研究，发明了臭豆腐，这个人叫王致和。意大利人发明鼻烟，跟王致和差不多。他们收藏很多烟叶，天长日久，烟叶糟了、粉碎，跟土差不多，闻了闻有股特殊味，从此创造出鼻烟。你说脚巴丫泥味，这种味的是洋烟，咱们本地烟是仿洋烟制作的，那味呛鼻子，有点辣。聊完了他便问：“这烟壶要多少钱？”徒弟说：“掌柜的说了，10块钱就卖。”“那好，我给你12块。”桂月汀跟小徒弟就这样做买卖，用这种办法提挈年轻人。二三十年代他就是这样做的。当小徒弟长大成为大掌柜的时候，就格外尊重他，谁也不肯用假货骗他，他在古玩行业里的人缘很好。

桂月汀买古董，他不懂不装懂。1931年，北京西城有家宅门，请他去看件法花罐，他跟人家说，我给你找个人看看，我不懂法花。他找雅文斋萧书农，萧书农鉴定是件新东西，没当面说什么。可是在这家屋外墙角的台上，放着一件海棠式的宋哥窑洗子，被萧书农看到了，只花八块钱就买到手。萧书农打电话把这事告诉了桂三爷。桂月汀没见东西，在电话里说，我给你150元，萧书农二话没说，就卖给了他。这件宋哥窑洗子，是件珍品，当时值个三五百现大洋。为什么萧书农这么便宜卖给他呢？因为，这号买卖是由桂月汀介绍去的，如果他说

要伙着，赚钱也得分他一半；再说，人家不见货就给价，是充分信任，讲交情面子，150 块钱也就卖给他了。

崔耀庭与萧书农合伙花 400 元买了件宋定窑洗子，萧书农卖给桂月汀，1 000 块钱，告诉崔耀庭卖了 800。一次，叶叔重请客，桂月汀、崔耀庭、萧书农等人都在座。崔耀庭说：“桂三爷喜爱宋瓷，雅文斋那件定窑洗子您看没看？”“卖给我了，1 000 块！”桂月汀脱口而出，萧书农很尴尬，崔耀庭“噢噢”两声，心里说：“姓萧的‘克’了我 200！”从此，都知道桂月汀买古玩价钱公开，不说假话，赢得一些古玩商的信任。

表面上看桂月汀是位买古玩的收藏家，不是卖古玩的古董商。在一般人、特别是外国人的眼里，桂三爷是清代的贵族，北京的老住户，家里讲究，人有气派，是位古董鉴赏、收藏家。其实，桂月汀既是买古玩的，也是卖古玩的，在古玩铺里卖不上好价钱的东西，到他的手里就能卖上好价钱。

日伪统治北平时，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的经理高田，领着几个日本客人，到桂月汀家里作客。桂三爷家里有厨师，先宴请他们吃中国老北京的饭菜，然后请他们观赏古董玩物。日本人看他的这种排场，谁都不小看他，也不好说要买他的古玩，只是向他说，这件古玩很好，我喜爱它，请您“匀”给我吧！桂月汀痛快地说：“你喜欢它，你拿走！”从不说，给我多少钱。日本人对这种不讲价的买卖，只听高田的，他说多少给多少，高田从不让桂月汀吃亏，也不让他的同胞们花“大头钱”，因为他是内行。一些外国人的心理，觉得在北京这样的宅门里、老住户的家里买古玩，错不了，比在古玩铺里买的既真实，又便宜。他们哪里知道，桂月汀也是从古玩铺里买来的，怎能比古玩铺里的东西还便宜呢？

桂月汀买古玩、卖古玩，跟有些古玩商不同，有的古玩商真是“买死人、卖死人”，就是买货时尽量把价钱压得低而再

低，卖时则把价钱提得高高的；人在困难时，要是委托他卖件古董，他则“勒大脖子”。桂月汀从不干这种事。民国以来，有些在京的旗人穷了，委托他卖件古玩维持生活，几十块钱能买到手的東西，他要花个千八百块钱。他说：“人家没辙了，我再去坑他，良心过不去。”他到了晚年，自己经济困难时也是如此。1952年，无量大人胡同有位徐老太太，她是高凌霨的夫人。高凌霨在曹錕当大总统时，曾给曹錕当国务总理，高凌霨不在人世了，他的夫人隐姓埋名，人们只知她是徐老太太。徐老太太病了，没钱治病，想卖件古董，不知到哪里去卖。1949年，古玩没人要，不值钱。桂月汀的女儿认识徐老太太，徐老太太把一件宋哥窑洗子交给了她。桂三爷一看是件好东西，可是如今没人认货，自己手里又没多少钱，徐老太太正在急需。他就找老朋友凑了3 000块钱，给徐老太太送去。徐老太太在1952年临终前还念叨：“桂三爷是位忠厚好人。”桂月汀后来将这件宋哥窑洗子转让给广东著名收藏家谭静。

从清政府倒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8年政治风云中，旗人的经济生活、政治地位几经衰落，而桂月汀始终维持着他的那种生活，是极为稀少的。1953年，73岁的桂月汀在京去世。他收藏的文物，由梅兰芳先生出面，归故宫博物院保管，他的独生女儿桂泽华被安排在医院工作。桂月汀圆满、顺利地度过他的一生。

收藏家的悲剧

——珍贵文物付东流 上当受骗假“古月轩”

沈吉甫，浙江宁波人。光绪三十年（1904）沈吉甫辞去沙俄在北京开设的道胜银行买办（中国人当经理称买办）的职务，自己在西交民巷开设懋业银行，担任理事长。他在北京

开办银行三十余年，是中国最早的金融界知名人士之一。他会俄语，懂金融业务，对货币、商品有研究，也是中国人研究货币学较早的一位学者。

沈吉甫有一种癖好，就是鉴赏、收藏我国历代珍贵文物，对青铜器、陶瓷、古玉有研究。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1931年，31年的时间，他在北京搜集了历代名贵古瓷千余件，青铜器、陶器、玉件头等古代文物几百件，成为北京的著名收藏家。

北京锣鼓巷蓑衣胡同的一所百余间的深宅大院，是沈吉甫在京住所。这所宅院的五间北房和六间东、西厢房里，陈设着明清时代制作的雕花紫檀桌、椅、条案。紫檀是世界上最贵重的木料。欧美人喜爱紫檀，在他们的国家里用紫檀制作小巧器物玩赏，当他们看到拿破仑墓前的有5寸来长的紫檀棺槨模型时，都惊慕不已。来京的西洋人，看到沈家陈设着这样大的紫檀雕花条案、桌椅，无不咋舌！而今，这些器物多运往欧美。

在紫檀家具上陈放着商周秦汉青铜器、陶器、玉件头、瓷器。在红木顶箱立柜中，锁着更为珍贵的文物。文物收藏、陈列占有11间房子，这在民间是少有的，而其所收藏的尽是珍贵文物，名贵稀有的古瓷之多，在北京是独一无二。那时，北京经营古瓷著名的延清堂、荣兴祥所收藏的历代名窑和明清官窑瓷器，与之相比，尚显逊色。

沈吉甫搜集、收藏这么多古董，大部分是从琉璃厂和东四牌楼一带的古玩铺买来的。他是大观斋、延清堂、铭珍斋、博韞斋、雅文斋、荣兴祥、天和斋等家古玩铺的老主顾。这些家古玩铺的掌柜都是他的朋友。他学识渊博，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不鄙视古董商。他认为，中国从汉高祖刘邦就看不起商人，把商人列为下等人，是不对的，中国要富强，商业应兴旺。卖古玩的商人同其他商人大不一样，有眼力，懂历史，鉴

定文物有经验。所以，古玩商到他家去，从不让在门房等候，他专门设有三间小客厅，接待他们。

北京的古董商也愿意将自己的名贵文物送给沈吉甫鉴赏，因为他鉴定文物，特别是鉴定陶瓷的眼力好，并对我国古代名窑有研究。他对宋代柴窑，持否定态度，说：“只闻其说，未见其物。”对哥窑则认为：“见其物，其窑不明。”他收藏有宋代汝窑、官窑、定窑、钧窑、哥窑的瓷器和磁州窑的瓷枕，而元代钧瓷、青花瓷器和明清官窑瓷器较多。他收藏明清瓷器讲求釉色、彩头。他喜爱永乐、宣德青花、青花红彩、成化斗彩、正德孔雀绿、嘉靖瓜皮绿、万历五彩、康熙豇豆红、天蓝釉、郎窑瓶和雍正粉彩瓶等等，一般瓷器他看不上眼。

老古董商中传述这样一段故事：20年代初，铭珍斋的掌柜韩敬斋拿件乾隆官窑粉彩瓶给沈吉甫看。沈认定是件中等瓷器，称不上上等官瓷瓷器。韩敬斋则认为这是件官窑珍品。二人论来论去，沈吉甫说：“咱们不讲珍品不珍品、名贵不名贵，我看只值400块钱。”韩敬斋说：“它要是只值400块，我砸了它！”沈吉甫一听，话说僵了，得给他找个台阶下，笑了笑说：“你拿回去砸，可别在我这儿砸。”说完两人都笑了。沈吉甫讲交情，爱面子，重友情，讲义气，自己又有鉴别文物的好眼力，所以，古玩行里的人，谁也不用假货蒙他。他买了三十多年古玩，从未听说过他买了打眼货。

1931年，沈吉甫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老人只有一位女儿，已出嫁，自己子身一人居住在北京，甚感孤独寂寞。加之对时局的忧患，居住北京甚感不安。“九一八事变”后，他关闭了自己开设的懋业银行，卖出了在京的全部财产，房产、古玩、紫檀家具一概不留，完全卖光。

这么多名贵稀世珍宝，一下子全卖，北京的古玩铺哪家也买不起，最后，由日本在京的古玩商号——山中商会买走。经

山中商会经理高田同沈吉甫协商，日本古董商用 24 万现大洋，买走了沈先生花了 30 年心血搜集、收藏的我国历代名贵瓷器上千件、其他文物几百件和全部紫檀、硬木家具。其中有乾隆皇帝写诗赞叹的“赵宋官窑人间无，宣成雅具晨星看”罕见之物，几多文物付东瀛！沈吉甫将在京财产处理完，到天津英租界地买了栋小楼，以安其身。

第二年春天，沈吉甫住在天津英租界的那幢小洋楼里。一天，老人起床盥漱完毕，吃了点早点，精神很好，也很高兴。仆人一看，是个好时机，便拿来一件黄包袱，包里一件锦匣，匣里软囊卧着乾隆珐琅彩瓶，给沈老先生看。沈老说：“我把好东西都卖了，不再玩这些了。”仆人递过眼镜说：“您看看。”沈吉甫戴上镜子一看，这包袱是否黄色的带玉别子，锦匣上写着名签，编有字号。他哼了一声，自言自语说：“包袱的颜色，锦匣的名签编号，都是宫里的标志，外边没这种装璜。”再看珐琅彩瓶，胎质洁白，薄如蛋壳，彩色鲜嫩，花鸟图画瑰丽，精美异常。画面有立体感，瓶高不到 5 寸，非常精致。沈老先生懂得，这种瓷器是宫廷垄断、始终秘藏宫苑、从不用以赏赐宠臣的“古月轩”。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才稍有外流。1924 年，清宫改为故宫博物院后，开放宫禁，任人参观，在宫里展出过珐琅彩瓷器，品件不多，甚为珍贵稀少。

仆人见沈吉甫爱不释手，便问：“您看这件瓷器好不好？”沈吉甫连声说：“好！好！”并问：“你从哪儿拿来的？”仆人说：“我的老家有个当兵的兄弟，拿给我求您鉴定、鉴定。”沈吉甫说：“告诉他，这是件好东西。”又看了看珐琅彩瓷瓶，心想，买了一辈子名窑瓷器，就是没买到古月轩，边想边打开锦匣仔细看。仆人在旁看出主人的心思，便说：“老爷子，您喜欢的话，我那位本家兄弟说，还有十几件这种瓷器，您都给

看看。”沈说：“好吧！都拿来我看看。”

一个星期后，沈家门前来了一辆军人开着的小汽车，从车上拿下十几件黄包袱。仆人把它们提溜进客厅，随着进来一位军人。沈吉甫一件一件仔细观赏，件件色彩娇嫩，花卉各异，绘工精细，底部有“乾隆年制”仿宋体款识。他越看越高兴。他想，这准是从宫里弄出来的。沈吉甫正在兴头上，军人开口说：“这是我们长官的东西，他说他是打仗的粗人，不懂古玩，也不爱玩这些东西。您如果喜欢，把东西先留在您家里，过几天我们长官再同您商量。”沈吉甫笑了笑说：“放在我这儿，你们放心吗？放心的话就先搁这儿，我再看看。”

又过了半个来月了，来了两位军官拜见沈老。沈吉甫同他们寒暄之间，仔细打量两位军官，见他们言谈外貌是军人气概，但不是大官。有位军官说：“这些东西是我们长官的，他不便来拜会您，派我们两人来了，我们是他的副官。您如愿意把东西留下，就给个价，我们要换防，部队要开拔，司令等我们回话。”沈吉甫一听心里明白了：噢！原来是个司令弄出来的，又不便追问是哪位司令，从哪儿弄出这么多古月轩瓷器，便同他们商议起价钱来，以10万元代价议妥。

沈吉甫兴致勃勃，邀请北京琉璃厂的两位老朋友，来津观赏古月轩名瓷。一位鉴定家看完这些瓷器，直咋嘴，说不出话来，“呵、呵”两声，表示惊讶和疑惑。另一位鉴定家看看东西，不表示什么态度，只说：好！好！这两位鉴定家心里明白，这些都是天津锅店街同泰祥瓷店在景德镇仿制的，沈吉甫人老了，眼力不行了。但嘴里不敢直说，怕把他气出毛病来。所以，两人哼呵几句，聊别的，不评论这些瓷器。沈吉甫一看这二位的态度，心里也明白过来了，也不便让朋友们对这些瓷器下结论。彼此心照不宣，谈起别的事来了。

将朋友送走后，沈吉甫取出放大镜细细观察头一天拿来的

那件乾隆珐琅彩瓶。他发现这件珐琅彩瓶的胎，釉虽然洁白匀净，但不够精细，胎、釉密度都低，釉面有细小棕眼；胎骨薄、手头轻，拿起来发飘；彩质不精细，彩层较厚，彩面光泽欠细腻，彩色过浓艳；彩色与绘画联系起来看，笔法呆板，缺乏纸绢画气，没有多种彩色重叠地反复地皴、擦、点、染的纸绢“院画”的特点。这位老鉴赏、收藏家悔恨当初没仔细看，只着眼于包袱是否黄色，锦匣上有宫内编号标志，又是来自军人之手，就认为是宫里的东西，麻痹大意了。没料到玩了一辈子古玩，而今上了这么大当！越想火气越大，盛气之下，“啪嚓”！把瓶子摔得粉碎。仆人连忙跑来问：“老爷子！您怎么啦？”“你马上把那两个军官给我找来！”沈吉甫大声喊。

二位军官来了，沈老要求退货。军官说：“您不愿意要可以，钱还归您，东西还给我们，咱们是两厢情意，货归原主，我们向司令交差。”沈吉甫听了比较满意，将摔碎一件瓷瓶跟他们说了，其实不用说，他们早知道了，而且已准备好在这件摔碎的瓷瓶上做文章。

军官开口就说：“您先赔瓶子，我们再退您钱。”沈吉甫一听，这是要讹人。双方，一方要求退款，一方则让先赔瓶子，后退款交货。两厢争持不一，军官提出，摔碎那件瓷瓶是其中最好的一件，不止值10万元。沈吉甫说，这不但不能退货，还给你添钱吗？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一次没谈成，后经多次周折，才给退回两万块钱来。

这就是在古玩行里流传着“沈吉甫花八万块钱买一声响听”的故事。有人说：“沈吉甫如不摔碎这瓶子，气憋在心里会生病。对他来说，八万块算不了什么，可是插圈弄套骗他钱的人，太缺德。”这种缺德事是谁干的呢？都说，不是古玩行人干的。到底是谁干的，至今无人透露，所以还是个谜。

沈吉甫于抗战初期迁居上海，不再鉴赏、收购古董玩物，

同古董商少来往，故不知其所终。

收藏家开古玩店还想联营大千

梁培，字植之，生于 1896 年，上海新惠人。青年时在法国留学，回国后在上海寓居。梁培的夫人乃名门闺秀，其父萧瀛洲是澳门著名绅士。萧瀛洲爱好古董、珠宝钻翠，清末在澳门、香港、上海、北京等地，收买了不少古瓷和翠钻等饰物，他家收藏有宋钧窑、汝窑瓷器和明清官窑瓷器。萧瀛洲的长女有串珍珠，大而滚圆。俗话说“七分珠，八分宝”，就是说滚圆珍珠重八分以上的，是稀世珍宝。萧之长女去英国伦敦身带大而滚圆的一串珍珠，为世人所称道。

梁培爱好古董文物乃受其岳父之影响。1939 年，梁培偕夫人第一次来北京，先在玉器街廊房二条德义兴珠宝店买了翡翠、钻石首饰，花数万元。再到琉璃厂古玩铺购买古瓷。梁培第一次到雅文斋时买了件康熙官窑五彩罐，那时古玩便宜，这件五彩罐，他才花 600 元便买到手。这趟来到雅文斋是徒弟们招待他，跟他做买卖。第二趟来雅文斋，徒弟向经理说，那位梁某人来了，是个买主，您见见他吧。一位副经理同梁培见了面。这位副经理很会做买卖，一边同他共同观赏官窑瓷器，一边跟他聊这件东西胎质釉色花纹，并热情款待。梁培买了康熙郎窑瓶、乾隆官窑小花觚，以及青花、五彩、粉彩、一道釉、豆青等釉色、彩色官窑瓷器二十几件，包装运往上海，共花了一万多块钱。

梁培成为雅文斋的买主。雅文斋在上海的人，又在上海卖给他几件明清官窑瓷器。上海、北京的同行见到雅文斋同梁培交上了买卖，有人就想这买卖不能让他一家做，也拿些瓷器给梁培看，并观看梁培从雅文斋买来的官窑瓷器，看后拿出几

件，一一指给梁培看，说这几件有的是仿制品，有的是后挂彩。

仿制品也叫复制品。民国以来，景德镇仿制康、雍、乾的官窑瓷器很多，在北京前门大街、天津锅店街有专门卖这种瓷器的商号，古玩铺卖仿制品后挂彩是丢信誉的事。后挂彩是一种艺术加工，就是一件瓷器原来没彩色花纹，或者有青花，在旧胎上填绘彩色花纹，或青花添上黄地等等。这种后挂彩的瓷器，制作得好的很难鉴别其真伪。后挂彩专家刘永清告诉笔者说，他年轻时给宝古斋制作的雍正官窑素白胎碗上，挂彩为粉彩牡丹碗，卖给了日本古董商，他们看不出是后挂彩。还给现在著名陶瓷鉴定家某人，挂彩一件明代万历鹭鸶卧莲盘，他卖了二十来两黄金。用后挂彩充正品，在古玩行来说也是不名誉的事。

梁培从雅文斋买了复制品和后挂彩很生气，要求退货。雅文斋的副经理对待这种事情有办法处理，他告诉梁培：“你什么时候认为这些瓷器有问题，我都可以退还原价，你的钱我的货，没什么关系。看古玩凭眼力，有的眼高，有的眼低，看得不能一致。”梁培选出两件退给了雅文斋，原价退还没影响买卖双方关系，反而增强了彼此的相互信任。梁培邀请这位副经理给他做向导，到各家古玩铺看看。他提出给这位副经理的回扣，人家分文不取，带他到彬记、荣兴祥北京最大的两家古玩铺看货。

在虹光阁，梁培看到一件康熙五彩棒槌瓶，画面上的花鸟生动，彩色夺目，用彩、布局谐调，有观赏价值。到了彬记又看到这件棒槌瓶。岳彬跟他说：“这是前两天虹光阁的杜少亭给我送回来的。我跟他要两千五，他说有人给他两千，两千五卖不出去，给我拿回来了。”梁培想我花两千他不能卖，给他两千五又贵了点。彬记的买卖大，岳彬是财大气粗，非两千五

他不卖。雅文斋这位副经理从中说和，他说：“岳二爷不在乎三五百块，梁先生也能出个几百，我看给两千三，其中一百给开汽车的，他也辛苦了，彬记净赚两千二，行啦！”岳彬点了头，梁培也同意。在荣兴祥，梁培买到乾隆官窑霁蓝瓶一件，绿地黄花开光，新颖别致；乾隆官窑松绿地粉彩带盖罐一对，乾隆官窑绿地金龙瓶一件。

日军侵占香港前夕，梁培从香港买到一件宋钧窑大钵，高约8市寸、口径约1.2尺，天青色与彩霞般的紫红釉相互错综掩映，而里外的紫红釉多于天青色，称之为满红大钵，釉汁肥厚润泽，极为美观。香港著名古董收藏家冯已千是梁培的好朋友，冯先生特别喜爱这件宋钧窑满红大钵，他鉴定为稀世珍玩。

梁培收藏有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万历明朝各代的青花、斗彩、填三彩和五彩名贵瓷器多件。他喜爱玉器，特别喜爱白玉，他收藏有白玉彝、鼎、炉、瓶和鸟、兽，都是白玉无瑕，做工精细的高级工艺美术品。他还收藏很多商周秦汉青铜器，仅知其中两件商代青铜器，一件是安阳出土的繹壶，另一件也是安阳出土的商代花觚尊，又称罗汉尊。这两件商代青铜器乃是国宝。

1943年至1945年，梁培出资在上海江西路北口路东，开设艺林古玩店，由北京聘去罗伯恭、刘秉昆为他经营，两年的时间即倒闭。他曾设想同香港大古董商潘溪先生、上海古董巨商叶叔重联合北京韞玉斋经理范岐周经营古玩，由于当时是战争年代，古玩业生意萧条，加之范岐周不愿出任总经理为之经营，故未实现。

梁培从1939年至1949年，十年中同京、沪、港的古董商接触较多，收购的古玩不少，鉴定界公认他看青铜器和古瓷的眼力不错，有鉴赏水平，是位收藏家。50年代初他迁居香港，

后在香港去世，子女留在国外。

二、鉴别古玩珠宝的路数与方法

凡属收藏家都具有鉴别文物真伪之能力，也有较高的欣赏水平。故收藏家大多是鉴定家。经营古玩的老古董商也基本具备鉴别真伪之能力，他们通过长期经营古玩的实际锻炼，有一套鉴定方法，也有不少人成为著名鉴定家。老古董商的鉴定方法，口头流传多，不成系统，见诸文字者甚少。而今，笔者归纳出老古董商鉴别珠宝钻翠、书画、铜器和瓷器四大项的基本路数与方法，供读者参考。

珠宝钻翠的价格变迁和鉴别方法

人们一提到珠宝钻翠，似乎就有些神秘感，这东西是真还是假，到底值多少钱，一般不好回答。珍珠可以入药，主治惊痫神昏、心悸不寐之症。钻石可用于工业，它们具有实用价值。而我们所说的珠宝钻翠，是指供人欣赏、装饰在居室、客厅或佩带在身边的工艺美术品。它们之所以名贵，是由于人们的爱好所致，玩物是以稀为贵，而其价格是随着社会习尚的变化、人们爱好的变化而变化。

清朝嘉庆、道光年代，人们喜爱深红色，红色碧玺、珊瑚的价格昂贵。北京珠宝市、廊房二条一带卖金银珠宝的店铺，叫“红货铺”，就从那个时候叫起的。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官员们所佩碧玺尚浅红色，人们争相购买“双桃红”、“胭脂水”等名目的碧玺，一块“双桃红”值银上千两。到了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去世时，接连举行“国丧”，朝廷禁用红色，双桃红、胭脂水的碧玺价格则一落千丈。

清朝对不同爵位、品级所用朝珠、顶珠、翎管、带钩的材质、颜色，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那时一些名贵质料、颜色的朝珠、顶珠、翎管的价格很高，一个带钩值银几千两。到了宣统年间，原几千两的带钩只值几十块钱。民国以后，则无人问津了。清朝四品官顶子规定用青金石。青金石有深蓝、紫蓝、天蓝、淡绿蓝之分，颜色美观，价格就高了，一副顶子值几百两银子。清朝覆灭，青金石也就不值钱了。

民国初年，珍珠的价格昂贵。珍珠以滚圆为佳，早先人们说：“七分珠、八分宝”，就是说够八分重量以上的滚圆珍珠，就是稀世珍宝。一颗珍珠价格七八万元。在天然生殖的条件下，珠蚌受外界各种刺激与影响，极难生成大而滚圆的珍珠，得到八分以上重的圆珍珠也相当困难。自从日本实行人工养殖后，珍珠的生长可以控制，产量高质量好，大而圆的珍珠不稀少了，人们不再以它是最贵重饰物了。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红、蓝宝石为贵。一枚蓝宝石戒指值个百八十两黄金。1937年，廊房二条聚珍斋珠宝店卖给天津大财主李七爷一块玫瑰紫宝石，重量只有1钱5分，菱形，色泽温润美丽，宝石上有六道线（俗称星星），漂亮的坑子（即透明体），是一绝品，价格4.5万元。李七将这块玫瑰紫宝石买到手后，索价2000两黄金。1939年，他儿媳将这块宝石带往美国。

在清代末年，一串翡翠朝珠不过值几百两银子。而今翡翠价格不断不涨，比1949年涨了二百余倍。如将一串翡翠朝珠剖开，镶嵌在首饰上，价格要达到几百万元。

翡翠产于缅甸（我国云南产硬玉，很像翡翠，但硬度不够），而我国藏翠最多，质量最好。这是因为在我国明代喜欢用各种宝石做装饰品，到了清朝则用翡翠代替宝石，那时的缅甸是附属国，年年来贡，岁岁来朝，将好的翡翠进贡给清王

朝。民国初，北京的那王府、庆王府、豫王府（现为首都医院），这三大王府的翡翠很多。那王府的一副翠头面，即翠凤冠，凤头、凤翅都是翡翠串成的。1962 年这副翠凤冠以两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老珠宝商。买回后他拆下珍珠七两，扣珠串的翠凤头、凤翅、珊瑚龙三个，口含珠子坠两个。这些珠宝翠件，而今的价格何止百万、千万！

中国的翠多，旧王府中有，王公大臣手里也不少。李鸿章的母亲有副翠手镯，绿、紫、白三色，珠宝商给它起个名叫“福禄寿翠镯”。艺术家、著名戏剧、电影演员的手中也有好翠。1962 年一位老珠宝商到著名京剧演员赵荣琛家走访，见他母亲戴着一副黄杨绿翠镯，它颜色像春季杨树刚生出的绿叶一样，珠宝行话叫“黄杨绿”。当时价值五六万元，而今岂止五六百万元。社会名流手中藏翠，普通商人手中也有翠。有位恒顺斋的齐掌柜的，日伪统治时期他去大连，到北京火车站检查，他慌了神，本来都检查完了，他吓得魂不附体，叫家人再看看他的暖壶，引起检查人员的怀疑，把暖壶往地上一倒，满地是翠。

中国翡翠多，引来日本人成群结伙来京、津、沪买翠，三四十年代日本商人从中国买翡翠摆件和首饰，回国开翡翠商店。汉奸特务金璧辉（川岛芳子）曾在北京王府井开珠宝店，经营翡翠。1945 年日本军国主义失败后，美国人在京、津、沪买了不少翠。他们买中等翠，要成套的，每套四件：项链、手镯、戒指、别针，要同样颜色的。美国人也要翡翠摆件、瓶、壶、插屏等等。香港的金珠店也经营翡翠，香港已成为翡翠的汇集之地。

翡翠在珠宝钻中，而今的价格是最高的，翡翠风行、时兴，价格自然比红、蓝宝石高得多。鉴别翠之真假则是喜爱翠者最关心的问题。一般来讲，有以玻璃冒充翠的，玻璃料的光

色不柔和，有点“贼亮”，老珠宝商用眼一看、手一掂量便知是“料的”，它的重量不够。还有用调合漆做假的，这种假货用眼看，翠石无纹理，用刀可刮掉漆皮。也有真翠料做假色的，就是借高温将绿色沁入石里，然后打蜡，称之为“炆绿”。鉴别这种“炆绿”，从翠的硬度上找不出问题，主要的是看色，色彩不正，不自然，不耐高酸和日晒。最难鉴别的是缅甸翡翠与云南硬玉之分。硬玉与翡翠完全一样，我国出版的《辞海》，都称硬玉为翡翠。缅甸翡翠的光泽绿色如一汪绿水，油润，半透明；云南硬玉的光泽稍差，亦半透明，主要是硬度不够。

红蓝宝石，早先在广东有烧料仿制品，叫“宝烧”，鉴别“宝烧”，主要是硬度不够，色泽不温润，无纹理，如有则不自然。民国初年，外国人用高温、高压制出人造宝石，名叫“炉赛石”，其硬度与真宝石相同，点水也能立起，只是颜色不够温润、自然。纹理与真宝石不同：天然宝石纹理呈均匀的三角形或蛛网状，有闪光；“炉赛石”的纹理呈螺旋状，无闪光。

钻石，最早用铸造玻璃冒充钻石，称之为锡兰钻。锡兰钻的反光率差、透明度不够、份量轻、比重小。后来又有用水晶石加工制作假钻石的，称之为水钻，水钻的反光率也较差。近年来，德国人制造人工钻石，名叫锆石，是用高温高压制成的白晶体，车出番头（棱角）为五七度，跟真钻石完全相同，反光率也可与真钻媲美。鉴别这类假钻石，首先要看到它是极其纯净，与天然钻石不同，首饰钻石讲究无杂质、纯净，但极端纯净则非天然生成，天然生成的钻石，不免含有杂质，反光率虽与真钻石相媲美，但总有点“亮得发贼”，不自然。主要还是锆石比钻石的硬度稍低，用真钻石刻划锆石即出现伤痕，而其比重较大，每克拉比真钻重分五之一。

还有人工制作的假珍珠、假珊瑚。

解放前在苏州有用玻璃体加银粉造成的假珍珠。假珍珠目视光泽不对。

珊瑚是古代腔肠动物珊瑚虫的石灰质骨骼，经石化作用后保存下来的化石。这种化石有顺丝纹理，最怕酸碱浸蚀。清代中期珊瑚的价格很高，到清末以后，才逐渐低落。早先有造假珊瑚的，清末时有纯化学品的“赛璐璐”；后有日本人烧料外挂珊瑚釉的；广东人用玉米面包铅珠，使重量与真珊瑚重量相仿，外面涂一层珊瑚漆皮做成纹理的假珊瑚，这种东西，时间一久，玉米面收缩，就出现裂痕，只能蒙人一时；还有用牛骨或软质滑石刻成珠子，沁以红色，冒充珊瑚。

珠宝钻翠中的一些质量好的东西，并非我国所产，缅甸的翡翠、斯里兰卡的猫眼儿、巴基斯坦的祖母绿、阿富汗的青金石、巴西的碧玺（译音）、意大利、日本的珊瑚，都是质量最好的。这些外国的质量好的珠宝玉石材料，经中国的工艺美术家加工制作，大放奇光异彩，给人类以美的享受。

鉴定书画的基本功

从事某一工作，都应具备这种工作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人们称之为基本功。鉴定书画更要有基本功。有了好功底，才能锻炼出好眼力。老古董商鉴定书画的基本功，约有三项。

第一，了解历史文化，熟记历代著名书画家的姓名。

我国古代文人画，也称士夫画。区别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

作文章是文人的必要技能，精于书画方为大学问家。书画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历来拥有崇高地位和重要的价值。有

人说：“书画蕴含着东方神韵，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凝结；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现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这不是过分夸张，而是真实的写照。

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艺术盛世不衰，绵延不断，因而我国的名书画家，多若繁星，《画史会要》所记，人数众多，而鉴定书画的基本功要求，先要熟记以下历代著名书画家的姓名与年代：

书法家。三国时的钟繇，东晋时的王羲之、王献之、王慕，南北朝时的智永，隋朝的智慧（隋炀帝尝谓“智永得右军肉，智慧得右军骨”），唐代的虞世南、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怀素、张旭、李邕、李阳冰，宋代的苏荔、黄庭坚、米芾、米友仁、蔡襄，元代的赵孟頫、鲜元枢、倪瓒，明代的宋濂、宋■、宋克、张羽、祝允明、文徵明、唐寅、董其昌，清代康熙时的何焯、姜宸英、汪士■、陈奕禧，乾隆时的翁方纲、刘鏞、成亲王永璘、铁保，后又有许乃普、赵光、祁間藻、陈孚恩，此外还有张照、何绍基、郑燮、翁同龢、阿克敦布等。

画家。唐代：王维、李思训、周■。五代四大家：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后蜀：黄筌。宋代：米芾、米友仁、宋徽宗、崔白、黄居■、文同、李公麟、马远、马■、范宽、李唐、夏■、赵伯驹。元代：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赵孟頫、钱选、柯九思。明代：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明末清初：朱耷、杨文■、邵长衡、张学曾、邵弥、卞文瑜、程嘉燧。清初的“四王”：王■、王时敏、王原祁、王鉴。还有吴历、恽寿平、石涛、王■、王玖、王昱、王宸、王廷元、王廷周、王鸣韶。金陵八家：樊圻、龚贤、高岑、胡■、谢荪、叶欣、吴宏、邹■。扬州八怪：金农、高翔、郑燮、罗聘、李方■、李■、汪士慎、黄慎。又有南张北■：张照、■宗万。还

有一名意大利人，康、雍、乾三朝的宫廷画家郎世宁。

要学鉴别古书画，先要熟记这 72 位历代著名画家和 49 位书法家。在此基础上还要扩展到“熟记画家一百八，书法家九十八”。有位老书画鉴定家，他可随时背出 300 名历代书画家的姓名、字、号、又号。

第二，熟知历代名书画家之经历和他们的字、画特征。见其真迹必须反复揣摩，悟其要旨，达到心领神会，豁然贯通，并加熟记。可见，做一名书画鉴定家，非一日之功，必须日积月累，勤学苦练。鉴定家自身不仅懂书法、绘画，而且是能写会画，摹谁像谁，在临摹中领悟名书、画家笔墨之奥秘。故著名书画鉴定家，多数人都是书法家或画家。

第三，懂鉴别书画之要领。鉴定书画时，要求澄心定虑，不可粗心浮气；要专心致志地看，不要心神不定。观书法，先看“用笔结体，精神照应”，再看“人为天巧，真率造作”。还要考证古今跋尾相传来历，辨别收藏印识，纸色绢素。看名画要懂名画之神韵，妙手之作必须“人物顾盼语言；花果迎风带露；飞禽走兽逼真。山水林泉，清润幽旷；屋庐深邃，桥礅（礅：横木渡水也）往来；石老而润，水淡而明；山势崔嵬，泉流淅落；云烟出没，野迳迂回；松偃龙蛇，竹藏风雨；山脚入水澄清，水源来历分晓。”而“人物如尸似塑；花果类瓶中所插；飞鸟走兽但取皮毛。山水林泉布置迫塞，楼阁模糊错杂，桥堧强作断形，境无夷险，路无出入。石止一面，树少四枝。或高大不称，或远近不分，或滟淡失宜，点染无法，或山脚浮水面，水源无来历。”凡此种种皆为画病，定是俗笔，不列名画。

有了这三项基本功，还要在实践中锻炼，就是多看名人真迹，用脑子多琢磨。如果打开一幅字画，眼睛一看，脑子一惊：“啊！这东西不错。”再一研究，确实是幅好字画；打开

一幅画，一看发楞：“这东西对不对？”再一研究是不对头。这叫“灵光一现”，手一拿眼一看，就能出现这种灵感，这是看字画有了“八成眼”。学到这种程度，没七八年的苦功夫是达不到的。

有了“八成眼”，还要学会看字、纸、画、印、色一致不一致、一贯不一贯。如果画显旧，款的墨色、印章的印色显浮、新，可能是落款或假款。琉璃厂有位张明是书写假款的专家，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但从墨色印色中，可比较出来，通过比较，鉴别真伪。墨色：明代使用的是松烟墨，墨迹发灰，淡；清代使用的是漆烟墨，墨迹发亮，黑。印色：明代使用的是水印色，色浅；清代使用油印色，色浓重。纸张：宋代是麻纸，有麻纹、有弹性、厚、结实。总之，鉴定字画，既要看作品，看纸绢、墨迹、图章、印色，还要看字画上的题跋，注意鉴赏、收藏者之印章，全面统一察看，仔细认真看，才能鉴别出真伪。

如没见过某名人字画之真迹，则不能鉴别其真伪，这跟没见过这个人，只拿相片给你看一样。所以，见了名人真迹必须仔细琢磨，再拿来他的其他作品，则能看出其真伪。有的字画假赛真，就是假的比真的还好。比如，乾隆的字留下来的很多，他作的诗超过万首，是不是都是他写的、他作的呢？老的字画鉴定家们说，有位大臣仿乾隆的字很像，书法比乾隆的造诣深，乾隆的字，特别是晚年的字，大都出于这位大臣之手，他比乾隆真迹写得好，这叫假赛真，就要认定它是真的。民国初年，有人仿郎世宁、仿王石谷的作品不少，仿得很好。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早年仿石涛的山水画，达到假赛真，鉴定家难辨真伪。在既不能认定是假的，也肯定不了是真的之时，就要审定，审定的学问就深了。审定就跟医院会诊一样，请来名家“审定”，各抒己见，有时一次审定有结论，有时则下不了结

论。

一位名书画家，他一生的作品甚丰，青年时期、中年时期、老年时期的作品，是不相同的，这一不同的特点在每个人身上又有所不同。所以，鉴别起来相当困难，不了解这位画家的整个身世、经历，就难以分清这幅作品是他晚年作品，还是中年作品。而且一个人的作品有好有差，就跟写文章一样，一个人写的文章，不能说篇篇都写得好，好中有差，字画也是如此。

1956年4月12日，公私合营高潮时，笔者见到《人民日报》刊载一篇徐迟的文章《真迹》，内容是某家古玩铺的经理人合营时，拿出一幅苏轼的真迹，上有御览、题跋、收藏、审定等印章印迹和字迹，乍一看是件珍品，就是明眼人也难以认定有问题。可是经理人向公方代表说了实话，说是件高价收购的一件复制品。是将真迹的上层揭走另裱，下层的印迹很深，找来高手照印迹描绘出来的。这里有揭裱字画的高超手艺，又有描者的精巧描填。1987年笔者与鉴定家徐震伯谈及此事，问他：“听说那幅真迹，您在1945年一眼就看出有问题，让李欣木、崇庆瑞赶快卖，您根据什么说有问题的？”他说：“我跟你说了，你反而不明白，简单地告诉你，我看字的笔法不是写，而是描，古人写字作画讲究笔法，是画出来、写出来的，不是描出来的，这幅字卷一看就是描的，所以我断定它有问题。”

30年代，有人拿到虹光阁一幅手卷，是仇英作画、文徵明题字、白描画卷，画的是赵飞燕的故事。仇十洲擅长画人物，特别是仕女，画的仕女神态生动，看不出是仿的；文徵明的题字工整秀丽。邱震生仔细观看，文徵明的字有败笔之处，而文徵明的书法特点就是从无败笔。经审定认为是仿制品。邱震生在1989年时说：“虽然是幅仿制手卷，也是清初时仿的，

仍然属于佳作。”

鉴定、审定、珍藏、过眼，名家过眼的字画，价值就要提高；名裱画匠裱的字画，价值也高。邱震生说：“严嵩时代有位裱画的叫汤勤，手卷、字画等后面如有‘汤勤裱’三个字，这幅作品就值钱。”他还说：“有人说，六必居是严嵩写的，我看不像，因我见过严嵩亲笔手札，他的字清秀，不浑厚。”

鉴定古代名家书、画学问很多，也很深、很广。简短文字，只能说一些星星点点的皮毛，其精髓只有通过多看、细看名家之真迹，反复揣摩，全面观察笔法、画意和纸绢、墨迹，以及印章、题跋等等，达到融会贯通，始得其要领。

鉴别青铜器之要点

研究古铜器学问深奥，鉴别铜器甚为烦难。古代铸铜在当时无记录，又无样本。后代鉴别仅以前人根据遗物而著录之句章和出土器皿为根据，至今尚无对古器的实在情形的全面彻底了解。精于鉴别者，不过是见闻较多，经验丰富而已。若说有所不知、鉴别无误者，乃欺世之谈。

老古董商鉴别铜器，没有科学仪器测定，只凭眼看、手摸、耳闻、鼻嗅、舌舐，即通过感官之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的感受，加以判断、推理、辨别其年代与真伪。这种老而落后的方法，也有可取之处。因为它是长期积累的实际经验。有的人拿起二三千年以前的铜器，运用感觉器官，加以思索，很快做出判断，说出年代与真伪，较之仪器测定既快又明确。所以，行外人看有经验的老古董商像高深莫测的神秘人物，其实并不神秘，他们是在经营铜器的长期实践中，头脑中有了一套鉴别方法。据笔者所知，其要点是锈色、手头和声响，花纹与款识，铜质与器式。

看铜器首先看到的是锈色。三代秦汉之铜器年代久远，在含有酸性气体的潮湿空气、水或泥土中，或在其他条件下被氧化生锈是很自然的，器物虽然失去原有的光泽，但增添的却是古铜器特有之美。有人喜爱古铜器，专爱锈色。

几千年之铜器流传至今有三种方式，即入土、坠水、传世，故有“水古、土古、传世古”之说。老古董商说：“铜器入土千年色纯青，如铺翠，翠润欲滴；铜器坠水千年，则纯绿如瓜皮，而莹润如玉，未及千年，虽有青绿而不莹；未入土水之传世铜器，其色紫褐，而有朱砂，甚至其斑凸起。”实际上坠水、传世之铜器甚少，大量的是入土铜器。由于铜质不同和各地土质、水质不同，入土铜器的锈色也不同。常见之锈色有绿锈、红锈、蓝锈、黑锈、紫锈等等。

老古董商鉴别锈色的方法，用眼观看，锈色与器体合一，深浅一致合度，坚实匀净，呈现出莹润而自然，美妙而诱人，乃自然而生之锈，非伪制也。锈色浮在器物之上，绿而不莹，表皮锈；不论绿、红、蓝、紫、黑色，不润而发出刺眼之色、行话叫“发贼”之物，乃伪制之锈。需要进一步审定的锈色，则用双手搓热触摸器物，用鼻嗅手，如有铜腥味，则是后上锈。因千年以上古铜无铜腥气味，新出土铜器有点土气味，久则无味。伪锈若用热碱水刷洗，锈即脱落；如刷洗刷不下，可用火烤即脱落。用舌舐有盐卤味，也是伪制锈色。有经验的鉴定家，只用目一看就见分晓，用不着闻味、刷洗、热烤，更不用舌去舐。

手头和声响。用手一掂量，轻重适合为理想，过轻过重之器皿，要仔细琢磨。这纯属经验，经多见广，过手的东西多，才有轻重适合之感受。用手敲击实物，听其声响，声微细而清脆，视为真品；铜声混浊，发出“嗡”声，则应产生戒心，要反复全面察看。

花纹和款识。花纹和款识是鉴别铜器的重要之点，从花纹来讲，夏代铜器花纹多，简朴，单一形式器皿居多，大段花纹成章成幅者稀少；商代铜器花纹做工精细、繁复，满花纹器物较多，比夏代器物上的花纹之迹的细而浅，要宽些深些；周代铜器，花纹与商代略同，而商代无粗花压细花之做法，周代则有粗花压细花；秦汉铜器朴素者居多，带花纹的较少，有花纹也是浅而糙，不及商周花纹之精细。

款识。古铜器的款居内而凹，识居外而凸。夏周铜器多款识皆有，商代铜器多无款有识，秦汉之器有款者少，有识者更少。铜器上有无款识，不作为鉴别真伪之依据。而研究金石学者，则注重款识，从铜器上款识之铭文字体演变，研究我国文字之渊源与变化。

夏代铜器款识字体，似图形像鸟迹，老古董商称之为：阳文古字，鸟迹篆。商代铜器款识字体，似鸟迹者少，虫鱼象形的多，称之为虫鱼篆。周代铜器款识字体，仍有虫鱼象形字而杂以大篆，东周之后有小篆象形文字。秦器则大小篆兼有，汉初袭用小篆，后用隶书。

鉴别花纹与款识之真伪，老古董商一看即明，作假花纹与款识是刻的，原花款是铸的。刻工刀法再好，也不像铸的。古代铸器以蜡为模，花款细如发，匀整分晓，识文的笔法如仰瓦，而不深不峻，大小深浅如一，亦明净分晓，无丝毫模糊。伪作或野铸之器，达不到这种程度。因为三代铜器，一是选铜精，二是良工精妙，三是不吝工夫，铸铜非一朝一夕所为。这三点为后世所不及。

铜质与器式。鉴别铜器要看铜质，铜质的鉴别较简便，翻看铜器的足底，如露出黄铜之质地，则是近世伪造的。足底如作了假古铜色，用碱水刷后则露出黄铜。

古铜之器式、形状各异，名称在各代又不相同。有经验的

老古董商能记下很多古铜器之器式形状与名称，还知道什么年代铸什么铜器，什么样式的铜器是什么年代铸的。这全靠经验积累和过目的东西多，凭头脑记下来的。

例如，古玩行话说，“夏_戔、商_罍、周爵”，这三项器物都是温酒或盛酒器，但铸造年代不同，名称也不同。其实这种行话也不准确，譬如，_罍是圆口、有_罍和三足，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期。爵的形状与_罍不同，不是圆口而有流、柱_罍和三足，也盛行于商代和西周。不过周代的爵较多，商代的_罍较多而已。因此，不能绝对化，一见爵就认为是周代的，一见_罍就认为是商代的。要详加考证，不可用行话作为鉴别年代的惟一依据。

再如钏。钏是方形壶，有盖，盛酒或粮食的器皿。经考证钏是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铸作的。假如一件钏是按三代做工、锈色制作，则无疑是伪作。还有鼎，三代秦汉皆有鼎，而一件鼎有盖，足略短，若说是三代的鼎，则属伪称，因这种鼎汉代居多，三代之鼎未发现这种形状的。同称为_■，因年代不同，器式也不一样。“奉_■沃盥”，盥洗时与盘合用，西周东周的_■是有流、_罍，有足，而汉代的_■，则无把、无足、平底。

由于这些器物形状在老古董商的头脑里记多了熟了，所以，他一见器式形状，不仅能叫出名称，也能说出年代。

三代和秦汉之铜器，名称很多，按种类来分，曾分为兵器、礼器、乐器三大类。器名之释介，乃专门学问，非本篇所能述及。但可以说，三代铜器器式形状名称虽然很多，但做工的规律匀整，却是一致的。

我国夏商周秦汉，特别是三代之铜器，做工之精良，式样之美观，尺寸之合度，花纹之秀丽，确是鬼斧神工，佳妙至极，加之诱人之锈色，即使不懂铜器的人，见了真品，也爱不释手，称为奇珍。而伪制品，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种程度。

至于秦汉以后，特别是唐宋元所铸铜器，老古董商未加以重视，而称之为“新铜器”，还有宋元明的“黑铜”，都不列入金石，而列为杂项，殊不知其中蕴藏着我国古代铸造技艺的延续与进展，而今已有人研究考证。

鉴别铜器烦难，但只要掌握要点，广为观看，深加思考，伪制品到手也可鉴别出来。可是其中的学问，则不是见真东西多了，学问就深了。作为学问来讲，研究青铜器，则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专家谈鉴定古瓷之秘诀

一件古代瓷器，鉴定家仅凭眼力就能鉴别其真伪，一般人认为，这是一种奇特的奥秘，其中必有诀窍。诀窍是什么呢？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笔者拜访过几位陶瓷鉴定专家，他们都谈了自己的体会，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陶瓷鉴定家孙会元跟笔者谈的较多，很实际也很明白。

按古玩行的规矩，笔者称年近八旬的孙会元为师兄。跟他有四十多年没见了，见面时不认识了，聊了一阵子他突然叫起笔者的“小名”来，说我想起来你是谁了。笔者说：孙师兄在文物鉴定界已60年了，您能不能告诉我鉴定古瓷的诀窍。他笑了笑说，哪儿来的什么诀窍，你不是说我干了60年么，咱们哥儿俩四十多年没见，就说说我怎么学会鉴定古瓷的。以前你小，我的好多事，你不知道，今天咱们聊聊往事。孙会元从他小时候怎样学徒谈起：

1929年，中国处于军阀混战之中，民不聊生，我们胶东老百姓生活很苦，在生活的压力下，我从山东荣成来到北京。托人找保在琉璃厂雅文斋古玩铺学徒。那时，我虚岁17，算是比较大的，一般人都是十四五岁学徒。这家古玩铺里的掌柜

的、伙计、徒弟都是河北人，就我这么一个山东小力巴儿，他们真有点欺生。扫地、买菜、擦桌子、沏茶、倒水、搭铺、提溜夜壶……我什么都得干！学古玩铺先学伺候人，学鉴定文物没人教。不像现在，有人给讲课。那时候有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要是问师傅：“这个为什么是真的，那个为什么是假的？怎么鉴别？”师傅只用一句话回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什么叫意会，徒弟们也不大懂。用心学鉴定的徒弟，在掌柜的跟买主做买卖时，细心听他们怎样评论具体的文物，留心记下来，日积月累，就能入门儿。

我的毛笔字写得还可以，能写对联、挽联。掌柜的看我写得不错，又会算账、打算盘，就让我帮他写账。后来，雅文斋的账归我管，今天说是会计。通过记账，我熟悉一些古玩的名称、价目，时间长了，我懂了一些古玩的特点，没事儿我去看，看完了琢磨，慢慢开了点窍。

雅文斋掌柜的萧书农，对我不错，我从他那里学到点东西，直到今天我还感念他，是他把我领进古玩行这个门的。可是，在那个社会开买卖哪有不算计别人的，掌柜的算计人我看不惯。萧书农有两位师弟跟他开买卖吃股，他让我在记账上盘算他们，我不愿干，经常不听他的话，总是按照实际记账，日子长了，我们爷儿俩的关系紧张了。1937年，我学了三年徒，记了五年账，共干了八年，请假回山东老家。没料到在家里接到师傅来信，把我辞退了，父母认为我在外边没好好干，不然人家怎会辞掉你？

笔者说：您够冤枉的！听说您从雅文斋出来，范岐周给您拿些钱，开韞玉斋古玩铺，大约是在“七七事变”之后。他说：范叔对我不错，在我困难时，他拉了我一把，使我在古玩行业中继续干下去，我才有今天。你知道我在家里接到你萧大伯的来信，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我兢兢业业地给他干了八

年，一封信就把我辞退了。父母说我在外边没学好，准干什么坏事了。我写信给范岐周，他让我回北京，找人锅锅（辞退或不干了叫裂锅，托人说和叫铜锅）。我回到北京，锅锅未成，你伯父跟萧书农说，你如果让孙福凯回来，我们都不干了。你瞧他糊涂不糊涂，我为他们两位吃股的掌柜的，得罪了萧书农，他根本不知道，也不明白。

范岐周问我，你有胆量没有，有胆子敢干，我拿钱你开一个，胆子小到外地买点货自己干。我说，我有胆子，可以开个古玩铺，“七七事变”后，我在东琉璃厂开了韞玉斋古玩铺，小本经营，勉强维持。我开韞玉斋，我的老师萧书农给我送副对联：“买卖兴隆通四海 财源茂盛一百天”。

笔者插话说：您可知道，萧书农从大观斋出号时，他的老师赵佩斋曾把他臭骂一顿！看来他对您还是比较文明的。大观斋门系下，您是佼佼者。

他接着说：可不能这么说，我是在师傅们的指教下和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又赶上好时代，他们都没赶上这个时代。

韞玉斋开张的前三年，就两三个人，每月生活费要 60 块，我们只能维持门面。要问怎样学会鉴定，我是在实践中学会的。这种学习可不像现在这样轻松，现在琉璃厂古玩铺里的营业员跟我们可不一样。我们那时如果买的是假货，可就毁了，不但赔钱咱们赔不起，就是丢人也丢不起。特别是在同行的交易场所，在古玩商会的窜货场，货一到手很快要鉴定出真假，马上能递上价，这可要靠真本事。不能看不准便拿回去研究研究，那时没这一说。大古玩商买假货不怕赔钱，而怕丢名誉；我这个小本经营，既怕赔钱，更怕丢人，买了假货，名声一出去，在这种行业中就不好干了！所以，这种形式的买卖，逼着人们下苦功夫，费大气力，练好眼力，学真的过硬的本领，不然，在古玩行里你站不住脚。

我开始买货时，心里也同样有点嘀咕。记得在 30 年代末期，我到护国寺聚和成挂货铺看了一件明代宣德青花盘子，没有年款。我心想，这是宣德的还是雍正仿的，拿不准。好在花钱不多才八块钱，我就买了。可心里没底，拿给范叔看，他点点头，我的心才放下来。这算是我的第一次考试合格。

1940 年，范岐周从雅文斋出号，来到韞玉斋，他是东家又是掌柜的，我要出去买买货，他说，你在家管管账，不用出外了。我还是要求出去，他给我找位可靠的同行，跟我一起去山东。在青岛有位朋友拿来件铜鼎给我看，我看是商代饗饗纹三足双耳铜鼎，还有四个字的铭文，是从诸城拿来的。山东诸城刘家是有名的大户人家，他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出了三位进士，刘^棠是康熙进士，刘统勋是雍正进士，刘墉是乾隆进士。这件铜鼎是刘家的后代拿来青岛的。我反复看认定是件珍品。他要两千八，我给他一千八，他不卖。跟我一起到山东的那位同行说，看不准，不敢买。我说，赚了咱们均分，赔了算我的，咱们伙着给他两千四。我敢买铜器，要感谢我的老师萧书农，他是什么都买，雅文斋不单经营瓷器，铜器、字画、杂项什么都买卖，所以我能看出是商代的东西。买回来我转手卖给岳彬是 8 000 块。

在天津我买件宋哥窑盘子，买得便宜，几件货中有件宋哥窑盘子，胎质坚密，胎色紫黑，釉面滋润如凝脂，粉青色，是件珍品。给我“拉纤”的人不大懂行。我这个人，知道钱好，但还得讲点义气，所以我让他同我合伙。我拿到古玩商会窜货场去卖，同行们投标到一万两千，我不卖。会长崔耀庭问我，你多少钱买的？还不卖。我说，你甭管我多少钱买的，看底封，投标没到底封的数，我可以不卖。后来，同行里有八家合伙花两万六千买下来了。

有一件嘉靖五彩罐，人家要五千，我给他一万。买回来

后，范岐周训我一顿：哪有你这样做买卖的：可是我认为做买卖是要赚钱，但也要维持人，维持人才能财源不断。赚钱的办法不能采取“摁在板儿上把人宰死”的方式，大家都赚点为好。卖给我五彩罐的同行，以前卖给我一件永乐青花葫芦瓶，他要八千，我给他七千，他卖给我了，我转手卖了三万。所以这件五彩罐我不能少给他钱，他要五千，我给了他一万。

我买件乾隆官窑粉彩绿地描金瓶，拿给范叔看，他看了又看，就是不言语。我问他，您看怎么样？他还是不说话。那时我才三十来岁，还要孩子脾气，你不吭声，我把它包起来，放在顶柜上，咱们不卖。没过几天，外边传出风声：孙会元买了件假官窑瓶。原来，卖我这件货的人，先将货给郭静安、崔仲良、孙瀛洲等鉴定古瓷的行家看过了，他们都没看好，才拿来卖给了我。我把它放了半年多，不给任何人看。这年的春节，孙瀛洲原来的伙计罗伯恭由上海回到北京，罗伯恭在上海开古玩铺，他听孙瀛洲说，我买了件假官窑瓶，来找我看货。我说，别人来了我是谁也不给看，你是我的老乡，可以看。他反复仔细看，看完我又把货收起来了。罗伯恭用力拍一下桌子说：这怎么是假的，明明是真东西！他们怎么看成是假的了。

说来也不奇怪，这件乾隆官窑粉彩绿地描金瓶，原是“库货”，是在乾隆年代从景德镇烧制运往北京内务府的瓷器库，一直没开封，是件刚开封不久的东西，所以，上手一摸，彩有点刺手，地子雪白，跟刚出窑的差不多。

笔者说：“鉴定东西，要全面看，不能只觉得刺手，瓷器上有毛刺儿，就断定是新出窑的。鉴别乾隆官窑瓷器从年款上可以看出问题，一般地说，仿制品篆字的‘御’字少一笔，以示区别。”

孙会元说：你不能把“御”字缺一笔的，都鉴定是仿制品。我经过几十年的实际经验，真东西写错款的有，但是极少

数。我们不能只因“御”字少笔，就鉴定是仿制品。你不是说要全面看吗，不能片面，也不能绝对化。如用一个标准字样的款识去衡量一切，就绝对化了。我见过一件乾隆粉彩官窑瓶，款写错了，缺笔少画，但却是件珍品。

我还有一个看法，不知对不对，有人说，古代的瓷器仿不了。我认为不是仿不了，而是时代不同了。比如，皇帝御窑烧的瓷器，不是为了卖而烧制，而是为了皇上欣赏而烧制的。皇上是最有权势的至高无上者，他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他烧制最精美的瓷器，他从不讲、也不懂什么叫成本，花多少钱都行。仿制品就不同了，仿制官窑、御窑瓷器都是为了卖，成本太高了，卖不出去。同时谁也不可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去烧制仿制瓷器。所以，仿制品再精也精不过原来的官窑、御窑瓷器。现在仿制的更不行。这不是仿不了，而是条件所限。康熙仿成化青花，谁看都觉得，康熙青花的颜色比成化的好，釉色明亮，胎质细腻，这可以说，仿的比原来的好，因为是皇上的官窑、御窑仿的。那么为什么成化的比康熙的价值高呢？

这可不能按质论价，而是按历史年限，给以历史的评价。到1465年，中国生产的青花瓷器，有了这样一个水平是不简单的。200年以后，康熙年代生产的青花瓷器，又前进了。我是个发展论者，不同意那种后退论的观点。有没有暂时的后退？有，瓷器发展史中也有暂时的后退，但它总是要前进的。要前进必须取消前进中的障碍，创造条件促使其前进。

笔者说：老兄！几十年不见，进步不小，会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鉴定古瓷，不愧为专家。

专家不敢当，不过在古玩行，现在叫文物界，干了60年。生活所迫，走上文物鉴定这个行业。说真格的，我这点本事，还是后来学到的。以前在古玩行里混碗饭吃很不容易，只是混饭，混好了的发了财，往深里研究的人不多。后来，生活有了

保障，再不为生活而奔波、担忧，这就给了我一心扑在文物鉴定上学习与研究的前提条件。再有一条，过去一家一户、个人经营，所见甚少；1956年以后，我参加工作了，经多见广，眼界开阔，知识增长。所以我说，真本事还是后来学的，当然没有以前的扎实基础，也学不到真本事。

我在北京文物管理局鉴定组工作，开始时是文物清理组。两年的文物鉴定清理，见到的文物比我过去看到东西多多了。后来我又到外地鉴定文物，考察历代名窑窑址，观看出土文物。经我鉴定的文物，岂止千件。历代名窑瓷器，差不多我都亲眼见过，过去看不到的乾隆御制款的铜胎珐琅彩，少见的康熙豇豆红等等都看到了。只有见到真东西，才能鉴别真伪，真东西都没见过，怎能搞好鉴定工作。特别是我被派去检验出口文物，做验关工作，这项工作政策性、技术性都很强，工作中经常发生争执。我不怕争辩，只有争辩才能增长鉴定知识。比如有件西周铜簋，扁圆型，有耳子带盖，满身纹饰。验货人和库房管理人员，都说是新仿制的，我看是西周的。几经周折，才确定是件珍品；还有件绣花帏帐，要求出口的单位说是新的，我看是件珍贵文物，争执不下，请刺绣专家鉴定，确定是康熙年代宫内御用帏帐。这样的事我遇到不少，我是在众多的事例中增长鉴定知识，保护国家文物，为国家把好关。验关是经常同外国朋友打交道，既要讲究文明礼貌，又要坚持政策原则，还要有过硬的鉴别各种文物的本领。玉器、象牙雕刻、图章、砚台、缂丝、字画、硬木家具、法帖、地毯，可以说什么都有，都要鉴定，把好关，不准出口的决不能放过。这就要求有政策水平和技术水平，是真是假一看就有个八九成，这点儿本事，我是在实践中学到的，“实践出真知”。

我是怎样把我在实践中碰到的零七八碎的事儿，归纳起来，形成系统、有条理的知识呢？从前我们古玩行人，不会总

总结经验，光凭眼力，人到 60 岁以后，眼力不行了，买打眼货就难免了，原因是没总结经验。我也是不总结经验，可是，1962 年，领导上让我给从事文物鉴定行业的人员讲课。我讲什么，怎么讲？我的师傅告诉我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怎样言传？这时，我更加努力学习，开始思索总结自己的经验。我的言传，就是把过去自己经过的、见过、买过、鉴定过的文物，系统起来，找出它们的特点、特征，在比较中学鉴定，在系统中找规律。同时，也要读书、查找资料。书上的、资料上的是前人总结的经验，虚心学习前人的和别人的经验，才能更好地总结自己的经验。

我自己弄懂了是一回事，教别人也懂则是另一回事了。要使别人明白，自己先明白，还要思索怎样让人家明白。为了弄明白一个问题，甚至为表述文物的某一特征，我曾成天思考、琢磨，怎么表达得准确。我讲了二十六七年的课，我讲课不是我讲什么是什么，而是不断接受学员的意见，吸取他们在实践中取得的经验。所以，我的《讲义》是不断反复修改、补充，我想使之成为一套系统化、完整化，具有科学性实用性的陶瓷文物鉴定参考资料，留给后人，我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访问结束时，笔者说：孙师兄！年近 80 岁，还在验关、鉴定、上课、思考、研究和写作，永无休止的上进心，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坚韧不拔，不断总结经验，这可能是您成为专家的秘诀，也是学会鉴定古瓷的诀窍。

孙会元莞尔一笑：“秘诀就是学习与实践。”

三、古董佚散

古玩经收藏、佚散，再收藏、再佚散而流传。收藏与佚散是相联的，私人收藏的年月不久。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他所

收藏的书画名帖，以天籁阁、项墨林印记识之，当清兵到他的家乡时，项子京累岁之藏，尽为千夫长汪六水所掠。清代大收藏家陈介祺，他收藏三代陶器、古坯甚多，搜集汉印万颗，建造万印楼，到了光绪年间则佚散在琉璃厂的古玩铺里。

收藏时日较久，则是皇帝宫室秘藏之文物，也不断佚散。清末民初，清室皇宫收藏之珍贵文物，通过典当抵押、封货拍卖，佚散在民间；行宫失盗，流落到古董商之手；战乱兵燹，珍贵文物散失街头，经古董商之手，佚散他方。

二百余年未启封的康熙官窑瓷器

辛亥年阴历 12 月 25 日，溥仪退位，但仍居宫中，皇上和宫内生活照旧。生活来源，按袁世凯签定的清室优待条件：“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 400 万两。”后改为 400 万元。宫中开支浩大，加上内务府从中舞弊，中饱私囊，袁世凯的优待条件付诸实现，400 万元也是入不敷出，何况每年都不能全部照付。所以，宫内的生活开支，一部分则靠典当抵押金银珠宝、古董玩器过日子。20 年代初期，北京《京报》和其他报纸曾多次披露这种新闻。

1924 年春季，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请古玩行、玉器行的人封货。这批货有乾隆时代制作的玉器，康、雍、乾官窑瓷器，是宫内抵押在盐业银行的，超过合同日期，由盐业银行采取封货形式进行拍卖。

康、雍、乾的官窑瓷器，古玩行的多数人看成是新的，因为这些瓷器好像是刚从景德镇运来、新出窑的东西，有的还带有毛刺。封货不踊跃。虹光阁的张云岩封到雍正官窑天蓝圆笔洗一对，康熙官窑彩绘十二（季）月酒杯一套；东四牌楼荣兴祥古玩铺以 120 块银元的封价，买到一堂十二季杯。

张云岩封到的货，由虹光阁的股东之一渠铁衣收买。荣兴祥封得的一堂十二季杯，琉璃厂信古斋古玩铺搂来作价 450 元。当时在大观斋主持经营的萧书农看准了，说是真东西，花 470 元，从信古斋买到手，转手卖给边业银行（段祺瑞办的银行）副总裁李墨林 600 块现大洋。

盐业银行封货拍卖的康熙官窑十二（季）月酒杯，有几十套，张云岩和荣兴祥都是各封一套，但都是一样产品。一堂十二季杯，就是一桌酒席摆 12 个酒杯；12 个酒杯上绘画着 12 个月开放的 12 种不同的花卉，例如，正月的迎春花，七月的荷花，腊月的梅花等等。所以，又称之为十二季杯。这堂十二季杯是康熙官窑五彩杯，胎薄釉细，绘工精美，色彩鲜艳，底部书写“大清康熙年制”楷字款，确属珍品。古玩行里的人，多数人当时只看表面现象，在手感上有毛刺扎手，认为康熙至 1924 年已有三百来年，杯底毛刺早应磨掉了，这可能是新出窑的东西。

张云岩为什么鉴定的是康熙官窑珍品，敢封这批货呢？因为他鉴定瓷器有“绝招”，一是胎、釉、彩色、款识仔细看，先单项“教练”，再统观；二是“手头”（用手一拿、手感和分量）合度；三是用手指敲或弹，弹、敲后，放在耳边听声。这第三项是他的“绝招”，他鉴定瓷器总是敲和弹一下，听听声音，几十年都如此。笔者少年时曾问过他：“张大伯！您这是什么招数？”他说：“你小孩子不懂，这叫不单眼睛看，还要耳朵听。耳聪目明，才能鉴定。”

荣兴祥为什么敢封这种货呢？他是先解开了带毛刺这个谜的。因为荣兴祥掌柜的贾腾云同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是要好的朋友，所以他先知底。原来在康熙年间从景德镇将这批瓷器运到北京，三百来年一直放在南池子的内务府瓷器库，一直没打开包装，到了 1923 年，清宫室将这包瓷器抵押在盐业银行时，

仍是 300 年前的原包装，包装里边还有稻壳子。三百来年未见天日，稍有毛刺则是自然的了。荣兴祥不仅知底，而且这家古玩铺的师徒鉴定明清官窑瓷器的眼力较强，他们过眼的东西多，善于比较，看胎质、看釉色、看花纹、看彩头、看款识，看后加以比较，因而确定是康熙官窑珍品。

所以，鉴定古瓷的鉴定家们是各有一套，都是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没见过那么多实物，见到实物后不认真琢磨，光靠书本上写的那些，是永远也学不会鉴定的。

12 万多两金质文物一次抵押

岳乾斋是承办皇室典当抵押珍贵文物的中介人，他是盐业银行的经理。民国初年，岳乾斋住在北京内务部街甲 5 号，宅院占地 72 亩，深层套院，三百来间房子，有花园。大门上挂有牌子：“山阳郡岳”。宅内有护卫、打更的、听差的、厨子、老妈、开车抬轿的，仆人几十名，气派之大，颇似清代王府。岳乾斋不是官僚胜似官僚。他身材魁梧，四方大脸而麻面。一般人麻面无须，他却蓄有长髯，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嗓音宏亮，说话瓮声瓮气。他的眼珠儿一转，听差的就得知道他要干什么，不然，就不能在他手下使唤。旧时代人们称呼他“岳大爷”。

岳大爷出身寒微，祖籍江苏淮安，本人出生于北京，在京长大，缺人照管，生了天花，落个麻面。光绪十年前后，岳乾斋在北京前门西河沿一家金店学徒，同廊房二条聚珍斋珠宝店的李仲五是发小儿好友。李仲五当了掌柜的，岳乾斋早就开了金店，从内蒙运来金沙进行冶炼，发了大财。在袁世凯的表兄弟张振芳出任长芦盐运使时，岳乾斋认识了张振芳。那时，一些人发了财买金子，浓缩财产不外露，另一些人将钱财存放在

金店里吃利息，那时还没有银行。光绪二十三年（1897）北京才开了一家“中国通商银行”，搞银票，汇兑和存、放款项。

民国初年，张振芳投资百万银元，创建北方第一家私人商业银行——中国盐业银行，聘任岳乾斋为经理。岳乾斋虽未学过金融经济，但那时的金店也算金融业，有存、借款业务，他懂些信用中介、抵押、汇兑等知识，而且他认识官场和商业界的知名人士多，眼界宽，人又机警、果断。所以他经营银行的盐业银行，不逊于后来开办的金城、中南、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乃民国“四大银行”之首。

老古董商和珠宝商中知名人士都同岳乾斋有交往，因为他经手承办的皇室抵押品变价要卖给他们。他承办了多少皇室抵押品变价，而今只能说不计其数。这从经荣源等人和岳乾斋签字承办的一次抵押，可见一斑：抵押合同日期是民国十三年5月31日，签字人是内务府绍英、耆龄、荣源和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抵押品是金编钟、金册、金宝和其他金器，抵押款数80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合同规定，40万由16个金钟（共重11 1439两）做押品，另40万押品则是：8个皇太后的和5个皇后的金宝10个，金册13个，以及金宝箱、金印池、金宝塔、金盘、金壶等，计重10 969两7钱9分6厘，不足十成的金器36件，计重883两8钱，另加上嵌镶珍珠1 952颗，宝石184块，玛瑙碗等珍品45件。这样的抵押和变价，每年总要有好几宗，特别是逢年过节需要开销的时候。

除盐业银行外，中南银行郑瑞生也办理这种业务，外国银行也做这种生意。

传世宋钧窑瓷器之抵押变卖

清末民初，琉璃厂的老古董商经常在一起聊那中堂、徐世昌与袁项城的关系和那桐、徐世昌抵押宋钧窑瓷器的事。而今一位老人将前辈人议论之事，旧话重提，记录下来，后代莫忘。

清朝的大学士和协理大学士，都称呼为“中堂”。那中堂，名叫那桐，字琴轩，是镶黄旗人，同西太后是一个姓氏——叶赫那拉氏。那桐年轻时中过举，是举人出身。他长期居住北京，在王府井附近有那家花园。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那桐奉命领兵守丰台御敌，没挡住洋兵，北京失陷，西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往西安，那桐受命充留京办事大臣，跟着奕■、李鸿章同八国联军议和。《辛丑条约》签订后，那桐当了专使，去日本“道歉”，后升为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因而，人们称呼他“那中堂”。

光绪帝死后，他的弟弟载灃当摄政王。载灃要为其兄报仇，想杀掉袁世凯，被当时的军机大臣奕■劝阻。1908年，袁世凯被摄政王罢了职，回到河南老家，他戴上斗笠，披上蓑衣，驾一小舟，垂竿洹水滨，悠闲自在。实际上，袁世凯仍在加紧活动，他的军师徐世昌在清廷任巡警部尚书、邮传部尚书。1911年武昌起义，前去讨伐起义军的清兵作战不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徐世昌见时机已到，花钱运动奕■、那桐，他们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那桐“愿以身家性命”来保，载灃大发脾气，把那桐申斥一顿。摄政王抖了威风，那桐告老辞职，军机大臣奕■不上朝应班。前线仍然告急，载灃没主意，忙着赏给那桐乘二人肩（二人抬着那桐进宫）。在奕■、那桐、徐世昌联名保举下，袁世凯讨价还价，达到要求后，袁

项城才二次“出山”，当了钦差大臣，节制各军，袁的亲信冯国璋、段祺瑞为两军统领。所以，后来才有那桐当了袁世凯内阁的弼德院顾问大臣，徐世昌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二位大臣将清宫内的国宝抵押在汇丰银行之事。

清末民初，那桐、徐世昌二位大臣将宫廷内收藏的宋代钧窑成套瓷器抵押在英国在京开办的汇丰银行。这套瓷器约二十余件，是宋代钧窑专为皇家烧制的御用品，瓷器的外边底部刻有一至十的配套编码。传说是明代宫中之遗物，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今之景山）后，清王朝接收了明宫内的全部器物，其中有这套宋钧窑瓷器，称之为传世之宝。这套钧窑瓷器为何物？当时的北京古董商谁也没看到，只是听太监们传出消息说，是钧窑洗子和成套带盆托的花盆。抵押多少钱？实数局外人谁能知晓？有人估计可能是几十万两银子。

当抵押到期时，曾花过很多钱运动军阀、图谋复辟的溥仪，哪有财力偿还本息，赎回国宝？！在汇丰银行当买办的中国人邓君翔见奇货可居，倒手卖给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赚了一大笔美元，国宝流入异国他乡！

打那以后，美国人在北京古玩铺里买宋钧窑瓷器的“胃口”高了。以前，一般的钧窑瓷器，美国人都愿出高价收买，这时，则非精品不要。他们在买中国的宋钧窑瓷器中，懂得了行，什么“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颜色、芝麻酱底、玫瑰紫瓜皮绿等等古玩行的鉴定术语，他们都明白知晓。

1921年的前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和豪富巨富，曾掀起“中国钧窑瓷器热”，通过中国的古董商，宋钧窑瓷器源源不断运往美国。据老一代陶瓷鉴定家们估计，而今在美国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的中国宋钧窑瓷器，质量之高、数量之多，不逊于在我国国内收藏的实物。

行宫御用瓷器转入古董商之手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人。光绪进士，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结业后分发湖南，帮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1897年参加湖南维新运动。“百日维新”时他认为并主张“朝廷变法，首在兴学，兴学之本，先重师范。”他联合湘绅提议整顿湖南全省书院。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被弹劾革职。

熊希龄和端方是好朋友。端方在“百日维新”期间曾给光绪帝上《劝善歌》，标榜维新，受到光绪帝的提拔，后又追随西太后，不仅没因维新而革职，反而受太后重用。1905年端方受命出国考察宪政。这时，端方援引熊希龄充当考察宪政五大臣参赞。端方和熊希龄都喜爱古董玩物、收藏古玩，同琉璃厂的古董商有交往。琉璃厂延清堂古玩铺经理丁济谦同熊希龄的来往较多，二人交了朋友。

武昌起义后，熊希龄拥护袁世凯。袁世凯任命他为财政总长、热河都统。这时，清王朝覆灭，热河行宫混乱，屡屡发生被盗案件，太监们也拿出一些字画、瓷器等文物，到琉璃厂去卖。丁济谦、常惠川、韩少慈等人买到一些偷窃出来的文物。行宫里的东西有珍品，也有一般文物。那时，清初“四王”，即王□、王鉴、王时敏、王原祁的作品，每幅也不过百八十元收购。清代的御用上等官窑瓷器、郎窑瓶、豇豆红尊、古月轩珐琅瓷器，以前在古玩铺里根本见不到或极为稀少，自从清朝覆灭，故宫和行宫的珍贵文物才逐渐流入古董商手中。

琉璃厂延清堂的丁济谦胆子大，敢收购宫里流出的东西。他从行宫被盗的文物中收购到康熙官窑豇豆红的莱菔瓶、柳叶尊和郎窑瓶等，都是些康熙时代烧制极少的宫廷珍贵文物，也是民间见不到的皇帝御用玩物。常惠川、韩少慈也买了一些，

但都属一般文物。

事隔两年，官府抓到了个别的偷盗犯，追询赃物下落，罪犯供出了丁济谦、常惠川、韩少慈等人收买了他们的赃物。官府传讯丁济谦，丁济谦在大堂上公开声称：“你们去找熊希龄要东西，那时他是热河都统，行宫被盗，他看守不严，他应负责。我是买来的，不是偷盗来的，做买卖就有买有卖。”这时熊希龄已同梁启超、张謇组成“名流内阁”，任国务总理兼财务总长，根本不过问这种偷盗之事。这场官司，花几个钱，也就结案了。

泰安庙供器失而复得

1941年日伪统治时期，北京古玩商张玉华到济南看货，买来十几件明清瓷器，其中有藏草瓶，没把没盖的壶即投壶。投壶，我国古代宴会的礼制，也是一种游戏。把壶放在一定的距离，人们用矢向壶中投入，以投中多少决胜负，负者须饮酒。瓷制投壶是摆在佛桌上的祭器。张玉华买得较便宜，回到北京卖给同行，赚了一笔钱。

徐少山去济南从同行人霍介秋手里搂来四件货，其中一对大明嘉靖黄地青花带盖葫芦瓶，盖和瓶之间系一条鎏金链。霍介秋没看好这对瓶，认为是仿制的，徐少山看好了，认为是珍品。嘉靖的黄地青花瓷的制作过程是先以高温烧成瓷胎，然后浇上黄釉，看不好的则认为是后挂黄釉的“后挂彩”或仿制品。徐少山看准了，但不动声色，跟霍介秋说，我给日本人代买几件礼品，搂几件让他再挑选。边说边又选了三件瓷器，说了声，能卖我给你卖了，卖不了给你退回来。霍介秋没介意，也不知让他拣了漏。回到北京，徐少山将一对嘉靖黄地青花葫芦瓶卖了，赚了些钱，那三件瓷器退给了霍介秋。

时隔一年多，一天，济南伪警察局派人来京，到琉璃厂找张玉华和徐少山，跟他两人说，一年前你们在济南买的货犯案了！是官了还是私了？如果愿意私了，把货退回来。徐少山说：“货早就卖了，我卖给朝鲜银行董事赵汝珍了，无法退货。”张玉华态度硬，他说：“我是从济南古玩铺里买来的，又在北京卖给我们同行，有上家也有下家，我不是偷盗的，不犯法，退货没听说过！”跟警察闹僵了。警察回济南找古玩商会会长万恩普。万恩普说，我去趟北京，劝他们私了此案。万恩普跟张玉华、徐少山谈了几遍，他们都不吐口退货，又请同行人说和，但怎么说也不退货。

张玉华和徐少山从济南买来和搂来的瓷器，都是泰安庙的供器。收藏供品的房子是前门封着、锁着，从后边撬开窗子盗走的，春节前检查时才发现被盗，报告省长唐仰杜。唐仰杜喜爱古董玩物，从济南、北京买了些古玩收藏起来。当唐仰杜得知泰安庙被盗之事，下令侦察破案。济南警察局迅速破了案。当要求退赃物、私下了结了此案时，唐仰杜说：“把他们给我抓起来！”张玉华、徐少山被押送济南警察局，收监。这两人是嘴硬胆小，一蹲监狱货就退了。究竟退到哪里，落到谁的手里，在那战乱年月，国土沦陷时期，谁能知晓！

西蕃片在瑞典

西蕃片，古玩行人把它归类于“小铜器”。西蕃是指什么说的，西蕃片又是什么？过去的古董商只知做生意，有买的又有卖的，生意就好做，没人去考证、研究像西蕃片这样的小件铜器。

西蕃，就是吐蕃。吐蕃是我国藏族政权之名称。公元七至九世纪时，在青藏高原建立的奴隶制政权，史称吐蕃王朝。吐

蕃王朝传位九代，历时二百余年。在这个历史时期，我国唐代王朝曾与吐蕃两次联姻：第一次是公元641年，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特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入藏，赞普为文成公主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第二次是公元710年，唐中宗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赤德祖丹。唐中宗率领文武百官亲自把金城公主送至始平县。为了纪念金城公主入吐蕃，将始平县改名为金城县。两位公主对增进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和经济、文化、医学、历算、技术交流有重要贡献。

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后，吐蕃人民接受了汉族人民的很多工艺技术，特别是毛织手工艺，传入吐蕃，藏族人民学会了织栽毛毯，后来发展成为驰名中外的“藏毯”；冶炼工艺的传入，藏族人民学会制造兵器、铠甲。铠甲是古代的战衣，上面缀有金属薄片，可以保护身体，西蕃片就是吐蕃王朝时期制作的铠甲片。其中有护面用的鬼脸或叫假面具，护心用的护心镜等。

以前的古玩行人称西蕃片为小铜器。小铜器中大部分是铠甲上的金属薄片、鬼脸和护心镜等。铠甲片上刻绘多种图案，如龙虎斗、二虎相争、虎鹿相逐、虎吃鹿等等，画面生动活泼，形象逼真，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

在小铜器中，一部分是吐蕃的铠甲片、鬼脸、护心镜，一部分是西夏时期的铠甲片、鬼脸、护心镜。西夏是我国宋代时，人们对党项羌族所建大夏封建政权的称呼。西夏（1038—1227）和辽、金先后成为与宋朝鼎峙的政权。西夏、宋、辽、金多次发生战争，在战争中各方都遗留下铠甲片、鬼脸、护心镜等小铜器。以前的古董商不对吐蕃制作的铠甲片和西夏、辽、金制作的铠甲片，进行分期、分类地考证、研究，而是将非汉民族遗留下来的铠甲片，统称为西蕃片。

袁世香是经营西蕃片、而今仍健在的老人。以前他是玉器

行人，40年代经营小铜器，那时西蕃片的销路很窄，没人识货，在北京仅有袁世香一人做西蕃片生意。他认识一位瑞典人，名叫卡尔必。卡尔必对我国的西蕃片很感兴趣，在中国专门搜集铠甲片，回国后还请袁世香给他搜集并寄往瑞典。卡尔必于50年代初在瑞典去世，他搜集的中国西蕃片献给瑞典博物馆。现在瑞典博物馆有专门陈放中国西蕃片的陈列室，可见其数量之多，但是否已做分期、分类、分民族的考证、研究，则不知矣。

“八蛮进宝”进伦敦

1929年，雅文斋的掌柜萧书农来到前门大街双合号挂货铺，看到地上放着七个木头人、一个硬木座。人不完整，有缺胳膊的、有断腿的；座子是紫檀螺钿镶嵌，不完整，有的螺钿掉了，有的座腿没了，双合号没大重视这堆“破烂”。但当萧书农问他们要多少钱时，他们很快注意起来，总怕古玩铺的掌柜的拣他们的漏，开口要500元。那时的500块能买十亩好地，这堆破木头怎么值那么多钱。讨价还价，最后300元成交。

七个木头人、七个硬木座拿到雅文斋反复研究，人的形状不像中国人，每个人手里捧着鎏金棒，是“八蛮进宝”，少一个木头人和座；再看木质和雕刻，做工精细，花纹细腻。鉴定为乾隆年间藩属国的贡品。要修复、配齐，才可以作为珍品出售。

请谁修配呢？找小器作张绍永。琉璃厂附近的杨梅竹斜街有几家小器作，专门为古玩铺制作硬木雕花座，手艺好的张绍永在一块硬木上能雕出透体玲珑的精巧木座，这种座子不准有一块是用胶粘的，完全是雕刻出来的。张绍永用精湛的雕刻技

艺，修复配齐“八蛮进宝”。他是用原有的座配新雕刻出的木人；用原有的木人配新雕刻出的木座。用原有木人的胳膊、腿，按在新雕刻出的人身上；在原有木人的身上安上新雕刻出的胳膊、腿。经过构思，他创造一个新蛮人的形象，雕刻精美，模仿逼真，八个人、八个座浑然一体，看不出哪是原来的，哪是新配的，真是巧夺天工，天衣无缝。

蛮人的手和脸是象牙的，又请象牙作坊的艺工雕刻，配齐八个蛮人的脸和手。紫檀座镶嵌的螺蛳壳和贝壳有的失落了，还请珐琅作坊修配齐全。最后，由锦匣铺制作好八个锦囊盒，装璜美观大方。

修复、配齐的“八蛮进宝”：八个紫檀镶螺钿的座子，每个座长30厘米，宽22厘米，高12厘米。镶嵌在座子中腰上端的螺蛳壳和贝壳，形成花纹图案，闪闪发出蓝、红色的微光。

蛮人是檀香木制作的身子，带画彩，衣服是蓝色的，露出的衣服里是红色的。蛮人的脸是用象牙雕刻的，八个人八个模样，身高30厘米。手是象牙制作的，手里捧着鎏金棒，棒的上端是珐琅“八宝”，每个棒上有一宝。八个蛮人分别捧着轮、螺、伞、盖、花、罐、鱼、长八件宝贝。

人和座全高65厘米，非常美丽壮观。八个人的形象，神采各异，造型端庄而秀丽。远处观望，八个捧着宝贝的蛮人，好似徐徐向前走来，散发出幽微的檀香气。

修复、配齐的“八蛮进宝”，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也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八蛮，据《周礼·尔雅释地疏》中记载，是指我国以南的八个国名，即天竺、咳首、焦侥、穿胸、■踵、儋耳、狗帑、旁眷。其中天竺，经考证认为是印度，其他七国未见考证是今天的哪些国家。

我国在清康、雍、乾时代，疆土有所扩展，藩属之国年年

进贡，岁岁来朝。据考证“八蛮进宝”乃是我国以南的藩属之国，向乾隆皇帝表示忠心的贡品，究竟是哪国的贡品，无证可考。但它是二百五十多年前制作的精湛工艺美术品，它证明我国在二百五十多年前处于强盛时期。

这样有价值的珍贵文物，落在何方？过去的古董商是讲本图利，东西修复完整后，想的是卖个好价钱，谁去研究“八蛮”出自何经何典，只知道“蛮”就是“南蛮”，不过多地考虑它的艺术和历史价值，一心想卖高价。萧书农给“八蛮进宝”标价6 000元。同行入只有延古斋的陈养泉给价2 000元，还在犹豫。贾尽臣懂英语，跟英国古董商有交往，将“八蛮进宝”的照片和说明书寄往伦敦。英国人花6 000元收购了，贾尽臣吃了600元的回扣，雅文斋得了5 400元。从此，“八蛮进宝”进入英国皇家学会博物馆，以后，移交给伦敦博物馆。

文中提及的“八宝”，又叫八大吉祥，为佛教纹饰八种，称之为：法轮、法螺、法伞、白盖、莲花、宝罐、双鱼、盘长。

法轮。能摧破众生之恶，犹如轮王之轮宝，能辗摧山岳岩石。

法螺。梵语商法，译曰珂贝，即螺贝。螺声之远闻，广被大众；螺声勇猛，以表示大法之雄猛，千手观音手持法螺。

法伞。佛语，张弛自如，曲覆众生之谓。

白盖。又称天盖。饰以宝玉之天盖，佛菩萨及讲师之高座上所悬。

莲花。弥陀之净土，以莲花所居，故指净土曰莲。

宝罐。尊称佛具之瓶器，有华瓶、水瓶等数件。

双鱼。佛说，坚固活泼，能解脱坏劫之谓。

盘长。象征连绵不断。

万历五彩兽头尊和日本画家

1942年，前门大街祥和成挂画铺，有一件明代万历五彩兽头尊，是件真东西，如果卖给西洋人，能卖个好价钱。可是，这时的北京城里的外国人中日本人多，德国人、意大利人有一些，英、美、法等国的人就很少或者没有了，因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法等二十多个国家对日宣战，日本人占领北平，把西洋人赶走了。

一天，祥和成挂货铺门市上来了位日本人，名叫梅原龙三郎，是日本的著名画家。这位画家跟祥和成的王哲东是朋友。王哲东拿出万历五彩兽头尊给他看，他摇摇头不看，专门看旧地毯和西藏的氍毹。他认为挂货铺里没有什么好古瓷，地毯、氍毹还可以看看；看好瓷器、铜器、字画，到古玩铺里去。似乎他是位“中国通”，但他忘了一句中国老话：“鸡窝里出凤凰”。

过了一周，王哲东到北京饭店拜会梅原龙三郎。梅原拿出一个锦匣，锦匣里装着王哲东曾给梅原看、梅原不看的那件万历五彩兽头尊。梅原用日语跟王哲东说：“王先生，请你看”，接着用英语说：“这件古瓷是你们古玩商会会长、德兴斋古玩铺经理崔耀庭拿来的，崔先生告诉我，这件古瓷是清朝某王府的东西，要2 000元出售，我给他一千五，他还不卖，你看这件古瓷怎么样？能值那么多钱吗？”王哲东心想，我给你看，你不看；崔耀庭拿来的，你当宝贝了，让我说什么呢？心里这么想，嘴里可不能这么说，如果这样说出去，就给崔耀庭砸了买卖，所以只可应付几句说：“我看东西不错，你如果喜爱它，就请留下吧。”

王哲东回到祥和成，跟掌柜的王殿臣说：“梅原和我要

好，还想给我画张像，可是他看不起挂货铺。那件兽头尊我给他看，他不看，崔耀庭拿去了，他当成宝贝。崔耀庭是从咱这儿搂去的，他告诉梅原是某王府的。咱们跟他要八百，梅原给价一千五，赚七百他还不肯出手。”王殿臣说：“咱们也不能便宜了崔耀庭！”

第二天，崔耀庭坐着包月人力车、拿着兽头尊来到祥和成。进门把兽头尊往桌上一搁说：“殿臣！你的东西不错，我的买主不给那么多钱，你看六百行不行？”王殿臣心里有底便说：“崔二爷！您放这儿吧，八百就有点亏，甭说六百啦！”崔耀庭看了看王殿臣，王殿臣连忙说，“您做的锦匣装璜，我给您作价。”崔耀庭说声：“好吧！”出门上了包月车就走了。

崔耀庭是想用这套办法“砸浆”，往下压价。他没料到王哲东已经摸到了他的底。王殿臣沉着气，崔耀庭沉不住了，没过三天，他又来到祥和成，见到王殿臣便说：“殿臣！600块差不多了，别绷着啦，差不多就行了呗！把兽头尊拿来我再看看。”王殿臣说：“您看不着了，东西被人拿走了，这回我跟他要一千，这位买主很可能留下！”崔耀庭想，哪儿这么快的买卖，没过三天就卖了，所以他不信，跟王殿臣扯了一个上午，王殿臣也没把货拿出来。崔耀庭一看要吃饭了，便说：“我请客，哲东也去，吃完饭再说。”在煤市街丰泽园吃了一顿饭，崔耀庭掏出了十来块钱，王哲东打了圆场说：“崔二爷！我们掌柜的跟您说的都是实话，东西确实没在柜上。这么的吧！您出九百，明天我把东西拿回来，给您送去。”崔耀庭一想，少赚点就少赚点，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了”，赚不着钱还白请他们吃顿饭，不合算。他说，就这么办吧！我给你们白跑，顶多我卖一千。其实，他还是赚了600元。

为什么王哲东不直接将兽头尊卖给梅原龙三郎，中间让崔耀庭白赚600元呢？这是因为古玩行人讲名誉、信用。如果王

哲东直接将货卖给梅原，这叫“撬行”，这样干，一是失信于崔耀庭，而崔耀庭在古玩行里是位人物，不是好惹的；二是在同行中名誉不好听。同时，买卖古玩的双方有个相互信任问题，梅原龙三郎认为崔耀庭是古玩行的头目，王哲东是旧地毯行家，崔耀庭如果给他好地毯看，他也可能不看，因为他不相信他懂地毯。如果王哲东卖给他兽头尊，他可能不要，因为梅原不相信挂货铺里有真万历五彩。

梅原龙三郎买的这件万历五彩兽头尊，约30厘米高，扁方形，尊口的下端，四面有四个兽头，彩色艳丽，造型新颖别致。

万历五彩瓷器，从工艺上讲，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相结合，也应属于斗彩，是成化斗彩瓷发展的产物。但万历五彩和成化斗彩有明显的区别：万历青花五彩瓷器的青花，不占主要地位，成化斗彩瓷器的青花居主要地位，青花是构成整个图案决定性的主色。再者是这两种瓷器图案画面是两种风格，成化斗彩瓷的色彩鲜艳，以疏雅取胜；万历五彩瓷则以图案花纹满密、色彩浓艳得名。万历青花五彩为彩瓷，给人浓翠红艳的感觉。

梅原在当时花1500元得到这件万历青花五彩兽头尊，从价格上说是便宜的。笔者记得，1942年春节，李鸿章的孙子李定侯逛火神庙，到一家古玩铺坐坐闲聊，有人问他：李爷，您那万历五彩笔洗，2000块能不能让给我们？李定侯说：你是侧棱着脖子睡觉，想偏了心。兽头尊是要比笔洗值钱的，当然也要看彩头，一般来说万历官窑五彩瓷的彩头都是红艳动人。今天，这件明代万历青花五彩兽头尊堪称国宝，它的价值何止百万元。

古董改变了洋博士的生活习俗

比司徒雷登在中国传教还早 19 年的另一位美国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博士，中国名叫福茂生。1886 年他来华传教，光绪十四年（1888）在南京设立汇文书院，自任校长；1897 年盛宣怀聘他为南洋公学外国语文教习，后升监院，1899 年在上海办《新闻报》，在他的长期管理经营下，该报与《申报》成为清末民初时中国最大的报纸。福开森在华传教、办学、办报，进行活动，结交清政府的官僚，和两江总督端方拜把兄弟。后来，北京政府、南京政府的要员同他也有来往。他担任亚洲文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还给刘坤一、张之洞的北京政府当过顾问。1921 年华盛顿会议，他出任中国代表团团员。他还是慎昌洋行的股东。

福开森在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就到北京琉璃厂古玩铺收购文物，运往美国。琉璃厂的老古董商都认识他。人们传说，清末时，福开森的服装是清朝官僚的那套靴帽袍套，上身穿马蹄袖的朝褂，下身穿肥腿朝裤，足登朝靴，头戴双眼花翎礼帽，俨然清廷官员，就是蓝眼睛、高鼻子。古董商按中国官僚习惯，称呼他“福大人”。民国以来，他的服装改为长袍马褂、缎鞋布袜，中国绅士的派头儿，古董商仍称呼他“福大人”，他也仍以“洋大人”自居。

福大人买古玩，要真东西，不嫌价钱高，只要是真的他就要，给现钱不赊账，人们都认为他是位老主顾，好买主。其实，中国人太老实，为了赚钱不敢得罪他。民国初年，一家古玩铺给他送去一件康熙郎窑瓶，他看是仿的，不但退货，还声言，不准这家古玩铺的人再登他的门。过了一年，他听说这家古玩铺收藏一件宋钧窑鸡心杯，颜色好，造型美，他又亲自登

人家的门，掌柜的还是盛情招待。那时，古董商不知道一件文物在国外值多少钱，按国内价格要价，不敢出圈儿。所以，福开森买古玩不还价，要多少给多少，只要是真东西，他都觉得便宜。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福开森在中国搜集大量的青铜器、瓷器、汉玉、字画等各类文物，不断运往美国。具体地说，他由中国弄走什么珍贵文物，今天谁也说不清。询问老古董商，他们搔首曰：“记不清了。”福开森通过长期收购中国文物，成了中国文物的鉴定家和考古学者，他同中国人合著或由中国人帮他编著的书籍有《项子京收藏图录》、《历代著录吉金目》、《历代著录画目》和《艺术综览》等。南京政府曾聘他担任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委员。

老古董商们都知道，福开森家里养着一位寡妇。这位寡妇是他的亲生女儿。美国人没有丈夫死了、妻子守节不嫁的习俗。可是，福开森模仿中国旧官僚的一套生活方式和旧礼教习俗。他的家庭里封建家长制很严，女儿的丈夫死了，福大人按中国的旧礼教，不准女儿再嫁，让她守节。这位守节的美国妇女，传说在协和医院工作，是位著名医生，还担任过副院长；1941年，琉璃厂茹古斋经理白五楼去世，她父亲曾命她去吊唁，在灵前她行叩拜礼。所以，人们很觉奇怪，都说，中国古玩改变了美国博士的生活习俗，她按中国的礼教行事了。

四、珍品与杂项

古玩之珍品，是指宝贵之文物。但从广义上讲，凡属古玩都是宝贵的，可是宝贵之中也可分为国宝级和一、二、三级文物。杂项是古董商将古玩分为书画、金石、瓷器、杂项四大类，除金石、书画、瓷器之外，统称杂项。这不是科学分类，

而是经营的术语，杂项中有珍品，不过杂项中的文物名称繁多，零零碎碎较多，有些文物不曾被人重视，却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本节中做些实物介绍，但仅是杂项中极少部分。古钱不属于杂项之类。古钱分为刀布类、圆钱类，刀布类中的刀钱，过去古董商将其列入铜器。古玩铺与古钱铺有联系，但不是同一行业。经营古钱与经营古玩不同，收藏古钱是一种雅兴爱好，研究古钱，则同考古、治史密切相关。故将古钱作为一项内容，在本节中做简要介绍。这一节的题目概括不了内容，再立题目又细碎繁琐。

一挂朝珠八万两白银

朝珠是清代官服上佩带的一种装饰品，形状类似和尚的念珠，共有 108 颗，挂在胸前。清廷礼部冠服规定，皇帝和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者，佩带朝珠；妇女受封在五品以上者、内廷行走人员和典礼执事人员，也要佩带朝珠。皇帝的朝珠，“以东珠为之”，东珠乃松花江下游及其支流所产的颗大光润的珍珠。文、武官员的朝珠，则是用翡翠、珊瑚、玛瑙、水晶、琥珀、沉香、蜜腊等材料制作的。

民国以来，朝珠作为官服的装饰品废除了，而北京的皇室宫廷、王府和官宦人家，存有大量的各种材料制成的朝珠。珠宝商收购朝珠，改制成其他装饰品，进行销售。老珠宝商见过的朝珠很多，有挂朝珠价值 8 万两白银。这挂朝珠有 108 颗滚圆翡翠珠，颗颗碧绿光润，两颗朝珠的中间用金饰件隔开，避免翠珠碰击摩擦；用来隔开的金饰件，名叫“截饰”。朝珠串上有 5 颗红宝石佛头，每颗重 1 两 2 钱，还有红宝石佛嘴，连接翡翠大坠。朝珠两侧配有 30 颗蓝宝石念珠，念珠比朝珠略小，念珠下面是蓝宝石坠。这挂朝珠共重 2 市斤，是红蓝绿三

色，瑰丽而庄重。这挂朝珠是端王府的，1921 年以后流入珠宝商手中。

翠扳指入土复出

一位老珠宝商说，经他买卖的翠扳指很多，只有一个翠扳指最好。扳指的上口刻有“行有恒堂”堂号字款。“行有恒堂”据说是端王府的堂号。笔者记得翡翠大王铁宝亭有一个全部呈高艳绿的扳指，装在白玉套盒里，刻有“行有恒堂”字款，这只扳指是铁巴心爱之物，也是“翠扳指之王”。老专家们认定，两只扳指都是端王府之遗物，一只曾作为殉葬物入土而复出，另一只在 1931 年前后流入铁宝亭手中，铁宝亭将它带到台北。

出土的这只翠扳指的形状是上口凸出来，下口凹进去，用之扣拉弓弦不挡手。行话说这翠扳指叫一口气，没有任何毛病；颜色名叫“鹦哥毛”，绿得十分好看。这种颜色居于菠菜和青杨绿之间，是不深不浅的好颜色。

出土后，经加工改成 5 块方形戒指面。铡口 4 次共损失 5 分翠。原重 1 两 2 钱 5 分，改后净重 1 两 1 钱。可惜的是，改成戒指面后，颜色不如出土时好看，色泽失润。经专家细心考察，是因为铡后光亮时用药过多，热度太高所致。弄巧反拙，不如原物了。

“百一砚”终归国有

收藏古砚者历代有之，古有百砚阁、万砚楼，私人藏砚世代相传者甚少，往往是人亡而物亦亡，惟有各朝帝王藏砚传世者多。清廷砚之多是亘古以来所未有，《西清砚谱》中有记

载。

“百一砚”乃清朝乾隆皇帝收藏之名砚。砚色呈青紫，形状是“抄手型”。奇特叫绝之处是在砚背有 101 石柱，每柱上有一石眼，眼是淡黄色，还有睛，是黑色。故名之为“百一砚”。这块石砚自宋代已收入内府，至清代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弘历对这块石砚极为喜爱，御题诗句、刻成砚铭，并著录于《四库全书·西清砚谱》中，为宫藏重宝。

古人贵石砚有眼，眼的种类很多，有“鹦哥眼”、“鸽鸽眼”、“了哥眼”、“雀眼”、“鸡翁眼”、“猫眼”、“绿豆眼”，眼的形状和名相似。同时还分为活眼、泪眼、死眼。“圆晕相重，黄黑相间，黑睛在内，晶莹可爱”者，谓之活眼；“四傍浸渍不甚鲜明”者，谓之泪眼；“形体略具，内外皆白，殊无光彩”者，谓之死眼。古人鉴别石砚之眼是，“活胜泪，泪胜死，死胜无。”百一砚有 101 个活眼，乃天地造物之惟一绝品。

“百一砚”在清末民初，由宫中太监携带珠宝和这方石砚出宫，卖给珠宝商。珠宝商转卖给琉璃厂某家古玩铺。古玩铺掌柜看有乾隆御题诗句，怕露出宫中物之痕迹，把它磨掉了。后被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后裔 31 世侄孙苏宗仁先生用 70 块现大洋买去。宝砚几经磨难，被苏宗仁先生的后代献给了国家。国宝国藏，未流入异国他乡，实属万幸！“百一砚”曾被康生窃取，后复归国有。

润贝勒的一对白玉如意

润贝勒，即载润。贝勒是满语，满族贵族的称号，复数为“贝子”，其尤尊者称和硕贝勒。亲王、郡王、贝勒都是清朝的爵位名。清末时称载涛为涛贝勒、载洵为洵贝勒、载润为润

贝勒。

载润（1877—1963），惠亲王绵愉之孙。清末袭封贝勒爵。曾任守护西陵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正黄旗汉军都统，并主管过陆军贵胄学堂。民初曾在溥仪的小朝廷任御前大臣、宗人府右宗正。民国政府授给他“将军”衔，但无薪俸。1924年后，他与溥仪等人失和而分道扬镳，其后家境逐年败落。

1940年，润贝勒搬到西城劈柴胡同住，家里的总管叫“管事的”，谱儿没前清时大了。润府管事的派人到廊房二条聚珍斋玉器珠宝店，请人去看货，张廷烈跟着去了。到了贝勒府只是管事的接待，等了一会儿，管事的从里边拿出一对白玉如意，张廷烈仔细看这对如意，三镶式，长1.5尺，暗花刻有松下老人，雕工精细，玉质细腻、白润，全身无瑕疵。管事的介绍，这对如意是光绪皇帝赏的，张廷烈鉴定是“乾隆作”，即乾隆时代造办处制作的，是新疆和阗玉，乃传世珍贵文物。当时3000元成交。那时3000元能买一千多袋洋白面，但与这对白玉如意相比，二十多吨的面粉又算什么！可是，润贝勒当时生活困难，只可忍痛割爱。

张廷烈将这对白玉如意卖给了天津财主李四季赞臣，赚了两千多块。其实，这对白玉如意的价值岂止五六千元？！今日看来，可说是无价之宝，国宝级文物。张廷烈说，“我干了60年，所见白玉器物很多，哪件也赶不上这对如意的玉质好。‘玉润珠圆’，这块玉真是润滑如油，细腻无比。”

如意为何物？如意是器物名，出于印度，梵语“阿娜律”。最早的如意，柄端作手指之形，以示手所不能至，搔之可以如意，也有柄端作心字形的，用竹、骨、玉、铜制作。讲僧持之记文于上，以备遗忘。有手持如意的菩萨像。我国古代有“蚤仗”（现在叫“痒痒挠”），以搔背痒，又记文于笏以

备启事，如意则兼二者之用。

我国什么时候从印度传来如意？无据可考。在《晋书·王敦传》中记载王敦“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唐代诗人李贺诗中有：“向壁悬如意，当帘阅角巾”之句。可见，晋唐时代如意已较为普遍使用，用以挠痒而已。

明清时代，取其如意之名，表示吉祥如意、幸福来临之意，供玩赏吉利之物。康熙年代如意为宫中皇帝、后妃之玩物，寝殿中和宝座旁摆有各种不同的如意，以示吉祥、顺心。有沉香如意、硬木嵌金丝镶玉如意、全白玉、碧玉等如意。三镶式，即两端均为灵芝或云叶形，中间凸出心形或圆形，表示称心如意。乾隆时制作的如意，做工雕刻，选料特别讲究，皇帝赏赐皇亲、王公、大臣。民国以来，成为贵重礼物，富有之家相互馈赠。

永乐青花瓷器和葫芦瓶

明代建文元年（1399），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因建文帝用齐泰、黄子澄之计谋，议削藩，危及燕王。燕王朱棣便指斥齐泰、黄子澄为奸臣，并援引《祖训》，以“清君侧”为名，号称“靖难之师”，鏖战四年，打进南京，建文帝朱允炆逃跑，燕王朱棣当了皇帝，改年号为永乐。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不明，怀疑他逃亡海外，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想寻找建文帝的踪迹，又谋求与四邻通好。所以，历史上才有了“三保太监七下西洋”的故事。

郑和七下西洋，与亚非三十多个国家通商往来，发展贸易。在郑和每次下西洋之前，都大量收购瓷器、丝绸、铜铁器

和金银饰物，在国外每到一处，都用这些物品换取当地的特产。由于国外通商，促进了我国瓷业、丝绸等生产事业的发展。那时的江西景德镇发展成我国制瓷事业的中心、繁荣的手工业城镇。那里集中了制瓷的能工巧匠，陶瓷技艺有了提高。所以永乐年间的瓷器在胎质、釉色、花纹等方面都有了进步，数量增长也快。

在明代，青花瓷器是景德镇陶瓷生产的主要品种。青花，西洋通称“Blue and White”。烧制这种釉色，元代和明代初期，使用的是由波斯进口的原料，里面含有钴、锰、铁、钨等，后来改用一种天然出产的黑褐色矿物钴古矿，我国称之为“珠明料”。把这种料磨成细面，加水使其成为墨汁一样乌黑的液体，在干燥的瓷坯上绘画图样，然后再挂上白色的长石釉，在1200度以上的高温中烧制而成。烧成乌黑色绘成的图样变作美丽的蓝色。

永乐青花瓷器的特征是，胎质细腻洁白，釉层晶莹肥厚；色泽浓艳，泛出黑斑，黑斑和浓艳的青蓝色相映成趣。这种青花瓷器，除少数器皿有篆书年款外，多数没有年款，加之康熙、雍正时期又有仿永乐青花瓷器，所以鉴别永乐青花瓷器较难。永乐年间，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器，当时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而且远销海外。至今，东南亚一带的国家中的博物馆和收藏家的手中还保存着永乐青花瓷器，海外华人非常喜爱这种文物。

1942年，在天津出现了件永乐青花绘龙葫芦瓶，造型美观，绘画的青花龙，生动活泼。白色的坯体上用蓝色绘成的龙，比在白纸上所画的龙更动人心目，加上蓝色比黑色更多朴素的感觉，青翠光艳，色调明亮，给青花葫芦瓶增添了典雅的深厚意味，洋溢着雅洁、恬静之美感。这件葫芦瓶具有东方工艺美术之特点，实属难得之珍品。

永乐青花绘龙葫芦瓶，是在天津劝业场出现的，吕湘亭看

了看，鉴别不了是永乐的还是雍正的，雅鉴斋的萧宏度看是永乐的。萧宏度和吕湘亭正在欣赏、鉴别这件青花瓷器时，顾巨六的儿子顾德威来了，三人一商量，花1 300元联合币（准备银行的票子）合伙把它买下来了。琉璃厂大雅斋的王幼田来到天津劝业场，萧宏度给他看了青花葫芦瓶，这位“王四爷”看不出是永乐的还是雍正的，没敢给价，回到北京把消息传给了韞玉斋。韞玉斋的孙会元去天津，鉴定是永乐的，花6 000元买下来带回北京。东四牌楼的郭静安、崔仲良、孙瀛洲三人合伙要买，三人来韞玉斋看货，经他们三个人鉴定是永乐的，不是雍正的，可是一问价，又嫌价高没买成。后来，这件永乐青花绘龙葫芦瓶卖给了上海收藏家梁培。

250 年前的法国机械钟

1940年，北京廊房二条聚珍斋珠宝玉器店的张廷烈，被邀请去鼓楼东的金王家看钟。金王家在清代时是北京北城有名的财主。财主姓王，因他家藏金子多，人们称之为金王家。北平沦陷，日伪统治时期，金王家已经破落，但有钱人家的派头还十足。张廷烈走进王宅，领到跨院儿里，让隔着窗户看钟。张说，这样看不行，要求打开屋门进去看。

走进屋门，靠北墙摆着一对大座钟，揭开钟上布罩，仔细一看，这对钟足有1米高，红木座子，气派壮观。多年不上弦，已不走动。主人介绍说，上弦后走动起来，声响不大。打点时，钟顶上的一朵大花和四角上的四朵小花全开放。钟下端两侧站立两个洋娃娃手捧小水沟，水沟围绕着钟的下部前后左右，打点时从两个洋娃娃手里放出两颗小珠球，珠球在水沟里绕钟行走，按报时转圈，1点钟转1圈，12点转12圈，水沟里添入水，珠球在水中流动，浪花滚滚，悦目喜人。

珠宝玉器店本来不做钟表生意，可是这座钟不是一般的钟，是乾隆年间法兰西向清王朝进贡的贡品。金王家在清末从宫里太监手里买的，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西太后、光绪帝逃往西安时，宫里丢失的。张廷烈看了看钟的周围没镶嵌珠宝钻翠，但钟的下端珐琅图案美观、完整无缺损，便同主人讲：“您如果保证钟里的发条无损断，擦擦油泥就转动，我给您一万块！”主人不肯卖。后来1.2万元成交。

张廷烈雇了两位扛肩的工人，从后门扛到前门廊房二条聚珍斋。聚珍斋到北京各大钟表店请人修理，没人敢拆下来擦油泥，怕拆了后装配不起来。后又托人打听谁能修理二百多年前的法国钟。找到一位曾给宫里修过进贡钟的老手艺人，他看看这对钟说：“给我二两金子，三天修好。”二两金子擦一座钟的油泥，实在是少有的，可是除他没人会干这路活儿，聚珍斋也就认可了。

钟修好了。半个月上一次弦，打点时钟上端的五朵花儿一齐儿放，并发出芳香，打完点完全合上。同时，小珠儿的水沟里绕钟流动，钟声似西洋乐曲，优雅动听。这么好、这么大的一对钟，轰动玉器街和文化街——琉璃厂，珠宝商、古玩商赞不绝口。卖给谁呢？谁买了都要占一间屋子的一面墙的地方。本是宫殿里摆设的珍贵贡品，民间哪有那么大的房子摆它？

天津有位李善人是个老太太，清末民初她曾在深武饶安、冀州城一带搞过赈济，因而得“善人”之名。李善人是天津八大家之一，很有钱，她有11个儿子，李四、李七、李十一都买珠宝钻翠。李七在北京住东城礼士胡同里的一座深宅大院（后来，这座大院曾做过印尼大使馆）。聚珍斋请李七看钟。李七看了后很喜爱，花了三万多元买了下来，运往天津。

49年过去了，当笔者与张廷烈谈起这对钟时，他说，听说法国前总统蓬皮杜来中国，参观故宫博物院，看到陈列的法

兰西钟表时，曾感叹地说：“没想到，二三百年前法国制造的钟，在这里保存得这么好，可惜在法国见不到这么好、这么多的机械钟了！”张廷烈接着说：“我看现在故宫保存的法国钟，还都赶不上49年前我卖给李善人的那座钟壮观、美好。”但我们都不知这对在中国保存的法国珍宝而今流落何方。

日本画家笔下的《贵妃出浴图》

日本著名画家梅原龙三郎喜爱中国西藏的氍毹和古地毯。他来北京，到前门大街挂货屋子转悠。他不大懂中国话，会英语，祥和成挂货铺的王哲东会说英语，他两人用英语会话。来的次数多了，二人交了朋友。王哲东知道梅原三郎爱听马连良、言慧珠等京剧名演员演出的京戏，他爱吃河南饭馆厚德福的熊掌和瓦鱼块。有时，梅原龙三郎请王哲东吃饭看戏，聊家常。

北京沦陷时，梅原龙三郎经常来北京，每次来京都是住在北京饭店五楼靠西头的那套房间。王哲东问他为什么总是住这套房间，他说是为了便于欣赏故宫的风光和太庙的景色。他仔细观赏中国地毯上的色彩图案，认真观看中国京剧的服装和演出，都是为了他的事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开阔眼界，增强艺术修养”。

梅原龙三郎善于画裸体画，在他的笔下显现出人体的美态多姿，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他在北京要找模特儿，拜托王哲东去给他找，体形要美、眉眼要俊、身条匀称、胸部隆起而适中，这样条件的美人哪去找？找到了人家也不能脱光了，让一个日本人画。所以王哲东谢绝了他的拜托。

有一天，梅原龙三郎看言慧珠演出《贵妃醉酒》，认为言慧珠的身段、体形美，表演细腻动人，想起《长恨歌》中，

杨贵妃在华清池沐浴的故事，要画《贵妃出浴图》。经过多次周折，花了很多钱，请来一名演员身披粉红透明丝纱做模特儿。梅原正在绘画《贵妃出浴图》，王哲东来访。梅原赶忙让他到洗澡间去洗澡，惟恐打断自己的画兴和引起模特儿的不满。

1942年，当梅原龙三郎离开北京前，把这幅《贵妃出浴图》展现在王哲东的眼前，并说：“王先生，我想给你画一幅画，送给你留个纪念，这次来不及了，下次给你画。”从此，王哲东再没见到梅原龙三郎。而今，当王哲东谈起《贵妃出浴图》时，表露出对梅原龙三郎的怀念之情。

梅原龙三郎画的《贵妃出浴图》已是一幅名画。这幅作品画出了中国古代贵妇人的神姿玉态，粉红色的丝纱衬透出体态丰盈，肤如凝脂，好似出水芙蓉；画出了“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清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的诗情画意。这幅杰作，有着感人的艺术魅力，无论是谁看了，都是久久不愿离去，感叹不已！

一座周代特钟的来历

清末民初的时候，老北京特别是古董商都知道■子府住着一户人家，人称“梳头李”。这户人家为什么叫“梳头李”？“梳头李”是在皇宫里给皇家贵族梳头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给皇上、娘娘、宫妃们理发的高级理发师，这位理发师姓李，家住■子府。那时，一提■子府“梳头李”，人们都知道。

在那个时代，梳头的、搓澡的、修脚的人是被人看不起的行当。可是在皇宫里梳头就不同了，侍候皇室贵族的奴仆，在京城里是吃得开的。■子府的李家可阔气了，派头儿不比四品

官差。1945 年前，“梳头李”到琉璃厂古玩铺，掌柜的都称呼他“李二爷”。其实，李二没在宫里给皇上、娘娘梳过头。给皇上梳头的是李二他爹，他爹是位太监。试想，不当太监，皇上怎能让他他在宫里给娘娘梳头？！在宫里侍候皇上、娘娘的大部分是太监，还有宫女。

太监怎能有儿子？那个时候，在京城里住着一些太监的眷属，有钱的太监都娶妻，但不生子。有儿有女的太监不少，都是抱来的，螟蛉之子。李二在“梳头李”家扶养成成人，从小惯养到大，长大了扎腿带，自己都不会，得老妈子给扎。他二十来岁时，长得挺像样，高个子，大眼睛，高鼻梁，细皮嫩肉的小白脸，招人喜欢，特别是年轻妇女的喜爱。而他是个“银样蜡头枪”。“卢沟桥事变”前，“梳头李”给儿子说了个媳妇儿，模样长得俊，是别一家太监收养的女儿，他们是门当户对，两人又都长得好看漂亮，批八字，换小帖，明媒正娶，“七七事变”过了没几天，就结婚了。

1940 年，“梳头李”去世了，给李二留下房屋和古玩。李二有了妻室也学会过日子了，日子过得在附近来说是数一数二的，街坊邻居当面都称呼他李二爷，背后也叫他“梳头李”。这个“梳头李”就不是太监了，虽不是太监，但他也不大中用，小俩口年轻时，就因为这档子事儿，感情不怎么好。后来，有了两个儿子，女人的心用在孩子们的身上；“梳头李”又有祖上留下的财产，吃瓦片就够过日子的，再卖一两件古玩，日子就过得很宽裕，李二奶奶的吃喝穿戴都能得到满足。所以，十多年来俩口子相安无事。

孩子们长大了，李二奶奶一天没什么事，她爱听相声、大鼓，经常到西单商场启明茶社去听常连安、二蘑菇的相声和白凤鸣的京韵大鼓。日子长了，一位唱大鼓的男主角，认识了这位“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李二奶奶，来来往往，有了感

情。1952年，李二发觉了自己的老婆有外遇，但不敢明言制止。到了宣传婚姻法，演《刘巧儿》、《小二黑结婚》的那阵子，李二奶奶向李二提出离婚，理由是他们的婚姻是“老家儿”做主，婚后夫妻生活不美满。李二让孩子们劝劝他妈，两个儿子给娘跪下了，苦苦哀求。李二奶奶说什么也不肯再跟李二过下去。为什么日子过得很好，不想继续过下去呢？当妈的不好向儿子启口，只说：你们爸爸没本事，人家有“功夫”，我跟他半辈子没舒服过，有舒服地方我为什么不去呢？李二没办法了，同意离了婚。

1954年，一位老古董商被人约请去看一件一米多高、扁圆型，口缘平，有悬钮的大铜钟，也叫特钟或称钟。是熟坑青铜器，出土多年，锈色磨掉了，钟身有夔纹鼓丁，像是东周时代的，又似秦汉铜钟，一时鉴定不准。想约请程长新或傅大卣来看看，可巧，他们都不在京。所以，只是鉴定鉴定，没谈及出售问题。后来这件青铜器卖给了故宫博物院，现收藏在那里。

这位老鉴定家纳闷儿，怎么在唱大鼓的家里收藏有这么大件的周钟？这位京韵大鼓演员的师傅是鼓王刘宝全。刘宝全有点小零碎古玩，有一年马连良过生日，刘宝全给送去几件，只是些小零碎文物，没见过鼓王有好古玩，他徒弟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贵重文物？细一打听，才引出上边说的这段故事。原来“梳头李”的太太改嫁鼓界泰斗时，带去了几件古董，其中一件就是这口周代的大钟。

烟具与马镫

烟具，是吸鸦片烟用的器具。古玩铺里不买卖这种东西，旧时代前门大街的挂货屋子买卖烟具。他们从败落的王公贵族

和官僚的旧宅门里买来，卖给中外顾客，有的人买了自己用它吸鸦片烟；有的人则是作为工艺美术品欣赏。耐人寻味的是，北京政府时期，英国驻北京大使馆（那时叫“英国府”）的汉文参赞周尔，在他的大客厅里陈设着中国式的硬木雕花炕桌，桌上也摆着中国人制作的精致而华贵的全套烟具。

外国人到中国来，有的人爱烟具这种工艺品，不成套、单个的也要。抗日胜利后，北京的六国饭店、北京饭店里的销售古玩的柜台上，摆有吸鸦片用的烟具。用玻璃瓶子磨制的烟灯，外国人也要买，当作纪念品，回国欣赏。

烟具包括些什么？

烟盘。俗称大烟盘子。是用红木制作的2尺宽、3尺长的长方形盘子。红木的木材，花纹美观，木质坚硬、耐久，是贵重家具及工艺美术品的用材。有螺钿的烟盘更为珍贵。螺钿是用贝壳薄片制成人物、鸟兽、花草等形象，嵌在漆器物上。螺钿烟盘，用贝壳薄片制成象征“福禄寿喜”的图案较多。镶嵌螺钿的漆器是我国著名的手工艺品，它的起源很早，周代已流行，1945年前能见到唐代螺钿实物，螺钿烟盘最早的是清代中期的产物。

烟灯。北方人讲究太谷灯，南方人讲究苏州灯。这两地厂家是用白铜制作烟灯。烟灯有圆形、六棱、长方形；有雕花、镂花；有带扣、不带扣的两种。灯罩的玻璃是纯白料、磨花，花纹素雅大方。烟灯制作巧妙，盖上灯罩，灯不冒烟。

烟枪。烟枪有一尺半长，最讲究的是绿犀角枪、香妃竹枪。枪的头、尾镶有象牙或虬角。象牙口、象牙手，在手的中间安上紫砂烟斗。紫砂烟斗上印有制作者的印章。

烟钎。烟钎是用白银或白铜制作的。一头如针，一头扁形，鑿有花纹。最著名的是张盘烟钎。

一套精美的烟具，是有欣赏价值的工艺美术品，可见我国

工艺水平之高超。

“人是衣服，马是鞍”，说的是人要用适体美丽的衣着修饰，马要以鞍辔、马镫加以装饰。模样长得一般的人，穿上整洁适体的衣服，能显得俊美；装饰上漂亮的鞍辔，驽马也像是骏马。

我国是在什么时代给马配备上了鞍辔的？有的专家说：在春秋战国；有的学者则认为，战国时还是骑着“光板”马打仗。究竟哪个朝代给马配备上了鞍辔，无实物给以验证，很难认定。长沙墓的陶俑中，发现西晋永宁二年（302）的马镫，要算是最早的马镫了。

满、蒙、藏族人民喜爱良马，善于骑射的人多。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大清王朝，皇帝和王公贵族特别讲究马的鞍辔、马镫的制作和装饰。

马鞍。用桦木、沙榆皮制作木胎，加以镶嵌鎏金。故宫博物院现收藏有清顺治年间制作的镶金嵌珠石珊瑚马鞍，这副马鞍豪华端庄，远看闪闪发光，是马背上皇帝的宝座。

马辔。用羊毛或丝织做出美丽的、象征着吉祥如意的图案，或用柔软的香牛皮制作。将马辔披在马背上，马鞍放在马辔上边，用肚带捆紧。肚带，是用香牛皮或丝线编织的五彩绶带。

马笼套。笼套的上前方有红缨穗，笼套箍是鎏金、压花的，鲜红色的缨穗和金黄色的笼套箍交相辉映。

马鞭。鞭把有象牙的、白玉的、碧玉的、青玉的；鞭绳是用驴皮制作的。

马镫。是骑马时踏脚的装置。清代时期在内务府设有造办处。造办处为皇宫制造金属用器，马镫由造办处铸造。马镫分铁、铜、珐琅三种。铁合金铸造的最好，双镫一碰，声如钟磬。铸造技术高超，造型大方。马镫的上端，铸造出两个龙

头，龙的眼珠能转动，龙的嘴里有舌头，含有圆珠。摇晃马镫，龙眼转动，龙舌伸吐，龙嘴里的珠儿前后滚动，从龙嘴里发出清脆的音响。人骑在马背上，听到这种音响，赏心悦耳，精神振奋；马儿听到这种音响，龙腾虎跃，奔驰向前。

本世纪 20 至 40 年代，在北京前门大街开设的挂货铺，经营马鞍^鞢、马镫、马鞭、马肚带、马笼套等。那时，认为这些是平庸之物，列入不了古玩之类，登不了大雅之堂。其实，这些都属于文物，平常的东西里有不平常之处。

它证明了我国在 300 年前的铸造、镶嵌等技术之精巧。以马镫来说，用一次铸造的方法，制作出如此精致、能发出响声的器物，可以想见其技艺之高超。同时，在整个马的装备上，体现了声、色、美的艺术和谐。不难想象：人们骑在马上，在峡谷河山中驰骋，阳光照射着马鞍^鞢和笼套，是五彩缤纷；高山流水，马蹄声碎，伴随着马镫发出有节奏的音响，确是一种自然、声音、色彩的和谐。可见古人造物用心之细微。

1942 年，会说英、法、德语的古董商刘宜轩落魄了，给外国人做导游当翻译，来到前门大街祥和成挂货铺，见有一堆马镫，外国朋友便奇怪地问：“这是些什么？”刘宜轩用流利的英语向他讲述了马镫和它的制造与来历，并挑选了一对，双镫一碰，声如钟磬；再一晃动，龙眼转动，龙舌伸吐，龙嘴里的小珠儿滚动，迸发出清脆悦耳的音响。这位外国朋友欢笑拍手，高喊：“Very good！”花高价买了这对马镫。但他只是好奇而已。听说，这位外国朋友回国后，将马镫摆在客厅里，来了客人便介绍说：这是中国皇帝用过的马镫。

牛角灯 活计 织锦诰命 缙绅

牛角灯、活计、织锦诰命，这三项文物，曾不被老古董商

所重视，只是在前门大街的挂货铺里经营。可是，这些文物的艺术价值不低，有的则具有考古价值，不应小看。

牛角灯是北京独有的特殊工艺美术品，始于永乐年间，继而连绵不断制作，直到1940年以后，逐渐失传。

制作牛角灯的主要原料是牛犄角。制作方法是用刀把牛犄角削成极薄的薄片，用微火烤，将众多的牛角薄片拼对联结起来，再做成各种形状，扁圆形，直径2尺，小高桩或带棱的居多。灯的下端中间有蜡托，可点大蜡烛。牛角灯的里层面有人物、山水、龙、福寿字、五蝠捧寿等各种图案，画工细腻淡雅，色彩协调优美，富有京都艺术的韵味。这种灯的特点是光色柔和、不刺眼。每年灯节，北京的大户人家选用牛角灯，悬挂庭院，欣赏观看。

牛角灯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受国外人士来京游览者的赏识，他们出高价购买。旧的牛角灯买光，则由北京崇外花市大街的几家手工作坊制作新牛角灯，由前门大街挂货铺销售。外国朋友特别珍惜牛角灯，他们买到牛角灯，体形大又不能折叠，就跑到大饭馆子去买蒸饭菜用的大圆笼，用大圆笼装牛角灯，运往自己的家乡。问他们为什么这样看重牛角灯？他们回答说：“回到自己的家乡或城市，把牛角灯挂在庭院或室内，别有情趣！它能使我们思念古老的中国和美丽的北京。因为它具有中国北京的特色。”

活计也叫荷包。原来北京还有东西荷包巷，那里专卖荷包。荷包巷在正阳门箭楼后，城楼前的瓮城中空隙地的东西两侧，商贩群集那里卖荷包。

荷包原是清代时人们随身携带的绣花小囊，用以装零星财物，有绣花表囊、眼镜盒、扇套、香囊、钱褡裢、扳指套、首饰盒等等。古玩行人将这些小零碎，统称为活计。这些小零碎，由于绣工精细美观，曾是清代官员系于袍褂之外的装饰

品。这种小巧美观的装饰物，有的是皇上、太后赏的。清代的皇帝、太后用这些小玩艺儿赏赐给大臣及其眷属，成为贵重的奖赏品。

荷包上都是用彩色线，使用各种不同的针法，绣出各种花卉、人物、动物、景物、八仙人、八宝、福禄寿、博古等美丽的图案，做工精致，色彩绚丽，形象生动，层次清晰。荷包上的刺绣，有湘绣、蜀绣、苏绣、京绣和顾绣之分。其中以顾绣为最佳。顾绣不是指地区而言，乃是清代时期，上海有位叫顾玉兰的绣花女艺人，她绣出的人物花卉生动而富有诗情画意。顾绣稀少而珍贵，湘绣次之。

清王朝覆没，在建立东西火车站时，拆除了瓮城，荷包巷也不存在了。一些小零碎绣货，则由前门大街挂货铺经营销售，取名活计。民初时，北京居住的一些官宦之家，将珍藏几代的皇帝御赏之绣花荷包，卖给古玩商贩。买时不值数文，卖给外国人，只要向他们说明，这是皇上赏给大臣之御赐品，他们可出上百银元收买一件荷包，古董商赚了大钱。

已被淘汰或正被淘汰的绣货，由卖小荷包而复兴。挂货铺卖的活计，引起外国人对中国绣货的兴趣，绣衣商人将收进来的绣衣、绣片拿给外国人看，外国人出高价收买，很快传开，有人在西湖营开设字号，专营旧绣货，业务发达，赚钱多，1921年前后，西湖营成了著名的绣货街。

织锦诰命。古董商称织锦诰命为诰命。织锦也叫织文。中国发明织锦很早，桀纣之时，妇女即“锦绣文绮”。织文，就是用各种颜色的丝相错而织花纹或文字。

我国自隋唐以来，帝王授官、封赠的命令称之为“诰”。诰命，就是皇帝赐爵或授官的诏令。明清制度，一品至五品，以诰命授予，五品以下用敕命授予。《红楼梦》第13回中有段话：“只是贾珍虽然心意满足，但里面尤氏又犯了旧疾，不

能料理事务，惟恐各诰命来往，亏了礼数，怕人笑话……”这段话中的“诰命”，是指受有封号的贵妇。而我们研究的诰命，是一种实物。织锦诰命，可以说是用丝织成文字的“任命书”、“委托状”。

明代的诰命是比较细的织锦，绣有花纹和正楷汉字的彩色丝织物。约1市尺宽、2市尺长，上端有绒头和丝绳，可以挂起来；下端有玉轴，可以卷起来。清代的诰命与明代的相同，只是加了一行满文。道光以后的织锦较粗糙。

北京是明清两代之故都，两个朝代的官僚后裔，居京者较多。有的官僚后裔成了纨绔子弟，北京人管他们叫“秧子”，有专门“架秧子”的人。“秧子”游手好闲，什么也不会，可就是吃喝玩乐，也要“架秧子”陪伴。“秧子”没辄了，“架秧子”的人也就离开了他。当他们贫困潦倒时，家里的什么东西都卖，拿着先人的织锦诰命，天不亮跑到东晓市去卖，弄个块八毛钱混日子。有的人是站在家门口，把织锦诰命卖给“打鼓的”。“打鼓的”是手拿小皮鼓，边走边敲，挑个小挑子，走街串巷，收买旧物的。

古董商从东晓市和“打鼓的”摊上和手里，收购织锦诰命，也有从王府、宅门里买到的。买到手后加以装修或配硬木框。一件明代织锦诰命，可卖到200银元，大部分是经挂货铺卖给外国人。有的外国朋友觉得很新奇，他们认为，中国皇帝颁发的“诰命”太珍贵了，为什么官员的后代把它卖掉，感到奇怪。有人还开玩笑说：“我买了织锦诰命，拿回国去，告诉大家，中国皇帝委任我当大官了。”

缙绅也称荐绅，亦作搢绅，是指古代高级官吏的装束而言的，也是官宦之代称，说某人是位缙绅，就是说这个人是位官员。《荀子·礼论》：“缙绅而无钩带矣。”《晋书·舆服论》：“所谓搢绅之士者，搢笏而垂绅带也。”《说文》：“搢，插也；

绅，大带也。”古代官员插笏于绅带间。笏是古代大臣朝见皇帝时手中所执的狭长板子，用玉、象牙或竹板制作，也叫手板。手板上可书写文字记事，面见皇帝时，奏事的简要提纲写在手板上，防止错乱。历代大臣所用过的绅和笏，都属古董文物，古玩铺或挂货铺里曾经营过。

《缙绅录》是一种书刊，很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刊物。清代康熙以来，逐年由书坊刊行《缙绅录》。书刊详细记载朝廷内外官吏的姓名、籍贯、出身，即秀才、举人、贡生、进士、状元等出身。因为每年都有官吏的擢升、贬黜，所以每年都出刊发行，是一本清代官场流行的职官姓名录。清代大小官员和进京会考的举子，都需要这本书刊，故颇流行。至 1912 年，清廷覆没时停刊。

缙绅局是专门卖《缙绅录》的商号。光绪十年（1884）在琉璃厂开设一家缙绅局，字号“荣禄堂”，是由咸丰进士、光绪的户部左侍郎孙诒经书写。孙诒经是位顽固派，他反对设银行、开铁路。

荣禄堂接触官场，光绪年间生意兴隆，到了民国只经营些旧书，1925 年歇业。老掌柜名叫丁蕴卿，河北东鹿人，他开的缙绅局取字号“荣禄”。“蕴卿”和“荣禄”同他经营《缙绅录》是相得益彰。

古 钱

琉璃厂有位古钱刘，咸丰五年（1855）开设广文斋古钱铺。古钱刘是河南献县人，名叫刘三戒。刘三戒的名字是位爱好古钱的翰林给他起的，是从《论语》上孔夫子说“君子有三戒”一语中择取的，并告诉他三戒的内容：“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

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古钱刘深受其教，一生崇尚“三戒”。

古钱刘的儿子刘崇三，两个孙子刘文清、刘文铎，祖孙三代经营广文斋古钱铺，共经营 80 年，1935 年广文斋歇业。广文斋鉴定古钱具有权威性、爱好古钱的人有时拿着古钱请他们鉴别或配齐年代（即按年代顺序选配成套）。刘家三代人经营的古钱最多，经验丰富，对历史古钱有研究，并有独到的见解。可惜的是他们祖孙三代不善笔墨，他们的研究、鉴别古钱的经验，未留下只言片字。

鉴别、研究、收藏古钱是一种雅兴爱好，但它同考古、治史密切相关。研究我国各个朝代和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离不开研究当时各代的币制。中国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所谓礼让之国，文人以谈钱为耻。史书对于各代之币制情形避而不谈，除偶有片段之类记叙外，没有系统的详细记载。考证古钱相当困难。

据笔者所知，有位日本人考证、研究中国古钱，并有著述，是位收藏家，他的名字叫平尾聚泉，从“聚泉”二字可见他对我国古钱爱好之深。因“钱本名泉，言货之流如泉，后转曰钱”（见《史记·平准书》索引）。民国以来，我国研究、收藏古钱的学者、专家有：上海的丁福保，著有《古钱大辞典》；天津的方尔谦、方药雨。方尔谦爱好古钱成癖，收藏甚丰，自秦汉刀币至历代通宝。传说他嫁女儿，用古钱做定礼，还写一副对联：“两小无猜，一个古钱先下定；四方多难；三杯淡酒便成亲。”方药雨收藏古钱最多，他在琉璃厂还收购字画、端砚、印章等文物。他编著的《钱谱》乃近代研究古钱的权威之作。方药雨长期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地。传说他收藏的古钱和其他文物，曾存放在北京盐业银行保管库，后卖给上海陈长庚，陈长庚出国，将这批具有考古价值的稀有珍贵

文物带往国外。方药雨一生心血积聚的大量古钱，全部编号装箱出国，落在何方，不知其详。

钱，原是一种农具的名称，其形状类似铁铲“𤔔”。这是研究古钱的学者们一致见解。但有人引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乾部》：“古者货贝而宝龟，周太公立九圜法，乃有泉；至秦废贝行钱”则认为钱是从秦始皇时开始流通的。有人则不同意这种见解，认为我国上古时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无所谓交易，偶有所需则以农具“钱”做筹码进行交换。仿“钱”形状铸成货币，也不是从秦开始。赵汝珍先生认为，“三代以前各代之币虽大小文字间有不同，其为铲形则一也。”

古钱分类，有刀布类，指刀钱、贝钱，包括铲形钱。有圆钱类，指方孔圆周之币，我国古代取天圆地方之义，制成方孔圆周之货币。古钱铺里圆钱类较多；古玩铺里有刀布类的钱，划为青铜器之内。

过去搜集古钱类似今日集邮，讲究成套。例如将一个朝代的钱币搜集齐，是很不容易的。以我国元朝为例，自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到1368年朱元璋当皇帝，改国号为明，前后才97年，但这时的钱币共有124个不同种类，要搜集齐全是不易的，一是要有时间，二是要有资金，限于此，很少有人将一个朝代的钱币种类搜集齐全。因此，集单枚者大有人在。

五铢，钱重五“铢”，上有“五铢”二篆字。这种古钱不值钱。因为五铢数量最多，流通时间最长，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至唐武德四年（621），共流通使用739年。单枚的钱币要算“天显通宝”和“天赞通宝”最珍贵。天显、天赞是我国辽太祖耶律亿使用的两个年号（922—926），这两种钱币在历代钱币中是铸造最少、流通时间最短的。

不是所有“天显通宝”和“天赞通宝”都值钱，按照古

钱铺的要求，必须是铜质温润，周圆孔方，边缘齐整，字迹清楚，锈色美丽，大小合度，才算是稀世珍品。古钱的价值，可以由收集者的喜好而定，例如有人喜爱欧阳纂书写的“开元通宝”，他喜爱的是字，不是钱币，如四个字完整，孔不方、周不圆、边不齐的钱币，也可以出高价购买。

古钱商人对单枚、成套、半套、部分的古钱，究竟能卖多少钱，心里没多大底，要看买者的需要程度而定。例如，某人收集了一个朝代的各种钱币就差一枚，这一枚价格很高也能出手，如人家不缺这一枚，也就不值钱了。当古钱商人知道某人急需某种钱币时，自己手中又没有，他们还能做假钱，以假充真，从中牟利。鉴别新造的假钱很容易，用舌尖一舐，凡有咸味的则是假的。因为新造的锈是用盐卤浸过，锈色发白，用醋一擦假锈即掉。

古钱商长期经营古钱养成一种特殊的售货习惯，给他的价钱越高，他越不想卖；他要了价，你不还价，他也可能不卖，他会说，现钱交易，如马上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他就不卖了，如当时给了他钱，他就没办法了。这一特点同古玩商不同，古玩商讲信用，说话算数，讲价钱不能“来回拉抽屉”。

本世纪30年代初期，某古钱铺掌柜的在门市收购一件明万历年五彩大梅瓶，他心里没底究竟值多少钱，买的较便宜，到底能卖多少钱呢？他用卖古钱的办法跟古玩铺掌柜的讲交易。开始时，有家古玩铺给价2 000元，他不卖；有的给5 000元、6 000元，都不卖。后来，就问他，你究竟想卖多少钱，他说8 000元，古玩铺掌柜的说，好！给8 000元。他说，拿钱来！一手钱一手货。古董商说，我回柜上拿去；他说，你回来我就不一定卖给你了。最后，一家大古玩铺摸透了他这一套，就拿着一万元现款去跟他讲价。果不其然，他一开口就要价一万元，这位古玩铺掌柜的说，咱们一言为定，不得反悔；他

说，这没什么反悔的，你拿现钱来，我就卖给你。古玩铺掌柜的随手把钱拿了出来，这一下子他没辙了，只好卖了。

根据一位陶瓷鉴定老专家讲，这件万历青花五彩梅瓶，古钱铺掌柜的买到手后，曾拍照分发给各大古玩铺，约请看货。老专家说，万历官窑青花五彩的工艺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相结合，五彩不一定是五种色彩，而是形容多彩的意思，绘画方法是用釉上黑彩和矾红勾勒画面轮廓，填以各色釉、上彩一次绘成，是我国瓷器多彩绘画发展成功的一个新阶段和新标志。明代官方对五彩色料控制较严，除王公、权贵能烧制五彩瓷器外，民间是少有的。清代末期，一件万历官窑五彩瓶就价值数万。而这件梅瓶足有三尺来高，带盖，完整无缺，彩色艳丽，岂止值万元。据说是被东四牌楼荣兴祥古玩铺同一家日本人开的古玩铺合伙买走了，是否已运往日本，则不详矣。

第五章

这一章写的是古董商和古玩铺老字号。

古董商留给人们的印象是神秘人物。民间传说，他们会“憋宝”，就是说他们能看出“宝贝”来。做古董商必须有好眼力，能鉴别古玩之真伪，知晓各类具体文物的历史、艺术和收藏价值。老古玩铺、文物市场是培育具有鉴赏各类文物专业知识人才的学校。这类“学校”自清代乾隆年间，金石学再度兴起以来，渐渐形成和增多。可是“学校”培养出的人才，却很少见诸文字记载。鉴赏文物古玩，似乎是文人学者之事，古董商却被排除在外。《清代野记》有“海王村人物”一节，记述几位老古董商的事迹，数笔勾勒而已。王冶秋《琉璃厂史话》引用《海王村人物》的两段话后，写道：“可惜这种专家，向不为人所重视，见于记载的太少了。而一些踩着这些垫脚石却得到盛名的人，反而博得头衔。旧社会以琉璃厂为例，也不知埋没掉多少人才？”

为不使人才埋没，笔者经十多年的调查采访，写出 115 位老古董商的传略，反映自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至北平解放前活跃在文物市场的古玩界前辈的真实面貌，并附有琉璃厂古玩铺老字号表，供读者参考。

一、风云人物——老古董商之传略

祝晋藩 字锡之，生卒年不详，清道咸同年间人，河北大

兴县（即北京）人。幼读诗书，擅长山水画，自称虞山派，摹仿王石谷的山水画可乱真，八股文却未作好，因而落榜经商。鉴定书画、金石等文物的眼力超群，清季一位学者写了本《清代野记》，在“海王村人物”篇中写道：“博古斋主人祝某，鉴赏为咸同第一，人皆推重之。”陈元禄《十二种兰亭精舍诗集·潞河渔唱》记载：“徐天池泼墨写生卷，长几三丈，花木蔬果之属，都十四种，纵横挥洒，靡不如意。翁苏斋阁部题七古长句，行草亦如画卷，奇气勃勃，从十指出，其结句曰：‘空山独立始大悟，世间无物非草书’。可想见下笔之狂纵矣。道光乙巳，潍县陈寿卿编修介祺得诸厂肆博古斋。”

可见，祝锡之在琉璃厂开博古斋是在道光乙巳年（1845）之前。他曾参与毛公鼎出土后的鉴定；考证鉴别顾炎武手抄《范永谟百苦吟》。他具有文人风度，并给古玩行业创立“学徒先立规矩”的办法，这种立规矩延续很长，从而形成琉璃厂古玩商的“谈吐文雅、举止得当，礼让待客，不卑不亢”的不同于一般商人之风范，至今为老古董商所怀念。

祝德酬 祝锡之之子，擅画花鸟。后人形容他画的花：“蕊瓣分明，风呼欲动，观之鼻感闻香”，画的鸟儿赛活的。光绪进士紫萼《樊天庐丛录》：“京师琉璃厂，画肆博古斋祝华封者，其人以孝闻，教子成立游泮，非寻常市井人”。老古玩行人说：祝华封应是祝华峰，即祝锡之，教子成立游泮，是说教子读书的意思（游泮：清科举制度，经州县考试录取为生员者就读于学宫，称游泮）。祝德酬是位生员，就读于学宫，亦未考取举人、进士，从而经营博古斋。同治年间博古斋由祝德酬的徒弟李镜湖经营。

李诚甫 生卒年不详，清代道咸同光年间人，山西襄汾县丁村附近人。李诚甫生在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附近，长大了做起古董生意，跑陕西买新出土铜器，带到北京来卖。道光二十

六年（1846）在北京巧遇克勤郡王，做上了王府的古铜生意，并为王府收藏的文物鉴别编目。道光末年（1850），由乡绅集资在琉璃厂开德宝斋，请克勤郡王书写匾额。

《清代野记》“海王村人物”中记载：“德宝主人李诚甫，亦山西太平人，肆始于咸丰季年，他千金资本耳，李乃受友人之托而设者，其规矩之严肃，出纳之不苟，三十年如一日，今则其肆已逾十万金矣。诚甫能鉴别古彝品甚精，潘文勤、王文敏所蓄，大半皆出其手。”

德宝斋第三代门人、89岁的毛润甫于1987年同笔者说：德宝斋开在道光末年，不是咸丰末年；李诚甫参与鉴定毛公鼎，同收藏毛公鼎的陈介祺有深交。陈介祺的万印楼、潘祖荫（即潘文勤）的攀古楼之所藏，很多经李诚甫之手。当时的金石学家赞赏他的眼力，是琉璃厂鉴定金石有声望的人。

刘振卿 山西襄汾人。幼读诗书，因会试未中转而经商。《海王村人物》中记载：“有若刘振卿者，山西太平县人，佣于德宝斋骨董肆，昼则应酬交易，夜则手一编，专攻金石之学，尝著化度寺碑图考，洋洋数千言，几使翁北平无从置喙，皆信而有征，非武断也。”《翁文公日记》记载：癸巳四月初七日（即1893年阴历四月初七）翁同龢到琉璃厂德宝斋，观赏《大观帖》，同刘振卿论帖写道：“与德宝主人刘姓，论口师塔铭三段式，伊画一图，较苏斋为详，此市人中风雅者也。”

刘振卿与李诚甫为同时代人，在德宝斋当二掌柜，咸丰九年曾主持经营德宝斋。潘祖荫收藏大孟鼎、大克鼎等三代铜器，他同李诚甫共同鉴定过，识金文，搜集秦汉印章，售给陈介祺。著有《化度寺碑图考》。

萧秉彝（？—1890），河北衡水人。道光年间萧秉彝的父亲在琉璃厂开信远斋卖酸梅汤。父亲盼子成龙，在琉璃厂文

明胡同请位老秀才教他读四书五经，以改变萧家门风。可是，他乡试未中，会试没希望，却吟诗作画，同书画打交道。同治元年（1862）在信远斋对门，开起论古斋藏画处。收藏、陈列宋元明清名人字画，吸引朝野的文人学士，前来参观浏览。论古斋被誉为“艺苑画廊”。他本人鉴赏书画水平高，被琉璃厂鉴定书画的行家里手所尊重，称他为同治年间看字画的一把手。

袁厚民（1838—1911），名以德，河北南宫县人。幼年喜爱书画，青年乡试未中。同治四年（1865）由郑王府出资，袁厚民在琉璃厂创办笔彩斋古玩铺。光绪十九年（1893），笔彩斋由袁厚民的徒弟陈东甫经营，他自己出资开德珍斋古玩铺。鉴别经营书画三十余年，颇有文采，眼力较佳，举止言谈有文人之风度。袁厚民善于培育门生，在他的门下，鉴别书画之人才辈出。清末民初北京古玩行业中鉴别书画之名家，多数出于笔彩斋门下，形成门系。

王德凤（1820—？），字梧罔，山西太谷人。读书未中，在太原做起古董生意，跑陕西和北京。同治六年（1867），由太谷老财出资在琉璃厂开英古斋文玩处，道光进士贺寿慈写匾，曾国藩书门楹。王梧罔鉴定鸡血、田黄印章眼力强，经营玉石印章、古玉、秦汉瓦砚、宋代以后的端砚和歙石砚、明清古墨、漆盒等文人用具较出名。

他创立“万金账”、吃“后承”的经营管理方法和一套“铺规”，使英古斋开了81年，出了玉石印章鉴定人才，成为鉴定玉石印章的权威商号。

孙虞臣（1846—1919），名述祖，河北衡水人。幼年来京在博古斋学徒，是祝德酬的徒弟，同治末年接营博古斋，光绪九年（1883）创办茹古斋。鉴定书画、铜、瓷器有眼力，并注意文物考证，善于交往应酬。他鉴定的前蜀（五代时的

十国之一，903—925）画家李焯《袁安卧雪图》、宋徽宗题写“唐李焯袁安卧雪图”，核桃大的瘦金体字，绢本立轴，长四尺二寸五（142厘米），乃国之珍宝，历代深藏在皇宫秘阁中。在孙虞臣和二掌柜赵佩斋的培育下，茹古斋人才出众。清末民初，琉璃厂鉴定书画的人士中有三位杰出人物，其中两位是茹古斋的门生——萧虎臣、张治平。

赵佩斋（1850—1935），名德习，河北省大兴（即北京）人。幼年贫寒，在琉璃厂宜古斋碑帖铺学徒。1884年，协助孙虞臣经营茹古斋，当了15年的二掌柜的。茹古斋的匾是翁同龢所书，翁与孙虞臣、赵佩斋交往多。赵嗜酒，翁同龢来店，赵刚喝完酒，二人交谈，赵酒后失言，说了小看潘祖荫的话。翁与潘是至友同僚，听后不语，命笔墨伺候，挥毫写下“举觞白服”。赵珍惜墨宝，刻制成匾额。光绪二十五年，赵佩斋领内务府总管文索的东，在琉璃厂开大观斋，将“举觞白服”匾额悬挂在厅堂上中。民初，美国博士福开森来访，询及这块匾额，赵向他释义说，“举觞白服”是告诉我酒后注意戒骄戒躁。

大观斋开张第二年，赶上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被洗劫一空。东家拿出300两银子，做安家费。赵用这300两重新起业，从东晓市买来破旧货，经整修出售。他善于鉴定古铜、瓷器、杂项类的文物，又会经营，三年后，大观斋恢复原样。

宣统元年，赵佩斋被选为京师第一任古玩商会会长，从此成为古玩行业的头面人物。他人缘好，津、沪、广、京、陕西、山东、山西等各地古董商都与之交往；门徒多，同茹古斋合称博古斋之后的一大门系。他的徒弟中有鉴定能力的多，在琉璃厂开古玩铺的多，清末民初以来，琉璃厂著名的古玩铺有十多家是他的徒弟开的。

黄兴甫（1855—1921），湖北云梦人。光绪初年，从湖

北来京参加会试，落榜不肯还乡，在琉璃厂办私塾学馆，并鉴别书画、青铜器，既教书又兼做些古玩生意。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设尊古斋古玩铺，以经营三代铜器为主，古玉、古陶、字画为辅。他以一个书生步入古董行列，注重金石考据。当时，黄兴甫受维新派思想影响，认为要维新，就要学外国，故将其侄儿送入京师同文馆学外语。1911年，尊古斋由黄伯川接营，成为琉璃厂鉴定经营金石的最大一家古玩铺。

白瑞斋（1845—？），北京人。琉璃厂一家老古玩铺（字号不详）的徒弟。幼年学徒时很机灵，善于言谈，钻研洋人喜爱的文物——雕漆、珐琅器。二十几岁时，同治年间在兴隆店租房开瑞记古玩店，专跑交民巷做洋庄生意。可说是同外国人做古董生意的第一人。交往的是外国使馆官员和住六国饭店的外国游客。白瑞斋胆大心细，敢做掘墓出土的古董生意。那时人们忌讳做冥器生意，认为死后到阴间，要遭群鬼攻击。白瑞斋不信这套，偷坟掘墓出土的东西，他敢卖给外国人。他跟法国驻清廷第三公使魏武达、英国汉文参赞周尔交上了买卖，买卖雕漆、珐琅（景泰蓝）器和古玉、杂项等文物。

光绪二十六年，白瑞斋就发了财，瑞记古玩店在法、英等国有名，法国人称“大瑞记”。随之做了法花陶瓷器、康熙五彩、孔雀绿等釉色彩瓷生意。古玩行人称呼他“白大爷”。白大爷谱儿大、阔气，到琉璃厂来坐专用马拉轿车，还有掌鞭的、跟班的；说话声高、语气壮。大观斋掌柜的赵佩斋是他的老友，但不买他的账，说他胆大妄为，到头来好不了。果真如此。白瑞斋发了财，花上万银元聘礼娶位妻妾，是当时经常演出的须生名票时慧宝的妹妹，随后又染上吸鸦片嗜好。民国十来年，他便穷落在街头。民国年间的大古董商岳彬曾受白瑞斋之指教，当白穷落街头时，岳彬已露出头角发财了，但对白瑞斋却无可奈何，也未曾接济过。

张楼村（？—1910），河北省顺义县高丽营人，赏古斋张舜清的侄子。幼年跟叔父学徒，三十来岁住东南园挟包做古董生意，从各家古玩铺搂来货，提溜着它走宅门串大户，张罗买主。

约在光绪二十四年前后，张楼村提溜着古玩包袱走到后海岸边，巧遇醇亲王回府，他被王爷发现，叫进王府，打开包给王爷看古玩。王爷说：破烂铜器，算什么古玩。叫管家拿出件东西给他开开眼。张楼村看了一件金胎珐琅彩盘，十分耀眼，便说：回禀王爷，古玩铺里见不到这类西洋珐琅彩，就是些破铜烂铁。王爷吩咐在琉璃厂开家古玩店，把王府珍藏展出来，让大伙儿都来开开眼。

由王府总管张明芳出面，醇王府在琉璃厂开赏奇斋，张楼村由王府拿来金胎珐琅彩绘洋美人盘，珍藏在柜上，不时给古玩行人开眼，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赏奇斋有件“洋古月轩”，经行家鉴定为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金胎珐琅彩。

李德宣 生卒年不详，咸丰至民国初年人，德宝斋创办人李诚甫之侄。光绪二十七年，李诚甫去世，李德宣经营德宝斋。《海王村人物》记载：“诚甫卒，其犹子德宣继之，亦如诚甫在日，犹蒸蒸日上也。”光绪二十六年，德宝斋以鉴定经营青铜器、碑碣、法帖、秦汉印章，李德宣对秦汉印章上的篆刻有研究，代陈介祺的后人出售“万印楼”的印章。培育出贾平甫、毛子恒、贾济川、刘廉泉、李健平、李欣木、毛润甫等鉴定金石、印章、书画、杂项等各类文物的行家里手。

李云从（1858 - 1894），河北故城人。幼年在宜古斋碑帖铺学徒。《海王村人物》记载：“有若李云从者，直隶故城人，幼习碑贾，长益肆力于考据，当光绪初年，各衙门派员恭送玉牒至盛京，盛伯羲侍郎、王濂生祭酒、端香斋尚书，皆在其中。一日，夜宿某站，盛与王纵论碑版，端询之，王奋然

曰：尔但知挟优饮酒耳，何足语此！端拍案曰：三年后再见！及归，遂访厂肆之精于碑版者，得之云从，朝夕讨论，购宋明拓本无数，又购碑碣又无数。其第一次所购，即郾林碑也，以五百金得之，罗列庭院，果不三年而遂负精鉴之名矣。云从为潘文勤所赏识，有所售，辄如数以偿，故云从得以挥霍十余年，终以贫死。”

古玩界多年传说着，两江总督端方拜李云从为师的故事，并以此教育后人说：“上大学不如在古玩铺学徒，大学毕业找不到职业，有的拉了洋车；在古玩铺学会鉴定古玩，两江总督都来拜师求教。”

李云从死于光绪二十年（1894），因过度挥霍贫困而亡，年仅36岁。1993年，一位读者给笔者来电话说，看了你写的书中有李云从，我去日本讲学，那里也有关于李云从的记载和传说，日本考古学家曾聘李云从去我国东北考察鉴定碑碣。

陈玉堂（？-约1912），河北宝坻县人。幼年在琉璃厂清韵阁学徒。清韵阁掌柜袁庆余善于做官场上的礼品古玩生意，这路古玩总称为“礼货”，什么时兴卖什么。光绪二十年前后，陈玉堂在东华门大街路北开了家聚源斋古玩店，买卖“礼货”。此时正时兴铁画，官员们装饰卧室、书房、客厅，都爱在白墙上挂铁画。铁画是用黑铁片制作出山水人物、花鸟鱼虫等各种美术图案，镂空雕刻，镶在红木框里，挂在白墙上，白地衬托，显示出画面的宁静沉着，因而受到欢迎。

聚源斋地处朝臣上下朝的路旁，朝臣下朝时有的便走进这家古玩店，换下朝服穿便装，浏览观光，陈玉堂伺候周到，结交了些朋友。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没过三年，陈玉堂发大财了。于是，古玩行里传说着，洋兵抢皇宫的珍宝被陈玉堂得到不少。后来才知道传说不准确。原来是八国联军侵入北

京，西太后带着光绪帝逃到西安去了，朝臣不再应班上朝，一些大官无事可做，有时到聚源斋去闲聊，陈玉堂殷勤招待伺候。1902年初，慈禧和光绪帝回返北京。光绪二十八年过完春节，大臣们才照例上早朝。一些大臣经常在聚源斋闲聊一年多，受陈玉堂的伺候，心里不落忍。内务府一位大臣将修缮被洋兵毁坏的外朝三殿、东西两庑各32间的工程，赏给陈玉堂去承包。内务府下账是100万两，给陈玉堂80万两。陈玉堂同修缮总头目协商好，50万两银子将全部工程干好，他自己白得30万两银子，陡然巨富！

陈玉堂是买卖“礼货”的古董商，看古玩的眼力很平常。有了钱，财大气粗，目不识“珠”，却做起珠宝生意，假货买了不少，砸在手里，出不了手，无事吸鸦片烟消愁。清政府垮台，民国成立，他很快就贫困潦倒，不义之财也都烟消云散了。

张春圃 生卒年不详，北京人。同治、光绪年间，在琉璃厂鉴定、修理古琴。《海王村人物》中记载说他“志节高尚，不慕富贵，不趋势利，贤于士大夫远矣！”古玩行人传说：琉璃厂鉴定、修理古琴的有张春圃和张莲舫。张春圃在光绪年间就去世了，张莲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才去世的。张莲舫开蕉叶山房鉴定、修理古琴，古玩行人称他“古琴张”。张春圃比张莲舫的名声高，他不但会鉴定、修理古琴，还是演奏高手。王公大臣、西太后都知道他，请他去教弹琴。肃王爷隆鋕爱听他的演奏。但他谢绝伺候王爷和西太后，受到后人的称美赞扬。

袁占鳌 字春江，生卒年不详，北京人。他在西琉璃厂路北开鉴古斋，是光绪十年（1884）。民国初年开张，在鉴古斋的旧址上开公慎书局了。袁春江是位山水画家，鉴赏书画有修养，收藏古画不少，装裱后开起古玩铺来了，结交书画界名

人，切磋书画笔法意境，他的画笔生辉了。他不善于经营，古玩铺关了，但他的山水画出名了。他仿王□画较多，不露真名。

呼益卿（约1857—1917），河北衡水人。他是论古斋老掌柜萧益卿的徒弟，老掌柜去世后又帮少掌柜萧勋臣干了12年，论古斋成为“艺苑画廊”，他的功劳不小。他还学会了裱画的好手艺。这份手艺是跟修古斋装裱字画高手刘澄瑞学的。除装裱还会摹绘填补，摹绘填补残缺的字画，能使墨迹色彩跟原字画一模一样，看不出破绽，可称之为“绝活”。

光绪二十八年（1902），呼益卿在东琉璃厂中间路北开彝古斋藏画处，买损伤残缺的旧字画，经加工装裱出售，赚钱不多。父子俩开一间门脸儿的小字号，维持生活。

内务府给皇上家管理古玩陈设的庆宽（也叫赵小山，满洲贵族，是内务府的官员，不是庆王爷，《郭良蕙看文物》书中误说他是庆王爷），在彝古斋装裱字画，呼益卿跟庆宽交上了买卖。庆宽花两千块钱从他手里买了十多幅清代名人字画，觉得便宜。呼益卿则是赚了一千五六百元，能置一顷地（百亩）、盖一套四合院大瓦房。

不久，呼益卿准备好十多幅字画，雇辆洋车，主动上门张罗庆宽买画。车还没到椿树胡同庆宽的府上，半路途中车打偏乘。呼益卿觉得是不祥之兆，坐车回来了，心里犯嘀咕，怕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上次卖给他的画中有假的，怕庆宽找他不答应。心神不安数日，跟儿子呼博符说：我这辈子就到这儿了，买卖不做了，我回家种地去，你好好看着这个摊子！不久，他儿子把彝古斋关了，到天津太康商场开字画铺去了。

计文卿（约1832—1900），名彬，山西人。传说他是德宝斋李诚甫的徒弟，鉴定青铜器、碑碣法帖有眼力。光绪十年前后，他在琉璃厂开寄观阁。寄观阁的字号有来历，“寄

观”二字本意是凭借外物进行观察；计文卿的用意则是“寄存观察”。寄存观察什么呢？原来有件铜爵杯，刻有“精忠报国”四字，大收藏家潘祖荫看是宋代岳祠祭器。计文卿看出不是宋代的，鉴定是明清仿的，便买来寄存观察，较量一下军机大臣、金石学家潘祖荫的眼力。潘祖荫于光绪十六年便去世了，计文卿于光绪二十六年也去世了，寄观阁由马瑞亭经营。这爵杯是宋代的还是明清仿制的，没结论，而且这路铜器在收藏上价值不高，只留给他的徒弟研究去。

计文卿看帖。一幅《晋王羲之临诸葛亮帖》，宋徽宗赵佶书写瘦金体字绫签，名为《远涉帖》；1851年，乾隆进士、金石学家翁方纲题签：“远涉帖辛亥秋翁方纲据宣和书谱题签”。看题、跋之字句，计文卿拿不定主意，是王羲之真迹，还是唐人双钩本？结果被红螺山人廉价买去。李葆恂《海王村所见书画录》中记载中有：“按此卷，余画奇计，以廉直得于厂肆寄观阁。”计文卿用“漏货”这件事教育他的徒弟，学文物鉴定，必须有文字和史学知识。他的徒弟康竹亭、赵鹤舫是清末民初鉴定金石之名人。

刘三戒（约1832—1900），河北献县人。咸丰五年（1855）在琉璃厂创立广文斋古钱铺，人称“古钱刘”。“三戒”这个名是位收藏古钱的翰林给起的。《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刘因而给儿子起名崇三。

刘崇三继承父业经营鉴定古钱，他的两个儿子文清、文铎也做古钱生意，祖孙三代经营广文斋古钱铺80年，1935年歇业。刘崇三鉴别布币、刀币、圆钱很有功底，受到古钱收藏家们的赞许；广文斋收藏古钱最丰，识别古钱的经验最多，是琉璃厂独一无二的权威商号。如《海王村人物》中所说：“有若

古泉刘者，父子皆以售古泉为业，其考据泉之种类，有出乎各家著录之外者；惜文理不通，不能著述，为可恨耳。”

白五楼（1856—1941），名凤翔，河北大兴（北京）人。幼年从师陈寅生秀才，习文练字，陈寅生刻铜墨盒开店，他跟着学刻铜。刻铜的手艺没学好，钻研书画和古玩杂项。光绪二十年（1894）帮孙虞臣经营茹古斋。民国元年，接管茹古斋至1941年他去世，茹古斋歇业。

白五楼有文采，看字画、瓷铜、杂项有眼力，善交际，人称“白五爷”。他收了十个徒弟，其中最小的徒弟萧福存，字允中，习书法、学绘画，拜在张大千门下，书画俱佳，他的工楷《洛神赋》被北京故宫博物院选入收藏，解放后曾任宁夏文史馆副馆长。

清末民初以来，白五楼在中外鉴赏收藏界中名声较高，文物历史和掌故知道的多，令中外人士佩服。1941年春他去世后举办“开吊”，亲友来吊唁者众多，其中有美国博士、考古学家福开森派女儿来祭奠白五楼，行跪拜礼，令人惊奇。而今，目睹过这一情景的古玩老行家、89岁的李卓卿，90岁的马宝山还在述说着。他们还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福开森被日军拘禁之前，将他收藏的文物捐献给北平故宫博物院。福开森的女儿在协和医院当院长。可见白五楼生前死后之声望。

萧勋臣（1856—1921），名维邦，河北衡水人。自幼生长在父亲开的论古斋古玩铺，读四书五经，练习书法，受其父指教，钻研古书画之鉴定。

光绪十五年（1889）十月，萧勋臣从粤东收藏界手中搜集宋元字画数百件，携来京城展出，盛况空前，引来当代书画家、收藏家、朝廷官员以及文人学士浏览观赏。李葆恂《海王村所见书画录》中《晋顾长康洛神图》“光绪己丑十一月十三日，红螺山人识”中有段写道：“余自夏六月到都，日游厂

肆，所见皆下驷，至十月，论古斋萧姓，自粤东得吴荷座、叶云谷、冯展云暨海山仙馆各家收藏名迹数百件，始得纵观；于是梁蕉林、高江村两家著录，所谓稀世之迹，并得寓目。惟恨客囊羞涩，空入宝山，因即古今■赫昔人所希靓者，记其数识印章，略仿江村销夏录体例，公诸艺林。”由此，论古斋被称为琉璃厂古书画第一家“艺苑画廊”，萧勋臣被誉为鉴赏书画第一人。

民国初年，萧勋臣不再经营论古斋，由他五弟萧云章经营。1921年萧勋臣去世，1924年萧云章也去世了，由云章的儿子萧少云经营论古斋至1947年前后（有人讲是1942年关的张）。

萧云章（？—1924），萧秉彝之五子，鉴定经营字画有独到，精于明清名人书画识别鉴定，民国初年至十三年，去苏州、常熟搜集字画较多。当时，落臣字款和有皇帝御题的字画吃香，落假款、写假御题的字画赚钱多，萧云章为了维护论古斋老字号的信誉，不做这路生意，为同行人所称道。

民国六年，北京政府财政次长、书画收藏家汪向叔，准备出手一批字画，打电话同萧云章商量，要现款五六万元。此时正赶上萧家弟兄分家。萧云章想拖他几天，分完家再做这号买卖，同时他估计，除论古斋外，没谁家能买得起这么多钱的字画。不料被韩少慈抢到手，又很快出手卖给徐世章一部分，赚回本钱，赢余不少。从此，琉璃厂鉴定经营字画的首户、京师艺苑画廊的论古斋，逐渐被裱画匠出身的韩少慈开的韵古斋所代替。论古斋渐渐衰落下去，但仍维持到解放前夕，实为不易。

孙秋颿（1859—1931），名桂徵，河北衡水人。孙虞臣的侄子。幼读诗书，14岁进京浮住在博古斋，准备应试，后改志经商，进清秘阁学徒。清秘阁南纸店以经营新字画、文

玩、文房用具、八宝印泥出名。同清廷六部衙门（吏、户、礼、刑、兵、工）和国子监等部门做办公用具生意，做官僚们的文玩字画买卖。孙秋^飘聪颖好学，和士大夫、文人学士交往，学了些文化和官场交往知识。特别是在与王懿荣、孙诒让的交往中，学到了些金石学知识，又经王懿荣介绍认识了端方，被端方所赏识。为端方搜集铜器碑帖，协助端方写《藏石记》。光绪二十七年（1901），陕西宝鸡出土一堂西周礼器共13件，其中有“铜禁”，引起金石学者注目。孙秋^飘为端方搜集到手，收藏多年。端方死后被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买去，收录在1935年伦敦展出的万国博览会的《中国美术图片和目录》中。

光绪二十九年，孙秋^飘在琉璃厂开式古斋，鉴定经营金石、印章、瓷器、杂项等文物，以鉴定三代青铜器见长。端方生前收藏毛公鼎，死后被他的后人抵押在俄国人办的道胜银行，美国有位收藏家想赎回买走，孙秋^飘向叶恭绰述说，请他收购免外流，叶恭绰护宝有功，毛公鼎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

孙秋^飘与端方结为“金兰之好”，古玩界多年流传着“古董商同两江总督拜把兄弟”的美谈。孙秋^飘曾担任北京古玩商会会长。1921年以后，他很少在琉璃厂露面，端方死后，他看破人生，后回衡水老家过田园生活，式古斋交给他徒弟经营。1931年去世。

郭世五（1868—1940），名葆昌，河北定兴县人。这个在乡下只念过“三本小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的人，成为国内外闻名的文物鉴赏、收藏家，他的一生富有传奇性。

约于光绪二十年前后，郭葆昌来北京，在西华门一家古玩铺学徒。光绪二十二年（1896），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

陆军时，在北京建府，从西华门这家古玩铺买去铁画四扇。郭世五送铁画进袁府，帮助布置客厅，被袁世凯看中，收下当勤务兵。袁世凯当大总统，郭世五历任袁府总管、总统的呈启官、总统府庶务司长，并被委任九江关监督，给袁世凯烧造“官窑”瓷器。

为官后的郭世五没断同古玩界交往，琉璃厂有三代古玩行人和他来往约有 57 年之久。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古玩行人。对老古董商总是尊重，对下一辈人总是要求严格，致使一些学徒不敢跟他说话。他收藏文物较多，大部分是官窑瓷器，同福开森合编《项子京瓷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官窑仿战国金银错古铜釉双螭耳圆壶这件罕见珍贵陶瓷艺术品，是郭世五捐赠的。

郭世五对瓷器有研究，对法帖、书画不大在行。可是当他得知 1924 年溥仪将《中秋帖》、《伯远帖》带出皇宫，抵押在日本银行，30 年代某年到期未赎时，他惟恐其失落在东洋，就花重金赎回。“两帖”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郭世五给袁世凯烧造“官窑”瓷器。据他本人同老古董商们讲：那是在 1913 年春节后至 1915 年中秋节期间。仿雍正粉彩烧制出“居仁堂”款识的瓷器，“觐斋”款的是给自己烧制的。“居仁堂”、“觐斋”款识的瓷器工艺精致，造型端庄，彩色艳而不浓，淡雅宜人，绘画细腻，纸绢气十足，艺术价值、收藏价值极高，烧制极少，可称瑰宝。“洪宪年制”款的瓷器，不是他烧制的。1940 年秋季，他在北平秦老胡同去世。

韩懿轩（1864—1929），名德盛，东昌府邹平县（今属山东）韩家坊人。韩懿三岁的那年（同治六年）邹平县饥荒，逃荒来到直隶琛州二官庄。父亲是位冬烘先生，教他读四书五经，习作八股文章，准备童生应试去考秀才。不料，13 岁时父亡，不得不随同乡进京谋生。在杨梅竹斜街钱锦盛纸铺学

徒，只管饭不给工钱，混个饱，年节给点赏钱就拉倒。光绪十年前后，韩懿轩不干纸行，住进琉璃厂观音阁买卖旧纸和旧字画，贫寒勤苦。金梁撰文、张伯英书写的《韩德盛墓志铭》中写道：“吃穿自己料理，吃粗食穿布衣，夜常赤裸，以洗衣待天明披而出。”勤劳一天，夜晚孤灯下临帖习字。十年临摹出奇迹，仿翁同龢、杨守敬可乱真，鉴定古书画有了好眼力。以文会友结交满洲贵族金息侯、学部侍郎宝熙、翰林袁励准、考古学者罗振玉等文人墨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琉璃厂开悦古斋文玩处，他鉴定经营字画23年而寿终，由其子继续经营到1956年公私合营。23年中他买卖些什么好字画，无人能说清。买古墨用秤称，两次收购清廷内阁档案大库流散出的文物，受逊帝溥仪赏赐五品朝服的相片今仍保留。

光绪末年，有一天韩懿轩在东兴酒缸喝酒，见一文士模样的中年人也在哪里喝，攀谈起来，两人对废除科举不满，话很投机，酒逢知己，韩请了客。客人白喝白吃不落忍，把他放在酒桌上的布袋往韩的眼前一推说：“我全送给你，这里头全是旧墨。”韩请酒缸掌柜用秤约，足有二斤多。韩懿轩从钱袋掏出十两银子说：“这点银子不成敬意，请收下改善生活，以后有机会见面咱们再喝！”

宣统二年（1910）秋季的一天，韩懿轩在东兴酒缸又碰上了那位酒友。酒友告诉他说：“宫里的内阁大库年久失修，又遭八国联军破坏，今年大库塌了一角，准备维修。库里的档案搬进文华殿里，剩些东西堆在外边要去烧，好好的东西烧了怪可惜了，不如换酒喝。”这次酒友带来些什么？传说是古旧纸张和朱墨。准备再次多购些文物时，酒友来报，宫里严加管理，一些纸张档案不准烧，叫张之洞交给学部图书馆（即后来的北京图书馆）了。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要筹办历史博物馆，于是，清廷内阁大库档案归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管，而筹备处隶属教育部。筹备得十年也没办起来，此时北洋政府财政奇窘，各部自筹款维持开支，教育部为筹发官员的薪金，将内阁大库所藏档案留下一部分，其余装了八千麻袋（有说九千麻袋）以四千银元代价卖给西单同懋增纸铺，准备化纸浆做还魂纸用。这件事由韩懿轩的那位酒友（原在筹备处工作）向他来报告，韩闻之立即找到金梁，金梁震惊，库藏档案将化为纸浆！他们找宝熙、罗振玉商量，花钱从同懋增买回八千麻袋库藏档案。由韩懿轩牵线，金梁、宝熙、罗振玉和同懋增掌柜程运增当面讲价，结果是两万三千元成交，由罗振玉出款、辟库书楼收藏。这批档案的下落如何？笔者将它写入《悦古斋与清廷内阁大库库藏》一文中。韩懿轩得到了些？民国十年，溥仪仍居宫中，金梁、宝熙将韩懿轩挽救库藏档案免于化浆之事，向逊帝溥仪禀奏，请赏给功名。溥仪赏赐韩懿轩亮蓝顶带花翎和朝服。韩懿轩穿戴整齐照了相。这张照片，韩懿轩的孙子韩魁连拿给笔者看了。魁连承其祖业收藏古字画，在艺术品公司当顾问，并举办古字画讲座，手中尚有库纸和古墨。而在库纸中夹带着叶恭绰考进士的试卷，早转还给了叶恭绰。至于传说其中夹带一些其他文物，尚未闻其详。

郭小臣（1850—1923），北京人。祖辈在京为官，官宦子弟，游手好闲，喜好斗蛐蛐玩古玩。家境衰落，无事可做，跑晓市做起古玩买卖。光绪十二年（1886）郭小臣在东四牌楼开天和斋古玩店，是位翰林给起的字号。为什么叫天和？翰林解释说：“和者交易也，《管子·问》：‘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天和乃天赐之和也。”为什么是天赐之和呢？有人则说，郭小臣买到俏货而开天和斋，乃天赐之和。天和斋一直开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郭小臣的儿子郭静安，子承父业，在

古玩行里干了 57 年，当过古玩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可他从来没见过，他爹买到什么俏货而开天和斋。而行里人却传说着，他买了幅唐代名画，有的讲是买了件殷商古玉或北魏鎏佛造像。

天和斋开张后主要做清廷官僚们互赠礼品的文物礼货，这路古玩属于杂项较多。老掌柜郭小臣同宫里管古玩陈设的内务府官员庆宽有深交。庆宽，字小山，又叫赵小山，镶黄旗满洲贵族，西太后的亲信，既给皇上管古玩，自己又搜集收藏古玩，民国之初，他是京城一大收藏家。郭小臣靠庆小山的介绍，做官员们的“礼货”生意不少，使他在古玩行里立住脚。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天和斋被洋兵抢光。郭小臣同大观斋掌柜赵佩斋一样，跑晓市买旧货，修整装饰后在门市上销售，渐渐恢复起来了。同时，跟赵佩斋有了交情。他们俩同龄。

清末民初，郭小臣带自己儿子郭宗、字静安，做古董生意。民国之初，郭静安在古玩商会窜货场买了件雍正官窑粉彩蝶恋花过枝碧桃，二尺四（80 厘米）直径的大盘子。这盘子的釉色洁白，盘内绘画着春意盎然的粉红色桃花，两只蝴蝶上下飞舞，碧桃的枝叶由盘外延伸到盘内，彩色柔艳，绘工细腻，十分诱人。两千大洋买到手。当给郭小臣看盘子时，他用一摸，盘上的彩色面有毛刺、扎手，仔细一看似新出窑的瓷器一样，郭小臣炸了！把儿子的拉过来，让他在盘子面来回划拉、上下摸，高声说：“这明摆着是件新东西，你怎么当雍正的买了？！眼瞎了也能摸出来，有钱没处花去啦！”儿子不服，老子要“砸浆”退货。

郭小臣领着儿子去找古玩商会老会长赵佩斋，赵佩斋同新会长孙秋骥商量，请调解委员会的人都来鉴定。最后老会长赵佩斋说：“这是件真正雍正官窑，不是新的。是内务府瓷器库

里的东西，新打包的。这么大的盘子，绘工彩头这么好，谁仿得了？！胎子釉子是雍正的，官仿民仿都仿不了！小臣！你老了，不如你儿子了。”从此，郭静安在古玩行里露出了头角。郭小臣将买卖交给儿子去做，自己在家养老，1923年去世。

丁济谦（1875—？），名福田，北京人。幼读私塾，聪颖过人，本想应试取得功名，但家道日衰，改弦更张，进博古斋学做古董商。二十来岁便自己夹包做古玩生意了，交游广，时常同官府人员打交道。

光绪二十六年，皇宫的古玩陈设大量被洋兵抢、内部偷而外流。光绪二十八年由内务府官员庆宽奉旨在隆福寺设点收购宫中外流文物。内务府总管文索心理不平衡，他找丁济谦在琉璃厂开延清堂也收买宫中流散的古玩陈设，其中官窑瓷器较多。自此，官窑瓷器开始在市场上见到和交易了，以前那是专为皇上家烧制的瓷器，臣民家不准有。丁济谦是第一位做官窑瓷器生意的人。他胆大心细，做事认真，看古玩有眼力。他同原在清廷为官、后在民国任要职的熊希龄、王士珍、梁士诒等文物收藏家有交往，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是他的好朋友。延清堂设在东琉璃厂中间路南，三间大门脸儿，很阔气，古玩陈设琳琅满目，特别是官窑瓷器，在市场上头次见到，更是吸引鉴赏、收藏界的朋友。

民国年间，熊希龄做热河都统时，热河行宫失盗。琉璃厂的丁济谦、韩少慈和庆宽的管家常惠川收购了些赃物。盗窃案被破，这三位购赃物者被押解到公堂。丁济谦在堂上公言：“我是做古玩买卖的，将本求利，有卖的我就买，东西不是我盗来的。行宫失盗，责在熊希龄，他是热河都统。”故而，他赢得了“铁嘴钢牙”之称誉。官司花些钱了案，丁济谦手中的康熙官窑豇豆红柳叶尊仍收藏在延清堂，直到延清堂关张。

丁济谦经营延清堂二十三年（自光绪二十七年筹建至民

国十三年)给东家赢利数十万银元,他个人所得不多,但作为鉴赏收藏官窑瓷器的第一家,在国内外出了名声。比利时一位银行家喜爱中国瓷器,特别是雍正官窑粉彩瓷器,丁济谦跟他交上了买卖,成了好朋友,受到这位银行家的器重。1924年比利时银行聘请丁济谦出任北京华比银行经理,他由古董商当上金融买办。延清堂由他的徒弟任雁亭经营。

贾腾云(1882—1948),河北束鹿县人。幼年在西华门一家古玩铺学徒,是郭世五的师弟。他初学文物时,学的是雕花旧硬木家具、铁画、古墨古观等杂项类的文物。后受师兄郭世五的影响,钻研瓷器。光绪二十六年前,他同琉璃厂笔彩斋的徒弟韩敬斋去广东做古瓷生意,跟广东两家财主陆府、郭府有了交往。光绪二十六年后,当他得知丁济谦领了内务府总管文索的东,开延清堂公开买卖官窑瓷器时,便向陆、郭两家财主说:“内务府官员能开古玩铺公开做官窑瓷器买卖,咱们平民不也是可以干吗?!只要你们两家出资,我准能给你们赚钱,这路买卖要抢在前头。”

光绪三十年(1905),陆郭二府出资两万银元,贾腾云选择在北京东四牌楼灯市口的东口开了家三间大门脸儿的荣兴祥古玩店,同琉璃厂的延清堂比高低,都鉴定经营官窑瓷器。当时的两万元可谓资本雄厚矣,贾腾云的师兄郭世五大力支持。此时袁世凯已是北洋军首领、军机大臣,外务部大臣,职位显赫,军权在握,他的总管郭世五随之威风,权势不小。有郭世五的权势撑腰,有广东老财的财力雄厚,贾腾云开荣兴祥不入古玩商会,货源不靠商会的窜货场,主要来自皇家、王公大臣抵押在银行的珍贵文物。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开盐业银行,贾腾云同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交往,从他手里买来不少溥仪抵押的官窑瓷器。

民国十年前,中外收藏家有“城里荣兴祥,城外(旧

时南城称城外)延清堂”之说，两家鉴定经营官窑瓷器的古玩铺“并驾齐驱”了！民国二十三年后，延清堂衰落、倒闭，荣兴祥独占京城官窑瓷器之鳌头。贾腾云鉴定官窑瓷器的眼力好，经营上有诀窍：一是“精”；二是“真”；三是随时可以退货。他所经营的官窑瓷器均属精品、珍品；不做仿制品和后挂彩瓷器生意；买主看不顺眼时或玩腻了时，可以按原价退货。这三点拢住了海内外顾客，使生意兴隆。

贾腾云经营荣兴祥41年，培养出看陶瓷有好眼力的徒弟有谢蕴轩、栾静波、吉迎东、谢君忱、司仁甫、刘尊三。1946年，他年老体衰，有眼力的徒弟都先后自己去开买卖，陆家、郭家两大财东，要求分货撤股，无可奈何，只可关张。东家、掌柜的、徒弟、伙计要分荣兴祥的货，请来古玩业同业公会(原商会)全体理事和理事长，做中间见证人，在分货协议书上签字。此时，有件乾隆作的紫檀大条案不好分了，贾腾云用这件条案向古玩商会交了41年的会费。

1948年，贾腾云在京去世。20年过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清理阶级队伍”、“除四旧”搞得天昏地暗时，贾腾云的后代人将一对乾隆官窑珐琅彩碗交公。后经司仁甫鉴定和证实，是詹远广技师后挂珐琅彩之杰作。在民国十年前后买到旧胎后，花四百银元请詹师傅做的活。贾腾云一直不愿出售，惟恐砸了荣兴祥的牌子，失掉买主的信任，只由贾腾云自己留着。岂料，此碗在他死后20年交了公。

万筱竹(1872—1950)，北京人，幼读诗书，爱好书画，生活所迫，进古玩铺学书画鉴定。光绪二十六年，帮赵佩斋经营大观斋三年，凭眼力在晓市和旧货铺搜集旧字画，请裱画铺装裱好出售。光绪二十九年同韩少慈、张里五等人结为“金兰之好”后，帮韩少慈经营韵古斋至民国十九年。韵古斋代替论古斋成为琉璃厂鉴定经营书画第一家，万筱竹的功劳不

小。这个期间，他经常下江南收集古代名人画，对晋、唐以来的名家书画有研究，特别是鉴赏明清书画名家的笔墨丹青的能力颇佳，受到清末民初时的书画家的赞赏，被古玩同行称为琉璃厂鉴定字画的杰出人物之首。他注重学习，同书画家、鉴赏收藏家的接触中细听他们对具体字画的评议，自己不断对名家书画分析揣摩和比较，心领神会名家笔墨。鉴定具体书画时细致稳重，不武断不专横，倾听别人的意见。他搜集名家字画上千幅，从未买过打眼货。

民国二十年，万筱竹自己在家中搜集鉴定字画，受到同行尊重，人们称呼他“万六爷”。40年代笔者见到万六爷时，他已白发银须，颇有学者风度，言谈话语不俗，走起路来迈四方步，像位学究。万六爷一生鉴定书画很多，经验丰富，可惜未留笔墨。

韩少慈（1874—1960），名士怀，河北三河县齐各庄人。少年家贫，13岁进京在琉璃厂火神庙里的萃文阁裱画铺学裱画手艺。只念过《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三本小书的人，经过刻苦自学，却能同状元、翰林、名流学者、书画鉴赏家、收藏家和著名书画家交朋友，谈诗论画，评议古代名画之笔法意境，可称是位传奇人物。笔者少年时曾常见七十余岁的韩少慈，他高大的身躯，长长的胳膊，走路迈四方步，长袍马褂，绅士派头；隆准凤目，戴着金丝边近视镜，花白长髯飘洒胸前，学者风度。有一次他见笔者看书，便指教说：“书是知识宝库，要好好读。我是无师自通，全靠《康熙字典》和《辞源》，边看书边查字典。我读的书摞起来比我还高。看书要注意眼睛，我这近视眼不是天生的，是在小油灯下看书看的。”从他的话里笔者知道他走的艰苦自学之路，使笔者受用终生。

光绪十二年，韩少慈学徒，光绪二十九年，在琉璃厂开韵古

斋古玩铺，其间 17 年他是边学手艺边读书，靠的是毅力和追求。他装裱字画又研究字画，向书画收藏家借《宣和画谱》、《画史会要》等书阅读；向在古玩铺鉴定经营字画的人请教，和他们交朋友。他将自己长年积蓄的百幅字画和千块银元拿出来，又向朋友立下字据借了 3 000 元，开了韵古斋，请同治状元陆润庠写的匾。开始时是天不亮就跑晓市搜集破旧字画，白天开张营业，晚上做装裱手艺。他不但会装裱，还会补修、填绘，使破旧字画恢复原样，看不出破绽。在有皇上的年月，韵古斋在琉璃厂开了八年，给翁同龢、庄蕴宽、袁励准、宝熙、金梁、邵章、郑孝胥、傅增湘、林长民、朱幼平、汪大燮、易培基、汪向叔等名人学者裱过字画，做他们的字画生意，小古玩铺逐渐发展起来了。民国六年，韵古斋在琉璃厂成了殷实户，安上了电话，那时安电话的店铺是极少数。

清末民初时，韩少慈同冯公度结为好友，与徐世昌也有交往，他们都是书法界的名流。还跟收藏字画较多的汪向叔有来往。民国六年，汪向叔因赌博输钱，急需用款，欲将其《麓云楼书画记》中记载的珍贵字画全都卖掉，还清赌债。要有六万元才能买到手。千元的买卖他随时可做，上万元他手头可没有。这么多钱哪里去筹措？若犹豫不决，则坐失良机。韩少慈先同汪向叔商量，三天之内先交两万元，一个月内六万元全部奉上如何？汪答应了。他很快跑到北京电灯公司，找总经理冯公度，向他暂借两万元，月内还清。经冯公度介绍，津浦路铁路局长徐世章登韵古斋门，求韩少慈售给他汪向叔之所藏。韩给他看汪向叔所藏书画的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的珍贵稀有名画未露，并公开说是六万元买汪向叔的。徐世章给了八万元买走。仅用十天时间，赚了一批稀有珍贵名画和两万现洋，韵古斋一跃而居论古斋之上，数年后，韩少慈成为琉璃厂古玩行第二大财主（黄伯川是第一大财主）。

韩少慈经营韵古斋直到 1956 年加入公私合营，长达 53 年之久。其间买了幅仿王□山水立轴和一对仿宋钧窑圆笔洗，是打眼货，合营时都如实说了。有一幅宋代大画家李伯时的画，是同聚珍斋珠宝店伙的货，失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时的香港，他没有说。1960 年，他在北京安然去世，时年 86 岁。他创办的韵古斋这家老字号保留到了今天。

韩敬斋（1875—？），名德铭，河北武邑县人。幼年在笔彩斋学徒。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琉璃厂开铭珍斋古玩铺，鉴定字画和瓷器很有眼力，在行里和收藏界较有名气。他是琉璃厂古董商去广州、香港、澳门做生意的第一人，民国初年经常去，在粤、港、澳颇有名气。香港的冯已千、澳门的萧瀛洲、北京的沈吉甫三大著名收藏家都同韩敬斋交朋友，请他帮助鉴定字画或瓷器。他还同张作霖元帅府秘书长任毓林结为好友。

韩敬斋看明清官窑瓷器在琉璃厂数得着，眼力一流，都鉴定过什么官窑器，已无从查对了。但他鉴定过的范宽《雪景寒林图》、马远《夜山图》、黄公望《秋山图》和宋钧窑洗子、哥窑瓶，曾轰动港、澳、粤的古董爱好者和北京同行。

1936 年，韩敬斋同弟弟分家，将铭珍斋分给了弟弟，自己分得一所大宅院，住进去过清闲生活，不在古玩界抛头露面了，不再鉴定、经营古玩了。他的弟弟不懂古玩，铭珍斋从衰落而倒闭。韩敬斋的徒弟徐震伯在三四十年代同他的师傅一样，在看字画和瓷器上，亦属一流人物。

卢钦斋 字芹斋，生卒年不详，浙江吴兴人。中国第一位、最大的文物出口商。约于 1890 年，他去了法国巴黎，娶了位法国夫人，生了个女儿嫁给法国人杜伯斯。杜伯斯长期在中国工作，是位中国通，经常进琉璃厂古玩铺，大部分古玩行人没见过卢钦斋，却跟杜伯斯很熟。笔者少年时多次见过这位

先生，大家都说他在法国府（法国驻中国使馆）工作，给他岳父买古玩。老古玩商中传说着卢钦斋的故事，整理成文，留作史料。

在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支持帮助下，卢钦斋同上海古董商吴启周合作，于1911年在巴黎、上海开办卢吴公司，可称是我国私人开办最早最大经营古董的外贸公司。1911年至1926年，卢钦斋联合上海吴启周、苏州缪锡华、北京祝续斋四人合作出口文物，没打出卢吴公司的招牌。祝续斋从北京进货，缪锡华从苏杭进货，集中在上海，统由吴启周往巴黎寄运。那时称法国庄的买卖，法国人喜爱康熙五彩、三彩，法华釉的瓷陶器，抹红、茄皮紫、孔雀绿等釉色的古瓷，还有石雕、古玉、唐三彩陶器和三代青铜器等文物。他们往巴黎运去的是些什么具体古玩文物，现在没人能说出一两件来了，都说出口很多，他们赚钱不少，其中也有假货。

一次世界大战后，卢钦斋由巴黎迁往纽约，吴启周、缪锡华、祝续斋继续给他由国内进货。主要出口了三代青铜器、唐三彩陶器、宋代钧窑、汝窑等五大名窑瓷器，木雕石刻、北魏鎏金造像、精美玉雕等文物。出口了很多珍贵文物，卢钦斋在美国考古界、收藏界出了名，入了美国籍，成为美国著名文物收藏家。

国内北伐战争将结束时，卢钦斋和吴启周商议将缪锡华、祝续斋分出去，四人散伙，由他俩重新组合，这时才将卢吴公司的牌子公开亮出来了。缪锡华分得的钱在江南开办织袜工厂，祝续斋分的钱在武清县老家买地盖房子、开粮行、办烧锅（即酿酒厂），在北京用十万大洋将延清堂全部货底倒到手，送小儿出国去法国留洋，还开了家古玩铺叫大吉山房。当时，人们估计，祝续斋起码分得三五十万大洋，卢钦斋已是百万富翁了。

自 1926 年至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卢钦斋、吴启周合办的卢吴公司大量出口中国文物。吴启周亲自到北京、开封和各大古董商联系，他的外甥叶叔重从法国留学回来后，成了他的助手，他将女儿嫁给叶叔重。叶叔重，绰号叶三，同北京的古玩行玉器行都有来往，开封、洛阳也有他的朋友。这一时期，殷墟出土文物，通过开封蔺仕庵，北京岳彬、黄伯川、倪云书、陈鉴堂等吃金石的大古董商之手，不知有多少珍贵商周铜器、古玉、陶片、石雕木刻等等落到叶三之手，叶三将多少国宝运去了美国？！惜哉！至今未见有何记录。

古铜张的徒弟王德山说，20 世纪 30 年代初，他曾被通古斋乔友声找去，给“彰德府”出土的八件青铜大编钟除锈。最大的一件有“八仙桌”那么大，高有一米左右。除锈处理后运往上海，由叶三将一大批国宝在上海装船，估计这八件大编钟也在船中。在运往美国途中海上遇难沉船。后有叶三“盗宝船”沉没之传说。

古玩老行家们讲：卢钦斋经营中国文物五十余年，经他手卖给外国人的商周青铜器不止千件。又说：陈梦家编著《美国掠夺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中收集 845 件铜器，其中有 312 件是经卢钦斋之手出去的。卢钦斋在纽约的东 57 街住，上海吴启周、叶叔重开的古玩铺字号叫“禹贡”。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卢吴公司在出口中国文物上形成垄断，跟他们搞不好关系，东西运到美国也卖不出好价钱。抗日战争胜利后，跟卢钦斋、吴启周合作过的祝续斋，年老体衰，生活困难。跟吴启周在上海同做古玩生意的李文清，要他儿子李凌云去趟美国，请祝续斋给进点货带走。祝续斋靠老关系，从彰德府古董商手中得到新出土的商代兵器，造型、纹饰、锈色都好，价钱也高。那时出土的青铜器中是礼器多、乐器少、兵器更少，物以稀为贵，故而价格高。这件事被吴启周、叶三

知道了。李凌云还没到美国，叶三的电报就过去了。卢钦斋在纽约举行宴会，招待美国的鉴赏收藏家。在宴会上他说：“最近，北京从河南运到很多新出土的青铜兵器，其中有真有假，也有加工修复的，不算稀奇珍贵文物。”他是美国鉴赏收藏界的权威人物，一语千钧。当李凌云抵达纽约，请几位美国鉴赏收藏家过目商代兵器时，人人表示冷漠，不想要这路货。李凌云莫名其妙，这么好的铜器怎没人要？！在纽约居住开销大，不得不忍痛便宜地卖给了美国的一位收藏家，一次美国之行便破了产！

叶叔重在上海解放后，因向美国走私文物被捕判刑，发往大西北，后死在西北。

程启元（1876—？），名全仁，河北冀县人。幼年读四书，家贫进琉璃厂古玩铺学徒，帮张楼村开赏奇斋。张楼村去世，民国元年由他经营赏奇斋至民国十二年。他的眼力如何，做过些什么古玩生意，现在没人能说出来了，都知道赏奇斋做古玩生意十分秘密，还说：程启元赚钱不向东家交账，拿钱会同龙泉寺主持僧道创立孤儿院，收养孤儿三四十个，冬季办粥场舍粥。救济一些穷人，落个“程善人”美名。

民国之初，韵珍斋崇佑之从东晓市买了块砚台，是贼偷来的、犯了案，警察传崇佑之对案。崇打发徒弟把砚台给警察送去，不要了，东西交出去算了！徒弟刚出门碰上程善人了，程说：不用拿砚台，我去跟他们说。他一出头，事儿都了了。打那以后，谁家出点这路事儿，就去找程启元。他跟官面上去说，该送礼的送点礼，该打点差事的打点打点，买来贼偷赃物，也就不吃官司了。程启元去世后，同行还怀念他。赏奇斋由杨润斋经营，1942年歇业。

黄伯川（1880—1952），名■，湖北云梦人。幼年丧父，由其叔父黄兴甫抚养。来京先读四书五经，后进同文馆

（光绪二十七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学习八年，成绩优秀，通晓德、英、法三国语言文字。毕业后入德国奇罗佛洋行当译员。带着外国人进古玩铺，帮叔父经营尊古斋，学文物鉴定。宣统二年（1910）接替黄兴甫经营尊古斋，是古董商中有大学毕业文凭、精通外语的第一人。他做外国人的古玩生意，主要青铜器、碑碣石刻、古陶古玉等考古界所搜集之文物，具体文物，今已无人能说出。有件商代青铜山尊卖给日本大古董商老山中的事，他的徒弟王金声还记得清：民国十年，宝熙受硯贝子之托，拿件商代青铜小尊求售，硯贝子等钱用，五千元就出手。正赶上老山中来尊古斋，黄伯川拿出山尊请他鉴赏，于是俩人论起山尊来了。当山中得知这山尊是硯贝子所藏，就花了两万元买走了。山中是国际古董、珠宝商，他转手卖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则是五万美元了。

光绪二十五年（1899），河南安阳殷墟出现殷商占卦用的甲骨刻辞时，黄伯川才19岁，在尊古斋用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同甲骨文做过比较，发现近似。那时，端方、宝熙等清廷侍郎、尚书大官，时常来尊古斋同黄兴甫交往。罗振玉在学部当参事，是位小官，也来尊古斋，黄兴甫不与相见，黄伯川跟他聊。罗比黄伯川大十四五岁，一位是老学究，一位是精通外语的洋学生，他们俩人交了朋友。王金声老先生说：罗振玉的《殷墟书契》问世，黄伯川提供考证资料，他们俩交换拓片不少。自这时候起，黄伯川注意积累文物拓片资料，为了后来编撰考古书籍奠定基础。

黄伯川经营尊古斋、通古斋（由他的徒弟乔友声，后由他的儿子黄镜涵出面经营）长达四十余年，直到1952年他去世。他发了大财，人称“黄百万”；他留下112卷考古资料，是古玩行人中编撰书籍最多者。

有篇《北京文物商人》的文章，估计是北京解放后文化人写的，将经营书籍者亦列入文物商。此文专写“琉璃厂通古斋黄浚，号百川，专营铜器，对于商彝周鼎，秦权汉量，历代镜鉴印玺等，颇能辨别，并将其所得佳品绘图立说，印出《邲中片羽》等书，炫耀收藏。盖即章实斋所谓横通一流人物。”何谓横通？尹知章注：“横通，谓从旁而通也。”其实，黄伯川鉴定、经营文物，是他的家传。黄家三代人鉴定经营金石，黄兴甫、黄伯川、黄镜涵，都同当时的金石学者、考古学家交往，黄伯川亦可说是位金石学者。黄镜涵在通古斋 1956 年加入公私合营后，被中国历史博物馆聘为顾问。若将“旁通”解释为“广泛通晓”则符合实际。至于文中提及，河南出土一批铜器，黄伯川还不知道，行里人怕黄知而买走。一个夜晚，黄从东庠平澡塘子出来，碰上这位同行。这位同行人说这批铜器我们买了，给您安排一股，黄漫应之。后来，东西卖出去了，这位同行给黄送去千余金为黄应得。这件事，原是黄伯川的徒弟乔友声在北京解放后被聘到故宫博物院青铜器鉴定组工作时，闲聊所说。他说：“人要是走运时，城墙都挡不住。”以此为话题，讲了他师傅的这件事。其实，老古玩行早有“伙货”的一套规矩，见货不见货都可伙，只凭一句话。说声“这东西我伙啦！”或别人问伙不伙，对方一点头就伙了。伙货入股，赚钱就有入股的一份。可是，外行人一听乔友声讲这段故事，就觉得黄伯川财大气粗，蔑视同行，甚至以财力压别人。

康竹亭（？—1933 年），河北涿县人。幼年在寄观阁学徒，计文卿的徒弟。民国元年在琉璃厂开晋雅斋古玩铺，鉴定、经营青铜器为主。当时，他是琉璃厂看铜器的出名人物，认识些钟鼎文（金文），能辨别真假锈色，看铜质分辨朝代，对三代铜器能断代，在古董商中是少有的。他开的晋雅斋于

1932 年因他患眼病失明而关闭，他于 1933 年去世。他生前鉴定、经营的一些铜器，现已无人能说出一件具体的东西，只知大古董商岳彬对他看铜器的眼力特别钦佩，美国的福开森对康竹亭鉴定文物的眼力也是倍加赞赏的。

赵鹤舫（1881—1936），名福龄，北京广安门外人。父在广安门外菜园子种菜，盼子成龙，供他读书。不料光绪二十一年（1895）遭场雹灾，不得不送子到寄观阁古玩铺去学徒。他是计文卿的徒弟，康竹亭的师弟。因为他比师兄弟们读的书多，写一手好毛笔字，人又长得体面，甚受师傅的器重，学两年徒就管账当先生，还外出张罗买主。

赵鹤舫在张罗买主中认识位老翰林，这位翰林当了侍郎，有妻有妾，就是自己年老，老夫少妾，如同父女一样。老翰林没事愿意和年轻的赵鹤舫闲聊，因为赵能搭上他的腔，又能说会道，知晓一些历史典故，老翰林说话爱转文，他能听懂还能答出下句来了。小伙儿长得帅，老头儿也喜爱，所以他们来往多了，家眷也不避讳了。那时，大家妇女不抛头露面到街市买东西，往往由赵鹤舫代劳。老古董商说：赵鹤舫在某翰林家成了“碎催”（打杂的，使唤小子）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做了学部侍郎的老翰林要告老还乡回上海，这消息是从侍郎的如夫人口中得到，她约赵鹤舫一同去上海，在上海开家古玩铺。在这位如夫人主持下，向一些官僚的姨太太们集资，凑了些钱，租到上海大世界附近的街面门市一间门脸儿，开了延古斋古玩店。赵鹤舫经常和官僚的姨太太们打交道，买卖虽然做得不错，但他不敢久留。因为他听说，有的梨园行人同官僚的姨太太们过从密切而遭杀害，艺毁身亡，冤沉海底。所以，他在宣统末年便不辞而别，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在琉璃厂开延古斋。

在北京，赵鹤舫同袁克文交往上了。行里人说，他跟袁克

文拜了把兄弟。借袁家花园需要文物做点缀来说事，于1914年将陕西醴泉东北九萁山唐太宗昭陵前的昭陵六骏浮雕中的拳毛騧、飒露紫二块骏马浮雕盗走，卖给了美国。这两件国宝现陈放在美国宾州费城大学博物馆。从此，他发了财，延古斋扩大了门面，扩充营业，鉴定、经营青铜器、古陶器、冥器和木雕等文物。民国四年，赵鹤舫便不出头经营延古斋，由他表弟陈养泉出头露面做买卖，他养尊处优，过富翁生活，直到1936年他去世。他盗卖国宝引起老古玩界人士极大不满，当时的古玩商会会长赵佩斋惹不起他，他后面有袁世凯的儿子撑腰，便将此事告诉徒弟们记住，有朝一日向社会公布。

1986年8月16日和23日美国出版《美洲时报周刊》上连续发表文章说：拳毛騧、飒露紫是“文化大革命”中从大陆盗运走的。笔者向赵佩斋的徒弟88岁的范岐周师叔询问，他说出了上述实情。

萧虎臣（1881—1960），名文炳，河北衡水县人。幼年来京入琉璃厂茹古斋学徒，是孙虞臣、赵佩斋的徒弟。学徒时喜爱字画，练习书法绘画，看《画史会要》，不断琢磨古画之奥妙。光绪年间，他从厂甸画棚买到戴醇士侍郎仿董源大轴。萧虎臣知道戴醇士名熙，是道光进士、兵部侍郎，他的诗书画很有名于道、咸、同、光年间，人称他的画入神品。这幅仿董原山水画，云峰树石，元气浑灞，尤妙在布局整齐严谨，无一破碎之笔，是幅佳作。茹古斋收藏这幅画，吸引书画收藏家和当时书画家们的前来鉴赏，萧虎臣的名声出去了。

清末民初的著名画家、篆刻家，湖社创始人金城，字拱北，是当代的名家，他的山水花卉均佳，善临摹，几能乱真，但萧虎臣一眼便能辨认。金拱北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指导日本书画界改变其书画宗旨，使之与中国书画相同相近。1910年在金拱北提议下，从书画家手中集资九千元，请萧虎臣为经

理，在琉璃厂开博韞斋古玩铺。萧虎臣“让贤”推荐他的师弟杨伯衡为经理，自己为副经理。

博韞斋在筹备中尚未开张，萧虎臣和杨伯衡便将东家的投资九千元赚了出来。时值清廷倒台、新旧交替之际，新权贵有的不懂书画，却有雅兴，他们在金拱北推荐下，到琉璃厂找萧虎臣帮助鉴别和购买，生意兴隆起来。

萧虎臣鉴别明代画家仇英、唐寅、沈周、文徵明、董其昌之真迹和清代画家王鉴、王□、王时敏、王原祁之佳作是独具慧眼；对南宋画家夏圭、马远、李唐、刘松年之笔墨丹青，亦能鉴别真伪。1935年，英国收藏家戴维德通过叶叔重拜托萧虎臣从溥心畲手中买走唐代画家韩幹《照夜白图》。戴维德购得中国唐代名画后，借中山公园董事会所在地——园内来今西轩后面的四合院，展出韩幹《照夜白图》，门票一银元，京城书画爱好者和古玩、珠宝行业人士前去观赏者不断。半个月后，戴维德将画卷带到英国。据最近消息说，此画收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著名鉴定家徐邦达曾前去观赏鉴定过。

萧虎臣同张大千、溥心畲诸多著名书画家广交朋友，大家公认他鉴别书画的眼力超凡，书画掌故知之甚多，可惜的是他未留下笔墨。1945年，博韞斋关张后，他回衡水农村老家过田园生活。日子越来越不好过，1960年，国内粮食紧张，他饥饿而亡。

杨伯衡（1883—1960），名秉钧，河北衡水县人。幼年在茹古斋学徒，钻研瓷、铜、杂项等文物，颇有眼力，善于交际、运筹。所以，金拱北请其师兄萧虎臣为博韞斋经理，萧让他主持博韞斋。他在琉璃厂主持经营博韞斋从民国元年至三十四年。政府南迁前的16年是兴旺阶段，为东家赚了四五十万元。北伐胜利至抗日胜利阶段，日渐衰落下来，他未能南下开辟销路，守在北平张罗老买主，老买主也成了卖主。字画卖不

出去，瓷铜杂项等文物在北平也同样少有人要。博韞斋在1945年倒闭了。

杨伯衡在琉璃厂给同行留下印象较深的三件事，至今还在传说着：

民国之初，有的军阀权贵不懂古玩字画，却装懂，古董商只能顺着他说，他说真就真，说假就假，不能反驳。落臣字款、有御题的字画，新的权贵喜欢要，认为是皇家的东西、错不了。军阀、官僚在北京安家建府，专找这路字画布置客厅、书房。而这路字画不多，一买就没了，有的军阀则限期让古董商给买到。杨伯衡说这样有权势的人，是在“逼良为娼”，只可做假了。所以，遇上这路人就卖他假货。落假款、写假御题从此时兴起来。但对有眼力、有文物知识的买主，不可用假货骗他。但看真看假只凭双方眼力，买卖古玩是眼力竞赛也是智力竞赛，做古玩生意的人要具备眼力和智力，傻瓜干不了这一行。

1912年，杨伯衡在同行介绍从太监手中买来对宋钧窑鸡心杯，原是皇宫里的陈设，引起中外收藏界、古玩界的关注。美国著名收藏家福开森前来求售，杨伯衡不卖给他。原因是这位美国客人曾从杨伯衡手中买了康熙郎窑瓶，退回来了，说是用假货骗他，并声言不准杨再进他的家门。这次他听说杨伯衡手中有宋钧窑鸡心杯，反而自己登人家的门来了。杨伯衡不提往事，但很有礼貌地谢绝了。这对宋钧窑鸡心杯卖给了袁励准，之后由韩慎先收藏。天津解放后，韩慎先将这对鸡心杯捐献给天津艺术博物馆，现在该馆收藏。

1921年，杨伯衡卖给日本古董商茧山一件宋代龙泉窑香炉。茧山将龙泉炉带回东京，将他开的会仙堂古玩店的字号改为龙泉堂。1923年东京发生大地震，茧山在地动山摇、举步维艰中抱着龙泉炉跑出震区。1926年春节，茧山来北京，向

杨伯衡述说实情，两人结为好友，“日本同行茧山爱中国文物胜于自家生命”在北京老古玩界中传颂。

笔者幼年时见过杨伯衡，印象中他是位颇有风度的、中等身材、留着两撇胡须的长者。听他说过学古玩鉴定要下苦功夫，要多看多听，新旧、真假经常比较，才能看出门道。博韞斋开张后，他回衡水老家，有时还来北京，后日渐贫困了。他给东家赚过那么多钱，到头来他却饥饿而亡。

张治平（1883—1963），名钧，河北武清县人。父张子青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琉璃厂开富润轩古玩铺，鉴定文玩书画很有眼力，张治平自幼受到薰陶，喜爱书画，幼读私塾，聪颖过人，可望参加科举成名。光绪二十四年改变科举办法，废止八股（遭到反对，又复八股取士之制。1905年始以慈禧太后诏废除科举）时，父亲则说：“商人之子恒为商”，送他进茹古斋学徒，受业于孙虞臣、赵佩斋门下，钻研鉴别书画和练习书法。他长年临帖，先临柳公权，再临赵孟頫，先“柳”后“赵”，柳赵揉合一体，自成一家。他的字是柔中有刚，刚柔相济，圆润紧凑，另创一格。他看字画仔细认真。他说，要学会看字画，自己先要能写会画，才懂笔法；看画时俨若置身画境，方能品出优劣。鉴别古代书画，先要知道每位书画家的特色、笔法，还要了解纸张、墨色、印章、题、跋，全面看、综合看，才能看出真假。

1923年至1945年开证古精舍，鉴定经营古书画，同当代书画家交往，以谦逊稳重而闻名。鉴定经营过的古代名家书画很多，今已无人能说出一二了。他是一师一徒二人一起生活工作，薛士和出师后，又来位萧秉志跟他学徒，从来都是二人开证古精舍。

张治平在琉璃厂鉴定字画的名声高，没买过打眼货，也不卖假货。他没发过财，以鉴定字画维持生活；书法虽好，却没

卖过字。他对唐、宋著名书画家有研究，特别是对明代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大家和清代的“四王”：王□、王鉴、王时敏、王原祁以及吴历、恽寿平等著名书画家的作品有较深的研究，鉴别真赝的眼力最强，惜未见到他的有关书画鉴定的文字。

20 世纪 40 年代时的张治平，走在路上往往在腋下夹着蓝布包，笔者年幼好奇，问过张大伯包里是什么，他打开给笔者看，原来是书和笔。张治平布衣布袜布鞋，书卷气十足，像位教书的老先生。解放后他生活在北京，安安稳稳度过一生。

周杰臣（1885—？），名俊普，河北冀县人。幼年进茹古斋学徒，是孙虞臣、赵佩斋的徒弟。15 岁学徒 25 岁开鉴古斋。十年的时间，他钻研字画和缂丝，有一定的成就。在茹古斋时，他认识举人出身、任北京外城警察总厅厅丞、内城警察总监的朱启铃。朱喜爱、收藏缂丝，著有《丝绣录》。周杰臣帮他搜集破旧缂丝，经修补而后收藏，现仅知一幅油渍破裂、陈旧不堪的花鸟缂丝，只能看出花鸟迹象，其余之处则是黑糊糊一片。周从东晓市买到手才十几块钱，请竹实斋崔竹亭修复。崔的手艺高超，“妙手回春”，经修后，这幅缂丝是画面完整无缺，色泽典雅古朴，鸟羽支腾，花的瓣和蕊十分鲜明，看不出修补之处，配上雕花硬木框，给朱启铃送去鉴赏。朱鉴定为明代时苏州某名家织作，花 800 元买走。还有一对鹭鸶卧莲蓝地粉色缂丝挂屏，是乾隆时的作品，保存良好，原系山东黄县的“丁百万”所收藏，经周杰臣手卖给了朱启铃。经过给朱启铃搜集宋元明清历代缂丝，周杰臣成为琉璃厂鉴定缂丝的权威人物，而朱启铃则是我国收藏缂丝最多者。历经沧桑，他所收藏已转入辽宁博物馆保藏，但愿保管无恙。

周杰臣同光绪翰林熊希龄交往，熊收藏的郎世宁和唐岱给乾隆皇帝画的《春原阅骏图》，是经周杰臣得到手的。这幅画

展现出山川原野春色，百马腾跃，一骑马人年不及四十，隆准广额，疏眉秀目，新须朗然，耳巨而耸，丰裁峻整；旁立无须男子，甚恭谨，骑者微顾之。卷尾落款：“臣郎世宁、唐岱恭绘。乾隆甲子。”推算为乾隆九年所作，堪称稀见之珍品杰作，用现在话说是一级文物，是国宝了。

周杰臣卖给日本佛教界人士真、假雍正乾隆官窑瓷佛像，传说卖了很多。还有他同雅文斋、瑞增祥合伙做宋钧窑笔洗生意；卖给胡伯平一件康熙官窑釉下三彩松石笔筒，事先没跟冯耿光说，惹出冯要掀掉鉴古斋匾等故事，传说至今。

关子光（1883—1946），名耀先，山西汾城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进京在琉璃厂英古斋学徒。英古斋是同治六年（1867）开张的，由山西汾城人王梧罔创办，到民国三十七年歇业，在琉璃厂开了81年。这家古玩铺只收襄陵、汾城一带的人学徒。老掌柜的去世或告老还乡，则由店内年长、在店内时间长的人继任，不论鉴定、经营古玩的能力如何，俗话说：“多年媳妇熬成婆”、“论资排辈”的接替制。关子光经营英古斋是从1911年至1945年，共34年，是时间最长的一位。论眼力他较为一般，主要能力是善于用人，坚守店铺的老规矩；除襄汾人外一律不用；所有店内人三年回一趟老家，在家住半年，半年中自己可以做生意，赚钱归自己；告老还乡或回家养病者，仍三年一分红，按人力股给钱；买卖珍贵文物严守秘密，泄漏者遣散回乡。他善于使用有眼力的杨兰^增。杨兰^增眼力好，很会做买卖，琉璃厂古玩行人都知道，关子光是“甩手掌柜的”。其实，他另有一套，是会算计：建立“万金账”，从全年流水（全年总销售额）中扣除货的成本和全年开销，得出全年纯利，从全年纯利中留下“后承”。所谓“后承”，就是留下纯利的百分之二十，赚多了可能留下百分之五十，留下这些钱打入存货成本，逐年减少存货成本。这家多年

赢利老古玩铺存货很多，但这些货的成本年年减少了。这样一来，不赢利也能吃“后承”，可是东家、伙计、徒弟们的每年分利就少了。店铺富了，寿命延长了，从1868年开到1948年才关张。

郭静安（1884—1958），名宗，北京人。从小在父亲郭小臣开的天和斋古玩铺长大，鉴定、经营古玩，世家出身。他读书不多，对官窑瓷器有研究。笔者少年时见到过郭静安，他是位和善的长者，四方大脸，二目有神，一双大耳朵，蓄有两撇胡须，很有气魄。

民国之初，郭静安便被北京古玩商会两位会长看上，都说他比他爹的眼力强。这是因为在商会审货场买件雍正官窑粉彩大盘。郭小臣训儿子买了打眼货，去退货砸浆。前任会长赵佩斋、现任会长孙秋圃请行家审定，结果儿子看对了，老子看错，是真官窑不是仿做。郭静安从此出了名。实际上，天和斋由他经营，但老子尚在，经理人仍为郭小臣，1923年郭小臣去世，才正式由他经营，直至1956年加入公私合营。

当郭静安正式成为天和斋经理时，荣兴祥做官窑瓷器生意已驰名海内外了。他不甘心自家老字号落在广东老财开的荣兴祥后头。于是，他搞扩资、联合要战胜对方。先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四大行的金融巨头冯耿光、李馥荪、胡笔江、郑瑞生交往，投其所好，做他们的古玩生意。不久，这些银行迁往上海、南京，郑瑞生还在北京，争取到郑瑞生投资天和斋。民国十四年，天和斋由两间门脸儿扩大为五间大门脸儿，是东四牌楼一带门面最大的古玩店。他采取快买快卖、资金周转快的办法做古玩生意，改变“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老习惯。但赚不到大钱，还是竞争不过荣兴祥。民国二十六年后，郭静安同保粹斋的崔仲良、敦华斋的孙瀛洲联合起来做明清官窑瓷器的生意，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他们成为鉴定经营明清官窑瓷器和宋元名窑瓷器的一股权威势力。后贾腾云年老体衰，荣兴祥亦随之衰落。

郭静安与孙瀛洲、崔仲良合伙鉴定、经营过的明永乐甜白暗花牡丹梅瓶，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他与刘宜轩合作十年，雕琢碧玉仿乾隆作很是成功；他鉴定经营的明嘉靖孔雀蓝缀以白色花纹的法华罐，同行至今仍在传说着。

这位从小就生活在古玩铺里、自己独立鉴定经营古玩 57 年、担任过北平古玩业同业公会主席的人，加入合营后被分配到青山居做玉器行业的工作。他什么也不说，默默地工作到 1958 年他离开这人间。

俞淮清（1886—1959），名增河，河北安平县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从安平乡村进京，在狗尾巴胡同兴隆店内、外地古董商魏三开的小古玩店里学徒。魏三经常去外地买货，他给看门，学不到本事。兴隆店里设有外地古董商在行内进行交易的窜货场（古玩商会成立后，由商会掌管），定期卖货，招来京城古董商买货。俞淮清经常进窜货场看热闹，渐渐地看出门道，听行家议论、讲价钱、辨别文物的年代与真假。他留心听、仔细看，日久天长他懂了行。宣统三年（1911），他同段伯轩合伙在兴隆店内开了明古斋古玩铺，鉴定经营元明法华釉陶瓷，孔雀绿、抹红、茄皮紫等釉色的瓷器和康熙官窑三彩瓷器，拿这些“法国庄”的货，到东交民巷做法国人的古董生意。

民国七年（1918），正定县农村出土一件北魏鎏金佛像，京城去了些古董商都没买到手。俞淮清同袁世凯时代的陆军总长王士珍熟悉，袁世凯死后，王士珍退下来在家玩古玩，跟古董打交道。俞淮清拜托王总长给正定县衙写个便条，县衙出面，这件北魏鎏金佛像便得到手了。由于资金不够，他同丁济谦、俞宴斋合伙出钱，钱凑足了，货到手后很快转手卖给日本

在华开的山中商会东京总会是 15 万元，公开讲卖了 10 万，余下的五万，俞淮清与山中商会北京分会经理高田平分了，便发了大财。他同段伯轩分手，自己开淮诚古玩店，专做法国人的生意，又赢利不少，而支援岳彬、王悦之和金书源三人合伙经营欣源斋古玩店，一起做外国人的古董生意，拉帮同行。

1926 年，延清堂开张后，他用 10 万元收购了这家大古玩铺的全部货底，随后又以 10 万元让给了祝续斋。只是从中取出一件康熙官窑豇豆红柳叶尊（原系热河行宫被盗之赃物，延清堂收购了，一直没公开出卖），作为祝续斋对俞淮清的酬劳。这份酬劳价值连城！“如今若公开拍卖，百万美元有人要”，这是 1987 年古玩老行家、美籍华人李汝宽跟笔者所说。

1928 年后，俞淮清搬出兴隆店，住进蒜市口标杆胡同，继续做洋庄生意，随后不久便逐渐销声匿迹，不在古玩市场上出头露面了。但后来却同做后挂彩手艺活儿的刘永清不断来往，他们是安平县同乡，刘是他的晚辈，只是交往闲聊，不做古玩生意。当笔者在 1988 年同刘永清经常见面闲聊时，提起俞淮清的康熙官窑豇豆红柳叶尊，刘永清说，他没见到过，俞淮清从不向外透露，直至 1959 年他老死。

阎善之 生卒年月不详，可是他的故事却在古玩行中传说半个多世纪。他是北京人，光绪年间的秀才，住在琉璃厂观音阁里，读书习字，经常同古玩行人交往。有人跟他说，你闲着没事，何不练练模仿乾隆皇帝的御笔？人家韩懿轩仿翁同龢达到假赛真，您的字有功底，仿乾隆不成问题。于是，他借来乾隆写的条幅、中堂，照样摹拟。功夫不负苦心人，两三年后，他写的真像乾隆皇上写的了，人们叫他“阎御笔”。

在古玩行人的帮助下，他搜集到清代中期的宣纸和旧墨，并请人刻制仿乾隆皇帝的印玺，印迹完全相似，看不出蛛丝马迹。开始时，他用乾隆御笔条幅、中堂、扇面等作品，以假充

真，装裱后在琉璃厂出售。民国年间，他在古旧字画上写假御题，使内外行皆看不出破绽来。

阎御笔留两撇小胡子，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没事就铰□进古玩铺里去。民国十年，有一天他进了论古斋，跟掌柜的萧云章闲聊。话赶话，萧说出，你仿乾隆御笔，逃不出我的眼力。阎善之看了他一眼，捋捋自己的胡子，朝他微微一笑，告辞而去。一个月后，萧云章买了一幅乾隆御笔对联，他看是真的，确信无疑。阎御笔来了，说这是他仿的，萧云章不信。他说，我不用看，这幅对联写的是什麼，我背诵给你：“画栋朝飞南浦云，朱帘暮卷西山雨”，落款：“甲午年乾隆御笔”。萧云章愕然，脸马上红了，半晌说不出话来。

古董商用这段故事，教育后代人，鉴定文物要谦虚谨慎。故而，阎御笔的名字留传了下来，可是他的仿作谁人能鉴别？

张鉴轩（1885—？），名明，北京人。幼年住在琉璃厂沙土园，后搬进观音阁里住。读书时就喜爱书画，八股文作不好，绘画书法入了门道。清末民初，新字画不值钱，张鉴轩又不是名人，名人字画才有销路。那时，琉璃厂古玩铺收购的古旧字画，有的没落名款，请张鉴轩看看，这幅没名款的画落哪位古代画家的名款合适。张查《画史会要》，体会名家笔意，选出人名，刻出印章，仿出名家落款的字体模样。没款的旧字画，落上名款定能卖出好价钱。民国年间，带臣字款的字画吃香，能卖上好价钱，张鉴轩给落上“臣×××恭绘”字样，没“臣”字的添上“臣”字这路笔墨活，他干了不少。后来，他听说，经他落假款、落臣字款的字画卖钱很多，而自己却没得几个，他想不通，得了疯癫病，在琉璃厂街上疯癫乱走，后死在那里。

祝续斋（1885—1958），名维先，河北武清县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京，在琉璃厂德珍斋古玩铺学徒，是袁

厚民的小徒弟。他学徒的第二年，在今河南安阳小屯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殷墟发现占卜用的甲骨刻辞，不断出土商代青铜器，私人挖掘，引来外地古董商购买。北京古玩行人称这路同行为“跑彰德府的”。跑彰德府买到新出土的殷商青铜器，适应中外考古学界和收藏家的需要，赚钱多，祝续斋开始钻研起青铜器了。光绪三十二年，祝续斋开始跑彰德府，他是跑彰德府最早、时间最长的一位北京古董商。在那里他是“坑上”有人，地面上熟悉，进货多而快。完整的、破碎的铜器一起收，有时他还“包坑”（挖掘前同挖掘者协商价目，出土后全部收购），破碎铜器带回北京，请古铜张修复。

光绪末年，祝续斋在炭儿胡同开大吉山房，鉴定经营青铜器，同上海的禹贡古玩店吴启周有了联系。从宣统年间至民国十六年，祝续斋同吴启周、缪锡华与在巴黎和纽约做古董生意的卢钦斋合作，先做“法国庄”，一次世界大战后做“美国庄”的古董生意，卢钦斋、吴启周利用祝续斋在彰德府熟悉，能及时买到新出土的铜器；祝续斋利用卢吴的财力，在彰德府出土文物市场上独占鳌头。这一时期殷墟出土的殷商青铜器，大部分是通过这个渠道卖到外国去的。他们发了横财，却未留下卖到外国去的具体文物名目和件数。卢钦斋、吴启周以国内北伐战争为借口，说战争打起来买卖不好做，将祝续斋、缪锡华分出去，将卢吴公司的牌子公开亮出，继续做大宗出口文物生意。

1927年，祝续斋被分出时，分得大洋数十万元（具体数目不详），自己觉得很满足，岂不知入了美国籍的卢钦斋不仅是百万富翁，还是美国考古、收藏界的权威人物；吴启周在上海古玩界是头等户。祝续斋拿钱回武清乡下老家置地、盖房子、开烧锅（酿酒作坊），在北京冰窑胡同置下房产，用十万元将延清堂全部货底倒到手，还花一万元装修延清堂的房子，

盖起大玻璃罩棚，可他又不在此另开古玩铺，而租给萧书农开雅文斋了。

从1927年到1945年，由于他不善理财，给卢钦斋进货二十来年养成一种习惯，花钱不在乎，买新出土的新鲜玩艺儿，一般货看不上眼。买货仍按早先在同卢钦斋、吴启周合作时的论价，价高在国内卖不出去；要卖给卢吴公司，人家又不进他的货。他有个弱点，架不住别人捧他，同行人一撺掇，叫声“祝大爷，您拿钱开家古玩铺，还算回事儿！”他热情来了，手一拍桌子说：“开家古玩铺！我拿钱，你们帮忙。”于是，华古山房开了张。开了几年，赚不着大钱，又把它关了。他时常给同行出钱到外地去买货，十有八九是“赔本赚吆喝”。不到20年，他分得的近百万元，连折腾带抖搂，几乎全光。

日本一投降，幻想做外国人的古董生意、发洋财的人又出来了，他帮上海李凌云从彰德府进件青铜兵器，指望到纽约赚大钱。不料，被卢钦斋在纽约散布“青铜兵器有的是，不值钱，没考古价值”的信息，而卖了低价钱。幻想破灭，去给同行拉纤跑合，人老体衰，也拉不成几号买卖。无可奈何，回乡下老家，孤苦一人度日生活。

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传出祝续斋披着破棉被、趿拉着破棉鞋，走进乡镇“三反”、“五反”办公室，要交待问题的奇闻。虽然他曾是百万富翁、国内外闻名的大古董商、金石鉴定家，可是在“三反”、“五反”时，已经穷到这个份儿上，工作人员说：“你穷到这步田地，还有什么可交待的？！”此后，他靠吃救济粮和他在京的徒弟王鲁的接济，活到73岁，1958年去世。

周希丁（1886—1959），名康元，河北宛平县（即今北京）人。14岁进琉璃厂富润轩古玩店学徒，那年正是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那年，富润轩才开张一年。周希丁帮助掌柜的张

子青躲避灾难，看守店铺，受到青睐。他学徒时就爱看书学习，练毛笔字，钻研古代字画，琢磨历代书画家的篆刻印迹，对青铜器上的铭文感兴趣，在金石学家们的指导下，认识些金文。自己练习拓拓片，精心钻研金文彝器全形拓法，继承和发展了道光年间焦山寺僧六舟和尚拓焦山鼎全形的技艺。同时，他还时常练习篆刻，经名家指点和他本人锲而不舍，金石篆刻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民国七年（1918），周希丁在琉璃厂开古光阁古玩铺，门上挂出“周希丁篆刻处”的牌子。他开的古玩铺直到1956年加入公私合营。38年来鉴定经营青铜器、字画等各类文物，都有些什么出色的古董，如今谁也说不出一两件来了，而他是位出色的篆刻家和拓金文彝器全形的能人，是人所公认。公私合营后，他被分配到北京海关检验文物去了。

周希丁培育出的徒弟，皆能拓拓片，刻篆刻，特别是小徒弟傅大卣，解放后发挥了作用，担任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成为国内外著名的金石鉴定家、篆刻家、拓金文彝器全形的能人，并将其拓法传留了下来。周希丁的另外几位徒弟是韩醒华、郝葆初、萧寿田、宋九印、马振德。

萧敬斋（1890—1985），河北衡水县人。论古斋的徒弟，又是掌柜的萧维邦的本家。学书画鉴定，眼力一般。民国五年（1916）开敬古斋鉴定、经营字画和杂项等文物。此人憨厚老实，热心助人。民国以来，琉璃厂古玩铺学徒的衡水县人日益增多，到了民国二十年前后，形成“衡水帮”，这同萧敬斋有关。他年年向各家古玩铺推荐学徒，都是他家乡的十四五岁的娃娃。进古玩铺学徒要有介绍人，有的还要有“铺保”（由某店铺担保，写上字据，盖上手印），但只要他一出面推荐，掌柜的就收下这个徒弟。敬古斋在琉璃厂开了三十多年，鉴定经营过哪些珍贵文物，没人能说出来了，但老古玩行人都

说：“敬古斋是徒弟介绍所”，萧敬斋的人缘好。这位老人于20世纪80年代，九十多岁时还生活在琉璃厂附近的东北园。问他鉴定经营过什么好字画？他只说：“明清字画多，新字画我没卖过。”

张孝禹（1886—？），名延舜，河北衡水县人。论古斋韩懿轩的徒弟，钻研字画，看宋元明清字画有眼力，人也诚实。论辈数，现如今国内外闻名的古书画鉴定家刘九庵还要叫他“师大爷”。

民国之初，东北的张作霖有位亲属张瑞亭住在天津。张作霖出资让他在津开恒聚德军衣庄，供应奉军服装。张瑞亭发了财买古玩字画，张孝禹去天津张罗他的买卖，给他介绍古代名家字画的有关趣事轶闻，以及各家的笔法，两人交了朋友。民国八年（1919），张瑞亭出资在琉璃厂开鉴光阁古玩铺，由张孝禹当掌柜，鉴定经营字画，生意做得不错。到了1936年，张孝禹离开鉴光阁，自己独资开闻古斋去了。但文物市场从抗日战争爆发后，字画生意不好，他也一直没发迹，默默无闻度一生。

鉴光阁一直开到1956年加入公私合营。有人说，张孝禹在鉴光阁干了17年，手里攒了点钱，不想给东家干了，撂挑子自己开古玩铺去了。其实，是张孝禹从信古斋把傅凯臣请来当伙计，帮助他经营鉴光阁。傅凯臣鉴定官窑瓷器有眼力，帮助东家张瑞亭买了不少好瓷器，跟张瑞亭熟悉后，不断吹风说张孝禹太死板，做不好买卖。在柜上，又时常挤兑张孝禹。张孝禹惹不起他，便被挤兑走了。傅凯臣主持鉴光阁的鉴定经营，则以官窑瓷器为主了。这一阶段，官窑瓷器在文物市场还有销售，所以维持到解放后加入公私合营。傅凯臣被分配在宝古斋当业务员，一直干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他惨死在河北南宫县的乡下老家。

马霁川（1890—1959），名恒雨，河北枣强县人。13岁由农村来北京，在玉皇庙夹道跟刘竹修学裱画，后在竹实斋跟崔竹亭学裱画手艺。民国七年（1918），在南新华街长春会馆内开玉池山房，鉴定经营古字画，兼做装裱手艺。玉池山房装裱字画手艺好技术高，裱出的活儿特别讲究，深受书画收藏家和当代书画家的赞赏。于右任、张学良、张群、林森等军政要人和张大千、溥心畲、齐白石等书画大师都找马霁川裱画，也买他收藏的古旧字画。一个时期古旧字画在文物市场上生意不好，但他们做装裱字画手艺，仍能维持门市。抗战胜利后，玉池山房去南京设分店，马霁川也曾去东北买过长春伪皇宫佚散的字画。隋朝画家展子虔画的《游春图》，他曾入股参与买卖。

解放后，未分配给他工作，生活很困难。他的徒弟王禹平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成为书画鉴定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另一位徒弟张金鼎迁往香港，亦是位闻名的书画鉴定家，他的号叫张鼎臣，在香港出名。

曹文波（1890—1925），河北景县人。幼年来京，在琉璃厂笔彩斋学徒。他字写得好还会画两笔，学徒时钻研字画，看有关鉴赏书画的书。笔彩斋收藏古字画多，他经常展卷细看，常琢磨。练出了好眼力。国民十二年（1923），他的师兄杜华亭领东开虹光阁，自己觉得看字画的眼力不如师弟曹文波，便约他当了二掌柜的。

在虹光阁时曹文波继续钻研字画，同书画收藏家、在北洋政府做过教育总长的汪大燮，在段祺瑞内阁当过司法总长的林长民，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著名文物鉴赏家朱幼平等名人交往，做他们的古字画生意。他还去秦老胡同张罗郭世五，给他送去字画，其中有唐寅的花鸟写意画，没见到郭世五，画留给管家。郭世五见画说：“唐伯虎的工笔仕女画好，

拿花鸟画来干什么？曹文波再来，你找张纸儿，把他给我捏出去！”这话被曹文波知道了，当郭世五来虹光阁时，曹文波不理他了。郭问掌柜杜华亭，杜华亭实话实说了。郭世五抿嘴一笑说：“那是玩笑话，怎传到他耳朵里了。”

曹文波将自己看字画的体会心得，时常跟徒弟邱震生说，使邱受益匪浅。当邱震生八十多岁时还向笔者表达他对曹文波的感谢之情。曹文波自幼用心劳累过度，三十多岁得了肺病，大口吐血，35岁便死了。

杜华亭（1887—？），名英魁，河北武邑人。幼年在笔彩斋学徒，是曹文波的师兄，人很精明，同行人称他“老杜子”，善于交际。他同翁同龢的后代翁氏家族、山西票号的渠氏家族、安徽巡抚恩铭的后代人于泽三的交往多。由翁家、渠家和于家出资，在民国十二年，将山西人崔阶平开的永宝斋的全部货底倒到手，开了虹光阁。

“扶乩”起字号，华世奎写匾。扶是指扶架子；乩，谓卜以问疑，就是用扶乩的方法求神给起个字号。华世奎的字丰满肥润，象征能发财。

自1923年到1944年，杜华亭当了21年的虹光阁经理，给东家赚了不少钱，但他看古玩的眼力却没在古玩界叫响，原因是他善于筹措经营，交际应酬，对徒弟、伙计放手使用，并不善于鉴定，看字画八成眼，看瓷铜杂项也就是一般水平。邱震生说他是当了21年的甩手掌柜的。虹光阁刚开张的几年，曹文波帮他鉴定经营，曹去世后，请来张云岩帮他开展瓷铜杂项等文物的买卖门路，1932年张云岩回大观斋当掌柜，邱震生已学徒快十年了，由他主持业务。1944年邱震生去宝古斋当经理，杜华亭将虹光阁交给儿子杜少亭，自己回家养老。

同行人都说，杜华亭这辈子不错，儿子将虹光阁经营到公私合营，字画、瓷铜、杂项全行，至今琉璃厂还保留他的虹光

阁字号。

夏锡忠（1891—1961），北京海淀六郎庄人。父亲是位木匠，同治、光绪年间给皇家园林干木匠活，是维修颐和园的长工。他生有五个儿子，民国年间都成事了，故有“夏家五虎”之称。夏锡忠排行老四，古玩行人称他夏四爷。笔者幼年时见到夏四爷是高大魁梧，大大的眼睛瞪着，说话声儿高，怪□人的，其实，他只是脾气不好，长相有点凶，心地还善良，不会玩心眼儿斗智，他戏剧性的故事，至今仍在同行人中传说。

大哥夏锡九，光绪年间在琉璃厂附近的杨梅竹斜街蕴和店里租间房，倒腾出土文物，跟外地古董商交往。夏锡忠读了三年书，便到蕴和店帮助大哥做古董生意，他没在琉璃厂古玩铺里学过徒，古玩铺里的规矩礼法他不懂。二十来岁时就跑山西买卖货，在太原开了家小古玩铺，收购些货，拿北京来卖。民国九年（1920），在琉璃厂开清和斋古玩铺。第二年便搬走，住到南河沿路西南头，现在的“欧美同学会”旁一所四合院里去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买了南河沿北头的原张勋府，非常阔，古玩陈设、走廊花园，百十来间屋子堆满了，厨子、老妈子全有，不是王侯胜似王侯。

十四五年间，他发起来了。怎么发的呢？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曾向北京市最后一任古玩商会主任、80岁的邱震生请教，他说：“这事儿我可以说，太具体了我可说不出，大致上知道他是买卖了云岗武周山上的北魏石佛和洛阳墓葬出土文物。这事儿传出很远，就连河南的老道也知道。”清末民初，琉璃厂古董商是不做佛头石佛造像和殉葬的冥器生意的。一是有“王法”，偷坟挖墓犯死罪，偷盗古石佛像砍头；二是人们信鬼神，怕死后到阴间，神鬼来算账，故而不做这路生意。夏锡忠不信这一套，还有岳彬、赵鹤舫等人开始都是做这路生意

的，做的渐渐多起来，买卖冥器也就公开了，军阀混战时期没人管这些。

老古玩行人都知道夏锡忠霸道，没人敢惹。只要顺着他的脾气，什么事也没有，逆着他不行，还说打就挺，撸胳膊挽袖子！这在古玩界中是绝无仅有的，也是行规所不容许的。20世纪20年代末，夏锡忠在古玩商会窜货场上买货，两句话不来，他骂人“混蛋”，会长崔耀庭马上制止，下次不准再骂，这里是文明交易场所，哪能随便骂人？！夏锡忠二话没说，只是瞪了他一眼。在同行间夏锡忠逞强不讲理的事，传说的具体事还不少，不再列举了。可是到了“八一五”光复后，他的脾气变了。

日伪统治北平的后期，市民生活困苦，吃混合面的年月，信道信教的人多了。河南来位老道传九公道，夏锡忠的太太入了道。老道插圈弄套，夏锡忠上了套。老道说他的罪孽不小，佛祖怒了，鬼神急了。佛爷的头体分离，鬼神的供器用具丢失，你买卖佛头冥器发财，致使神鬼哭泣！罪孽！罪孽！夏闻之，毛骨悚然：河南来的老道怎知我的底细，难道是神差鬼使？！老道让他清静无为，不再做古董生意，避开烦恼不做罪孽之事，向佛祖赎罪，多多行善，求得善终，修得来世。夏锡忠听老道的话，积德行善去了，施舍捐献随之而来。他想富贵荣华为浮云，若不赎罪，到阴间要入油锅下地狱，生时要为死后着想。不到三年，他在京的房产、古玩，三十多年东奔西走赚来的钱，化为乌有。他搬到西单一条陋巷租两间房住下。夏四爷穷了。北平和平解放时，他成了瘦骨伶仃的老头儿。但还有些铜器，唐三彩、石雕木刻等文物，屋里放不下，就堆在屋外走廊两旁。

北京刚一解放，社会治安良好，真正实现了多少辈子人盼望的“路不失遗，夜不闭户”。夏锡忠的那点古玩放在屋外，

他在屋里放心睡觉。白天他出门，敞门走、屋不锁，他说：“针线头儿都没丢过，好古玩也没人来拿了，我活了六十多年，这样的市面还是头一次见到。”在同行劝说下，夏锡忠将自己所存的全部古玩交公，政府嘉奖他万元，他用这钱活到71岁，1961年去世。

毛子恒（1891—1955），名月颀，山西襄汾人。1907年来北京，在琉璃厂德宝斋学徒，李德宣的徒弟。他在德宝斋见多识广，三代秦汉铜器、秦汉印章、鸡血田黄、古墨明砚、字画、旧玉件等文物，都能鉴别，练得一副好眼力。民国之初，他开始在城里张罗买主，竟是些前清的进士、翰林，没维新派人物。

毛子恒还写一手好毛笔字，跟一位进士出身的书法家冯恕，字公度，交上朋友。冯恕的字像刘墉的笔体，为人也像刘墉，达观诙谐。民国十二年，冯恕当了几年的北京电灯公司总经理，手里有些钱，搁着不如开个买卖，就找毛子恒商量开家古玩铺。毛子恒在琉璃厂海王村公园里找间铺面房，于是开起了渊识斋古玩铺，字号是冯公度起的，他说：博学方可渊识，识见深远，文章绝伦，乃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他戏谑毛子恒乃博学之士，懂文物门类较广，但文章尚未绝伦。毛子恒说，我只用眼看，不会用笔作文章。渊识斋这字号起得好，要赚钱不靠写文章，还是要用眼鉴别真假。这段故事在德宝斋的门人中传说着。

渊识斋开到“卢沟桥事变”后关了张。毛子恒自己在家做古玩生意了。

萧延卿（1891—1961），河北束鹿人。光绪末年来北京，在椿树胡同同益恒古玩铺学徒，掌柜的张聘之，东家姓姜乃清廷一名四品官的后人，开同益恒经营些古玩杂项、礼货，维持生活。岂料，这家古玩铺从光绪二十六年开张，直到

1956 年加入公私合营，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大古玩铺，这与萧延卿的努力经营和他的好眼力是有直接关系的。

民国初年，张聘之去世，东家姜府选中张的徒弟萧延卿和张彬卿二人共同经营同益恒。他们创出新门路，鉴定经营青铜器。这时，青铜器在国内外文物市场吃香，新出土的多，货源足，价格高，高出明清官窑瓷器多少倍，而且好销。萧延卿跑外地山西太同，河南彰德府去收购，张彬卿在北京经营。

萧延卿长期驻彰德府，是祝续斋走后收购出土青铜器的第一户，经常采取“包坑”的办法，挖出好坏一齐包购，运到北京，由“小古铜张”给整修，碎铜一堆也能修复成原来的完整的造型。销路是通过叶叔重卖给卢吴公司，好铜器大部分从这个渠道出口美国，也卖给其他国家的古董商。是些什么殷商青铜器，今天谁也说不清楚了，账目早已销毁，但知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

从收购发掘殷墟青铜器中，萧延卿学会了金石鉴定，在国内外出了名，赚不了不少钱，到头来两手空空，归西而去了。1956 年公私合营后，他回到乡下老家。1961 年粮食奇缺，他饥饿而亡。

萧静亭（1892—1952），名文江，河北衡水县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来京，在琉璃厂益珍斋古玩铺学徒，是刘益卿的徒弟。益珍斋鉴定经营字画，萧静亭钻研历代名家字画，锲而不舍，反复读有关画史的书，认真观看益珍斋收藏的古画。学徒四年，19 岁时便接了刘益卿的班，当益珍斋经理，那是宣统三年。民国十年，他自己开静寄山房，“七七事变”后，在家鉴赏，经营古旧字画，直到 1952 年去世。

萧静亭善与人交，同近代学者、教育家傅增湘，史地学家张国淦，考古学者易培基，国画大师张大千、溥心畲、齐白石等都有交往。张大千跟他来往多，他的儿子萧福存，字允中，

拜在张大千门下。他鉴别书画的眼力强，能讲出书画家之生平，除能鉴别出一幅画的真赝外，还能说出这幅画是作者的青、中、老年之作，令收藏家、书画家们叹赏佩服。他鉴定经营书画 40 年，1952 年在京去世。身后只留一幅 72 开的册页，是清初画家王原祁的山水画 36 开，上有诸多名家的题和跋。

卢月舟（1892—1970），名桂莹，河北南宫县人。光绪三十二年来京，14 岁在琉璃厂益珍斋跟刘益卿学徒。他只读过不到三年私塾，经多年自学和鉴定经营历代名家书画的锻炼，练出看字画的好眼力，能同专家、学者、书画名家讲评书画，受到赞赏。

卢月舟和萧静亭是刘益卿的两个小徒弟，还有四个大徒弟：王友良、王奎山、江汉臣、吕文彬，这四位较为一般。两个小徒弟一个赛一个，肯努力钻研，又善于交际和言谈。宣统三年时，刘益卿将益珍斋交给萧静亭经营，卢月舟被论古斋请了去当伙计。

民国三年，卢月舟领东开蕴秘阁，鉴定经营字画。民国九年，由论古斋萧勋臣出资，卢月舟开振雅斋藏画处，1948 年歇业。卢月舟看字画在琉璃厂较有名声，对宋元字画有研究。20 世纪 40 年代时，卢月舟开的振雅斋藏画处，座落在火神庙东侧。他给笔者的印象是不像商人，是位文绉绉的长者，中等身材，走路迈四方步。解放后未发挥他鉴定书画的作用，回原籍了。1970 年他在南宫县的乡下去世。

谢瀛轩（1893—？），河北冀县人。幼年在荣兴祥古玩铺学徒，是贾腾云的大徒弟。专门学鉴定明清官窑瓷器，较有眼力。同荣兴祥交往的是宫廷太监、官僚和国内外收藏官窑瓷器的富豪，而一般人和一般瓷器，他们是不看在眼里。

宣统年间，谢瀛轩跟同治状元徐■的儿子徐星曙交上朋友。徐■官至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徐星曙是有学识远见的

人，他看到大清王朝气数将尽，官僚们及其后裔必将衰落没辙！如何维持生计？荣兴祥买卖官窑瓷器赚钱不少，是广东两家老财开的买卖，自己也开家古玩铺，有个后路才是，便跑到荣兴祥同谢瀛轩商量。

清廷刚一倒台，徐星曙便出资万元，在东四牌楼开韵宝斋古玩店，由谢瀛轩当经理，还从荣兴祥带出两位师弟：吉应东和栾静波。荣兴祥培养出的徒弟，一下子走了仨，掌柜贾腾云很恼火。师傅看徒弟领东当掌柜的，不但不扶一把，还要往下拉。贾腾云老谋深算，门路宽广。在收藏家和同行人的眼里，贾腾云是鉴定经营官窑瓷器的权威人物，他说句话很管用。他说他的这仨徒弟不咋的，没眼力，在我这儿没学出啥本事，看门接待客人还可以。

韵宝斋的资本是万元，那时算是资本雄厚了。靠本钱足，谢瀛轩进了不少好官窑瓷器，在古玩行里算是有名的。可它跟荣兴祥无法比，那是竞争不过的第一。谢瀛轩、吉应东、栾静波这仨人在荣兴祥，一般瓷器不看在眼里，不愿做这路生意。上等官窑瓷器有师傅贾腾云垄断着的呢，他们很难买到手、卖出去。干了十多年，到了民国十七年（1928），给东家没赚多少钱，只维持门面而已；又因买卖一对“古月轩”瓷碗，师兄弟争吵起，致使韵宝斋关闭。

约在民国十五年后，谢瀛轩从一位太监手里买了对乾隆官窑珐琅彩碗（古玩行人称珐琅彩瓷器为“古月轩”），口径不到14厘米，胎薄釉细，绘画工整，乃罕见珍品。这位太监曾给另一家古玩铺的掌柜的看过，他没看好，认为是赝品。给谢瀛轩看，鉴定为真东西。太监高兴极了说：“那个姓孙的猴崽子说东西是假的，你的眼力不错，皇家的东西，哪儿来假的。”于是1200元出手。不过一个月，谢瀛轩把碗卖了，说卖了5000元。他的两位师弟：吉应东和栾静波听从荣兴祥传

出消息说，谢瀛轩是卖了一万多。于是，三个人争吵起来，师弟骂师兄是“坑东灭伙”，不能再给他干了！买卖关了。

苏惕夫（1893—？），名永乾，河北深县人。幼读私塾，十四五岁进京，在琉璃厂韞珍斋学徒，是李克甫的徒弟。韞珍斋开业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鉴定书画和文房四宝较有名望，李克甫的徒弟冯伯勋、董兰池看字画的眼力好，师弟苏惕夫比他们能力更强。民国八年（1919），苏惕夫在琉璃厂贞古斋鉴定经营历代名家字画。他有几十年的鉴定经验，很爱鉴赏收藏家和近代书画家的赞赏，同行人也佩服，20世纪80年代时，邱震生还说他看字画周到仔细，有独到的鉴别能力。他的儿子苏甦春自幼学习书画鉴定，毛笔字写得好，今日可称是位书法家了。80年代，甦春被选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为书画鉴定家，在广州海关检验文物，为防止文物外流把关。

王栋廷（1893—1978），北京人。古玩行人都知道有位“王七儿”，他的名字往往被人忘记。他的个儿不高，倒是挺精神，说话时眼睛滴溜转，显示出他的聪明能干。他是在古玩铺长大的，父亲在东四牌楼开辅聚斋古玩店，哥儿七个，他最小叫王七。父亲去世由他经营辅聚斋，1923年搬到炭儿胡同，辅聚斋没有了门面，他在家做古董生意。他鉴定三代秦汉铜器、汉瓦、唐三彩陶器和宋元瓷器有眼力。行里人传说着他的两个故事：

一是，1929年，他在古玩商会窜货场买了件宋钧窑花盆，从此他出了名，“王七儿”改称“王七爷”了。这花盆是长方形带六棱，高约16厘米，长约22厘米，宽13厘米。工艺特殊、精致，瓷胎深灰色，胎质紧密，芝麻酱底，底端刻有“九”字。釉厚、玫瑰紫颜色，红处似胭脂朱砂，青处像葱翠，远处望之，恰似行云流水，鲜艳而不死板，令人赏心悦目，实属罕见珍品。行家鉴定，是北宋时期钧窑为皇家烧制的

贡品。卖货人披上大套袖与买货人要拉手讲价钱时，人们蜂拥而上，袖里讲价的方式无法进行，改为“封货”方式。即密封投标，投毕、拆封唱票，标价高者得标，货归得标者。由商会指定人唱票：两千元、三千元的标价最多，唱到四千元标价时，人们认为可能得标。不料，唱票人高声喊出：王栋廷标价九千六百零六元，得标！从此“王七爷”的官称在行里叫响了！其实，王七爷没那么多钱，他是给卢吴公司买货的，卢吴公司每月给他五百元，雇做代理人。日本山中商地高田得到消息，撬了卢吴公司的行，给了王栋廷一万五千元，将货买走。日本人又将这件宋钧窑碗卖给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是五万美元。而今是五百万美元也买不回来了。

二是，1931年，彰德府出土件殷商青铜盘，被当地土财主买走。北京的古玩行去了几位向他求购，土财主是给他多少钱，他也不卖，从三千到一万二，再加价也没指望他卖出去。岳彬同王栋廷闲聊说起这件事，王拍胸脯说，你岳二爷能出一万二，我把东西买回来。岳答应出钱，要看你王七爷的本事门道！王栋廷去河南彰德府乡下土财主的大宅院，拉纤人向主人介绍说：“这是王七爷！”主人见来客神气十足，派头儿不小，身穿哗叽长袍、礼服呢马褂，头戴毡礼帽，足蹬黑缎子鞋，脸上戴着一副深色茶镜，手里提溜着香妃竹的文明杖，说话声音宏亮。主人心想，这是从京城里来的哪位官老爷，只称“爷”，不道名号？！

主人拿出商盘给王七爷鉴赏。见商盘有一尺二的直径，沿外撇，像脸盆一样，锈色如铺翠，花纹深浅如一，明净分晓，盘中有铭文，可惜王七爷认识不了上面的字，更不知铭文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却说这是商代盘庚时的青铜器乃天子赏赐诸侯之祭祀用器，考古价值相当高，并建议主人赶紧卖掉，不然，官面上会来干涉。不料，主人不听这一套，说官面上管不了，

当官的睁只眼、闭只眼，捅俩钱儿，睁着的眼也合上。王七爷一听，吓唬不住他，便说让我看看这铜盘。他将铜盘拿到屋前，站在石头台阶上去看，一失手盘子掉在台阶上，成两半的了！

拉纤人被吓得脸发白，主人发了火，王七爷定定神，猫腰把两半的古铜盘捡起来，冲着主人大声说，你发什么火，这坏盘子，你七爷我按价赔偿！不是见价最高是一万二吗，我给钱。主人不干，王七拉住他的手，要去见官。主人不摸底王七在京城是什么官，不敢去见官。拉纤的给打了圆场，王七花一万二买了殷商青铜盘。拿回北京，找张济卿给修好，照样按完整的卖钱。

这两个故事在琉璃厂古玩界中传说多年。到了1956年他加入公私合营后，分配在振寰阁当业务员时，老同行跟他闲聊这些往事，他付诸一笑。老来不求名利，甘当业务员，安度晚年，85岁在京去世。他的儿子至今仍给琉璃厂文物商店开汽车。

孙瀛洲（1894—1968），河北冀县人。宣统元年来北京，先在隆福寺三合公硬木家具店学徒，后在铭记古玩铺给马铭轩当伙计。1920年在东四牌楼开敦华斋古玩铺，直到1956年加入公私合营。

古玩行人中，解放后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惟有孙瀛洲。1956年合营前他捐献一批文物，主要是犀角杯最多，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奖励赞扬，被聘为故宫博物院顾问。他曾写过一篇《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别》，是颇有见解的学术论文。他培育出的徒弟耿宝昌，是陶瓷鉴定专家，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常委。

一位文化程度很低、幼年学做硬木家具生意的人，能写出鉴定成化官窑彩瓷的论文，其中经受的磨练和自我完善的过

程，是相当艰难的。他开古玩铺只做瓷瓶瓷罐、玉如意等文物礼品生意，段祺瑞政府的官员到这里买点东西，给他们的上司送礼。1924年后，他认识了当时的交通总长叶恭绰，做上交通总长的古董生意，逐渐发展起来了。民国十六年政府南迁，敦华斋在东四牌楼的古玩铺中还算是略有起色的小古玩铺。后来，孙瀛洲手中积攒点钱，西什库延古斋张武如想同他合伙，在烟袋斜街开家小古玩铺，买卖没开成，反而使他在北京古玩行里不好露面。他将敦华斋交给弟弟蓬洲做，自己去上海，同孙公寿，耿朝珍合作。孙公寿在上海有门路；耿朝珍的眼力好、青铜器、瓷器、玉器，除字画他全懂；孙瀛洲将在京没开成的那家古玩铺的资本带去了，三人同舟共济，又赶上抗战爆发，上海古董商原想出口的货运不走。他们从上海同行手中买到好宋元瓷、明清官窑瓷器和铜器运回北京，在北京卖给同行，从中得利不少，孙瀛洲大长了鉴定铜器、瓷器的眼力。在上海孙瀛洲站住了脚，在北京敦华斋扩大了营业，古玩界有了位“孙四爷”。

孙瀛洲在北京同崔仲良、郭静安经常合伙鉴定经营宋元和明清官窑瓷器，在行里出了名，而且影响较远。1985年台湾郭良蕙在她的著作《郭良蕙看文物》中，有篇《色彩缤纷蒜头瓶》里提到孙瀛洲、崔仲良等三大商家热衷于明瓷，“尤以孙氏研究成化极有心得，曾为辨识‘大明成化年制’款书而编写成谣……”这位久负盛名的陶瓷鉴定家在“文化大革命”时受到不公正的批斗，因受刺激而亡。

朱浦泉 名光涛（1876—？），河北省大兴县人。幼年在茹古斋学徒，孙虞臣的徒弟。光绪二十八年开闻光阁，26岁当掌柜的，自己书写牌匾，不次于名家笔墨。鉴定经营书画、瓷器、杂项三十余年，交结近代书画名家，谈论书画，他对古代字画很有研究，特别是对元代四大家：黄公望（大痴道

人)、王蒙(黄鹤山樵)、吴镇(梅花道人)、倪瓒(无锡高士)的山水画有独到见解,鉴别真贋的眼力最好。自幼练习书法,有“商界书法家”之称号。他的书法艺术和鉴别书画的能力,没能传授给徒弟,他的徒弟王幼田后来虽然开了大雅斋,当了北京古玩同业公会理事长,但眼力却平平常常,只善于交际。

张式如(1889—?),名实,北京人。懂法语,虔诚的天主教徒。年轻时爱玩古玩,中年时在西什库开家延古斋古玩铺。他生活俭朴,积攒点钱就走路到琉璃厂去搜集点古物。有时他从东晓市和走街串巷打小鼓喝旧货的手里买来瓷器、铜器等文物,拿来琉璃厂古玩铺,请行家帮助鉴定。一来二去跟行里人熟了,也学会鉴定,未入古玩商会,便做起古玩生意。他做的古玩生意中有两件文物的交易,给人们留下印象深、传说久远:

民国八年(1919)学生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张式如开始时不知学生为什么出来游行。当他了解到学生在天安门前集合,“拒绝和约签字”,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时,他甚是赞同。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在西什库教堂前,见到一位收旧货、打小鼓的小贩,挑着小筐在街边边走边敲打小鼓。他往筐里一看,发现有颗铜印,拿出仔细一看是“闯王印”,小贩是按旧铜价收来的,让张式如给个价他就卖。不料,张掏出两块大洋给了他,觉得不到四两的铜疙瘩,能换来四十多斤的一袋洋白面(面粉一袋只卖两块钱),喜出望外。

没过多久,打小鼓的小贩拿来一件很脏的“痰盂”,说是位太监卖给他的,请张式如给看看。经刷洗后,呈现出宋钧窑瓷器的本色,釉色青中带红,有如蓝天中的晚霞;青色不同于一般青瓷,色泽深浅虽不一,但近于蓝色,是件宋钧窑蓝色乳

光釉渣斗。它的形状像痰盂但有区别，口大、沿宽，用途不同，我国宋代时，宴席桌上摆有盛吃剩下肉骨头或鱼刺的用具，叫渣斗。这些小贩不明白，可张式如全明白。他看完后想到：古物陈列所（溥仪居住在宫里时，前三大殿两旁，文华殿、武英殿为古物陈列所），武英殿正面右方，高台大玻璃柜里，陈列着四只宋钧窑碗，中间摆着一个渣斗，跟眼前这件渣斗很相似。是不是一对，丢了一个？经与小贩协商，张式如花五百银元买下了这件宋钧窑渣斗。

北京古玩商人得到消息都来观赏求购，张式如迎接不暇，忙了几天，也没出售。因为最高价只给了五六千元，再多没有敢买的了，怕卖不出手。此时，张式如的好友姚叔来从纽约来了，他俩都是天主教徒，一位英语好，一位法语流畅。姚叔来同卢钦斋合作，姚在纽约，卢在巴黎，二战后在法国的卢钦斋来到美国，同姚叔来共同做古董生意，资本雄厚。姚叔来花一万现大洋将张式如的宋钧窑渣斗买走，轰动古玩行。

张式如转眼成了富翁，那时的万元可换黄金 300 两。可是他的生活俭朴如初，到琉璃厂来不徒步了，改骑一辆自行车。他将赚来的钱不断向一些慈善机关团体捐献了。后曾拿出千元准备与孙瀛洲合作，请李兴之当掌柜，在烟袋斜街开家古玩铺，后因孙瀛洲的丑闻而告吹。张式如独善其身，一直过着平民百姓生活，笃信他的天主教。

安溪亭（1894—1962），名长柱，河北通州西集镇安辛庄人。光绪末年来北京，在琉璃厂延清堂学徒，是丁济谦的二徒弟。自幼刻苦耐劳，不与人争斗。在延清堂干到买卖关张他才离去。1924 年，他在琉璃厂静观阁，后在东四牌楼开家东亚委托商行，一直鉴定经营古玩，1956 年加入公私合营，安度晚年。1962 年国内困难时期，他在北京无声无息地去世了。

他却是位古瓷鉴定家，看瓷器的眼力，20 年代以来在琉

璃厂古玩界中是一流人物，但他从不夸张，也不爱讲话，行里人给他起个绰号：“安老蔫”。

当丁济谦离开延清堂时，曾向东家推荐他的两位徒弟：任雁亭和安溪亭，谁当掌柜的都行。东家却选中了能说会道的任雁亭，没看中寡言少语的安溪亭。不过两年，便发现任雁亭在城里摆谱儿、耍威风，不务正业，在他的乡下老家盖房置地。东家不干了，将买卖关掉，后悔说：“当初不如让‘安老蔫’当掌柜的了！”

行里人和收藏瓷器的名人，遇上看不准或辨别不清真贋的宋元瓷或明清官窑瓷器，便请安溪亭帮助掌眼鉴定。“九一八事变”后，大收藏家沈吉甫打眼买了假古月轩瓷瓶，请安溪亭鉴定，大古玩字画商韩少慈买件钧窑洗子，安溪亭一眼看出是贋品。安溪亭练眼力，除了在延清堂不断观察比较历代著名瓷器，还经常去古物陈列所，后来改为去故宫博物院里的陶瓷陈列馆，也去前门大街德泰细瓷店和天津同泰祥细瓷店，去看明清官窑瓷器的仿制品。有一次，在同泰祥见到一件雍正官窑粉彩碗，精致细腻，色彩不一般，给人以层次立体感。看了半天，不言语，问要多少钱，他要买。这时，经理陈建侯过来了，叫声安大哥！随即说出，您的眼力可真好，这碗不是仿的，是真的，是借来做样子的，准备拿到景德镇照样烧制去，仿好了再卖给您如何？安溪亭笑了说，你要仿制，千万注意这红花的层次：花心要色浓，从花心到花瓣愈往外红色愈淡，才能将雍正粉彩仿像。

加入公私合营后，安溪亭不显山不露水，老实巴交地工作，1962年去世。他只有一个儿子，在荣宝斋学过徒，北平一解放就参军南下了，安溪亭成为革命军人家属，家里门上挂“光荣军属”的牌子。

张彬卿（1894—1972），河北冀县人。宣统元年来京在

椿树胡同同益恒跟张聘之学徒。学徒刚满三年半，张聘之去世了，东家让他同师兄萧延卿一起经营同益恒。张彬卿有心计，看师傅原先鉴定经营的那些古董零碎赚不着大钱，跟师兄商量另辟门路，搞金石鉴定经营。民国初，我国青铜器、冥器、唐三彩等文物出土较多、销路广、价格高，鉴定经营这类文物为主的店铺，大部分都搞出口，发“洋财”的多。

萧延卿觉得师弟有心胸，比自己的谋略多，让给他在京主持业务，自己外出收购。张彬卿经常来琉璃厂同各大古玩铺沟通。他跟雅文斋萧书农的关系一直很好，一聊就聊到半夜三更，说到天亮的时候也有。主要是通过萧书农了解南北古玩行的情况，特别是“吃金石的”北京的黄伯川、岳文轩，上海的叶叔重、吴启周，他们买了什么，卖了什么，价钱如何。有了消息，决定自己的进货卖货和货的价格。萧延卿在彰德府挖掘铜器的地方“包坑”，张彬卿在京请张济卿整修包坑时挖掘出来的残碎商代青铜，修复成原型。然后销售，而绝大部分新出土的殷商青铜器，他们通过叶叔重、吴启周运往纽约。为卢钦斋进了货，都是些什么好铜器，账目早已销毁，又无记录。中国3000年前的殷商铜器，不乏国宝，出口国外，自己国家连个记录都没有，为个人发财，什么国宝文物，一切不顾。

张彬卿在鉴定经营铜器的实践中，积累了鉴别、整修、复制青铜器的经验，但无记录传留。他的一生为东家赚了大钱，培养出两位徒弟：倪玉书、陈鉴堂，在中外古董商中出了名。而他本人，除吃穿住用外，所得不多。老来生活困难了，50年代末在隆福寺摆旧货摊，勉强维持生活，后又双目失明，死在北京。

萧书农（1894—1952），名文田，河北衡水县人。光绪末年来京，在琉璃厂大观斋学徒，赵佩斋的徒弟。学徒五年便主持大观斋的日常业务。他精于鉴别瓷、铜、杂项等文物，勤

于业务，经常到前门挂货铺，后门（地安门）旧货铺去看货，以勤买勤卖著称。大号生意做得不多，小号买卖没少做，积少成多给大观斋赚钱不少。故而在民国十年，便在大观斋吃了人力股的百分之二，即按纯利计算，每赚百元有他二元。到了民国十七年，他手中积攒些钱，加上他的夫人娘家赔送的嫁妆钱，也就两三千块钱，要想开家古玩铺还不够。在他的堂兄萧静亭的帮助下，和《群强报》主笔陈慎斋、同行入邱良臣协商，立下字据借款 3 000 元，这才在延清堂的旧址开了雅文斋。

从 1928 年到 1952 年，萧书农经营雅文斋 24 年。前 12 年较为兴旺，后 12 年渐渐衰落，1952 年他去世，买卖关了张。雅文斋开张正赶上政府南迁，北京文物市场走下坡路了，虽有东陵盗宝、殷墟发掘的刺激，但只是对做洋庄古董生意的有利。官僚、富商、金融界有经济实力的收藏家，全都随政府南下了，留在北京的老收藏家毓绶衡、衡致中、桂月汀、袁励准、庄蕴宽、朱幼平、汪大燮、林长民等人，有的不买古玩，还要卖些自己的收藏，而这些人又都是萧书农原先的老主顾。此时，萧书农辟出新门路，做银行界中收藏家的古玩生意了。中国银行冯耿光、汪冷伯，交通银行李馥荪，中南银行胡笔江、胡惠春都收藏明清官窑瓷器和其他文物，雅文斋做上了他们的买卖。萧书农开雅文斋与师弟陈中孚、范岐周通力合作，陈跑上海，范在京主持业务，他本人抓总。分工合理，同心协力，生意兴隆起来了。民国二十八年后，范岐周、陈中孚先后离开雅文斋，自己去开古玩铺，而且还从雅文斋带走几位有眼力能经营的徒弟，致使雅文斋大伤原气，萧书农再有鉴定经营能力，也支撑不起来了，故而雅文斋从此渐渐衰落下来。

“好汉靠帮，篱笆靠桩”，“三人同心，黄土变金”，萧书农后来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年轻时操劳过度，老来身体不好，

58岁就去世了。他的徒弟孙福凯，字会元，是当今的陶瓷鉴定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国内外闻名。

王幼田（1895—？），名琳，通州人。宣统元年来琉璃厂，在闻光阁跟朱溥泉学徒。1935年，在海王村公园开大雅斋，至1956年加入公私合营。1945年“八一五”后至北平和平解放，王幼田担任北平古玩业同业公会理事长。

王幼田虽然没有他师傅朱溥泉的那套本事，书法、眼力没赶上师傅，可是他在做人处世接物方面，要高于师傅一筹。同时，他对文人用具方面的文物有研究。他善于交际，消息灵通，靠信息做生意谁家有什么好古玩要卖，谁家要买，他得到消息早。但不过早插入买卖双方中去，一旦看准他才加入“伙货”中去。古玩行人靠的是眼力，没眼力做古玩生意是百分之百要赔进去。可是，王幼田懂的古玩门类多，但看准一件古玩也是有困难的，行里人说：他是“门门通，门门松，叫真章，就不中。”因此，他自己不单独买卖珍贵文物，一般的折扇、墨砚、水壶一类的杂项文物，自己独立经营，贵重文物，他伙货经营。

在古玩行里，王幼田的人缘好，谁也不得罪，有人说他两句，也不往心里去。在书画界、收藏界能交往得来，跟文化人能谈得来。所以，虽然他对具体的珍贵文物看不准、决定不下来，但大雅斋开了21年，年年赚钱，行里人还是选他当了三年的公会理事长。

杨润斋（1895—？），通州人。程启元的徒弟，接程启元经营赏奇斋二十余年。赏奇斋是醇王府管家出面开的古玩铺，王爷要让古玩界和收藏界赏奇珍，才开的。这里的奇珍异宝，别家的古玩铺是比不了的。杨润斋在这里学会鉴定三代青铜器、宋元名窑瓷器、金胎银胎的珐琅彩器，一般古玩文物他看不进眼里去。交往的是日本的山中商会在北京的经理高田，

清代王朝贵族桂月汀、毓绥衡，大古董商岳彬，一般的古董商他看不起。在柜上（即赏奇斋店铺里）他“独来独往”，不许徒弟伙计经手做生意；他买卖了些什么货，一概不准泄密。他经营的赏奇斋一直是很神秘，但他卖出去的金胎洋珐琅彩盘，银胎“官僚雅集杯”、成化青花宫碗的秘密，还是传了出去。具体事例写在《文物话春秋》书中“赏奇斋笼罩着神秘色彩”和《古玩谈旧闻》书中“太古佳士得成化宫碗价值千万”文中。

醇王府出资在琉璃厂开设的赏奇斋，开了41年，是在杨润斋手中关张的。这家古玩铺珍贵文物集中，本可以培育出鉴定人才，但“独来独往”的杨润斋没培养出人来。

张云岩（1895—1973），名广益，河北衡水县人。宣统末年进大观斋，赵佩斋的徒弟。在大观斋干了十多年，鉴定瓷器、古玉、铜器颇有眼力，做曹锟部下高凌爵、吴毓麟等人的古玩生意。1924年初，在古玩商会窜货场上张云岩买了件乾隆官窑粉彩瓶，拿回大观斋，主持业务的师兄萧书农说他买贵了，要他送回去，俩人闹僵了，争吵起来。一气之下，他回了衡水老家。当他从乡下回来时，冯玉祥已将曹锟赶下台，国务总理商凌爵原想由管家出面，在琉璃厂开家古玩铺，请张云岩当经理的事，也随之告吹。

正当他离开大观斋，又开不了买卖时，虹光阁杜华亭请他去主持柜上的营业，他如鱼得水，开展业务，虹光阁除鉴定经营字画，还有铜器、瓷器、杂项一类文物也经营。同时，还将他积累的鉴定经验，告诉给徒弟。1988年，他教的徒弟邱震生已是80岁的老人，他回忆说：“我的这点鉴定本事，不少是跟张云岩学的，我这辈子没忘记他。”张云岩看瓷器，看完用手敲放在耳边听，他说：“眼见为明，耳听为聪，耳聪目明，才能鉴定。”他鉴定铜器，不但要看、要听、还要闻。笔

者幼年时曾问过他，能听出什么，闻出什么？他告诉我要记住，听瓷器的声响清脆，问题不大；若是发闷，就要仔细看是不是后挂彩的了。古铜是闻不出什么味来的，新出土的有土气味；若闻有酸、臭味，就要仔细看是不是仿做或后上锈的，或是拼凑修复之物。张云岩在琉璃厂是有名声的鉴定家，对瓷器、三代秦汉青铜器、古玉、杂项文物有鉴定能力，收藏界古玩界都知道有位“张黑儿”，这是人们给他起的绰号。民国二十四年，大观斋老掌柜赵佩斋去世，将买卖倒给了玉器行的林复贤。林复贤请来张云岩当掌柜。他经营大观斋不到四年，便回家自己做古玩生意。抗日胜利后，做了些零零碎碎的古玩生意，一直没干起来，生活日渐困难，入了一贯道，想解脱人间苦难。不料，解放后宣布一贯道为反动会道，他本人被遣送回乡下老家，后无声无息地死在乡间。

崔耀庭（1896—1968），北京人。幼年家贫，在崇文门一家洋酒店里伺候外国水兵，会简单的英语。1911年，来到狗尾巴胡同兴隆店里的德兴斋古玩铺学徒。这时，德兴斋掌柜郭德明被推选为京师第一任古玩商会副会长。郭德明是代表行商（外地来京卖货的古董商）担任副会长的，他本人也是行商，在兴隆店租房开家古玩铺，做外国人的古玩生意。他鉴定古玩没什么好眼力，卖些外国人喜欢的洋庄货。崔耀庭虽然才十五六岁，但聪明能干，跟外国人做生意比他师傅强，因为他会说几句外国话，又同外国水兵打过交道，很受郭德明的器重。郭无子女，去世后，德兴斋归崔耀庭经营。崔耀庭自“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是主持北平古玩商会的中心人物，虽然他仅担任两任会长，但成立理事会后他一直是理事，别人当理事长或会长，重大事还要经他定。此人为人耿直，处事公平，对会务殚思竭力，故而商会的事离不开他。他是北京古玩行的头面人物。

他鉴定青铜器、陶瓷器、杂项一类文物有眼力，又善于交际，派头大，能说会道不饶人，一般人惹不起。但他讲交情讲面子，不让人下不了台。古玩商会有他主持，窜货场上的行里古玩交易，多年来未出大问题。市政当局不断更换，日伪、国民党统治时期，官面上的事是很难应付的，崔耀庭则善于处理。北平和平解放后，古玩业在新的公会未建立时，由 125 户会员中公推出崔耀庭等 18 人负责筹备委员会工作。后来成立文物业同业公会时，崔耀庭就未能参加了。

五六十年代，崔耀庭没参加工作，卖旧货维持生活。当人们问他：你过去卖给外国人一些什么古玩文物时，他说：“那个时候政府允许我做这路买卖，我有字号，有营业执照，谁也管不着。今天算什么老账？！”他的老境困难，死得十分可怜，痼疽其身，脓血进流，疼痛而亡。

岳文轩（1896—1955），名彬，通州西集镇张各庄人。幼年家贫，在村私塾只念过两年的书，半部《论语》也没念完，就由本村的常惠川带来北京锡拉胡同破庙里，跟倒卖古董零碎的朱二学徒，那是宣统二年，满清政府将要倒台的时候。民国三年初，学满徒从锡拉胡同的破庙里搬出，住进狗尾巴胡同兴隆店，租间长房，自己夹包做古玩生意。民国十年，俞淮清出资，王悦之约岳彬、金书源三人共同经营欣源斋古玩铺，做“法国庄”古玩生意。这一年，岳彬从天津劝业场福兴成古玩铺花四千元买件法花罐，卖给原法国驻清廷第三公使魏武达是一万五千元。岳彬向王悦之、金书源说卖了六千元。纸里包不住火，内情很快曝露，三个人争吵而散伙，岳彬独得九千元搬出欣源斋，住进杨梅竹斜街蕴和店，起个字号叫彬记古玩店，找徒弟丁兆凯给他看（k n）店做饭。从此他成了“气候”，发了财，中外古董商都知道北京有位“小岳”。1924 年搬出蕴和店，租了琉璃厂附近东北园一套小四合院。买卖越做

越大，货多，四合小院放不下，1928年花万元买下炭儿胡同西头路南两个大四合院（即今大栅栏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所在地）。彬记，已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大字号，岳彬已是北京著名的、最大的古董商，“小岳”改称“岳二爷”了，他的老主顾魏武达也叫他岳先生了。

岳彬怎么成了北京头号的古董商？其说不一，有人说他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也有人说他是“赶上了那个时候”；还有人说他是“鬼迷心窍，除了古玩、赚钱，脑袋里是空的”。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52年，岳彬当众在文古斋闲聊起他第一次买货时说：“现在解放了，都说剥削。我发财靠的是眼力、本事。从第一次我买货起，白大爷给了我发财的钥匙，就是练眼力，随时随地学习。这我辈子可不是傻小子睡凉炕！”他第一次买货是在民国三年，从窜货场买了块雕填脚踏板，是明代漆器，长条形，约有85厘米长，30厘米宽，底部有腿，是贵族用它做上床时的脚踏板。他买了货拿给瑞记掌柜白瑞斋看时说：“白大爷！您看看我买的这雕漆大板凳！”白瑞斋教训了他一番，讲明这叫雕填，和雕漆都是漆器，但它们有区别，说了板凳和脚踏板的不同点，告诉他要学习不断练眼力。这些，56岁的岳彬还未忘记。

老古玩行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就是同岳彬接触闲聊，是“三句话离不开本行”，不聊行里的人、物、事，过不了三句话，他就不理你。说起古今中外古玩行里的事，他爱听爱聊，扯闲篇，没他的事儿。他满脑子装的是古玩，怎样用古玩去赚钱。他的眼力好，鉴别铜器、漆器、珐琅、木雕石刻、唐三彩、宋元瓷、明清官窑瓷器、地毯、缙丝、杂项，除字画外，他都在行。

岳彬是在同中外古董商闲聊中听消息的，所以跟他扯别

的，他是不理你的。古玩向来没有标准价格，是以市场交易而论的。在民国之初，往往是某类文物，外国人一买，价格马上去，以前没人要，此时变“抢手”。譬如绣货，满清一倒台，绣货成估衣了，外国人一买，买出个绣货行（请看《文物话春秋》中“荷包巷和绣花街”一文）。做古玩生意的要靠自己的眼力，还要靠自己的耳朵听消息。老古董商说岳彬是“眼睛尖，耳朵长；消息灵，记性好。”他做古董生意有诀窍：一是注重文物的稀有和特殊；二是收集到特殊珍贵文物，他收藏居奇，宣传出去，搞复制品卖出去。他是在“真假虚实”中做文章的（请看《文物话春秋》中“古董巨商岳彬的生平和致富诀窍”一文）。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岳彬锒铛入狱。查账查出1934年他同美国古董商普爱伦签订盗卖龙门石窟里的《皇帝礼佛图》和《皇太后礼佛图》两块北魏浮雕，并抄出凿碎浮雕的碎石块两木箱，又有张济卿等人揭发检举并做证，在当时文化界知名人士三百余人联名上书，要求政府严惩岳彬的呼声中，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55年在狱中病饿而亡。他的全部财产被没收，只有琉璃厂原文古斋铺面房，那座小楼留给他的太太居住。

苏颢墀（1896—1963），河北冀县人。1912年来京，在东四牌楼荣兴祥古玩铺跟贾腾云学徒。人很聪明，长相也好，深得师傅的器重。1917年荣兴祥的大师兄谢瀛轩带走两位师弟去另开家古玩铺，贾腾云便依靠苏颢墀主持业务，在前台做生意。他看官窑瓷器的眼力好，做事又有魄力，还学会说点外国话，正赶上荣兴祥在国内外有名气。在他主持业务的五六年里，是荣兴祥最兴旺时期，因而苏颢墀在中外古董商中也较有名声。

北京兴隆街有家大财主姓徐，弟兄二人都爱玩古玩，同苏

觀墀熟悉。他们想把苏觀墀从荣兴祥请出，出资十万元另开家古玩铺，把广东老财开的荣兴祥顶回去。贾腾云的消息灵通，得知这件事，马上去找徐家大少爷说：“苏觀墀跟我学了十多年的徒，眼力还不行，他没少给我买假货。你要是给他钱去买，那是把钱往坑里扔！”大少爷变了卦，不肯投资。苏觀墀去找二少爷，二少爷给了他两万元，1924年在东四牌楼开毓珍祥古玩铺。

毓珍祥开张鉴定经营珍贵的明清官窑瓷器，一般的货不经营，而他所鉴定经营的这路货，却被师傅贾腾云所垄断，经验阅历他赶不上师傅，自然甘败下风。无可奈何的形势下，他携货去了法国。本想在法国巴黎打开局面，又遇上法国古董商魏武达和万年克，这二位买卖中国古玩比他的资格老、货物多。法国人不认他带去的货。结果失败而归。1942年毓珍祥关了张。

在荣兴祥，苏觀墀干了12年，在中外古董商中曾红极一时，曾令人羡慕，论眼力他是过目能辨真假贗，论言谈他是言谈举止斯文。而他自己开店18年，始终未得发展，碰壁而失败。在文物市场上，亦应审时度势，也要靠人帮。他遇到的净是拆台的，没遇上帮手，有本事也施展不了。“好汉靠帮”在商品市场上也是如此。荣兴祥培养他只愿做大号买卖，不愿做赚钱少的小号生意，致使他无法应付市面，维持生活。一气之下，关了古玩铺，去开油盐店，卖油盐酱醋去了！最终还是从赚小钱中维持生活。

陈养泉（1896—1952），名利昌，北京丰台人。幼年家贫，读书不多便到琉璃厂一家小古玩铺集雅斋学徒。但他善于钻研，对古代铜器、珐琅器、瓦器、木雕石刻等文物有研究兴趣，并取得成绩。1915年，赵鹤航请他当了延古斋的经理。在延古斋主持鉴定经营文物23年，在国内外文物收藏界中出

了名。1938年后，自己开设养源斋，鉴定经营铜器、石雕木刻、冥器、陶瓷等文物，直至1952年去世。

他对铜胎掐丝珐琅器有研究。“九一八事变”前后，岳彬从陕西客商手中买了件铜胎掐丝珐琅盘，蓝色浅淡而粗糙，掐丝反而细致精美。岳彬将盘卖给英国古董商高林士说，这掐丝珐琅盘是唐代的。陈养泉鉴定说：“铜胎掐丝珐琅是明代宣德年间才有的。”时至今日，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始创于何时，中外文物鉴定界仍是这两种见解。

陈养泉为人和善，笔者幼年看见他时，他总是笑咪咪的，是位体胖长者。据老行家讲，他做买卖不够干脆果断，粘粘搭搭。有一次他同夏锡忠到祝近斋家，见件唐三彩瓦马。他同夏说，你买下来，咱俩伙着。夏给祝400元买下，陈养泉嫌贵犯犹豫了，夏问：“养泉！你伙不伙？”他嘻嘻不答话，夏锡忠脾气暴，举起瓦马摔碎了！但是，陈养泉一辈子没买过打眼的或价格高得离谱儿的货，在古玩界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中孚（1896—1961），名德英，通州西集镇寨府辛庄人。宣统二年，由他的表舅常惠川（内务府庆宽的总管）带他同岳彬一起来京，引荐给大观斋掌柜赵佩斋当徒弟。1917年帮姚栋臣开古欢阁。1919年，在博韞斋当伙计，后博韞斋经理杨伯衡出资，住三元店夹包做古董生意。1928年，在雅文斋当二掌柜，跑上海做古玩生意。1940年，岳彬给他出资在琉璃厂开文古斋。1955年，岳彬被判刑后，岳彬的小太太翠云揭出文古斋是岳彬出资开的，全部古玩陈设被没收，陈中孚被净身出户。而其中被没收的古玩文物和家具陈设还有他的股份，他却不敢说出去。所以，他除了自己的衣服、行李外，全被充公。1961年贫困疾病而故去。

他鉴定宋代名窑瓷器、明清官窑瓷器、青铜器、杂项文物有较好的眼力。1928年，政府南迁后，他跑上海，同上海古

玩界、收藏界熟悉。北平文物市场冷淡，他长年在上海做生意，在文古斋当经理时也常去上海。上海有他做生意的门路，北京琉璃厂的这家古玩铺才维持住。

在上海，他通过岳笃周卖给张群一对乾隆官窑黄釉青花九龙瓶，张群曾用这对九龙瓶为蒋中正祝六十大寿。而这九龙瓶乃赝品。除官窑瓷器仿制品外，他也卖后挂彩瓷器。上海同行称他“小窑瓷器陈中孚”。虽然卖小窑瓷器，却一直有销路。因为他买卖的还是真东西多。

李健平（1896—1967），名永康，山西临汾人。幼年在琉璃厂德宝斋学徒，李德宣的徒弟。学徒时他能吃苦用功，对田黄鸡血石章、古墨古砚有研究，看铜器的眼力也好，吃硬片也在行。1931年，他同师弟李欣木合伙开永誉斋古玩铺。李健平做事稳重，受到老收藏家们欢迎，北平沦陷前，他做老翰林袁励准、北京政府时任盐务署长的收藏家王幼平的古玩生意。他同韵珍斋崇庆瑞合伙做过孔圣人的七十七代孙、衍圣公孔德成的古玩买卖，卖给他一台大圆覆寿砚。日伪统治时期，他做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珣的田黄、鸡血石章的生意。汪时珣收藏各类石章最多，大部分是经过李健平搜集到的。

李健平在鉴定田黄、鸡血石章上有专长，解放后的1956年，他开的永誉斋加入公私合营，他本人只做文物商店的业务员了。

何玉堂（1897—1985），河北大成县人。父亲是位瓦匠，在内务府当差，维修皇家花园的房屋建筑。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把这位瓦匠吓跑，跑回老家种地去了。民国元年，他带着14岁的儿子何玉堂进京，住在南城头发胡同小店里，外出做瓦匠活打零工。35年之后，这位小泥瓦匠在北京开了两家古玩铺，在上海五马路租房做古玩生意，开了家不起字号的古玩

铺。他本人从文盲泥瓦匠，成为平、津、沪古玩界出了名的陶瓷鉴定家“何山药”。北京解放后，他没参加公私合营，靠卖积存的货底维持生活。60年代在西单商场附近摆旧货摊，卖旧货。活到88岁而终。在古董商中，他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详细内容，请看《文物话春秋》书中“何玉堂由文盲成为陶瓷鉴定家”一文。

刘宜轩（1899—1982），江苏太仓人。父刘少溪于光绪年间在上海、南京路开宝华祥古玩铺，刘宜轩是古玩世家子弟。兄刘宝庚在上海青帮头目黄金荣手下，经常来京邀请京剧名角到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又由黄金荣出资，按上海大世界模式、在北京香厂路建起一座“新世界”，刘宝庚当了新世界的总经理。刘宜轩不靠父兄，自己闯出一条路。幼年住在古玩铺，入上海外语学校读书，通晓英、法两国语言文字。1918年，19岁的刘宜轩来北京，给英国古董商阿伯特、美国古董商布洽德当翻译，经常来琉璃厂。1921年，他在北京南小街租一所四合院，做起了洋庄古玩生意。他身材矮小，戴银丝近视眼镜，走路快、不迈四方步，又加上他爹跟琉璃厂老古董商都熟，他在家排行老四，故而都称呼他：“小刘四”。这个绰号一直叫到他84岁临终，不少老古玩行人忘了他的大名。20世纪90年代，一说起“小刘四儿”，人们会乐，会觉得刘宜轩的一生都快快乐乐、不发愁，招人乐的事儿也很多。

刘宜轩的文物知识丰富，英、法语熟练，翻译起来，妙趣横生，令人倾倒。他给布洽德翻译“拱璧”和“诸葛鼓”，给行里人留下深刻印象。当布洽德问他，拱璧在中国古代做什么用？他双手拱抱这块璧，用英语回答说：“是拱抱着的璧玉，中国古代天子祭天时拱抱躬身用的礼器。”并引申解释说：“中国人重视拱璧，汉语中用‘拱璧’这词比喻极珍贵之物，譬如布洽德先生生了儿子，很珍贵、喜爱，中国人就会说，布

先生生一子，视为‘拱璧’。”布听了哈哈大笑，说：“我喜爱我的儿子，可不能总是抱着他，那就太累了！”翻译诸葛鼓时，刘宜轩给布洽德讲起《三国演义》中的七擒孟获、祭泸江的故事。说这鼓是一鼓两用，打仗时击鼓用它，驻军埋锅造饭时，把它当锅用，是诸葛亮的发明，这鼓是在云南省发现、运来的。布洽德听后说：“这鼓里还有这么多故事，中国的文物历史故事多，美妙极了！”

1928年，刘宜轩从南小街搬到南河沿一所大四合院，起了个字号叫大仁济古玩店，又在本司胡同租一所房，办起玉器作坊来了。十年磨玉出珍品，仿乾隆作碧玉工艺美术品大部分卖给了美国人和日本人，京、津、沪的收藏家也有人搜集收藏的。1939年，刘宜轩办的玉器作坊关了，是同郑瑞生、郭静安合伙办的。发了财，他不善理财，也没把钱放在眼里。大手大脚地花钱，大仁济也赔了进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又重新当翻译，带着美国人劳恩斯到前门挂货铺，拿起一对马镫，双镫一碰，声如钟磬；再一晃动，马镫上的龙眼转动，龙舌伸吐，龙嘴里的珠子滚动，迸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刘宜轩边摇晃马镫，边用英语说明，说这马镫是乾隆爷骑马打猎用过的，并描述乾隆皇帝游猎情景。他的流畅的英语同马镫的声响，节奏合拍，抑扬顿挫，不时引起人们的欢笑声。

日本投降后，刘宜轩既当翻译又做古玩生意，赚了些钱。听说济南文物市场出现宋定窑渣斗是罕见珍品，在济南被围的形势下，他派人坐飞机去买，结果是“空去空回”，赚的钱又搭了进去。

解放后，他曾去香港做古董生意，香港同行给他出主意说：刘四爷！就凭您的本事，在香港集资去日本东京买古玩，带到纽约去卖，赚钱不成问题，东京、纽约的古玩界会欢迎您。但他认为外国人不讲人情义气，还是生活在自己的国土

里，和同胞们接触有乐趣。从香港回北京，分配在北京工艺品出口公司（后改为首饰公司）工作，仿做过玉雕石刻，为出口创汇做过贡献。但对他的使用不够大胆，许多作用未能发挥。这样好的翻译家，未用他做法语翻译，只是公司偶尔跟法国人打交道，让他给翻译几句儿。他自己写了些古玩、珠宝钻石、玉雕石刻方面的文字资料，他死后已佚散。刘宜轩的详细资料，已记录在《文物话春秋》里的“古董商中的翻译家刘宜轩”一文中。

骆泽民（1900—？），沈阳人。1921年至1931年在沈阳鉴定经营古钱。1931年来京在东华门开汇泉堂古钱铺，1955年，汇泉堂搬到琉璃厂，1956年加入公司合营，骆泽民分配在文物合作商店工作，1962年，他被中国历史博物馆聘为顾问。

骆泽民是鉴定经营古钱四十多年、有丰富的鉴定经验、所见钱币很多的人，但他缺笔墨无著述。而在老古玩界中却流传着他的故事传说。

古玩行人说做古钱生意的，讲价钱特殊，不像卖古玩的说话算数。他们说了价，若不当时给钱，你再去买又是一个价，经常“来回拉抽屉”，说话不算数。以骆泽民卖嘉靖官窑青花五彩梅瓶为例说：传说骆泽民在“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跑来北京，带来这件梅瓶。他曾因这件梅瓶吃了官司，圈在狱中。“九一八事变”沈阳乱了套，狱中人全跑了，骆泽民也随之而去，带领家人来到北京，在东华门开家古钱铺，给梅瓶拍了照，分别给了几家古玩铺，先看照片后约看货。这瓶值多少钱他心里没谱儿，便用卖古钱的办法，同古玩行人做买卖。古玩行人做买卖是靠消息灵通和自己的眼力，见到照片时，便知道这梅瓶是盗墓出土的，曾在奉天登在报纸上。骆花五百元买下，吃的官司，他趁事变之乱，将梅瓶带来北京的。

铭珍斋掌柜韩敬斋是年近 60 岁的老行家，他先被约去看货。他看这明嘉靖青花五彩梅瓶，完整无损还带盖儿，彩头艳丽，釉色光润，胎骨精细，款识端庄，图案花纹密满，浓翠红艳具备嘉靖官窑五彩的风格，是件好货。韩问：多少钱出手？骆答：您看值多少钱？韩说：我看值两千！骆说：我想卖五千！结果买卖没做成。

博韞斋和雅文斋两家合伙要用五千去买，不料，骆泽民不卖，还说：给我六千块钱，我就卖给你们。雅文斋掌柜萧书农说他要价没准谱儿，昨天说五千，今天给五千又不卖，明天你会要八千啦！骆说：怎没谱儿，你拿现钱，我就卖给你们。岳彬听说，骆泽民要六千，他觉得值，便坐车去了。骆见岳二爷来了，六千元不卖了，开口要八千。岳彬财大气粗，手一拍桌子说：八千就八千，东西我拿走！骆又变卦了说：咱们是一手钱一手货。岳彬说：谁提溜一口袋钱来买货？！钱，我不会差你分毫。骆说：您什么时候拿钱，咱们再说价钱了。岳彬数落他两句，抬屁股就走了。

荣兴祥掌柜贾腾云是老谋深算，他想要是照先前去的四位掌柜的那种买法，东西还不会买到手。他找位日本古董商合伙去买，日本人把大明五彩叫“赤绘”，收藏家特别喜爱。这位日本古董商跟贾腾云有二十多年交情，俩人商量好，第二天去了东华门汇泉堂。日本古董商穿和服留着八字胡，一进门就被认出。贾腾云介绍说我和这位日本朋友打算伙买你的那件梅瓶，听说你要价八千，岳彬没买走。我们想买就匀给我们吧！骆说：你们想要是一万元，少一个子儿我也不卖了。贾说：一言为定，可不要反悔啊！骆说：这有什么反悔的，你拿钱来我给你货。贾腾云马上掏出万元支票，告诉他当天可取。骆想再找借口拉抽屉，看着旁边坐着的留八字胡穿和服的日本人，坐在那里不吭声，眼睛却直盯着他，怪□人的，也就没再说什

么，将梅瓶卖给了贾腾云。

靳伯声（1901—1967），河北香河县人。1915年到天津一家南纸店学徒。1923年，在天津自己跑业务，经营新字画和仿古画。1926年来北京在粮食店街上的北方旅馆租长房，做起新旧字画生意了，同当代的书画家交往，和琉璃厂论古斋、韵古斋古玩铺，清秘阁、荣宝斋南纸店做买卖。1944年，他将在琉璃厂开了34年的论文斋倒到自己的手里，开起古玩铺，鉴定经营古代名人字画，入了古玩行。1956年加入公私合营，分配在宝古斋当业务员，1967年去世。

这位经营南纸、新字画出身的人，同国画大师张大千有深交，鉴定明清字画的眼力好，书法也堪称一家，他的故事在老古玩行人中传说着。

1956年合营后，宝古斋的业务人员展视一幅唐伯虎的仕女画轴，大家都说好，是唐伯虎的杰作，靳伯声却说：“画胖了。”人家问他，你怎么知道是画胖了？他说：我见过真的唐伯虎仕女画没这么高大肥胖，这是张大千仿的。大家愕然。他说：张大千仿唐寅、仿石涛、仿八大山人、仿陈老莲诸家之作多矣！我跟他是人熟，笔墨也熟。不知底细者认为他在吹牛。60年代初，国内生活困难时期，大千先生从海外给他寄来两幅亲笔画卷，通知他到海关去领，他顾虑重重，怕因有海外关系受影响没敢去领。

他同张大千认识约在民国十五年前后。早年当过奉大都督、被袁世凯封为一等伯、列名将军府、兼参议院参政的张锡奎生前抵押在交通银行一批明清字画，过期来赎，靳伯声做了这笔生意。将张锡奎的这批画卖给天津的一位银行界、著名收藏家黄子久。此时，大千先生正住在黄家，专门摹绘明清名画家之杰作。经古董商张盘甫之介绍，靳伯声代为销售张大千仿作之古画。到1944年，靳伯声开论文斋前，见荣宝斋摆有张

大千画的 12 扇通景山水画的围屏，想请张大千也给论文斋画通景围屏，大千先生点头应诺，后因先生离开沦陷区未画成。

靳伯声幼年在家念书时，毛笔字就写得不错，过年时给街坊邻居写春联。在天津学徒时，结识书法家华世奎、张伯英。在他们的指导下，法书大有进步，有人请他写牌匾、对联、中堂。他把论文斋倒到手后，自己写匾，把挂了 34 年由著名书法家貽穀写的老匾摘下。

1945 年至 1946 年，靳伯声曾去东北收购溥仪收藏在“小白楼”里的历代名画。此时，溥仪已逃走，“小白楼”中之珍藏佚散在街市上。传说，他收购到的名画，有的卖给了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有的卖给了收藏家张伯驹。

据说靳伯声开论文斋，自己的资金不足，请他家乡的一座大庙主持僧将庙上的土地卖掉入股开古玩铺。“文化大革命”中从他的家乡来了两位农民，把他押解还乡清算，进行批斗。他积郁成疾，病死在故乡。

司仁甫（1901—1981），河北束鹿县人。1915 年来京，在东四牌楼荣兴祥跟贾腾云学徒。在荣兴祥干了 25 年，经多见广，眼力练出来了，在鉴定宋元瓷和明清官窑瓷器方面较有名望。1940 年，他同师弟谢君忱、刘尊三合作，在琉璃厂开协记古玩铺，又在上海五马路开设荣古斋古玩铺，以鉴定经营明清官窑瓷器为主。1949 年两处古玩铺全关了张，开了十来年都经营什么好官窑瓷器，已无人能说出。只有一对乾隆作的带镶嵌黄杨木大顶箱立柜，人们还记得。师兄弟把买卖分了，不知这柜落在谁手。

“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中，贾腾云的后代将一对乾隆官窑珐琅彩碗交公，一些专家鉴定是真的，有人说是仿的，真、仿难下结论时，司仁甫出头说：不是真的，也不是仿的，是旧胎后挂彩的，并说出它的来龙去脉，是他师傅贾腾云请詹

远广做的手艺，一直没敢卖，怕丢荣兴祥的名誉。

苏凤山（1901—？），北京人，幼年在隆福寺三和公硬木家具铺学徒。民国十五年，他将琉璃厂雅韵斋倒到手，经营到1954年关了张。一位经营硬木家具的，鉴定经营起古墨、端砚、杂项文物，对宣德炉有了研究。

琉璃厂古玩铺差不多家家都有宣德炉，真的很少，对它有研究的人更少。苏凤山是在帮助收藏家陈汉第、邵章搜集宣德炉，做他们的买卖中，学懂看宣德炉的。明代宣德年间所铸的铜香炉，后代仿铸的太多，鉴定宣德炉极不容易，苏凤山独具慧眼，在古玩界有名气。可惜的是他没将自己的鉴定经验传留下来，1954年，他到西单商场做皮箱买卖去了。

周殿侯（1903—1989），河北束鹿人。1918年来京，在琉璃厂益珍斋学徒。1931年由天津银行界黄子久出资，在海王村公园开集粹山房，直到加入公私合营。他鉴定书画有眼力，知道古玩书画掌故多。80年代中期，笔者曾拜访求教，他说他见过张少帅，跟罗振玉有来往，参加过“湖社”，张大千、溥心畲、齐白石都跟他不错。现在正写书，书稿谁也不给瞧。问他过去的书画鉴定经营，他答：等我的书出来，你就知道了。之后，张庆华师兄告诉我，周殿侯跟苏盩春不错，苏在广州验关，年年回来跟他聊书画鉴定和回忆往事，可能他们俩在写作，不给别人瞧。1988年，再次见到周殿侯时，他显得孤僻，和常人不一样，古玩书画往事一概不谈，却自称是形意派武术家，脚心长毛，能“飞檐走壁”了。见他如此这般，笔者只能苦笑。不久，听说他去世了，终年86岁。

倪玉书（1903—1967），河北武清县人。1918年来京在同益恒古玩铺学徒，是萧延卿、张彬卿的大徒弟。1939年，他同师弟陈鉴堂合伙开鉴宝古玩店。40年代初，陈鉴堂自己开设清记古玩店，他独自经营鉴宝古玩店，至北平解放。

倪玉书鉴定金石在三四十年代的古玩行中，他同乔友声、黄镜涵被称为“三杰”人物。外表看他不像老古董商那样走路都迈四方步，而是西服革履，高高的个子，腰板挺直，洋人的神气。他练习写毛笔字颇有功底，楷书、隶书、篆书都写得不错，老古玩界人士中有人还保存他写的扇面。他善于学习。日本古董商平野懂化学，用化学方法给青铜器做假锈，土办法做假锈色他也明白。1939年，他曾指导小古铜张铸造仿北魏鎏金佛像，很是成功，被德国鲁麟洋行、日本山中商会和法国魏武达在巴黎开的古玩店，各家买走了一尊。他曾在日伪统治时期，打扮成道士，去山西大同武周山道观，考察武周山洞窟里的北魏石雕佛造像两个来月。回来后请人仿作北魏石雕佛造像，仿制也是很成功。

此人略有文采，谈古论今亦有见解，却不知为何入了“九公道”，宣扬起迷信来了。解放后，“九公道”定为反动会道门，他未被文物机关和商店任用。“文化大革命”初被撵回老家时，他自溺于筒子河中。

金从怡（1904—？），上海人，古玩世家子弟。父金才宝于光绪年间跑北京，给北京、上海的古董商跑合拉纤，民国初年在上海五马路开金才记古玩店。1921年，金才记由金从怡经营，做外国人的古董生意，直至1950年移居香港，在香港去世。

金从怡是位有学识的古董商人，鉴定经营三代秦汉青铜器、唐三彩、浮雕石刻、宋元名窑瓷器有眼力，同外国收藏家、古董商人做生意。他经营的金才记在三四十年代是海内外闻名的上海第一大的古玩店。上海金才记、北京彬记是国外文物鉴赏收藏家、古董商人人皆知的。但由金才记出口了什么珍重文物，却无人能说出一二。

叶叔重（1903—1976），江苏人。同卢钦斋合伙开办卢

吴公司的吴启周是叶叔重的舅舅，后姑舅成亲被招为女婿。清末民初，卢吴公司往法国巴黎出口文物。叶叔重曾在法国留学，1928年回国帮岳父吴启周做古董生意，起个字号叫“禹贡”。三四十年代，叶叔重在古玩、珠宝界很出名，绰号“叶三儿”。他看铜器、瓷器、石雕木刻、宝石玉雕都有眼力，同北京、开封、洛阳、西安、上海、天津、广州、香港的古玩珠宝界都有联系，出口文物经他的手的珍品不计其数，具体东西很少有人能回忆起，而流传有叶三“盗宝船”之谜。说是彰德府出土八大青铜编钟，经通古斋乔友声请修理古铜技师王德山给清理除锈又装入木箱运往上海。叶叔重在上海装船，将八大青钟编钟和其他文物运往美国纽约，在海上遇难沉船，八大青铜编钟沉入海底中，后人再未能见到这组大编钟。

1952年，叶三仍往国外走私出口文物，被政府判刑，发往西北，不准返回京沪。后死在西北。

仇焱之（1907—？），江苏人。1922年，在上海五马路晋古斋跟朱二学徒。“九一八事变”前后，仇焱之鉴定明清官窑瓷器和宋元名窑瓷器出了名气，经常来北京，自己做古董生意。后来他结交了一位瑞士国籍的老人，老人无妻室儿女，跟他生活在一起。中国人有孝敬老人的好传统，仇焱之继承发扬之，感动了这位外国老人，认他为义子。从此，仇焱之在上海有■山路和愚园路公寓两处居住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做美国人古董生意的销路被隔断，为了解脱困境，上海六名大古董商人：仇焱之、张仲英、戴福葆、张雪耕、洪玉琳和管复初联合起来成立“六公司”，同叶叔重的“禹贡”竞争。他们不断来北京买卖货。仇焱之面善和气，和北京的古董商岳彬、范岐周、崔耀亭、郭静安、崔仲良、孙瀛洲、陈中孚等人较熟悉，大家都叫他“小仇”，他并不在意。日伪统治时期，他从北京买走不少明清官窑瓷

器。“六公司”解散，许多好瓷器归了他自己。

抗日战争胜利后，仇焱之来北京、去香港做古玩生意，他人缘好，眼力也好，京、沪、港的古瓷买卖做得不错。1948年，他将上海存货移到香港，在香港做古董生意了。1950年，北京的同行去香港还见到仇焱之。之后，听说他去了瑞士，入瑞士国籍了。

1987年，笔者同程长新见面时，他拿出法国报刊上登的半幅照片中有岳彬、崔耀庭、王栋廷等人和仇焱之。程师兄是让笔者看他师傅岳彬的照片在外国报上刊登。只说，“小仇”到国外去了，详细情况他不知道。1992年，笔者见到海外出版的《郭良蕙看文物》书中“宝归何处”一文，才知道1980年11月25日苏富比在香港富丽华酒店举办拍卖会，拍卖仇焱之所收藏的175件古玩瓷器，此时仇焱之已故去。175件瓷器中宣德雪花蓝大碗是1942年仇焱之从琉璃厂陶庐买走的，当时才卖他800元，而1980年拍卖到370万港币了。陶庐的东家范岐周老人看到这篇文章，回忆起仇焱之的往事，喟然叹曰：“小仇辛苦一生，搜集了许多明清官窑瓷器，转眼被儿孙拍卖殆尽！”郭良蕙的书使北京古玩界人士得知，昔日的“小仇”早已是世界上收藏陶瓷的五大家之一。他虽然早已故去，仍令老同行们既怀念又兴奋。

贾济川（1903—1985），名来顺，山西襄陵人。德宝斋李德宣的徒弟。20年代初帮师兄毛子恒经营渊识斋古玩铺，1928年，在琉璃厂开晋秀斋古玩铺，1956年加入公私合营，贾济川入文物商店当业务员。

他鉴定铜器、玉石印章有眼力，看字画也可以，在老古玩界是有声望的人，为人老实和气。他所鉴定经营的文物，今已无人能回忆得起。人们还记得晋秀斋开张时，悦古斋韩博文去祝贺，买了他的一幅画。有人说这幅画是唐代画家韩幹《照

夜白图》，有人讲是元代画家黄公望、大痴道人的山水画。买得很便宜，才 160 元钱，都是仿的。韩博文把画拿给溥心畬看，溥将画挂在书房里。一位英国朋友去看望溥心畬，特别欣赏溥先生书房挂着的这幅画，花 4 000 元买走。韩博文赚了一大笔钱，重修悦古斋。

从这件往事中，又传出英国人戴维德从溥心畬手中买走的韩幹《照夜白图》，就是韩博文从晋秀斋买来的那幅画，是仿的。这幅画辗转流传六七十年，由英国人转到日本人手里，终于收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90 年代，我国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曾去观赏、鉴定，认定是唐代韩幹之真迹，从而才证实贾济川卖给韩博文的那幅画，不是韩幹《照夜白图》，而是黄公望的一幅山水画。

刘廉泉（1905—？），名清选，山西汾城县人。幼年在家乡私塾读过四年书，1920 年来京在琉璃厂德宝斋跟李德宣学徒。在学徒中他的“四书”底子较厚，读过背过，毛笔也写得好，很受师傅器重。在德宝斋十五年，学徒时见过张学良来德宝斋，也见过一些清代的翰林，并做他们的铜器、秦汉印章等文物生意。

1935 年，开摧古斋。人们问他“摧古”怎么解释？他说我看《张宣公翰苑集》“序”中：“公之秉笔内署也，摧古扬今，雄文藻思，敷之为文诰，伸之为典谟。”借用其中“摧古”二字。摧古者，研讨古代文物也。同行人说他是位山西老学究。这位学究，认识些钟鼎文字，也能辨识秦汉印章上的字，看青铜器、石雕、玉石印章有眼力。经营上较保守，终未发财。

耿朝珍（1904—1978），名金元，河北霸县人。幼因家贫，进保定府给曹锟当了底下人，从小当差伺候人。1920 年，随曹锟进了北京城，在中南海居仁堂当茶房（打杂儿的工

役)，给曹锟端茶倒水。1924年，曹锟被冯玉祥幽禁于中南海延庆楼时，他住进炭儿胡同一所曹锟买下的大宅院，开始做古玩珠宝生意。1926年，曹锟获释回天津寓居，他到天津太康商场，将利康金珠店倒过来开家小古玩铺，做下野军阀的古董生意，同时跑北京、上海做古玩买卖。1931年以后，他先同孙公寿，后又与孙瀛洲在上海合伙做铜器、瓷器等文物生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上海买古玩到北京来卖，往返于上海、北京之间，而定居在北京炭儿胡同，直至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后在琉璃厂振寰阁当业务员，利用他在天津的关系，从天津寓居的北洋军的后代人手中收集到一些珍贵文物，为国家做出过贡献。

他虽然是出身于伺候人的底下人，但鉴定青铜器、陶瓷、唐三彩、珠宝钻翠都有好眼力，二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天津、上海很有名气。1987年，美籍华人老古董商李汝宽回国来京时还问耿朝珍是否健在，说他是古玩行中眼力最好的一位。耿朝珍由外行变内行，在老古董商中传说着他的故事：伺候曹锟的有两个年轻人，耿金元、曹景勋。曹锟当直隶督军和当大总统时，他的这两位仆人，经常来琉璃厂从古玩铺里给曹锟买古玩。曹景勋买些花里胡哨的小玩艺儿，跟古玩行人闲聊时说的是“海天西”没影的事儿。耿金元买古铜、旧玉、好瓷器，好听行家讲古玩掌故轶事，没有旧听差的那些坏习气，渐渐他懂了些鉴定知识。民国十三年，曹锟被幽禁在延庆楼时，他住在炭儿胡同开始做古玩珠宝生意，炭儿胡同东边是廊房二条都是玉器珠宝店，西边是琉璃厂，净是卖古玩的。耿朝珍跟各家古玩铺、珠宝店掌柜的打交道、闲聊，慢慢地他知道了鉴别各类古玩珠宝真贋的方法了。几十年买卖古玩珠宝的经验很丰富，行家里手都佩服。1979年，河北省博物馆聘他去当顾问时，才知道他已于1978年病死在河北霸县的乡下老家了。

马振卯（1907—？），河北束鹿县人。在杭希阁跟田健秋学徒。田健秋是悦古斋韩懿轩的徒弟，看字画很有眼力，马振卯却钻研了古墨了。民国二十六年，他在琉璃厂开设玉网斋，鉴定经营字画、古墨、端砚，直至加入公私合营。

古玩铺差不多家家都有古墨，但不多。收藏古墨的有位翰林袁励准，自己搜集许多名墨，著有《中舟藏墨录》，书法篆刻字寿石工收藏古墨多，著有《玄尚精庐墨录》。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珣在日伪统治时期，不断来琉璃厂搜集古墨。而琉璃厂古玩铺藏墨最多的属玉网斋了，马振卯花了二三十年心血搜集到名家名墨最多，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的御制墨，可说是制作精良，精绝千古，世间难得。公私合营后，公家收购，折价四千元，他拒不收款。传说，在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他饿死在街头。他的墨价值百万。

黄镜涵（1904—1966），名金鉴，原籍湖北，生于北京，古玩金石世家子弟，黄伯川之子。幼年读书，上了师范大学，在文学系还没毕业便在琉璃厂尊古斋，学金石鉴定，帮助父亲记账，经营古玩铺。1944年在通古斋当经理，1956年加入公私合营，后被中国历史博物馆聘为顾问。后感无所作为，心情苦闷，以酒解闷，毁坏了身体，1966年，62岁便去世了。

他对青铜、石雕、古玉、古陶都有研究，眼力也好，被同行誉为看铜器的杰出人物之一。还识些金文、甲骨文，50年代初，郭沫若曾访问过他。1955年、1958年、1962年，黄镜涵先后向北京故宫博物馆捐献青铜器、古玉、陶片、汉印共计106件。1986年，故宫博物院给补发了捐赠文物凭证。

崔仲良（1905—1958），河北冀县人。民国七年（1918）来北京，在东四牌楼义兴和古玩铺学徒。民国十二年（1923），他开设保粹斋古玩铺，鉴定经营宋元瓷和明清官窑瓷器，直到1956年加入公私合营，共有33年整。他的眼力

好，经验丰富，名声远扬，80年代台北出版的《郭良蕙看文物》还记述了崔仲良之名。

北宋官窑瓷器，在老古玩界中只是听说：宋徽宗赵佶于大观、政和年间，在宫里自置瓷窑烧造瓷器，所以叫官窑瓷器。可是谁见过官窑瓷器呢？“九一八事变”前，小宣统到了东北大连，保粹斋崔仲良从太监手中买了件北宋官窑翠绿双耳炉，令人们大开眼界。这件官窑瓷器的造型是仿古铜器彝炉，六寸来高，有盖有耳，规正端庄；胎骨坚密，紫色黑地，釉色莹润，葱翠碧绿，釉中有开片；“紫口铁足”，口部釉厚是紫色的，底部露胎处是黑色的。

崔仲良将这件稀世珍宝卖给了上海古董商洪玉琳，洪玉琳把它出口到英国去。洪玉琳发了大财，崔仲良的名声传了出去。

崔仲良幼年出天花没钱医治，落一脸麻子，绰号“崔麻子”。老古玩行都说崔仲良是位守本分的人，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待人和气，发了财也不妄花分文。1956年，虽然他自愿将保粹斋公私合营，后又将分司胡同他的一百多间房产，交给东城房产局，接受私房改造，但他的心理总是不平衡，觉得这辈子自己冤枉，只知做买卖赚钱，不胡花乱为，没享受过，自己对不起自己。经常苦思，心中郁悒，日久天长作了病，觉得胸部发闷，也没去医治。1958年初，文物业在琉璃厂火神庙开批斗“右派分子”邱震生大会，崔仲良参加大会，会后雇辆三轮车回家，中途死在车上了。因而有“斗争邱震生，吓死崔仲良”的传说。

杨兰^增（1905—1987），山西襄汾人。1921年来琉璃厂英古斋学徒，受业于关子光门下。英古斋是古玩界鉴定田黄、鸡血玉石印章的权威商号，开设八十余载，杨兰^增是最后一任经理。他鉴别、经营田黄、鸡血印章、旧玉件、雕漆盒、古墨

端观等文玩，是位权威人物。1948年，英古斋歇业，他返回家乡，在地方曾鉴别过一段时间的文物，但未发挥其专长，默默老死在穷乡僻壤。

据邱震生生前回忆，杨兰^增鉴定经营过一副田黄印，一副大印，昌化石章，使他难忘。这副田黄印，色泽莹润，雕工精细，是虎头印章，杨兰^增把它卖给了汪时颢，才一千二百元准备票（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出的票子，汪时颢是该银行的总裁）。

昌化石章是杨兰^增从山西太谷买来的，高约15厘米，6厘米见方，特殊之处是一面红、一面黄、一面黑，另一方面是黑红黄，古玩行人给它起名叫“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印章。既是天然产物，又巧夺天工，雕琢精细，质地莹润，红呈鸡血，黄如蜂蜡，黑似漆墨，确是稀世珍宝，人间罕见之奇物。杨兰^增得此奇珍异宝，献给张伯驹欣赏，张见此宝欣喜若狂，花重金收购，具体价目不详。日汪统治上海时，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去上海，带去这副印章，给朋友们欣赏。不料慢藏诲盗，张伯驹被上海的青红帮勾结日汪政府官员，绑架走了，急坏了潘素，八方求援，设法搭救，花了很多钱才把张伯驹赎出来了。人安然无恙，可那昌化石章呢？邱震生说：是被人抢走，还是仍收藏在他的身旁，可就不清楚了。

李欣木 名向荣（1905—1966），山西临汾人。1920年来京，在琉璃厂德宝斋学徒，是李德宣的徒弟。他鉴别玉石印章练出了好眼力、好手头，一块田黄石章用手一掂量，就能说几两几钱重，用戥子一称不差分毫。那时一两田黄石是一两黄金的价格。1931年，他同师兄李健平合作开设永誉斋古玩铺，直到1956年加入公私合营，被分配在文物商店当业务员，到河南、山西去收购文物。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个阶段后，文物商店打电报要他从山西回京参加运动。接到电报

后，他心内慌惧，不知为何召回北京，怕卷入运动而忧郁惶恐，心脏病突发而亡。

李欣木人很善良而活跃，跟同行们的关系相处较好，心眼小，心里搁不住事。在日伪统治时期做汪时瓛的古墨、印章生意。日本投降后曾同崇庆瑞去东北买货，得苏东坡墨宝真迹，如获至宝。后被同行徐震伯看出是勾填临摹之作，真迹已被揭走。他们又找邱震生，邱震生打了眼，花四条黄金买到手。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邱震生才将事实向公方代表说明，他原谅李欣木、崇庆瑞对字画不懂行。

王孝禹（1906—1958），河北冀县人。1920年，在东四牌楼义兴和古玩铺学徒，1923年帮师兄崔仲良一起经营保粹斋。1944年，在琉璃厂开设馥粹斋古玩铺，1956年加入公私合营，在文物商店工作一个阶段便去世了。

王孝禹鉴定宋元瓷和明清官窑瓷器的眼力好，善交际，做买卖爽快，门路广。他与性格不同的师兄崔仲良合作21年，一位是抠抠缩缩，一位是大手大脚，怎能合得来、一起干了这么长时间呢？原来是王孝禹能干，能给保粹斋赚钱。后来，王孝禹抽上了大烟，才分手另开馥粹斋去了。

1944年至1948年，古玩市场生意萧条，馥粹斋就在这段时间里开张经营。同行人都说，王孝禹干不好，买卖“抽”进去拉倒！没想到他和烟友在烟榻上做成一笔古玩生意。烟友是原先给皇上家管钟的“钟杨”的后人，他要将四件玲珑精致的哥窑瓷器：小圆笔洗，印池、水中丞和小盘卖掉。王孝禹给了他两千元，便将这四件珍贵文物买到手。时间是在1945年春节前的时候。近半个世纪设在北京的日本山中商会，得到消息将这四件哥窑精致的瓷器买走，这也是山中商会从琉璃厂买走的最后一批好瓷器了。1948年夏季，上海古董商洪玉琳受金融巨头丁雪农之托，来北京搜集明代官窑瓷器，准备带往

国外。王孝禹将他收藏的一对明代宣德官窑霁蓝白花鱼藻纹七寸盘出手卖给洪玉琳是 60 两黄金。同行认为：这是遇上了准备带出国外的金融巨头，不然 20 两也卖不到，该王孝禹走运发财了！这也是古玩行业奄奄一息时期的“回光返照”。谁能料到古玩的价格也将随着太平盛世的到来而飞涨，一对宣德霁蓝白花鱼藻纹盘，而今是 600 两黄金也不会换了！

韩博文（1906—1987），名增贤，河北深县人。古玩书画世家子弟，韩懿轩之子。幼年在悦古斋长大，读了几年私塾，便去向黄宾虹学画画。1928 年继承父业经营悦古斋，他年轻就当上了掌柜的，老同行没看上他。没过两年，悦古斋变了样，盖了楼房，门市扩充了。原来是他从贾济川手中买了一幅大痴道人黄公望的山水画，浅绛色山多石头，笔势雄伟，画法别具一格。韩博文把这幅画拿给溥心畲欣赏。溥心畲说：“我喜爱黄一峰（黄公望的号）的另一种画法：水墨色皴纹极少，笔意简远，才是他的画中逸品。”又说：“这幅画先在我书房挂两天，我看看再说。”韩博文也没说要卖多少钱，就走了。没过一个月，溥心畲来电话让他去一趟。溥当面交给他四千现洋说：你那幅画被一位英国人看上了，他是来我家访问的，在书房看上这幅画，要求我匀给他。我说这是别人的画，你得给人家四千块，人家才能卖。不料，他当即要拿走。我本来想要这么高价，他也不会卖，只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了。韩博文一听，喜出望外，160 元买的，不到一个月就卖四千块！忙着给溥心畲作揖说：谢谢溥爷了！谢谢溥爷了！

韩博文继承父业，除鉴定经营字画，还搜集历代书画家的印章，同时搞些仿作。他们两代人搜集收藏历代书画家的印章很多。同行讲，1956 年悦古斋加入公私合营时，交给公家的就有三百多位著名书画家的印章。当时，未引起公方代表之注意，皆因他们是外行。

悦古斋鉴定经营历代名家字画很多，据他的徒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著名古书画鉴定家刘九庵回忆说：最著名的画要属北宋画家许道宁的一幅山水林木画卷。徐道宁擅写林木、平远、野水三种景色。这幅山水林木画是他老年所作，峰峦峭拔，林木劲硬，笔墨简快，浓淡分明，乃是他惟一的存世佳作，现在国内仅存的《渔父图》则不如这幅画了。约在“七七事变”前后，他将这幅画卖给上海一位姓崔的银行界巨头，崔某带出国外，后在德国发现，又流落到美国。

韩博文鉴定历代名家书画的眼力好，对历代著名书法家、画家、鉴赏收藏家、皇帝御览等的用印、文迹有研究；知道书画家轶事趣闻也多；跟当代书画界名人张大千、黄宾虹、溥心畲、齐白石、张伯驹等都是好朋友，他本人是黄宾虹的弟子，画一手好画。年轻时他好诙谐，爱开玩笑，和同行人的关系搞得较好。1956年悦古斋加入公私合营，分配他到宝古斋当业务员了。一天，宝古斋门市收购一幅《郎世宁花鸟画轴》，大家都看成是真的了。韩博文统观画面全局，鉴别一下印章，发现全局有差，印迹是假，便说：这是幅仿作。大家问他：你怎么看出是仿作？他回首一笑说：“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老来时韩博文的性格变了。合营后他工作不到两年，便退居斗室作画，以卖画为生。当时他给荣宝斋画幅书笺，每幅给他五元钱。他的性格变得孤癖了，一人生活，不大与人交往，默默地离开了人世间。

裴振山（1906—1968），名天锡，山西襄汾人。他是崇文门集珍斋王鹤年的徒弟，王鹤年是琉璃厂英古斋关子光的徒弟，属于英古斋第三代门人。可是他没走英古斋的路子，1938年开振寰阁鉴定经营金石了。他对青铜器、陶瓦器和石雕木刻很有兴趣。

1950年时，北京琉璃厂文物业萧条，裴振山联合，修理

复制唐三彩的著名技师李焕章，修复青铜器的著名技师王德山、赵振茂在琉璃厂振寰阁办起文物整修加工部。振寰阁加入公私合营后，文物整修加工部改名北京特艺公司文物加工部，仍在琉璃厂，后归北京文物商店领导。1959年，建国十周年时，北京市文化局将这个加工部归并北京市美术公司，继续整修、复制铜器、瓦器、石雕等文物，由琉璃厂汲古阁销售其文物复制品和代办整修文物业务。老古玩界人都说：“裴振山对整修、复制文物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虽然他自己没什么手艺，但组织起来坚持下去，就很不简单了。”

傅凯臣（1906—1968），名林■，河北南宫县人。1920年来京，在琉璃厂信古斋学徒是刘克昌、程秋浦的徒弟。刘、程是茹古斋的大师兄、二师兄。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的信古斋，主要是鉴定经营瓷器、铜器、杂项，也买卖些字画。傅凯臣在鉴定瓷器，铜器上有眼力，对字画不大在行。1929年，傅凯臣帮张孝禹经营鉴光阁，跟鉴光阁的东家张瑞亭逐渐熟悉、张瑞亭喜爱官窑瓷器，他帮助给搜集。1936年，张孝禹不干了，自己独资去开闻古斋，张瑞亭请傅凯臣当鉴光阁掌柜的。

行里人传说：张孝禹是悦古斋这门人，傅凯臣属于茹古斋的那门人，俩人“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傅凯臣能说会道，是他把张孝禹挤走的。鉴光阁由傅凯臣经营到1956年加入公私合营，他被分配在宝古斋当业务员。北京、天津解放后，文物市场上出现一对雍正官窑青花小瓶，一对乾隆官窑金地粉彩盖碗，一对嘉庆九江瓷紫地彩花勾莲茶壶，当时不值几个钱，但这些均属官窑器中的珍品，今日若拍卖这些官窑瓷器百万元也打不住了。那时是天津张瑞亭卖出去的，是早先傅凯臣给张搜集到的好官窑瓷器。傅凯臣在“文化大革命”中惨死在他的家乡。

陈鉴堂（1906—？），河北冀县人。1921年来京在同益恒学徒，是萧延卿、张彬卿的徒弟。在同益恒时跑过山西大同、河南彰德府等地收购铜器、石雕等文物。鉴定青铜器、北魏浮雕、唐三彩等的眼力好，对复制三代铜器、北魏石雕有研究。1939年，他同师兄倪玉书合伙开鉴宝古玩店，仿造北魏鎏金佛像发了财，二人又分开，自己开设清记古玩店。

40年代初，陈鉴堂鉴定一件西周青铜鸭子，轰动过古玩行。一天，大同来位客人到同益恒找陈鉴堂，这时陈鉴堂已自己开清记古玩店了。同益恒的纪国廉不问来客找陈鉴堂干什么，便将陈的新地址告诉了来者。后得知是来卖鸭子壶的，纪国廉后悔当时没细问，让财神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走了。

西周青铜鸭子壶是新出土的，绿锈斑斑，通身花纹，造型奇特，是一只卧着的鸭子，有嘴、有盖、还有把。陈鉴堂花四千多元买下，转手卖给叶叔重是三万元。叶将它出口到美国，不知卖了多少美元。这件西周鸭子壶的图片被荣庚收录在《商周彝器考》书中。陈鉴堂做古董生意，一些文物是通过叶叔重出口国外，他自己本人也做外国古董商的生意，都卖过些什么珍贵文物，始终是个谜。80年代末，笔者准备让他的徒弟、笔者的师兄张庆华引荐去拜见他，不料，张庆华故去，未能如愿。但听说，解放后他生活困难，曾卖过冰棍。改革开放后，外国人欠他的钱汇了来，又被国内企业请去指导仿造青铜器，晚年生活较富裕。

萧宏度（1906—1988），河北衡水县人。1920年来京，在琉璃厂笔彩斋跟陈东甫学徒，1924年在博韞斋当伙计，1938年，由萧书农出资，在天津太康商场开雅鉴斋古玩铺，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在天津文物商店当业务员。

笔彩斋在琉璃厂形成门系，以鉴定经营字画为主。萧宏度在博韞斋当伙计时，钻研瓷器、铜器、杂项等文物，而且很有

眼力。所以，1938年，萧书农才拿出2 000元给他在天津开雅鉴斋。天津北市场有家茶馆，一位姓潘的茶客经常拿着破铜鸭子壶在茶馆显摆，这铜壶用手摸得油亮，壶上的花纹也摸浅了。有一天被萧宏度看见，问姓潘的，这铜壶卖不卖？潘答：看你给多少钱了！萧说：也就值二三十块钱。潘说，才够买十袋洋面（44市斤的一袋白面粉）的钱，我不卖。经茶馆掌柜给说合，50元钱成交了。姓潘的从此不再显摆这掉了一条腿的破铜壶了。萧宏度将掉腿的鸭子铜壶拿来北京琉璃厂雅文斋。经鉴定是西周熟坑（出土时间长的）青铜鸭子壶，需要配腿补修。萧书农知道陈鉴堂卖给叶三的那件生坑（新出土的）青铜鸭子壶是三万元，故而提出伙货，先修后找买主。萧宏度同意了。修理费花了200元钱，成本总共是250元。招来同行看货的不少，还有德国古董商也来看货，但都知道这壶是50元买来的，就给价两千元，还有人看是唐代仿铸三代的铜鸭子壶，没给价就走了。最后还是卖给叶叔重了，是6 000元。萧书农一核计，得给萧宏度3 000元，不如雅鉴斋的买卖给他，那两千元资本我不要了，这3 000元也不给他算了！从此，在古玩行里有萧宏度买件破铜鸭子壶赚回了一家古玩铺的传说。

1942年，萧宏度鉴定经营明永乐官窑青花云龙葫芦瓶，曾轰动过古玩行。因清康熙、雍正仿永乐、宣德青花瓷器较多，内行人也鉴定不准，当时，惟有萧宏度和现在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陶瓷鉴定专家孙会元（那时他才30岁上下）看准是明永乐官窑青花器，不是康、雍仿。

萧宏度不仅看瓷器的眼力好，为人也坦率，宽于待人，与人为善。参加公私合营后，虽然只当名业务员，但在收购文物上做过不少贡献。活到82岁而寿终。

靳咨轩（1901—？），宛平县人。幼年在琉璃厂致宝斋

学徒。后来自己跑河南、山西收购新出土的铜、陶、瓷器。1928年后，同洛阳县长高少木认识，帮高收购些古董。

高少木弃官经商在北京琉璃厂附近的炭儿胡同开设大泉山房古玩店，聘靳咨轩当了伙计。大泉山房开张后，1940年以来，靳咨轩住炭儿胡同自己做古董生意，直到北平和平解放。这一阶段，他发了福，成了又高又大的大胖子，嘻嘻哈哈爱聊天。解放后，古玩生意暗淡，靳咨轩没辙了，推着冰棍小车，在廊房头条西口上卖冰棍了，人也渐渐地瘦了。解放初期，英国的白兰斯德想从北京买点古玩珠宝带回国，在去廊房二条的路上遇上靳咨轩推着卖冰棍的小车。他推着车躲避不及，白兰斯德见到他时，脸上现出惊愕的神色，说：“Fat man”！又说“Poor man！”！使他非常难堪。

靳咨轩在大泉山房时，经常做外国人的古董生意，外国叫他“Fat man”，就是大胖子的意思，所以，白兰斯德一见他面，说声“fat man”是打招呼；一看他这个样子，不由得喊出“poor man”——“可怜的人”来了。那时，谁知道这位推车卖冰棍的小贩原是位很有眼力的古董商，鉴定经营过铜器、陶器、石雕、鎏金造像等珍贵文物？！1956年，公私合营后，他没参加工作，鉴定文物的本事没处施展了，只可过穷日子度过余生。

邱震生（1907—1989），名云皋，京东燕郊村人（今属河北三河县），幼年在在外祖母家教养大，外祖父是位拔贡，教他读《四书》，练毛笔字。民国十二年（1923）来北京，先住在琉璃厂松华斋南纸店，他姨夫是这家店的经理。后由姨夫介绍到新开张的虹光阁古玩铺学徒。1931年，主持虹光阁业务，1944年，自己开设宝古斋，直到1956年加入公私合营。

他是老古玩行业中的惟一的民主建国会会员、北京工商联合会的成员；也是惟一被打成“右派”的人物。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后十年，他是古玩行里的头面人物，曾担任北京市文物

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也曾在乡下劳动 18 年。1978 年得到平反，回京安度晚年，1989 年底离开人世。死后在北京市文物商店发的讣告上为他冠以“北京名人、著名文物鉴定专家”的称号。他是笔者所写的 115 位老古董商传略中，惟一被公家称为专家的，但实际上笔者所写的都是文物鉴定专家，有的还属于“世界级”的收藏家鉴赏家。

1985 年，《北京工商史话》第一辑上发表了邱震生《古都的文物业》一文。1987 年，笔者与他重逢时，他说：那篇小文只写了个大约摸，再写详细我写不了。甭说我，就连和我在 1956 年同当北京市前门区政协委员的叶祖孚，他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这么多年他总想写一部咱古玩行业的书，至今他也没写出来。光有文笔不行，还要懂行。我懂的也就是字画、瓷器等文物，往深里说又说不出个子午卯寅，快 80 岁了，写不了了！他听说笔者要写，便拱手对笔者说：“拜托你给我们古玩行写出史话来！”从此，他无私地向笔者提供古玩行业的史实口头资料，并告诉笔者说：“要多向老行家们去请教，这里边的学问多。幸亏你在咱琉璃厂古玩铺呆过十来年，再下它十年功夫准能写好。”还鼓励笔者说：“古代文人的著述，都是自己学什么研究什么经历过什么，去写什么，没有专门什么也不干去当作家的。你能写好，因为你有那段经历，再加上在世的这些老行家的指教。但你要虚心，坚持不懈，百折不挠才有希望。”他的话激励着笔者。当 1990 年笔者的第一部书《古玩史话写鉴赏》出版时，他已谢世了，但那些鼓励的话，仍记在笔者的心头。

乔友声（1907—1972），名振兴，河北束鹿县人。幼年在尊古斋学徒，是黄伯川的徒弟。在尊古斋他学会鉴定青铜器、古玉、陶片、古印玺、石雕等文物，眼力较好，被同行人士称之为鉴定铜器的年轻的“三杰”人物之一（三四十年代看

铜器眼力好的倪玉书、乔友声、黄镜涵，被称之为“三杰”。他还懂“金文彝器全形拓法”和整修复制青铜器，识些金文字。东陵盗宝案案发后，黄伯川把尊古斋关了。1937年，开了通古斋，让乔友声当掌柜。抗战八年，他当了八年掌柜，1945年，通古斋由黄伯川之子黄镜涵当经理，乔友声自己单独做古董生意。1949年，他还乡闲居。1951年，被北京故宫博物院请回，在院内担任鉴定青铜器的工作。

据整修复制青铜器的专家王德山回忆：通古斋乔友声曾找他到琉璃厂黄家大院，见院中有几个大木箱，打开木箱见到的是河南彰德府新出土的八件青铜大编钟，带有坑土潮气味。最大的一件直径和高矮有八仙桌那么大，钟面宽径和高度在一米左右。让我除锈，其实，这批编钟锈蚀并不严重，只将内外附着的坑土清除一遍，又装入木箱，运往上海，寄给叶叔重。叶将其装入远洋货轮，出口到美国，不料中途遇难沉船了，八件青铜大编钟沉入海底，成为古玩行业的一个谜，来龙去脉谁也不清楚。

曹旭深（1907—1987），河北衡水县人。1922年在延古斋学徒，是赵鹤舫、陈养泉的徒弟。1935年在琉璃厂开陶古斋，直至1956年加入公私合营，后被分配在北京市首饰公司看管库房。

他鉴定秦砖汉瓦、古陶、石雕造像、宋元瓷器的眼力好，就是心眼小，缺乏胆量，安分守己，做正常买卖维持生活。他开的陶古斋，一间小门脸儿，两三个人，鉴定经营一些陶人陶马，唐三彩的瓦器较多。那时，这些古物不大值钱。21年的经营中，有件宋汝窑瓷盘和西夏时代的白玉造像，是珍贵文物，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事有凑巧，他在看管库房时，见到他当年心爱的那尊西夏白玉造像被放在院中任凭风吹雨打和践踏，紫檀佛龕早没啦。

他伤心落泪了，几宿没睡好觉。他好不容易将这尊玉石观音佛像花千元联合票（日伪时期的货币）买到手，1948年，有人给他3 000元，他不肯出手，一直收藏到公私合营归了公，而公家如此对待这件珍贵文物，令他伤心难过。1957年“反右运动”，在向党交心会上他说出心里话，但很委婉，没说公方不懂行，将珍贵当粪土。领导者听之顺耳，将白玉造像收藏起来，但佛龕始终没找到。可是，曹旭深心理受刺激不小，从此不再喜爱文物，尽职尽责去做保管工作。

王致中（1905—？），北京附近人。幼年在延古斋学徒，是赵鹤舫的徒弟。鉴定唐三彩和杂项等文物的眼力好。1938年在琉璃厂开怡文斋，1956年加入公私合营，后分配到西北工作，之后就听不到他的消息了。

他长得体面，中等身材，“同”字面，人又随和，老同行跟他开玩笑说：你若是在前清，非当大官不可，就凭你这张‘同’字面就得为官。原来，清朝时有规定，“申”字面，“由”字面的人，不被录用为官，“甲”字面还可以，最好是“同”字面。王致中不能做官，他自己说：我不会作八股文，只会看陶人陶马，脸长得再好也当不了官啊！

王致中不仅会鉴定唐三彩的陶人陶马，还能指导仿制唐代的陶俑歌舞人，由祝茂群给他仿制得惟妙惟肖，这路货他卖出不少，若收藏至今恐怕没人能鉴别了。他鉴定经营的唐三彩比目人骑骆驼、猴骑骆驼，算是珍贵罕见的文物了。1943年，沦陷后的北京，百姓生活最困难。地安门学院胡同一家朱门深院，住着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女儿、袁世凯的儿媳，为了维持生活，她也要卖家中收藏的古玩，往往由王致中给跑腿、拉纤，因为他有人缘。经王致中手卖过宣德官窑青花碗和雍正官窑青花梅瓶，还有其他古玩。

徐震伯（1908—1988），河北安平县人。幼年在琉璃厂

铭珍斋跟韩敬斋学徒，他同邱震生属于笔彩斋的第四代门人，他们的关系一直较好。他鉴定字画、宋元瓷器有独到之处，虽然他没开古玩铺，只是单干个人在家鉴定经营文物，却受到同行尊重。“九一八事变”后，他是大古董商岳彬的座上客，岳彬见到好瓷器，字画、刻绦等文物，有时请他帮助鉴定。同行人称他是岳彬的“高参”、“耳报神”，因为他们经常在一起聊。1948年，徐震伯和岳彬商量合伙办家珐琅小作坊，制作铜胎掐丝珐琅盘、碗、瓶、罐。没干三年赔钱了，因在北平解放前后的一段时间，没人买珐琅器物。1951年，徐震伯找岳彬说：咱们开的珐琅作坊赔了，也不多，你拿出五两黄金就够了。不料，岳彬火了说：你看解放了，来讹我，没门儿！一个钱也没有。徐震伯只可自己承担了，从此他们也就不往来了。

1946年，他帮邱震生鉴别出《苏东坡真迹》是勾填临摹之作，显示出他看字画的眼力很强。解放后，曾做过文物鉴定工作，给文物商店的人员讲过古瓷鉴别之课。1987年，笔者曾向他求教鉴定古字画的门路，仍很健谈，不料1988年便去世了。

丁兆凯（1908—1965），河北吴桥县人。15岁来京，在杨梅竹斜街蕴和店里跟岳彬学徒。1928年，岳彬搬到炭儿胡同后，由他主持彬记的日常业务。1942年，从彬记出号，自己夹包做古董生意了。北平解放后未被吸收到文物商店工作，卖旧货维持生活，一度生活困难，1965年便去世了。

丁兆凯在老古玩界中是位经多见广，有眼力，在国内外有名声的人物，人们都知道彬记古玩店的丁先生。他仪表非凡，1米8的身材，宽肩细腰，长方脸，高鼻梁，大眼睛，尖下颌；说话慢条斯理，从不与人争吵，是商人却有学者风度。他鉴定三代秦汉青铜器、北魏造像、浮雕石刻、唐三彩、宋元瓷、明清官窑和木雕的眼力，为同行人所称道。1987年，美

籍华人、文物考古学家李汝宽来京时，还打听丁兆凯，他说：“彬记的丁先生，人诚实，处世为人都好，鉴定文物仔细，经他过眼的东西错不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金石鉴定专家程长生前同笔者讲：“我们的大师兄丁兆凯是位好人，眼力也好，他要是在世，按能力说当专家、当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绝对合格。”笔者年少时就认识“丁大哥”了，14岁之后（1942）至到笔者考入华北大学前（1949），经常见到他，听他讲岳彬的历史故事，文物市场的见闻，以及鉴定知识、文物掌故等等。而今笔者能写这些书出来，还应感谢这位“丁大哥”。

1943年北京人吃“混合面”的时候，丁兆凯一人夹包做古玩生意没买卖可做，他没事儿到东晓市三庆成旧货铺去串门，掌柜的见彬记的丁先生来了，拿出刚收购的好货给他瞧。他见一件明弘治官窑黄釉青花三桃三果大瓷盘，口径有一尺二（40厘米），大而完整的明代官窑瓷盘很少见。而黄釉是弘治年间著名的单色釉，这种黄釉是用浇釉的方法浇在瓷胎上的，称之为“浇黄”，又由它的色彩较淡而显得娇艳，又叫“娇黄”。娇黄釉已属明贵，又加上苹果绿釉色，则属罕见奇特的釉色了。苹果绿是由于浇在盘子里青花苹果的画面上了黄釉（行话叫“肥釉”），入窑烧造时肥釉流动了，而形成苹果绿的颜色。这不是有意制作，而是浇釉过多，操作上的过失造成。但从美术观点上看，黄地青花加苹果绿，是有意制作也做不出来的一种别有情趣、赏心悦目的色彩。

这奇特釉色的明弘治官窑大瓷盘，是朝廷用的祭器，它的收藏来历不一般。卖盘子人是位大烟鬼，穷极了瘾上了，实在没辙了，才卖这件祖传的弘治官窑盘。三庆成掌柜在东晓市花500元伪币买下后，卖盘的老年人蹲在地摊前站不起来，他把他搀扶起，又请这位老人到大烟馆抽了口大烟，老人落泪说：

“我染了烟瘾，给祖宗丢了人现了眼！”原来这盘子是他的祖宗留下的纪念，他的先祖在明朝为官。清兵进关，祖宗传下明朝祭器，留下遗言说：“守住祭器，不给满洲人做官。”可是传到他这一代守不住了，换来吸大烟。

这一件具有历史教育意义的、釉色奇特的明代弘治年间的官窑大瓷盘，在日伪统治的 1943 年，在古玩商会窜货场上，才卖了伪币八万八千八百元。到抗日胜利后，卖给一位满洲贵族出身的收藏家衡致中，才两万五千元法币。据老行家讲，这盘子没出北京城圈，若“文化大革命”除“四旧”时不被毁坏，今日拍卖岂止千万！

刘学敏（1911—1965），北京人。15 岁在天和斋学徒，郭静安的徒弟。学的是鉴定瓷器，看明清官窑瓷器有眼力，人很精明，长得也秀气，大眼睛、高鼻梁，两道浓眉，白皙的面容，笑时还有俩酒窝，就是个头不算高。1935 年，随同天和斋的伙计孙华峰跑上海做古玩生意。1942 年，由范岐周出资在琉璃厂开陶庐古玩店，鉴定经营明清官窑瓷器。1956 年加入公私合营，他本人被分配在西单文物商店当门市部主任。

刘学敏鉴定经营过不少明清官窑好瓷器，具体物件回忆不起来了，有一件又粗又脏的宣德霁蓝釉暗龙大碗，却写进了台北出版的《郭良蕙看文物》书里边。刘学敏于 1942 年从天津劝业场一家小古玩铺里买来的，这碗原是天津盐运使的后人卖出来的。民国以来早先家财万贯的盐运使，日渐衰落下来，老人去世后人不识古玩，用这碗盛咸黄酱用了二十来年，因碗的胎骨厚，又放在固定的地方使用，一直没坏。可碗内印□儿一直刷洗不掉，所以这碗没人爱要。刘学敏花 500 元伪币联合票买到手，回到北京卖不出去。后被上海同行仇焱之花 800 元买走。1980 年在《敦良蕙看文物》书中写道：这碗在 1980 年 11 月 23 日拍卖到 370 万港币了！

崇庆瑞（1912—1962），字云■，满族，北京人。15岁到天和斋跟郭静安学徒。他个子不高，人很机灵，鉴定明清官窑瓷器和古墨石砚的眼力不错。崇佑之是他的叔父，叔父去世后（约在1935年），韵珍斋由他经营，干了12年买卖关了，自己在家鉴定经营古董。1952年后，在琉璃厂火神庙文化馆当服务员。

他鉴定经营的明清官窑瓷器中有件乾隆官窑飞燕双耳霁蓝粉彩大罐，仍在老古董商的记忆中，他卖给孔府的大圆覆寿观，同李欣木合伙去东北，买来《苏东坡真迹》等往事，而今仍在传说。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精明能干，说话时眼珠乱转，走起路来跳跳窜窜，老同行叫他“小崇”，他抿嘴儿笑，云■的号没人叫。庆瑞是他的名，一位翰林给他起个号叫云■，有人跟他说，你这号的意思是“彩云”，大男子汉怎能叫这个名号？！他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古代以三色彩云为瑞征，庆瑞为名，云■为号，十分恰当。庄翰林还告诉我说：《扬州画舫录·草河录上》有句：“亭中云气往来，或化而为嘉禾瑞草，变而为■云醴泉。”后来用云■比喻贤德而有地位的人，“紫譙以象小人，■云以象君子。”无论他怎么解释，老同行还是叫他“小崇”崇庆瑞。

李汝宽 1908年生于山东招远县。15岁来北京，在前门大街挂货铺学徒。约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他在前门大街开设奇珍祥挂货铺。“七七事变”后，北京的古玩铺、挂货铺生意萧条，而奇珍祥的生意越做越好，李汝宽还被推选为北京市古玩商会的理事，在古玩行业中有了名声。原来是这位山东人很有钻研劲头，他研究古旧地毯，是个冷门，研究古瓷、雕漆有独到见解，还会说英国话。偶然的机，他认识德国驻中国大使比德尔，这位大使在他本国法兰克福博物馆看到中国古地毯，对它的编织、染色、图案很有兴趣，来到奇珍祥又见到

中国古地毯，便同李汝宽聊。比德尔不会说汉语，李汝宽不会说德语，俩人用英语会话，交了朋友。

经比德尔的宣传介绍，外国人到奇珍祥买古旧地毯的人多了，李汝宽在北京搜集旧地毯，但旧地毯的货源有限，供不应求。于是，李汝宽投资开了两家地毯作坊，编织仿古地毯。一家设在南岗子法华寺，由技师啜再荣主持织做；一家设在校卫营，由王祯师傅领着干活。他们按古地毯的编织模式、染色、图案制作。做好了放在屋顶风吹日晒，去掉浮色；再用人工脚踩，好似曾经使用过。还要用梳子梳，用耙子耙，把地毯绒毛疏松，使之现出松散自然、古色古香的形象。这种仿制品甚受国外朋友们的欢迎。

“八一五”抗日胜利后，李汝宽在上海金陵西路54号和南京中山路开设奇珍祥分号，经营古旧地毯，从天津进拉绞地毯补充货源。这时的销路主要在美国，李汝宽同美国的考古学者、美军将军交上了朋友。1948年，他将北京、上海、南京的奇珍祥关了，将货运往香港，带领师弟王德纯在香港九龙重庆市场开设利华有限公司，经营新旧地毯、皮货和漆木家具等。50年代初，李汝宽将利华公司交给王德纯经营，他本人到日本东京开古玩店去了。他往返于香港、东京、纽约，鉴定经营古地毯、陶瓷、雕漆、铜器等文物，成为鉴赏收藏家、考古学者。老年时著书立说，写出《西域长城艺毯图录》、《中国漆器》、《宋代青花瓷》等专著，1980年在美国和日本出版发行。

改革开放后，他几次回到北京，会见老朋友叙旧，并向北京大学捐献文物。1993年夏，他以86岁的高龄又来京，并带来“唐青花瓷”进行研讨，老而不忘故国。

王哲东（1920—？），字圣源，山东招远县人。李汝宽的外甥。14岁来北京，在前门大街祥和成挂货铺学徒。学会

鉴定经营瓷器、铜器和古旧地毯等文物，自学英语，可用英语同外国人交谈做生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下令将北京商铺的英文招牌去掉，学校取消英语课。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著名大画家梅原龙三郎来到祥和成挂货铺，他不会说中国话，会用英语会语，跟王哲东聊起来了。梅原龙三郎喜爱西藏毯毯的彩色浓艳、古地毯图案的多样而美观、他搜集西藏毯毯和古地毯做艺术标本，丰富自己绘画创作的灵感。王哲东陪他在北京搜集，做义务翻译。并陪他游览和看京剧，二人交了朋友结了情谊，王哲东到了老年仍在怀念这位老友。

日本投降后，王哲东在六国饭店设摊卖地毯和旧货，生意萧条，后去了青岛卖皮货和地毯。青岛解放，他申请去了香港。在香港凭他的鉴定经营古旧地毯、瓷器、铜器的能力，可以立住脚，还可发财致富。但他思念家乡，又回到北京，在西湖营开办了新兴美艺商行，经营新旧地毯。1954年，西藏代表团来京，他做起藏族兄弟的地毯生意。在代表团成员格桑旺堆和江洋伯姆的支持下，销往西藏的地毯生意有了门路，两年不到，两个人做生意为国家创了万元税收。

1956年，新兴美艺商行加入了公私合营，王哲东当了工艺品出口公司的门市部主任。1957年入国营北京市工艺品出口公司，王哲东负责鉴定旧地毯的年代、产地、图案、质量和规定出口价格。

1957年至1965年，这八年是北京旧地毯出口业务兴旺的年月，中国地毯在国外重振名声，受到国际市场的欢迎，王哲东在出口旧地毯业务上做出过贡献。同时，在国内收购旧地毯和去新疆考察地毯生产情况等工作上，也有成绩。“文化大革命”时，新旧地毯出口日渐减少，王哲东受到批斗、下放劳动等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始终无怨言，国外来信先拿给领导

看。后来，他退休在北京市首饰公司，老了时还想将自己鉴定经营古旧地毯的经验留下来，准备编写一部《中国古旧地毯图录》，曾与笔者合作两年多，后因病未能如愿，他病重时仍想着出书。

范岐周 名凤山，1907 年出生于河北衡水县。1921 年来京，在琉璃厂大观斋学徒，赵佩斋的徒弟。1928 年，在雅文斋担任副经理。1937 年在琉璃厂开设韞云斋，1942 年开设陶庐古玩店。1956 年加入公私合营，他被分配在北京市首饰公司工作，直至退休。他是老古玩界著名人士中硕果仅存的高龄老人。

他 18 岁开始做古玩买卖，第一个买主是留学法国，在北京政府做事的刘符城。刘符城喜爱法国油画，因法国油画能较充分地表现对象的复杂色调和丰富的层次；他也爱中国的古缂丝画，缂丝画面细腻柔润，尤如杜甫《丽人行》：“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那样美丽动人，远观之又似雕刻镂空颇有立体感。刘符城用每月工薪的一半收买缂丝。范岐周给他送去一幅乾隆年代的缂丝花鸟画挂屏：花鸟细腻如生，花蕊花瓣鲜明，鸟似展翅欲飞，生气腾腾。刘符城花一千二百现洋买下收藏。28 年过后，范岐周在前门大街巧遇刘符城，历经沧桑，“三反”、“五反”运动刚结束，回首往事，刘老先生说：“我已六十多岁了，那幅缂丝花鸟挂屏还在我手中。生活困难我想出售，拿到故宫博物院，惜尚无人能鉴别古代缂丝，给我俩钱来应付，我不肯出手。而今我还有六幅缂丝画，昔日无价宝，今日不值钱了！”相互感叹后分手。

范岐周在雅文斋当副经理时，有位徒弟孙福凯在雅文斋干了八年，被经理萧书农辞掉，求人锯锅（即饭锅裂了找人锯上，形容被辞退的求人给说合继续工作），锅没锯上。孙福凯问范岐周怎么办？范问他，你有没有胆子，咱另开家古玩店？

孙答：您指导，我就敢干。于是，范出资两千元，孙会元（福凯的号）在1937年开设韞玉斋古玩店。这家老字号而今仍保留在琉璃厂东街，孙会元于1986年被选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陶瓷鉴定家的名声远扬海内外。

30年代后期，一天雅文斋门市上来了位顾客，选了件康熙官窑五彩罐：白地彩绘人物耕织图，彩色鲜艳，光泽透澈明亮，彩画手法精妙。历来鉴赏家认为：画人物，是以康熙五彩“耕织图”为最佳。“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一尺五（50厘米）高、带盖的大罐。当时只卖了600银元，今日600万元谁又能买到这样好的康熙官窑五彩大罐？！

没过几天，这位顾客又来买走康熙郎窑瓶，乾隆一道釉小花觚，还有五彩、粉彩、斗彩、青花官窑瓷器二十多件，花了一万多元。从交易中，范岐周了解到这位顾客是澳门著名收藏家萧瀛洲的女婿，留学法国寓居上海的梁培先生。他陪同梁培到各大古玩店选购上等官窑瓷器，不收回扣不要报酬，二人交了朋友。1940年，梁培出资四万，由范岐周给买货，加利润一成。从此韞玉斋的古玩生意有了生机，在文物市场萧条时期，还鉴定经营两件商代青铜器觚和壶，明永乐青花葫芦瓶、宣德釉里红高把杯等珍贵文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文物市场萧条，出口中断，六位大古董商：仇焱之、张仲英、戴福葆、张雪耕、洪玉琳、管复初联合起来成立“六公司”度难关。梁培提议并出面联合上海的叶叔重，香港的潘溪、北京的范岐周成立古董联营公司，请范岐周担任总经理，古玩出口困难，可在香港、澳门、广州、上海、北京搞联营，一俟战争结束则可同美国的卢钦斋抗衡。计划很好，财力、文物都很充裕，若范岐周出山可展鸿图。但是范岐周惟恐多家联合，他当总经理，自己难于调和各家之利益与矛盾，因而放弃。他自己单独在北京鉴定文物，经

营韞玉斋。1990年，年已八十多岁的范岐周述说这段往事时，笔者跟老人说：“仇焱之、梁培于1948年去了香港，潘溪早在香港定居。叶叔重留在上海，解放后走私文物，判刑后死在西北。在香港的三位早已是著名的收藏家了，仇焱之还被称为“世界五大陶瓷收藏家”之一。当年“南仇北范”（40年代鉴定瓷器是南方的仇焱之，北方的范岐周名声较大），而今您安贫守本，默默无闻。”老人一笑说：“鼎鼎大名有什么用，仇焱之1980年前就去世了。古玩界过去出名的人不少，他们早已作古，我活到现而今，不愁吃穿，遇上太平年月，我很知足。”今年（1999），范岐周老人已是93岁高龄，他长寿的秘诀是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心情平静。

马宝山 1910年出生于河北衡水县南谢漳村。1927年来北京，在琉璃厂墨宝斋学徒，侯荣斋的徒弟。1934年，经营墨宝斋，直至1956年加入公私合营。合营后被分配在琉璃厂庆云堂当业务员。1966年在文物管理处做文物鉴定工作。1979年，在北京市文物局复制厂担任业务指导。1980年，调入首都博物馆做书画碑帖鉴定工作。1981年退休后被聘为首都博物馆鉴定委员。现在还担任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北京老年书画联谊会顾问，中国文物学会顾问。

马宝山有七十余年的书画、碑帖鉴定经验，是位鉴定碑帖硕果仅存的权威专家，著有《书画碑帖见闻录》。而且还是位著名的画家，他画的《百松图》巨卷，赠献给毛主席纪念堂，敬祝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故宫博物院收藏他两件作品，荣宝斋展出代售他的作品，出版有《马宝山先生画集》。

他鉴定经营名贵书画、碑帖珍品有数百件之多，著名的有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张好好诗》、顾恺之《洛神图》、孙过庭《景福殿赋》、颜真卿《裴将军帖》、张逊《双钩竹》巨卷、盛子昭《秋江待渡图》等等。马宝山同鉴赏收藏家、

书画家相识与交往，尤与宝熙、罗振玉、衡亮生、张伯驹、张大千、齐白石、陈半丁、启功等名家交往较多。他自幼喜爱书画，勤于动笔，又长年鉴定书画，耳濡目染，神领意会，托诸笔端，山水画卷远攻云林，近交浙江，笔简空灵，淡雅绝尘。年近九旬，日日挥笔，勤奋不辍。

李卓卿 名廷琦，1911 年出生于河北香河县北吴村。1918 年来京，在琉璃厂崇古斋学徒。

崇古斋是清末奉天新民府知府、著名书画家陈衍庶（字昔凡）于光绪三十年出资万两白银开设的，在沈阳大南门里（后迁小南门里）设分号。1931 年，李卓卿出任崇古斋沈阳分店经理。1940 年，总店经理牛在如去世后，他致函远在四川江津的陈昔凡夫人谢氏。不料，谢氏夫人和陈昔凡之子陈独秀已先后去世。由陈独秀的小儿子陈松年给李卓卿回了封长信，委托李卓卿掌管经营北平、沈阳两家崇古斋古玩铺。1956 年，公私合营时，李卓卿将这封长信出示给公方代表，此信仍保留在李卓卿之手。

合营后至 1959 年，李卓卿被分配在北京特艺美术品公司宣武管理处下属琉璃厂韵古斋、萃珍斋门市部，担任鉴定采购工作。1960 年至 1980 年，特艺公司转为首饰公司，在五科担任鉴定采购工作，后退休。

李卓卿以鉴定古代字画和陶瓷见长，是老古玩界中而今仍健在的、有丰富鉴定经验的专家之一。

公私合营前，他鉴定经营历代名人字画和名窑瓷器很多。字画以隋展子虔《游春图》、宋范仲淹手迹《道服赞》为最著名，陶瓷以明万历官窑青花十六子戏耍图大罐著称（此罐从日本古董商手中收购）。

合营后，为国家收购文物做出较多贡献。宋定窑粉定刻花瓶，已由故宫博物院收藏，还有雍正、乾隆官窑彩瓷多件转入

琉璃厂文物商店。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外贸公司举办的文物鉴定学习班上、曾多次讲授陶瓷、字画鉴定知识课程。“文化大革命”中为保护文物做过贡献。“破四旧”时，我国文物遭到空前破坏，令人痛心。上级曾派李卓卿去收购，他尽力将作为“四旧”的文物收购为国家所有，并将有价值的文物留在外贸公司不出口。1967年，李卓卿去西谊宾馆见一幅徐悲鸿画的画，上款是“赠郭沫若”；在酱房胡同一家宅院见另一幅徐悲鸿画的马，上书“宜生将军为北平二百万生灵免遭涂炭，和平解放纪念。”他建议这两幅画不应出口。他曾到傅作义府上收购傅将军处理的字画文物，傅将一幅明代著名画家文徵明的画也处理掉。李卓卿建议他留下鉴赏收藏，傅作义说：“我让它们一扫而光，全不要！”可见，“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令人气愤之情景。在这种气氛下，他为国家收购许多珍贵文物，转入首饰公司、文物商店保存下来了。

*

*

*

笔者经十多年的调查采访，才写出以上 115 位老古玩界人士的传略。还有的鉴定名家笔者尚未了解到，未能写入。而已知的著名鉴定家，如：王禹平、耿宝昌、刘九庵、孙会元、程长新、傅大卣、萧允中、苏盩春等师兄的传略，笔者相信会有人写的，因为他们是闻名海内外，被选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专家，笔者尚无力写好他们的传略。

二、琉璃厂古玩铺老字号表

自 1845 年至 1948 年，在琉璃厂街上曾开设的古玩铺约 125 家，简介于下：

字 号	经理人	开业时间	备 考
宝文斋		道光年间	经营字画、法帖
博古斋	祝锡之 李镜湖 孙虞臣	道光乙巳年（1845）	鉴定经营金石、字画，20 世纪 30 年代后又有博古斋字号重新出现，经理人不详
德宝斋	李诚甫 刘振卿 李德宣 贾济川 毛子恒	道光末年（1850 年）	经营金石、秦汉印章、古墨石砚、古玉等文物杂项
宜古斋	李云从 朱鹤泉	咸丰十年（1860）	鉴定经营法帖碑石。原经理人不详，光绪十年后，李云从是经理人。民国以后专营碑帖，店铺划归帖业，琉璃厂约在二十余家，后碑帖铺亦属古玩业

字 号	经 理 人	开 业 时 间	备 考
论古斋	萧秉彝 萧勋臣 萧云章 萧少云	同治元年（1862）	鉴定经营书画、玉石、印章、墨、砚
笔彩斋	× × × 袁厚民 陈东甫 武琴轩	同治四年（1865）	鉴定经营书画和古瓷、杂项
英古斋	陈 × × 徐全义 贾丕焕 关耀先	同治六年（1867）	鉴定经营玉石印章、古墨、石砚等文玩
清韵阁	袁庆馀	光绪四年（1878）	经营书画、法帖
茹古斋	孙虞臣 赵佩斋 白五楼	光绪九年（1883）	鉴定经营书画、法帖、杂项
鉴清斋	阎蕴斋	光绪十年（1884）	经营书画、杂项
鉴古斋	袁春江	光绪十年（1884）	经营书画、杂项
永宝斋	崔阶平 贾凤笙	光绪十年（1884）	鉴定经营书画、瓷铜印章
德珍斋	袁厚民 赵沧涛 张君翔	光绪十九年（1893）	鉴定经营书画、铜器、瓷器和玉石、杂项

字 号	经理人	开业时间	备 考
怡墨斋	阎筠亭	光绪二十年（1894）	鉴定经营法帖、书画
吉珍斋	张竹君	光 绪 二 十 二 年 (1896)	鉴定经营字画为主
尊古斋	黄兴甫 黄伯川	光 绪 二 十 三 年 (1897)	鉴定经营金石、古玉、陶片、古印等
寄观阁	计文卿 马瑞亭	光 绪 二 十 三 年 (1897)	鉴定经营法帖、书画、金石
赏奇斋	张楼村 程启元 杨润斋	光 绪 二 十 四 年 (1898)	鉴定经营金石、瓷器等古玩珍品
大观斋	赵佩斋 何骥良 张云岩 王金声	光 绪 二 十 五 年 (1899)	鉴定经营杂项文物
富润轩	张子青	光 绪 二 十 五 年 (1899)	鉴定经营书画、碑帖、金石
延清堂	丁济谦 任雁亭	光 绪 二 十 七 年 (1901)	鉴定经营瓷器、杂项
瑞珍斋	程瑞卿	光 绪 二 十 七 年 (1901)	鉴定经营明清官窑瓷器
益珍斋	刘益卿 萧静亭	光 绪 二 十 八 年 (1902)	鉴定经营字画
墨宝斋	侯荣斋 马宝山	光 绪 二 十 八 年 (1902)	鉴定碑帖，经营字画

字 号	经理人	开业时间	备 考
明雅斋	丁来临	光 绪 二 十 八 年 (1902)	经营杂项、书画
悦古斋	韩懿轩 韩博文	光 绪 二 十 八 年 (1902)	鉴定经营书画为主
馥古斋	寇余轩	光 绪 二 十 八 年 (1902)	鉴定经营书画、瓷器
云松阁	李 × ×	光 绪 二 十 八 年 (1902)	鉴定经营陶瓦器、杂项
澄云阁	杜琢庵	光 绪 二 十 八 年 (1902)	鉴定经营法帖、书画、 杂项
韞珍斋	李克甫	光 绪 二 十 八 年 (1902)	鉴定经营玉石印章、古 砚墨
石妙斋	尚彦甫 王辑之	光 绪 二 十 八 年 (1902)	鉴定经营书画、法帖
彝古斋	呼克祥	光 绪 二 十 八 年 (1902)	鉴定经营书画
赏古斋	张舜卿 刘云朴 刘少溪	光 绪 二 十 八 年 (1902)	由刘云朴鉴定经营书 画、碑帖
闻光阁	朱溥泉	光 绪 二 十 八 年 (1902)	鉴定经营书画、瓷器
信古斋	刘克昌 程秋浦	光 绪 二 十 八 年 (1902)	鉴定经营书画、杂项

字 号	经 理 人	开 业 时 间	备 考
致宝斋	郭质庵 郭梅亭	光 绪 二 十 九 年 (1903)	鉴定经营瓷器、字画、 铜器、杂项
韵古斋	韩少慈	光 绪 二 十 九 年 (1903)	鉴定经营书画、瓷器
崇古斋	张鸿瑞 李卓卿	光绪三十年 (1904)	鉴定经营杂项、瓷器
铭珍斋	翰敬斋 冯湛如	光绪三十年 (1904)	鉴定经营书画、瓷器
式古斋	孙秋 ^枫 杨福旺	光 绪 二 十 九 年 (1903)	鉴定经营金石、杂项
博观斋	刘华西	宣统三年 (1911)	鉴定经营瓷器、铜器、 杂项
韵珍斋	崇佑之 崇庆瑞	宣统元年 (1909)	鉴定经营砚、墨、瓷器
蕉叶 山房	张莲舫 张玉华	宣统三年 (1911)	鉴定经营古琴、瓷器
论文斋	刘子恒 靳伯声	宣统二年 (1910)	鉴定经营书画
晋雅斋	康竹亭	1912 年	鉴定经营金石
博韞斋	杨伯衡 萧虎臣	1912 年	鉴定经营书画、瓷器
商旧阁	董兰池	1913 年	鉴定经营瓷器、铜器、 杂项

字 号	经 理 人	开 业 时 间	备 考
延古斋	赵鹤舫 陈养泉	1913 年	鉴定经营金石陶、瓦器
清逸阁	程瑞卿	1913 年	鉴定经营瓷器、杂项
尚古斋	孔华峰	光 绪 三 十 二 年 (1906)	鉴定经营瓷器、杂项
绮 ■	张伯翔	1913 年	鉴定经营书画
蕴秘商	卢月舟	1914 年	鉴定经营字画
古欢阁	姚栋臣	1916 年	鉴定经营书画、杂项
贞古斋	苏惕夫	1917 年	鉴定经营书画
宛 委 山 房	吴寿亭	1917 年	鉴定书画、裱画
敬古斋	萧敬斋	1916 年	鉴定经营字画、古玩杂项
聚古斋	袁质彬	1917 年	鉴定经营书画
学古斋	贾平斋	1918 年	鉴定经营图章、砚墨
问古斋	郭彬生	1918 年	鉴定经营法帖、书画
清和斋	夏锡忠	1918 年	鉴定经营金石、陶瓦、瓷器。后迁南池子
玉 池 山 房	马霁川	1918 年	鉴定经营书画
古光阁	周希丁	1918 年	鉴定经营书画、金石、篆刻

字 号	经 理 人	开 业 时 间	备 考
雅韵斋	张德鹤 苏凤山	1918 年	鉴定经营杂项、宣德炉
鉴古斋	周杰臣	1918 年	鉴定经营缂丝、书画、瓷器
鉴光阁	张效禹 傅凯臣	1919 年	鉴定经营书画、瓷器
蕴辉阁	朱仲超	1920 年	鉴定经营书画
振雅斋	卢月舟	1920 年	鉴定经营书画
话古斋	李允升	1920 年	鉴定经营书画
证 古 精 舍	张治平	1922 年	鉴定经营书画
虹光阁	杜华亭 杜少亭	1923 年	鉴定经营书画、杂项、瓷、铜玉
博雅斋	张君翔	1923 年	鉴定经营书画
文燕斋	张寿卿	1923 年	
渊识斋	毛子恒	1923 年	鉴定经营字画、铜器、杂项
贻观阁	孙仲三	1924 年	
师古斋	孙秋江	1924 年	
静观阁	安溪亭	1925 年	鉴定经营宋元瓷、明清官窑瓷器
文芳阁	路仲芳	1925 年	

字 号	经理人	开业时间	备 考
蕴古斋	汪筱舫 刘竹坡	1925 年	鉴定经营金石、瓷、陶
博闻簠	韩醒华 郝葆初	1926 年	鉴定经营铜、瓷、书画
蕴竹斋	阎德民	1927 年	鉴定经营字画、杂项
珍古斋	张兴府	1928 年	
晋秀斋	贾济川	1928 年	鉴定经营书画、印章、金石
雅文斋	萧书农	1928 年	鉴定经营瓷器、杂项、铜器
德润兴	何玉堂	1928 年	鉴定经营瓷器、杂项
杭希阁	田健秋	1929 年	
国华堂	萧程云	1929 年	鉴定经营书画
静 寄 山 房	萧静亭	1931 年	鉴定经营书画
惠古斋	柳春农	1931 年	鉴定经营书画、杂项
集 粹 山 房	周殿侯	1931 年	鉴定经营书画
永誉斋	李健平 李欣木	1931 年	鉴定经营印章、砚墨
通古斋	乔友声 黄镜涵	1931 年	鉴定经营金石

字 号	经 理 人	开 业 时 间	备 考
博鉴斋	孙少虞 刘润之	1933 年	鉴定经营书画、古玩
蟠古斋	刘廉泉	1935 年	
大雅斋	王幼田	1935 年	鉴定经营瓷器、杂项
陶古斋	曹旭深	1935 年	鉴定经营金石、陶瓦
玉纲斋	马振卯	1937 年	鉴定经营古墨、书画
韞玉斋	范岐周	1937 年	鉴定经营瓷器、金石
怡文斋	王致中	1938 年	鉴定经营陶瓦、金石
萃珍斋	黄同文	1938 年	鉴定经营新旧瓷器、书画
二孟斋	李孟东	1938 年	鉴定经营书画、瓷器
振寰阁	裴振山	1939 年	鉴定经营金石、陶
藏辉阁	毛润甫	1940 年	鉴定经营玉石、印章
成古斋	孙成章	1940 年	鉴定经营瓷器铜、杂项
文古斋	陈中孚	1940 年	鉴定经营瓷器铜、杂项
协 记	谢君忱 刘尊三 司仁甫	1940 年	鉴定经营瓷器
葆珍斋	杜樾林	1940 年	鉴定经营瓷、铜、杂项
学古斋	温德润	1942 年	
陶 庐	刘学敏	1942 年	鉴定经营瓷器

字 号	经 理 人	开 业 时 间	备 考
墨缘阁	刘九庵	1942 年	鉴定经营书画
宝古斋	邱震生	1944 年	鉴定经营书画为主
馥粹斋	王孝禹	1944 年	鉴定经营瓷器
裕文斋	傅大卣	1944 年	鉴定经营金石、古玉
振华斋	耿宝昌	1944 年	鉴定官窑瓷器
宣和斋	孙会元	1946 年	鉴定经营瓷器、杂项
万古斋 裕古斋 润珍斋 春永斋 宝铭斋 德源堂			这六家老字号见于寂叟《海王村游记》中，只记字号与所见文物，而无经理人姓名和开业时间的记载
典古斋 振古斋 萃古斋 益宝斋 古雅斋 晋古斋	刘永泉 杜撝云 罗绍先 商春升 徐 轩 李清航		这六家字号，开业时间不详，约在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

后 记

我是个教书的，“在十亿人民九亿商”盛行时，我所在学院撤销了，要我改行去经商，我干不了。我的一位领导说：“必要时，教授也可以去喂鸡。”我更是想不通。“坎坷出文章”，北京财贸学院《学报》主编石椿年先生给我出个主意，他说：“你去写书，北京古玩行业的历史还没人写，你有条件写出来。”我说：“那可不容易。”他说：“你去调查研究，下决心干几年。”我想没事干，做做社会调查也是有益的。

当我拜访阔别了四十来年的古玩行业中我的前辈和兄长时，见他们都已须发皆白、老态龙钟。他们跟我说：“曾有人想写琉璃厂古玩行的历史，也找过我们，但写不出来，皆因是外行人，又没见过老古玩行的人和事。”并说：“要写就要抓紧时间，等我们这茬人没了，谁想写也写不出来了。”听他们一说，激发了我的写作欲望，我想，这部分重要文物历史资料眼看要泯灭了，不能坐视不顾。

1986年夏季，我开始走访古玩行业的老人，有的愿意跟我谈往事，有的则不愿讲过去的事；有的说了一件事，我要核对几个人；有人给我说了一件事的头，我要找另外一个人讲内容和结尾。我奔走了一年，才写出十多万字的“古董纪实”六十余篇，请我的师叔范岐周老先生审阅，他看后说：“都是

事实，但要继续加工，继续往下写。”这时，遇到 50 年代初我的一位领导，他问我干什么呢，我说：“没事干，搞点调查研究，写点东西。”我将稿子给他看，他推荐给文物机关。不久，来了回信说：“书稿已拜读，内容之丰富翔实，实在不可多得。我们商议，准备以连载的形式摘编后在报上发表，以后可以考虑出本册子。”

可是久等不见报。我有点沉不住气，跟我师兄孙会元老先生说：“您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他让我沉住气、别着急，并说：“你继续往下写，认准的事要干到底。”我又跟 邱震生 老先生说这件事，邱老说：“那 60 篇你甭管，往下写。我当过北京市文物业公会主任委员，我写过一些回忆，不完整，很短。你把它完成了。”

在他们的鼓励支持下，我反复调查，补充原有的 60 篇素材，到 1989 年底，才系统写成《古玩史话与鉴赏》30 万字的书稿。1990 年的夏季，我又做了一次大的补充修改，才算彻底写成这本书。

本书写作承蒙范岐周老先生之指导和孙会元、邱震生、徐震伯、程长新、王哲东、张廷烈、李卓卿、王金声、张汉儒诸位老先生的支持与协助；傅大卣师兄给题了书签；书的出版承蒙洪淑梅大姐、关奎章先生和吴松雪先生之相助，在此对他们深表谢意。

石椿年先生对本书的写作与出版，一贯支持、关心，曾审阅书稿，联系出版，并在《学报》上连载发表《古董经营》等六篇文章。我俩幼年时拜在国学家、书法家魏旭东老先生门下，既是同窗，又是挚友，在此就不再言谢了。

陈重远

1990 年 7 月 8 日

写于北京海淀双榆陋室



再版后记

《古玩史话与鉴赏》是我从 1986 年 5 月至 1990 年 7 月采访古玩、珠宝老行家三百余人次后写成的。出版后颇受广大和文物爱好者的喜爱和欢迎；香港、台湾的文物、文史刊物也给以关注。随之，香港《大成》杂志、《龙语》杂志和台北《典藏》杂志，陆续刊载了我的不少文章。

港、台以及海外其他地区的读者不少人喜爱看介绍古玩历史和鉴赏知识方面的书和文章，而《古玩史话与鉴赏》未曾在港、台印刷发行。故而我于 1992 年写了一本以宋瓷、明清官窑瓷器和青铜器为内容的 20 万字的《古玩旧闻》书稿，准备在台湾出版，向海外传播。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见结果。1993 年 11 月，古玩老行家和出版界的朋友给我出主意、提要求，要我将出版和未出版的百万字书稿，统一整理、修改、补充，写出一部全面的、内外行人都爱看的介绍文物市场和鉴赏古玩知识的书。88 岁的范岐周师叔说：“文章是改出来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下苦功夫采访写作，不要着急上火！”邱震生在去世前曾要求我说：“我拜托你给咱古玩行写出部像样的书来！”

我开始写古玩至今八年了，累计采访老行家五百余人次。我从 10 岁就住进琉璃厂一家古玩铺里，二十来岁离开，老古

玩、珠宝行业中的亲朋较多。我应该达成前辈人和朋友们的希望与要求，在有生之年努力写好这部书。师兄傅大卣说：“你写吧！我再给你提供点资料，写好了我给你写篇序。”没料到他于1994年8月初因病去世了，实在遗憾！

正当我继续采访写作时，《古玩史话与鉴赏》的责任编辑王春元同志找我，要再版这本书。春元很热情，他说：“这是介绍文物历史和鉴赏知识、写琉璃厂古玩行的第一本书。读者要求再版，你看如何？”

感谢读者的厚爱，感谢王春元同志、杨华同志和戴京彤同志的帮助。据我所知，写琉璃厂的书早已有过：乾隆进士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光绪进士缪荃荪《琉璃厂书肆后记》、孙殿起写琉璃厂书铺行业的……但专门介绍古玩行业历史和鉴赏知识的书，《古玩史话与鉴赏》算是第一部。

既然要再版这样一部书，那就更应仔细校正、好好修订，但又不宜做更多增添补充，应使其保持本来面目，供读者观赏阅读。

为纪念傅大卣师兄，本书扉页里再版时保留了他题写的书名，感谢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古书画鉴定专家刘九庵兄为本书再版题字。并向为本书提供口头资料、今已作古的毛润甫、邱震生、周殿侯、徐震伯、张廷烈、程长新、傅大卣等古玩、珠宝老行家致以深切怀念！

陈重远

1994年9月初

写于双榆陋室

第二次再版后记

这次再版改了书名，也增删了一些内容。古旧地毯的内容删掉了。全书做了文字校正修订；一些史实与观点进一步挑明：文物整修复制和能工巧匠、老古董商传略的内容增加较多，但仍保持其原来面目。这是我写文物市场史实和收藏鉴赏知识的第一部书。为使书名同我后来写的几部书的书名吻合一致，改名为《鉴赏述往事》。

全书修订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征求了文物界前辈人的意见，在 93 岁高龄的范岐周、90 岁的马宝山、89 岁的李卓卿的指点支持下和北京出版社文史部杨良志主任、责编刘剑宏同志的关怀下，修订和再版了这部书。

陈重远

1999 年 6 月写于双榆陋室